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世纪之书：

名人评点百年国外名著

eBOOK
网络资源 电子图书

前言：一个世纪的智慧长河

一

人类是一条河，一条奔流不息、汹涌澎湃的河。

她从远古走来，由无数涓涓细流，汇集成滔滔大河。她一路欢歌，一路豪情，穿过岁月的河床，走过 20 世纪，奔向憧憬的未来。

这是一条智慧的河，一条流淌着人类聪明、才智的河。每一滴河水都闪烁着智慧的光芒，每一朵浪花都映照着智者的身影。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即将过去的 20 世纪，是一个令人陶醉、令人深思的世纪，它以鲜明的时代特征，给人们留下了不尽的分析、评判的议题。

这是一个高速发展的世纪，一个创造着辉煌文明的世纪。在这个世纪里，人类不仅创造了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也创造了无比灿烂的精神文明。这两种文明交相辉映，互相促进。

20 世纪，是自然科学的时代。科技巨子，层出不穷。科学家的辛勤劳作，使 20 世纪科技发展日新月异，令人瞩目。夸父追月，精卫填海，人类这些早期的幻想，今天借助科技的手段，都变成了现实。

20 世纪，也是社会科学的时代。社会科学大师们所创造的业绩，也同样辉煌璀璨。社会的高速发展所引起的巨大变化，使人类面临着众多的困惑和难题。社会科学的大师们，运用他们睿智的眼光，紧紧地把握着时代的脉搏，对众多繁杂的社会现象给予深刻的思考。他们从不同的学科，从不同的角度，对人类社会生活进行了极其深刻的剖析。自然科学的发展，也为社会科学大师们提供了现代化的手段和方法。

展现在我们面前的极其丰富的社会科学著作，就是社会科学大师们的汗水和智慧结晶。那些鸿篇巨著里的每一个思想，无不闪烁着大师们的智慧之光。大师们那严谨的逻辑，精湛的推理，在人类发展史上都是空前无比的。

人类要展望美好的未来，就必须总结自己的过去；

人类要追求完善的自我，就必须剖析自己的灵魂。

20 世纪的社会科学极其丰富，包括哲学、历史学、政治学、军事学、经济学、管理学、社会学、心理学、教育学、科学学、宗教学、未来学等等，涉及人类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从人类社会历史的发展到民族国家的兴亡衰落；从社会的伦理道德到人的本性的善恶；从抽象的哲学思维到具体的现实生活；从宏观的经济理论到微观的经济操作；从两性需求的生理现象到性爱的感情融合……，每一方面都有社会科学研究的丰硕成果。

二

让我们走进社会科学大师的世界，去领略一下他们智慧的风采吧！

在哲学领域，法国保尔·萨特的《存在与虚无》，首开存在主义哲学的先河，奠定了存在主义哲学原则在社会科学和人类领域中的应用，是一本古典意义下的“形而上学”著作。

挪威的乔斯坦·贾德的《苏菲的世界》，是一个童话般的梦幻世界，也是一个启迪人类智慧的理性世界。它通过对那些人们所熟悉而又陌生的哲学

命题的探讨，将一幅幅生动的哲学图景展现在我们眼前，它让普通的读者畅游于哲学的神圣殿堂，解读生命的意义。

在历史学领域，英国赫·乔·韦尔斯的史学名著《世界史纲》，以巧妙的构思，优美的文笔，生动的叙述，描绘出一幅幅活生生的历史画面，令读者耳目一新。

在政治学领域，英国保罗·肯尼迪的《大国的兴衰》，分别以“左右逢源的中国”、“进退维谷的日本”、“得失并存的西欧”、“矛盾重重的苏联”和“相对衰落的美国”为标题，逐一分析了世界五大国的困难与潜力、挑战与机遇。

美国约翰·罗尔斯的《正义论》，思想深邃，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它打破了西方政治哲学万马齐喑的冷清局面，产生了如石击水的强大效应。

在经济学领域，英国杰出的经济学约翰·梅纳德·凯恩斯，以其《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进了一场席卷西方国家的凯恩斯革命。在凯恩斯理论的指导下，西方各国政府都改变了经济政策的价值取向，从自由竞争走向政府干预。

美国保罗·A·萨缪尔逊的《经济学》是一部西方经济学的百科全书，内容几乎涉及西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是目前西方国家最为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被誉为“独领风骚的憾世之作”。萨缪尔逊由此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的殊荣。

在管理学领域，美国杰出企业家、世界首富比尔·盖茨以其无比优秀的经营才干和经营实践经验，写出了《未来之路》一书，这一本并非学术大师所写的学术著作，一经出版，便畅销全球，洛阳纸贵。该书通俗易懂，充满睿智与远见，是人们了解信息高速公路乃至21世纪人类生活新貌的最佳读物之一。

美国拿破仑·希尔的《成功之路》，以明快活泼的写作风格，对成功之路作出了简明的阐释，创造了指导人们获得成功的17条“黄金定律”。此书一出版，便风靡世界，并培育出一大批“成功人士”。

在社会学领域，德国马克斯·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通过对大量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分析，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并对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思路，这一部著作不仅在社会学发展史上，而且在整个社会科学领域中都占有重要地位。

在女性学领域，法国西蒙娜·德·波伏娃的《第二性》，被誉为女人的“圣经”，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成为西方妇女的必读之书。

美国约翰·格雷的《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一书，正如苏佩·佩吉对它的评价那样：“要我可以一口气读完的自助书籍是很难的，但是约翰·格雷写出来了。”《男人来自火星 女人来自金星》改变了一切陈词滥调，给我们这个时代带来一股清新的气息。

在教育学领域，新西兰戈登·德莱顿与美国珍妮特·沃斯合著的《学习的革命》畅销全球。该书根据未来世界的15种发展趋势，提出了学习方式上的一系列大胆的设想和革新，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学习的革命给人类未来所带来的振荡，使人们认清世界的发展趋势，并帮助人们取得“通向21世纪的

个人护照”。

在文学领域，日本渡边淳一的《失乐园》，文笔清新流畅，选取视角独特，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现代人生的意义，探索人性发展与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关系和矛盾冲突，包含着深刻的哲理。

在科学学领域，美国弗里德·希尔的《挑战上帝》，以通俗的表述方式和睿智的语言风格，对 20 世纪以至更早时候探索宇宙生命来源的科学成果、论点和质疑作了相当完美的归纳、分析和评介。科学的异彩与神学的灵光不协调地交互闪现，构成了此书的一大特色。

在未来学领域，美国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是 20 世纪 50 年代开始出现的有关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方法的一部名著。作者在 1959 年夏季，第一次提出了“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使用了“后工业社会”这一概念，由此引起了世界学术界对人类社会发展新阶段的新认识。

……

用不着更多地举例了，本书中所选评的 40 多部学术著作，每一部都闪烁着作者智慧的光芒。

三

我们所编著的这本《世纪之书——名人评点百年国外名著》，力图比较全面地回顾与分析 20 世纪社会科学各个主要学科中具有世界性影响的著作，它旨在向广大读者提供 20 世纪人类文化的精华，使大家能在浩如烟海的社会科学文献中，比较容易地获取人类最富有价值的智慧，同时也是向 21 世纪的人们展示 20 世纪人类的文化成就，为后人了解今天提供一把钥匙。由于篇幅有限，本书所介绍、评析的学术名著仅仅只有 40 多部，这的确会给人以挂一漏万的感觉，但是它也有一个好处，这就是能使人们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了解 20 世纪社会科学各个学科的精华。

本书在编写过程中，参阅了大量的中外文献，（详见本书后面所列的参考书目），我们首先在此对被所引用和参考的文献的作者致以衷心的感谢。应该说，这本书是大家集体智慧的结晶。

《世纪之书》编委会
1999 年 5 月 10 日

世纪之书

名人评点百年国外名著

哲学 · 历史学

【法】保尔·萨特：
《存在与虚无》——存在主义的开山之作

人的自由就是处境的自由。

——让-保尔·萨特

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思想家中，萨特大概是被人引述得最多，而又被人了解得最少的人。

——L·J·宾克莱

一、萨特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让-保尔·萨特(Jean—Paul Sartre, 1905—1980)是当代著名的法国哲学家、文学家、文学批评家和社会活动家。萨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后流行于西方世界的存在主义思潮中主要的代表人物之一，是这一思潮中影响最为广泛，声名最为卓著的人物。萨特作为哲学家和文学家，其造诣和成就几乎不分轩輊。最抽象的哲学思维和最形象的文学思维，在他心中水乳交融。若理解了他的哲学观念，他的小说和戏剧将给你更深的感受，若不读他的文学作品，也难深入体会他的哲学理论。萨特其人及其思想是独特的。

萨特 1905 年 6 月 21 日生于巴黎。他的父亲让-巴蒂斯特·萨特(Jean - Baptiste Sartre)是海军军官，在小萨特两岁时去世。而后，萨特随他母亲安娜-玛丽·史维泽生活在他外祖父家。

1980 年 3 月 20 日，萨特因肺气肿住进勃鲁塞医院，4 月 15 日逝世。终年 75 岁。4 月 19 日出殡，数万巴黎市民自发给他送葬，世界舆论纷纷表示哀悼。只此可见萨特所获得的人民的尊敬与爱戴。

让-保罗·萨特毕业于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到过法国弗莱堡大学进修，在德国占领法国期间，他是著名的地下抵抗成员。萨特的思想深受胡塞尔和海德格尔的影响，他利用小说、戏剧和政论性文章宣扬和阐述他的哲学思想。主要著作有，小说：《通向自由之路》(计划出 4 卷，但只出版 3 卷)、《恶心》(1938)；戏剧：《苍蝇》(1946)、《没有出路》(1946)；理论著作有：《自我的超越》(1936)、《情感理论概略》(1939)、《想象心理学》(1940)、《存在与虚无》(1943)、《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1946)、《什么是文学》(1949)、《辩证理性批判》(1960)。

萨特的哲学，较系统和集中地在《存在与虚无》和《辩证理性批判》中得到表述。《存在与虚无》是一本古典意义上的“形而上学”著作，而《辩证理性批判》则更象是一本关于社会历史学说的作品，甚至在某种意义上也可以看成是他在《存在与虚无》中奠定的存在主义哲学原则在社会学和人类学领域中的应用。

二、《存在与虚无》评介

1943年10月，萨特的哲学名著《存在与虚无》出版。这是他十年思索，两年努力的成果，《存在与虚无》是存在主义哲学的经典理论著作之一，其中系统地论述了萨特的世界观或本体论。他认为，本体是“人的实在”，按他的现象一元论原则，他认为人的实在的存在有三维，自为或意识是人的实在的核心。它自身只是不存在的虚无，是空洞的意向性，是对于一切的一个抽象的否定。这个虚无的意识是在向存在的超越中借自在的存在而成为存在的。自为的超越有三个方向，一、价值，自为或意识给外物意义而使事物价值化，组织为世界，二、可能，自为向完满的自我超越，在追求自身的未来中展现出存在的时间性。三、他人，自为在他人的注视下发现自身是有限的存在，自己是身体，身体是人的为他存在。以此为基础，萨特肯定人对处境是自由的，人的自由就是处境中的自由。

“在我们这个世纪的思想家中，他大概是被人们引述得最多，而又被人们了解得最少的人。”L·J·宾克莱在他的《理想的冲突》中如是说。这话在中国也符合实际情况，曾几何时，萨特及其存在主义风靡一时，有人为它献出了年青的生命，有人则因之而走上犯罪的道路，但是，所有这些人，有几个读过萨特的著作呢？不用说整部的《存在与虚无》，就连《存在与虚无》的只言片语，恐怕也只是从二手资料中窥得一鳞半爪。即便如此，也已算是不错的了。然而更多的人则是从道听途说的人云亦云中去了解萨特的思想的。

那么，萨特究竟是怎样的一个人？《存在与虚无》到底又是怎样的一本书？

（一）存在价值的总结

从萨特童年所处的境况以及他以后所遭受的经历，我们或许可以找到一条解开《存在与虚无》秘密的路径。

我们从萨特的自传《词语》中看到，萨特的幼年是不幸的。父亲在他降生一年多就死了，他自己也患了肠炎，在死亡线上挣扎，由于生病，他才9个月就被强行断了奶。父亲死后，身无分文的母亲只好带着他回到了她父母的身边，开始了他在“一个老人和两个女人中间”的长达10年的孤独生活。他敏感、孤独，除了书籍，没有任何童年的伴侣。当他在卢森堡公园里看那些活泼、健壮的孩子在游戏时，他惊呆了，他不能不感到自己的短小，而当他呆立一旁根本就不为他人所注意时，他更觉得自己是一个“更低层次的人”，一个被排除在生活之外的局外人。没有象征权力的父亲的管束，只有外祖父的宠爱，不愁吃，不愁穿，这在一般的人看来是美妙的生活，然而，这种人生缺少一个目的而变得疲塌、懒散，使人萎靡不振。因为，没有目的也就没有必然性，而没有必然性的人生却是一种苦涩的、没有存在理由的人生。这种人生是偶然的，多余的，既没有人在盼望他，也没有什么事情等着他去做。在这不幸的童年中，我们或许找得到萨特存在主义思想的根苗。

萨特的外祖父是语言教师，对萨特自小异常的聪明颇为欣赏，并以独特的方式教育他。萨特4岁时即开始阅读，7岁时已读了福楼拜的《包法利夫人》，虽然有些地方不懂，却因此而更令他着迷。此外，他也读高乃依、拉伯雷、伏尔泰、雨果等人的作品。他母亲生怕对他心理有影响，常拉他到户

外活动，并买儿童看的书籍给他看。萨特对户外活动没什么兴趣，但对童话则很入迷，但却仍不放弃读那些“大人的书”的爱好。

7—8岁时，萨特已尝试写作，他写了第一篇小说：《为了一只蝴蝶》，接着是第二本：《卖香蕉的商人》。成为一名作家，这似乎是萨特的使命。

萨特的早期教育是在家庭中进行的，没有上学校，而是由家庭教师，其实主要是外祖父母和母亲进行的。1915年，萨特进了巴黎最有名望的亨利四世中学，当时他上六年级。（法国初等教育是12年一贯制，最低年级是12年级，逐年升至1年级。）刚开始时不很适应学校的教学，但一年后，他就成了最优秀的学生。

1916年，萨特的母亲再嫁，这件事对萨特的心理影响颇大。萨特一直像对待同龄朋友一样对待他的母亲，两人一直相依为命。因此，当母亲再嫁离家，把他留给外祖父外祖母时，他把这视为背叛。为此，他一直与他继父处于一种敌对的情绪之中。1917年到1919年，他随继父和母亲到拉罗舍尔，在那里继续上中学。也许正是在与继父的这种敌对情绪中，萨特的叛逆性格逐渐形成。后来他曾回忆说，就是在拉罗舍尔期间，他开始认真地思考过上帝的问题，并相信“上帝不存在”，而且这种看法一直保持终生。

1920年，萨特的父母为使他受到更好的教育，把他送回巴黎，继续上亨利四世中学1年级。在这一年中，萨特开始领会了当代文学家季罗杜、纪德、瓦莱里、儒勒·罗曼和普鲁斯特等。

1921—1922年，萨特通过了两阶段的中学会考考试。为了准备上巴黎高等师范学校，他上了路易大帝中学文科预备班。巴黎高师是法国最高学府之一，为上高师，一般学生都需先在其他大学学习两至三年，再去设法考入。像萨特这样特别聪颖优秀的学生才能从中学由两年预科直接进高师。萨特在路易大帝中学的两年中，读了柏格森的《论意识的直接材料》，开始对哲学发生了兴趣。同时，还仔细研读了叔本华、尼采、陀斯妥耶夫斯基和克尔凯郭尔等人的著作，以及其他许多现代作家的作品，他对读书心得分门别类做出了笔记。

1924年，萨特以第七名的成绩考入巴黎高等师范学校哲学系。

在巴黎高师学习期间，萨特认真读了笛卡尔、斯宾诺莎及卢梭等古典哲学家的著作，并且可以说特别热衷于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和怀疑一切。他也读弗洛伊德和马克思，但对他们不怎么信服。

在高师期间，萨特结识了一些后来都有相当影响的同学。其中保尔·尼赞是他中学的同学。其他的，例如：雷蒙·阿隆，后来是著名哲学家、社会学家和政论家；丹尼尔·拉加斯，后来是精神分析学家；梅洛-庞蒂，后来是著名现象学家和存在主义哲学家等。这些人对萨特都有较大的影响。

在高师期间，萨特开始构想他自己的哲学，在他的心目中，这应是一种超越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而以无神论为核心的哲学，他希望为他少年时期信奉的上帝不存在找到一种理论根据。当时，他还未能成功。

1929年11月，萨特去服兵役，得力于雷蒙·阿隆，他分去当气象兵。1931年，服役期满，是年春天，到勒阿弗尔中学任哲学教员。此后两年时间，他的生活就是写作，读书，与德·波伏瓦去西班牙旅游等。

1933年9月，萨特争取到做官费生去德国柏林法兰西学院进修哲学的机会，得到现象学大师胡塞尔的指导，并且迅速地把握了现象学的要旨。胡塞尔的现象学对萨特思想的转变起了决定性的影响。作为一年学习的总结，他

写下了两篇有名的哲学论文：《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和《论自我的超越性》。这两篇论文当时并未发表，但它们标示出，萨特的哲学思维方向已然确定。

《胡塞尔现象学的一个基本概念——意向性》1939年发表于《法兰西评论》。萨特在此文中写下了自己对意向性概念的理解，他认为意识是意向性说明意识自身是无，“一切意识都是对某物的意识”这意向性的说明表明意识的存在是借助于事物的，事物由意识给予意义，意义从某物借得存在。

《论自我的超越性》发表于1936年《哲学研究》。本文主要研究主我(je)与宾我(moi)的关系，力图克服古典哲学中主客体对立的古老主题，消除纯粹精神性的我思的一切价值，而建立一种我与世界的一体关系。

这两篇论文的共同主题是要证明人的存在是“在外面”的。

1936年10月，萨特去法国东北部的拉昂任教，1937年7月，又到巴黎巴斯德中学任教。此时，在《法兰西评论》上发表了短篇小说：《墙》，引起较大反响，而后，萨特进入了一个旺盛的创作时期。

短篇小说《墙》中已明白显露出萨特文学和哲学创作的基本风格和基本指导思想，而它的成功则说明，萨特的获得公认只是一个时间问题了。

《墙》的故事取材于西班牙内战，描写反法西斯战士巴布洛面对死亡威胁时的心理和态度。贯穿着小说的观念，是荒谬的死亡，死亡是现代哲学，尤其是存在主义哲学十分重视的一个概念。因此，从《墙》中已不难看出，萨特作品的两大宗旨：以哲学概念为核心，而以介入，或说干预世界为目标。

1938年4月，萨特的长篇小说《恶心》出版，并引起轰动，萨特因此进入了法国现代名作家的行列。

《恶心》完稿于1936年，当初被伽利马出版社退稿，初名为《忧郁》，后删改更名出版。全书是托名一位名叫洛根丁的青年的日记，他准备写一位洛勒旁侯爵的历史，因此，住在布城，往来于住所、图书馆和咖啡馆之间。日记写下了他意识到他的生活和工作都无意义时那种恶心的感觉。他感到失了人生目的，一切都失了根据，天旋地转，人像打水漂时的那块石头：不稳定地浮在其实无法承受它的基础上。而世界像一条大白肉虫子，粘糊糊地，迂缓地在身边蠕动。这不是刻骨铭心的痛苦，而只是感到世界太平庸，平庸到令人无法忍受。太多的历史，太多的传统，太多的事物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然而，这无目的的生命，却像树根半露，树皮像岩石的老橡树那样，死抓住土地，朝着青天，顽强地不肯死去。忧郁、寂寞、孤独，洛根丁感到世界的荒谬，但他决定，不顾一切地生活下去。

《恶心》写出的是当时青年面对风雨飘摇的西方世界那种无出路，无救助的感觉，表明西方人又正经历着一场严重的精神危机。

1939年2月，出版短篇小说集《墙》，除短篇小说《墙》之外，集中还收了另外4篇小说。这4篇小说几乎都是探讨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房间》写一位精神病患者彼埃尔的妻子夏娃与她丈夫自闭在房间中，她一心想深入她丈夫的内心而不可得，人与人是不相通的。《密友》写一位女性吕吕，她丈夫有生理缺陷无法过性生活，她的女友劝她另寻新欢，吕吕始终犹犹豫豫，她不想违背任何人的意志，却没有想到这其实是她自己的事情。《艾罗斯特拉特》写一位一心想以做无意义的恶事来换取别人承认的青年人希尔拔，他是自卑的，仇恨人类，想杀人而后自杀。《一个工厂主的早年生活》写资产阶级青年吕西安的成长，他经历了童年和少年时期的精神危机，终于成了一

个自以为可以傲视他人的人物，一个排犹主义者。

这几篇小说的中心，是说明人应当正视自己的自由，也尊重他人的自由。小说中的主人翁几乎都不是“正面”人物，而是不正常、不健全，甚至应该谴责的人物。

1939年9月，德法战争迫在眉睫，萨特应征入伍。但萨特只是经历了那场“奇怪的战争”，到次年6月，就在洛林与马其诺防线的守军一起，未经交战而成为俘虏。起初他关在巴卡拉，后迁至德国特里尔战俘营。在那年圣诞，萨特写的剧本《巴理奥纳》在战俘营由战俘们上演，这是他的第一个剧作。

1941年4月，萨特因视力欠佳的证明而获释，回到巴斯德中学任教，与梅洛-庞蒂等人建立了一个叫“社会主义与自由”的抵抗组织，但不久就解体了。

此后萨特的生活，除教书外，就是写作。

1940年3月，萨特的又一本哲学著作《想象物》出版。此书副题为：想象力的现象学心理学，旨在说明意识的完全自由。想象物作为意识的意向对象，不同于事物，即不是自在之物，而是一种“存在着的虚无”，就像梦幻中所见之物，它的产生在于意识使事物虚无化的能力。因此，想象物的存在证明意识有一种完全的自由。

1943年4月，出版三幕剧《苍蝇》。此剧是改写古希腊悲剧之父埃斯库罗斯的名剧：《俄瑞斯忒斯》。故事取材于史诗《伊利亚特》。阿尔戈斯国王阿加门农之子俄瑞斯忒斯杀母为父报仇。萨特此剧的核心观念是说明人是自由的，人一旦意识到自己的自由，一切高压，无论是神还是暴君就统统无能为力了。而人的自由并不是无所事事的闲云野鹤式的生活，而是介入世界，干预生活，背负起沉重的责任，哪怕那种生活是罪孽，是像苍蝇一样含混着血污，也义无反顾。萨特此剧的主旨在于号召法国人民反抗法西斯暴政，不要因高压而气馁。

从萨特早年的经历和他所写的大量著作的内容可以看出，他存在主义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是由于他早年不幸的磨难以及这种磨难在他早年的心灵中留下的阴影而产生的。他早年的许多著作特别是小说都较多地带着点这种色彩，从而使他感悟着这世界的存在价值，也在他的头脑中酝酿着《存在与虚无》的产生。透过他早年经历和著作内容的深处，我们可以看出他写作本书的社会基础和思想基础，从而可以更好地深入了解此书的实质。

萨特1939年开始计划写《存在与虚无》，1941年秋开始动笔，1943年初就完成了这一巨著，当年夏天即出版发行，或许是由于当时的局势，却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直到1945年萨特成了新闻人物，评论家们这才纷纷把注意力集中到这部巨著上来。这或许可以说明这部巨著的价值有多大。

(二) 倡导反思前的我思

《存在与虚无》的副标题《现象学的本体论》，这个副标题点明了萨特哲学的理论目标和方法特征。

现象学的祖师是胡塞尔，胡塞尔现象学的主要论题或目的，在于使哲学成为一种严格的科学的哲学。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哲学本身也应当有严格的科学的方法，他认为这种方法就是现象学的方法。这样的一个论题加上这样

的一个方法，就是全部现象学哲学的内容。

胡塞尔现象学的基本精神是“走向事情本身”。为达此目的，就得按照现象(实际显现在我们眼前的东西)显露其自身的样子来观察现象，而不是依据传统的主体—对象认识来把各种现象归入什么范畴，因此就要把存在的观点和历史的观点悬置起来，存而不论，以便排除主体和对象的分别。这样，就可以发现意识与那个胡塞尔称之为“先验的自我”的世界之间的本质接触。

胡塞尔发明“现象学的还原法”来排除感觉经验和理性思维的干扰，回到对纯粹意识现象的直接描述。这就还需要对进行描述的主体加以还原，使经验的自我还原为先验的自我，又使意识得以纯粹化，即从一切非意识的东西中脱离出来。胡塞尔希求的是把自我把握为一个纯粹的自我，即独立于来自所有客体的规定的先验的自我。而本质并不是在自我之中，它只是在意识进化事物时显现出来。胡塞尔现象学的这些思想启迪了萨特，为萨特进行哲学探索提供了一种方法。

萨特理论的逻辑出发点是现象。他认为胡塞尔的现象学从事情本身入手，即从现象入手的思想是一种重大成就：“现代思想实现了一个重大的进步，就是把存在归于一系列的显现。”(P.11)现象自身就是存在着的，现实的，具体的。研究存在、研究本质就得从现象入手，这种现象的显现则是存在的本质直观。在萨特看来，并不存在什么抽象的、超越现象的本质，本质是由一系列的显示存在者的显现决定的。“现象理论的第一个结果是：显现并不把存在推向康德的本体论的现象。因为，显现的后面什么也没有，它只是揭示了它自己。”(P.14)他否认现象背后有本质，否认现象背后有不可还原为现象的自在之物，他以为现象本身就是存在。因而研究人的本质就必须从现象入手，因为人的本质就是由现象揭示出来的。显现并不隐藏本质，而是揭示本质，它就是本质。本质与现象不是对立的，这就是萨特企图对现象进行的本体论的描述，他企图以此来消除本质与现象之间的二元的对立。

从这种本体论出发，萨特区分了存在的现象和现象的存在。

“存在的现象”是本体的，它的被揭示是要通过诸如烦恼、厌恶等体验的，它只有在显现时才存在，它并不隐藏在现象之后，它并不是我们认识的东西，但却是认识的根据，存在的根据。而“现象的存在”则是未显露为现象的存在，是应当被揭示的东西，它超出了人们对它的认识。它等待着人们去认识。

总而言之，认识不能赋予自己以存在的理由，即“现象的存在”不能还原为“存在的现象”，只有存在的现象才是本体论的。这就是说对存在的现象进行如实的描写，就是他所谓的本体论。

既然现象的存在不能还原为存在的现象，所以，意识是先于认识的，我是先对现象的存在——即向我显现，揭示出来的存在有意识，继而才能根据某一系列的显现确定这张桌子或别的什么东西是自在的存在的。比如，在反思的行动中，我对被反思的对象做出诸如羞愧、骄傲、欲求、拒绝的判断，但我的直接意识不能使我去判断，我必须先向着这被反省的对象，先意识到它所向我显现的，然后才可做出判断，也就是认识其存在，这就是反思前的我思。萨特的反思前的我思实际上是胡塞尔“纯粹意识”的翻版，即是一种把客观认识内容和主观认识主体的意识统统地剔除出去的所谓“净化了的意识”。它是一种没有任何内容的意识，是一种纯粹的意识活动本身。

萨特“反思前的我思”这个名词是他自己独创的，但是，其实质内容在

胡塞尔和海德格尔那里都进行了深刻的论述，胡塞尔的“纯粹意识”，海德格尔在“形而上学是什么”一文中所论述的向着存在者整体的“摆脱自身而入无”的一跃，所跃进的“无”说的都是这样的一种思想。实际上，在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的《道德经》中对此也有论述，“涤除玄览能无疵乎？”所说的“无疵”“玄览”以及“婴孩状态”，与萨特所谓的“反思前的我思”是同样的思想，其目的就是要人不要带任何偏见、任何偶像去认识事物。

掌握了“反思前的我思”就等于拿到了萨特思想的钥匙。萨特的《存在与虚无》就是建立在这个前提之上。以这种“反思前的我思”式的纯粹意识活动去认识世界，就是自为对自在的关系。自为与自在的关系就是这部书的全部内容。

(三)重释自由的函义

萨特最有影响的就是他的“自由观”。萨特的自由观被称为“绝对的自由观”。这种自由观实际上是“反思前的我思”的逻辑结果。因为意识就是空无，所以世界要怎么显现就怎么显现，或者说，由于人没有任何的束缚，所以他要怎么认识世界就怎么认识世界，要怎么行动就怎么行动，用中国的一句古话说就是“无为而无不为”。用老子的“婴孩”比喻就是：一个婴儿诞生在这个世界上，他是以“无”的姿态来到这个世界上的，谁也不知道他从何而来，为什么要来，因此他要干什么也是不应该有什么规定的，也就是说，他天生就是自由，而正是这个自由才迫使他进行选择，自由就是选择，同样选择也是自由，他要选择什么是他自己的事，因此，萨特有一句有名的话就是“存在先于本质”。任何人的本质都是由自己选择的。萨特认为，在自由这个问题上，目的与动机是次要的。最后的成功与否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去进行选择。而选择是在处境中的选择，也就是说，正是因为有处境，才有选择，处境是选择或自由的条件，否则根本没有任何选择可言。自由的选择实际上就是对处境的虚无化。同样，没有选择处境也就没有任何意义。

两次世界大战，给人们的心灵造成了极大的创伤，更加深了萨特的人生无常的思想，更加深了他的恶心而厌恶的情绪。试看他在《沉默的共和国》中描述的1940年至1945年法国抵抗运动时期的生活：

我们从来没有比在德国统治时期更为自由的了。我们失去了自己的权利，首先是讲话的权利。我们每天当面受到污辱，还不得不忍气吞声。我们在种种借口之下比如说由于是工人，犹太人或政治犯，而被统统放逐。在广告栏目里，在报章中，在银幕上，我们到处都能看见镇压者想让我们接受的那种关于我们的令人作呕而又毫无生气的图画。而正是因为所有这些，我们是自由的。由于纳粹的毒液渗进我们的脑海，所以对每一个精确的思想都是征服。

正因为强大的警察当局试图使我们保持缄默，所以我们说出的每个字都具有原则宣言的价值。也正因为我们被追捕，所以我们的每一个姿态都具有庄严承诺的分量。……

流放、监禁，特别是死亡(在较为好过一些的日子里，我们一般避免正视它)，对我们来说已经成为习以为常的事情。我们认识到，这些并不是在所难免的意外事件。甚至也不会总是发生的、不可避免的危险。我们必须把它们看成是我们的命运本身、我们的定数，我们作为人在劫难逃。我们无时无刻

都在理解“人固有一死”这句老生常谈的整个含义。我们每个人对其一生所作的选择都是真正的选择，因为这种选择是在面对死亡的情形下作出的。“我宁死也不……”，而且我在此指的并不是我们中间的优秀分子，——那些真正的抵抗者，而是那些在四年中日日夜夜每时每刻在回答“不”的所有法国人。

萨特连同他的存在主义哲学遭到了左右两方面的责难，责难之大，以至于萨特不得不专门写出一篇《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的文章来进行辩护。这些责难是，“首先，存在主义曾被指责为鼓励人们对人生采取无所作为的绝望态度。”“另一方面的责难是，我们强调了人类处境的阴暗一面，描述卑鄙，肮脏，下流的事情”，“而忽视某些具有魅力和美并属于人性光明一面的事情。”看了上面所引述的一大段话再看这些指责，在此，我们可以说，无非是不正视现实的、纸上谈兵而已。我们可以说，一个以恶心的心境面对存在的人要比根本不去遭遇存在，不敢正视存在的人好！

萨特一直保持着一种独往独来而与一切恶势力抗争的态度，他的热情并不随着年龄的增加而减退。在1968年5月法国青年学生掀起的“五月风暴”中，就有萨特活跃的身影。而此时，萨特已经是63岁的人了。

萨特在《辩证理性批判》力图从存在主义出发，以现象学方法建立起真正的人类学的基础。他希望以人的主观性原则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萨特想要说明的是，历史本是人的自由实践的产物，但历史反过来与它的创造者相敌对，这个过程是如何造成的，以及作为创造物的历史如何变成一种必然性反过来支配了人。《辩证理性批判》把《存在与虚无》中基本是心理的人的存在，化为一种具体的社会历史的人的存在。他在书中提出的溶合集团、誓约集团等的理论正好迎上了60年代世界性的左倾思潮，甚至可以看成对后来“五月风暴”的一种理论准备。

任何选择都有后果，后果就是责任，因此选择与责任是紧密相联系的，选择本身就是责任，因此，萨特说，“命定自由的人，把整个世界的重量担在自己的肩上；作为存在的形式，他对世界也对自己负责”。

自由——选择——处境——责任，此四者是一而二，二而一的东西，当你沉醉于“绝对的自由”之中的时候，请注意：还有“绝对的责任”。这就是萨特对自由涵义的最后解释。

(王君琦 撰)

【德】马丁·海德格尔：
《存在与时间》——“思想的神秘主义者”的探索成果

每一个思想家只思想一个单一的思想。这一点从本质上把他和科学家区分开来了。

——马丁·海德格尔

自苏格拉底以来，没有谁能够像海德格尔这样遭遇到如此不同的毁誉褒贬。

——斯坦纳

一、海德格尔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马丁·海德格尔自 1927 年以来已经赢得世界范围的声誉，他是 20 世纪最重要和最有影响的哲学家之一。然而，相当长一段时间内，他的私生活与个性却鲜为人知。海德格尔本人绝少谈及和写出他个人方面的事情，他的亲密朋友和学生们也一直虔诚地尊重他对这些问题的沉默。

1889 年 9 月 26 日，海德格尔出生于德国西南部巴登州梅斯基尔希镇。其父亲弗里德里希·海德格尔(1851.8.7—1924.5.2)是位箍桶匠，在梅斯基尔希镇圣马丁教堂负责敲钟、看守教堂、挖掘墓地等。其母亲约翰娜·肯普福·海德格乐(1858.3.5—1927.5.3)出生于当地的农民家庭，也是一名天主教徒。

小学毕业后，海德格尔因家境贫穷，无钱再上学。先跟私人教师学习拉丁文，后由天主教会资助，到离家乡 50 公里以外的康斯坦茨中学(旧天主教会耶稣会学校)四年级学习。在这里，他受到欧洲传统文化教育(包括古希腊文学、天主教拉丁文献、拉丁文学、德国文学、自然科学基础知识等)。

高中暑假期间海德格尔回家乡度假时，从康斯坦茨三一教堂回家度假的格约伯神父向他推荐了弗朗茨·布伦塔诺的博士论文《存在观念在亚里士多德学说中的多重意义》(1862)，唤起了他对“存在”问题的强烈兴趣，由此影响了他一生的事业，并预示着他在今后几十年的全部思想历程。

在弗莱堡大学神学系学习期间，海德格尔得以亲聆卡尔·布莱格教授的教诲，并开始阅读布伦塔诺的学生胡塞尔于 10 年前写的《逻辑研究》，希望能从中找到被布伦塔诺唤起的关于存在问题的回答，此书对他思想产生了决定性的影响。此外，胡塞尔的早期著作《算术哲学》使他对数有了全新的看法。

1911 年，海德格尔开始进行大量的哲学问题的研究，这是海德格尔思想形成的开始。

1927 年(38 岁)2 月，海德格尔的代表作《存在与时间》发表(《哲学与现象学研究年鉴》第 8 卷)。不久出版单行本(哈勒，马克斯·尼迈耶尔)。后收入《全集》第 2 卷。但只有原计划中的第一部的第一、二篇，第一部的第

三篇和第二部分的三篇散见于后来的《现象学的基本问题》、《康德和形而上学问题》、《形而上学是什么？》、《论根据的本质》、《论真理的本质》、《形而上学导论》等论著中。

希特勒在德国掌权以后，民族社会主义的影响遍及各地，包括所有的大学，他们制订了各种严厉的措施以把大学置于纳粹党的影响之下，藉助大学宣传纳粹思想。由于海德格尔当时已经被认为是德国的主要哲学家，弗莱堡大学此时考虑到，由于海德格尔的声望，他将是唯一可以与纳粹党摧毁大学精神的企图相抗衡的人。海德格尔的同事就此事与他进行交涉，起先，海德格尔礼貌而坚决地拒绝了这一提议。然而，他的同事们坚持提名，在经过长时间的考虑和从过从甚密的朋友们那里征询以后，海德格尔勉强接受了大学校长的职务。九个月后，他辞去了这个职务。

1945年，盟军占领弗莱堡以后，海德格尔被剥夺了在大学教授的职务。1951年恢复职位但此后不久即退休，但继续讲课和写作。在那些艰难的岁月里所作的一些讲义是他所曾写的最好的东西。

1976年5月26日，海德格尔逝世于梅斯基尔希。

二、《存在与时间》评介

在我们眼中，海德格尔就如同一座宝藏丰富、形态多姿的大山，“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海德格尔所具有的多义性，既给我们准确地全面地描述海德格尔带来了困难，也为我们有方向有目的地接近海德格尔提供了机会。

有人说，海德格尔只是一个语言的神秘主义者，一个形而上学的神学家。有人甚至说他是一个摇唇鼓舌的江湖骗子，一个人类良知的毒害者。也有一些著名的哲学家根本不把它放在眼里，认为他不是一个严格意义上的哲学家。在罗素的《西方哲学史》中，竟对他不置一辞。有人干脆认为，海德格尔的著作只是一些不经之谈的总汇。他提出的只是一些虚假的问题，他的学说无异于一种谬论，既错误又琐碎。或者说海德格尔是一个空话连篇的饶舌者，他的本体论或关于存在的辩证法更是一些无聊的呓语。而海德格尔晦涩的语言更人们攻击的目标。阿尔多诺的《特殊的行话》在对海德格尔的语言进行分析时就认为，海德格尔的语言风格是令人厌恶的，它不仅是一种晦涩不堪的行话土语，而且是崇玄风气的拟古主义到处作祟的象征。著名的逻辑实证哲学家卡尔纳普则干脆把它看作一种神秘的、自我催眠式的符咒。还有人甚至认为，海德格尔的语言风格与纳粹语言有着本质的联系，正是它们毒化了希特勒以来的德国语言。

海德格尔是自亚里士多德以来西方哲学史乃至整个哲学史上第一位把关于存在的意义问题作为一个严肃的甚至是最基本的哲学问题来研究的思想家。我们已经知道，海德格尔的哲学正是建立在亚里士多德以来的西方哲学史之上的。他对于哲学史知识的深厚功底，使他很敏锐地发现，近代西方哲学对于主体的专注遮蔽了对于存在问题的认识，使存在成为了一个无家可归的空洞的概念，也使他能够通过一种新的视角来重新看待和解释传统哲学，特别是古希腊哲学对于存在的论述。于是，“从新康德主义到价值哲学的现代哲学的全部问题突然变得陈腐不堪，同时，从柏拉图到尼采的形而上学闪烁着新的光芒。”一开始，海德格尔就对此弄得很清楚，他的哲学根本不同

于舍勒和雅斯贝尔斯所提出的那些哲学。对于他来说，人的生存既不是首要的，也不是最后的哲学问题。海德格尔不仅是康德以来最杰出的哲学家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家，是可以和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笛卡尔、莱布尼茨和黑格尔这些为数不多的西方伟大思想家比肩的思想巨匠，而且，他关于存在与时间意义的探讨，他对艺术理论和技术性的沉思，他的语言格局理论，以及他对柏拉、亚里士多德和康德的真理和逻辑模式的彻底矫正等等，对当代西方各种学说都产生了影响。也有人解释说，海德格尔的主题不是揭示人的行为或我们心灵的活动，而是通过确立我们通常所说的存在的最本质的东西来阐明存在这个概念。毫无疑问，这是哲学的任务，而且，这个命题在某些方面是所有哲学命题中最迷人的一个。还有人预言，如果说 17 世纪是笛卡尔和牛顿的时代，那么，海德格尔将主宰着我们这个世纪的精神王国。

一位造诣颇深的犹太女政治家汉娜·阿伦特则说，纵观 20 世纪的全部哲学，海德格尔一直是“思想的神秘主宰者”。而对海德格尔的著作持否定态度的分析哲学家 G. 赖尔(Gilbert Ryie)也承认：“他对意识所作的考察极其精细和透彻，他的方法和结论大胆而有创见，他以不懈的毅力努力超越正统哲学和心理学的陈旧范畴，这些都表明他是一位真正重要的哲学家。”斯坦纳因此断言：“自苏格拉底以来，没有谁能够像海德格尔这样遭遇到如此不同的毁誉褒贬。”

然而，海德格尔自己并不承认自己是一个“存在主义者”。虽然，他最有代表性的著作《存在与时间》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的意义的问题”，而且，他一生中最关心的问题就是存在与存在者的区别。但是，为了与让—保罗·萨特(Jean Paul Sartre)的存在主义划清界限，他宁愿自称是整个哲学史上第一个明确提出存在意义问题的思想家。

海德格尔不仅不承认自己是个存在主义者，而且也不承认自己是个“实存哲学家”。虽然，在《存在与时间》中，他成功地探讨了人的实存问题，并取得了大家一致公认。按他自己的意思，《存在与时间》只是一部未完成稿，对人的实存问题的探讨也只是为了更深入地探讨一般存在问题的前奏，人的实存问题并不是最主要的或最根本的哲学问题。

胡塞尔作为青年海德格尔的老师和崇拜对象，按说，算是比较了解自己的学生的了吧？他认为，海德格尔由于用人的存在来代替纯粹自我，已经把现象学改造成了“人学”，但海德格尔同样给予了否认。虽然，他针对胡塞尔所说的“奇迹中的奇迹是纯粹自我和纯粹意识”而提出了“奇迹中的奇迹：这就是存在者是存在的(dasSeindesist)”。虽然，海德格尔在《康德和形而上学》一书中比在《存在与时间》一书中更明显地以人的存在作为出发点。

那么，也许只能说海德格尔对于哲学的人学的关心，只是他通向基础本体论的一个过程。然而，海德格尔也不愿意被人看作是一个本体论者。因为，海德格尔认为，本体论这个旧名称与传统的形而上学的关系过于密切，不能表达他本人的意思。

同样，海德格尔也不承认自己是个“形而上学家”。虽然，他对形而上学有过深入的卓有成效的研究，他的《康德和形而上学》实际上就是《存在与时间》的未完成部分。他在弗莱堡大学所作的教授就职演讲就是著名的《形而上学是什么》。他在课堂上还开设过一系列关于形而上学的课程。但是，在 1936 年之后，他便宣称要克服形而上学。他认为，形而上学只是存在的历史中一个必要的阶段，形而上学的任务只是集中探讨存在者，而不是探讨存

在本身。他甚至认为，整个西方的形而上学史实际上是对于存在的遗忘史。

最后，海德格尔甚至不再将自己的学说称之为“哲学”。他认为，哲学由于现代科学的发展而变得过时，现在应由“思的工作”来取代。他甚至说，“哲学”实际上成了“思想”的敌人。因此，他宁愿将自己的哲学思想称之为“存在的思想”。在他的心目中，“存在的思想”完全是独一无二的，不能与其他已有的思想和学说共名的。

也许正因为如此，人们对他的评价也就常常是极端尖锐对立的，完全矛盾的，相互排斥的。

正如这本书的书名所建议的那样，时间概念在《存在与时间》中占有一个重要的位置。在这本书的简短的前言中，海德格尔就已经表明了存在与时间是如何相关联的。“本书的目的就是要具体地探讨存在的意义问题，而其初步的目标则是把时间阐释为使对存在的任何一种一般性领悟得以可能的境域”。

海德格尔指出人的本质存在于它的生存中；人向之站出来的这个东西就是世界；所以人们也可以说人的本质就是在世界之中存在。而这第一部分的主要任务就是要揭示“在世界之中存在”这一复合表述语的确切意义；但是在这样做的过程中，最终的目的就是要为存在问题的问题准备一个答案。海德格尔通过提出下述情况来为这一对存在问题的探究进行辩护：被视为在世界中存在的人是唯一的能够以他自己的存在样式使自己澄明的存在者。对这一问题的根本回答是这种存在者的存在模式之一，而且它因此从它所追问的东西中接受它的本质特征，即存在本质。“这种存在者，就是我们自己向来所是的存在者，就是除了其它存在的可能性外还能够发问存在的存在者，我们用此在(Dasein)这个术语来称呼这种存在者”(《存在与时间》，第7页)所以“此在(Dasein)”这一通常不可译的技术性术语确切地说，指的就是就其从本质上关涉到存在而言的人。

海德格尔认为，合适的存在者必须是这样一种存在者，对它来说，首要的是作为存在，而不是仅仅作为存在者。它不是为了成为什么东西而存在，而是“为存在本身而存在”。

海德格尔指出，此在这种存在与其它存在者的区别在于：

第一，此在就是不断地去亲临存在(Zu—sein)。“在它的存在中，至关重要是这个存在本身；也就是说，它从来就是它所不是的东西，而不是它所是的东西。因此，存在专称为生存(Existenz)。”

第二，此在不仅是生存的此在，而且它“总是从它的生存来领会自己本身”，“它是存在论的存在”。

第三，科学的目标在于探究各种各样的存在者的存在，但它们作为人的活动都是此在的存在方式，因此，“此在的存在领悟就对‘世界’和对世界之内可通达的存在着的存在的领会有着源初的关联”。这就是说，其它一切以非此在的存在者为课题的存在论，即各门科学的基石都是“赖此在自身的存在状态的结构为根基并得以说明的”，它们的答案却必须归之于此在的生存论分析。

由于此在拥有这三个方面的优先地位，便理所当然地被海德格尔奉为“在其它一切存在者之先从存在论上首须问及的存在者了”。于是，询问一般存在意义的问题，也就首先成了询问此在的存在，即生存的意义问题。海德格尔把这种构成其它一切科学的基础的此在的生存论分析，称为“基本存在

论”。“基本存在论——所有各种存在都只有依此才能提出——必须在对此在的存在论分析中寻找。”

此在的存在样式的准备性分析，只能用来描述这种存在者的本质；它还不能从存在论上解释它的意义。这种准备性的分析仅仅是力图把阐释存在的最原初的方式的地平线展示开，一旦这一地平线展示开来了，这准备性的分析就要为一种本真的存在论的解释来加以替换。在这里地平线指的是时间性，它决定着此在的存在意义。这就是为什么在第一部分所展示的人的存在的所有结构要在作为时间性的所以《存在与时间》的样式的第二部分中重新加以解释的原因。但是，即使是在把此在解释为时间性的过程中，存在的意义问题还没有得到回答：它只是为后来获得这一问题的答案准备基础，本意就是为一种存在论(形而上学)提供基础，并且与康德一起，在努力建立形而上学的努力中强调人的有限性。

在《存在与时间》中，海德格尔试图应用“解释学的现象学”来分析人的存在，并详细说明解释的现象学的意义。海德格尔认为，哲学主要关注的东西应该是关于存在的意义的问题。这个问题应该在存在论中来处理；这样的一个存在论要由一个基本的存在论来准备，这种基本的存在论必须采取对人的存在进行生存论上的分析的形式，而人的存在要理解为在世界之中存在。尤为重要的是，在这种基本的存在论中，要使用解释学的现象学方法。

对他来说，现象学(Legein ta phainomena)让那显现自身从其自身被看就是这样的一种方法：通过这种方法让那主显现自身者如其所是地显现自身。在《存在与时间》中所要揭示的“事情本身”就是被当作此在的人。所以《存在与时间》力图让此在在其所是及如何是中显现其自身，这种分析具体地表明了此在的本真人的自我存在于有限超越的过程中，而这种有限超越的最终意义是时间。

此在的特点就是对存在的领悟，这种领悟的进程是：此在向着存在的方向超越存在者，并且在它的存在中领悟包括它自身在内的一切存在者。在此应该立即强调一下，超越的进程内在地是有限的。因为，首先，此在并不能掌握它自己的起源；它只能发现自己被抛进了多种多样的存在者之中(被抛状态)。其次，被抛进多种多样的存在者之中的此在，必须与这些存在者打交道并具有把自己表见在这些存在者之中的趋势(被抛状态)，从而忘记了它自己的存在论的“天命”。最后，超越的进程是内在地向着此在终结。在这些样式中显现自身的否定性的根据是海德格尔称之为“罪责”的东西，但是这里的罪责不能从道德的意义上理解。

有限超越的基本结构包括领会(Verstehen) ,即此在其中所由以筹划世界的构成因素，存在论的现身情态(Befindlichkeit) ,即此在的被抛弃，沉沦和世界的非存在所由以展开的构成因素，和逻各斯(言谈) ,即此在能够展开和“用语言”表达出所领会的东西和原初的情态构成因素。就超越从本质上是烦(sorge) ,即存在本身事先就已经在作为寓于世内的有所照面的存在者的存在的世界之中而言，这些构成因素构成了一个统一体。如果把这个统一体视为一个总体，就可以把它理解为走向终结即死亡。最后，赋予此在以本身的东西，就是海德格尔之为良心的呼唤的东西。为了到达它本身，此在必须让它自己被召唤着趋向它本真的自我，即有限超越的进程。此在在其中且由此达到本真性的行动被称之为决断(Entschlossenheit)。

张祥龙在《海德格尔思想与中国天道》一书中说，对“死亡”和“良知”

的分析是《存在与时间》一书的高潮。“它以特别清晰的令人可领会的方式把这本书前面的几乎所有重要论述推向了最逼真空灵的境地，是海德格尔解释学化了的 phenomenology 的存在论分析中闪烁着最纯粹的思想光辉的两章。”他分析说，“海德格尔讲的死亡主要不是指生物学意义上的死亡。从古至今，宗教、神话、形而上学、方术等都力图超越这种死亡。他讲的死亡是指人这种存在者的根本的有限由这种有限性以及而产生的一系列与人生在世相适应的思想问题(神不需要思想)，即那逼着人非以构成的和牵挂(即“烦”——引者注的方式去回答不可的终极可能性的问题，比如‘存在的意义’、‘善的意义’等等。”“对于海德格尔，良知所体现的比道德活动和任何一种心灵能力(比如知、情、意)的活动都要更原始。他认为良知是种‘呼唤’(Ruf)。”

海德格尔说：“此在在良知呼唤自己本身。”也就是说，此在在众人中更新换代了其个性之后，要想重新恢复其个性，必须首先要找到自己。但是，“良知向召唤所及者呼唤了什么？严格说来——无。呼声什么也没有说也没有给出任何关于世间事务的讯息，……良知只在而且总在沉默的样式中言谈。”因此，海德格尔在自己的一生中，总是倡导并实践着“沉默是金”的格言。

陈嘉映在《海德格尔哲学概论》中说，“海德格尔所谓良知的核心，仍在于个别化。良知令此在越过公众意见而听命于它自己最深处的生存可能性。这就是说：‘此在选择了它自己。’选择之为选择，在于它在说‘是’的同时说‘不’。选择包含着割舍、毁灭、罪责。此在为选择的自由而烦，因为自由在本质上和罪责连在一起。‘自由只存在于这种选择之中；这就是说，在于把不曾选择也不能选择另一个这回事承担起来，……此在之为此在就是有罪责的’。”

在《此在与时间性》这一篇中，海德格尔用大量的篇幅讨论了时间和与时间有关的内容，如时间的三维、时间性的统一性、此在的时间性、世界时间、原始时间以及空间、历史和历史性等等。然而，海德格尔这部追问“存在与时间”的残篇并没有完成他时间问题的探讨，直到1952年，当他仍然说：“什么是时间？或会认为《存在与时间》的作者一定知道这个。但他不知。所以他今天还在问。”到了1962年，当再一次访问希腊时，又以《存在与时间》为题作了演讲，虽然这个题目恰巧与他在《存在与时间》一书计划中的第一部分第三篇同名，但已经不再是原来意义上的“时间与存在”，只是他仍然没有放弃时间问题的研究。当然，《存在与时间》没有完成的课题还有很多，“如现象学观念、存在论和科学的关系、时间和睿的关系，对言谈的进一步规定、语言的存在的关系、存在论的区分、存在和真理的关系等。”而海德格尔自己正是以一连串的符号结束全书的，看来海德格尔当时正深深地陷入沉思之中，《存在与时间》注定只能是一个“残篇”。

(许静 撰)

【匈】捷尔吉·卢卡奇：
《历史和阶级意识》——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

正统马克思主义并不意味着无批判地接受马克思研究的结果。……恰恰相反，马克思主义问题中的正统仅仅是指方法。它是这样科学的信念，即辩证的马克思主义是正确的研究方法。

——捷尔吉·卢卡奇

这部书，在某种意义上，成为我们思想的来源，我们著作的“圣经”。

——法兰克的学派

一、卢卡奇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捷尔吉·卢卡奇(György Lukács 1885—1970)是20世纪最著名的哲学家、美学家、文艺理论家之一。他的社会哲学理论是马克思社会哲学传统的最有力代表之一，并在本世纪产生了持久而广泛的影响。

捷尔吉·卢卡奇1885年4月13日生于匈牙利的布达佩斯。他的父亲是当时匈牙利最主要银行——“布达佩斯信用银行”的经理，他的母亲出身于维也纳的贵族魏尔特哈穆之家。富裕的家庭生活使他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中学时代他就对戏剧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并在《匈牙利沙龙》、《未来》杂志上发表了一些剧评文章。

卢卡奇文学道路的真正开端是中学毕业以后参加塔利亚剧团的活动。四年期间这个剧团分别演出了海贝尔、易卜生、斯特林堡等27位现代剧作家的35部作品。尽管这个剧团以后失败了，但他的《现代戏剧发展史》则是这一时期的总结，此书1908年2月获得克里斯蒂娜奖金。在这部书中卢卡奇分别论述了“戏剧”、“现代戏剧”、“自然主义”、“超越自然主义”等问题，全书的中心是人的悲剧及其出路。在这本书的写作期间，他读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著作，开始接受马克思社会学的一些基本观点：剩余价值理论，把历史作为阶级斗争的历史，对资产阶级的批判。正如其晚年回顾这段历史时所说的“马克思的倾向明显地占中心地位。社会学的理论：戏剧是没落阶级的产物……一种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不可能的有意义的生活。”

1909年11月卢卡奇以其《戏剧的形式》的论文获得布达佩斯大学哲学博士。

1911年初卢卡奇移居佛罗伦萨，这期间柏林一家出版社出版了他的论文集《心灵与形式》，这些文章大都发表在《西方》杂志上，经他修改后重新出版。这部著作是他称为“散文时期”的代表。全书的主题是人的异化，这种异化的典型是男人和女人分离的裂罅，生活的悲剧是这种异化不可避免的结果。

1911年—1914年在德国的海得堡，结识了布洛赫、马克斯·韦伯、艾米尔·拉斯克等，其思想历程经历了“美学时期”和“历史哲学”时期，前者

的代表作是《艺术哲学》和 1913 年发表的《美学文化》一书；后者则是著名的《小说理论》。《小说理论》是卢卡奇思想发生重大转折的一个前奏。这部书和《心灵与形式》一样把异化置于研究的中心。但两部著作有着明显的差别。如果说《心灵与形式》证明了人类生活的悲剧感，那么《小说理论》则突出了一种乌托邦的希望；如果说前者还停留在自我悲戚的心理的纯形式中，后者则已把文学与世界的广阔天地联系起来，借助于费希特，作者已从康德的心理主义走向了黑格尔的历史主义。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世界上，卢卡奇试图建立一个新的世界。

1917 年—1918 年是卢卡奇生命历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俄国革命的爆发，在索列尔工团主义和罗莎·卢森堡的影响下，使他经过短暂的动摇犹豫之后，于 1918 年 12 月加入了匈牙利共产党。他始终认为“成长为共产党人的确是我一生中最大的转折，最大的发展成就。”这一时期的思想进展，集中体现在 1923 年出版的《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上。这本书的出版使他受到了共产国际的批评，也为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兴起埋下了伏笔。在那个动荡的年代中，卢卡奇全身投入革命，参加了 1919 年 5 月的匈牙利革命，并被任命为苏维埃共和国的教育事务部副人民委员。1919 年 9 月卢卡奇在维也纳被奥地利政府逮捕并准备引渡回匈牙利，经过德国文化界以托马斯·曼为代表的一大批作家的呼吁和营救，奥地利才释放了他。

卢卡奇从 1929 年匈牙利共产党和共产国际批判了“勃鲁姆纲领”以后，在政治上没做更大的努力，而他却在文学理论和文艺批评领域中写下了一系列的著作，并且引起了颇多的争论，要研究 20 世纪的文论史不能不提到卢卡奇，关于现实主义的争论，关于表现主义的论战，对后来的文学理论与批评都发生了重大的影响。卢卡奇这一部分思想不是我们本文所研究的对象，但他的文学理论是建立在他的社会哲学理论上的，这点是毫无疑问的。

从社会学理论来看，他 50 年代所写的《理性的毁灭》一书是其社会学思想的一个重要方面。在这部著作中他对 20 世纪以来的西方社会哲学作了系统的分析和考察，并全面剖析和批判了自谢林以后的西方社会哲学中的非理性主义思潮。尽管书中有着明显的斯大林时代的痕迹，但决不能简单地把这本书归为一本毫无价值的政治批判书籍，正是在这种政治术语背后，隐含着卢卡奇长期以来的一个重要原则：黑格尔理性的历史主义。正是这个原则构成了他社会学理论的框架。

1930—1931 年，卢卡奇曾在“莫斯科马克思—恩格斯研究院”工作；1931—1933 年他在柏林参加了德国共产党的文学运动；1933—1934 年，他在莫斯科苏联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工作；1945 年回到匈牙利，在布达佩斯大学任美学和文化哲学教授。1953 年在“匈牙利事件”中，他再度出山，成为纳吉政府的文化部长，随后而来的是流放罗马尼亚。返回祖国后，他在学术上长期保持沉默，主要著作基本上只在西方国家出版。直到 1967 年以后，他才被重新恢复党籍。晚年的卢卡奇最重要的著作是《审美特性》和《社会存在的本体论》，前者是他社会哲学思想在美学中的运用，后者则是他社会学思想的总结，《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是卢卡奇的收笔之作，也是卢卡奇一生思想的总结。1971 年 6 月 4 日卢卡奇逝世。

二、《历史和阶级意识》评介

《历史和阶级意识》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圣经”，青年卢卡奇的思想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中，在萨特的人学理论中，在前南斯拉夫实践派中产生了广泛而持久的影响。

众所周知，法兰克福学派是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中影响最大、最有势力的一个学派。就 20 世纪的社会学思想史来看，法兰克福学派也是当代社会学界中有影响的一个学派，它们所建立的社会批判理论在西方社会中有着广泛的影响。

卢卡奇与法兰克福学派有着密切的联系，不仅他的理论对法兰克福学派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而且从法兰克福学派一诞生，在社会研究所成立的初期和以后的岁月中，卢卡奇始终和一些批判理论家们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友谊。

卢卡奇社会哲学理论的主要代表著作是 1923 年的《历史和阶级意识》和晚年的《社会存在的本体论》，正是这两部著作确立了他在当代社会哲学中的地位。这里展开的只是《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中主要社会学思想。

(一) 历史是马克思社会哲学的本体论基础

卢卡奇在《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根本性理论倾向是批判第二国际理论家的新康德主义倾向、实证主义倾向，突出和强调马克思的理论的历史功能和社会功能。他认为马克思不同于以往的哲学家在于提出了一种批判哲学，“这种批判的哲学首先表示了历史的批判。”马克思揭示了历史的本质就是社会制度的历史，他通过研究社会制度的历史起源，从而证明了社会制度的每一方面都服从历史，说明了“历史恰好是这些制度的历史，是它们作为人们集合在社会中的制度经历变化的历史。这些制度首先对人们之间的经济关系加以控制，接着进一步对人类关系的各个方面加以控制(因此，也包括人同自身的关系以及同自然的关系等等)。”历史唯物主义决不像考茨基所说的“是以主观灵感，以单纯的愿望和想象为根据”的，它是科学的世界观，是马克思的哲学本体论。卢卡奇认为决不能把马克思的学说看成一种纯科学的理论而应把马克思主义“完全看作一种社会理论、社会哲学...”。

从这个根本立足点出发，卢卡奇得出三条重要结论：

第一，只有历史辩证法，没有自然辩证法。在《什么是正统的马克思主义？》一文中他首次明确提出这个问题，他说：“认识到这种方法(即辩证法——作者注)被限定在历史和社会的范围内，这是特别重要的。从恩格斯对辩证法的说明所产生的误解主要基于这样一个事实，即恩格斯错误地追随黑格尔，把这种方法扩大到了自然界。然而，辩证法的决定性因素——主体和客体的相互作用，理论和实践的统一，在现实中历史的变化处在范畴的下面，作为思想上变化的根源等等——都不存在于我们对自然的认识中。”在卢卡奇看来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因为马克思的学说首先是一种批判的学说，是一种人求得解放的学说，如果以纯科学的方法去对待它，以一种实证主义的态度去研究自然界的发展和变化，那它和人类的社会解放有什么关系呢？正如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重要代表人物列菲弗尔所说的“如果辩证法来源于自然界，那么它怎么能是革命的呢？”卢卡奇认为恩格斯应对这种实证主义倾向负责，因为“在恩格斯的论述中都没有探讨过这个至关重要的方面，也就是说，恩格斯采取了与‘形而上学’相反的对比方法论述了辩证法的构成。……但是恩格斯甚至根本没有提到历史过程中的主体和客体之间的辩证关系，这

种最重要的相互作用，……而对于辩证法来说，中心问题是要改变实在。”

第二，自然是一个社会范畴。既然马克思的学说是一种社会理论，那么自然就是一个社会范畴。因为“无论什么被认为是自然的，那么这种自然是与人相关的，人所涉及的自然无论采取什么形式，也就是说，自然的形式，自然的内容，自然的范围和客观性总是被社会所决定的。”这样，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功能得到进一步说明，无论是社会和自然，都可以用这种社会哲学来加以说明和解释，对任何自然的考察都是基于一定的社会经济结构之上的。

第三，自然科学的片面性。第二国际的理论家崇尚科学，认为科学家通过实验室观察、抽象得到的事实是最纯正的事实，最科学的事实。卢卡奇认为这个结论是错误的，必须看到自然科学的片面性。首先，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是一种抽象研究的方法，这种看起来非常科学的方法实际上是很不科学的，原因在于“它没有看到，并去说明作为其依据的事实的历史性。”其次，自然科学在区别现象和本质时，没有注意到这些研究对象的“内在结构本质上是历史的。”最后，自然科学的研究结果都是有条件的，都是一定历史时代的产物。

卢卡奇的这条社会哲学原则在当时和本世纪产生了重大的影响，他开启了马克思社会学思潮中的反实证主义、对科学批判的浪漫主义思潮的先河。

(二) 批判异化是马克思社会哲学的主题

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异化是他存在的本质特征。这种异化现象不仅成为外在客观世界的根本特点，而且也成为人的内在世界的根本特征。卢卡奇的人道主义则首先是从批判异化入手的，《历史和阶级意识》所以名声大噪，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因为它在本世纪最早、最系统提出异化理论的著作。在《历史和阶级意识》发表十年以后，直到1932年马克思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才公开发表，一时间马克思的异化、人道主义思想轰动了整个西方思想界，青年马克思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与此同时，人们惊讶地发现马克思的这些思想与青年卢卡奇《历史和阶级意识》中的异化、人道主义思想十分相似。而这一切都是在卢卡奇未读到马克思的《手稿》情况下，独立分析出来的结果。卢卡奇由此身价百倍，受到许多西方思想家的高度评价。

首先，卢卡奇从商品入手，分析了资本主义条件下的劳动异化。他认为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入手，从总体上描述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方法论上给我们提供了一个范例。他认为马克思的这一方法告诉了我们“在人类历史的这个阶段，任何问题最终都要返回到商品的问题，任何答案都会在商品结构之谜的答案中发现。”卢卡奇认为当商品成为一个普遍的社会范畴时，这就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产生了重大的变化。

从客观方面来说，“一个充满客体和事物之间的关系的世界拔地而起(商品和它们在市场上的运动)，”这就是说人的劳动创造出了一个庞大的异己于自己的世界，尽管人们也可利用和掌握这个世界的规律为自己服务，但从根本上他不可能改造这一活动，这个商品关系的世界是既定的，无法从本质上触动的。从主观方面来说，“一个人的活动成了与他自己相疏远的东西，一个人的活动变成了附属于社会自然规律的人类以外的客观商品……。”不仅

这个世界是陌生的，不可控制的，连主体本身，人本身也成为陌生的，不属于自己的商品。人既然是商品，那就要服从商品运行的规律，人丧失了自己，他身不由己了。

商品的这种普遍性所造成的这两个方面的变化，使生产商品的劳动完全抽象化了。任何不同性质的商品进行交换都是依据着这个商品中所包含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来精确计算的。为了提高商品的竞争能力，就要缩短包含于商品中的必要劳动时间，而这种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缩减的过程，也就是资本主义从工场手工业生产发展到机器生产的发展过程，就是一个不断改造技术，提高生产率的过程。

这种生产的机械化和合理化的发展过程沿着两个方向前进。一方面，向着更精确计算的方向发展。资本家为了提高竞争力，必然精确计算生产的每一个环节，把一切生产过程都要归结为最节约、最简便的数字统计。这种数字统计的基础就是时间，节省每个商品生产的时间，只有这样才能摆脱那种传统的经验生产方法，使一切生产劳动数字化、合理化。另一方面，生产向着合理化的分工发展，要把生产过程归结为最简便的数字管理，这就必然把庞大的生产过程分解为各个单位。分工越细，生产就越合理，泰勒制就是这种合理化分工的一个典型。

这种生产的专业化、合理化、数字化的发展过程对于劳动者，对于生产者本人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呢？卢卡奇认为这个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其严重性表现为人的内在的存在被这种商品化发展过程分裂了，人的存在被这种专业化的过程否认了。因为这种生产的数字定额，这种合理的机械化必然“一直扩展到工人的心灵中。”资本家为了促使工人心理特征结合到专门的理性化生产系统之中，他们自然会把工人的心理特征也归结为统计学上可行的概念，这样工人的内在心理存在就被这种合理的机械化过程从他的总体人格中分离出来了，并且“使这种心理特征与其人格相对立。”就是说工人完整的人格已不复存在，它若生存就必然发生内在的分裂。

另一个结果就是工人被彻底地原子化了。因为生产过程分工越合理，机械化程度越高，劳动者就越不表现为劳动过程的主人。不仅如此，他反而成了一个大的系统中的部件、一个原子、一个螺丝钉。这样，工人就从根本上丧失了主动性，变得越来越滞留和愚笨。因为他们从整体上不是独立存在的，而是依附于机械系统的，当然也就谈不上独立性。这正如卢卡奇所说的“机械化也把他们分裂成孤立的、抽象的原子，他们的工作不再把他们直接地有机地结合在一起；由于禁锢他们机械抽象规律的作用，在日益扩大的范围内，他们成了中介。”

这一切使资本主义社会出现两个相反而紧密相联的奇怪现象。这就是人的价值的丧失和物的价值的上升。正像马克思所说的“时间就是一切，人不算什么；人至多不过是时间的体现。”表面上看人的确是自由了，它彻底地和生产手段相分离了，它自由得一无所有，它成了一个孤独的、微小的原子，它的存在在呼啸运转的商品规律面前算得上什么呢？只不过是一粒尘埃，一只蚂蚁，人根本无法支配自己的命运。正像卢卡奇后来用雨果在《悲惨的世界》中所描写的一个场景那样：茫茫大海，一叶孤舟，风起云涌，巨浪滔天，有一个人从船上掉到了水中。船无声地前进着，颠簸着，慢慢地消失在无界的天边。而那落入水中的人在死一般的孤独中，同无情的、冷酷的波涛搏斗着，挣扎着，直到他终于独自地、失意地、绝望地沉了下去。

这就是在商品的世界中，在异化的世界中人的命运。这种凄凉、悲惨的结局是整个社会的一个缩影，“因为这种自我体现，这种把人的作用变成商品的行为，完全揭示了商品关系的这种野蛮的，人伦丧失的作用。”

在社会的另一极是物的价值的升值。货币像魔术师戏弄着人，物成了主宰，人成了奴隶。后来卢卡奇曾引用马克思谈到莎士比亚时所说的：“莎士比亚特别强调金钱的两个特征：1.它是看得见的神灵；它把一切人和自然的性质变成它的反面，它把事物的位置普遍颠倒弄乱；它能使不可能的东西结成兄弟；2.它是普遍的娼妓，是人与人、民族与民族私通普遍的撮合者。”

异化的严重性还不仅如此。卢卡奇认为仅仅从经济上看商品经济是远不够的，“必须把它视为资本主义社会各个方面的主要结构问题。”这样卢卡奇对异化的批判分析就从经济领域转向了法律、文化等广阔的社会领域之中。

卢卡奇认为这种物化现象一旦转化为社会生活的每一种表现形式，那么，它首先最突出地表现在国家形式和法律制度上。他借助马克斯·韦伯的话说明了这一点。韦伯说：“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一个商行就是现代国家。”国家制度同样渗透着商品生产中的合理化原则和可计算原则，这就像一架机器可能操作运转能被计算一样。……在这样的国家中，法官或多或少是一部自动执行法律的机器，只要从这架机器的顶部塞进一张案卷，连同一些必要的费用，那么，你就可以从这架机器的下部得到它所吐出的多少具有说服力的裁决：也就是说，法官的所作所为大体上是可以预先知道的。”显然，在国家机构中的工作人员和在生产机构中的工人有类似之处：一切都是可计算的，它不过是一个机械系统中的一环，生活的单调、刻板 and 枯燥无味使人对生活和工作毫无兴趣。

因而，卢卡奇发现，国家机构分工越细，越合理，那么它的异化也就越严重，人的非人化倾向也就越突出。这里同样存在着人的能力和他的整个人格相分离的问题，一个国家雇员只是作为一种有能力的商品出卖给这机器的。那种个别官僚对于他们所面临的物的关系体系的绝对服从，足以证明了生产中泰勒制已经侵入了人的伦理领域之中。尽管国家管理和生产领域有着很大的差别，但就其实质而言是一致的。资本主义的国家制度“决不是在减弱物化的结构，而是在强化这种物化结构。”

整个社会都在堕落。这种异化在学术领域中以一种更加“控制”的形式表现出来。正像卢卡奇所说的“专门化的‘名人’作为是对象化和物化了的能力的小贩”仍逃不脱商品结构这个大网，尽管他们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到头来仍是一个商品的出售者。一旦与商品联在一起，就必须发生灵魂的分裂，因而这些人类的“头脑”其结局也是很惨的，他们只好默认了自己的没落和腐败，对自己心灵的腐化和这种出卖生活的方式也只好默默认可。卢卡奇说这种情况在新闻界尤为突出。

商品关系所带来的腐败，所导致的异化的痛苦，所产生的心灵震荡渗透到了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它像那带着毒气的晨雾，每个人都在吞吐着它，谁也离不开它。甚至两性关系也被对象化了。异化已侵入了私人生活的最隐秘部分——性生活。卢卡奇引用了康德的话来证明这个问题，康德说：“性的共同性就是一个人利用占有另一个人的性器官和功能……婚姻是异性的两个人结合，以便共同占有对方的器官而达到传种接代的目的。”

哪里还有美好的东西呢？哪里还有纯洁、善良呢？哪里还有独立的人

格、自由的思想呢？卢卡奇认为一切都被异化了。而在这个世界上，人的关系所可能具有的一切自然的形式，人的物理和心理‘性质’所可能发挥作用的一切方式，无不日益纳入这一物化过程中去。”

由此，卢卡奇认为批判异化是马克思社会哲学的主题。

(三) 总体性原则是马克思社会哲学方法论的实质

《历史和阶级意识》的副标题是“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研究”，这种辩证法的研究不仅表现在从性质上把自然辩证法转换为历史的辩证法，还在于对这种历史辩证法的具体展开，即总体性的辩证法。正因为这样，总体性是卢卡奇社会学思想的一个很重要范畴。他认为辩证法的实质就是总体性，是马克思从黑格尔哲学中继承了这个思想，并“把它变成一门全新科学基础的方法的实质。”从根本上来看，“总体性范畴是科学中革命原则的支撑者”，或者换一个说法，马克思的社会学说就是一门“关于作为总体的社会进化的科学。”我们可以从以下三个方面进一步展开卢卡奇关于总体性的思想。

第一，总体性原则的本体论特征。

上面我们已经提到卢卡奇用一种历史本体论取代了恩格斯的自然本体论，历史成为其本体论的基础。卢卡奇认为历史所以成为马克思社会学的出发点和归宿点，根本上还在于马克思说明了历史的总体性，从而在根本上解决了资产阶级哲学的问题。

主客体的对峙是自康德哲学以来资产阶级哲学的基本特点。因为很明显，自然客体总是外在于主体的，主体对它是陌生的，主体和客体之间没有必然的桥梁。黑格尔哲学就是一个例证。黑格尔哲学本质上是一种历史哲学，他把整个对象作为一个历史过程去把握。实体即主体的原则推导出了主体和客体的历史运动。但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并未真正找到历史的主体，黑格尔是把“世界精神”或者“国民精神”作为主体的。这样就产生了问题，因为“国民精神”只是一种表面上的主体，它只是作为“世界精神”的负荷者去完成它的使命。这样，“世界精神”是世界历史的最高法官，历史的过程就是这种“世界精神”通过各个“国民精神”认识自己，把握自己的过程。而这种“世界精神”实质上是先验的、神秘的。

卢卡奇认为黑格尔哲学代表了资产阶级历史哲学的最高水平，但它并没有说明历史。而马克思迈出了决定性的一步，马克思第一次真正地揭示了历史的本质，这就是历史唯物主义。第一次真正地发现了历史的主体“创世的我们，也就是无产阶级。”这样马克思在无产阶级身上找到了“同一的主体——客体”。历史第一次得到了真正的说明，主体和客体的对峙得到消解，达到了统一。

总体性的重要性就在于，它不仅决定着历史的主体，也决定着历史的客体。历史主客体的统一，资产阶级二律背反的解决，新的社会学理论的产生都有赖于辩证的总体性。从客体来说，历史是总体性的历史，而不是支离破碎的历史。历史不是一堆杂乱无章的个别事件的堆积，历史作为自在之物其“形式和内容关系的特点必然表现它的总体性问题。”当然，这种总体性不是一种神秘的总体性，它是体现在感性和经验的历史中，他强调说“超越现实只能意味着经验世界的客体将被作为一个整体的各个方面来理解，也就是作为总的社会状况的各个方面，体现在历史变化的进程之中。”

卢卡奇认为“总体性范畴不仅决定着认识的客体，而且也决定着认识的主体。”为什么资产阶级的经济学家总是局限于枝节问题而不能从总体上揭示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实质和规律呢？关键在于他们总是从个别资本家的观点来看问题。所以，“只有假定主体本身是一个整体，客体的整体才能够被假定，如果主体想要了解自身，那它必须把客体看作是一个整体。”

第二，总体性原则的认识论功能

卢卡奇认为历史的本体论和社会的认识论是一而二，二而一的，它们从不同的方面反映了总体性范畴的作用和特性。他说“总体性的辩证法概念似乎把自己放在和现实相距很远的位置，它似乎很不科学的去构造现实，但实际上，它是能够理解和再现实在的唯一方法”。卢卡奇认为马克思的《资本论》为我们提供了总体性认识方法的典范。资本主义表现为一个庞大的商品堆积，马克思为什么能透过现象揭示出商品的本质呢？原因就在于“辩证法和它的总体性概念提供给我们达到对于社会上述事情的真正认识。”因为认识对象是总体性的，认识方法也应是总体性的，只有运用这种认识方法，才能真正把握一个事物的本质。

第三，总体性原则的人道主义特征

当哲学是一种“历史的哲学”，辩证法是一种历史辩证法时，作为历史辩证法的根本范畴的总体性必然具有一种人道主义特征。

在“物化现象”一节中，卢卡奇认为在资本主义商品生产条件下工人异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是生产的机械化导致了工人总体性人格的分裂。人被分裂成各个生产环节上的一部分，成为自动化系统中的一个部件，它的心理的、精神的需求都被取消了，工人似乎不再是一个完整的人，而成为一个部件。所以，卢卡奇认为劳动的对象化、机械化成了和工人“整个人格相对立的东西。”人的“总体性的每一个形象的消失”，人的沉沦与人性的扭曲成为社会的最严重问题。

总体性成为卢卡奇批判资本主义条件下异化的最有力武器，成为他解释马克思学说的一个基本切入点。他说：“正如青年马克思的总体性概念使人更清楚地看到了资本主义的病状一样……”，人们从总体性中看到了人发展的目标。人要有完整的人格，有审美式的存在，人作为尽善尽美的总体，它在内心克服了或者正在克服理论和实践、感性和理性、形式和内容的分离，从这里我们看到总体性的人道主义特征。

以上这三条社会学的基本原则构成了《历史和阶级意识》一书社会哲学思想的最主要内容。《历史和阶级意识》自 1923 年发表以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卢卡奇本人一生中在文艺理论、美学、政治学等多方面引起过一系列的争论，但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围绕着《历史和阶级意识》所发生的争论。甚至我们可以说《历史和阶级意识》是 20 世纪社会哲学范围内最有争议的一部著作。考察卢卡奇的社会学思想不能不考察《历史和阶级意识》所发生的影响和所引起的争议，只有通过《历史和阶级意识》影响史的考察，我们才会更清楚看清他的思路，他所提出问题的价值，从而看出他在本世纪社会学思想史中的地位。

(王君琦 撰)

【挪】乔斯坦·贾德：
《苏菲的世界》——畅游哲学的神圣殿堂

每一个人都需要食物，每一个人都需要爱与关怀。不过除了这些以外，还有一些东西是人人需要的，那就是：明白我们是谁、为何会在这里。

——乔斯坦·贾德

这是一个将学术作品通俗化的杰出范例——对于未曾修习哲学概论者而言，本书是最佳的入门读物，对于修过此门课程但已忘却大半的人而言，本书有助他们重新温习。

——新闻周刊〔国际版〕

一、贾德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乔斯坦·贾德，1952 年生于挪威，从事高中哲学课程的教学工作多年。自 1986 年作者的处女作出版以来，他已经成为挪威的世界级作家，并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1991 年他出版了其代表作《苏菲的世界》。该书将深邃的哲学思想通俗化，使读者能以轻松的心境浏览从柏拉图以前一直到 20 世纪的整部西方哲学史。因此该书出版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即成为挪威、丹麦、瑞典和德国的畅销书，销售量多达三百万册，日本推出该书一个月即售出五十万册。到目前为止，已有三十多个国家购买了该书的版权。我国著名的哲学教授傅佩荣评论道：“哲学不是万灵丹，但是从来不去留意爱好智慧的重要与前人的心得，那么注定将会陷于心灵之封闭与终结。这或许是本书在世界各国广受欢迎的原因吧。为了使人从困感到觉悟，本书提供了一盏明灯。”

二、《苏菲的世界》评介

“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人死后是否还有生命？”在历史上，人们对诸如此类问题给出了不同的答案，即使在今天，人们也仍然在不厌其烦地寻求对这些终极性问题的解答。哲学作为一种系统化、理论化的世界观，正是以探讨人生的真谛、追问世界的本源和归宿为己任。然而古往今来，多数哲学著作深奥而晦涩，其中规范性的名词术语令平凡世人望而生畏，从而成为仅供少数哲人和先知享用的奢侈品。本书作者贾德一改过去的千古惯例，以通俗流畅的语言、扣人心弦故事情节，将抽象而严肃的哲学内容寓于轻松活泼的小说文体中，打破了哲学与世俗的界限，使得高高悬浮于经济基础之上的哲学从天上降到了人间。作者这种“敢为天下先”的创举正是本书的魅力和特色所在，也为作者本人带来了巨大的成功。

贾德说：“哲学家追寻真理的过程很像是一部侦探小说”，因此他以其丰富的想象力，描述了一个类似于侦探故事式的情节：14 岁的少女苏菲放学回家，在她的信箱里发现了一封未留名，也未贴邮票的信。

——你是谁？

——世界从何而来？

就这样，苏菲在某个神秘导师的精心指导下，通过一些不同寻常的信件，一步一步地了解到哲学发展的历史。从柏拉图到亚里斯多德，从笛卡尔到马克思，古往今来各位哲学大师的观点尽收眼底，哲学演化发展的脉络清晰可见。通过一封封的来信和对一些熟悉而又陌生的哲学命题的探讨，一幅幅活生生的哲学图景展现在苏菲的眼前，也展现在每个读者的眼前。

《苏菲的世界》是一个童话般的梦幻世界，也是一个启迪人类智慧的理性世界。解读本书的过程，就是与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对话、交流的过程，也是反思自我和宇宙，领悟人生真谛的过程。

(一)从神秘的伊甸园到黑暗的中世纪

世界是如何创造出来的？其背后是否有某种意义或意志？人死后是否还有生命？千百年来，无数的哲学家孜孜以求，试图破译这些复杂深奥、神秘莫测的问题。

圣经上讲，世界是上帝创造的。自从亚当、夏娃被逐出伊甸园后，上帝用泥土造了人。人类早期的创世神话试图呈现世界的面貌，并且认定在善与恶这两种势力的相互对抗之中存在着一种不稳定的平衡。随着城市的兴起和经济的发展，神话的思维方式逐渐被以经验和理性为基础的思维方式所取代。早期的希腊哲学家关注的主题是大自然与它的循环变化，希腊哲学基本是一种自然哲学。作者列举了米雷特斯的三位哲学家。泰利斯认为水是万物之源，安纳克西曼德认为我们的世界只是他所谓的“无限定者”，安那西梅尼斯则认为万物之源必定是“空气”或“气体”。德谟克里特进一步提出，大自然由无数形状各异的、不可分割的原子组成。总之，他们都相信宇宙间有一种基本物质是世间万物的本源。

自苏格拉底之后，雅典成为希腊文化的中心，哲学理论从自然哲学演变为苏格拉底的人本学说。自然哲学关注的话题是自然物质的本质，而雅典哲学家的兴趣主要在个人及其在社会的地位。诡辩学家普罗塔哥拉斯说：“人是衡量一切的尺度”。苏格拉底作为许多哲学学派的始祖，也是整个哲学史上最神秘难解的人物。作者将他形象地描绘为：“像牛蝇般叮他的同胞”，因为他与别人讨论问题的方式是通过不断地追问，一直到他的对手理屈词穷之际，被迫承认自己的理论误区”。而这样一个博学之人却说：“我只知道一件事，就是我一无所知。”作为苏格拉底得意门生的柏拉图所关心的是永恒不变的事物与“流动”事物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世间有所谓永恒、绝对的是非观念存在，即“理念的世界”。在他的名著《理想国》中，他虚构了一个理想的国度，认为国家应该像人体一般，由三部分组成，就像人有头、胸、腹一般，一个国家也应该有统治者、战士与工匠，而哲学家是最好的统治者。亚里斯多德在柏拉图的学园中进修了二十年，他不仅是希腊最后一位大哲学家，也是欧洲第一位大生物学家。他认为人类灵魂中存在的事物纯粹只是自然事物的影子，因此自然就是真实的世界。在批评了柏拉图的理念论后，他认为存在界乃是由各种本身的形式与质料和谐一致的事物所组成的，以此事确定自然的层级。在大自然中，人是唯一的理性存在，“人唯有运用他所有的能力与才干，才能获得幸福。”希腊文化衰落后，进入了罗马时期，作者

概括地介绍了这一时期的哲学派别，即犬儒学派、斯多葛学派、伊壁鸠鲁学派和新柏拉图派。

当基督教进入希腊罗马地区后，两种文化交汇融合，历史进入了以基督教为重心的持续了一千年之久的中世纪。这一时期最著名的两大哲学家是圣奥古斯丁和圣托玛斯。圣奥古斯丁一半是基督徒，一半是新柏拉图派的哲学家。他认为上帝自虚空中创造了世界，但是在上帝创造世界之前，那些“理念”存在于神的心中。因此他把柏拉图所说的理念放在上帝的心中，借此保存了柏拉图有关永恒理念的观点。圣托玛斯是中世纪最伟大的哲学家，他将亚理斯多德的学说加以“基督教化”，试图使亚氏哲学与基督教教义相容共存。他认为，我们用理性可以体认到我们周围的事物必然有个“目的因”。这是因为上帝既透过圣约，也透过理性向人类显现，所以世上既有“信仰神学”也有“自然神学”。在道德方面也是如此，圣经教导我们上帝希望人类如何生活，但上帝同时也赋予我们良心，因此我们要过道德的生活，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中世纪过后不久，基督教分裂。哲学与科学逐渐脱离教会的神学，使得宗教生活与理性思考之间的关系变得相对自由，新的科学方法与新的宗教狂热逐渐产生，终于在 15 到 16 世纪爆发了文艺复兴运动与宗教改革运动。

作者精炼地概括道：“在中世纪期间，上帝是一切事物的出发点，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则以人为出发点。”文艺复兴运动最重要的影响是改变了对人的看法，使得对人本身和人的价值重新树立了信心，“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深入人心。当时的信念是：我们不仅是人，更是独一无二的个体。宗教改革的领袖马丁·路德摒斥了教会中的许多陈规陋习与教条，借以将基督教带回它的“源头”。他认为应该让每一个人都能读懂圣经，并从某种意义上说，成为自己的教士。

(二) 英国的经验主义与欧陆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思想是 17 世纪哲学的特征，其代表人物是法国的笛卡尔和荷兰的斯宾诺莎。理性主义者相信理性是知识的源泉，是通往知识的唯一途径，唯有透过理性才能获得确实的知识。笛卡尔的名言“我思故我在”，他认为除非我们能够清楚分明地知道某件事情是真实的，否则我们就不能够认为它是真的。他还希望用“数学方法”来进行哲学的思考，用一般人证明数学定理的方式来证明哲学的真理，并且将思想的真实世界与扩延的真实世界区分得一清二楚。斯宾诺莎是第一个对圣经进行“历史性批判”的人，他认为，“基督教与犹太教之所以流传至今，完全是借助于严格的教条与外在的仪式。上帝创造这个世界并不是为了要置身其外，世界就在上帝之中”。

到了 18 世纪，理性主义思想受到了日益严格的批判。当时的哲学家认为，如果不是透过感官的体验，我们的心中将一无所有，这就是经验主义的哲学观，其代表人物是英国的洛克与休谟。他们认为：我们在看到这个世界之前对它并没有任何固有的概念或观念。如果我们有一个观念或概念是和我们所经验的事实完全无关，则它将是一个虚假的观念。因此我们的心灵中所有的事物都是先通过感官而来的。

洛克宣称，我们所有的思想和观念都反映我们曾看过、听过的事物。在我们看过、听过任何事物之前，我们的心灵就像老师还没有进教室之前的黑

板一样空白。他将感官的性质分为“主要”与“次要”两种。主要性质指的是扩延世界的特质，通过我们的感官可以将它们加以客观地再现；事物的其他特质即次要特质不能真正反映事物本身的固有性质，而只是反映外在实体在我们的感官上所产生的作用。洛克相信世间有所谓“自然权利”存在，人类凭理性就自然而然可以知道上帝的存在。他最早强调立法权与行政权必须分立，以防止专制统治。为了确保国家的统治，必须由人民的代表制定法律，而由国王或政府执行法律。

休谟认为：“没有一个哲学家能够带我们体验日常生活，而事实上哲学家们提示的那些行为准则，都是我们对日常生活加以省思后，便可以领悟出来的。”作为一个不可知论者，他只接受用感官所认知的事物，除此之外，一切事情都有待证实，这样信仰与知识之间的纽带终于被切断了。他强调说：“一件事情发生后另外一件事情也会发生”的想法只是我们心中的一种期待，并不是事物的本质。哲学的目的之一就是教人们不要妄下定论。

(三) “法国革命的德国理论”

作者在概括地介绍了18世纪法国的启蒙运动后，把关注的视角转向德国的康德和黑格尔。康德是在休谟之后出现的另一位大哲学家。他的概念是：时间与空间属于人类的条件，是人类感知的方式，并非物质世界的属性。因果律的存在是人类理性的特色。作者认为康德对哲学的最大贡献在于他区分了“事物本身”和“我眼中的事物”，并断定我们永远无法确知事物本来的面貌，而只能知道我们眼中看到的事物。每一个人都有“实践理性”，也就是辨别是非的智慧，都能够感知普遍的道德法则，这套法则是无条件的无上命令，具有绝对权威。只有我们自己确知我们纯粹是为了遵守道德法则而行动时，我们的行为才是自由的。用作者的话说：“我们可能会成为各种事物的奴隶，我们甚至可能成为我们的自我中心思想的奴隶。独立与自由正是我们超脱自我的欲望与恶念的方法。”

康德使哲学走出了理性主义与经验主义的僵局后，欧洲历史进入了最后一个伟大的文化纪元即浪漫主义时期。作者说：“黑格尔是浪漫主义的传人，他是随着德国精神的发展而成长的。”黑格尔相信人类认知的基础代代不同，因此世间没有永恒的理性。哲学唯一可以确切把握的一个定点就是历史。历史就是世界精神逐渐实现自己的故事，是一个正、反、合的辩证发展过程。这里，作者借助于女权运动的实例生动地解释了这一命题。黑格尔同时认为，个人是团体的一个有机的部分，那些无法在国家中找到定位的人就是没有历史的人。个人不能发现自我，只有世界精神能够发现自我。世界精神在经历主观精神、客观精神和绝对精神三个阶段后达到了最高形式的自我实现，哲学是世界精神的镜子。

(四) 自然主义哲学

自然主义指的是一种认为除了大自然和感官世界之外，别无其他真实事物的哲学观点。一个自然主义的科学家只相信自然现象，而不相信任何理性假设或圣灵的启示。马克思、达尔文和弗洛伊德均为自然主义哲学家的代表。

作者首先虚拟了一个生动形象的故事，由此来揭示马克思的观点。苏菲

在一片树林里遇到了一位富有的老人，他就是狄更斯的小说《圣诞颂歌》里面十分吝啬的资本家史古吉。在不远处苏菲又遇到一个衣衫褴褛的小女孩，即安徒生童话中那个卖火柴的小女孩。苏菲很同情这个女孩，就请求史古吉帮助她，可史古吉却说：“我一分钱都不能浪费。”小女孩被逼无奈，擦亮了一根火柴，瞬间焚毁了树林。作者将这场火喻为19世纪中期的阶级斗争之火，而阶级斗争理论正是马克思主义的核心理论之一。马克思说：“哲学家只诠释了世界，可是重点在于他们应该去改变这个世界。”作为一个辩证唯物主义者，他认为社会的经济基础与它的上层建筑之间有一种能动的辩证关系存在，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反映那个社会的经济基础，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本身有若干内在的矛盾，它是一种自我毁灭式的制度，因为它缺少理性的控制。作者对马克思主义理论作出了较为客观的评价，他说：“马克思主义造成了社会上很大的变动。毫无疑问的，社会主义已经大致上改善了社会上不人道的现象，这一部分要归功于马克思和整个社会运动。”

作为一个自然主义哲学家，弗洛伊德通过对潜意识的研究，发现人们的行动多半是受到“动物”本能驱策的结果。他首创的精神分析学说认为，人与他的环境之间有一种紧张关系存在，尤其存在于他的驱策力、需要和社会的要求之间。人们的行动并不一定源于理性，非理性的冲动经常左右人的思想、梦境和行动。这种非理性的冲动可能反映我们的基本需求。他提出人类心灵中的三个因素即：本我、自我和超我。并且认为：人类的意识只是他的心灵中的一小部分而已。意识就像是露在海面上的冰山顶端，在海面下，还有人的潜意识存在。洞悉潜意识的最佳途径就是解析人的梦境，做梦并不是偶然的，那是我们的潜意识试图透过梦和我们的意识沟通。”这里作者举了一个弗洛伊德式的简单例子：假设有一个年轻人梦见他的表妹给他两个气球，那么很可能他真正想要的是他的表妹，而那两个气球就是他表妹的胸部，当他对自我的愿望觉得很难为情的时候，就可能做这种梦。因此梦境是“以伪装的方式，满足人被压抑的愿望”，而灵感则是潜意识的“盖子”被揭开。作者描述了一个非常有趣而又令人伤感的故事：从前有一只蜈蚣，可以用它那一百只脚跳出美妙的舞蹈，其它动物都跑来欣赏，乌龟出于妒嫉心，想了一个恶毒的计划，便写信给蜈蚣，问它跳舞时先举起哪只脚，后举起哪只脚？蜈蚣思前想后也不得其解，从此再也不跳舞了，这就是理性的思考扼杀想像力的结果。

作者以轻松的笔调和生动的故事勾勒出哲学史的发展轨迹后，并没有到此止步，而是把关注的界域由具体的人和理论扩展到生命和整个宇宙，试图对该书开头提出的问题：“你是谁？世界从何而来？”做出解答，他理智而清醒地认为，目前有许多现象仍然是我们无法理解的，也许我们还没有真正了解自然的法则。所有真正的哲学家都应该睁大眼睛，即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白色的乌鸦，我们也不应该放弃寻找它。宇宙之大是无法想像的，人类只是刚开始了解宇宙而已。在浩渺无垠的宇宙中，人类就像星辰一样，“当我们仰望天空时，我们其实是在试图找寻回到自我的路。”

(乔波 许静 撰)

【英】阿诺德·汤因比：
《历史研究》——观古今于一瞬

我活得越久，我的忧伤与愤慨就越深。撰写《历史研究》这本书，就是我对呈现在我面前的人类残忍行为的挑战所作的应战。

——汤因比

整体的历史观乃为当今世界切实所需。

——阿·蒙达戈

一、汤因比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1889年4月14日，阿诺德·汤因比出生在英国伦敦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曾在茶叶进出口公司和一家慈善机构任职；母亲是个历史学家，曾写过《苏格兰历史故事》等书；叔伯中有著名的语言学家和经济学家。生活在这种家庭氛围中，汤因比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并偏爱历史，后来又在牛津大学巴里奥学院接受古典教育，专攻希腊罗马史和近东历史。1911年，遍访希腊各地，并在雅典的不列颠学院进修；次年受聘为母校巴里奥学院古代史教师。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汤因比在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任职。1918年，作为近东问题顾问，随英国政府代表团参加巴黎和会。1919年，被任命为伦敦大学教授，主讲拜占庭史和近代希腊史。

早在1920年，汤因比就萌生了撰写一部多卷本的宏观历史著作的念头。1921~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作为《曼彻斯特导报》记者，他到希腊、巴尔干半岛、土耳其一带采访。在东方列车上，他拟定了《历史研究》一书的编写大纲，后来在实际写作时几乎很少变更。

1925年，汤因比被聘为伦敦大学的国际关系史研究教授，同时兼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研究部主任。1920~1946年，他还出任英国皇家国际事务学会年刊《国际事务概览》主编。在1930年前往东京参加国际会议途中，他曾顺道访问过中国。1943~1946年，他在英国外交部担任研究司司长，参加过许多重要的国际会议。1947年，汤因比赴美讲学，在美国完成了《历史研究》最后数卷的写作。1955年以功勋教授名衔退休后，他仍致力于历史研究，并活跃在国际政治舞台上，公开谴责美国的侵越战争、以色列的中东政策和南非的种族歧视，热情宣传世界和平。1975年10月22日，汤因比因病去世，享年86岁。

汤因比著作等身，除了《历史研究》外，还著有《新欧洲》（1915年）、《希腊人的文明和风格》（1925年）、《巴黎和会之后的世界》（1925年）、《中国之旅》（1931年）、《考验中的文明》（1948年）、《文明与战争》（1951年）、《世界与西方文明》（1955年）、《一个历史学家的宗教观》（1954年）、《基督教在世界各大宗教中的地位》（1958年）、《从东方到西方：环球游记》（1958年）、《希腊文明时期：一个文明的历史》（1959年）、《美国与世界革命》

(1962年)、《汉尼拔的遗痕：布匿战争对罗马社会生活所产生的影响》(1965年)、《习俗与变革：我们这个时代的挑战》(1966年)、《我所认识的一些当代人物》(1967年)、《我的经历》(1970年)；由谈话录整理而成的有《两代人的对话》、《汤因比论汤因比》、《展望二十一世纪》、《拯救人类的未来》；1976年他的遗著《人类与大地母亲》出版。

尽管汤因比著述宏富，但使他名传后世的还是那12大卷的《历史研究》。此书第一至三卷出版于1934年；第四至六卷出版于1939年；第七至十卷出版于1954年；第十一卷是地图和地名汇编，出版于1959年；第十二卷《重新考虑》对他以前的观点有所修正，出版于1961年。《历史研究》卷帙浩繁，约有500多万言，常人难以卒读。1946年，美国学者索麦维尔将此书前六卷缩写成600多页的节本出版，深受欢迎，汤因比也因此声名大噪。1957年，索麦维尔继续将第七至十卷缩写成节本出版。上述节本的优点是框架清晰，条理分明，缺欠是没能收入汤因比的一些重要观点(因当时《重新考虑》尚未问世)。1972年，经汤因比手订并附插图的一卷节本出版，它收入了作者晚年的定论。

二、《历史研究》评介

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名字是与《历史研究》一书连在一起的。这部巨著使他声誉鹤起，名满天下；也使他四面树敌、备受讥评。在西方学术界，有人将《历史研究》视为当代最伟大的史学著作，认为作者真正发现了历史规律，为人类指出了一条光明大道；也有人认为这部书根本算不上什么历史，汤因比玷污了史学的尊严。见仁见智，各执己见，一褒一贬，判若天壤。

从1921年拟定大纲到1972年手订节本，汤因比为《历史研究》这部巨著倾注了一生的心血。在《历史研究的主旨及其编写过程》一文中，他声称撰写此书有三大目的：第一，要纠正史学界见木不见林的倾向；第二，要对最新的历史、考古成就作一个综合概括；第三，要履行一个历史学家的天职，为世界和平尽绵薄之力。他忧心忡忡地指出，历史学家们各自埋头钻研、老死不相往来之时，技术的发展已使地球“变小”，世界已联为一体。在核战争可能将整个人类文明毁于一旦之际，人们思想情感上的差距却遥隔万里。

“我们深知人类的前途岌岌可危，我们要挽狂澜于既倒。历史学家能做一件事：他能帮助各大文明中的同伴互相熟悉，帮助他们了解并珍视其他文明的历史，将各区域文明的历史视为人类共同的贡献和共有的财富，从而消弭相互间的恐惧和敌对情绪。在原子武器和超音速飞机的时代，要末天下一家，要末同归于尽。天下是一家，人类一直在为之奋斗不已。正视一下今日世界，就该明白了。我深信，整体的历史观乃为当今世界切实所需。”这无疑为汤因比撰写《历史研究》的真正的主旨所在。

汤因比曾得意地表示，虽然他的某些论点与斯宾格勒不无雷同，但“挑战”与“应战”则是他的独家发明。有人指出，这种理论取之于神话和诗歌，是一种非科学的概念游戏。汤因比反驳道，神话、诗歌并非无稽之谈，其中自有真知灼见。“挑战与应战是人类生活的一种样式，它带有自由而非命定的色彩。”，颇能说明历史的动因。一个社会物质水平再低，只要具有奋发向上的精神，其前途不可限量；如果不思进取，纵有一时繁荣，也逃不了衰亡的命运。

汤因比如此强调人的精神自决，用心可谓良苦。其目的主要是向西方社会敲敲警钟，告诫人们不要为政治、经济势力的扩张冲昏头脑，要清醒地看到由此带来的社会问题。汤因比曾多次表示，他剖析历史上已死的文明，旨在阐明文明并不是命中注定必死的，但仍有人指责他以文明的生死循环暗示西方文明也必然走向解体。他反复申明自己是反对历史循环论的。他认为，历史不一定重演，也不一定不重演，即使历史的形态会重复出现，也不等于历史又回到原来的起点。历史的循环不同于春夏秋冬、白昼黑夜式的自然现象，它是在循环中发展的，正如梭子往来飞驰，而织出的图案却可不断翻新。可见，汤因比的史论在总体上是积极的，尤其是“挑战”和“应战”这对概念的确能起到启人心智、催人自省、促人奋起的作用。正如他自己所说：“我活得越久，我的忧伤与愤慨就越深。撰写《历史研究》这本书，就是我对呈现在我面前的人类残忍行为的挑战所作的应战。”

当然，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汤因比应战的武器也必然取之于历史。他从大量历史资料中归纳出希腊模式、中国模式和犹太模式，认为这三大模式不仅能概括各大文明的历史形态，而且可以对人类的未来有所启示。人们可以通过希腊模式来了解从区域性小邦到大一统帝国的情形。各自为政的城邦体制为人们创造力的焕发提供了条件，但国际冲突的加剧、攻伐不已的战争使之大伤元气。大一统帝国虽然带来了和平和秩序，但丰富多彩的创造性却为呆滞死板的一体化所取代，从而为文明的衰亡埋下了祸根。可见，在军事技术尚十分落后的时代，由列国纷争到武力统一会使社会受到难以弥补的破坏，进而导致文明的衰亡，那末在原子时代，某个大国若以武力来统一世界，这就不仅是某个区域文明的厄运，也必将是整个人类的浩劫。中国模式向人们揭示了大一统国家在治乱交替的过程中日趋巩固的情形：大一统国家一旦建立，对战乱心有余悸的人们痛定思痛，为此舍弃一些创造的机会也在所不惜。这也说明，每当统一的局面遭到破坏后，总有某些强有力的因素使社会由分而合、由乱而治。中国人为统一而奋斗不懈的历史体现了人类反对战争、渴求和平的强烈愿望。犹太模式则显示了人们对其传统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无限的眷恋和执着的追求。正是这种坚定的信念，使人们能在千难万劫中绝处逢生，保存民族文化的特性。

创造性、独特性、和平与秩序是人类赖以生存的基本需求。但是历史表明，人们往往顾此而失彼，结果导致文明的僵化或崩解。汤因比指出，在文明的进程中，如果人类要生存发展，就取决于人们能在何种程度上使这些需求成功地趋于一致。可见，汤因此所谓的历史模式几乎都与现实需求和未来世界相联系。布克哈特说过，所谓历史，“无非是人们在另一时代里发现的对当代有价值的那些东西的记录”。汤因比正是从现实和未来的考虑出发，去寻觅他认为有价值的历史模式。他的模式不仅要求解释历史，更指望垂训未来，因此，带有强烈的主观意图和实用色彩。

汤因比是一位具有深沉宗教感的历史学家，致使《历史研究》也带有浓厚的宗教色彩，无怪乎有人把此书喻为从世俗之国升向上帝之国的汤因比启示录。但是，他所谓的宗教不等同于传统意义上的任何一种宗教，他的“上帝”也并非指神学教义中那个全知全能的人格化的上帝。他所指的宗教，广义而言，就是指事物背后的一种奥义。人们在它面前感到自身的渺小，希望与它建立和谐的关系，汤因比一再声言的“上帝的法则”，也近似于历史的规律。他看到历史的进程具有某种节奏感和划一性，揣度历史的背后隐藏着

某种神秘的力量，“但无以名之，权且称其为上帝”。在这一点上，汤因比的宗教观颇似爱因斯坦所崇尚的“宇宙宗教感”，相信人类可以通过自身的努力求得自救，又对历史的规律、人类的前途不胜迷惘。正是这种矛盾的心理，驱使汤因比在强调人的自决的同时又以宗教为归宿，企图发现“上帝的法则”。

《历史研究》一书展示了汤因比的宏观史学体系，确立了他在西方史学史上的地位。作为思辨历史哲学的最后一位大师，尽管汤因比的理论不无遗憾，但其中一些精辟的见解仍为后世所采纳而流传。

《历史研究》共分为十三部，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以论带史，以文化形态史观贯穿全书。汤因比从各大文明的发生、成长、破坏、崩解和死亡的过程来展开其论点，他总是先阐述自己的观点，然后用大量的历史事实不厌其烦地加以论证。他自称这是英国经验主义的治学传统。

(一) 历史研究的“单位”和“模式”

汤因比认为：历史研究的范围不应局限于某一民族国家或某一时代，而应以“社会”为研究的基本对象。所谓“社会”，也就是能自成一体的“文明”，即指某一特定的具有共同文化或共同生活方式的人的群体。宗教则是文明的载体，文明是按照宗教来划分的。唯有以“文明”为研究的基本单位，才有可能把握人类历史发展的轨迹。

在考察了前文明时期的社会之后，作者将前文明的特征归结为：(1) 经过混乱时期，建立起大一统帝国(如罗马帝国)；(2) 间歇时期；(3) 大一统教会；(4) 蛮族大迁徙。教会和民族大迁徙是一个垂死文明的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的产物。

以此为依据，汤因比认为人类历史已出现过西方基督教文明、东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印度文明、远东文明等 20 多种文明。在第十二卷《重新考虑》中，他又将文明扩展到 37 种，并修正了早期以希腊罗马历史为蓝本的文明模式，提出了“希腊——中国复合模式”以及“犹太模式”。

汤因比以文化为特征来标志各大文明。他的所谓“希腊模式”是将罗马历史也包括在内的。希腊世界在文化上属于同一体系，各城邦的公民具有文化上的认同感，在政治上则处于分裂状态，各邦国之间竞争激烈，战乱频仍。竞争固然激发人们的创造力，促进了文明的繁荣，但战争愈演愈烈，对社会的破坏也日益严重。罗马的统一带来了和平与秩序，暂时缓解了文明崩溃的进程，但统一的代价极其昂贵，连年的战争已使各城邦国力虚耗。在大一统帝国僵死的制度下，人们生机勃勃的创造力受到窒息，整个社会已失去活力，大一统帝国也势必难以长治久安。少数当权者依靠武力来维持统治，导致人民离心离德，对毗邻的蛮族也失去了吸引力。前者形成“内部无产者”，后者成为“外部无产者”，帝国处于内外交困的窘境。内部无产者从外来的宗教思想中获得灵感，创立了高级宗教——基督教，在精神上独树一帜。随着基督教势力的上升，整个社会和外来的蛮族都皈依了基督教，大一统教会应运而生。外部无产者的入侵给予日薄西山的帝国以最后的一击，帝国的垮台标志着希腊文明的衰亡，而教会则作为西方基督教文明和拜占庭文明的媒介幸存下来。

汤因比认为，中国从春秋战国到秦汉统一这段历史与希腊模式基本吻

合。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在文化上趋于一体，百家争鸣，盛况空前。政治上则群雄竞起，逐鹿中原，以至哀鸿遍野，民不聊生，最终由秦始皇一统天下。汤因比所谓的“中国模式”，主要指秦统一以后中国历史所呈现的一治一乱、一分一合的发展形态。这种治乱交替的历史形态与埃及、拜占庭、印度等地区的历史有相同之处。因此，中国模式要比希腊模式更具有普遍性。但它与西方基督教文明、中美洲文明的历史形态并不一致，与犹太历史更是大相径庭。

因此，在汤因比看来，“希腊模式普遍地符合各大文明早期的历史，中国模式则普遍地符合各大文明后期的历史，将两大文明加以综合改造，就可以构成一个新的模式，希腊——中国复合模式”。这个模式兼取两者之长，比单一的模式更能概括各大文明发展的形态。

此外，汤因比又提出了“犹太模式”。他写道，历史上有些民族尽管国亡家破，但他们在浪迹天涯、寄人篱下的逆境中仍能保持其民族的认同，表现出惊人的创造力，其中以犹太民族历史最为典型。汤因比认为，犹太模式颇能说明拜火教徒、一性教徒、法国新教徒及教友会等散居社群的历史形态。宗教是散居社群的精神凝聚力，经济力量是其物质基础。散居社群大都经历过一个由垂直社会结构演变为横向社会结构的过程。原先的领土、政府和文化的居地已不复存在，以领土和政府为基石的民族团结转变为以文化和宗教为纽带的团结，一个民族不再靠诸如国家之类的政治设施而凭共存的记忆、信仰和习俗结合在一起。

作者强调，希腊模式、中国模式、犹太模式不仅能概括各大文明的历史形态，也可以对人类的未来有所启迪。

为了对众多的文明进行比较研究，汤因比还提出了一个独特的观点作为立论的基础。他指出，人类历史已有 100 万年之久，而人类文明史不过 6000 年左右，相对而言不过是弹指之顷。因此，可以从哲学的意义将人类文明史视为同时代的历史，从宏观的角度进行整体研究。

(二)文明的起源、生长、衰落和解体

汤因比从“挑战——应战”的理论出发，对文明的兴衰存亡作出了独到的解释。他在书中列举大量历史事实，批判种族优越论和环境决定论，认为人类之所以能创造文明并非靠人种的优越，也不是由于安逸舒适的生活环境，而是人类面临严酷的挑战进行了不屈不挠的应战。虽然汤因比并不认为这是文明起源的唯一因素，但他强调人对自然环境的应战是超乎其他因素的一个因素。汤因比对中国《易经》中的阴阳之说极为欣赏，认为历史就是在—静—动、—阴—阳交替的过程中前进的。面对挑战，人们起而应战，社会也就由阴变阳，文明即产生于这种从静态到动态的过渡之中。

作者写道，在早期文明产生过程中，外部自然环境的挑战尚起很大的作用，但第二代文明产生的契机则往往来自内部人为的挑战。原先富有创造性的领袖人物此时正蜕变成靠武力维持统治的孤家寡人。少数统治者死气沉沉不思进取，社会也就从动的阶段陷入静止状态。少数统治者的武力压迫导致无产者的精神觉醒，无产者的脱离运动成为一种有力的应战，社会又由静过渡到动，从而诞生新一代文明。

文明的起源在于成功的应战，文明的生长也不例外。一种文明的诞生表

明它已经对最初的挑战作出了有力的应战，但这并不等于说该文明从此就可以一劳永逸自然而然地成长。文明的生长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有使挑战——应战这种单一运动成为循环往复的过程，文明才能顺利成长，反之，文明则可能遭到夭折或僵化的命运。

汤因比指出，文明生长的标志是该文明内在的精神自决，而非外在的物质膨胀。文明生长的进程看似对外部环境的征服，事实上则取决于内在的精神力量。对外部物质挑战所作的成功的应战尚不足为文明成长的标准；相反，军事扩张和科学技术的完善往往可能是文明衰退的征兆。他举大量历史事例说明某些文明社会在地理扩张的同时出现了实质的退化。有时技术力量在发展，而文明却静止不动，甚至在衰退；有时技术力量增长不明显，而文明却在前进。可见，衡量文明成长的尺度是挑战——应战的行动从物质水平过渡到精神水平的程度。文明只有在其内部向自身提出种种挑战，并起而应战，才能长盛不衰。

汤因比一再强调的“内在的精神自决”，实质上就是指少数精英对社会发展所起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他发现，一般而言，一个社会的成长可以用社会领袖逐渐增长的自决能力来衡量。社会上大多数人往往是无足轻重的苟且偷生者，富有创造性的少数人才是文明发展的动力。这些社会精英通过“退隐”，得到精神上的启示；然后“复出”，以天下为己任。他们迫使大多数人尾随其后亦步亦趋，从而推动社会前进。但少数精英如不能带动大众一起应战，其创造性便不足以促进文明的生长，他们本身也会为社会所不容。

文明的生长取决于少数人物自决能力和多数人的模仿追随，那末文明的衰落也就意味着少数人自决能力的丧失和多数人的分离。因此，文明衰落的原因是内在的、精神的，而非外部的、物质的。少数天才人物的自决能力的丧失是文明衰落的症结所在。大众对少数天才的机械模仿反过来影响天才人物的行为，使之受到机械性的感染，导致创造力的窒息。而且，对于第一次挑战胜利地进行应战的集团往往很难在第二次挑战面前再度取胜，因为少数创造者容易沉溺于以往的成就，希图用曾经有效的旧方法来应付新的挑战。因循守旧，不事创新，无疑标志自决能力的丧失。此时社会就会每况愈下，丰富多彩的创造活动就被偶像崇拜、制度崇拜所取代。在这种情况下，即使该文明依旧享有物质的繁荣，也不过是黄金时代的回光返照而已。

自决能力的丧失导致文明的衰落，而反复的挑战和一再应战的失败则是文明解体的征兆。文明解体的历程有共同的模式可循，其最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分裂为三大块：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文明解体的过程有一种不断交替地出现动乱和集合的节奏。例如，统一国家的建立便是在混乱时期的动乱以后出现的集合，而统一国家的消散乃是最后一次动乱。在一般情况下，在混乱时期是一次集合之后出现一次动乱，而在统一国家时期是一次动乱之后出现一次集合，因此正常的节奏好像是动乱——集合——动乱——集合——动乱——集合——动乱：三拍半。生于社会分裂时代的人们，精神上也产生分裂现象。人们或避世以求独善其身，或随波逐流与世沉浮，或迷恋于逝去的往事，或寄希望于乌托邦式的未来，对现实的挑战则一筹莫展。可见，每一种文明的死亡都是自杀，而非他杀。然而在文明解体之时，也有一些伟大的心灵试图将尘世的生命转型为某一更高的层次，从而为新的精神创造播下了种子。

(三)文明在空间、时间上的接触

汤因比认为，文明在它的起源、生长和衰落阶段，都可以独立地进行研究；但是到了解体这一最后阶段，文明却不是可以自行说明问题的研究对象了。可见，对于不同文明的相遇接触作比较深入的探讨是合乎逻辑的。

汤因比首先研究了近代西方文明和当代其他文明之间的关系。西方社会史的近代时期可以从两个事件开始，一件事发生在 15 世纪刚结束以前，一件事发生在 16 世纪刚开始以后；第一件事是掌握远洋航海技术，第二件事是中世纪西方基督教共同体的分裂。宗教改革是长期进化中的一个阶段，这个过程从 13 世纪开始，到 17 世纪时还没有全部完成，但是宗教改革在时间上已超越了目睹哥伦布和达·伽马远洋航海的那一代人。汤因比进一步追溯中世纪时期西方文明同它的两个敌对社会所发生的接触，然后又上溯到古代希腊社会同各方面发生的接触，最后再简要地谈了这一类接触的更早期的情况。

通过比较，汤因比试图发现两个同时代的文明在文化上紧密接触时将会产生什么后果。在他看来，通常其中一个文明已处于解体的过程，而且大多数高级宗教都产生于几个文明交相混融的地方。检视了文明接触的后果，人们可以发现，“侵略性”的文明倾向在文化上、宗教上、或种族上对处于劣势的文明加以贬抑；而遭受攻击的文明一般采取两种方式应战，一是试图促使自己与外来文化对抗，一是采取过分的守势。汤因比指出，这两种应战方式都不足取。文明的互相接触会引起可怕的仇恨，但同时也造成了共存这一重大的问题。他认为，唯一的积极的解决方法是双方都能自觉地互相调整，这也就是高级宗教对这个问题提供的答案。在当今世界，不同的文化尤其不应彼此再做敌对的竞争，而应尝试共享它们生存的经验，正如它们共享了普遍的人性一样。

汤因比认为，同代文明间的接触并不是一个文明与另一个文明发生关系的唯一方式。一个现存的文明，也可以与一个已死的文明发生接触，所谓文艺复兴便是一例。但汤因比指出，幽灵的价值在本质上较活人为低。在那些表面上将旧的体制、理念、艺术加以恢复的事例中，如果一个社会只以接受旧文化遗产为满足，而没有能力推陈出新，那末，该文明本身的天才的火花将会趋于熄灭。

(四)西方文明的前景

汤因比认为，西方社会是唯一存在的尚未明显解体的文明。在许多方面，西方文化已遍及于全世界，因此，它的前景就是西方化了的世界的前景。没有理由因为所有其他文明都已经毁灭或正在走向毁灭，就可以假设西方文明也一定要这样。维多利亚式的乐观主义和斯宾格勒式的悲观主义都是没有说服力的。

战争和军国主义是一个社会衰落的最根本的原因。迄今为止，西方社会在同这种疾病作斗争中并未成功，但它却在其他方面取得了空前的成就：如废除奴隶制度，民主和教育的发展等。西方社会现在也表现出不祥的预兆，分裂为少数统治者、内部无产者和外部无产者，不过在对付西方化世界里复杂的内部无产者问题上却取得了某些显著的战绩。

在 20 世纪的人类社会里，人类有着战争和阶级冲突的问题，有着马尔萨

斯式的人口问题，有着就业和失业问题，也有科学技术所带来的种种问题。20 世纪已经过了中期，我们虽然还不能确知西方文明的发展究竟如何，但有一些迹象显示：人类永远幸福地生活下去的希望可能存在，然而目前尚渺不可期。

(张和声 程郁 撰)

【英】赫·乔·韦尔斯：
《世界史纲》——勾勒生物和人类的历史轨迹

亚洲普通人的头脑在质量上一点儿也不比一般欧洲人头脑差；历史表示出亚洲人和欧洲人一样地勇敢、精力旺盛、慷慨、自我牺牲和能做出强有力的集体行动。

——赫·乔·韦尔斯

《世界史纲》是对过去百年内地质学者、古生物学者、胚胎学者和任何一类博物学者、心理学者、民族学者、考古学者，语言学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大量活动所揭示的现实的初始图景加以通俗的叙述。

——列宁

一、韦尔斯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世界史纲》作者赫·乔·韦尔斯(Herbert George Wells, 1866—1946年)英国著名的作家、科学家、历史学家。1866年9月21日生于布腊姆利一个不富裕的小店主家庭。父亲是季节性的职业棒球队员。母亲是女仆，后为管家。韦尔斯未读完中学，便去药店和布店当学徒，自幼就熟悉中下层阶级的穷困与愿望。他刻苦自学，18岁时考入南肯辛顿的皇家理学院，攻读生物学，但他的真正志趣是文学创作。他在校期间广泛地阅读了古典名著。由于生活窘迫，他未毕业就提前离开了学校，在社会上一面任教，一面攻读伦敦大学学士学位，1888年，以优异成绩获伦敦大学理学学士学位。后任伦敦大学科学研究员，在著名科学家赫胥黎的实验室工作。此时他已认识到科学的发展能造福于社会。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也常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他急切地关心社会的改革问题，企图通过写作宣传他的改革社会的主张。1893年，他转入新闻工作，专职从事写作。先后发表了《时间机器》(1895年)、《莫洛博士岛》(1896年)、《隐身人》(1897年)、《星际战争》(1898年)等科学幻想小说，提出建立世界性的合理的社会组织的改良理想。1901年，他的重要论文集《科学进步对人类生活和思想的影响》(又名《预见》)出版，从而确立了他在英国文坛的地位。1903年，韦尔斯参加了英国社会主义改良团体费边社，至1908年他一直是该社的领导成员之一。他积极主张把这个由著名学者、作家、政治思想家、议员等组成的鼓吹改良主义的学术理论研究团体改变为一个群众性的政治宣传与行动组织，因而他与该社以肖伯纳为首的“旧帮”发生了尖锐的对立。1908年他终于退出费边社。1911年韦尔斯在他出版的小说《新马基雅弗利》里，对费边社内部的斗争和该社领导人作了极其生动的描绘。

1900年以后，他的小说创作转而反映城市中下层人民生活，以冷嘲热讽的笔调，深刻而有力地揭露由于不合理的资本主义社会制度所造成的城市下层一些小市民的心理变态和不轨行动。如《爱情和鲁维轩先生》(1900年)、

《基普斯》(1905年)、《波里先生的历史》(1910年)、《托诺——邦盖》(1909年)等。而《托诺——邦盖》是其中最杰出的一部,评论家认为这部小说是19世纪末英国社会变革史。在创作的后期,他愈益强调小说的社会宣传作用。

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在欧洲硝烟弥漫的岁月里,他积极投身于反战的宣传活动之中。他创作的小说《获得自由的世界》(1914年),描写世界大战将给人类带来巨大灾难。他创作的优秀反战小说《勃列特林先生看穿了它》(1916年),曾受到高尔基的赞扬。但小说散发着抹杀阶级界限、否定阶级斗争的和平主义思想。战争使他进一步认识到世界的统一性和联合的必要性。1915年6~7月,他匿名在《泰晤士报》上一连发表6篇《读者投书》,一再提出建立“世界国家”、“自由国家联盟”、“世界政府”等世界主义的主张。1917年,韦尔斯还进行了筹建“自由国家联盟”的具体活动。这时他“对于把人类历史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简直着了迷”,“他经常对整个历史和缔造历史的普遍动力神往不止”,决定突破按国家、按朝代的编纂史书的传统模式,编写了一部新型的统一的世界史。1920年,他的《世界史纲》问世。同年,韦尔斯访问了十月革命后的苏联,通过高尔基的介绍会见了列宁。随后写了苏联访问记:《黑暗中的俄罗斯》(1921年)。1934年,他再次访问苏联,拜会了斯大林,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探讨新的社会模式等问题。1946年8月13日,韦尔斯在伦敦逝世。

二、《世界史纲》评介

《世界史纲》因其文笔优美,叙述生动,娓娓动听地向读者诉说着一个个动人的历史故事,描绘着一幅幅活生生的历史画面,所以问世后,立即成为风行于欧美的畅销书。1920年这部书就被译成多种文字,行销达200余万册。从1920到1930年仅10年时间就再版了6次,行销势头不减。这种巨大的成功,使韦尔斯自己都感到惊奇。他在1932年出版的《人类的劳动、财富和幸福》一书中说:“没有人比作者本人对《世界史纲》的巨大成功更感到意外了,可以说,一夜之间,他从教育改革家摇身一变,成为畅销书的作者。”

《世界史纲》之所以大受欢迎,是因为它令读者耳目一新。首先,它打破了传统史学的编纂模式,突破了按着时间的顺序,一个国家一个国家的,一个朝代一个朝代的叙述历史事件和人物的俗套。而是把人类历史做为一个整体综合地进行考察研究。作者像是云游在宇宙空间,俯看人类生存的小小星球,从地球存在的时间与空间,生物的起源与进化过程,人类的形成、人类早期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种族的分化与混合,语言文字,最早文明古国的产生,人类活动范围的扩展,人类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巨大进步,人们相互间的交往、斗争与战争,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把人类推向痛苦的深渊。从宏观的角度透视人类文明史的兴衰变化,把世界史描绘成一幅无止境的形成,无止境变化的图景。作者在评述历史事件时总是通观全局,采用纵横对比的方法加以衡量和研究。如罗马共和国同近代西方民主共和国的比较;14世纪欧洲的农民战争与19世纪的“劳工运动”的比较;把公元前6世纪的乔答摩、孔子、老子加以比较;把耶稣教义与佛教、中国道教进行比较等等。从宏观的比较中,探讨历史问题,说明今天并回答时代所提出的问题。作者把历史研究置于极广阔的范围来进行,他不仅写政治、外交、军事史,而且记述了

生产活动、经济生活、文化、科学、宗教、日常生活、种族、习俗、语言、瘟疫等，把整个社会和人类命运纳入自己的研究范围，反映出丰富多采的人类历史的画面。第二，《世界史纲》顺应了“自然科学奔向社会科学的强大潮流”，彻底地打开了传统史学研究封闭或半封闭的局面，向自然科学敞开了大门。韦尔斯十分重视历史学与自然科学的相互联系和互相合作，他不是像实证主义史学派那样把自然科学发展的规律与研究方法硬套在人类社会发展史上，而是巧妙地将两者融合为一体。他说：“这本《史纲》不过是对过去百年内地质学者、古生物学者、胚胎学者和任何一类博物学者、心理学者、民族学者、考古学者、语言学者和历史研究者的大量活动所揭示的现实的初始图景加以通俗的叙述。”他把人类历史的研究同对人类生活的自然环境的研究紧密结合起来，探索了人类社会与自然环境的关系。第三，《世界史纲》以分析史学取代了叙述史学的模式。传统史学只是叙述历史上发生的事情，韦尔斯认为这种史学“学究气十足”，从“那里可以得到的只是积累起来的资料，而不是装配和聚集好了的成品。”对普通公民来说它的价值不大。所以《史纲》并不着重于对史实的详尽铺叙，对大部分历史事件和人物都是概述或简述，重在分析。如第二十章希腊城邦时代，作者只勾划出城邦形成的基本线索，而侧重分析了希腊城邦的特色及这种特色形成的原因和后果。又如第二十七章罗马帝国时期，并不叙述罗马帝国发展的全过程，只是列出帝国诸帝的简历，着重分析所谓“罗马全盛”时代的内幕，以及罗马帝国崩溃的原因。历史只有从叙述变为解释，它才成为科学。韦尔斯的《世界史纲》所创立的史学模式对传统的实证主义史学是个很大的冲击，同时也成了 20 世纪史学新潮的主流——年鉴学派的先驱。

《世界史纲》是韦尔斯思想和文笔成熟时期的作品，他的进步的政治思想和改良主义的主张在这部书中表现的最充分。他反对君主专制，崇尚民主共和制。对破坏共和制，实行个人独裁的凯撒，拿破仑等人给予了无情的鞭挞。韦尔斯猛烈地抨击了主张君主专制的马基雅弗利，说他没什么“远大和崇高的意向”，没什么“爱国的美德”，“根本不相信什么正义”、“竭力想使自己成为一个君主权术的‘专家’。”他充分地肯定了罗马共和制，颂扬法国大革命推翻了君主制，赞美美国的民主共和制“全然达到人类结合的最质朴和毫无掩饰的基本原则”。他反对战争，主张和平，对亚历山大、查理曼、拿破仑等的对外扩张，对十字军东征，蒙古西征及第一次世界大战给人类造成的灾难都予以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斥责。他同情下层人民的无权地位和贫困生活，对历史上代表中下层人民利益变革的失败表现出无限的惋惜情绪。他欣赏佛教、基督教的原始教义，称他们所宣传的人人平等没有压迫，没有剥削的主张具有“解放生活”的伟大意义，“是一种道德和社会的革命。”他没有种族和民族的偏见，认为不同种族和民族的头脑没有聪明和愚笨之别。他说：“亚洲普通人的头脑在质量上一点儿也不比一般欧洲人的头脑差；历史表示出亚洲人和欧洲人一样地勇敢、精力旺盛、慷慨、自我牺牲和能做出强有力的集体行动。”常以赞赏的态度叙述亚洲、非洲、美洲的古代文明。韦尔斯不像某些资产阶级反动思想家们，极力反对和诋毁马克思主义，而是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观点持肯定态度。如在谈到 19 世纪社会主义思潮时，就指出马克思“从欧文的社会主义跨出了一大步。”“马克思是一个具有强烈的历史感的人；他是最先看出，自文明开始以来一直存在着的古老社会阶级正处于瓦解和重新聚合的过程的人之一，”他“洞悉财产和劳工的对立”，

“他不单是一个预言的理论家，他也是一个劳工造反即所谓‘无产阶级’造反的宣传者。”韦尔斯勇于揭露资本主义制度的种种弊端，希望通过改革解决社会的矛盾和不合理现象。他希望在世界上建立起一个统一的、和解的、友好的“世界联邦政府”，他撰写《史纲》的目的就是要教育人从历史的总体上认识建立世界国家的必要性和可能性。尽管他还不能认识到在阶级和阶级斗争存在的历史条件下，建立“世界联邦政府”只是一种空想，但它反映了作者对人类美好前景的一种善良愿望。韦尔斯不愧为 20 世纪前期西方进步的史学家。

《世界史纲》不仅构思巧妙，思维敏捷而宏扩，说理性强，令人诚服；而且语言精炼形象，文笔多变而通俗，叙事生动更是有口皆碑。如记载马其顿王菲力浦家庭内部矛盾与斗争的那种紧张气氛(第二十二章，第二节)；记述格拉古兄弟改革失败的悲惨情景(第二十六章，第三节)；描述查理五世为自己举办丧礼的令人啼笑皆非的场面(第三十三章，第十三节)；法国大革命那种雄壮磅礴的气势等都令人读后难忘，确实是一部雅俗共赏的历史佳作。

但《世界史纲》也不尽完美，其最大的缺点是作者基本上还是以唯心史观论述历史。他不是从生产力的发展，人类从事物质生产的条件和阶级斗争的观点来阐述历史发展，而是过分强调思想观念的作用。如他说从公元前 3 世纪初西方文明里崛起了三个伟大的结构性的思想，即一是亚里士多德和希罗多德的“科学观念”；二是世界宗教中的一神论观念，三是世界统一的观念。而后这些关于“科学”、“正义”、“公益”的思想就“逐渐扩展到人类的普遍意识之中。”这种唯心史观使他常常在一些重要的历史问题、事件面前迷惑不解，徘徊不前，不能做出正确的解释。如当谈到阶级是怎样产生的时候，他说：“当人们不再过游牧生活的时候，某种自由与某种平等也从他们生活中消失了。”“随着文明的成长，发生了奴役的过程。”甚至说“普通人相当满足于在主人或国王或神的统治下生活并服从他们的命令。这种生活较为安全，较为容易。”对于封建制是怎样形成的，他解释说：“在西罗马帝国溶解在混乱违法的大海中的时候，就很迅速地经历了一次政治结晶的过程。保护者和从属者这些自然的联合和结盟很快地成长成为一种制度，即封建制度。”他常常把思想、科学文化看成是人类历史兴衰的主要原因。他认为罗马帝国失败的原因全在于缺乏任何自由的思想活动和任何增长发展和应用知识的组织，是看重财富而轻视知识的结果。作者把中国近代落后的原因也归之于中国文字的过于复杂，教育制度和考试制度对人的灵魂的禁锢上。在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原因时，不去分析垄断是帝国主义战争的根源，而强调是帝国主义“观念”发展的结果。马克思主义认为，在阶级社会里历史主要是一部阶级斗争史。韦尔斯却常常抹煞阶级斗争，宣扬阶级调和，大谈人类本是天下一家，来自一个共同的起源，具有共同的命运，积极倡导建立一个统一的“世界国家”、“世界政府”，不管谁来领导，即使是罗马教会建立基督教世界帝国的思想也是“可贵的”。其次，韦尔斯毕竟还不能完全摆脱阶级偏见。《史纲》中还有美化资产阶级民主制，维护帝国主义的殖民制度，鼓吹其他帝国主义国家要效法美国殖民政策等说教，也是应该批判的。

《世界史纲》出版不久，我国的梁启超就嘱其子梁思成等人翻译成中文，梁启超本人做了校订。梁启超还亲加按语，商请商务印书馆出版。由于原著在短短时间内一再增订再版，商务印书馆乃转请向达等人根据 1923、1926

年版本重加译订，1930年分上、下册出版，1982年人民出版社的这个版本，是由吴文藻、谢冰心、费孝通等人翻译的第三个译本。

《世界史纲》内容分成八大部分(八编)。正文前面有一篇导言，主要叙述编著此书的宗旨、方法和历次修订的情况。书中附有105幅地图和100幅插图。

作为一位在自然科学方面有很深造诣的作家，韦尔斯在撰写世界历史时，并没有从人类的诞生写起，而是从地球这个人类生活的大舞台开始叙述。因此，他给《世界史纲》一书加上了《生活和人类的简明史》这样一个副标题。在第一编《人类以前的世界》中，他讲述了人类时空观的扩大，地球在广漠宇宙中的地位和本身形成的经过，生物怎样从无到有，又怎样逐步从简单低级进化到复杂高级，地球的地表面貌又如何如何在亿万年中缓慢地变化(大陆漂移等)。可以说，这一编是一部地球形成与发展简史和生物进化简史，犹如人类登上历史舞台前的序幕。

在第二编《人类的形成》中，作者首先讲述了人类的起源和进化的过程，阐发了人猿共祖和劳动创造人的唯物主义观点。接着，叙述了在进化阶梯上从较低级的各种猿人和亚人到高级的真人的生理特点、生活环境、日常生活和文明程度。韦尔斯对于工具的制造和生产技术的进步十分重视，重点加以阐述。作者又叙述了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亚洲、欧洲、非洲和美洲)人类的社会生活、生产力与文明发展的状况。在讲述原始人类物质文明的同时，他对于原始精神文明——宗教、哲学、时空观、天文历法、神话传说等也作了较为详细的阐述。作者还介绍了人类的主要种族和特征，人类语言的产生和发展的历史以及几大语系——雅利安语、闪米特语、含未特语、乌拉尔——阿尔泰语、中国语、印地安语、尼格罗语等的特点。

第三编《最初的文明》分成五个部分。第一部分讲述世界上一些最古老的民族如何进入早期文明社会，又怎样建立和发展自己的国家。所涉及的文明古国有苏美尔人、闪米特人与阿卡德帝国、亚摩利人与巴比伦帝国、亚述人与亚述帝国、迦勒底人与迦勒底帝国、埃及人与古埃及王朝、印度的早期文明、秦汉以前的古中国文明、美洲的玛雅文明等。第二部分主要写航海事业与商业贸易的出现和发展，以及在这两方面作出过杰出贡献的古代民族——克里特人、腓尼基人、迦太基人、希伯莱人及早期爱琴海诸民族。第三部分专门叙述人类文明进步过程中不可或缺的文字。其中包括文字的创造与演化、各种文字(中国的象形文字、苏美尔人的楔形文字、埃及的僧侣草书象形文字、字母文字等)的特点和使用情况。第四部分主要讲述宗教与僧侣问题，包括庙宇及僧侣出现的根源和社会功能；僧侣与天文学及其他学问的关系；僧侣(教权)与世俗政权间的矛盾与对抗(以埃及、巴比伦、亚述、波斯等国为例，并连带讲了一下秦始皇时代的中国)。第五部分主要描写人类社会如何分化为阶级，以及古埃及、两河流域社会中各阶级和阶层的人们生活与工作的情况，还叙述了印度的种姓社会，中国的官吏体系；并十分概括地讲述了从西方到东方整个人类的文化(绘画、雕塑、建筑艺术、文学、戏剧和音乐)发展的大致情况和所达到的水平。

从第四编《犹太、希腊和印度》开始，作者叙述的重点放到西方世界中雅利安人和闪米特人的相互影响与相互斗争上。在此编的第一部分，作者叙述了以色列人早期的历史和扫罗、大卫、所罗门时期希伯莱三国的历史；十分详细地介绍了希伯莱文化中最重要文献——《旧约全书》的产生及其内

容；评价了以色列人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叙述了犹太民族的形成经过以及希伯莱先知与《旧约全书》在犹太人生活中的重要地位与作用。第二部分，作者把笔锋转向了西方雅利安人的早期历史，叙述了他们的分布、家族和社会组织；然后便重点描写古希腊诸民族及波斯的文明与历史：古希腊各城邦国家及其政体的演变；波斯帝国的兴起与强盛；大流士远征欧洲与希波战争；古希腊的鼎盛时期——伯利克里时代的雅典，光辉灿烂的古希腊哲学（包括苏格拉底等著名哲人）和文学（包括荷马史诗与索福克勒斯等人的戏剧）。但对举世闻名的古希腊造型艺术，作者却评价不高，只是一笔带过，未作详细介绍。第三部分，作者叙述了马其顿王国的兴衰史。他认为菲力浦的历史功绩和人品都大大超过历来被后人称颂的亚历山大，是有史以来世上最伟大的君王之一。他对亚历山大的评价不高，认为亚历山大并没有像人们想象的那么伟大，一生中做了不少蠢事和坏事。对亚历山大继位后的那段远征史，虽然也用了一些篇幅，却在叙述中不时夹杂着批评和贬责。亚历山大帝国崩溃后，作者的叙述重点放到了托勒密统治下的埃及。对亚历山大城的文化建设——大学、图书馆、博物馆、医学院、宗教等用浓墨重彩进行了描述，并对其在世界文化史上的贡献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在此编的最后一章，作者叙述了印度的历史发展及孔雀王朝的建立；特别详细地叙述了佛教的创建与兴起，佛教创始人乔达摩·悉达多的生平事迹，佛教的教义及其传播分布情况；并且也附带讲到了中国古代的两位大思想家孔子与老子的生平学说。

在第五编《罗马帝国的兴亡》中，作者仍按一般世界通史的惯例，继古希腊之后，把历史叙述的重心放到拉丁民族与罗马国家上。这一编从上古时期的拉丁人、意大利人的起源讲起，到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和东罗马帝国的建立结束，历时千余年。其中讲述的重点是：罗马人与罗马国家的形成，罗马国家的社会生活，社会阶级与阶层（贵族与平民等）的状况与斗争，罗马国家政体的演变过程，三次布匿战争，格拉古兄弟的改革与罗马共和国内部的斗争，罗马共和国演变为罗马帝国的经过及罗马共和国失败的原因分析，以及屋大维、戴克里先、君士坦丁等罗马帝国皇帝的表现和政绩，罗马文明全盛时期的概况和文学、史学、地理学、医学、艺术、建筑等方面的成就。

韦尔斯对宗教在人类社会发展中的作用十分重视。第六编《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以东西方两大宗教的产生与传播为主线，描写了从上古末期至中世纪欧亚两大洲一些主要民族的历史。首先，他不惜用大量的笔墨介绍了基督教的起源与诞生，包括耶稣的生平、原始基督教的教义、基督教的传播、基督教会的正式形成及其影响。接着，作者又把笔锋转向了东方一些国家与民族的历史演进，主要叙述了查士丁尼统治下的东罗马帝国、波斯的萨珊王朝及与它同一时代的叙利亚等两河流域国家、波斯的琐罗亚斯德教和摩尼教、中亚细亚和印度的匈奴各部、从汉末至唐朝的中国及其发达的文化（其中有一节专写玄奘去印度取经的事迹）。然后，作者以伊斯兰教的兴起与传播为主线，专门叙述了阿拉伯帝国的兴衰史。其主要内容包括：穆罕默德的生平事迹和伊斯兰教的创立，伊斯兰教的教义，伊斯兰（阿拉伯）政权的兴起、扩传、全盛（倭马亚王朝）及逐步衰亡（阿拔斯王朝），光辉灿烂的阿拉伯文化。韦尔斯对阿拉伯文化的评价很高，他认为：“如果说希腊人是科学方法之父，那末阿拉伯人是它的义父。近代世界是经由阿拉伯人的而不是拉丁人的途径而接受了那个光明和力量的赏赐的。”（第 676 ~ 677 页）最后，作者又把读者带回西方世界，讲述了西欧的封建制度、墨洛温王朝的历史、西方各蛮族的基

督教化、查理大帝其人与查理曼帝国的兴衰和分裂、欧洲其他地区各民族的迁移、纷争和各民族国家的建立、十字军东征、罗马教廷一些著名教皇的简况及其评价，以及哥特式艺术与建筑。

在第七编《陆路上的诸蒙古帝国和海路上的诸新帝国》中，作者以陆路和海路为主要标准，把东西方划为两大不同的文明地区，并以当时最强盛的一支游牧民族——蒙古人的兴起及其对东西方文明的冲击为主线，叙述了12~16世纪的历史。本编可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主要讲东方民族的历史，在简要地介绍了西亚、中亚和中晚唐至五代十国时期的中国后，作者着重叙述了成吉思汗和蒙古帝国的建立、兴起及其扩张、元明时期的中国、马可·波罗的事迹及其游记、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的兴起以及钦察汗国、莫斯科公国、印度的莫卧儿帝国。第二部分主要讲这一时期西方各民族的历史。作者讲述的重点没有放在政治军事和王朝兴衰上，而是着重讲述了基督教对西方国家文化发展的影响(特别是对普及教育的贡献)、基督教内部早期的各种改革思潮与改革运动(威克利夫、胡斯等)、英、法、德诸国早期的市民起义与劳工运动(瓦特·泰勒、扎克雷、再洗礼者约翰等)、新教改革运动的兴起与耶稣会的建立、科学与哲学在封建专制与基督教统治下的再次觉醒及哥白尼、牛顿、伽利略等人在科学发展上所作出的巨大贡献、新型城镇在欧洲的兴起、意义深远的文艺复兴运动及其代表人物(但丁、莎士比亚、达·芬奇、米开朗基罗等等)、新航路的开辟和美洲的发现与征服、麦哲伦的环球航行、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前后的德意志诸国、马丁·路德宗教改革与查理五世的生平轶事等等，此外还专门介绍了马基雅维里、托马斯·莫尔的生平、著作及思想。

第八编《列强的时代》的叙述范围，即通常所谓的世界近代史。韦尔斯把这一历史时期分成几个时段。第一时段包括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史和一些欧洲封建君主国。他将尼德兰革命和荷兰共和国的建立作为整个近代史的开端；然后，叙述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和英吉利共和国、德意志的分裂与混乱、路易十四统治下的法国、彼得大帝的改革及俄罗斯帝国向东方的扩张、波兰君主共和国、欧洲一些强国向海外的殖民与扩张、英国占领印度等等。作者还描述了这一时段文学艺术的发展及其成就，特别介绍了笛卡儿、卢梭、洛克、巴赫、莫扎特、贝多芬、伦勃朗等大师巨匠。第二时段的重点是美国独立战争与法国大革命。韦尔斯高度评价富兰克林、杰斐逊和华盛顿等人，评说了美国宪法的特点和精神；然后向读者展现了波澜壮阔的法国大革命的全过程，着重叙述了拿破仑的生平事业和拿破仑帝国的兴亡。在第三时段，作者详细地介绍了机械革命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从蒸气机的发明到内燃机的发明和飞机的制造)并认为机械革命与工业革命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前者仅指人类在科技经验方面的进步，而后者则与社会和财政的发展相联系。作者还述及了工业革命所造成的社会后果——两大阶级(雇主与雇工)的出现及相互的矛盾，并介绍了各种学说和人物，其中包括马克思及其阶级斗争学说、罗伯特·欧文的空想社会主义学说及其实践。然后，作者又专门评述了达尔文主义的产生、主要内容及其对宗教和政治思想的影响，以及19世纪的民族主义(即国家主义)观念的形成。

在该书的最后一章中，作者叙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历史，包括德、英、法、意、美、俄等国如何走上帝国主义道路并成为战争的策源地，战争的近因，爆发经过、整个进程及最后结局。对于这次战争，韦尔斯的态度是鲜明

的，因此他把这一章的标题定为《近代帝国主义的浩劫》，并以低沉的笔调结束了全书。

(魏蕴华等撰)

政治学·军事学

【英】保罗·肯尼迪：
《大国的兴衰》——探索国家兴衰轨道的力作

当前国际体系中的大国必须应付以前 500 年中所有大国都遇到过的挑战：一是经济发展的不平衡，这将使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富有、更强大；二是紧张的、有时甚至是危险的国际形势，这将迫使它们在追求近期军事安全和长远经济发展之间做出抉择。

——保罗·肯尼迪

向历史学习绝不是一个单行线的过程。根据过去来了解现在，就意味着也要根据现在了解过去。历史的任务就在于通过两者的相互关系，促进对于过去以及对于现在的更深入的理解。

——卡尔

一、保罗·肯尼迪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保罗·肯尼迪 1945 年出生于英国，1966 年毕业于英国纽卡斯特大学，后又赴牛津大学攻读博士学位。1970 年起执教于英国东安哥尼亚大学，先后任讲师和教授。1973 年，28 岁的肯尼迪以《萨摩亚的纠纷：对 1878～1900 年英、德、美关系之研究》一鸣惊人，被当代美国著名史学家小施莱辛格誉为这一专题的“权威之作”。此后，他又连续出版了《英国海上霸权的兴衰》（1976 年）、《英德对抗之缘起，1860～1914》（1980 年）、《外交背后的现实：1865～1980 年英国外交政策的影响》（1981 年）和《战略与外交》（1983 年）。其中《英德对抗之缘起》一书，被西方学术界评论为：“一方面透彻地分析了国际关系背景的变化，另一方面有力地叙述了个人和杰出人物在决策过程中的作用。”因其在外交史领域的杰出贡献，1983 年，肯尼迪被美国耶鲁大学聘为教授，并入选英国皇家历史学会，作过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和德国洪堡基金会的访问学者。

在西方史学界，自 1809 年德国戈尔丁学派史学家希伦出版《欧洲国家制度及其殖民地史》、史学界泰斗兰克 1833 年发表《论列强》一文以来，试图制订控制国际暴力和制止个别大国称霸的措施，已成为外交史学的重大主题。本世纪有众多的史学家致力于这一主题的探索，如英国史学家韦伯斯特的《帕麦斯顿、梅特涅和欧洲的秩序：1830～1841 年》、坦伯利的《从庇特到索尔兹伯里的英国对外政策的基础：1792～1902》、A·J·P·泰勒的《争夺欧洲霸权的斗争：1848～1918》，法国史学家勒努万和迪罗塞尔合著的《国际关系史》、美国史学家兰格的《欧洲的同盟与协调》、德国史学家费舍尔的《争雄世界：德意志帝国 1914～1918 年战争目标政策》等。但是这些著作往往喜欢把那些在历史长河中时时泛起的巨涛波澜当作独立的事件来做文章，而未能从根本上阐明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体系之间的关系，从而揭示波澜涌起和衰落的规律。

1987年，在美国耶鲁大学研究和讲授当代战略和国际关系的肯尼迪出版了《大国的兴衰：1500~2000年的经济变化和军事冲突》。此书独树一帜，打破了陈陈相因的传统，以全球性的宽广视野、引人思索的新颖观点、旁征博引的历史资料和逻辑严密的有力论证，广泛论述了500年来国际政治、经济、军事、外交和历史的沧桑巨变与兴衰存亡，引起了美国学术界、政界与读书界的震动，也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

《大国的兴衰》是一本论述重大主题的历史著作，尽管有的西方学者嫌此书的标题落入俗套，但它毕竟对500年来各国的军事和经济地位作了比较，涉及了战争与力量对比发展周期等诸多理论问题，在以全球性眼光从总体上分析诸大国的兴衰交替方面不乏真知灼见，同时也为那些渴求了解各大国经济和军事力量对比不断变化之背景知识的当代读者提供了大量翔实的材料和评论。

从形成上看，本书的重点仍局限于传统史学的领域——经济史和军事史，但其内涵却有了质的变化。正如作者所言，《大国的兴衰》并非一部军事史，也不是一部经济史。它通过追溯1500年后世界经济力量的变化，描绘了国际体系中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战略的相互影响。作者在描述国际体系的动态性结构变化中，突出了经济因素的作用，这当然与他多年研究国际关系有关。他知道国家除了把维护本国安全作为外交政策的首要目标之外，在国际交往中保护和扩大本国的经济利益也是外交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更何况在当代国际关系中一个不可逆转的趋势即是世界经济日益政治化和世界政治日益经济化，这是一个相互依存相互渗透的关系。

肯尼迪不但把军事冲突同经济变化联系起来加以考察，而且在论述国际权力体系与全球经济秩序的相互关系中，具有法国年鉴学派那种“总体史”的眼光，对1500年以来的这一历史时段进行经济、政治、军事、思想、社会、地理、外交等方面的综合研究，勾勒出这一历史时段的总貌。值得注意的是，作者还分析了文化和权力的关系。他认为，追求权力是人类的共性，无论诸大国在争霸过程中实力发生何等变化，但人们追求权力的倾向似乎是恒久不变的。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作者指出了一种跨越国界的趋势，而这种趋势决定了在国际社会中生活的各国人民的文化。这是对全球性文化趋势进行探讨的一种尝试。

大凡在当代能打动读者、启发读者掩卷长思的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著作，都具有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大国的兴衰》即是史论并重，在说古论今之中，充溢着一种强烈的现实感，并对解决战争与和平这一关系人类生存前景的重大问题怀有深沉的忧患意识和责任感。这也许是本书对我们最大的启示和教益。

二、《大国的兴衰》评介

《大国的兴衰》除前言和后记外，正文分为三编八章。该书以经济、军事为中心，既概括又相当详尽地评述了自1500年以来500年中各大国政治、经济和技术对它们地位的影响，以及平时时期与战争时期战略和经济的相互作用。按作者本人所言，该书的主旨是：“论述近现代（即启蒙运动以来）的国家或国际力量，追述和阐明自西欧建立‘新君主国’和全球性跨洋国家系

统以来，五个世纪中大国的相互关系和兴亡盛衰，”重点在于“描绘国际体系中一流强国在励精图治、富国强兵过程中经济和战略的相互影响”。

在前言中，肯尼迪首先提出了本书的一个主要论点，即一流国家在世界事务中的相对地位总是不断变化的，原因在于各国国力的增长速度不同，技术突破和组织形式的变革可使一国比另一国得到更大的优势。自16世纪以来，西班牙、荷兰、法国、英国和美国等一流强国的兴衰史表明，在国家的生产力和取得收入的能力与军事力量之间，从长远看有着一种非常重要的相互依存关系。全书围绕着这一论点层层展开。

第一编《前工业社会》共三章，主要分析前工业世界的战略和经济。

第一章的主题是考察1500年前后的世界形势。与西方许多历史学家一样，肯尼迪将近代世界的上限定在1500年，这是因为地理大发现、文艺复兴、宗教改革、殖民主义、民族主义和工业革命塑造了近代世界。他认为，在1500年前后，世界上存在着明朝中国、奥斯曼帝国、莫卧儿帝国、俄罗斯帝国、日本德川幕府及中西欧诸国等六大文明中心，它们都处在大致相似的发展阶段。通过对这六大文明中心的历史考察和分析，肯尼迪指出：“有一种主要由经济和技术进步所引起和驱动的机制，虽然这种发展总是同其他可变因素，例如社会结构、地理和偶然事件发生交互作用；要理解世界政治的进程就必须把注意力集中到物质和长期起作用的因素，而不是人物的更换或外交和政治的短期变化；实力是一种相对的事物，只有通过各个国家和社会之间的经常比较才能加以描述和衡量。”在16世纪初，还没有明显的迹象表明欧洲将会超过其他诸力量中心。所不同的是，东方诸帝国受到集权制度带来的影响，尤其是商业活动和武器发展受到集权制度的限制。

作者指出，在近代以前的所有文明中，没有一个国家的文明比中国文明更发达、更先进。15世纪明朝有过郑和七次远洋航行的壮举。在世界迈入近代之时，中国曾有过向海外发展的机会，但由于信奉儒家学说的官吏们的保守性，以及他们重农抑商、压制私人商业资本的政策，再加上来自北疆外族入侵的威胁，使他们放弃了向海外发展的良机，闭关自守。结果明朝时期的中国即使与积贫积弱的宋王朝相比，活力与进取性都大为逊色。奥斯曼帝国的制度同明朝中国一样，使之最后失去支配世界的机会。反之，欧洲则没有这种东方式的至高无上的权力约束，虽然政治上分裂，但各王国和城邦国家之间的争斗刺激了军事技术的提高，反过来又促进了商业和科学技术的发展。“大部分欧洲政权逐渐地、不平衡地与市场经济形成了一种共生的关系，为市场经济提供了国内秩序和非独断专行的法律制度，并以税收形式得到日益增长的商业利润的一部分。……欧洲在军事技术这个特别领域受到繁荣武器贸易的刺激，取得了对其他文明和实力中心的决定性领先地位。”“欧洲的优势是经济自由放任、政治和军事的多元化以及智力活动自由的一种结合，这些因素在经常的相互作用中产生了‘欧洲的奇迹’。”

第二章着重分析西班牙、奥地利的哈布斯堡家族与欧洲其他国家间的争霸历史。作者认为：“欧洲能在经济、军事方面雄居世界之首，亦得益于16世纪欧洲内部的权力斗争。”他以1500年为界，此前100年的战争主要是地方性的，而此后150年的战争则主要是为争夺欧洲霸权而进行的。导致争霸战争的主因有二：其一是宗教改革为王朝斗争增加了教派纷争和分立的色彩；其二是哈布斯堡家族的王朝联合体谋求控制欧洲，而其他欧洲诸国则力图阻止其得逞。哈布斯堡家族的君主们尽管积聚了大量的经济资源，但由于

发生了近代欧洲早期的“军事革命”，战争的规模和费用剧烈膨胀，造成了经济力量与军事需要间的尖锐矛盾，结果哈布斯堡家族的西班牙逐渐精疲力竭。而欧洲其他列强虽然也在战争中受到损失，但在维持物质基础与军事实力的平衡上比哈布斯堡家庭的西班牙强一些，以致他们最终获得了胜利。

第三章论述 1660~1815 年间列强的纷争，着重分析财政、地理等因素与战争的关系。这一时期的特征是欧洲列国之间的多极体制的形成。在这种短暂多变且又比较松散的联盟体系中，各国不再为跨国利益或宗教信仰而战，他们对战争与和平的决断日益受“国家利益”所制约。此时，西班牙、荷兰、瑞典和奥斯曼帝国相继沦为二等强国，法国与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继续保持一流强国的地位。在大陆两侧，英国和俄国分别成为海洋帝国和大陆帝国；在中欧，普鲁士励精图治，悄然崛起，跻身于一流大国的行列。“欧洲列强体系开始变成五大国——法、奥、普、英、俄——以及一些诸如萨伏依一类的小国和像西班牙那样正在衰落的国家体系。”

作者将这一时期大国的兴盛衰亡主要归因于陆军和海军技术的更新。18 世纪初的君主们拥有庞大的陆上常备军和海军舰队，促使政府发展经济、增强筹措和管理有关资金的财政机构，因此那些拥有较为先进的银行和信贷体系的国家比起那些财政系统落后的国家来，无疑享有更大的优势。肯尼迪详尽地分析了在 17 世纪享有“海上马车夫”美称的荷兰何以在 18 世纪落伍的秘密。他认为，荷兰的银行家们不愿把资金投入 18 世纪末大规模的工业风险事业，虽说政府多方筹借资金，但越来越脱离生产性经济而变成一种高利贷式的经济，政府债台高筑，仅靠有限的消费税收入来偿付债务，陷入通货膨胀的困境，最终导致荷兰商品在国际市场失去竞争力。反之，英、法则比较优越，特别是英国在税收制度、公共信贷制度、偿债基金等方面更为完善，因而能在列强争雄中独占鳌头。

作者认为，地理因素也是列强争雄中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它包括一个国家的气候、原料、农业生产力、可以利用的商路等等，更重要的是每个国家在这些多边战争中所处的战略位置。由于地处欧陆侧翼，英、俄两国在拿破仑战争结束后，地位十分显要，进退自如。它们既可随时参与中西欧各国的斗争，又由于地理位置的关系而不易受这些斗争的影响。它们在确保欧洲大陆均势的情况下，向欧陆以外扩张。尤其在历经工业革命之后，英国更有能力在海外拓展殖民地和挫败拿破仑帝国企图称霸欧洲大陆的野心。地理上的优势和经济利益结合在一起，使英国如添双翼：“一面转向欧洲大陆，调整均势；另一面则指向大海，加强其制海权。”

第二编《工业时代》包括第四、五、六章，主要论述 19 世纪列强的工业化进程和力量对比，以及 1900 年之后随着全球范围力量平衡的变化而出现的中等强国的危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来临和两极世界的形成。

第四章着重分析工业化及列强的力量对比。肯尼迪首先指出，1815 年以后发展起来的国际体制具有三个方面的特点：其一是形成了以西欧为中心的全球经济体系；其二是欧美国家对不发达民族的征服战争加剧；其三是工业革命所引起的一系列技术上的进步影响到军事工业和战争形式。因此，在前工业化时代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战时财政问题就不那么突出了。

作者认为，除了美国南北战争之外，1815~1885 年间欧洲没有出现任何长期的、互耗精力的联盟战争，如克里米亚战争主要是地区性的战争，而普奥战争与普法战争则在几个月内便告结束。因此，欧洲列强之间基本上保持

着一种势力的均衡。国际经济的稳步发展、工业进步和技术变革引起的生产力的大规模增长、大国体制的相对稳定、以及只限于发生局部的和短期战争的形势，有利于列强的内部稳定和对外扩张，如俄、美的大陆领土扩张，英、法、比、德等国的海外殖民扩张，特别是全球性帝国——大英帝国在海军舰队、殖民地、商业贸易诸方面达到其发展之巅峰。在这样的格局与态势下，战争中的失败者往往是那些没有取得新式武器、没有动员和装备庞大的军队、没有使用先进的交通与通讯手段、没有供养武装部队的生产性工业基础的国家，而更主要的失败者是欧洲以外的非工业化农业社会。

第五章叙述 19 世纪末 20 世纪初，随着工业化的演进和传播，国际力量均衡开始发生变化，1815 年维也纳会议以后存在的国际协作体制——相对稳定的欧洲五头政治——逐步趋于解体。

在这一时期，技术发展的步伐与不均匀的增长率使国际体系较 19 世纪中叶更为复杂动荡，而力量对比的变化则更进一步加剧了动荡，甚至直接导致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连续不断的殖民地冲突和频频发生的国际危机，即是世界性力量平衡转移的证明。延续了三个世纪之久的、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制受到了严峻的挑战，老牌殖民帝国在新的竞争中遭到削弱，而法国政治学家和历史学家托克维尔在半个多世纪前所预言的“美国和俄国将在未来成为两个世界强国”正逐渐变为现实。此外，在远东，明治维新后的日本正悄然崛起，作为经历工业革命的唯一非西方国家，它先后击败清朝中国和沙皇俄国，成为远东与太平洋地区的大国。这一切，意味着“瓦斯科·达·伽马时代”——欧洲统治世界的 400 年历史——已宣告结束。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只不过使这一特征更趋明朗，德国战败，奥匈帝国解体，沙俄崩溃，英、法遭到削弱，日本在太平洋区域地位加强，美国成为世界头号强国，以欧洲为中心的国际体系终于被打破了。通过对意大利、日本、德国、奥匈、法国、英国、俄国、美国列强的逐一考察和分析，作者认为，决定战争胜负并非仅靠将军的才智和士兵的勇敢，更重要的因素是生产力上的显著优势；在长期的联盟战争中，这一因素最终会变得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在第六章中，作者指出，自 1900 年以后的 50 年间，国际力量平衡的主要变化可以说是一个“两极世界的来临”。尽管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为世界一流的工业大国，但它难以摆脱其外交传统的束缚。随着威尔逊理想主义的外交政策的受挫，美国在战后又重新退回到相对的外交孤立主义状态之中。俄国在十月革命后所建立的布尔什维克政权，对所有的资本主义国家保持警惕，它的自我封闭成为自我保护的手段。在斯大林领导下，苏联迅速地向一个超级工业大国过渡。这一状况造成 20 年代和以后时期的国际事务似乎是以英国和法国为中心，但这一国际体系显然与经济实力的分布不相吻合。因此，在 20~30 年代便出现了“现存中等强国”（英、法）受到“复兴的中等强国”（德、意、日）的挑战的局面，于是新的战争策源地便告形成。

作者写道，“复兴的中等强国”所遇到的难题是，如果它们不想被美、苏两个大陆强国所超过，就要迅速对外扩张。如德国纳粹政权建立后，其外交政策便体现了过去民族主义者的野心和受到压制的武装部队要求重振雄风的延续性，希特勒的目标就是要尽可能早地改变国际秩序。而对“现存中等强国”而言，它们所面临的困境则是，如果应付德、意、日的挑战，无疑将会同时削弱它们自己，从而更加落后于美、苏两个大陆巨人。英国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便担忧自己的地位将进一步下降，这一预感已被大战的结局

所证实。而德、意、日轴心国虽然在战争初期取得过辉煌的战绩，击溃了法国，削弱了英国，并使美、苏两国严重受挫，然而它们终究无法克服资源不足的弱点，并且难以在工业生产和经济潜力方面与美苏两国进行持久的抗衡，它们的失败是注定的。因此，到 1943 年，人们在数十年前预测的两极世界终于来临，军事平衡再度与全球经济实力的分布相一致。

第三编《当代和未来》包括第七、八章。

第七章论述了 1943~1980 年间两极世界中的稳定与变化。作者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力量的对比已完全不同于战前：法国和意大利这两个昔日的大国已黯然失色；德国、日本称霸欧洲和远东太平洋的企图也烟消云散；大英帝国正面临衰落；美国和苏联这两个超级大国构成了世界的两极。国际格局已从一个体系过渡到另一个体系。随着核时代的到来及长距离投射系统的构建，超级大国的地位更为加强，世界在战略上和政治上已从传统的多极世界变成了两极世界。在这样的格局中，意识形态的作用更为突出。东西方冷战的缘起，即具有意识形态分立的性质。而意识形态的分立不可能同政治利益相分离，美、苏双方都得益于冷战，都用意识形态原则来掩盖自己对内和对外政策的需要。在战后初期的 20 年中，国际政治的首要任务是进行自我调整，以适应美苏对抗的新形势；而次要任务则是反对美、苏对抗。在冷战体制下的世界具有三个特点：一是欧洲两大国家集团进一步分裂；二是冷战从欧洲向世界其他地区逐渐扩散；三是以美、苏为首的两大集团之间的军备竞争愈演愈烈，并分别成立了一系列的军事联盟组织。

然而，战后国际政治又开始出现另一个新动向——全球性的政治分化；与此相联系，第三世界作为一支重要的国际力量迅速成长。至 60~70 年代，美苏虽然在世界事务中仍继续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但国际力量体系的两极化程度比起战后初期的 20 年来大大削弱了。不仅第三世界的出现使事态进一步复杂化，而且由莫斯科和华盛顿分别控制的先前铁板一块的两大集团内部也发生了重大的分化，其中最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中苏之间的分歧与论战。从战略上看，这一分裂是从 1945 年以来发生的最重大的一次事件。此外，从 60 年代初起，西方阵营主要因戴高乐反对美国霸权而引起不和。西德勃兰特政府奉行“新东方政策”，开创了东西方频繁接触的活跃时期，经贸扩大，文化交流、人权公约、共同裁军等形式纷纷出现，使冷战时代欧洲分裂为封闭集团的格局日益受到削弱。不管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极难制止这一进程，而美国本身也因越南战争引起的问题而处于越来越动荡不安的状态。1973 年，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不得不承认：“在经济方面，至少已出现五个主要集团。从政治上看，更多的势力中心已出现。”他所指的五个集团，即是美国、苏联、中国、日本和西欧。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以中美关系的恢复为标志的外交革命，对全球的力量关系格局发生了深远的影响。

尽管在军事上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到 80 年代仍处于他国无法抗衡的领先地位，但战后几十年科学技术和世界经济的发展使全球生产平衡发生着很快的转移。发展中国家在总产品与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不断提高，“日本以及中国经济的显著增长；欧洲共同体尽管仍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集团，但它在世界经济中的比重也有所下降；苏联所占比重的稳定、尔后的缓慢下降；以及美国经济尽管衰落较快但仍拥有较强大的经济力量”，这就是作者对战后数十年世界经济发展所作出的基本分析。他进而指出：生产力平衡上这些长期的变动本身并没有多大的意义，只有同其所具有的强权政治的含义结合

起来才意义深远。他引用列宁的论述，认为正是由于国家之间的经济增长率的不平衡，才必然地导致个别大国的兴起和其他一些大国的衰落。这正是 500 年来大国发展所遵循的历史模式。由此认为，如果以经济指数作为标准，那末可以说，一个新的多极世界业已形成。

第八章着重阐述了存在于当今世界五大力量中心(美、苏、中、日、西欧)之间的与军事平衡和生产平衡不相一致的态势，分析了各自的潜力、前景和困难。作者首先对五个世纪以来大国的兴衰作了简要的回顾，由此提出了本书的两个主要论点：一是世界上有一种变革的动力，这个动力主要由经济和技术的发展所驱动，它对社会的结构、政治制度、军事力量和各个国家和帝国的地位都产生影响；二是经济增长速度不均衡，对于国家体系中许多成员国相对的军事力量和战略地位都产生了决定性的长期的影响。以此为基点，作者又对未来世界局势的发展趋向作了大胆的预测，尤其着重提出两个值得注意的趋向：其一是全球性发展的趋向，由于亚太地区的崛起，世界经济的重心正向该地区迅速转移；其二是由于新武器系统昂贵和国际上的抗争，军备竞赛的耗费呈螺旋式上升的趋向。这两个趋向虽是独立发展，但也越来越互相影响，并具有重大的社会、经济和政治意义。肯尼迪分别以“左右逢源的中国”、“进退维谷的日本”、“得失并存的西欧”、“矛盾重重的苏联”和“相对衰落的美国”的标题，逐一分析了世界五大力量的困难与潜力、挑战与机会。

在全书最后的结论中，肯尼迪指出，国际平衡正在发生重大转移，也许会加快步伐。假如过去 20 年的发展趋势今后依然如故，在世界政治方面可能出现如下情况：其一是在世界经济总产量和世界军事开支总额方面，五个力量中心所占的比例与其他国家相比将会减少；其二是全球生产平衡在五强之间会偏离美、苏、西欧，而偏向日本与中国；其三是就军事实力而言，美、苏两极世界仍会存在，但会逐渐发生演变。如何应付挑战，关键就看五强领袖们的智慧和胆略，取决于他们在时间长河中驾驶航船的技巧和经验。

(赵自立 撰)

【美】约翰·罗尔斯《正义论》—— 对正义的呐喊与呼唤

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

——约翰·罗尔斯

罗尔斯的著作在英语国家立即被承认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贡献。

——罗伯特·达尔

一、罗尔斯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约翰·罗尔斯 1921 年生于美国马里兰州的巴尔的摩。1943 年毕业于普林斯顿大学，1950 年又在该校获哲学博士学位，以后相继在普林斯顿大学(1950—1952 年)、康奈尔大学(1953—1959 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1960—1962 年)和哈佛大学(1962—)任教。

罗尔斯最早于 1951 年发表了初鸣之作《适用于伦理学的一种决定程序纲要》。基本观念的确立是《正义即公平》(1958 年)。其后陆续写出《宪法自由权与正义概念》(1963 年)、《正义感》(1963 年)、《非暴力抵抗》(1966 年)、《分配的正义》(1967 年)等。1969 年至 1970 年，罗尔斯在斯坦福的高级研究中心完成了对《正义论》的整理和加工。《正义论》一书，洋洋洒洒 40 余万字，实际上是一本论文集。

有的评论家把罗尔斯与柏拉图、阿奎那和黑格尔这些思想泰斗相提并论，但罗尔斯与他们有所不同。那些思想大师均著作甚丰，涉猎颇广，而罗尔斯的主要著作只有《正义论》一本。在这 20 年中，罗尔斯不断遇到来自各方面的批评和挑战，这促使他写出一篇又一篇的论文来完善自己的立论，反驳对方的观点。这样一个过程也使得《正义论》一书显得非常晦涩难懂，概念成群。作为一名从大学氛围中产生的学者，他的整个思想体系显得充满了学究气。

二、《正义论》评介

《正义论》是一部学术内容丰富、思辨难度颇大的著作，它不仅反映了西方学术界 20 年来争论的主要问题，而且深刻反映了西方社会的内在矛盾，为读者思考正义问题提供了极好的文献。美国著名的政治学者罗伯特·达尔表示：罗尔斯的著作在英语国家立即被承认是对政治哲学的一个根本性的贡献。自 1971 年问世后，在西方国家引起了广泛重视，被视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西方政治哲学、法学和道德哲学中最重要的著作之一。该书出版之后，受到热烈讨论，被列为不少大学课程的必读书籍之一。由它引发的各类争鸣或研讨文章，更是汗牛充栋，目不暇接。

《正义论》一书之所以能起到如石击水的效应，关键在于它打破了西方政治哲学万马齐喑的冷清局面。西方政治哲学的衰落已是众所周知，专攻政治理论的学者爱·麦·伯恩斯说：在政治学说的阳光下没有多少新东西。这充分表明了西方传统思辨方法构筑的理论体系的困境。罗尔斯的《正义论》一书则以其独特性和思辨性令人耳目一新。

罗尔斯的《正义即公平》一文发表于1958年，《正义论》一书成于1971年。这些年间，正是美国社会风云变幻的年代。资本主义社会固有的矛盾和冲突接踵而至，此起彼伏。经济危机、通货膨胀、种族歧视、民权运动、女权运动、贫困问题、抵制越战的浪潮、学生造反……接连发生。这无疑会引起人们对社会正义问题的反思。罗尔斯置身于这样一个时代，认真思考和观察这些现象，并把走出困境的希望寄托于正义观念的澄清。这自然是一个过分讲究气的想法，但他做了可观的努力。必须指出，罗尔斯仅仅是一个改良主义者，他的目的是在资本主义的现有范围内进行改良，而不是去改变它。

正像罗尔斯所表示的那样，政治生活中依然存在着我行我素的权势集团，经济生活中依然存在着巨大的分配鸿沟，徘徊于街头车站的无家可归的人依然构成对制度的最大挑战，黑人的社会地位依然令人担忧……这些问题的存在也构成《正义论》一书走红的社会条件。只要这些问题存在，解决这些问题的讨论就不会结束。

罗尔斯的主要目的在于通过用正义即公平的观念来取代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念，从而推动社会变化。他的注意力集中在民权和贫困两大问题上。这两大问题在美国社会长期以来没有得到解决，这是由资本主义社会的基本结构所决定的。他提出的自由权优先，考虑最少受惠者的利益，平等自由等观念，也都是为这些难题寻找出路。

罗尔斯贬低功利主义正义观，主张正义即公平的理论，还有以下背景；60年代之后，美国以及西方社会爆发了一场争论——新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论战。新保守主义坚持自由是西方社会的核心价值，过分强调平等会妨碍自由的实现，自由主义者过分强调平等，不仅给社会造成种种危机，而且侵害了人的自由；而自由主义者则认为只有突出平等才能保证人们的自由，否则，政治和经济资源的不平等分配，必然会侵害一部分人的自由。这场争论旷日持久，代表着社会的不同势力。可以看出，罗尔斯力图协调平等与自由两者。他的第一个原则突出了自由，他的第二个原则突出了平等。不过，他的总体倾向是突出平等的。因为这种争论有制度上的根源，罗尔斯的调和努力是难以成功的。若深入地观察，不难发现两个正义原则之间的不协调，甚至在某种程度上的相互排斥。这也使罗尔斯的理论实际上无法产生他所希望的社会效果。《正义论》受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批评，原因也在此。批评罗尔斯的人提出了种种观点，如：没有理由认为正义原则高于一切功利主义的考虑，无知之幕全然是人为的，政治权利绝对高于社会经济权利并不合理，第二个原则是绝对不合理的，等等。恐怕在美国现有的社会基本结构下，正义即公平的理论难以被接受，至少难以被全部接受，因而也难以达到改良主义的目的。

正义的两个原则带有颇多的理想主义色彩，具有较多的道德主义因素。一种正义观的产生需要有客观物质条件，它不可能凭空产生，没有成熟的社会条件，正义观的改变就无从说起。在西方制度下，两个正义原则没有这样的基础。罗尔斯看到了这一点，他把正义的基础放在个人的道德价值、自律、

自我的统一与一致性等上面，而没有找到客观的基础。

《正义论》，顾名思义，是研讨正义的。正义观念在人类的思想发展史和社会发展史上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正如罗尔斯所说：正义是社会体制的第一美德，正如真实是思想体系的第一美德一样。正义，历来就是一个众说纷纭、各执一端的价值观念。在最早的文字记录中，正义指一般意义上的相当和正当，正义包括全部美德和完好的道德行为模式，后来正义逐渐与平等、慈善区分开来。但正义概念依然是一个宽泛的概念，不同的思想家作出不同的界定。

罗尔斯把正义观的规定视为社会发展的基石。《正义论》一书共分三编九章，第一编“理论”讨论对正义的界定，正义的历史发展，正义的作用，正义的内涵以及原始状态等观点；第二编“体制”分析如何用第一编确定的正义原则来剖析社会政治制度、经济制度和公民生活，涉及到人们社会生活的具体层面，这里较为详尽地反映出罗尔斯高度思辨的正义观的社会意义和实践意义，以及他作为一名学者提出的解决西方社会矛盾、冲突、民瘼的方策；第三编“目的”探讨伦理和道德领域中的课题，涉及善、自尊、美德、正义感、道德感情、自律等一系列课题。这一编与前两编不同，论述和分析似都与他的正义原则稍微疏远一些。其实罗尔斯认为这一部分相当重要，如果不考虑最后那一部分的论据，关于正义的理论也会被人误解。的确，如果一种正义原则要想在一个社会中通行，关键就是人们能否接受并相信它，这就牵涉到道德心理学和正义感形成的问题。如果众人没有一种正义的心理氛围和文化环境，正义原则就不可能被接受，这就是罗尔斯所讲的“正义即公平的相对稳定性”。尽管这一编的内容不如前两编那样新奇，但在整个理论中是不可或缺的。

罗尔斯开宗明义地讲，正义的主题就是社会的基本结构，或者说得更准确些，就是主要的社会体制分配基本权利与义务和确定社会合作所产生的利益的分配方式。罗尔斯把既存的主导西方社会的正义理论分为两大类：(1)功利主义的正义观。罗尔斯将其概述为：如果社会主要体制的安排获得了社会全体成员总满足的最大净差额，那么这个社会就是一个井井有条的社会，因而也是正义的社会。功利主义的基本观点是谋取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2)直觉主义的正义观。直觉主义不从个人或群体的得失思考问题，而是通过对自身的反思来达到一些基本的原则，这些基本的原则是至高无上的，可以用来衡量各种互相冲突的正义原则。直觉主义强调道德事实的复杂性使人们往往无法解释人们的判断，这两种正义观具有明显的差别：一种依据功利，一种依据直觉。

罗尔斯对这两者均不赞同，但他尤其反对功利主义。他认为在现代道德哲学的许多理论中，某种形式的功利主义始终占据上风。事实上，由休谟、边沁、亚当·斯密和穆勒等人所传播的功利主义观念在西方社会历来是占统治地位的，这些观念原则奠定了西方政治制度、社会制度和经济制度的基础。然而这些体制并没有克服社会上存在的深刻的矛盾。罗尔斯是一位改良论者，他相信要改良西方社会体制，关键在于改变占主导地位的功利主义的正义观。这是罗尔斯为自己确定的目标。

罗尔斯确信功利主义的正义观存在着几个弊端：(1)它没有揭示自由和权利的要求与社会福利的增长欲望之间的原则区别，它没有肯定正义的优先原则，正义否认使一些人享受较大利益而剥夺另一些人的自由是正当的，政治

交易和社会利益不能成为妨碍基本权利的理由 ;(2)它假定一个人类社团的调节原则只是个人选择原则的扩大是不足取的,这里没有把人们将一致赞同的原则视为正义的基础,其原则内容无法成为调节全体人的宏观标准 ;(3)它认为任何欲望的满足本身都具有价值,而没有区别这些欲望的性质,不问这些满足的来源和性质以及它们对幸福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怎样看待人们在相互歧视或者损害别人的自由以提高自己的尊严中得到快乐的行为。这里直接表现为对功利主义的批评,也间接地批评了西方社会存在的各种不公正的现象,如分配不平等,欲望至上,种族歧视,贫困问题等。

既然功利主义的正义观不敷所用,纰缪甚多,那么应当建立什么样的正义观呢?罗尔斯的观点十分明确:“我所要做的就是以洛克、卢梭和康德为代表的传统的社会契约论加以归纳,并将它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来。”因此,罗尔斯所依据的是传统的契约论的方法。

罗尔斯的正义理论,一言以蔽之,可称作正义即公平的理论。得出这个理论的各项原则,首先需要说明一个前提,这就是社会契约是如何产生的。这里就必须做一个理性上或逻辑上的假设。罗尔斯把这个假设环境称作“原始状态”(Original Position),相当于自然状态在卢梭、洛克等人思想体系中的地位。

原始状态纯粹是理性上的设想,在实践历史中无法论证。罗尔斯知道这一点,他说过原始状态是一种纯粹假设的状态。在确定正义观的过程中,罗尔斯常常部分地倚重于直觉主义,他表示,正义即公平这种直觉观点将把正义的原则看作是在一种适当规定的原始状态中达成的原始契约的目标。原始状态的设计意图是排除各种历史的和现实的因素,给出一个纯粹逻辑思维的状态,使人们产生正义原则。在原始状态中,所有各方都是道德的主体,都受到平等的待遇,他们选择的结果不决定于随意性的偶然事故,也不决定于社会力量的相对平衡。但是光有原始状态还不足以达成正义的首要原则,还必须设定其他一些条件。

为了设定原始状态,罗尔斯进一步提出几个核心概念:

(1)正义的环境。包括主、客观两方面的条件。

(2)正当观念的形式限制。这是对正义原则性质的规定。(3)无知之幕。这个概念是更为大胆的假设,以便能运用纯粹程序正义的概念,使人们纯粹从零点开始思考正义的原则。

(4)推理的合理性。即假定处在原始状态中的人是有理性的。

以上四方面的条件确定了原始状态的基本属性,由此可以演绎出正义原则。

在得出正义原则之前,还得解决人们如何达到正义原则的问题。罗尔斯首先确定一个前提:处在原始状态中的各方都是平等的,在选择的过程中,所有的人都拥有相同的权利,作为有道德主体、有自己关于善的观念和正义感的人,他们彼此之间都是平等的。人们是在这样的条件下确定正义的原则。根据原始状态及各项条件,罗尔斯推论出正义原则的一般表述:

所有社会价值——自由与机会、收入与财富以及自尊的基础——都应平等地分配,除非任何价值的不平等分配对每一个人都是有利的。

这个一般的正义观又可分解为两个层次,这就是罗尔斯最著名的两个正义原则:

第一,每一个人都有平等的权利去拥有可以与别人的类似自由权并存的

最广泛的基本自由权。

第二,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不但(1)可以合理地指望符合每一个人的利益;而且(2)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

罗尔斯用这一抽象化的标准来评判现代西方民主制度,他是持一种批判态度的。他表示,立宪政体的一个主要缺点是它不能确保政治自由权的公平价值,对此现象从未采取过纠正措施,财产和财富分配上的悬殊远远超出了可以与政治自由权并存的程度,但却为法律所容忍。这种缺陷在于民主的政治过程充其量只是一种有控制的竞争。政治制度中不正义的影响比市场的缺陷严重得多。政治权力积聚,变得不平等,得到好处的人利用国家的强制性工具和国家法律来确保自己的有利地位。经济和社会制度中的不平等很快就破坏了任何政治平等,普选制不足以抵消这种不平等。只要政党和选举经费来自私人捐助,政治讲坛就会受占支配地位的势力的控制。罗尔斯点明了西方民主政治的基本缺点,但他没有作更深入的分析。

第一个原则被确定为是优先于第二个原则的,按罗尔斯的话讲,这两个正义原则是按照“词汇式序列”排列的,即只有第一个原则被满足后才能满足第二个原则。事实上,因为第一个原则已有公论,罗尔斯并没有作什么创造性的论述,他花了大量的气力来论证第二个原则。在论述第二个原则时,他提出了几项论证:(1)效率原则。在分配上,效率原则是不包含正义原则的,因而一个人得到全部产品的分配或其他不平等分配的方式也可能是有效率的,因而仅仅效率原则本身不可能是正义的,应当寻找既有功利也是正义的分配方式,超越单纯的功利观念;(2)差别原则。差别原则通过挑出某种特殊的地位来判断社会基本结构中的不平等问题,这将克服功利原则的不确定性。任何差别的存在,都要能够有利于境况差的人,有利于最少受惠者。这个原则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因为如果要实施这一原则,那就意味着对西方制度进行彻底的改造,有人甚至称之为“社会主义的”改造;(3)连锁关系。这里假定,如果一种利益提高了最底层人们的期望,它也就提高了其他所有各层次人们的期望,当地位最不利者获益时,处于中间状况的人也会获利。如果正义原则得到实现,这种连锁关系就会实现。经过这三个方面的论证,罗尔斯又将第二个原则具体表述为:

对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这种不平等既(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又(2)按照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使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地位和职务联系在一起。

差别原则包含着某种平均主义,同时也反映了自由主义思潮的某些倾向,最基本的就是“平等的倾向”。差别原则意味着:(1)补偿原则。即应当对出身和天赋的不平等进行补偿,差别原则不等于补偿原则,但它力图达到补偿原则的目的;(2)互惠的观念。差别原则是追求相互有利的原则;(3)博爱原则。在西方社会中,与自由和平等相比,博爱处于次要地位。差别原则表明了一种公民友谊和社会团结。这些均为一些理想主义的原则,罗尔斯认为西方社会没有实现这些原则,或者说没有沿着这个方向发展。

这两个正义原则与罗尔斯对社会的基本结构相配套,第一个原则用于确定和保障公民的平等自由,第二个原则用于规定和建立社会及经济不平等。第二个原则引起了很大的争议,因为在私有制条件下,财富和收入的分配是绝对不平等的。那么平等原则如何才能实现呢?实质上罗尔斯的重点在这

里，其改良主义的理论出发点也在这里。

确定了正义的两个原则之后，罗尔斯便将它们贯彻于社会基本结构。罗尔斯将社会解释为一种互利的合作事业，其基本结构是一种公共的规则体系。它规定了一种活动设计，这种设计使人们共同行动，以产生更大数量的利益，并按照收益中应得的份额把某些公认的权利分配给每一个人。如何使正义原则演化为具体的制度，罗尔斯提出了“四个阶段的顺序”。第一阶段人们接受两个正义原则的选择；第二阶段召开制宪会议，确定政治结构的正义并选择一部宪法，设定制度，这个阶段主要是确定平等的公民权和各种自由权；第三阶段为立法阶段，在这个阶段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发挥主要作用；第四阶段是具体运用规范的阶段，法官和行政官员把制定的规范用于具体的事务，公民则普遍遵循规范。在这个部分，罗尔斯还深入讨论了自由权概念、良心平等自由权、宽容与共同利益、政治正义和宪法、参与原则、法治、自由权优先性的规定等课题，较为明晰地展现了他设想的理想的政治体制和社会制度。

为了指明西方社会改良的方向，罗尔斯集中在第五章讨论了社会经济制度。他先确定了“分配正义的背景制度”，这包括：(一)分配部门。负责保持价格体系具有切实的竞争能力；(二)稳定部门。负责实现合理的充分就业；(三)调拨部门。负责维持最低限度的社会保障；(四)分配部门。负责通过税收和对财产权的必要调整，以维持分配份额的一种大致的正义性(第43节)。社会通过调节这四个部门的活动实现正义原则。

经过对政治和经济体制的综合考察，罗尔斯又对两个正义原则作了完整的表述：第一个原则：每个人都应有平等的权利去享有与人人享有的类似的自由权体系相一致的、最广泛的、平等的基本自由权总体系。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不平等的安排应能使它们(1)符合地位最不利的人的最大利益，符合正义的储蓄原则，以及(2)在公平的机会均等的条件下与向所有人开放的官职和职务联系起来。

第一条优先规则(自由权优先)：正义原则应按词汇序列来安排，因此自由权只有为了自由权本身才能受到限制。(1)不太广泛的自由权应能使人人享有的自由权总体系得到加强；(2)不太平等的自由权必须是具有较少自由权的那些人能够接受的。

第二条优先规则(正义优先于效率和福利)：正义的第二个原则在词汇序列上优先于效率原则和最大限度提高利益总量的原则；而公平机会优先于差别原则。这里有两种情况：(1)机会的不平等必须扩大具有较少机会的那些人的机会；(2)过高的储蓄率在总体上能减轻为此而受苦的人的负担。

至此，罗尔斯的正义论有了一个概括的轮廓。

(永新 撰)

【英】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战略论》—— 构建战略思想的新大厦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以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

——利德尔-哈特

利德尔·哈特曾经很卓越地发展了一套“间接路线”理论，而他也认为那就是最好的战略。

——博福尔

一、利德尔·哈特生平与学本成就

《战略论》作者巴兹尔·亨利·利德尔-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 Hart, 1895—1970)，是英国军事历史学家和军事理论家。他是一位牧师的儿子，1895年10月31日出生于法国巴黎。他爱他的父亲，也爱他的母亲，后来便把父亲和母亲的姓氏结合使用，称为利德尔-哈特。利德尔-哈特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英国剑桥大学神学院；大学学业结束后，加入了由国王直接统辖的约克郡轻步兵，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在那里服役，后随军开赴法国，参加对德军的作战。他于1916年负伤，被迫住院医治，1927年退役，军衔为陆军上尉。

利德尔-哈特是一个勤于学习、善于思考、酷爱钻研和勇于发表独立见解的人，参军服役后即对战争理论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负伤就医期间就开始系统地学习和研究军事历史，并着手编写西庇阿、薛尔曼、福煦和劳伦斯的传记。1920年，英国官方重新修订《步兵训练教范》时，这位年仅二十五岁的陆军军官，即以战时所见的渗透战术为基础，提出了“洪水泛滥式”的进攻方法；以后，积极参加了英国军队的机械化运动，提倡集中使用装甲坦克和机械化部队，并强调加强空中力量。

本世纪20年代中期到30年代末，利德尔-哈特先后担任英国《每日电讯报》(1925—1935)和《泰晤士报》(1935—1939)的军事记者，《英国百科全书》的军事编辑，并在剑桥大学讲学。但是，在和平主义占优势的历史条件下，他的思想在国内并未受到重视。1937年，他被任命为英国陆军大臣莱斯利·霍尔-贝利沙的私人顾问，曾对英军的改革和机械化提出过不少建议，一度担负了特殊的责任。但是，他发现陆军部的工作进展极为缓慢，他的改革主张遭到一些人的反对，同时他也与某些高级将领的关系有所紧张，因而被迫于第二年辞去这一职务。从此以后，他便集中精力专门撰写军事著作，阐述自己的军事思想。

利德尔-哈特一生勤于军事理论、军事历史和军事人物的研究，撰写了三十多部著作。其中最有影响的，除《战略论》外，还有《步兵的未来》(1933)、

《有效防御》(1940)、《战争样式的革命》(1947)、《西方的防务》(1950)、《隆美尔战时文件》(1953)、《威慑还是防御》(1960)、《第二次世界大战史》(1971)等；同时，还有一些著名战史和军事名人传记。他在自己的著作中较早倡议“机械化制胜论”思想，不因某些高级人物的非议而却步，始终坚持自己的观点，曾不断批评英国军界领导者在发展军事方面的保守思想，并努力寻求提高英国军事力量的崭新途径。他主张彻底审查和修改英军的作战方法，包括重新考察战略问题。正是在这一基础之上，他提出了“间接路线战略”的观点，后来又在长期的研究和考察中，将这一观点加以系统化和理论化。

也许是历史条件和客观原因的嘲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前，利德尔-哈特的军事理论虽然在英国内部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但却在国外吃香，获得了德国将军古德里安和隆美尔等人的青睐。古德里安曾把自己描绘成是利德尔-哈特的“追随者和小学生”。二次大战爆发以后，利德尔-哈特的军事理论终于被西方军界普遍接受并逐步付诸应用了。1966年，他因在军事研究上功绩卓著而被授予爵士头衔。1970年1月29日，这位老人走完自己的人生旅程，在英国白金汉郡的梅德门汉去世，终年七十五岁。

作为现代著名军事作家，利德尔-哈特在军事上所作的贡献，已为世界所公认。1975年美国出版的《军事人物简明辞典》，称他是“二十世纪英国军事思想家中无可争辩的领导者”；1978年新版的《美国百科全书》，则把他奉为“二十世纪最富有创造性和有影响的战略家之一”。

二、《战略论》评介

《战略论》原名为《战略：间接路线》，是一部阐述“间接路线战略”的军事理论专著，英国著名军事理论家利德尔—哈特的重要代表作。该书的撰写、增修和出版，前后经历了近四十年。1929年，作者将其多处撰写的《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一书付梓，其中首先使用了“间接路线”一词。1941年，作者以此书为基础，进行扩充和修订，以《间接路线战略》为名再版。1942年，该书又以《赢得战争的方法》为名出版，但书的内容没有变化。1946年，该书第三版问世，内容有所增补，书名恢复为《间接路线战略》。1954年，作者在详细修订和大量补充后，出版了该书的第四版，并将书名更改为《战略：间接路线》。此后，该书又多次印刷。直到1967年，作者再对全书作了补充，增加了“论游击战”一章，从而形成了该书的第五版。

作者在其1954版本的“前言”中写道：“我的这本《间接路线战略》，初版于1929年，当时用的书名是《历史上的决定性战争》。现在这个版本，是我二十五年来继续研究的结果，特别是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在战略和大战略方面的经验的结果。”由此可见，《战略论》一书的研究、撰写与出版，是耗费了作者巨大的精力和时间的。间接路线的思想，对作者有着强烈的吸引力，是他长期潜心研究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课题。

《战略论》一书，洋洋三十五万余言，时间跨度两千五百余载。作者运用丰富的史料进行详尽的分析，旁征博引，论证一个中心思想：古往今来的许许多多战例表明，“间接路线要比直接路线优越得多”，“前者实在是最合理和最有效的战略形式”。他认为，“严格讲起来，战略的历史也就是间接路线的使用和演变的纪录。”因此，作者把其军事战略理论称为“间接路

线”理论。这种战略的目的，就是要使战斗行动尽量减少到最低限度；其主要原则，是避免从正面强攻直撞的作战方式。作者认为，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因此，在战争和战役中，应避免同敌人作直接的硬拼，而要首先使用各种手段，力求出其不意地振撼敌人，使其受到奇袭，在物质上遭受损失，在精神上丧失平衡，然后再视情况实施进攻。

据作者论证，历史上许多具有决定意义的战争和战役，差不多都是采取这种间接接敌方法取胜的。他强调：“要想掌握运用间接路线的艺术，了解它的真正意义，只有一个办法，就是对整个战史进行不断的研究和分析。”该书正是以史为据作出结论的。作者认真分析了人类历史上几十次重大战争的经验和教训；努力界定了“大战略”和“军事战略”、“间接路线战略”的定义，以及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具体地阐述了实施“间接路线战略”的原则与方法等，从而使它成为一本颇有实用意义的理论专著。

《战略论》的中译本，最早由台湾军事译粹社于1955年出版，钮先钟翻译；大陆译本由战士出版社于1981年出版，军事科学院组织翻译。

《战略论》全书分为四编二十二章。第一编为从公元前5世纪到公元20世纪初这段历史中的战略；第二编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略；第三编为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战略；第四编为军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利德尔·哈特在该书中，以历代战争的研究为基础，通过对西方世界2500年来大量战例的分析，特别是对两次世界大战经验教训的探索，提出了一种军事战略，即所谓“间接路线”战略。他在书中写到，通过对30场战争，280多个战役的研究，发现其中只有6个战役是凭借直接路线而获得了决定性战果。再作较深入的研究则又可发现，那些直接路线中仍不乏若干潜在的间接因素。所以他得出结论认为间接路线实为最有希望和最经济的战略形式。可是当他最初使用这个名词时，还只是具有地理意义。比如他说，“名将宁愿采取最危险的间接路线，而不愿驾轻就熟直接路线——必要时，只率领小部分兵力越过山地、沙漠或沼泽，甚至于与其本身的交通完全断绝关系”。但后来他又发现所谓路线不仅具有实质意义，而且更应做较抽象的解释，从而引申为一种战略形式。利德尔·哈特认为：“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进行战争所采取的‘路线’，如果不具有某种程度的‘间接性’，不能从而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难以应付，那么，也就难以使战争取得有效的结果。这种‘间接路线’，既有物理性的，也有心理性的，通常都是物理性的，但终归是心理性的。在战略上，最漫长的迂回道路，常常又是以达到目的的最短途径。”他进一步解释说：“朝着敌人‘自然期待的路线’采取行动，必将使敌人得以改善态势，因而增强其抵抗能力。……使敌人在心理上和物理上丧失平衡，是在战略上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来达到目的。”为了全面论述这种间接路线战略，利德尔·哈特在书中明确提出，他要在“新的基础上建立一座战略思想的‘新大厦’”。

利德尔·哈特所构建的战略思想“新大厦”，其内容是颇为丰富的，涉及到战略理论的各个方面。主要有：

1. “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

在利德尔·哈特之前，已有不少著名的军事家和军事理论家给出过战略的定义。如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曾提出：“战略是为了达到战争目的而对战斗的运用。”因此，他认为“战略必须为整个军事行动规定一个适应

战争目的的目标。”利德尔·哈特认为这一定义把战略概念限制得太狭窄了，因为只以单纯地运用战斗为限，会使人们以为只有会战才是达到战略目标的唯一手段。为了构建战略思想的“新大厦”，利德尔·哈特提出了自己的定义，即：“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与其他定义相比，利德尔·哈特的这一定义不仅明确说明了手段与目的的关系，从而更深刻地揭示了战略的实质，而且扩大了战略的内涵，使战略的概念不只局限于战争，对于和平时期同样适用，从而为他在更广泛的领域阐述其间接路线战略铺平了道路。

利德尔·哈特为了充分说明他所提出的战略定义，还从不同的层次上对战略的概念进行了深入的讨论。他在论述战略与战术的关系时认为：战术是战略在较低阶段的运用。战略所研究的，不只限于兵力的调动——一般的定义都只是注意这一点，而且要考虑到兵力调动的效果。至于会战当中军事力量的运用即这些兵力的作战部署和直接行动的指挥，则属于战术的范畴。战术充塞着整个会战(战斗)的领域，而战略则不同，它不仅仅停止在这一道界线上，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倒是需要把实际的战斗行动减少到最低限度。战略与战术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联系，可以互相影响。在执行的时候，二者之间没有明显的界线。因此，很难确定部队的战略行动在何处结束，而战术行动又在何处开始。

利德尔·哈特还提出了大战略的概念，并论述了大战略与战略之间的关系。在他看来，战略是大战略在较低阶段的运用。所谓“大战略”，或者称高级战略，与指导进行战争的军事政策是完全吻合一致的，其任务就在于调节和指导一个国家和几个国家的所有资源，用来达到战争的政治目的。而这个目的，正是由基本政策，即国家政策所决定的，军事力量只不过是大大战略掌握的各种工具中的一种而已。为了达到削弱敌人抵抗意志的目的，大战略更应该注意和利用的是其全部力量，即财政上的压力、外交上的压力、商业上的压力；以及从重要性说来并不算最后一项的思想道义上的压力。如果说，军事战略只限于研究与战争有关的各种问题，那么，大战略所研究的，不仅是与战争有关的问题，而且包括与战后和平有关的问题。他明确提出了军事战略必须接受“大战略”的指导，只有“大战略”才会有深远的预见和更广博的观点，从而初步界定了大战略与军事战略的学术范围。利德尔·哈特虽然未能明确说明间接路线战略与大战略的关系，但从内容上看，在许多方面已涉及到大战略的范畴。

2. “战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敌人的稳定性”

在战略目的问题上，利德尔·哈特反对当时已被许多人接受的观点：即战争的唯一正确的目的就是消灭敌人的武装力量，战略的唯一目的就是进行会战(战斗)。利德尔·哈特认为，战略的目的与战争的目的有着根本的区别。战略并不只有一个单纯的目标——摧毁敌人的军事力量。当看到敌人具有总的军事优势时，或者在某一战区具有军事优势时，它便可以采取有限规模战略。从抽象的概念来说，战争的目的是要彻底解除敌人的武装，但在实际中这个目的并不是能够经常达到的，而且对于和平来说也并不是一个必要的条件。为了达到大战略的目的，军事工具不过是许多种工具中的一种而已。同样，会战(战斗)也只是达到战略目的的许多种手段中的一种罢了。如果条件有利，使用军事工具往往能够很快收到效果。如果条件不利，使用军事工具就可能是一种愚蠢的行为，即使把决定性会战(战斗)看成是战争的主要目

的，而战略的目的仍然是要使这个会战(战斗)在最有利的条件下来进行。条件愈是有利，则进行战斗的成分也就会相对地减少。因此，最完善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的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利德尔·哈特的结论是：战略家的任务就是力求在最有利的条件下达到自己的目的，力争获得最好的结果。他的真正目的不仅在于寻找机会进行会战(战斗)，而且在于造成一种最有利的战略形势。他明确提出，战略的目的就是要破坏敌人的稳定性，要使敌人自行陷入混乱。这样的结果，敌人不是自动崩溃，就是在会战中轻易地被击溃。为了使敌人自动崩溃，也许还要采取一定的战斗行动，但从本质上说来，这与进行会战已经是两回事了。在《战略论》一书中，利德尔·哈特曾多次反复强调上述结论。实际上，这也正是他所提出的间接路线战略的实质所在。他指出，明确这一点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差不多在一个多世纪的长时间里，军事思想方面的重要教条，就是把“在战场上消灭敌人的主力”看成是战争的真正目的。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所以打成一场灾难性的消耗战，就是由于战争双方都错误地把彻底摧毁敌人军队的战争目的作为战略指导的依据，从而付出惨重的代价。这一结论未免有失偏颇，但他毕竟从另一角度提出了值得战略家全面考虑的问题，因此对于战略思想的发展仍然具有重要意义。

在讨论战略的目的时，利德尔·哈特对政治目的和军事目的的关系也给予了充分的注意。他提出，一个国家决不会是为了战争而发动战争，必然是为了追求某种政治目的而进行战争。所以，军事目的是由政治目的决定的。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取得了军事上的胜利，也并不等于达到了政治目的。他认为，战争的目的，尽管只从自身利益来看，也是想要在战后获得一个比较好的和平状态。因此，在进行战争的时候，也要经常想到你所需要的和平条件。在确定战略目标时，不能只注意到军事目标，而忘记国家的基本目的；不能只想取得军事上的胜利，而忽略未来的政治后果。

利德尔·哈特还十分强调战略目的与手段的结合。他认为，战略能否获得成功，主要取决于对目的和手段(工具)能否作精确的计划，能否把它们正确地结合起来加以使用。目的必须与现有的一切手段相适应。而用来达到每一个中间目的的手段，也必须与那个中间目的的重要性和需要相适应，而且不管所追求的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目的：是直接抢占某个目标，还是争取其它的成就。手段决不可以太过了，因为“过犹不及”。把目的和手段正确地结合起来，就是要最合理地“节约兵力”。他还指出，即使是一个最伟大的军事天才，也很难完全正确地把目的与手段协调起来。不过，在这个问题上做得愈完善一些，则成功的可能性也愈大一些。

3. “间接路线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

在提出把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作为战略的目的之后，利德尔·哈特具体论述了怎样去破坏敌人的稳定性，提出“间接路线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从而进一步从战略的行动上阐明了间接路线的内涵。

利德尔·哈特认为，要达成破坏敌人稳定性的目的，所采取的战略行动应包括两个方面：其一是物理性的；其二是心理性的。在物理性的或者叫做物质性的领域内，主要的行动有：破坏敌人的部署，从而迫使他们突然地改变行动方向，使他们在兵力的组织和配置上发生混乱现象；分割(切断)他们的兵力，威胁和危害敌人的补给系统；威胁他们的交通线，使其不能在必要

的时候沿着这些交通线撤退，不能在中间地区或战略后方重新设防进行固守。上述几种行动都可破坏敌人的稳定性，但比较经常的是，根据情况将它们结合使用。从心理方面来说，敌人稳定性的破坏是由于上述物理性行动对敌军指挥人员产生作用而造成的结果。如果敌人突然地感到自己的处境不利，因而没有能力进行抵抗，那么上述行动所产生的影响或作用就显得特别强烈。敌人在思想上感到自己已经落入陷阱，这是从心理方面破坏敌人稳定性的原因。利德尔·哈特特别指出，心理性因素贯串在物理性的领域之中，并且能够对它产生决定性的影响。在研究物理性因素时，永远不要忘记了心理性的因素。一个战略，只有考虑到这两种因素的结合，才能称得上真正的间接路线战略，才能真有帮助破坏敌人的稳定性。

正是从物理和心理两方面结合的考察中，利德尔·哈特得出了一切间接路线的方法通常是比直接路线的方法为好的结论。他指出，一个国家表面上的实力，是由它的国民数量和资源数量来表示的，但是，要把这个实力体现出来，则有赖于它的内部机构和“神经系统”的健康情况，也即是依赖于它的指挥稳定性、民心士气和补给机能。直接施加压力，常常会使对方的抵抗力反而紧缩和变硬起来，有如把散雪压挤成雪球一样，越压越紧，那么融化得也就越慢。无论在政策上还是策略上，或者换句话说，不管在外交战略上还是在军事战略上，对于破坏敌人心理上和物质上的稳定性来说，间接路线是最有效的一种手段，只有这样才能为摧毁敌人创造出有利的条件。因此，利德尔·哈特坚持认为，就战略的行动而言，最理想而最有利的办法，就是要设法解除敌人的武装，并尽量避免用硬拼挑战去消灭敌军。硬拼硬打去消灭敌军的方法，不仅包含着自己的兵力也消耗殆尽的危险，而且有可能导致相反的后果，使自己遭到失败。所以，一个战略家的思想，应该着眼于“瘫痪”敌人，而不是如何从肉体上去消灭他们。利德尔·哈特举例说，在攻势战略中，间接路线的表现形式，通常都是把部队开去进攻敌人的经济性目标，也就是说，用于进攻对方国家的或军队的补给资源基地。然而有的时候，这种行动也可能纯粹是追求心理上的目的。但无论如何，这种军事行动不应该有损于一个目的，那就是瓦解敌军的士气和破坏敌军的作战部署。这一点，正是判断任何间接路线的唯一标准。

利德尔·哈特还注意到空军和机械化部队的发展对采取战略行动所产生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他认为，这些部队的发展不仅增加了战略行动的手段，扩大了应用的范围，而且也使行动的效力更加强大，从而大大提高了战略的地位。他还把间接路线战略与制空权理论和机械化作战理论结合起来，具体地分析了空军和机械化部队的发展对战略行动的影响。他指出，空军是使用一种特殊形式的间接路线，即飞越前线的间接路线，来对敌人进行直接攻击。因而有可能不必预先在战场上消灭敌军的主力，对敌人的经济和政治中心进行打击，而坦克机械化部队则可以在地面采取间接路线的方法，即迂回“障碍物”——敌人的军队的方法，去破坏敌人的补给线和指挥系统，因而也有可能不经严重战斗而使敌人的主力发生崩溃。

4. 战略原则应是“实际上的行动指南”

利德尔·哈特认为，以战史为依据可以从经验中抽出几条基本的战略原则。这些原则是非常普遍而又无可争辩的，似乎完全可以称之为战略的“公理”。利德尔·哈特所列举的战略原则一共有八条。这八条原则及其基本的含义是：

(1)根据自己的手段来选择目标。在确定目标时，要有健康的思想和冷静的头脑。切记“贪多嚼不烂”。军事智谋的第一个特征，就是要有能力区别哪些是能够办到的和哪些是不能够办到的。要学会面对现实，但又决不能对自己的力量丧失信心。

(2)心里时刻记住你的目标。当根据变化了的形势来制订自己的计划时，必须时刻记住你的目标。虽然达到目标的途径是多种多样的，但要想到，每夺得一个中间目标，也就向预定的目标前进了一步。要始终注意不要偏离方向。

(3)选择一条敌人期待最小的行动路线。要站在敌人的立场上想一想，看看他们会把哪个方向看成是危险性最少的，因而不会对那里采取相应的预防措施。

(4)沿着一条抵抗力量最小的路线采取行动。只要没有重大伤亡，应该一直沿着敌人抵抗力量小的路线前进，力图进抵预期的目标。一旦夺下这种目标，也就使你向自己的最终目标靠近了一步。

(5)选择一条可以同时威胁敌人几个目标的作战线。这样可以迫使敌人处于左右为难的窘境。如果能够同时威胁敌人的几个目标，那么对于夺取其中的一个目标来说，就有了良好的前提和条件。因为这样至少可以使你夺得敌人防卫力量较弱的目标，甚至相继夺取几个目标。把“选择一条行动路线”和“选择一个目标”两者混淆起来，是一种很普遍的错误。前者通常是聪明的办法。后者只是为了实行打击，通常是较难发展胜利的途径。

(6)保证计划具有灵活性，同时根据情况的可能变化来部署军队。在制订计划时，必须预先考虑和研究下一步的行动措施。不管是成功还是失败，或者只是局部性的成功，都要有预定的应付办法。兵力部署必须保障部队能在最短的时限内发展已经取得的战果，否则应立即变更部署，以便适应变化了的新情况。

(7)当敌人有所戒备时，决不要以你的全力去实行进攻。在尚未确实查清敌营当中已经出现瘫痪现象之前，不应贸然决定对固守阵地之敌发动进攻。要使敌人发生瘫痪现象，从物理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他们组织涣散，从心理方面来说就是要使他们士气瓦解。

(8)当一次尝试失利以后，不要沿着同一路线和采取原来部署去再次发动攻击。这时候，单纯地增加一些兵力不能成为恢复进攻的基本条件，因为敌人在此期间也会增加他们的力量，而且还有战胜之余威，在精神方面早已占了上风。

利德尔·哈特强调指出，这些原则可以作为实际上的行动指南，而并不是抽象的原则。他反对那种使用一个抽象化的词语来表达作战原则的倾向，他认为对于作战原则，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释，其价值也只能取决于运用者对战争的了解程度。他指出，作战原则的研究愈是趋于抽象化，愈会形成一种幻想，这不过是一种智力游戏而已。因此，利德尔·哈特所提出的八条原则，实际上也就是他的间接路线战略在运用时的规范。

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思想一经提出，就在一些欧洲国家受到程度不同的关注。在德国，他的多部著作和文章被译为德文在军界广泛流传，包括勃罗姆堡、勃劳希契、伦斯德特、赖歇瑙、曼施坦因、隆美尔、古德里安等人在内的一批高级将领对他的一些观点很感兴趣，对“间接路线”理论有关坦克集群作战的思想尤为重视并加以吸收，最

终形成了一整套现代“闪击战”理论。这些将领战后承认，战前德军装甲部队的建设和“闪击战”理论的创制得益于利德尔·哈特的作战思想，他们都是“利德尔·哈特的信徒”。利德尔·哈特的作战思想在战前英、法军队的一些年轻军官中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比如，《战略论》附录中收录的英军中东总司令部副参谋长多尔曼·史密斯少将于1942年从中东写给利德尔·哈特的一封长信，记述了英军部队在北非战场运用“间接路线”思想的战例。

如果说战前欧洲将领只是从“间接路线”理论中吸取了一些新颖作战思想的话，那么战后以色列将领则是将其作为一整套符合以色列需要的战略纲领加以具体运用的。在以色列，“间接路线”思想起初仅被用于解决一些战术问题。曾历任以色列国防军作战部长、总参谋长的伊格尔·扬丁将军则注意到这个思想的战略方面具有更大的价值，认为“间接路线战略是一种唯一健全合理的战略”，它提供了以军可以依靠的战略指南。这样，扬丁不仅有意识地运用“间接路线”思想解决以军的建军和作战问题，而且将《战略论》的部分重要章节译为希伯莱文供军官们学习，并向其他军政要人进行宣传，从而使这些人也成为“间接路线”的信奉者。以色列前总理伊扎克·拉宾认为，利德尔·哈特的“间接路线”原则适合以色列国情，对于解决以色列的战略问题具有理论指导作用。伊加尔·沙龙等以军高级将领，也都或多或少地受到了利德尔·哈特的影响。因此，可以说利德尔·哈特是以色列的战略理论导师。1960年，利德尔·哈特作为政府的客人访问了以色列，受到热烈欢迎和赞扬，被誉为“当代最伟大的军事专家”、“20世纪的克劳塞维茨”、“理论教皇”等。

利德尔·哈特基于“间接路线”思想提出的关于核时代战略问题的见解，在西方国家也很有影响。1945年，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核武器的出现使利德尔·哈特深信，在核时代继续奉行总体战略将比以往更为荒谬，因为战争双方都将在战争中彻底毁灭。因此，核时代的安全政策和军事战略将主要解决两个问题：一方面是防止战争；另一方面则是在防止战争的措施失效后，以有限战争迅速地恢复和平。从这样的观点出发，利德尔·哈特认为，西方国家应当实行更为灵活、反应迅速的有限战争战略，并按照这个战略的要求建设军队。据此，利德尔·哈特提出了一系列政策性建议，对西方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军事战略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的理论指导作用，他也因此被誉为核时代军事理论的先驱者。美国总统肯尼迪1960年在为利德尔·哈特《威慑或防御》一书撰写的书评中写道：“没有比利德尔·哈特更值得尊敬的军事问题专家了。在过去20年里，表明他对战争与和平问题很富有预见性。他的预言和警告都是正确的。”美国著名的核战略专家伯纳德·布罗迪则直截了当地自称是利德尔·哈特的追随者。

还有其他一些国家也十分重视研究利德尔·哈特的战略思想。例如日本学者伊藤宪一在《国家与战略》一书中认为，利德尔·哈特是“不战而胜的战略家”。从他的一些思想中可以汲取有益于日本的战略原则。前苏联陆军中将C·H·克拉西利尼科夫在1957年为《战略论》俄译本撰写的前言中写道，利德尔·哈特是“苏联读者早已知名的一位军事作家和记者，他的许多部著作已经在苏联出版”，他的“不少很有意义的思想……反映了资产阶级军事科学的发展趋势”，“对于苏联读者将是有所裨益的”。

利德尔·哈特之所以能够提出影响如此广泛的“间接路线”理论，主要是由于他注重从历史材料中汲取思想营养，以历史之石磨就自己的理论之

剑。他不仅对战争史终身抱有浓厚的兴趣，而且几乎把历史研究作为形成理论原则的唯一方法。他认为，“有两种不同的‘实践经验’：一种是直接的；一种是间接的。而且在两者之间，间接经验可能具有更大的价值，因为它的范围毫无疑义要广阔得多。”在他看来，唯有历史提供的间接经验是最可以信赖的，“必须向历史学习”。

(程金明撰)

【美】伯纳德·布罗迪：
《绝对武器》——开核战略理论之先河

原子弹是一种“绝对武器”，它不仅具有史无前例的巨大摧毁力，而且对传统作战方式和国防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布罗迪

夺得制空权就是胜利；在空中被击败就是战败，并接受敌人强加的任何条件。

——杜黑

一、布罗迪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伯纳德·布罗迪，1910年5月20日生于美国芝加哥，毕业于芝加哥大学。1932年获该校哲学学士学位，1940年获博士学位。毕业后，布罗迪一直从事教学与科研工作。1940—1941年任普林斯顿高级研究所研究员。1941—1943年任达特茅斯学院讲师。1945—1951年任耶鲁大学副教授，为国际关系学导师。1966年始在加利福尼亚大学洛杉矶分院社会科学系任教授。布罗迪曾于1943—1945年在美国海军预备队服役，1946年到国防军事学院任客座教授。

布罗迪对现代战争问题颇有研究，特别是对核武器问题多有独到见解，其论著也多与战争战略问题和核武器问题有关。除《绝对武器》外，他还撰写了《核子战》（1965年），《逐步升级与核选择》（1966年），《导弹时代的核战略》（1973年第三版）和《战争与政治》（1973年）。该书由布罗迪主编，1946年耶鲁大学国际研究所出版。

1945年7月15日，美国内华达州一片荒凉的沙漠上，随着一声巨响和一片灼目的闪光，人类第一颗原子弹试爆成功了。冲击波以排山倒海之势由爆心向四面八方席卷开来。

美国的科学家和工程技术人员打开了魔瓶，放出了原子弹这个恶魔。他们知道，人类很可能再也无法将这个魔鬼重新收入魔瓶，它将要开始肆虐当时已经笼罩在战火硝烟中的世界。他们的担心不幸变成了现实。1945年8月6日和8月9日，日本广岛和长崎相继被原子弹摧毁，数十万无辜平民死伤在原子弹的蘑菇云下。美国研制出原子弹的精英们对自己放出的魔鬼束手无策，军人们也在原子弹的巨大摧毁力面前瞠目结舌：难道人类几千年的文明和财富就要毁于自己的聪明才智之下？整个世界惊呆了。

值得庆幸的是，终于有人率先从恐怖和惊愕中清醒过来。他们开始仔细研究原子弹的摧毁力，冷静分析其对现代战争的影响，努力寻找避免其继续危害人类的对策。而其中最著名、最先编撰出颇有见地的论著并开创了一代理论先河者，当属伯纳德·布罗迪。

二、《绝对武器》评介

《绝对武器》第一章为该书提纲挈领之作，介绍了原子弹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以及这种武器将来会对战争产生哪些影响。布罗迪认为，原子弹是一种“绝对武器”，它不仅具有史无前例的巨大摧毁力，而且对传统作战方式和国防政策产生了极大的影响。其巨大的摧毁力使之成为一种可怕的进攻性武器，人类在找到能够有效地防御这种武器的手段之前，将陷入绝望。垄断原子弹的国家可以为所欲为地对没有原子弹的国家发动侵略战争，没有原子弹的国家，其领土完整和国家主权将成为他人掌中之物。如果这种垄断被打破，许多国家拥有了原子弹且决心在战争中诉诸这种武器，那么一旦爆发战争，战争对交战各方来讲则毫无疑问地意味着毁灭。在这种恐怖局面和两难境地面前，人类间发生战争的可能性是大了还是小了？核战争能否避免？人类是否能够在核战争爆发以前找到控制或防御原子弹的有效措施？原子弹对未来的战争将有哪些影响？如何影响？在布罗迪看来，要想回答这些问题，必须首先了解原子弹到底是一种什么样的武器？布罗迪列举了原子弹的下述八大特点。

1. 巨大的摧毁力。布罗迪指出，即使按当时的摧毁力计算，1—10枚原子弹即可摧毁世界上的任何一座城市。当时纽约是世界上最大的都市，但仅需10枚轰炸长崎时所用的那种原子弹便可彻底摧毁之。而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原子弹摧毁力还将大大提高，届时仅需5枚即可摧毁世界上最大的城市。而对于各中小城市来讲，一枚原子弹就足以将它们夷为平地。在今天看来，布罗迪的估计过于保守。自从氢弹研制出来后，世界上的任何城市均可用一枚氢弹摧毁之，毫无例外。

2. 人类尚无法找到有效的防御手段。布罗迪认为，原子弹问世后，不仅当时尚无防御原子弹的有效手段，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人类将无法找到对付原子弹的有效措施。布罗迪承认，在原子弹问世之前，人们可以通过综合利用各种防御措施和提高其保卫目标承受打击的能力，来有效地防御常规武器的空袭。在此，布罗迪再次引用了伦敦防御德国飞弹的战例。英国采取了打防结合的防御措施。一方面派遣轰炸机突击德国的飞弹试验基地、制造工厂和发射场，从而迟滞了德国飞弹的生产计划和能够投入发射的飞弹数量。而那些最终得以发射并进入英国领空的飞弹，则在英国歼击机、高射炮和拦阻气球的联合阻击下，75%被击落；未被击落的25%中，由于制导系统欠准，最终仅有9%飞抵伦敦。这个比例的来袭飞弹的打击，伦敦可以承受。但是如果德国飞弹装备的不是常规弹头而是原子弹头，那么仅仅靠尽量减少击中目标的飞弹数量是拯救不了伦敦的。即使按伦敦防空作战最为成功的战例计算，亦是如此。1944年8月28日，来袭的101枚德国飞弹中，97枚被击落，仅有4枚飞抵伦敦。假如这4枚飞弹装备原子弹头，那么伦敦无疑将会遭到广岛和长崎同样的命运。因此布罗迪强调指出，防止某一目标遭受打击的措施必须万无一失。在原子弹的打击面前更是如此，而战争历史和军事技术的发展趋势表明和预示，人类在过去未曾研制出并且在尔后相当长的时期内很少有希望研制出保证所防护的目标完全不受导弹打击的措施。例如英国人在德国后期使用的V—2型导弹面前就束手无策。

3. 提高了现有运载工具的作战航程并提供了研制新型运载工具的巨大动力。布罗迪认为，原子弹不仅大大增加了现有运载工具的作战效果，而且还

会促使各国优先研制新型运载工具。他认为，如用当时的轰炸机运载原子弹，由于一架轰炸机载一枚原子弹即可达到摧毁一个城市等大型目标，轰炸机可减少载弹重量而增加其载油量，从而大大提高作战航程。布罗迪还以当时德国的 V 型飞弹为例。他认为，当时德国的飞弹最大飞行距离虽仅有 200 英里，只能载大约 1 吨 TNT 炸药，无线电导航设备也不准确，因此对伦敦的轰炸效果不明显，但如果使用原子弹作为弹头，即使这种导弹当作运载工具，其轰炸效果也将可想而知。伦敦居民中有幸能活下来的人恐怕不是去互相庆贺皇家空军在防空作战中所取得的胜利，而是去为断垣残壁和尸横遍野而悲哀了。

4. 力量对比相对较弱的空军，只要宁愿付出重大代价，也可突破敌国优势空军的防御，抵达目标实施核轰炸。

5. 原子弹数量方面的优势并不能保证在核战争中的战略优势。布罗迪认为，虽然如同在其他类型的战争中一样，在核战争中，需要打击的敌目标无论多少，数量总是有限的，而且摧毁某一个目标所需的炸弹也是有限的，超出这个限度即为浪费。当然，各国都可能希望从数量优势中捞取政治资本。但是从纯军事角度来讲，如果交战双方各用 2000 枚原子弹即可摧毁对方，那么一方拥有 6000 枚，另一方只有 2000 枚，这种数量上的重大差别对战争的胜负来讲并没有什么实际意义。

6. 不应过高估计原子弹用于秘密破坏活动的可能性。布罗迪认为，由于原子弹的引爆机制复杂等技术原因，原子弹在相当长的时期内难以实现小型化，因此派遣特务人员携带原子弹潜入别国或利用当地秘密制造的原子弹进行颠覆破坏活动的可行性几乎不存在。

7. 世界上可用于制造原子弹的原材料几乎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布罗迪认为，当时的原子弹已经令人感到可怕，但更加令人感到恐怖的是，制造原子弹所需的原料在自然界比比皆是，取之不尽，用之不竭。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很可能制造尽可能多的原子弹。这一点已经为后来美国和苏联研制和生产核武器的做法所证实。这两个核大国所拥有的核武器的数量已足以将整个世界摧毁许多遍。

8. 无论美国如何保守秘密，其他大国将在 5~10 年内掌握大量生产原子弹的能力。许多美国人在本国掌握了原子弹后不禁沾沾自喜，认为美国将在相当长的一段历史时期内垄断原子武器。有人认为别国的原子弹不是他们自己这一辈，而只是他们的孙辈所需担心的东西，还有人称，只有美国才有足够的财富、原料和工业资源来制造原子弹，即使像前苏联这样的大国，虽然在理论研究方面进展很快并有可能迅速赶上美国，但其工程制造技术落后，试验设备不足，因此难以在短时期内研制出原子弹。而布罗迪没有如此乐观。他认为不能以美国研制原子弹的速度来衡量他国的进度。布罗迪之所以估计其他国家可以在较短的时间内研制出原子弹，很重要的一项因素是他认为美国未能保守住制造原子弹的秘密。就在美国投下第一枚原子弹轰炸日本数日之后，美国便发表了所谓的“史密斯报告”，并随后以书籍形式将该报告广为传播。布罗迪指出，尽管陆军部人士声称该报告未泄漏任何秘密，但参与研制原子弹的科学家却承认“史密斯报告”中列举了他们截至 1942 年时所掌握的所有东西。布罗迪特别提醒国人注意，从 1942 年到美国最终研制出原子弹只有两年半的时间，而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和美国科学家一样是天才，切不可为美国科学家只要两年便可研制出的东西，其他国家的科学家就必须用

20 年才能搞出来。

上述 8 大特点是原子弹有别于其他武器的地方。但是正如布罗迪反复指出的那样，原子弹并不是一种传统意义上的新式武器。仅仅将原子弹当做一种新式武器来宣传，只能将人们引入歧途。他认为原子弹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绝对武器。其绝对性主要体现在下述三个方面。

首先，原子弹的问世打破了人类武器发展的规律，人类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无法找到防御这一武器的可靠手段。原子弹问世以前，只要有某种新式进攻武器研制出来，人们总可以及时研制出对付这一进攻武器的防御措施。直到原子弹问世前不久的现代武器发展依然遵循着这条规律。例如海军为了对付爆破弹而建造出了铁甲舰，为了对付潜艇，发明了声纳和深水炸弹；空军为了对付轰炸机而研制了歼击机、高射炮；陆军为了对付机关枪和野战炮而研制出了坦克，等等。布罗迪完全承认这一历史事实。他同时更为精辟地指出，进攻武器与防御武器间的关系是此长彼消，此消彼长，并且是互相促进发展的。新的进攻武器研制出来之后，原有的防御武器的作战效能满足不了需要，迫使人们去发展新的防御武器；新的防御武器研制出来之后原有的进攻武器又过时了，人们又不得不去研制更新的进攻武器，如此循环，推动进攻性武器和防御武器的相互发展。但是，自从原子弹问世后，这种循环发展的规律被打破了。在原子弹这种进攻性武器面前，人们束手无策了。人类武器的发展就此“凝固”在原子弹这种进攻性武器上。

第二，原子弹在打破了人类进攻和防御武器的循环发展规律的同时，却又建立了一个武器与战争关系的怪圈。人类所发明的各类武器原本是为了用于战争，但是原子弹这种绝对武器使人类不敢贸然将其用于战争。因为交战双方如果在战争中使用这种武器，战争对双方来讲均意味着毁灭。自从原子弹的垄断被打破以后，各国发展核武器的最终目的不是为了在战争中使用它们，而恰恰相反，是为了互相威慑，为了避免在战争中使用它们。

第三，原子弹从一定意义上改变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原子弹问世之前，世界各国政治和军界人士普遍认可克劳塞维茨关于政治与军事的关系的著名论断：“军事是实现政治目标的另外一种手段。”军人可以用手中的武器，通过战争来达成其他手段无法实现的政治目标。但是当原子弹问世之后，战争，起码是核战争，难以或不可能成为实现政治目的的手段了。交战双方如果在战争中诉诸原子弹这种武器，不仅达不成既定的政治目标，而且还会毁灭政治本身。与此同时，战争的主要实行者军人在原子弹的巨大摧毁力面前惊呆了，对自己手中所掌握的这一毁灭性武器不知所措。布罗迪认为依靠军人不可能找到适当的办法来解决原子弹的问题，而只能依靠政治家来解决。原子弹以及核战争本身由一个军事问题变成了一个纯政治的问题。

原子弹问世后不久，有人声称这种武器将使得突然性在战争中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布罗迪则不以为然。他认为原子弹使突然性这一战争决胜因素的作用减少而不是增加了，突然性在战争中的作用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因为使用原子弹发动突然袭击的一方必须考虑对方的报复。而如果在发动突然袭击前大规模疏散城市人口等对方实施报复时必将打击的目标，则必将暴露己方发动突然袭击的企图，而且对方也会同样进行疏散，从而降低突然袭击的效果。即使己方得以秘密地疏散了人口，但是工厂、城市等基础设施不可能搬走。在对方的报复打击下，这些东西仍将毁于一旦，而它们是现代社会不可或缺。消灭了敌人而自己虽得以生存但却回到了石器时代，这种胜利的代

价是任何人也不会接受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讲，在原子战争中，原子弹的摧毁力大大增加了，突然性的作用反而减少了。至于有人认为发动突然袭击者可瞒住对方，布罗迪认为这种看法只不过是一种天方夜谭。他强调指出，使遭受突然打击的一方不知道打击从何而来是不可能的。尽管远程火箭的发射阵地可能暂时不为对手所知，但究竟是何人发射了火箭不可能不为人知，特别是在仅有少数几个国家拥有原子弹并互相对峙的情况下，各自的对手和敌人很明显，不可能搞错。布罗迪认为虽然原子弹使突然性在战争中的作用不如以往那样重要，但却又使得战争来得更加突然了，即使得本来已经大大加快的和平与战争之间的转换节奏更加快了。航空时代之前，从发现某个国家的侵略企图到该国实际发动侵略战争之间有一个相当长的“缓冲”期，因为无论陆军或海军，其集结、前出、布势，以及发起进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空中力量问世后，飞机，特别是空中战略轰炸机的航程和速度得到长足的发展，大大缩短了这一“缓冲”期。而原子弹的问世又几乎将该“缓冲”期缩短为零。因为侵略国无论用轰炸机还是用远程火箭作为运载工具进行核袭击，被侵略国发现敌人的侵略企图和发现敌人来袭之间几乎没有时间上的间隔。

布罗迪认为，万一将来爆发大规模战争，可能会出现三种情况，即自始至终不动用原子弹或放射性武器；战争爆发后很久才使用原子弹；用原子弹揭开战争序幕或者于常规战争爆发后不久即诉诸原子弹。

布罗迪称出现第一种情况是双方害怕报复的结果，同时也可能有国际法禁止使用原子弹的因素。在这种情况下，双方虽均拥有原子弹但不敢使用这种武器。布罗迪认为出现第二种和第三种情况原因是多方面的。战争爆发后，如果交战双方均拥有原子弹，那么诉诸原子弹的驱动力立即变得十分巨大。双方都可能认为随着战争的进程，自己一方利用原子弹进行作战的能力将会迅速下降。如果在有能力使用原子弹的时候不去使用它，很可能会丧失使用这种武器的时机和能力。另外，军事工业能力较弱且常规军备较差的一方，可能会倾向使用原子弹，以争取军事力量对比上的平衡。此外心理方面的因素也会促使交战双方决定诉诸原子弹，即双方都因为害怕对方率先使用原子弹，使己方陷入被动，所以出现“过激反应”，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抢先于对方使用原子弹。因此，布罗迪认为尽管原子弹具有极大的摧毁力，是一种十分令人恐怖的武器，但是人类在战争中仍然有可能使用它。而对于原子战争中的一些具体问题，布罗迪率先提出了某些颇具启发性的见解。

例如他认为，一个国家一旦决心在战争中使用原子弹，就应该在战争一开始投入尽可能多的原子兵器，争取一举摧毁敌人的全部重要目标。他相信，交战双方一旦迈过核“门槛”，就必将进入一场决死的厮杀。逐步升级，分阶段逐渐加大打击力度的战法是极其愚蠢的。在核战争初期只投入使用少量核武器打击敌人只会将自己置于敌人的大规模核报复的打击之下。因此，布罗迪认为，战争中一旦使用原子弹就必须大规模使用之，争取在尽可能短的时间内达成作战目标，不给敌人喘息之机。至于原子弹的打击目标，布罗迪认为由于原子弹具有巨大的摧毁力，因此适于打击大型目标，而由于原子弹的摧毁力难以控制，因此不可能对传统意义上的“军事目标”和“非军事目标”分而打之。

既然原子弹有如此之大的摧毁力，用轰炸机和远程火箭作为运载工具即可给予敌人以毁灭性的打击，那么在发动核攻击后是否必须侵入并占领遭到

核打击的国家呢？关于这个问题，许多科学家和军事理论家的看法是，用原子弹摧毁一个国家后，完全没有必要去占领这个国家。布罗迪认为这种意见有失片面。持这种意见的人没有看到阻止或尽量减少敌人发动报复的重要性。他举例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和英国为了阻止德国 V- 和 V-1 型飞弹对英国的空袭，对德国飞弹的发射场和生产设施进行了大规模轰炸，其间轰炸发射场就使用了 4 万余吨炸弹，但仍未能有效地阻止德国飞弹对英国的空袭。布罗迪认为，尽管原子弹的推力比常规炸弹的摧毁力有了极大的提高，但是即使使用原子弹，进攻一方也无法做到完全打掉敌人的报复能力。因此在发动核攻击之前，应尽量探明敌人核武器的位置，在发动原子攻击时将此类兵器作为打击的重要目标之一，在核打击之后，迅速派遣部队进入并占领敌核武器的阵地。

布罗迪甚至认为即使敌国已经被打得毫无还手之力，入侵敌国也是必要的，不应半途而废，而应继续施加军事压力，迫使敌国投降并接受控制。布罗迪认为，异国可能会在被占领之前投降，但这仅仅是一种可能，不是一条规律。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日本在遭受原子弹袭击之前已经在战略上被彻底打败，没有任何可能挽救败局，但日本在这种情况下并未投降。诚然，日本是在遭到原子弹袭击后投降的，但当时只有美国一方拥有原子弹，日本并无进行核报复的能力。因此布罗迪指出，在双方均拥有核武器的情况下，任何一方在遭到首次打击后，决不会投降。决心打核战争的国家，必须在发动核攻击或遭到核攻击后，继续战斗。为了更好地组织作战行动，应该将武装部队按功能分成 3 类：即用原子弹进行报复的部队；担任进入并占领敌人国土的部队；抵御敌人入侵的部队。其中第一类部队应疏开部署在偏僻地区，阵地要保密，尽可能藏于地下，配备独立可靠的通信保障系统。其司令官应拥有充分的自主作战指挥权。一旦他确认本国遭到核攻击并且本国最高军事指挥当局被打掉或本部与该指挥当局的通信联络被切断，他应拥有命令发动核报复的权力。第二类部队和第三类部队分别属于担任进攻和防御作战的部队。在常规作战中，进攻和防御任务通常可由同一部队完成，但是在核战争中，进攻和防御这两类部队的职能一定要区别开来。第一类部队，即于核攻击后入侵敌国领土的部队，规模应相对小些，完全职业化，训练有素，装备精良。其任务是进入敌国领土，阻止敌发动大规模核报复，因此其作战行动必须十分迅速有力，争取一举夺取敌分散部署在各地的核兵力兵器的阵地。第三类部队，即防御敌人入侵的部队，其规模应相对大一些，并且应充分发挥民兵和准军事部队的作用。组织此类部队进入防御作战时，必须预先制定完善的计划，其武器、补给物资和通信运输装备的储备必须充足，且应作最大程度的疏散。此类部队也应有作战自主权，较强的机动能力。若需作战略性集中兵力时，应尽量避免在空间上作密集部署。

布罗迪特别注重核战争中的防御作战问题。他强调指出，一个国家遭受原子弹攻击后的防御和反击作战能力，将取决于该国武装部队独立于城市和工业所提供的补给品和支援的程度。国家遭受原子弹攻击后，军队要继续战斗下去，就必须利用已动员的兵力和现有的武器装备进行作战。因为届时城市将一片混乱，正常的交通运输渠道被毁；农村地区和小城镇虽可能未受到直接打击，但由于大城市的崩溃，这些地方的政治经济所依赖的基础没有了，它们也将陷入极大的混乱。因此，为了保证核战争中的防御反击作战能力，最理想的方法是尽量疏散城市人口，对关键工业作合理布局，并提高重建这

些工业的能力，以免在敌人原子弹的打击下，国家陷入全面瘫痪。

近半个世纪以来有关核武器的论著可谓汗牛充栋，但其中在理论的深度和广度上超过《绝对武器》者如凤毛麟角；少数与《绝对武器》齐名的著作，也无不以布罗迪提出的理论见解为基础。而这 50 年来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发展，各国的核战略以至各国的基本防务政策确立和演变，无不证明了布罗迪的预见，无不受到布罗迪理论的深刻影响。

例如原子弹问世后各国研制核武器及其运载工具的做法基本上遵循了布罗迪在《绝对武器》一书中所预言的趋势。布罗迪早在 1946 年就预见到，射程更远，更准确的火箭是比远程轰炸机更优越的运载原子弹的工具。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将会优先研制和发展射程达数千英里的远程火箭。而一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的核进攻和核报复能力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该国的原子弹的运载能力。谁拥有更强的运载能力谁就可以获得更大的威慑力，并将对手置于更为危险的危险之中。事实证明布罗迪的这一预见不愧为远见卓识。例如，前苏联在研制出原子弹后，立即着手研制远程火箭，并一度领先于美国，使美国人在“导弹差距”面前大哗，惶惶不可终日。美国之所以在远程火箭的研制工作上落后于前苏联，并不是因为科学技术方面不如前苏联，而是由于没有认识到布罗迪指出的远程火箭在运载原子弹方面比轰炸机更为优越的特点：如航程更远，可直接从本土发射而无需前方基地，突防能力更强，生存能力更高，等等。美国将原子弹运载工具的发展工作重点放在轰炸机上，先是搞 B-46，后因该机技术性能未达指标，又去研制 B-52。虽然美国先于前苏联研制出了远程喷气式战略轰炸机，但此类轰炸机作洲际飞行时需进行多次空中加油，飞行速度不如远程火箭，作战活动易受天气等自然条件影响，战场突防能力也低于远程火箭。因此到 50 年代末，尽管美国的核弹头数量一直超过前苏联，但是在总的投掷能力方面，美国并不比前苏联强，甚至不如前苏联。当时美国有些人士认为战略轰炸机的作战灵活性要比战略火箭略胜一筹，轰炸的精确度也较高一些，而正是这种看法将美国的研制工作带入了歧途。正如布罗迪分析的那样，原子弹是一种大规模杀伤和破坏性武器，其杀伤和破坏力是难以控制的，人们不可能使用原子弹进行精确轰炸。不过，布罗迪并未否认战略轰炸机的作用。他当时就指出，未来远程战略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飞越六七千英里完全不成问题。而且新的战略轰炸机的巡航高度将会更高，从而较少受气象条件的影响。此外，他在分析海军在核战争中的作用时还强调海军舰只可装备原子弹，从而成为一支令潜在敌国不得不有所顾忌的核报复力量。这里值得注意的是，目前美国战略核打击力量的三大组成部队，即战略轰炸机、陆地洲际弹道导弹和潜射弹道导弹，均已在布罗迪的论述中提及，美国“三合一”战略核力量的构成已具规模。而且从世界上几个主要核大国研制的发展战略核力量的做法来看，凡企图拥有全面的核打击力量的国家，无不像美国一样着力研制和发展这三种运载工具。

当然，布罗迪及其论著的影响主要还是在核战略理论和军事政策方面。尤其是美国的核战略理论和军事政策中，布罗迪的影响随处可见。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大陆一片废墟。当时美国的利益仍然集中在欧洲。但美国再也不能像过去那样依靠欧洲盟国的帮助来保护自己在欧洲的利益和依靠自己的常规力量来保护自己的欧洲盟国了。面对前苏联在欧洲东部的常规力量绝对优势，美国不可能像战时那样在欧洲集结数百万大军与其对抗，而只能利用核武器方面的暂时优势在欧洲实现军事力量的平衡。这样，第二次世

世界大战结束后美国的防务战略和军事战略从一开始就披上了核色彩。而美国战后的第一个防务战略——遏制战略就是在布罗迪的核战争理论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遏制战略的实质就是核讹诈，而布罗迪在其著作中就曾深刻地指明原子弹不仅可以用来遏制侵略，而且很容易产生讹诈这种负面效应。他指出，希特勒之所以能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通过讹诈，兵不血刃地取得了许多东西，就在于希特勒成功地利用了人们对战争残酷性的恐惧心理。而原子弹的问世使这种讹诈更加可行，特别是当拥有原子弹的国家对没有原子弹的国家威胁使用原子弹时，更是如此。

布罗迪的预言应验了。美国这个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联合世界反法西斯力量，打败了希特勒的国家，战后却要步希特勒的后尘，利用手中的原子弹向世界各国人民搞讹诈了。它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至朝鲜战争结束这段时期内，先是利用其对原子弹的垄断。前苏联研制出原子弹后又利用其对前苏联的绝对优势，推行了一项名为遏制，实为核讹诈的战略。

就在美国推行遏制战略期间，发生了朝鲜战争。这场东方社会主义阵营对西方资本主义集团的武装冲突是原子弹问世后爆发的第一场大规模常规战争。美国手中的原子弹不仅未能遏制住刚刚研制出原子弹的前苏联，也未能吓倒没有原子弹的中国和朝鲜人民。战争以美国的失败而告终。在核垄断已成为历史，核讹诈又不见成效的情况下，美国只好放弃了遏制战略。随着前苏联核打击力量的不断发展壮大，不仅美国在海外的利益开始受到前苏联原子打击的威胁，而且美国本土也不再是一块安全的大陆了。美国再也不能用核讹诈来对抗前苏联在欧洲的常规力量优势了，而且还要应付前苏联原子弹的威胁。因此美国认为，为了维护美国本身和盟国的利益，美国必须准备打核战争，于是便推出了大规模报复战略。而这个战略也体现了布罗迪有关核武器和核战争的某些理论。

美国的大规模报复战略实质上是一种全面核大战战略，完全忽视了核时代可能发生的常规战争，使得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数次大规模常规战争中屡屡败北。正如海湾战争以前美国的某些军事战略专家指出的那样，美国自从拥有了原子弹以后，还从未打赢过任何一场大规模常规局部战争。因此美国开始像布罗迪告诫的那样，既要准备打核战争，又要准备打常规战争，并将大规模报复战略改变为灵活反应战略。

值得一提的是，在前苏联解体以前的冷战时期，美国的军事战略无论如何演变，其实质始终为一种核战略，例如灵活反应战略后的“相互摧毁”和“相互确保摧毁”等。这些核战略也是以布罗迪的关于核武器和核战争理论为基础的。与此同时，前苏联等国家的核战略也在不同程度上受到布罗迪的理论的直接或间接影响。

另外，布罗迪在《绝对武器》一书提出了如何控制核武器的问题。例如他指出，原子弹的性质决定了这样一种局面，即任何一个违背协议而偷偷研制出原子弹的国家，可以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恪守诺言的国家；遵守协议的国家越多，违背协议的国家得到的好处越大。因此道义和条约的约束力不可信了，也没有任何一种力量可以阻止一个国家去研制原子弹。这样，控制核武器的目标不是单纯的减少原子弹的数量，甚至也不是彻底销毁这种武器，而是通过一定的措施实现拥有原子弹的国家间的力量平衡，即这些国家所拥有的原子弹可实现互为有效的威慑。从迄今为止各国间进行的核军备控制谈判和达成的核军备控制协议来看，布罗迪理论影响之深远，随处可见。

(王立群 撰)

经济学·管理学

【英】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引发经济革命的鸿著

资本的边际效率会随投资的增加而递减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

假如凯恩斯在 1925 年后逝世，深知他的才华的人们是很难使不了解他的人相信他博大精深的才华。我们 50 年代剑桥大学的年轻一代——他的学生都认为（我甚至揣测连他本人也这样认为），他主要是善于匠心独运，把从马歇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全部经济思想创造性地应用于当前的经济问题。

——奥斯汀·罗宾逊

一、凯恩斯生平简介和学术成就

约翰·梅纳德·凯恩斯(1883—1946)，出生于英国古老传统的发祥地大学城剑桥一个典型的学者家庭。现代西方经济学最有影响的英国资产阶级经济学家。少年时代就读于伊顿公学，主修数学。1902 年以数学和古典文学奖学金进入剑桥大学国王学院，专攻数学。1905 年，他获得数学学士学位。到大学四年级，他从马歇尔和庇古学习经济学。1906 年参加文官考试，名列第二，被选到英国财政部印度事务部工作。他获得了有关政府部门如何行使其职能的丰富知识，特别是学会了不但从学者的角度而且从政府官员的角度来分析实际经济问题。研究者通常只是从复杂的经济活动中抽象出各种规律性的概念和原则，政府官员必须根据实际情况做出决策。建立科学的经济学理论框架，为政府的决策服务，是凯恩斯经济学的一大特色。另外，印度事务部的工作使凯恩斯对印度的货币和金融产生了极为浓厚的兴趣。卢比问题是当时货币领域内最为经济学家所关注的问题。此后，凯恩斯是以在这个问题上研究的杰出成果，而初显一个青年经济学家的锋芒。

1908 年辞去该工作，由马歇尔介绍，到剑桥大学担任经济学讲师。1909 年以一篇概率论的论文，取得剑桥大学国王学院的院士资格。1911 年起长期担任皇家经济学会《经济学杂志》的主编。1913 年凯恩斯出版的第一本经济学专著是《印度的货币与财政》，这本书不仅对所论述的专门问题作了非常成功的分析，而且关于黄金交换本位的古典式叙述，也是引人注目的。

1915 年应征，到战时英国财政部工作。1919 年初，他以英国财政部首席代表身份参加巴黎和会。该年 6 月，因反对赔偿委员会的意见，辞去代表职务，回到剑桥大学教书。1929 - 1931 年任麦克米伦财政和工业调查委员会成员。1930 年任内阁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凯恩斯还善于进行投资和金融投机，通过这些活动，他使自己的财产增加了 50 万英镑。他还担任了不少厂商的金融顾问或董事。二次大战期间，他重进财政部任咨询委员会主要成员。1941 年起任英格兰银行董事。1942 年晋封为勋爵。1944 年以英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出席在布雷顿森林召开的国际货币金融会议，并担任了国际货币基金

组织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董事。1945年作为英国首席代表参加向美国谋求借款的谈判。1946年3月他出席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国际复兴开发银行的第一次会议，与美国财政部长发生尖锐的意见冲突，并对会议的决议感到失望。回国不久，即猝死于心脏病突发。

凯恩斯的确对现代经济学的确立和发展起了至关重要的开创性作用。他的理论的产生在西方被称之为“凯恩斯革命”，甚至许多人把他的影响和哥白尼在天文学上，达尔文在生物学上，以及爱因斯坦在物理学上的贡献相提并论。

凯恩斯一生写过许多论文和专著，1919年出版的《和约的经济后果》和1922年的《和约的修订》，是凯恩斯作为一位才华出众的经济学家成名之作。

凯恩斯于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简论》，是他早期的关于经济政策手段的最接近于系统的阐述。以后《通论》的许多观点都能在此找到思想的源头，凯恩斯是自由党工作调查委员会的积极成员，1928年发表的自由党工业调查报告《英国工业的前途》，其中有几章主要由凯恩斯执笔《货币论》(1930年)，《怎样筹措战争费用》(1940年)等等。

凯恩斯最重要和影响最大的著作，是他在1936年出版的《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以下简称《通论》)。凯恩斯在《通论》中，摆脱了传统观念，否定了建立在萨伊法则基础上的充分就业观点，论证一国短期的均衡收入和就业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他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存在萧条和失业，是因为“消费倾向”、“对资本未来收益的预期”和对货币的“流动性偏好”这三个基本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有效需求不足。资本主义经济不存在自动趋向充分就业均衡的机制，因此他主张政府干预经济，用政府的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刺激有效需求，以实现充分就业。《通论》的出版，在西方经济学界和政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西方经济学家把《通论》称为“凯恩斯革命”，并把凯恩斯与斯密和李嘉图相并列。凯恩斯的经济理论逐渐成为西方经济学的正统理论，资本主义各国政府纷纷采用凯恩斯主义的需求管理政策。

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凯恩斯经济学替代了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成为西方经济学的主源，居于统治地位。它的政策主张为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奉行，成为国家经济政策的主要组成部分。

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奥斯汀·罗宾逊于1947年在《经济学杂志》撰文，悼念他无比敬爱的导师——凯恩斯。他说，“假如凯恩斯在1925年后逝世，深知他的才华的人们是很难使不了解他的人相信他博大精深的才华。我们20年代剑桥大学的年轻一代——他的学生都认为(我甚至揣测连他本人也这样认为)，他主要是善于匠心独运，把从马歇尔那里继承过来的全部经济思想创造性地应用于当前的经济问题。

凯恩斯经济学的理论基础是有效需求理论体系通过国家干预经济以求减少失业的政策主张，一般被通称为就业理论。

凯恩斯认为，在他那个时代，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显著特征是：在产量和就业量方面变动较剧烈，但经济体系则比较稳定。经济体系可以在次正常(指低于充分就业)状态下，持续相当长的时期，既无显著的倾向趋于复兴，也无显著的倾向趋于完全崩溃。充分就业(或近乎充分就业)是很少有的现象，即使出现，也为时很短。凯恩斯自信，他从当代人性的常识所概括出来的心理倾向，能够说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的这一状况。

凯恩斯经济学着重考察总体经济的运行和调节，而传统的新古典经济学注重分析个体经济行为和市场经济的运行和调节。凯恩斯经济学和新古典经济学一起，构成了现代宏观经济学和微观经济学的两个理论体系的基础。凯恩斯的思想博大精深，在深奥、复杂的数学推算背后，往往隐含着他对社会经济现象的理性和哲学的思考。即使在今天，学术界对凯恩斯思想的研究和探索依然未能穷尽，对他的评价毁誉参半。即使是凯恩斯的追随者和支持者，也由于社会、文化背景不尽相同，而对凯恩斯的著作有不同的理解，对理论的阐述和解释有着很大分歧。分歧的持续存在和相互之间的争论，使凯恩斯的支持者基本上分为两个派系：一派是新古典综合派；另一派是新剑桥学派，又称凯恩斯学派。

60年代末以来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经济停滞与通货膨胀并发的现象，使凯恩斯主义经济理论发生了危机。凯恩斯主义理论和政策遭到了货币主义、理性预期学派和供给学派的挑战。西方经济学界单纯注重总需求而忽视总供给的倾向急剧减少，研究重点转向供给方面。凯恩斯的理论是为资本主义辩护的庸俗理论，但是也包含一些有实际意义的因素。

二、《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评介

1936年，《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在完稿两年并经过几度精心修改之后正式出版。

从经济学家的角度来说，《通论》使凯恩斯建立了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而从政治家的角度来看，《通论》是一套完整的解决危机和失业的政策主张。

凯恩斯在《通论》中，首先抨击了传统的新古典学派经济学。凯恩斯采用对照的方法，阐述了自己的理论。他非常强调该书名的“通”字。他认为，占传统地位的古典学派的各项假设，只适用于某种特殊的情况（即充分就业的情况），而不适用于一般的情况。结果是理论与事实不符，应用起来非常糟糕。而他自己的就业理论，既可以解释充分就业的情况，又可以解释低于充分就业的情况，所以是一般理论，即“通论”。

凯恩斯认为他的理论就是关于就业的“一般性”理论，适用于一切就业水平，而新古典经济学只涉及充分就业的均衡状态。第二，凯恩斯强调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使他在研究的基本方法上和马歇尔更加疏远。新古典经济学在分析经济问题时，假定当时的事实和预期的未来情况都是确切知晓的，各种风险都能够计算出它的速率，因此，只要对事实了解无误，理论分析得当，消费者就可以根据确知的情况进行消费选择，以期达到最大的满足，而资本家则冒最小的风险来实现最大的利润。凯恩斯对此并不以为然。他认为，一般来说，人们只对其行动的最直接后果知道得清楚外，其余的只是最模糊的概念了。凯恩斯认为，像欧洲的战前景，使20年后的铜价、利息率，使三、五十年后的财产所有制形式，都是不确定的，“对于这些问题并没有一个科学基础能在它之上进行任何概率计算”。但是，凯恩斯又没有陷入不可知论的泥淖中，他强调有理性的经济人依然能做出一系列关于将来利弊的比较精确的计算。他们行动的原则是：(1)以现在作为将来的指导；(2)对未来前景的正确预测建立在当前对价格和产量的一般认识而加以接受；(3)以大多数人的行为为准则，依靠他人的判断。

凯恩斯首先指出了危机形势下已被证明了的传统经济学的谬误。凯恩斯

尽管承认利率的重要性，但他不认为降低利率就一定能刺激企业作足够保证充分就业的投资。大萧条期间，需求严重不足，企业领导可能如此悲观，即使利息率很低，他们也不多借钱或多投资。另外，减少工资也不是传统经济学家认为的是减少失业的万能办法。首先工人强烈反对降低工资，工会力量强大，工资减得很慢并且带来社会冲突。但是，即使少发工资，一方面严峻的经济环境使大量工人在极低的工资条件下仍然不退出劳动力市场，另一方面消费者的收入和需求又相应减少，足以抵消减低工资的有利作用。传统经济学认为的恢复平衡的两大市场机制，就凯恩斯看来，已经在危机来临时完全失灵。

在凯恩斯认为的将来不确定的情况下，《通论》提出了货币的作用、利息与货币与投资的关系、投资的特点等三个基本观念。当然，凯恩斯的经济理论是以各种复杂的统计数据 and 数学上的推导为前提的，在此前已一一介绍。简言之，凯恩斯创造一个关于货币、产出、就业和价格的总体理论。我们只需了解他的一般思路：即社会总变量取决于有效总需求，总需求又取决于消费倾向和投资量，而投资量又取决于利息率和资本边际效率。因此，最终归结为人的心理规律。而一切都不能靠经济放任主义来扭转需求不足和失业增加的问题。因此最终要依靠国家通过政权的力量有意识地、有效地干预经济生活，以保证社会经济的正常运转。

(一) 就业理论

凯恩斯所说的就业理论，也就是收入决定理论。因为在总量生产函数为给定条件下，国民收入的量值与劳动时间或就业量之间有确定的函数关系。

1. 有效需求

凯恩斯认为，一国的就业水平(或收入水平)是由有效需求决定的。资本家在雇用工人进行生产时，对他们提供的每个就业量，有一个最低的预期收益，以保证他们收回成本并取得最低利润，这个最低预期收益，就是资本家对该就业量所生产的全部商品所拟索取的价格，称为总供给价格。资本家也预期出售这些商品能够取得多少收益，即预期社会上购买这些商品所愿支付的价格。只要总需求价格大于总供给价格，资本家为了得到更多的利润，就会增雇工人扩大生产，直到总需求价格等于总供给价格时为止。这时资本家预期获得的总利润达到最大值，就业和生产也就达到了均衡状态。这种使社会商品的总需求价格和总供给价格相等的社会总需求，就是凯恩斯所谓的有效需求。有效需求的大小将决定就业量是稳定在较高的水平，还是稳定在较低的水平。而不是如古典学派所认为的，就业量始终保持在充分就业的水平。

2. 消费倾向

有效需求是由消费需求和投资需求构成的。凯恩斯认为，消费需求的大小，是由收入和消费倾向决定的。所谓消费倾向，意指消费和收入之间的一种函数关系。如果用 Y 表示收入， C 表示消费，则 $C=f(Y)$ 。消费倾向又有平均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倾向之分。平均消费倾向表示消费占收入的比例，即 C/Y 。边际消费倾向表示消费增量占收入数量的比例，即 C'/Y 。凯恩斯从先验的人性出发，得出一条所谓的基本心理规律，即一般来说，当收入增加时，人们的消费支出也增加，但消费支出的增加量低于收入的增加量，所以 $0 < C'/Y < 1$ ，即边际消费倾向是小于 1 的正数。由于消费需求不能和收入

(总供给)同步增长,随产出和收入的增长,总供给和消费需求之间的差额即储蓄就会不断增大。假设消费倾向不变,则除非投资需求不断增大,弥补这一差额,否则就业量就不能增加。凯恩斯认为,资本主义经济并不像“古典”学派即马歇尔、庇古等人所假定的那样,当就业和产出增加时,总有若干力量使投资相应增加,正好弥补收入消费的差额,即投资等于储蓄。而是消费倾向这一心理因素所造成的消费需求不足,并没有为投资需求的增加所弥补。有效需求的不足,使经济体系在低于充分就业的水平就达到了稳定均衡的状态。这时,由较低收入水平所决定的储蓄与投资正好相等,就业不足的状况长期维持,经济社会不存在自动趋向充分就业的动力。

3. 乘数

由于消费倾向在短期内十分稳定,因此要实现充分就业就必须从增加投资需求这方面着手。凯恩斯指出,增加一笔投资所引起的收入增加量,并不限于增加的投资量。只要社会存在闲置的生产资料和失业的劳动者,投资变动就会使收入和产出的变动,产生一种乘以倍数的扩大效果,这扩大的倍数就是乘数。凯恩斯的投资乘数理论发展了凯恩斯在剑桥大学的学生卡恩(R.F.Kahn)于1931年提出的乘数概念。

在资本主义出现萧条和失业时,凯恩斯主张采取措施,刺激投资的增加。如果企业部门的投资仍不足以使经济体系达到充分就业,凯恩斯就主张直接增加政府的支出和公共投资。因为政府支出和私人投资一样,也会引起就业和产出按乘数原理多倍增加。他主张政府负起更大的责任来直接组织投资,增加政府开支,为此出现财政赤字并不会引起总需求过多的通货膨胀,因为就业工人的增加引起总供给相应的增加。因而总需求与总供给将在更高的就业水平达到平衡。

4. 资本边际效率

凯恩斯把投资需求作为影响有效需求的最重要的动态因素,而投资量则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决定的。资本边际效率是指,增加一笔投资,预期可以得到的利润率。它取决于资本资产(如机器设备、厂房等资本品)的供给价格和资本家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凯恩斯是指重置成本)或者原始投资成本,是不难知道的,但是资本资产的预期收益则因人们的判断不同而有很大的变化。这需要预期整个经济增长的状况,需要对产品市场进行研究,需要估算可能的销售收入。因此,资本边际效率主要是由资本家对资本资产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个基本心理因素决定的。根据凯恩斯的定义,把一项资本资产在它寿命期内各年的预期收益,按某一折现率折成现值后,正好等于该项资本资产的供给价格,这一折现率就是它的边际效率。

所谓资本边际效率,就是一笔投资预期的收益超过投资成本的金额的收益率,更通俗地说,也就是资本家进行一笔投资时预期会赚得的利润率。

资本家进行投资时,不但要看资本边际效率的高低,还要看利息率的高低。如果资本边际效率低于现行利息率,资本家就不会增加投资,他会把这笔资本存入银行或购买债券以取得利息。只有当资本边际效率高于现行利息时,资本家才会增加投资。凯恩斯认为,投资的增加,使资本资产增加,其未来收益势必下降,而资本资产的需求增加,又会使它的供给价格提高。因此,资本的边际效率,会随投资的增加而递减。但是,只要资本边际效率还高于现行利息率,资本家还会继续增加投资,直到资本边际效率下降到等于

现行利息率时为止。因此，假设现行利息率保持不变，投资量的多少，将取决于资本边际效率的高低。然而，资本边际效率的高低，又取决于资本家对投资未来收益的预期这个心理因素，取决于资本家对投资前景、获利可能性的信心如何。因此，凯恩斯说，资本家的投资活动，往往是靠他们的一时冲动、油然而发的乐观情绪。他认为资本家对投资前景很容易丧失信心，这是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经济发展受到阻碍的一个重要因素。他主张创造一种能使资本家保持自发的乐观情绪和对投资前途充满信心的环境和气氛，使资本边际效率不致于下降得太大、太快，以便增加私人投资。他又认为，在当时的现实经济生活中，积累的资本量日益增多，有利的投资机会则日益减少，再加上私人投资者的无知所造成的短视和不考虑一般社会利益等，更加剧了资本边际效率的下降。另外，虽然利息率可以由中央银行增加货币供应量而下降。但是下降到某一点以后，它将不再下降，从而无法对投资发生进一步的刺激作用。由此，凯恩斯对货币政策的作用表示怀疑，他认为，在当时的现实环境下，必须采用财政政策，增加公共投资和政府开支，以促进就业和产出的增加。

(二) 利息理论

凯恩斯认为，投资数量是由资本边际效率和利息率决定的。因此，为了使就业理论完整，必须研究利息率的决定问题。

在“古典”学派的理论中，利息是“等待”和“抑制消费”的报酬。利息率由储蓄(资本的供给)与投资(资本的需求)共同决定。假设在某一利息率下，人们自愿储蓄的金额超过资本家愿意进行的投资，即资本的供给大于其需求，利息率将下降，利息率下降会刺激投资的增加。这样，通过利息率的伸缩变化，总会使投资需求始终等于储蓄供给。就是说，不管国民收入和储蓄的多额有多么大，总会有足够的投资需求来填补收入与消费之间的差额(储蓄)，因而总需求和总供给达到平衡的时候，就业量必然稳定在充分就业的水平上。凯恩斯否定了上述传统的、由他的老师马歇尔提出的利息和利息率理论，并提出自己的利息和利息率理论。在凯恩斯看来，利息率的伸缩性并不是如上所说使得储蓄与投资趋向一致，而是使得货币的供给与需求趋向一致。他说，利息是放弃货币流动性的报酬，利息率则是测量人们对放弃货币的流动性的不愿意程度。因此，利息率是平衡现有货币数量和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这两者的“价格”，而不是平衡人们对投资的需求与人们抑制目前的消费的意愿这两者的“价格。”

1. 流动性偏好

人们以现金形式持有财富的愿望，凯恩斯称之为流动性偏好。交易动机、预防动机和投机动机这三方面的流动性偏好，共同决定货币需求量。凯恩斯把人们愿意用货币形式持有收入或财产的心理动机，即“流动性偏好”，作为决定社会就业量的三个“基本心理因素”之一。

2. 利息率的决定

利息率的高低，决定于货币的供给和货币的需求。货币的供给(包括现金和信用货币)，一般是由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决定的，如果假定货币的供给量不随利率的高低而变化，则货币供给量可以看作一个既定的常数。这样，货币供给量和决定货币需求量的流动性偏好函数，共同决定均衡的利息率水

平。

在凯恩斯看来，在一定的货币供应量下，流动性偏好越强，对货币的需求越大，则利息率越高，而高利息率是阻碍投资，从而影响就业率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他主张国家货币当局用增加货币供应量的办法使利息率下降，以刺激投资。凯恩斯又认为，即使中央银行大量增加货币，可能仍然无法达到充分就业。这就因为，利息率下降到一定水平时，人们认为利息率太低了，以后必定会上升，而债券的价格则太高了，以后必定会下跌。在这种情况下，购买债券将面临资本损失的风险，于是人们增加货币的持有。这时，中央银行增加的货币供给量，全部为人们所吸收，而利息率则保持不变，出现了所谓的流动性陷阱。另外的原因是，如果长期萧条使投资获利的远景非常黯淡，这时即使国家货币当局能够成功地使利息率下降，也难以使投资增加到足以恢复充分就业的程度。由此，凯恩斯认为，在 30 年代大萧条的情况下，政府的财政政策(直接增加政府开支)比货币政策(增加货币供给量，降低利息率以刺激私人投资)更为有效，更为必要。

(三) 工资理论

“古典”学派认为，当失业存在时，工资会下降，从而使充分就业得以恢复。工资率的自由伸缩变化，能使经济社会始终保持充分就业，除非工会或政府出来干涉，形成刚性工资，并导致长期失业。凯恩斯不同意用降低货币工资的办法来增加就业，他认为，如果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都不足以维持充分就业时，降低货币工资率并不能恢复充分就业。因为，降低货币工资率会相应地降低社会总需求，使市场进一步萎缩，使物价下跌，这又会使资本家的债务负担加重，丧失投资获利的信心。由此，要使货币工资的削减对就业产生积极的影响，就必须使货币工资的下降对整个社会的消费倾向、资本边际效率或利息率产生积极的影响。然而，能不能产生这些影响是很难断定的。此外，削减货币工资会在政治上造成不良后果，并提高流动性偏好，使利率不能下降。所有产业的货币工资很难同时而又同等地予以削减，工人们必然进行抵抗。最后，维持货币工资不变而仅增加货币供给量，其对实际工资所产生的影响与维持货币供给量不变而仅削减货币工资所产生的影响完全一样。因此，凯恩斯主张，与其削减货币工资而遭到工人的反抗，不如实行一种刚性的货币工资政策，在保持货币工资不变的同时增加货币供给量，用通货膨胀的办法来降低实际工资、提高资本的边际效率，从而刺激资本家的投资。

(四) 货币理论

传统的货币理论认为，货币只是使交易更为便利的流通媒介。人们持有货币只是为了保持一定的购买力，人们取得货币后都会立即用它来购买其他的物品。这样，任何的卖都意味着买，也就是说，供给会创造自身的需求(即萨伊法则)。“古典”学派相信，在完全竞争的条件下，供求力量会使经济社会保持在充分就业的产出水平。货币数量的变化，不会影响经济活动的实际量值，只会改变经济活动的名义量值，并决定经济社会的一般价格水平。所以，货币是中性的，它只是实际经济体系上的一层“面纱”。为此，传统的

经济理论把货币因素排除在经济理论体系之外。凯恩斯在《通论》中摆脱了这种观点。他认为货币不仅是一种交换媒介，也是最利于储藏的财产，它还可以用于投机的目的。人们可能把货币作为财富储藏起来，而不去购买。因此，需求不一定等于供给。他认为货币数量的增加可以降低利息率，如果利息率降低的幅度足够大的话，就会刺激投资活动，从而增加总需求。在总需求增加时，如果仍有失业存在，就业和产出的水平就会随总需求的增加而提高。可见，货币并不是中性的，货币数量的变化会导致就业和实际产出的变化。但是，当利息率降低到一定水平时，会出现流动性陷阱，这时货币供给量的增加就不能使利息率降低，也不能使投资和就业增加。

传统的理论从充分就业出发，认为人们持有的货币为收入的一个稳定的比例，这样产出水平是既定的充分就业水平，货币的收入流通速度又是一个常数，因此货币供给量对物价产生直接的影响，货币数量的变化引起物价水平的同比例变化。凯恩斯否定了这种货币数量说的观点。他认为，货币供给量对物价并无直接的影响。货币数量的增加，会刺激投资和总需求。当存在大量失业时，总需求的增加会促进就业和产出的增加，物价水平则不一定上涨。当就业水平已相当高时，总需求的增加才会引起物价的上升。

凯恩斯还认为，消费倾向和投资倾向都是“实际的”倾向，与货币供给量无关，如果总需求过大，物价将上升，而不管货币供给量是否增加。反之，如果总需求不足，则不管货币供给量是否减少，物价水平将趋于下跌。

国家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是凯恩斯政策主张的前题。凯恩斯认为，在失业情况严重时，单凭市场价格机制无法把资本主义经济调节到充分就业水平，必须由政府干预经济。凯恩斯对比了19世纪和20世纪的资本主义发展势态，他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的病情严重，只靠资本主义经济的自动调节作用，私人领域的分散活动，远不能及时地挽救资本主义的灭亡。他说“19世纪内，……物价相当稳定；……当然，平均就业量要比充分就业低很多，但也没有低到令人不能忍受，以致引起革命”的地步。相形之下，20世纪的失业情况就严重得多了。凯恩斯提出的国家调节经济的主要方针就是“国家必须用改变租税体系，限定利率以及其他办法，指导消费倾向“并且”把投资这件事情由社会来总揽”。当然，凯恩斯并不想触犯资产阶级利益，认为没有必要把社会上大部分经济生活包罗在政府权限以内。他强调“国家之权威和私人之策动力量互相合作”。凯恩斯这种公私合作的经济就是后来西方经济学家所说“可调节的资本主义”或“混合经济。”

既然在面临危机和失业时，国家应采取政策进行调节，那么该从哪里着手呢？凯恩斯认为，国家对经济干预的形式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是运用财政政策，二是运用货币金融政策，其中财政政策是重点。所谓财政政策就是资本主义国家的政府有意识、有目的地通过国家财政收入(收入)和支出(支出)来影响有效需求(或国民收入)和总就业水平的政策。货币政策则是由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央银行有意识地变动货币数量和利息率，以影响经济活动的政策，又称金融政策。

在《通论》出版以前，凯恩斯是以他的货币政策著称于世的。他强调货币政策的有效性。在1923年出版的《货币改革论》一书中，他主张利用货币政策稳定价格水平，以便维持一个高的就业水平。但是1929年爆发的资本主义世界经济危机，证明货币政策无法解决资本主义的失业问题。面对这种困境，凯恩斯改变了政策主张，认为要想从危机中复苏过来，必须政府兴办公

共工程，带动就业。于是一向是货币政策的坚定支持者的凯恩斯，从此改变为财政政策的积极拥护者。

1944年5月发生了一件对凯恩斯而言意义非凡的大事：战时联合政府发表了一个提出战后就业具体计划的《就业政策白皮书》。该白皮书是凯恩斯个人的胜利，他的经济理论真正付诸应用，指导就业计划。亚当·斯密的思想经历了半个多世纪才从书本上走到生活中去，而他的理论只经历了15年，这正是他个人的成功所在！

(舒元 撰)

【美】熊彼特：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对资本主义前途的“创新”性探索

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统计学家，特别重要的是一位史学家，那就不配作为经济学家。

——熊彼特

作为一位综合一切经济门类的大师和一位博学的学者，熊彼特在当代经济学家中，保持有独一无二的地位。

——哈伯勒

一、熊彼特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1950年1月8日的深夜，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熊彼特因突发脑溢血而在睡梦中与世长辞，享年67岁。众多经济学家惊闻这一消息后，纷纷发表文章以示悼念。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西蒙·库兹涅茨认为他是“一位学识渊博，兴趣广泛，具有卓越洞察力以及具有敏锐判断力的学者”，并称赞他“实质上是一位史学家和社会哲学家”，另一位著名经济学家赫伯特·基希则称熊彼特是“现代社会科学的巨人”。

熊彼特，美国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熊彼特在西方经济学界享有很高的声誉。他的研究领域广泛，对政治学、历史学、社会学都非常谙熟，其经济理论也是复杂的和广泛的。他常把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联系起来分析，创立了把经济理论、经济史、经济统计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他的经济理论的核心是创新理论及经济发展理论。以创新论出发，他证明了，资本主义制度由于自身内在逻辑的发展，迟早要被社会主义制度所取代。他的经济发展理论被归结为处理经济周期中的自发性和间断性的变化。他的经济理论对后世产生了重要影响。熊彼特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发展理论》(1912)、《经济思想和方法》(1914)、《帝国主义和社会阶级》(1927)、《经济周期》(2卷，1939)、《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1942)、《10位伟大的经济学家》(1951)、《熊彼特论文集》(1951)、《经济分析史》(1954)等。在这些著述中，熊彼特提出了一个全新的经济概念——创新，并以此为基础构造其理论体系，从而在西方经济学界独树一帜。

然而更为人称道的是他渊博的学识，和他研究范围的广泛和复杂。经济学家哈伯勒在悼念文章中写道：“作为一位综合一切经济门类的大师和一位博学的学者，熊彼特在当代经济学家中，保持有独一无二的地位。”他自己亦曾说过：“一位经济学家，如果不同时是一位数学家，一位统计学家，特别重要的是一位史学家，那就不配作为经济学家。”但实际上他的视野远超过这三个领域，他还广泛涉猎法学、社会经济理论知识，这也不是其他经济学家可以匹敌的。近现代西方经济学家对英美经济学具有丰富素养者，大多

对欧洲大陆经济学家的经济理论不甚熟悉；而欧洲大陆的经济学家，由于受到对正统经济学的批判的传统影响，真正能掌握正统经济理论的并不很多。熊彼特不仅二者兼备，对西方古代经济学说亦曾广泛涉猎。渊博的学识和宽阔的视野使他认识到，经济学与其他学科的内在联系是不可割裂的，因为把经济现象与非经济现象区分开来只是为了科学研究的方便。

尽管如此，他在学术研究上所取得的重大成果仍是在经济学领域，因为他将主要精力还是放在经济学上，这使他当之无愧地成为当代最有影响的经济学家之一。

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评介

《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是熊彼特论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问题的一部具有广泛影响的著作。他以创新理论为基础，认为资本主义不能活下去，社会主义行得通，资本主义可自动过渡到社会主义。该书英文版于1942年由哈珀兄弟出版公司出版后，1947年和1950年两次再版，后被译成德、西班牙、法、意大利、日等文字出版。中文版由绛枫根据其第3版翻译，商务印书馆1979年出版。

本书作为熊彼特生前最后一部著作，标志着他的理论体系的完成。他在本书中利用瓦尔拉斯、马歇尔等的均衡理论和自己提出的创新理论，将经济学和社会学结合起来研究社会制度形态问题。这种分析是在批评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和剩余价值理论的基础上进行的。

熊彼特在西方经济学界被公认为博学多闻、兼收并蓄的经济学家。他受教于奥地利学派的几个代表人物，但也很赞赏马歇尔和魏克赛尔的理论，十分推崇洛桑学派创始人瓦尔拉运用数理方法建立的一般均衡理论体系。从他的哲学、政治、社会学和经济观点可以看出，马克思的著作对熊彼特有相当大的影响。他的代表作有：《经济发展理论》（1912年），《产业循环：资本主义过程的理论的、历史的和统计的分析》（两卷，1939年）和《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1942年）。熊彼特的另一部巨著《经济分析史》生前未完成，1954年由他的妻子伊丽萨白编辑出版。此外，《从马克思到凯恩斯十大经济学家》系根据他从1905年到1950年所写的一些传记评论，于1952年由他的妻子编辑出版。

熊彼特的3本代表作贯穿一个中心思想：通过他定义的“企业家”的“创新”，从理论的逻辑推论说明，资本主义由于自身的内在逻辑的发展，或迟或早，有朝一日终将由社会主义所取代。熊彼特认为，他的这种看法是与马克思相同的。熊彼特说，“实际上，马克思所以有别于同时代和前代的经济学家”，正是因为他认为经济发展的特定过程是经济制度本身所产生的这一看法。在任何其他方面，他只是采用或修改李嘉图经济学的概念和命题；但是被放在次要的黑格尔背景里的经济发展概念，却完全是他自己的创见。在《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和民主主义》的序言中，熊彼特说：“本书是把我40年来对社会主义这个题目所作思考、观察和研究的大部分，集合成为容易读的一本书的努力的结果。”不用说，在熊彼特理论体系中，不仅价值、利息、利润等概念，包括像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名词，熊彼特与马克思都是截然不同的。该书分5篇28章，现提要基本观点如下。

(一) 马克思的学说

马克思的经济史观或“唯物史观”是社会学方面的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其真正意义为：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是社会结构的基本决定因素，生产方式有其自身的逻辑。以经济史观为基础，马克思提出了社会阶级理论，以生产手段及消费的占有为依据，将资本主义社会的阶级划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对立的基本阶级。

熊彼特承认马克思的学说是伟大的创作。其伟大在于它强大的生命力和深远的影响。但他又称马克思为先知，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一种宗教，承认是它的信徒，第一，它提供了一整套最终目标，这些目标体现着生活的意义，而且是判断事物和行动的绝对标准；第二，它提供了达到这种目标的指南。熊彼特说，宣讲最后目标是无效的，分析社会过程只会引起一二百个专家的兴趣。但是，穿上分析的外衣讲道，以无可超越的力量，系统地表述了被阻挠和受虐待的感觉，这就是马克思主义所以能赢得人们的热诚皈依的原因。熊彼特说，马克思从不以自己设定的理想教导别人。犹如每个真正的先知把自己说成是他的上帝的卑微的代言人一样，马克思也只宣讲历史的辩证过程的逻辑。正是在这一意义上，人们认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思想和社会主义意志可以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的原因。

熊彼特反对把哲学作为理解马克思体系的关键。他指出，马克思的论证到处根据社会事实，他的一切命题的真正源泉，没有一个导源于哲学领域。作为社会学家的马克思在工作中所依靠的武器主要是广泛掌握历史和当代的事实。对这些事物，他是以穿透崎岖的不规则的表层，并且以深入历史事物的宏伟逻辑的眼光来领会它们。他用以表述这个逻辑的企图成果，即所谓经济史观，毫无疑问是迄今为止社会学方面最伟大的个人成就之一。熊彼特认为，经济史观的意义，并不是指人们有意识地或无意识地，整个地或主要地被经济动机所驱使的。正相反，关于非经济动机及其机制的解释和对于社会现实怎样反映在各个人精神上的分析，是这个理论的主要组成部分，也是它的最重要的贡献之一。这个理论的真正意义可以归结为两个命题，其一是生产方式或生产条件决定社会结构，社会结构则产生各种动机、行动和文化；其二是生产方式本身有其自身的逻辑。

熊彼特说，我们可以认为《共产党宣言》中那段认为社会的历史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的名言里，社会阶级这一概念最初登上了历史舞台，如果把它理解为这样一个命题，即历史事变常常可以借阶级利益和阶级态度来解释，各个历史时代中的现存阶级结构总是解释历史的重要因素，那末，这是一个和经济史观同样有价值的概念。但熊彼特又认为马克思没有完成对阶级学说的研究。马克思用所有权作本质特征，没有把阶级理论和经济史观当作互相独立的学说，在马克思看来，前者是以特殊的方法补足后者。由生产方式所决定的社会结构决定历史进程和一切文化，而社会结构是通过阶级来反映的。因此，马克思只能从纯粹经济的角度来分析阶级，这使他不得不把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主要是合作的关系夸张为对抗关系，从而得出阶级斗争推动社会发展的结论。

熊彼特认为，阶级学说作为马克思的一种分析工具，其作用是把经济史观与诸经济概念联系起来，用以解释社会的进化。阶级学说中的社会学论据是以价值、利润、工资、投资等经济概念为中介而起作用的。马克思的经济

理论解剖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结构，指出了资本主义是一种终将自我毁灭，并为社会主义诞生创造条件的经济过程。

熊彼特说，作为经济理论家，马克思是十分博学的人。他是求知若渴的学者，是不知疲倦的工作者。他很少漏掉有重要意义的文献。不论批判和驳斥，或是接受和同意，他总是深入每件事的底层。这可以从他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一书中得到证明，这是具有理论热情的著作。不停止地自学，努力精通应该精通的东西，这很有助于他摆脱偏见和放弃超科学的目的，虽然他的工作确是为了证明一个确定的见解。但是，熊彼特从他自己的理论体系出发，对马克思几乎所有重要的经济理论观点持批判态度。

熊彼特说，即使马克思的论据和推论在现在看来缺点很多，但就其断定资本主义发展将毁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基础这一点而论，仍然不失为真理。马克思把经济过程看成具有自身规律和内在联系的见解也是真正伟大的成就，就足以抵消他的其他不足之处。

熊彼特说，马克思的理论只能从整体上予以把握。在这个整体中，经济学和社会学具有互相渗透、彼此依存的内在联系，一切重要概念和命题既是经济学的又是社会学的。例如，经济学范畴的“劳动”和社会阶级的“无产阶级”在原则上至少是全等的，在事实上是同一的。又如，经济学家所说的职能的分配，在马克思主义的体系中，只采取各社会阶级分配的形式，因而具有不同的涵义。马克思把历史事变、阶级斗争和社会制度纳入经济分析的领域，这种综合使经济理论的幽灵一样的概念开始了呼吸，无生气的定理成为活动、奔驰和呐喊。它并未失却它的逻辑性，但不再仅仅是关于一个抽象体系的逻辑性质的命题，它是描绘社会生活的激烈动乱的画笔。熊彼特认为这样的程序的缺点是，受制于这种概念装置的束缚，虽在生动活泼方面有所收获，但很容易在有效性方面有所丧失。

(二) 资本主义能存在下去吗？

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和方法，是一种进化过程。开动资本主义发动机并使它运转的基本动力来自新消费品，新生产方法或运输方法，新市场，资本主义企业所创造的产业组织的新形式。产业突变过程不断以内部使经济结构革命化，不断毁灭老的结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这个创造性的毁灭过程就是关于资本主义的本质性的事实。正是引进创新打击了这些的基础，危及它们的生命。新方法、新商品等经济进步大部分是与完全竞争不相容的，经济进步会产生垄断。垄断企业的生产结构已成为资本主义经济进步的最有力的发动机，完全竞争并不能带来高效率。

资本主义发动机的运行动力是新企业、新投资所能有的机会。但现在投资机会正在减少乃至消失。投资机会消失与人口增长、新土地开发、技术可能性等没有必然联系，而主要是由企业家职能削弱和敌视资本主义的政治权力及社会心理状态的增长引起的。

投资机会消失首先根源于企业家职能的削弱。企业家职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利用一种生产新商品或以新方法生产老商品的新的技术可能性，通过开辟原材料供应的新来源或产品的新市场，通过重组产业等来改革生产模式或使之革命化。这些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早已在丧失之中，而将来还会加速地丧失下去。因为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了，技术进步愈来愈成为

专家的业务，经济进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构和委员会的工作日益代替人的活动。自动化使资本主义企业趋于成为多余的东西。完全官僚机关化的巨型产业集团不仅会赶走一批中小企业，剥夺其所有者，最后也会赶走企业家，并剥夺整个资产阶级。资本主义进化还倾向于被伤以前同它联合的阶级的社会威望和社会权势，同时打击资产阶级产业的较低阶层，打击财产和自由契约制度，从而毁灭资本主义社会体制。

资本主义进化还产生了一种敌视自己的政治权力的社会心理状态。资本主义创造了一种思想批判气氛，在毁灭了其他制度的道德威信后，回过头来反对自己的道德威信，合理主义打击了私有财产和资产阶级的整个价值体系。这样，资产阶级的堡垒在政治上就变得没有防御了，这种无防御与对于资本主义秩序的敌意之间存在着高度的相互依存关系。同时，资本主义创造、资助了一个对社会骚动很感兴趣的即得利益集团——知识分子，他们刺激、组织、表达了人民对资本主义秩序的敌意。日益增大的敌意使立法行政和司法措施、企业家和资本家最后将不再起作用。他们的典型目标将变成无法达成的目标，他们的努力正变为白费功夫的努力。总之，资本主义过程不仅毁灭了自己的体制，而且为另一个体制——社会主义体制创造了条件。

本书第二篇，熊彼特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历史进程和它的发展变化的内在机制。

熊彼特否认资本主义能活下去。虽然熊彼特与马克思的结论一致，但两者的论据截然有别。在熊彼特看来，资本主义并非是在经济失败中崩溃的，恰恰相反，是它的巨大成就毁坏了自身的社会制度，创造了导致资本主义必然灭亡的诸条件，同样的条件使社会主义终将取代资本主义。

熊彼特从分析资本主义的成就入手，他以总产量增长率为标志来检验资本主义在经济上的历史业绩，从中得出乐观的展望。他认为，如资本主义能够保持它已达到的经济增长速度(经过一系列扣除之后，假定这一长期增长率为2%)，那末，到1978年，人均实际收入将为半个世纪前的2倍，按现在标准称之为贫困的一切东西都将被消灭。失业虽然不像贫困那样可以在资本主义的经济进步过程中消除，但通过失业救济，失业所造成的困苦和堕落大部分将会消灭。

这种经济进步并不是平衡有序地达到的，而是在反映资本主义本质及其机制的经济长期波动中实现的。每一个长波包括一次“产业革命”以及新技术的普及。它导致繁荣与萧条的交替，改造了现存的产业结构，大大丰富了消费物品的川流，提高了民众的生活水平。

对资本主义未来的经济增长只能作出预期。显然，只有当总产量增长率和资本主义制度之间存在内在联系时，预期资本主义能够重复以往的经济成就才是合理的。

于是，熊彼特着手论证这种内在联系。他认为，资本主义社会是按照纯粹经济的模型塑造的，奖励和惩罚是用金钱来衡量的，上升和下降的意思就是挣钱和赔本。这种刺激——动力结构吸引了大量的优秀人才，少数成功者得到多得眩目的奖金，大部分失败者则两手空空。但由于存在丰厚的报酬，这种不公平的分配制度就能够吸引、鞭策每一个人，使之竭尽全力。

自然，在这种制度中，个人的最大限度的成就并非是为社会和公众服务，而是与发财致富紧密相联的。经济学家们对此众说纷纭。古典经济学家认为资本家是在利己主义的动机下为社会利益作出了最大限度的贡献。尽管他们

的见解是正确的，但其论证是成问题的。马歇尔证明古典学派的命题，在完全竞争中，生产者对利润的追求会使生产扩大到最大限度，使社会资源充分利用。但事实上完全竞争并不是常规而只是例外。当垄断竞争、寡头垄断占优势时，马歇尔、魏克赛尔这一代经济学家的许多命题将变得无法应用或极难证明的了。

一些赞美完全竞争的经济学家批评垄断企业保持高价和限制生产，熊彼特为此极力辩解。他说，对垄断大企业的指责是完全错误的，虽然上述论点所依据的观察和得出的定理是正确的，但这只不过出自现实中的某些片断，从这些片断中得不出关于资本主义本质的结论。

那末，什么是资本主义的本质呢？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在本质上是经济变动的一种形式或方法，它从来不是并且永远不可能是静止不变的。资本主义进程的基本推动力出自创新，即出自被引入经济领域的新消费品，新的生产或运输方法，新市场和新的产业组织形式。这些因素导致资本主义经济结构的内部革命，不断毁灭旧的结构，又不断创造新的结构。所以，资本主义的本质是创造性的毁灭过程。

认识到这一点将使我们重新理解某些传统观念，尤其是改变对完全竞争的赞颂。传统经济学研究的是关于价格、生产方法的竞争，而真正有价值的是来自创新的竞争，它打击的不是现在企业的利润和产量，而是消蚀这些企业的基础，危及它们的生存。这种竞争在长期会产生和完全竞争十分类似的结果。进行创新的主要是垄断企业。这些企业往往被指责为通过限制产量来达到利润极大化并维持既有地位。但熊彼特认为，这种行动在创造性的毁灭过程中具备了新的意义，如此的价格战略使投资分摊更快，从而减少企业投资的风险，它与其说是遏制了扩张，毋宁说是保护了扩张，正是这样才能引诱资本投向没有走过的羊肠小道，否则新企业是不可能建立起来的。

熊彼特反驳了垄断企业造成价格刚性和阻碍技术改进。他认为，实际上垄断企业更能利用较为优越的生产方法，这是垄断企业的突出特征。垄断价格并不必须比竞争价格高，垄断产量并不必然比竞争产量少。如果说利润中可能包含着垄断赢利在内，那末，这只不过是资本主义颁发给成功的革新者的奖金。熊彼特的结论是：完全竞争与经济进步是不相容的。垄断企业已成为总产量长期增长的最有力的发动机。

资本主义能一如既往地推进经济进步吗？经历了 30 年代的大萧条之后，不少经济学家感觉到出现了资本主义某种活力永久丧失的征兆。按照马克思的理论，资本积累和资本集中会使平均利润率有下降趋势，利润率下降又会影响投资，投资机会的部分丧失将使资本主义制度垮下去，所以熊彼特又转而研究投资机会是否会日益消失的问题。熊彼特认为，既然资本主义本质上是经济和社会变革的过程，那末投资机会的多少不可能恒久不变。但是，对导致投资机会减少的因素和机制并不值得大书特书，因为人类的欲望不可能达到饱和状态。新的需求又产生了新的投资机会，技术突破的可能性是没有边界的海洋，新技术革命将创造一连串新的投资机会。可以信任资本主义发现和创造新机会的能力，因为这是和资本主义本质紧密相联的。因此不能根据投资机会正在日益消失的理论推导出资本主义正走向灭亡的趋势。

但是，熊彼特并不认为资本主义可以永恒地存在下去。他是用他独到的“企业家职能”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日渐消失来论证其结论的。所谓企业家职能是通过利用一种新发明，或更一般地，利用一种生产新产品，或用新

方法生产老产品的没有试用过的技术可能性，通过开辟原料供应的新来源或产品的新销路，通过重组产业等等来改革生产模式，或使它革命化。早期的铁路建设，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电力生产、蒸汽机、钢铁、汽车和殖民地冒险，是一些眩人眼目的大类的例子，其间还包括了数不清的类别，往下数一直可以数到比如制成特种灌肠、牙膏等方面取得成功之类的事情。正是这种活动，造成了使经济机体革命化的周而复始的“繁荣”，以及由于新产品和新方法的扰乱均衡的冲击而引起的周而复始的“衰退”。熊彼特说，着手进行这些新事务是困难的，而且构成一种特定的经济职能，它需要一种仅见于极少数人身上足以说明企业家风格或企业家职能的那种特别资质。这种职能主要不在于发明某些东西或创制出企业得以开发利用的某些条件，而在于把事情付诸实行。

熊彼特认为，这种社会职能的重要性早已在丧失之中，而且将来它势必还要加速地丧失下去。这是因为，一方面，革新本身已降为例行事务了。技术进步越来越成为一伙有训练的专家的业务，他们作出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并使它按照可以预测的方法进行工作。另一方面，周围环境已经变得习惯于经济变革，它不但不抵抗这种经济变化，而且还把它看作当然之事。在这种环境中，人格和意志力量必然不那么重要了。这样，经济进步日趋于非人身化和自动化，机关和委员会的工作日渐代替个人的活动。

熊彼特还指出，资本主义过程正在同它用以破坏封建社会体制的几乎同样的方法，损毁自己的体制。一方面，资本主义过程不可避免地打击了小生产者和小商人的经济立脚点；另一方面，资本主义过程也在大企业的领域内打击它自己的体制。资本主义过程用仅仅一包股票代替了工厂的围墙和机器，夺去了财产这个观念的生命，领取股息红利的大股东和小股东，既无所有者的职能，又无所有者的态度了。财产这个名词包含的实质急剧地消逝了——财产的物质实体(财产的可以看得见摸得着的现实性)蒸发了。其次，深入地研究一下知识分子的社会学可以发现，资本主义和其他类型的社会不一样，它不可避免地，并且它的文化的必然性质一定会创造、教育并资助一个对社会骚动很感兴趣的既得利益集团——知识分子集团。这个集团不得不吹毛求疵，因为它的整个地位有赖于哲人的批判，而对人物和时事的评论在没有任何东西是神圣的局势下，必然会在对阶级和制度的批判中流露出来。最后，资产阶级家庭的瓦解，是导致资本主义灭亡的另一种“内部原因”。极端利己主义侵入了家庭，生育率下降表明人们不愿再为孩子作出牺牲，小而机械化的住宅和社会服务取代了大住宅和仆人。家庭和住宅曾经是资产阶级追逐利润的主要动因。当家庭动机提供的驱动力衰微了，实业家眼中的时间范围就缩短到大体上相当于他的有生之年。他大概不会像过去那样乐于行使他的挣钱、储蓄和投资的职能了。他滚到一种反储蓄的心理状态中去，他越来越甘心接受表现了某种短期观点的各种反储蓄理论。

总之，通过减少企业家和资本家职能的重要性，通过创造一种敌对气氛，在破坏了资产阶级地位的同时，也从内部瓦解了资本主义的原动力。资本主义有一种固有的自我毁灭的趋势，那些促进资本主义毁灭的客观的、主观的、经济的和超经济的因素，不仅促成了资本主义的毁灭，而且也有助于社会主义的出现。资本主义过程不仅毁灭了它自己的体制，同时也为另一个体制创造了条件。

(三) 社会主义行得通吗？

社会主义当然行得通。但这需要满足两个前提条件：一是所要求的产业发展阶级已达到；二是过渡问题能成功地得到解决。

社会主义是指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对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同中央当局掌握，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人方面。即是说，这种集权的社会主义不是由私有或私人经营的企业，而是由公共权力机关控制生产资料，决定怎样生产，生产什么，谁该得到什么东西的一种社会组织。

熊彼特说，社会主义，我们用来指这样一种制度模式，即对生产手段和生产本身的控制权是授与一个中央当局的——或者我们也可以说，在这个社会中，经济事务原则上属于公众而不属于私人方面。这个定义排除了基尔特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及其他类型的社会主义，因此可以称为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但是，这样的中央集权制，它并不必然是专制而独断独行的；也不是指，凡总经理、董事长自己提出的一切创议只能来自这个中央当局。关于第一点，中央当局必须把它的计划提交议会或国会审议，也可能有某种监察或检查权力的机关；关于第二点，中央当局必须把某些行动自由留给“现场负责人”，比如各个产业或工厂的经理们。

熊彼特说，我关于社会主义的定义，就其完全在经济的观点上打转这一点来说，是与其他一切定义一致的。但经济的考虑并不是唯一的，甚至也不是最重要的考虑。我们要记住，社会主义的目的比填饱肚子要高，恰如基督教的意义比某种天堂地狱的快乐主义的价值为高。首先而且首要的是，社会主义意味着一个新的文化世界。

熊彼特说，现在需要阐明的问题是，假定有一个前面所规定的那种性质的社会主义经济，我们能不能在那些根据的基础上，并根据合理的行为规律，合乎逻辑地推导出能有效率地决定关于生产什么、怎样生产的决策呢？回答是肯定的。

熊彼特说，曾挺身出来否认这件事的权威是密塞斯教授。他的论据是：合理的经济行为必须先有合理的成本计算，因此必须先有成本因素的价格和标定它们价格的市场。既然社会主义没有这样的市场，因而不存在合理生产的信号。

熊彼特论证了社会主义的经济效率比资本主义要高。其理由是：一、资本主义经济经常处于经济的短期波动中，而社会主义的生产可以在合理的、最适度的基础上决定，势必能够节约人力和物力；二、社会主义协调经济和分配资源的效率之高是无可比拟的，因而它能消除经济周期性的上升和下降，资本主义却只能缓和它而不能消灭它；三、社会主义的经济增长不是波动式的，它可以走生产量增长长期趋势线的道路；四、由于消除了萧条，加强了计划指导，社会主义的非自愿失业和摩擦失业都将减少；五、在社会主义经济中，技术进步可以借法令来加以推广，传播时间更短、抵制更小；六、资本主义的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是互不相容的，政府和企业时常发生冲突和摩擦，这造成浪费和效率下降，社会主义则能使经济机体协调一致，从而避免了这种损失。熊彼特把他的论证归结为一个结论，社会主义走的是垄断企业开拓的道路，但它能超越垄断企业的范围，因而它的经济效率高于垄断资本主义。

设想中的社会主义蓝图是否可行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人的素质。某些社会

主义的反对者认为，在这种经济高度集中管理的社会主义社会中，中央当局要靠神仙来指导，而劳动者应当是天使。

熊彼特对这种非难的反驳是：掌管社会主义经济的担子将比资本主义经理的担子更轻，因为不确定因素、摩擦和冲突将会少得多，所以无须依靠什么神仙。有关“天使”的问题他则强调，社会主义的生存方式要以人的高度道德水准为必要条件。

熊彼特批评了那样一种说法：即一旦消除了剥削和压迫之后，人类本性中的全部美德就能体现出来。他认为，人们道德水平的提高可以通过两条途径：在人的本性不变的情况下，可以通过社会环境的变化而改变人的行为，同时，人的本性本身也是可以改造的，不过，社会主义的可行性并不依赖这一条件。熊彼特指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农民、工人和职员的行为可以是一如既往的。有争议的、最困难的是合理对待资产阶级的的问题。按照社会主义的理论，社会主义诞生与接管权力是同一涵义，资产阶级将从统治地位上被赶下来。但熊彼特争辩说，作为一个文明的社会主义者，应该承认资产阶级的品质和成就，他们不应成为社会主义的牺牲品。相反，要把资产阶级从道德上压迫他们的资本主义桎梏中解放出来。资产阶级的合作，与社会主义的成败休戚相关，因为这一阶级积蓄了人才，不论哪一个社会组织使用这项人类财富都是合理的。所以在社会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仍然应该执行经济管理的职能，并要给予他们合理的报酬，这种报酬主要取决于资源的稀缺性而不是同物质刺激相联系，它可以以精神鼓励为主。

(四) 社会主义和民主

社会主义可能是民主的真正的设想，但许多的社会主义者赞成用革命和专政、暴力和恐怖这样非民主的手段打开社会主义之门，这是违背民主的本意的。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是为了达到政治(立法和行政的)的决定而做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民主本身不是目的。

根据竞争领导权理论，社会主义与民主之间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两者之中任何一个都能没有另一个而单独存在，且两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这与资本主义不同，现代民主在历史上是和资本主义一起兴起的，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且和资本主义是因果相联的，资本主义在其鼎盛时期也十分重视使民主获得成功的任务。

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发动机可以按照民主原则发动。实行社会主义民主必须具备的条件是：满足“成熟的”必需条件，特别是要具有按民主方式建立社会主义秩序的能力；具有充分的能力和经验的官僚机构体系的存在等。

熊彼特认为，如果把古典理论关于人民的作用限于生产政府，就能使民主理论自圆其说了。这样的民主制度是现代民主。现代民主不过是指人民有机会接受或拒绝他们的统治者，现代民主是资本主义的产物，它在历史上与资本主义同时兴起并和资本主义有因果联系。

学者们总是怀疑现代民主政治的行政效率。因为，议会内外的无休止的争斗惊人地消耗了领导者的精力，政策法案和行政法令都屈从于它的“政治价值”，政府不免采取一些没有远见的做法。民主制度造就了职业政治家，但使一个人成为候选人的智慧和品格，并不必然就是一个好的行政长官所必

需的智慧和品格。

上述批评是否意味着民主制度行不通呢？并非如此，熊彼特提出，民主制度的良好运行，有赖于制度之外的一些条件：1.领导者具有非凡的能力和优秀的道德品质，这对民主制度的成败特别重要，唯一有效的保证是，客观上存在一个献身于政治，又经过严格挑选的社会阶层，这一阶层能吸收和同化其他优秀分子以更新自身；2.政治决定的作用范围不能扩展得过大，权力无边的国家机关必须自我限制，一些本属于国家的职能，如执法机构和中央银行，可由政府机关之外的机构来承担；3.除政治家外，政府还需要一批职业官僚，他们必须有出色的工作能力和良好的道德品质，他们不仅要高效率地承担日常的行政工作，还要能够引导政治家作出决策；4.要有一种民主的自制，一切集团都要自我克制，政府的支持者要服从政府的领导，反对党要在规章允许的限度内活动。只有当拥有不同利益的集团对国家的忠诚是全体一致的，对现存社会结构原则的拥护也是全体一致的时候，民主制度才能发挥其全部长处。由这一论点可推出，民主制度在动乱时期是不适用的，此时采用高度集中的领导形式是合理的，但必须规定时限，否则等于废弃了民主。

熊彼特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制度正日益失灵，这部分是因为民主制度不能在对社会制度的基本看法上出现分歧时作良好运行，部分是因为资产阶级没有产生出本阶级的成功的政治阶层，这些事实足以使我们对资本主义民主提出悲观预测。

那末，社会主义与民主的关系如何呢？有人认为计划经济与民主是不相容的，也有人认为只有社会主义才有真正的民主。熊彼特的观点是，社会主义与民主并没有必然联系，二者中的任何一个都能够没有另一个而单独存在，但二者也不是互不相容的，民主制度虽然是资本主义的产物，但它并不必然和资本主义一起灭亡，在适当的社会环境下社会主义可以按民主的原则来运行，并且，由于利害冲突将大大减少，社会主义民主制度能够和经济的高效率并行不悖。在民主的社会主义中，政府在经济管理领域权力的增大并不意味着政治管理领域的相应扩展，但这会产生一个严重的问题，因为社会主义并不存在对政治权力的自动限制。

(五) 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

本书的最后一篇为各社会主义政党史略，其作用在于补足以前各篇，为前面的理论内容提供适当的背景。

社会主义政党经历了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未成熟的社会主义者提出了一些合理的梦想，拟出了社会主义计划的细节或计划的某些变体，对纯粹经济分析也做出了贡献。空想社会主义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区别，与其说是性质上的，不如说是程度上的：空想社会主义者们与阶级运动间的关系是偶然的，不是一个根本原则问题，而对马克思及其以后的社会主义者来说，这种关系就成为根本原则性问题了。

在1875年以后，出现了各种社会主义思潮，如费边社会主义、瑞典社会主义、美国社会主义、工团主义、德国修正主义、奥地利社会主义等，这些思潮各有其特点，影响也有很大差异。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出现的欧洲社会主义政党在政治主张、政治影响上也有着较大差别。

熊彼特为不成熟状态下的过渡阶段描绘了一幅截然不同的图画。所谓不

成熟状态是指，社会主义的建立在物质上、精神上尚无准备，比如，资本主义的技术进步还在进行；中小企业为数众多；政治机构和组织尚不健全；社会主义的主张仍未深入人心；社会主义政党还不能赢得多数；而资产阶级的抵抗则很强烈。于是，过渡不能通过和平途径，只能用暴力革命来夺取政权。在这种过渡阶段中，首先必须控制银行进行通货膨胀，以此来消除过渡时期的经济困难和剥夺资产者，然后要对经济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可能导致原有的资本主义企业无法行使其职能。熊彼特认为，在不成熟状态下进行的过渡，不仅会使法统中断，也意味着恐怖统治。

(程向前 邹正方 撰)

【美】保罗·A·萨缪尔逊《经济学》 ——独领风骚的撼世之作

从经济学教科书中吸吮的第一滴甘泉也会像王子亲吻了睡美人。仿佛我就是为了经济学才来到这个世界的。

——保罗·A·萨缪尔逊

萨缪尔逊对提高经济科学的一般分析方法的水平的贡献，超过任何其他当代经济学家。他事实上重写了经济理论的许多部分，也指出了经济学中各个问题和各种分析技术方面的基本统一性。

——阿沙·林贝克

一、萨缪尔逊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经济学》一书的作者保罗·A·萨缪尔逊是当今世界经济学界的巨匠之一，他所研究的内容十分广泛，涉及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是世界上罕见的多能学者。萨缪尔逊的巨著《经济学》流传颇广，被翻译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种文字，据报道销售量已达100多万册，成为许多国家和地区制订经济政策的理论根据。现在，许多国家将《经济学》作为高等学校经济学专业的教科书。

1915年，保罗·A·萨缪尔逊出生在美国印地安那州噶里城。童年的萨缪尔逊聪明活泼，善于思考，他看问题比同龄的孩子深刻、全面。在小学、初中、高中阶段，他接连跳级，15岁就考入了美国芝加哥大学专修经济学。

进入大学生活后，他高效率地利用时间学习，博览群书。他爱好广泛，课余常把做高等数学学习题作为自我消遣。他对物理学也有浓厚的兴趣。初入大学时，萨缪尔逊年纪虽轻，但沉着稳重，喜欢思考。他对前人的理论总抱着审视的态度，寻觅理论中尚未完善或不合理的地方，哪怕是极小的问题也不轻易放过。

1935年20岁的萨缪尔逊踏入了著名的哈佛大学，他是来攻读经济学博士学位的。他与经济系主任哈罗德·伯班克初次会面，就直截了当地对这位经济学界的前辈说，他要尽快地汲取哈佛的精华，所以准备直接选修二年级研究生的课程。萨缪尔逊的自信、直率甚至说是狂妄在令伯班克恼火之余，不免也让他大吃一惊：“这个年轻人，好大的口气。”

萨缪尔逊早就认定自己是做学问的料子，在大学里，他惜时如金，博览群书，是个门门全优的高材生，荣获了全美大学生社会科学奖章，成为经济学专业最有希望的毕业生之一，并因此而得到了1935年由社会科学研究委员会颁发的首届研究基金，以资助他攻读博士学位。

在哈佛，萨缪尔逊以思维敏捷、知识广博及实干精神而著称，是为数不多的最优级生之一，被誉为“才华横溢的神童”。在萨缪尔逊的师尊中，有以提出“创新理论”而享有盛名的熊彼得、有因研究“投入产出法”而扬名

学术界的列昂惕夫等等。其中，令萨缪尔逊受益最多的是阿尔文·汉森教授。汉森原先是凯恩斯的反对者，但是自《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发表后，他的思想竟发生了 180 度大转弯，不但成为凯恩斯主义的信奉者，而且致力于凯恩斯主义的美国化，于是师生协作，不断宣传凯恩斯主义，并对它做了进一步的补充。这样，汉森和萨缪尔逊便成为凯恩斯主义在美国的主要代表人物。而萨缪尔逊对研究凯恩斯主义所做的贡献远比他的老师大得多。

萨缪尔逊在攻读博士学位时，重新阅读了从威廉·配第到亚当·斯密，从李嘉图到马歇尔·瓦尔拉斯以及帕累托·庇古、凯恩斯等人的著作，得以纵观整个经济思想史，并以新的眼光看待凯恩斯主义。当时社会上对凯恩斯理论中的“投资乘数论”及“就业乘数论”颇为注意。萨缪尔逊认为，凯恩斯主义是从 1929 年 4 月的美国华尔街股票暴跌开始到 1933 年基本停止这一遍及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的历史背景下产生的。凯恩斯的理论对资本主义的发展很有价值。因此，他决定从研究当时社会上急待解决的难题——投资与就业问题入手，来研究凯恩斯主义。

自从凯恩斯在《通论》中提出“投资乘数论”和“就业乘数论”之后，汉森认为乘数论不足以说明问题，原因是乘数论没有说明一定量的投资如何引起收入和就业的增加，也没有明确收入(或消费)的变化如何引起投资的变动。因此只有把加速原理(关于收入或消费量的变化如何导致投资量变动的理论)和乘数论有机地结合起来，才能充分估计乘数的作用，并解释经济增长中的周期波动现象。

萨缪尔逊注意到了乘数论和加速原理相互作用的关系，他在导师的提示下巧妙地把两者合为一体，于 1939 年发表了他的处女作《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并首创经济波动的模型，提出政府开支对国民收入的重大作用。西方经济学界认为，这一开创性的研究是他在经济周期理论方面的重要贡献之一。

1941 年，萨缪尔逊和 W·P·斯尔佩发表《保护和实际工资》一文，被认为是国际贸易理论的重要发展；同年，萨缪尔逊凭着《经济学分析的基础》一文顺利地获得了博士学位，并且被授予 1941—1942 年度哈佛大学最佳经济学论文大奖——戴维·韦尔斯奖。

就在博士答辩的前夕，萨缪尔逊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的聘书，他满怀激情地准备“在那里建造自己的大厦”。

1944 年，萨缪尔逊被提升为麻省理工学院经济学副教授和辐射实验室经济学研究员。1945 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他来到美国战时生产局和战争动员重建办公室任职，并担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这些工作使他有可能会把经济理论应用于实际工作，得以从实践中证实其理论的科学性。同时，也使他有条件搜集资料，为以后的研究积累大量的材料。

1947 年，年仅 23 岁的萨缪尔逊已经是一名正教授了，同年，他还获得了美国经济学会颁发的第一枚约翰·贝茨·克拉克奖章，此奖只授予 40 岁以下最有贡献的经济学家。萨缪尔逊年纪轻轻便有所建树，并得到公认，不可不谓大器早成。然而对于学术生涯一帆风顺的萨缪尔逊来说，这一切只是一个开始，更辉煌的成就还在后头。20 几年后，萨缪尔逊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那一年，他只有 55 岁，而大多数获奖者却都年逾古稀。他还是获此殊荣的第一位美国人，把他的老师和前辈们都抛在后面。

萨缪尔逊的研究，涉及资产阶级经济理论的广泛领域。他根据所考察的

各种问题，采用了多种数学工具，使用了既包括静态均衡分析，也包括动态过程分析的方法，这对当代资产阶级微观经济学和宏观经济学许多理论的发展，都有一定的影响。

萨缪尔逊对静态、比较静态、动态这三者的联系和区别，作了精辟的论述。

在一般均衡论方面，他补充并发展了希克斯关于静态一般均衡稳定条件，进一步讨论了均衡的极大条件，均衡位移和提·查特莱尔原理，并举出了很有说服力的经济实例，说明数理方法的普遍适用性。

在福利经济学方面，萨缪尔逊首先对所有在这一领域中创建各个学说的先驱者的著作进行了分析和评价。尔后，建立起自己的新福利经济学，并和汉森为国家福利论的建立和在实际生活中实施，做出了重大贡献，他的论述被西方经济学界认为是自庇古以来在福利经济学方面少有的理论之一。

在国际贸易理论方面，萨缪尔逊补充了比较成本学说的“赫克雪尔—俄林定理”，对贸易国之间的生产要素价格趋向均等的条件作了严密论证，被西方人士公认为“赫克雪尔—俄林萨缪尔逊模型”。他论述了国际贸易对贸易国利益的影响，被各资本主义国家认为是现代国际贸易理论的一项重要发展。

1948年，萨缪尔逊发表了他最有影响的巨著《经济学》教科书。这本书一出版就立即脱销。许多国家的出版商不惜重金抢购它的出版权，并答应立即翻译成日、德、意、匈、葡、俄等多种文字。

1953年，当《经济学》第三版发行时，萨缪尔逊来到美国预算局任职，为美国政府出谋划策，提倡赤字预算，追逐加速经济增长，从而使美国克服了50年代的“艾森豪威尔停滞”，他也成为白宫中不可缺少的高参。

1959年至1960年，萨缪尔逊被任命为美国总统事务委员会调查咨询小组的顾问。1960年，他被美国总统肯尼迪任命为总统调查咨询顾问和美国国家计划局经济顾问。1958年，他与R·索洛和R·多夫曼合著了《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一书，为经济学界新诞生的经济计量学做出了贡献。

1961年在萨缪尔逊学术生涯中是一次大突破。他再次出任美国财政部经济顾问。同时，他在《经济学》第五版中，把自己的理论体系称之为“新古典综合学派”，并在1961年的美国经济学年会上，对其理论的核心部分、理论体系及其研究方法作了较为详细的解释。他的此番讲解，受到与会者的高度评价，人们一致推选他做该年度学会的会长。

1962年，萨缪尔逊被里彭学院授予名誉文学博士，被博斯特学院授予名誉法学博士。1965年，又被任命为美国联邦储备银行经济咨询委员会顾问，并出任美国国际经济学会会长。

1966年，萨缪尔逊在接受印地安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的同时，出版了《萨缪尔逊科学论文集》。1967年，密执安州大学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1970年，克莱尔门特·雷特·丢特学校授予他名誉法学博士，伊利诺斯州的伊文斯威林大学授予他荣誉奖章。1971年，他获得了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他的爱因斯坦奖。

在许多荣誉中，最使他激动的是，他是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第一个美国人。他从斯德哥尔摩领奖回到纽约时，成千上万的人用最高的礼仪欢迎他。在为他举行的庆祝会上，他满怀激情地向人们说：“我可以告诉你们，怎样才能获得诺贝尔奖金，诀窍之一就是要有名师指点。”他没有忘记精心栽培

他的汉森·阿尔文教授。

萨缪尔逊的主要著作有：《经济分析的基础》(1947年)、《经济学：初步分析》(第1版, 1948年)、《线性规划与经济分析》(与索洛和多夫曼合著, 1958年)、《保罗·A·萨缪尔逊科学论文集》1—4卷(1966年, 1972年, 1977年)等。

二、《经济学》评介

萨缪尔逊对西方经济学的主要贡献,集中体现在他提出的新古典综合理论体系,即他的著作《经济学：初步分析》一书中,该书的题材广泛,几乎涉及西方经济学的各个领域,是目前西方国家最为流行的经济学教科书。自从1948年第1版问世以来,每隔三年修订再版一次,使该著作的内容不断增添,篇幅也不断扩大。

萨缪尔逊曾说过,他的兴趣在于教学和研究。但是他刚刚任教时,所使用的教科书如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等极为陈旧,方法上没有数学分析,内容上没有吸收凯恩斯主义,根本没有反映经济学的变化发展,教师和学生都十分不满。萨缪尔逊决定自己来承担起改写入门教材的重任,并立即付诸实践。1948年,他终于实现了这桩心愿。他的《经济学：初步分析》一经出版便流行美国大学讲坛,它的影响还远远超出了美国的国界,被译成法、德、意、匈、波兰、朝鲜、葡、西、阿拉伯、日、俄和中文等外文,近半个世纪以来已经13次再版,销量达数百万册,至今仍然畅销不衰,影响了一代人的思想。在日本等国被评为优秀的入门教材。西方经济学界的许多人甚至认为,《经济学》是自凯恩斯的《通论》发表以来最重要的英文经济学著作。

经济学的教科书可以说是比比皆是,为什么萨缪尔逊的《经济学》能够独领风骚呢?重要原因之一就是《经济学》中体现着萨缪尔逊深邃丰富的经济学思想。

(一) 经济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

萨缪尔逊指出：“政治经济学是最古老的艺术,最新颖的科学——的确,它在社会科学中,居于首要地位。”学习经济学与我们每一个人有极其密切的关系,甚至可以说,生存本身取决于经济学。那么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象或定义是什么呢?书中列举了六条简短定义后,归纳为:经济学研究人和社会如何作出最终抉择,在使用或不使用货币的情况下,使用可以有其他用途的稀缺的生产性资源在现在或将来生产各种商品,并把商品分配给社会的各个成员或集团以供消费之用。它分析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这个定义在萨缪尔逊看来,包括个人和社会对经济目标、经济体制的抉择,货币流通或实物交易的不同影响,稀缺资源的配置和使用方向,现在或将来生产的选择,分配问题和消费,最后又强调资源配置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以便为个人和社会作出最终抉择提供科学的基础。

萨缪尔逊认为,经济学是一门兼文、理二科的优点加以合并的学科,和其他社会科学如心理学、社会学、历史学有互相重叠之处,经济学的研究方法,有逻辑和几何学的演绎法、统计推断和经验推断的归纳法。由于不能进行人为控制的实验,于是引起了诸如:价值判断的主观因素;意义含混和造

成感情用事的语义学上的问题；大数概率规则，包括正常误差和偏斜的形式；推理的谬误和推断的谬误等一系列方法论上的基本问题。

(二) 基本经济问题和基本事实

萨缪尔逊认为，每个经济社会都必须以某种方式解决三个基本经济问题：在可能生产的物品和劳务中，生产什么和生产多少；如何利用经济资源来生产这些东西；为谁生产这些东西，即收入如何在各人和各阶级之间进行分配。

经济学面临着仍然必须和稀缺相周旋，把稀缺当作生活中一种基本事实。萨缪尔逊试图用生产可能性边界来说明许多基本经济过程，如当经济发展时，如何把日益减少的资源用于必需品的生产；私人的市场与公共的政府之间如何选择；目前消费品和扩大将来生产能力的资本品之间如何选择；阐述技术进步与收益递减等。

关于资本主义自由企业经济，萨缪尔逊认为，基本经济问题主要是由一种价格制度决定的。因而市场机制如何解决上述三大基本经济问题，就构成了经济学的三位一体的一个基本问题。

经济学者往往注意的是整个经济制度的作用，他的目标是社会与国家的政策。但经济学者必须很了解工商业者、消费者和投资者的行为和想法。在萨缪尔逊看来，人们的货币选票影响物品的价格；而价格乃是决定各种物品的生产数量的指南，处于完全竞争下的企业家必须找出成本最低的生产方法，否则他就会亏本而被淘汰掉。

经济学者还应该了解企业需要得到的短期资本和长期资本的办法，以及公司形式，单人业主制和合伙制的优缺点。也应该知道公司的基本的法律权利，以及债券、优先股票和普通股票的一般特点。

《经济学》上册在介绍美国的收入和生活标准、企业组织及所得、劳工与劳资关系等现实问题时，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一个主要问题是工资增长与物价水平之间的关系，如果工资的普遍增长持续地超过生产力的 3% 到 3.5% 的年增长率，那么，价格水平几乎肯定会以通货膨胀的方式上升，而“成本推进”的通货膨胀会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

萨缪尔逊认为，经济学者必须研究赋税的最终归宿问题，即赋税负担最终落在谁的身上，研究它对商品价格、生产要素价格、资源分配工作以及对生产和消费的组成部分的整个影响。这个问题需要动用经济学的一切先进工具来解决它。

(三) 加速原理

加速原理的源头可追溯到美国经济学家 J·M·克拉克(1847—1938)。克拉克注意到，危机时的生产过剩不是消费资料生产扩张带来的，而是由于生产资料产业的大规模扩张所引起的。为说明这种现象，他提出了加速原理这一概念。后来，挪威经济学家弗里希接受这一概念并赋予它更严格的定义。今天这一概念之所以成为分析经济周期的重要工具，应归功于萨缪尔逊将之与乘数理论结合所做的努力。

1. 《经济学》中的加速原理

下表是《经济学》一书中原表的简化。

年度	消费额	设备额	更新投资额	新投资额	总投资额
1	6	60	3	0	3
2	6	60	3	0	3
3	6	90	3	30	33
4	12	120	3	30	33
5	15	150	3	30	33
6	15	150	3	0	3

假设第一年棉丝的消费额为 6 亿日元。这里暂不考虑生产所需原料来看机器设备的情况。假定生产这 6 亿日元的棉丝，需要 20 台单价为 3 亿日元的纺织机，因而需要 60 亿日元的设备费用。并且，为使生产持续进行，每年需要新添一台纺织机进行更新。这里因为只有一个年度，只需更新一台，其金额为 3 亿日元。

在此，新投资就是增加的新纺织机所需要的费用。在第一年，经济没有发展，新投资就为零。新投资额加上每年的更新投资额，就是当年的总投资额，又称粗投资。上述情况下，粗投资为 3 亿日元，以此为开端。

第二年的消费需求仍为 6 亿日元。与上一年度相比，消费没有增长，同时不必增加机器设备，这时的新投资仍为零，但仍有 1 台机器要更新，为此需要 3 亿日元的更新投资。这样，总投资仍为 3 亿日元。

第三年，消费额提高到 9 亿日元，由于消费增长了 50%，在技术水平不变的情况下，就需要增加 10 台机器；10 台机器需要有 30 亿日元的新投资，加上这一年的更新投资 3 亿日元，总投资就是 33 亿日元。

在这里，有关消费的变化如何影响投资的问题，就是加速原理所要解决的问题。上面的例子中，消费增长—单位引起投资按一定比率增长，即消费从 6 亿日元提高到 9 亿日元，增加了 3 亿日元，但新投资却增加了 30 亿日元。这就是说，消费增长—单位引起投资增长了 10 倍，这种投资增长对消费增长的倍数，就叫加速系数。

第四年、第五年和第三年的情形相同。但到第六年，假定消费不再增加和第五年一样仍为 15 亿日元。这样也就不需要新增设备，新投资就从上一年度的 30 亿日元下降为零。由此可见，为了维持高水平的投资，就必须有消费需求的不断扩大。如果消费需求不再扩大，投资就回到消费需求扩大前的水平上。这种消费对投资的关系，就是加速原理的内容。

2. 乘数原理和加速原理的结合

凯恩斯的乘数理论，旨在说明投资对收入和消费的影响。但凯恩斯所使用的乘数分析，存在这样两个问题。首先，是与凯恩斯理论的特征相联系，即他主要关心的是均衡状态，而模糊了时间过程上的问题。按照凯恩斯的分析，投资创造收入；人们根据边际消费倾向进行消费支出，而其支出又创造出收入。凯恩斯用乘数这一概念来说明这种收入与消费的累积过程。但实际上，投资的增长如属短期性的，就只能增加极少的消费，要经过一段期间后，消费才会大量增加。这里就出现了一个时间缺口。因此，不应把边际消费倾向看成是即期消费支出对即期收入的比率，而应视其为即期消费支出对前期收入的比率。假定边际消费倾向为 $1/2$ ，这就表明即期消费为前期国民收入的 $1/2$ 。

凯恩斯理论的另一个缺陷在于，他所说的乘数只表示国民收入增加总额对民间及政府投资的比率，却忽视了被乘数，即投资本身，因而容易使人看不到政府投资增长对民间投资的影响。

而加速原则则注意到消费变动对投资所带来的影响。关于“投资 消费”过程的分析属于乘数理论，而关于“消费 投资”过程的分析则属于加速原理。这样，综合这两个方面，就能够把握住理解经济周期的关键。萨缪尔逊则为此建立了严密的理论体系。

这里，我们引用萨缪尔逊在《乘数分析与加速原理的相互作用》一文中的有关数据，来说明这个问题。

假设政府最初支出 1 美元。这样，国民收入就增加了 1 美元；如边际消费倾向为 1/2，那么第二年的消费支出就是 1 美元的 1/2，即 50 美分。这样，消费支出与前期相比增加了 50 美分，所以投资也要增加；假定加速系数为 1，即增加 1 美元的消费，就诱发 1 美元的投资。那么第二年就会有 50 美分的诱发投资，这部分投资也同样形成等额的收入；另外，第二年政府支出又追加 1 美元。因此，第二年的国民收入就等于：50 美分+50 美分+1 美元=2 美元。

以上计算的结果，列表如下：

期间	经常政府支出	由前期支出所诱发的投资	诱发性投资	国民收入总额
1	1.00	0.00	0.00	1.00
2	1.00	0.50	0.50	2.00
3	1.00	1.00	0.50	2.50
4	1.00	1.25	0.25	2.25
5	1.00	1.25	0.00	2.25
6	1.00	1.125	-0.125	2.00
7	1.00	1.00	-0.125	1.875
...

下面介绍计算国民收入总额的一般公式。

假定以 Y_t 表示 t 期间的国民收入，它包括：(1)最初自生的新投资 G_t (t 表示期间)，(2)消费支出 C_t ，(3)诱发性投资 I_t 。这是因为，国民收入=投资+消费。这点是经济学上计算国民收入的常识，必须铭记在心。收入是企业支付的生产要素(劳动、资本、土地)、价格(工资、利息、地租)的总和，并转化为消费支出。因此，知道了消费支出的大小就能够把握收入的高低。但由于一部分收入被用于储蓄，所以要使企业的经济均衡得以成立，就必须有相当于储蓄额的新投资。因此，消费支出加上新投资额就等于即期的国民收入。这里的新投资包括自生性独立投资和由消费增长引起的诱发投资。

这样，国民收入的计算就表现为如下公式：

$$Y_t = G_t + C_t + I_t$$

如我们在前面曾提到过的， t 期的消费支出 C_t ，等于其前期 $t - 1$ 的收入 Y_{t-1} 乘边际消费倾向之积，即：

$$C_t = Y_{t-1}$$

而诱发投资 I_t ，等于即期消费对前期消费的增量 $(C_t - C_{t-1})$ 乘加速系数之积，即：

$$I_t = (C_t - C_{t-1})$$

又因为 C_{t-1} 等于其前期 $t-2$ 的收入乘边际消费倾向 β 之积，所以

$$\begin{aligned} I_t &= (\beta Y_{t-1} - \beta Y_{t-2}) \\ &= \beta Y_{t-1} - \beta Y_{t-2} \end{aligned}$$

将第一式 $Y_t = G_t + C_t + I_t$ 代入上式得

$$\begin{aligned} Y_t &= G_t + \beta Y_{t-1} + \beta Y_{t-1} - \beta Y_{t-2} \\ &= G_t + (1 + \beta) Y_{t-1} - \beta Y_{t-2} \end{aligned}$$

由这个公式可以看出，已知自生性投资 G_t ，前期的两个消费额 Y_{t-1} 和 Y_{t-2} 以及边际消费倾向 β 、加速系数 λ ，就能够计算收入总额。在此某基础上还可以掌握未来的经济变动。

在上面的公式中，边际消费倾向 β 和加速系数 λ 取值的不同，能够决定收入变动的不同类型。

萨缪尔逊根据 β 、 λ 的取值，列举出收入变动的四种类型：

1. 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系数取值都很小，此时消费增长率很低，所以诱发投资接近于零，追加的国民收入趋近自生性投资乘数的均衡水平；
2. 边际消费倾向和加速系数取值略高，由于经济围绕上述均衡水平作反复的升降运动，其振幅渐次减弱；
3. 上述两项数值更大时，其振幅则不断增大；
4. 当取值极大，诱发投资也极大，消费不断增长，并带来更多的诱发投资，从而使经济系统以几何级数的增长率持续上升。此时即便中止最初投资，上升运动仍不停止。

这四种类型中，前二类为收敛体系，后二类为扩散体系。萨缪尔逊把收敛体系视为经济周期的基本类型。在这一点上，哈罗德的看法与他截然对立，而把扩散体系当作经济周期的基本类型。

(四) 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一般经济理论

传统经济学注重微观，提倡自由放任；凯恩斯主义却偏重宏观，主张政府干预，似乎是两种完全不同的理论。表面上的分歧也引起了西方众多经济学家的困惑，认为只能在两者之间任择其一。然而事实上，这两种学说在本质上并无不可逾越的鸿沟，凯恩斯本身就是传统经济学大师马歇尔的高徒，他从来没有说过要推翻资本主义，他提出的宏观经济理论和政策只是为了弥补资本主义经济机制的缺憾而已。所以精明的萨缪尔逊很快就找到了两者的结合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仍是理想制度，资本主义经济仍是一部美妙的机器，遗憾的是，依靠自身的力量，它无法避免周期性危机及失业，而这个没有危机和失业的大环境，必须依靠政府来创造。只要政府协助满足了“充分就业”的条件，传统经济学还会继续发生作用，从而实现“帕累托最优状态”。

1950年，萨缪尔逊在名为《经济理论与工资》的学术报告中宣称：一个把凯恩斯主义和传统经济学相结合的折衷学说已经产生。1961年，萨缪尔逊正式把这个学说命名为“新古典综合”体系，自认是与李嘉图、亚当·斯密、瓦尔拉、马歇尔、凯恩斯一脉相承的正统经济学。在纪念《通论》发表30年的文章中，萨缪尔逊以一贯自得和自信的口吻说，“新古典综合”体系的诞生是战后凯恩斯主义的重大发展之一。

《经济学》具有“集大成”的特征。萨缪尔逊在书中陈述的主要观点，反映了后凯恩斯主流经济学派的一般经济理论，可以归纳为四个方面。

1. 主张总支出水平取决于储蓄和投资的货币数额的相互作用

萨缪尔逊在分析“投资的变动性”时认为，“就总投资或货币支出能力而论，自由放任的制度没有良好的自动调节的设备”。也没有像斯密所说的“一只‘看不见的手’来保证好坏年份会自动拉平”；更不可能按照熊彼特所讲的“保证科学家及时地发现足够的新产品或方法，正好稳定经济活动的波动”。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经济没有自行调节能力，过剩危机和失业不可避免，正如凯恩斯的判断，资本主义经济常态为小于充分就业的“均衡”。由于消费倾向、灵活偏好和资本边际效率等三个基本的心理因素作用导致“有效需求不足”，只有国家干预经济，并进行需求管理，才能解决充分就业的“不稳定性”。

对于萨伊的“供给能够自身创造需求”，自身机制能“自我调节”恢复“均衡”的观点；以及马歇尔关于自由竞争作用下，价格、利息率、货币工资率均由供求调节而具有无限“伸缩性”的观点；还有庇古关于“自愿失业”和“庇古效应”的论调，萨缪尔逊都承袭了下来，把古典均衡论与凯恩斯的不均衡论两种不同的见解融为一体，他既赞同宏观调控、国家干预，前提是承认“有效需求不足”；又维护市场竞争和自由企业制度，前提是以“影响供给与需求的独立的力量通过市场价格的变动而趋于平衡”，进而推导为，“同样的，我们将看到，储蓄与投资的决策也通过收入与就业水平以及利息的变动而趋于平衡。”

对于古典学派的均衡充分就业论与凯恩斯主义小于充分就业论的综合，萨缪尔逊更多地借助于“庇古效应”，即在未达到充分就业的条件下，物价下降将提高持有的货币余额的价值，引起对商品需求的增加，从而增加就业，个人的实际现金余额变化后引起的资产调整，导致消费需求增加，在IS-LM图中，引起IS曲线的变动，萨缪尔逊认为，经济史“是通货膨胀的历史”，现实中，“刚性工资”、“垄断价格”的存在，抵销了工资、价格的“伸缩性”，“在现代的成本推动的通货膨胀中，物价和工资并不自由浮动来使各个市场供求相等。甚至在充分就业和生产能力全部得到利用以前，它们就开始爬行上升。通过收缩的货币和财政政策来对付这种通货膨胀，结果只能造成大量失业和停滞膨胀。但是，如果不采取行动，爬行通货膨胀可能发展成恶性通货膨胀。因此，必须用“需要‘收入政策’来补充财政和货币政策——以便改善混合经济制度的菲利普斯曲线。”

2. 各种类型的社会经济制度都具有一定的优势

萨缪尔逊分析了资本主义制度难以克服的弊端，强调政府的经济干预职能。他指出：“政府在现代混合经济中具有日益扩大的作用。这可以从三个方面反映出来：(a)政府支出的数量增长；(b)国家对收入的再分配；(c)直接调节经济生活。萨缪尔逊一再强调政府要通过法令、措施来限制“垄断”的危害因素；用政府经济作用来熨平周期波动，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和收入政策来消除失业和通货膨胀。最后还分析了政府调控下，反对贫穷和不平等、反对城市和环境的病态、反对种族和性别歧视的各种斗争。

3. 主张财政政策与货币政策协调作用

萨缪尔逊从第18章起将收入决定的各条曲线和货币分析联系起来，认为“货币分析能够很好地和现代收入决定论配合在一起”，它为“两种稳定性

政策(指货币与财政政策)的结合创造了条件”。这两种宏观经济的措施必须协调起来,以便达到成为具有适当的稳定价格和能充分利用生产潜力的进步的经济社会的目的。从而有助于造成一个有利的经济环境,在其中,“人民具有最宽广的机会来取得成就”。

4. 主张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的照应与配合

萨缪尔逊认为,宏观研究总量性经济变量的运动及其相互关系,其目的在于探索“熨平”经济周期性波动,以保证经济均衡发展。但当人们解决了大萧条问题或存在的失业和通货膨胀问题后,又会对微观经济问题感兴趣。在萨缪尔逊看来,必须把宏观经济理论与微观经济理论相综合,为微观经济分析提供和开拓一个“充分就业”的宏观经济均衡的依据和方式。混合经济的需求管理的宏观经济学中,古典学派的微观经济原理仍然适用,经济学家可以满怀信心地讲述古典经济学原理,并运用此学说以济世,以求达到“帕累托最优状态”的“理想境地”。

(侯书森撰)

【美】彼得·德鲁克：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企业经营百科全书”

在一个要求创新的时代，不能创新的公司注定要衰落和灭亡；一个不知道如何进行管理的高层管理是无能的。

——彼得·德鲁克

他是当代西方影响最大的管理学家之一，经验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管理哲学、管理原理、管理组织、高层管理等方面都有较深的研究和独到的见解。

——F·斯坦姆斯

一、德鲁克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的作者彼得·德鲁克(Peter F. Drucker)是原籍奥地利的美国管理学家和管理咨询人员。他早年受的教育是法律，1929年成为英国伦敦一家国际性银行的报纸通讯员和经济学家。由于躲避德国纳粹的迫害，他从1937年起移居美国。在美国，他开始时作为一个由若干家美国银行和保险公司组成的经济学者。以后担任美国通用汽车公司、克莱斯勒公司、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大企业及一些外国公司的顾问。他在1942—1949年间任本宁顿学院政治和哲学教授，1950—1972年间任纽约大学工商研究院的管理学教授，1972年以后成为纽约大学的高级教授。他从1971年起并且是克拉蒙研究院的社会科学克拉克讲座教授。他于1954年创办了德鲁克咨询公司，自任董事长。

他写有许多著作，广泛论述了工业社会的本质，企业管理的一般概念和基础知识及管理方法、技术革命对未来的冲击等。他的主要著作有：《经济人的目的》(1939)、《工业人的未来》(1942)、《公司的概念》(1946)、《新社会》(1950)、《管理实践》(1954)、《美国未来的二十年》(1957)、《明天的标帜》(1959)、《管理的实践》(1964)、《有效的管理者》(1966)、《不连续的年代》(1969)、《今天为明天培养企业领导者》(1969, 编纂)、《管理：任务、责任、实践》(1974)、《动乱时代的管理》(1980)、《管理新潮》(1986)以及论文集《技术、管理与社会》、《人、思想和政策》等。

二、《管理：任务、责任、实践》评介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是德鲁克最主要的代表作，全面地论述了他的管理哲学和他对管理的任务、责任和实践等方面的看法。本书在1974年出版时就以英、德、日三种文字同时发行，以后又被译成多种文字，很受各国管理界人士的欢迎和重视，有人将此书誉为经营管理的经典著作和百科全书。其中有关管理组织的几章经他缩写为《今日管理组织的新样版》一文

发表于美国《哈佛商业评论》杂志 1974 年 1—2 月号上，颇受广大读者的欢迎。

在难以置信的短短 50 年内，我们的社会已成为一个充满各种机构的社会。它已成为一个多元的社会，其中每一项主要的社会任务都已交给各种大的组织来承担——从商品和服务的提供到卫生保健，从社会安全到文化教育，从新知识的探求到自然环境的保护，都是这样。而使各种机构有所成就的是管理者和管理。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一书对管理问题进行了探讨，但探讨的重点不在管理的技巧、工具和方法，而在管理的任务。该书从管理的任务出发，首先从外部来考察管理并研究管理任务的范围及其各方面的必要条件(第一部)，然后才在第二部中转而讨论组织的工作和管理的技巧，并在第三部中讨论高层管理及其任务、结构和战略。

该书也是以管理人员为中心的。该书的出发点是这样一个问题，管理人员为了圆满地实现其任务，必须知道些什么？

管理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文化”。它受到文化的影响，又影响文化和社会的形成。

归根到底，管理是一种实践。其本质不在于“知”，而在于“行”；其验证不在于逻辑，而在于成果；其唯一权威就是成就。因此，该书探讨的是一些基本原理，并不是一部哲学著作。该书产生于实践，又以实践为归宿。

《管理：任务、责任、实践》是经验学派的经典之作，也是反映彼得·德鲁克本人管理思想和管理哲学的最全面的著作。它还充分体现了经验学派的最新成果。该书也是一部优秀的教科书，同其他同类著作不同，该书要阐明的是管理人员所必备的全部工作，因而是以实际工作者为主要对象的教科书。该书虽然篇幅很长，但由于其中存有大量的管理案例，从而读来并不乏味，反而十分引人入胜。充分体现了作者的良苦用心。

该书的主要内容与学术观点如下：

(一) 管理的主要任务

德鲁克指出：为了使机构能执行其职能并作出贡献，管理必须完成以下三项同等重要而又极不相同的任务：

1. 本机构的特殊目的和使命(不论本机构是一个工商企业还是一个医院或大学)

一个机构是为了某种特殊目的和使命、某种特殊的社会职能而存在的。在工商企业中，这就意味着经济上的成就。工商企业的管理必须始终把经济上的成就放在首位，在每一项决策和行动中都这样。企业是为了取得经济效果才存在的。而其他社会工作则以经济效果为基础。企业的经理人员在他们的每一项决策和行动中，都必须首先考虑经济效果。一个企业若不能产生经济效果，这个企业就算失败了。可见，无论在何种社会经济制度和意识形态下，企业都有提供利润的责任。

企业应赚取足够的利润以防患于未然，但企业的目的却不在于赚取利润，而在于创造顾客。故而，企业只应赚取足够的或合理的利润，而不应以追求最大利润为目的。

2. 使工作富有活力并使职工有成就

工商企业只有一项真正的资源：人。它通过富有活力的人力资源来完成它的任务。它通过完成工作来取得成就。因此，使工作富有活力是首要的职能。但与此同时，在今日的社会中，这些机构日益成为个人取得生计并取得社会地位、与人交往、个人的成就和满足的手段。因此，使职工有成就越来越重要，并且是一个机构或取得成就的衡量标准，它日益成为管理的一项任务。

3. 处理本机构对社会的影响和对社会的责任

没有哪一个机构是为了自己而存在的，也不会以自身为目的。每个机构都是社会的一个器官，而且是为社会而存在的。工商企业也不例外。工商企业为了完成其任务，提供出经济商品和服务，就必须对人、社区和社会发生影响。

这三项任务中，取得经济成果是首要的，因为企业是一个经济机构，而使工作具有活力和使工作人员有成就感，则是把管理看成一种基本信仰和价值观的实现。而企业作为社会和社区这些大系统的组成部分，势必对所造成影响承担一定的社会责任。

(二) 管理人员的工作、职务、技能和组织

在题为“管理人员：工作、职务、技能和组织”的第二部分中，作者分别讨论了管理者的职责、管理技能、组织设计与组织结构等问题。

1. 管理人员的工作和职务

作者认为，作为企业主要管理者的经理，有两项别人无法替代的职责。其一是创造一个大于其各组成部分总和的整体，一个富有活力的整体，它把投入于其中的各项资源转化为较各项资源的总和更多的东西。可以把它比拟为一个乐队的指挥。通过乐队指挥的努力、理解和指挥，各种个别的乐器演奏形成了有生命力的音乐演出的整体。但乐队指挥有作曲家的乐谱为蓝本，他只是个解释者，而管理人员则既是作曲家，又是乐队指挥。其二是，在其每一项决定和行动中协调当前和长期要求。他如果牺牲了当前要求和长期要求中的任何一项，就会使企业受到危害。作为一名管理人员有五项基本工作。这五项基本作业是：(1)制定目标。他决定目标应该是什么，为了实现这些目标应该做些什么，这些目标在每一领域中的具体目标是什么。(2)从事组织工作，把工作分成各项可以管理的活动和作业，把这些作业和单位组合成为一个组织机构，选择人员来管理这些单位并执行这些作业。(3)从事激励和信息交流工作。(4)对工作成就进行衡量、分析、评价和解释，为每一个人确定一种衡量标准，使之集中注意整个组织的成就，同时又注意他本人的工作并帮助他做好工作。(5)培养人、包括他自己。

作者认为，管理人员的职务可以用四种方式来下定义：(1)首先是特殊的职能，即职务本身，如市场研究经理或制造经理等。(2)当时当地具体的目标完成期限以及由后果反馈的衡量。(3)由各种关系——向上的关系、向下的关系、横向的关系——来对职务下定义。(4)由该项职务所需的信息及一个管理人员在信息流程中的地位来下定义。从上述四个方面来仔细考虑自己的职务是每个管理人员的责任。

管理人员应该通过目标管理来自我控制。每一个管理人员，上至“大老板”下至生产工长或主管办事员，都必须明确规定其目标。这些目标必须规

定该人所管理的单位应达到的成就，必须规定他和他的单位在帮助其他单位实现目标时应作出什么贡献，还应规定他在实现自己的目标时能期望其他单位给予什么贡献。换句话说，从一开始就应把重点放在集体配合和集体成果上。这些目标始终应该是以公司的总目标为依据。每一个管理人员的目标应该规定自己对实现公司在各个领域的总目标作出的贡献。目标管理的最大优点，也许是它使得一位管理人员能控制自己的成就。自我控制意味着更强的激励：一种要做得最好而不是敷衍了事的愿望。它意味着更高的成就目标和更广阔的眼界。目标管理即使不一定能使企业的管理集团在方向和努力上获得一致，但一定能做到通过自我控制来管理。

2. 管理的技能

作者认为，管理的技能包括作出有效的决策；在组织内部和外部进行信息联系；正确运用控制与衡量；正确运用分析工具，即管理科学。

其一，作者认为，要作出有效的决策。首先，注意的中心是确定问题而不是提供答案。其次，把各种不同的看法都提出来，在达到协商一致以前不对答案进行讨论，而是探讨各种不同的看法和方法。再次，注意的中心放在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上，而不是放在“正确的答案”上。决策不是一种机械的工作，而是一种冒险的事，并且是对判断力的一种挑战。“正确的答案”不是问题的中心，而且通常也找不到正确的答案。中心在于对问题的理解。还有，决策不单纯是一种智慧的运用，还需要动员整个组织的见识、力量和各种资源，以便采取有效的行动。

其二。在组织内部和组织外部进行信息交流。作者认为，信息交流有四项基本原则：(1)信息交流是知觉，必须在信息接受者的知觉范围以内。“知觉范围”既指生理上的范围，也指文化和感情上的范围。(2)信息交流是期待。人们知觉到的是他们期待着的事物，而对不期望的事物会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所以，在进行信息交流以前，必须知道信息接受者的期望是什么，才能知道是否可以利用他的期望来进行信息交流，或者是否需要有一个“震动”来打破他的期望，并迫使他承认已发生了他所不期望的事情。(3)信息交流提出要求，要信息接受者成为某样的人、做某种事、相信某种事。因此，一般讲来，除非信息能适应于(至少在一定程度上)信息接受者自己的愿望、价值观和目的，否则，他就会抵制或不接受信息。(4)信息交流和信息是不同的。信息交流是知觉，是人与人之间的交流；而信息则是逻辑，是非人称的。信息愈是摆脱人的因素，即摆脱感情和价值观、期望和知觉等，则愈确实可靠，愈具有信息的作用。

核查与控制是有区别的。核查是关于方法的，控制是关于目的的。核查的同义词是衡量和信息，而控制的同义词是方向。核查是分析的、涉及过去和现在的事情。控制是描述的，涉及应该是怎样的情况。

其三，正确运用核查、控制与衡量。作者认为，工商企业中的核查有三个主要特点：(1)核查可能不是客观的或中性的，而是主观的、有倾向性的。(2)核查必须把重点放在成果上。而企业的成果只存在于外部，存在于经济、社会、顾客之中。企业内部的所有事物——制造、销售、研究等——只形成成本，只是一种“成本中心”。(3)对可衡量的事件和不可衡量的事件都需要核查。否则会给人以错误的信息。核查必须符合以下七项规范：符合经济性原则；必须是有意义的；核查必须适合于被衡量对象的特点和性质；衡量的尺度必须同被衡量的事件相称；核查必须适时；必须简单；必须是能被使用

的；最后，核查制度必须同组织的最终控制(表现于其有关人的决策中)相一致。

其四，正确运用管理科学这种分析工具。作者认为，要使管理科学产生良好的效果，管理人员应对管理科学承担起责任来，对这些工具进行管理。应该在管理科学家的密切配合下，对管理科学提出以下四项要求和期望：管理科学家要对各种假设进行检验；他们要确定应提出一些什么样的正确的问题；他们要提出各种可供选择的方案而不是提出答案；他们要把注意力集中在理解上，而不是集中在公式上。这四项要求和期望依据的都是下述假设：管理科学不是计算的方法而是分析的工具，它的目的是帮助管理人员深入认识和进行诊断，不是开处方，更不是开出灵丹妙药。

3. 管理的组织

关于组织问题，作者认为，组织结构不是自发演变的，组织的设计和结构需要思考、分析和系统的研究。组织设计的第一步是确定和组织一个组织机构的基本构造单位。此外，由于组织各有其特点，因而组织结构是由组织战略决定的。从规范的角度来看，组织结构特别要满足以下一些最低的必要条件：明确性、经济性、远景的方向、个人对本身任务及整体任务的理解、决策、稳定性和适应性，以及永存性和自我更新。从逻辑的角度分析，可以将组织结构分为以工作和任务为中心的职能制结构和任务小组结构，以成果为中心的模拟分权制和联邦分权制结构，以及以关系为中心的系统结构。

职能制的最大优点是具有明确性。每一个人都有一个“据点”，都了解自己的工作。它具有高度的稳定性。但它结构僵硬而不能适应变化。它不能为未来培养、训练和考验人员，因而只适用于作业工作，而不适用于高层管理和创新工作。任务小组则是为了完成某一特定的任务，而从组织的不同领域中抽调来一起工作的，具有不同的教育背景、技能和知识的一些人组成。它既可能是短期的，也可能是长期的。它使每个人始终了解整体工作，并使自己对之负责。它很善于接受新思想和新的工作方法，并有极大的适应性。但它的经济性和稳定性较差，而且在小组领导人提出明确的要求时，任务小组就缺乏明确性。它可能是适于高层管理的唯一结构，但对于作业工作而言只是一种补充。

任务小组结构是为了完成某一特定的任务，而从组织的不同领域中抽调一些人来组成的。所谓矩阵结构、规划—目标结构也大致与此相同。这种组织结构有很明显的优点。每一个人始终了解整体的工作并对之负责，善于接受新思想和新工作方法，并有极大的适应性。其缺点是明确性、稳定性、经济性较差。它较为适用于高层管理工作和创新工作、知识工作。

联邦分权制中，企业最高领导决定企业的重要目标、组织人力资源、选拔、训练和考核未来的领导人员，制定对工作效率进行评价的标准等。而总部下属的各个单位本身也是一个自治性事业单位，其负责人要对本单位的生产、工程销售、会计、采购、人事等方面负责。联邦分权制有高度的明确性和相当的经济性，同时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和适应性，是目前唯一能使人满意的一种组织结构，它还有助于培训人员。有一些大型的服务性企业由于规模过大而无法采用集权的职能制结构，而其本身的生产过程或经营活动的整体性较强，而不宜采用联邦分权制结构，于是就按一定标准把企业分成许多“组织单位”。这些“组织单位”被看作独立的事业单位，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和管理机构。各“组织单位”之间按内部的转移价格，进行产品交换并计算利

润，进行模拟性的独立核算，促进经营管理的改善。它也有着许多缺陷：(1)缺乏明确性，不易做到以成绩为中心，很难使每个人了解自己的任务和整体的任务。(2)信息交流较差，主要传递“杂音”而非信息。(3)对人的要求较高，要求人有自我纪律，能相互忍让，能把自己的利益交给上级去处置。(4)只适用于作业工作而不适宜于高层管理工作和创新工作。

模拟分权制结构主要应用于一些大型的化学工业、原料工业、银行、医院等企业。这些企业由于规模大，不宜采用集权的职能制结构，而其本身的生产过程或经营活动的整体性又较强，不宜采用联邦分权制，于是就模拟联邦分权制，按地区或其他标准把企业分成许多“组织单位”。这些组织单位有相当大的自治权和自己的管理机构。各个单位之间按内部的转移价格进行产品交换，并计算“利润”，进行模拟性的独立核算，促进经营管理的改善。模拟分权制有较好的效果，但也存在着一些缺点：缺乏明确性，不易做到以成绩为中心；信息联系较差；对人的要求比联邦分权制更高，难于做到；只适用于作业工作而不适用于高层管理工作和创新工作。

系统结构则是由范围很广的各种完全独立的单位参加，为实现一个共同的目标而从各单位抽调人力、物力组成的一个复杂的系统。它运用网络规划方法和管理信息系统，把所有参加的各个单位连成一个整体的系统，及时了解全面情况，解决出现的问题。它对人的要求极为严格，而且结构本身仍有很多缺陷，造成极为繁重的协调工作。

(三) 高层管理：任务、组织、战略

这一部分是作者对高层管理的任务、组织和战略的研究。德鲁克认为，高层管理是进行指挥、确定视野、制定标准的机构。因此，它有着特殊的任务，要求有自己的组织。作为高层管理，它在规模和复杂性、多样性及多角经营、发展、变革、创新等方面，面临着组织结构和战略上的各种特殊挑战。

1. 高层管理的任务和组织

作者认为，高层管理的主要任务有：(1)仔细考虑企业的使命，即提出“我们的企业是什么以及应该是什么？”的问题。这就导致确定目标、制定战略和计划、为了未来取得成果而在目前作出决策。(2)确定标准、榜样，关心企业应该做到和实际做到之间的差距。(3)从价值观、信念和行为准则等方面为未来，特别是未来的高层管理培养人力资源。(4)建立和维持重要的外界关系(主要的顾客、供货者、金融界、政府机构等)。(5)代表企业参加宴会等礼节性的活动。(6)在重大危机时接管处理。所有这些任务都是重要性的，但很少连续。作为高层管理者，他应当具有各种不同的能力、特别是不同的气质，既要有分析、思考、权衡各种方案、协调不同意见的能力，也要有迅速而坚决地行动、勇敢而直觉地判断的能力。同时还要求他既长于抽象的观点、概念、计算和数字，又能了解、体谅和尊重别人。所以，必须在高层管理人员中进行适当的分工。尤其重要的是必须确定高层管理中的关键性活动和任务。

高层管理的工作应由一个班子而不是一个人来担当。即便是小企业也是如此。而当企业较大和较复杂时，则需要一个类似“总经理办公室”的结构明确的领导班子，其中包括几位处于平等地位的成员。每个人有一个分工负责和负有最后决定权的领域。这可能是一个最好的结构。而另外一种相当普

遍的结构形式是，其中一个人全面负责，另有三四个高层人物分别承担分工明确的某些职责。但不管怎样，一定要防止在高层管理的伪装下实行个人独裁。其办法则是把高层管理的每项任务明确地分配给每一个高层管理人员，作为他的直接和首要的职责。此外，在较大公司中，凡承担任何一项高层管理职责的人，都不应再承担不属于高层管理职务的任何职责。

高层管理要发挥作用就必须满足这样一些严格的条件：(1)高层管理者如果在某一领域中负主要责任，就应拥有在该领域中的最后决定权；(2)高层管理者对不是由他负责的事务不应作决定，而应该交由对该事负主要责任的成员去处理；(3)高层管理班子中的成员不一定要互相喜欢，甚至不一定要互相尊重，但一定不要互相拆台。(4)一个高层领导班子不是一个委员会，而是一个班子，需要一个班长。班长不是“老板”而是领导者。(5)重大的方针政策和关键人员的任命等，应由整个班子讨论后再作决定。(6)高层管理的任务要求在班子中的各个成员进行系统而密切的信息交流，以便在互相了解情况的基础上能分工负责地承担起高层管理的任务。

董事会，又称监督委员会，是对高层管理进行监督、提供咨询、检查工作并指定高层班子管理成员的机构，它的主要职能：(1)对高层管理提供咨询、建议并一起商讨问题，使企业能够自制。(2)撤换未能取得成就的高层管理。(3)同公众和社区接触、谈话和听取意见。

2. 高层管理的战略和结构

德鲁克认为，高层管理的战略与企业的规模、多角化、复杂性、成长和创新有关。

他认为，企业的规模同结构和战略密切相关。不同的规模要求不同的结构、不同的政策、不同的战略、不同的行为。一个组织的规模有一定的限度，超过这个限度，其生产率就会下降并导致最终无法管理。企业规模的变化不是连续性的，而是跳跃性的。规模对战略有重大影响，而战略又对规模有重大影响。因此，对高层管理而言，适应于不同的规模来拟订战略是十分重要的。

小企业在管理上要仔细拟订出一种能使它显出特色的战略，认真确定实现本企业目标所必需的关键活动，并分配给适当的人去承担。集中使用资源，尤其是优秀人才，建立起有效的控制和信息系统，以便及时了解企业内外的情况而作出及时调整。

中等企业则有三种类型：(1)产品范围狭窄，只有一种工艺技术和一种主要市场，但关键人员的集团较大，不可能被一个人真正了解；(2)由若干自治性的小事业部组成，这些小事业部的经济特征相同；(3)由拥有独立市场但互相依存的一些事业部组成。但不管是那种类型，中等企业管理要诀在于集中力量。中等企业的高层管理应该有很强的自我约束力，自觉地以全部资源投入企业成功所必需的关键领域而压缩其他领域。

大企业必须恰当地组织正式的、客观的结构。在结构中必须包含各种有关人的关系和信息，并把各人的力量动员起来。这种结构必须不是个人性质的，而是以政策、目标、工作、程序、制度和贡献为依据的。大企业需有明确性，并明确规定和安排高层管理活动。个人之间的联系能使大企业具有灵活性并使人们相互间建立协作的习惯。否则，人们就可能成为死板的官僚。但是，这项任务不能只由高层管理来承担。大企业中管理发展的主要任务之一就是整个组织中建立起个人联系和个人关系。做到这点的最好办法是使

管理人员和专业人员在一起成长，并在工作中互相了解。大企业还必须防止对外隔绝和近亲繁殖，应注入新的、不同的、外界的观点。

关于多角经营，作者认为这并不一定是好事。因为企业愈复杂，则其管理层次愈多，各种报表、程序、会议、协调者就愈多，信息交流愈困难，而决策的延误也愈多。

但许多公司之所以进行多角化，是由于受到内外的各种压力。内部的压力有：(1)心理上的。人们对于一再地做同样的事感到厌倦，想做一些不同的事。(2)因企业规模不当，想用多角化即扩展到新的领域来予以弥补。(3)想把企业内部一个成本中心转化成为一个收益中心。外部的压力有：(1)社会经济范围过小，企业只有通过多角化才能成长。(2)由于市场向外扩展而实行多角化，如多国公司。(3)由于技术发展产生了一些供应许多不同市场的产品。(4)由于税法鼓励把盈利的资金重新投资于企业，而企业原来的业务已不需追加资金，于是用于多角经营。(5)新的投资和资本市场、以及工作和职业市场的出现。有的压力是企业的机会，但有的却是企业的威胁。但一个成功的多角经营离不开一个共同的统一核心，它或者是共同的市场，或者是共同的技术。

作者认为，要使多角化成为正确的，取得效果，就要使多角经营协调统一。而这只有通过两种途径才能实现：(1)以市场作为统一的核心，即一个企业的业务和技术、产品和产品线、各种活动都包含在一个共同市场的统一体之内。(2)以技术作为统一的核心，即一个企业的各项业务、市场、产品和产品线、各种活动都采用一种共同的技术。

关于多国公司，作者认为，多国公司把企业的多角性和复杂性提高到前所未有的高度，并在企业战略、企业结构和企业行为方面对高层管理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它除了规模、市场、产品和工艺技术的复杂性以外，还有多种文化、政治和政府关系及限制条件的复杂性。多国公司大量涌现的原因是，出现了一个真正的世界市场，即不受民族、文化甚至思想意识等界限的限制或规定，而是超越于它们的一个市场。多国公司一方面要建立起一个统一的企业，以便在一个共同的世界市场中使得各种要素成本和要素优势能够最优化；另一方面又必须公正对待其内部各种不同国籍和不同工作的人们。它必须有多种企业战略和多个高层管理班子。整个公司要有一个战略、有一个高层管理班子。它所属的每个国家中的每一子公司和工厂也都必须有其战略和高层管理班子。

企业的成长是指在经济成就上的增长，而并不表现在资金的多少或规模的大小上。成长是一个企业所必需的，但绝不是越高越好。企业的成长至少应达到成长的最低限度，即能在风险和各种资源的收益之间取得最佳平衡点，也是市场地位的提高能使每种主要资源的生产率同时提高之点。超过这一点，利润率提高将使风险大大增加；而低于这一点，风险的减少又会使生产率和利润率急剧下降。企业的高层领导必须为这场变革做准备。他们必须确定各项关键活动，并为今后准备一个雏形的高层领导班子来关心这些关键活动。他们要了解变革的需要会在基本政策、结构、行为等方面表现出来的征兆，以便在变革的时机到来时，就能不失时机地了解。他们自己也要在思想上作好变革的准备。

德鲁克还对企业的创新进行了研究。他认为，在这个要求创新的时代，不能创新的公司注定要衰落和灭亡。一个不知道如何对创新进行管理的高层

管理是无能的。现在已有了一些创新性组织，它们把一群人组织起来从事持续而有生产性的创新。他们组织起来使“变革”成为“规范”。这些创新性组织尽管在结构、业务、特点、甚至在组织和管理哲学方面大不相同，但却有某些共同特征。首先，它们了解“创新”的真实意义。创新是一种经济和社会用语，它并不是科学或技术，而是价值。它也不发生在组织内部而发生在组织之外。创新应以它对环境的影响来衡量。因此，一个工商企业中的创新始终必须以市场为中心。否则，其收益会令人失望的。其次，它们了解到创新的动态过程，从而知道如何去有系统地寻找那些能取得成功和报酬的创新活动。再次，它们拥有一个创新的战略。即有系统地淘汰旧的、正在死亡的、陈旧的事物，从而解放出用于新工作所需的各种资源，树立高目标、创造出新的事业、能力、价值等，而不是去改造那些旧的东西；第四，它们有一套适合于创新动态过程的衡量方法、预算和预算控制。从而对决定创新战略的最终机会、失败的风险、所需的努力和费用这三项要素进行衡量，以对创新进行评价和选择。第五，它们的高层管理人员积极支持创新，并把不切合实际的、不成熟的、粗略的想法转变成为具体的创新实际。高层管理者是创新的主要动力，他运用组织中的各种意见来激发自己的看法，并使各种意见为整个组织所关心。创新性组织中的高层领导对新思想加以思考和加工，使之成为组织的力量和企业遵循的规范。从而达到改变职工行为和态度的目的。最后，创新性组织认识到，人不可能同时既创造新事物又关心已有的事物。因此，它们把新的事物放到专门从事创造新事物的独立组织部门中去。此外，它们同时认识到，创新是一种“事业”而不是一种“职能”。创新把各种职能视为发展一项新事业的过程中的各个组成部分，从要达到的目标出发，反过来决定我们目前应当做什么才能达到目标。大企业往往将创新性单位组成一个创新性集团。

总览全书，在作者看来，我们正在从管理热潮转向取得管理成绩。这一代管理人员的任务正在于使这个社会中的各种机构，首先是工商企业，为社会和经济、为社区也为个人而取得成绩。

(孙耀群撰)

【美】赫尔伯特·A·西蒙：
《管理决策新科学》——对企业决策的开创性研究

认为科学研究如果可能变成有用的，或者它是从对日常世界遇到的问题作出反应中产生的，不可能是基础研究，这是一种庸俗的误解。真实世界事实上或许是需要基础科学研究的良好研究课题的一切来源中最丰富的来源。

——赫尔伯特·A·西蒙

西蒙思想中新的东西是，首先，他否认古典管理理论中作的假设，有一个无所不在的、理性的、求最大利润的企业家。他用一些互相协作的决策人代替这个企业家，他们的理性行动的能力既受缺乏关于他们决策的总后果的知识限制，又受个人和社会联系限制。

——瑞典皇家科学院公告

一、西蒙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1916年6月15日，西蒙出生在美国威斯康星州的米尔沃基。他20岁时毕业于芝加哥大学，获得文学学士学位。七年后，在伊利诺斯州技术学院获得哲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担任助理教授和教授。他的爱好和学识是多方面的。他走过许多地方，还在多种学术组织中担任职务。他教过政治学、社会学、行政管理学、心理学、情报信息学、行为科学、计算机科学，等等。除诺贝尔经济学奖外，他还荣膺过美国的心理学卓越贡献奖和计算机科学奖。

那么，他必定是一位一般人望尘莫及的天才了。西蒙自己并不这样认为。他提出，对于有一定基础的人来说，只要他肯认真地下功夫，在六个月内就可以掌握任何一门学问；每个立志成才者，经过十年时间的努力，都有可能达到“大师”的水平。

西蒙是一位严肃的学者，他这样说并不是夸夸其谈。他的立论，依据的是实验心理学有关的记忆研究成果。心理学研究表明，一个人一分钟到一分半钟可以记忆一个信息，心理学称之为“块”。我们的汉语词汇和成语，就是这样一些“块”。有人对任何一门学问所包含的信息量作过统计，估量每门学问所包含的信息量约为5万“块”。任何人只要掌握了这些信息，都可能在某一专门领域内成为专家。一分钟记忆1个“块”，5万“块”大约需要1000小时，以每星期工作40小时计算，要掌握一门学问约需六个月功夫。作为计算机专家，西蒙提出每一个论点，都辅之以精确的量度。六个月或十年虽不能使每个人都能成为像西蒙一样博学的人物，但他所主张的“天才出自勤奋”的观点，看来是不容置疑的。

尽管人们还是把西蒙叫做社会科学家，但他创立的决策理论已经在经济学领域中为他赢得了荣誉，美国经济学会1973年接受他为该会的荣誉会员。所以，他是美国的一位著名经济学家。

瑞典皇家科学院指出：“就经济学家最广泛的意义来说，他首先是并且

突出地是一个经济学家。”在经济学领域，西蒙的突出成就就是建立了现代企业决策理论。

决策虽然自古有之，按照资产阶级古典经济理论，每家公司都是一架榨取利润活动的自动机。每个企业在决策时，所考虑的问题只应该是如何攫取最大限度的利润。但西蒙的决策理论与此有较大差别。他认为，企业在制订计划和对策时，不能只考虑“攫取利润”这一目标，必须统筹兼顾，瞻前顾后，争取若干个相互矛盾的目标一同实现。其决策理论以“有限度的合理性”而不是“最大限度的利润”为前提，应用“符合要求”的原则。这一理论的典型例子有“分享市场”、“适当利润”、“公平价格”。在决策方式上，他主张群体决策。群体参加决策的优点是，群体成员不会同时犯同样的错误，可以避免决策的失误。群体参加决策可将问题分成若干部分，分别交给专家处理，从而加速问题的解决和提高解决的质量。

决策过程，可分为程序化决策和非程序化决策来说明。日常的活动往往是重复出现的，经过一段时间的经验积累，知道如何寻找并选择符合要求的措施，就会发展成一套程序化的办法，遇到重复出现的情况，就按既定的程序、步骤行动。这是程序化决策。还有一些问题，用正常程序是不能解决的，应修正或者产生新的程序，以此来解决。这就是非程序化决策。这类决策的过程包含全部决策的过程，从判定问题、确定目标开始，然后寻找为达到目标可供选择的各种方案，比较评价这些方案，在这些方案中进行选择，并作出决定，在执行决定中进行核查和控制，以保证实现预定的目标。

瑞典皇家科学院认为，西蒙有关组织决策的理论和意见，应用到现代企业和公共管理所采用的规划设计、预算编制和控制等系统中及其技术方面，效果良好。这种理论已成功解释或预示如公司内部信息和决策的分配、有限竞争情况下的调整、选择各类有价值证券投资和对外投资投放国家选择等多种活动。现代企业经济学和管理研究大部分建筑在西蒙的思想之上。因此，1978年，由于他“对经济组织内的决策程序所进行的开创性研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西蒙的主要著作有：《行政管理行为》(1945年)、《人类模型》(1957年)、《组织》(1958年)、《管理决策的新科学》(1960年)、《发明的模型》(1977年)、《思想模型》(1979年)。

二、《管理决策新科学》评介

《管理决策新科学》是赫伯特·西蒙的代表作之一。该书全面阐述了计算机的使用对于管理——尤其是管理决策，已经造成并正在造成的影响，是一部详细讨论了技术革命对企业行为各个方面影响的名著。全书共分为五章。其中，第二章“管理决策过程”是全书最核心的部分，决策理论的许多重要观点均出自该章。

西蒙认为，决策决不仅限于从几个备选方案中选定这样一种行动，而是包括了几个阶段和涉及许多方面的整个过程。决策贯彻于管理的全过程，管理就是决策。

西蒙认为，决策过程包括四个阶段：(1)情报活动。即探查环境、寻求要求决策的条件。(2)设计活动。即创造、制定和分析可能采取的行动方案。(3)抉择活动。即从可资利用的方案中选出一条特别行动方案。(4)审查活动，即

对过去的抉择进行评价。这四个阶段在经理的时间表上占有十分不同的分值。而且在各个企业和各个经理之间，各个阶段所占的分值也各异。但不管怎样，这四个部分加在一起就构成了经理所做的主要事情。经理的职责不仅包括本人制定决策，也包括负责使他所领导的组织或组织的某个部门能有效地制定决策。他所负责的大量决策制定活动并非仅是他个人的活动，而是他下属人员的活动。西蒙还把决策技术分为两种：由于活动出现重复和例行状态，决策可以程序化到一套处理这些决策的固定程序，以致每当它出现时，不需重复处理它们，这种决策即为程序化决策。另一类活动则是新出现的，不能程序化的重要活动，此种决策则被称为非程序化决策。前者可由组织为其制定具体的决策程序，而后果则运用通用问题解决过程进行处理，从而形成了两种不同的决策技术：程序化决策技术和非程序化决策技术。每种技术又可分为传统技术和现代技术两部分。

程序化决策的传统技术有三种。习惯是制定程序化决策的全部技术中最为普通和最为盛行的技术。新雇员往往在社会经办的教育训练机构中就已学会了部分习惯性技能，而组织则通过正式培训和体验为新成员提供他们工作所需要的全部技能和习惯。标准操作规程则是一种刚形成的、以正式书面方式记录下来程序，它使新成员明白地接受习惯模式，并使老成员注意其以往忽略的习惯模式。在标准操作规之上的组织结构本身，就是一种对决策制定程序的不完全的记述说明。组织结构规定了一套关于组织的哪些成员将对哪些类型的决策负责的设想和预断。组织结构也规定出一套次要目标结构，在组织的各部门起选择标准的作用，同时组织结构也在组织内设立特别的情报责任单位，以便对组织环境的某些特殊部分进行审核，并将需要注意的事件，通知给适当的决策点。

非程序化决策的传统技术中，通常用的是判断。而判断是通过某些不确定的方式由经验、直觉和洞察力来决定的。一个极其困难的非程序化决策通常都需要决策者发挥创造性。对经理人员进行选拔和训练也是非程序化决策技术之一。它主要包括两种形式，一种是在入选人员进入组织前，在基本原理方面给予专业性培训；另一种是企业本身提供的、使入选人员通过亲身体验和有计划的工作轮换受到培训。有时还以大学里的高级管理训练或公司的培训计划作为后一种培训的补充。从而提高经理人员对非程序决策技术的提高。“格雷沙姆定律”认为，一定要通过建立一种特定的组织职责和组织单位来负责非程序化决策的制定。现代大组织的特点之一，就是拥有各种各样的参谋职能部门。它们大多是一些专门研究某些较为复杂的非程序化决策制定任务的单位，这种专门负责非程序化决策的部门是第三种传统技术。

现代的程序化决策技术主要包括运筹学、数学工具和计算机模拟等二战及以后发展起来的现代技术。运筹学是将“条理性分析法”运用于管理决策的制定、特别是程序化决策的。作为科学管理运动的继续和发展，它给管理决策带来了系统方法。数学工具是运筹学的基本工具，它包括许多种，但其共同之处在于：建立既能满足所用工具的条件，同时又能反映将要分析的管理环境的重要因素的数学模型。规定一个基准函数，对各种可能的行动方案相对优劣作比较用的一种量度。概算出该模型中说明其特定具体情况的数学参量。最终通过计算求出行动方案。使基准函数达到最大值。为了使计算能有效地进行，每种工具都要与计算程序相连。计算机模拟则可以研究系统行为，从而作出程序性决策。

随着现代技术的出现，程序化决策发生了巨大变化。电子计算机使得过去属于职员工作范围的那些常规的程序化决策制定和数据处理，迅速地实现了高度自动化。运筹学更多地用于以前的判断性决策中而导致程度化决策领域的扩大。计算机将数学技术适用范围扩大到一些过去无法用自动化程度较差的计算设备解决的问题上去，计算机模拟技术也扩大了可程序化决策的适用范围。一些公司已将制定中层管理决策的数学技术，与用于各办公室的数据处理技术结合起来，实现了部分工作的自动化。

非程序化决策的制定技术也在经历一场革命，这主要指的是探索式解题技术的应用，其中包括决策者的培训和探索式计算机程序的编制。我们现在对一个人在进行判断时的思维过程有了一定的了解，并已达到将这许多过程在计算机上模拟的程度。

西蒙认为，人类的思维是由程序控制的，而这个程序将无数的简单的信息过程(即无数符号的控制过程)组成整齐而又复杂的序列，并且他们对任务环境和序列展开时由环境抽取的线索很敏感，很适应。因为可以给计算机编制出同样的程序来描述或模拟人类的思维。人类的神经与计算机硬件固然不同，但在基本信息过程所表示的详细程度的情况下，人们可以编制程序来描述人类符号控制的情况。这些程序可用来诱导计算机去模拟人类的思维过程。

通过对人类思维过程的研究，西蒙提出了一种新的决策方法，即所谓“目标——手段分析法”。这种方法就是，首先为要实现的总目标找到一些手段和措施，然后把这些手段和措施又看作新的、次一级的目标，再为完成这些次一级的目标，找出一些更详尽具体的手段和措施来。这样分层反复找下去，直到有了现成的解决办法为止。解决问题的过程因而也可以看成是，通过将非程序化决策简化为一系列程序化决策，而最后完成非程序化决策的过程。

目前，依据上述思想，已设计出一种“通用问题解算装置”(GPS)。它是一种可以使用“目标——手段分析法”来解决任何以某一种一般形式存在的问题的装置。它的程序使它能描述或达到三种目标：转变目标；缩小差异目标；应用0程序目标：将0程序应用于转变前之目标。“通用问题解算装置”的程序最初是在实验室里对解题受试者的录音带里推导出来的。以后用“目标——手段分析法”为计算机模拟进行了编码。它利用目标和次要目标的方法，对问题的情况进行推理和求解，适用于任何能履行或适合于一般形式的问题。

在该书的第三章，作者着重分析了计算机和自动化对工作场所的影响、对工作满足感、对工人的激励和对工作疏远等的作用。

作者认为，以往对计算机和自动化有一些错误认识，主要包括对人类心理和生活的冲击，使工作非人道化以及使雇员对工作疏远。而这些往往证据不足。作者指出，近年来认为工作满意度已经下降或人员疏远问题已经上升的论点是没有根据的，因而这种未实际存在的“趋势”，无论是过去还是未来，都不能把它的产生归因于自动化。那种对政府或其他社会机构信任上的低落倾向是由其他各种原因引起的。随着工作日益全面的自动化，工人不再是生产过程的直接环节。只要这个过程正常运转，机器就可以在不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下生产出物质产品来。操作工人的可能职责将变为确定任务、监督生产过程。保证正常运转，处理困难问题等。工人通常不再被束缚在某些特定劳动场合，工人可能有也许没有跟别的人经常相互作用的机会。对办公

室自动化的研究表明，除了少数由于自动化引进得太快或是计划不周引起了严重的暂时性混乱之外，很难看出它对工作性质的影响，也没有任何证据表明办公室自动化已经或将要以一种大规模疏远方式的出现来改变工作性质。行业在“满意”问题上有着从高到低的排列顺序；专业和技术人员、经理、文职人员和小业主、售货员、手工业者和工头、服务性人员、办事员、操作人员、非农业劳动者等。随着自动化的发展，机器与人的比率将高于今天的组织，在流水线中，仍将有一些残留的“工人”——可能比今天的总劳动力的数量要少——来完成那些相对而言，要求更灵活的眼脑手协作的任务。为了使工业系统持续地运转，将有相当一部分人的任务将是进行预防性和补救性的维修。还有相当一部分具有专业知识水平的人将负责进行产品设计、生产程序设计和管理工作。此外，在全部就业人口中，从事服务性工作的人，包括直接为人服务的人比例将增加。因此，认为工作满意的人数将比目前有增加。因为自动化把劳力构成，从工作满意程度平均值较低的行业移向较高的行业。

随着自动化的发展，我们的社会出现了向削弱权威方向变化的长期趋势，它使得那种认为组织正在变得日益独裁，并且窒息人的创造才能的论点逐渐变为过去。那种认为人在一种能为他们提供中间性结构，包括那些由权威关系中所派生出的结构环境中，将工作做得最好、最富有创造性和最舒适的理论，正一步步影响着现实。但还很难说中庸之道何在，而且也没有证据表明我们正在远离“中庸之道”。

虽然我们处在一个变革的时代，但不再有那么沉重的心理压力。自动化可能给人类带来的后果，在份量上是适中的，而且是逐渐出现的。它同时带来有利和不利条件，而前者要多于后者。

第四章主要探讨了计算机和自动化的出现对组织机构和管理工作的影响。

西蒙认为，当代是信息大量产生，形成“信息爆炸”的时代。重要的不是获得信息，而在于对信息进行加工和分析，使之对决策有用。决策者需要的是对决策有意义的信息。决策者的注意力是一种最宝贵的资源，不能无谓地消耗在大量无关的信息上。所以，对信息的提供，应当有一定条件的限制。不符合这些条件的信息，不应该输送给决策者。这就要明确管理人员在作决策时需要些什么信息，根据决策需要提供信息，避免大批无用的公文报表的出现。要认识到人脑处理信息的能力是有限的。所以必须重视信息处理效果，作出好的组织设计和决策。计算机在处理信息时，如果输入大于输出，它就起到了作用；如果输入了一大堆信息，输出的信息仍是一大堆或更多，则它就没有起到作用。所以信息系统中应包括一个筛选系统，保证提供与决策有关的有用信息。

西蒙认为，一个组织一般有三层机构，这三层机构分别是：基层机构，主要从事于直接生产过程、获取原材料、制造并储运产品。中层机构，从事于程序化决策，管理生产和分配系统的日常工作。上层机构，从事于非程序化决策，设计整个系统，确定其目标，并监督其实施，数据处理和决策制定的自动化将不会改变这三层基本的机构。自动化通过对整个系统进行较为清晰而正规的说明，使得各层次之间的关系更为清晰明确。大型组织不仅分有层次，而且其结构几乎普遍都是等级结构。即组织分成小单元，而这些小单元又分成更小的单元，这样依次细分下去。而通常加于这一分层系统的

金字塔型的权力机构也是分等级的。复杂系统划分等级的原因主要有三点：

通过演化过程而最可能出现的复杂系统正是由各个分系统构成的分层等级系统。在体积和复杂性已定的各种系统间，分层等级系统各部分间所需要的信息传输量要比其他类型的系统少得多。对分层等级结构来说，从组织中任一特定位置来观察，该组的复杂程度与其总规模几乎无关。计算机，无论从软件还是从硬件看，都同样显示出清楚的分层等级。分层等级结构是人类的有限智力，在面对复杂情况时所采取的一种适应形式。所以，决策制定的自动化不可能消除它。但分层等级结构在集中决策或分散决策的程度上，以及在各部分间权力关系上，是有差异和区别的。

组织设计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集权与分权的关系。二战以后曾出现过分权运动，如今这种势头在减弱，集权倾向又有所抬头。西蒙认为，公司结构在产品部门化热潮之后，又重新作了回顾和思考。认识到部分间的相互依赖有时比人们想象的大很多。使决策趋于集权化的第二个力量是计算机和自动化的引进。他指出，由于个人的认识、情报来源、能力、知识、经验等方面的限制，下级人员可能不如高层领导那样能够作出更适合于整个系统的决策。各级管理人员的决策要同他们的情报来源和职能相适应。所以有关整个组织的决策必须是集权的。另一方面，由于个人的认识能力是有限的，无法同时了解和分析一个复杂问题的各个方面，必须把它分解为不同因素，由不同的专门部门研究，所以此时决策又必须要分权化以保证其合理性。

自动化使得基层操作人员大大减少，导致了对基层管理工作的需要的减少，但由于对自动化决策和规划系统进行设计和维护的参谋性作业的增加，使得中层管理人员并未像人们所预料的那样减少。但我们必须看到，参谋单位的增长是以直线单位的减少为代价的。随着直线组织的变小而使组织的层次减少，同时通过参谋职能的扩大而使组织扩展。这样，组织在某些方面来说比以前的结构更为复杂。跨越等级界限的各单位间的相互作用更多了。但这种复杂性是可以容许的。因为这种复杂性与该系统实际操作中所需要的高频交互作用关系较小，而只是与具有较长时间范围的规划活动关系较大。

《管理决策新科学》新就新在作者引入了高科技的自动化这样一个变量，讨论在计算机和自动化的前提下，对管理工作、组织结构和决策技术的影响问题。为此，作者进行了人机比较，提出了与计算机相适应的两种决策技术。分析了层级结构及新技术条件下的集权与分析问题。作者关于决策过程的四阶段论更是经典中的经典。

(森竹 撰)

【美】比尔·盖茨：
《未来之路》——开启未来的金钥匙

我毕生致力的主要是我的微软业务，那是我决定献身的事业——个人电脑事业是年轻人的事业。

——比尔·盖茨

《未来之路》，通俗易懂，然而充满睿智、远见，确实可以作为当代中国读者了解信息高速公路乃至 21 世纪人类生活新貌的最佳入门书。

——辜正坤

一、比尔·盖茨的生平与事业成就

在 1995 年 7 月的《福布斯》杂志上，美国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Bill Gates)被评选为全世界最富有的人，他个人拥有的资产达到 129 亿美元。

这次《福布斯》评选的全球十大富豪，并不把凭世袭或政治地位取得财富的人包括在内，这十大富豪所拥有的财富全凭个人努力创业所获得。盖茨的 129 亿美元，就是在 20 年间的艰苦拼搏中积聚起来的。

盖茨其实也是一个普通人，他没有伟人的相貌，没有不凡的姿态。他有一头蓬松的金发，满脸雀斑，肤色苍白，身材平常，厚厚的眼镜片后有一双目光灼灼的眼睛，衣着颜色和款式的搭配甚至不如常人。他每看准一次机会，就全心全意投入，在这过程中，他呕心沥血，也有过颓丧和虚怯。但大多数人只看到盖茨巨大成功的喜悦，而不会想到这喜悦背后的艰辛。

比尔·盖茨，1956 年出生于美国西雅图郊外的华盛顿湖畔。其外曾祖父丁·W·马克斯韦尔是美国有名的银行家，曾经当选为市长和州议长。母亲玛丽是一位社会活动家，父亲是一位著名的律师。

小盖茨是个天才，从小酷爱读书。盖茨在读中学时就已沉迷于电脑。当时，电脑应用处于萌芽阶段，电脑程序中的错误被行内人士称为“臭虫”。一天，盖茨走进一家电脑公司，大言不惭地说：“我们可以帮你们‘捉虫’。”

从 12 岁开始，电脑就成了他的终身伴侣。他的大脑细胞与电脑里的线路和元件几乎是相通的。他 13 岁开始编写电脑程序。中学时代，这个电脑神童就显示出经商天赋。

1972 年，盖茨和艾伦创立了交通数据公司。1973 年秋，盖茨考入哈佛大学，被获准同时攻读本科和研究生课程，允许任意选修数学、物理和计算机的课程。这期间，他同艾伦一起编制了 BA - SIC 程序。这一成功使盖茨和艾伦非常高兴。盖茨心中豁然开朗，他意识到他真正的兴趣在于计算机，他的使命在计算机，他的未来在计算机。从某种程度上讲，他来到世界就是为了开创一个新的产业，为人类开辟一个新的天地。1975 年，19 岁的盖茨毅然中途辍学经商。也就是在这一年，日后妇孺皆知的微软公司(Microsoft)成立了。

在微电脑普及旋风的带动下，微软公司起飞了。苹果公司成了微软公司的大客户。盖茨和乔布斯都是电脑神童，一个致力于搞软件，一个热衷于搞硬件。

客户见到盖茨时，总不免怀疑眼前的小伙子是不是微软公司的董事长，他们往往伺机打电话到微软公司查询。公司女秘书总是这样回答：“他是一个年纪看上去十六七岁，长一头金发、戴眼镜的男孩！”

微软公司在新产品开发上取得重大进展，他们为当时最先进的英特尔 8086 微处理器编写 BASIC 语言程序，以完美的声誉走向市场。

IBM 公司历史悠久，规模庞大，号称“蓝色巨人”。这个巨人向微电脑市场进军，选择了微软公司为合作伙伴。

尽管微软还只是一家小公司，但盖茨却深得市场运作的精髓。他致力于整个电脑市场的结构，竭力要建立行业通用的标准。

随着微软的发展，盖茨大力收拢人才，公司的业务越来越好。在此基础上，盖茨确定了向“应用软件”进军的企业发展战略，从而使微软产品成为软件产品行业的标准。

微软公司从 1975 年创业，直到 1981 年中，公司内部的财务管理相当原始。盖茨忙于产品的开发和市场拓展，完全顾不上公司内部的管理。税务方面没有合理计算，结果 1981 年赚了约 100 万美元，半数交了税。

当时又逢莲花公司打了一场漂亮的市场闪电战。仅一年半，“莲花”就成为上市公司，市值逾 1 亿美元。“莲花”的下一个对手就是“微软”。

比尔·盖茨沉着应战，他果断地把微软公司与《PC 世界》杂志合作，开订杂志送软件宣传促销之先河，送出“微软词”演示版 45 万份。从此，其他软件公司争相仿效，渐成电脑业常见的宣传促销形式之一。

“微软词”在美国市场上屡遭挫折。经过不断改进，1990 年，“微软词”终于跃居领先地位。

电脑应成为人们的日常生活用品，因为它将来必定是容易操作的东西，就像电视机、收音机和其他电器一们。盖茨和乔布斯所见略同。

盖茨慷慨陈词：“如果企业经营者不为长远目标付出重大代价，即是等于无视将来的结局公司应有短期目标，但是长线策略是长久立于不败之地不可或缺的要害。……我们为什么不尽早去创造这个潮流呢？”

1986 年 3 月 13 日上午，微软股票正式上市，开盘价 25.17 美元立即成为抢手货。一年后，微软股票已冲至每股 90.75 美元，31 岁的盖茨因其持股而成为亿万富翁。

1987 年 8 月，“微软”取代“莲花”成为全球最大的软件公司。盖茨自豪地说：“也许过不多久，他们的营业额又追上我们。但是值得我骄傲的是，我们还未与他们真正决战的时候，第一的衔头已到了我们手上。”

1995 年 6 月，IBM 公司动用 35.2 亿美元收购莲花公司，分析家预料，这次行动将导致一个在软件业能与微软公司势均力敌的公司出现。微软面对 IBM 和莲花的“软硬联盟”，不甘示弱，推出“视窗 95”与之抗衡。微软并不把 IBM 和莲花合并看成是太大的威胁。

微软公司用推广流行文化的方式推销“视窗 95”。“视窗 95”一问世，就获得了空前的成功！在美国历史上，居然没有任何单一事件如此地轰动。

如果说：“在世界各行各业中，没有一个人物像盖茨那样赚钱赚得那样快”，是财富令盖茨骄傲的话。今天，我们要从另一个角度来看待他，因为

他领导并开创了个人电脑领域的新篇章，他是我们这个时代的爱迪生和福特，他体现的是数字化时代，也许，只有从他的《未来之路》中，感受到心灵受到的震撼。

二、《未来之路》评介

两点间的任何线，不论是直线，还是曲线，都是路。宇宙中有无限的点，因此若以人心之线连缀其间，则宇宙中当有无限的路。路贯通一切。然而路各有各的不同。有凡尘之路，有心灵之路；有上达天党之路，有下窥地狱之路；前通远古，后接未来——因此有这《未来之路》。

然而这里的未来之路不是由砂、石、泥土等构成，而是由信息构成，谓之信息高速公路。

以微电子技术和计算机技术为基础，包括信息的采集、处理、存储和传输技术，涉及到传感技术、多媒体技术、光导纤维技术、集成电路技术等一系列技术。建立在这些综合高科技之上的杰出成就，就是“信息高速公路”。

所谓“信息高速公路”，是克林顿在 1992 年美国总统竞选时提出来的设想，1993 年 12 月美国拟定了“全国信息基础设施”(National information infrastructure)方案；由此掀起了西方“信息高速公路”热。“信息高速公路”所描述的现代国家信息基础设施，就是以最新的数字化光纤传输、智能化计算机处理和多媒体终端服务技术装备，地区，国家或国际规模的多用户、大容量和高速度的交互式综合信息网络。

“信息高速公路”作为知识经济社会产业载体，是 21 世纪综合国力发展的重要因素，将对科技、文化、经济以及国际关系带来不可估量的影响，尤其是将带来巨大的市场。

在《未来之路》中，我们有幸通过一定的门径进入这条浩荡无垠之路。门在英语中叫做 GATE。饶有兴味的是，这本《未来之路》的作者比尔·盖茨的英文名字就叫 GATES(一道道的门)。所以通过一道道的门(GATES)，我们就可以进入信息高速公路，从而在未来之路上纵横驰骋，周游八极。

人类的想象力从来不像现在这样既超越存在，又执着于存在。当我们读到那些有关虚拟现实的篇章时，我们由衷地感到惊奇与振奋：数千年来人类所欲达到的所谓悄焉动容，视通万里的境界，而今只需一键在手，即可天上地下，神往心驰。现实与神话交互织入而成一否定之否定式太极图；人类的想象能力与科学的实现潜力的坐标图上似乎画出了一幅完整的互构互补正弦曲线。回到远古与走入现实将是 21 世纪人类语汇中的同义词。

现在，比尔·盖茨的《未来之路》横在读者面前，向读者展示出另一幅全新的人类文明画图。读者的忧虑或许只是多余的。按照比尔·盖茨所描述的虚拟现实图景，人类只消坐在家，就可以极为逼真地畅游天下。这样一来，人类就无须“回到自然”倒是自然以某种形式回到了我们身边，随时连接于我们桌上的个人电脑中。我们无须像远古的和尚道士两袖清风地云游四海，也无须像梭罗或爱默生那样在瓦尔登湖畔搭一个窝棚，以便亲聆自然的低语。我们可以进而推论，当虚拟的现实无限地仿真现实时，真真假假之间的界限就变得模糊起来。梦境、存在、神话、现实互动互构，融为一体。那时你可以是我，我可以是你，上下左右，古今未来，全可以共时和历时的方式存在。人与物的界限将最后打破，天人合一将不只是上古真人玄鉴、静观

宇宙幽微奥秘时的呓语，而成为新时代儿童可利用手中袖珍个人计算机助人转瞬成佛的亲身体验。

从一定的意义上来说，远古神话是现代科学的潜在形式，或者说现代科学是远古神话的物理印证。在我看来，凡人类可以想象得出的事物，都有实现的可能性。因为人的想象力先天地受制于人体心理或物理的客观条件，人类无法想象出没有某种客观依据的东西。

比尔·盖茨试图从微软公司的三次飞跃性的发展中论述信息化时代的必然和自己梦想实现的可能。从《未来之路》中，我们可以知道：微软公司第一次飞跃，是捕捉与 IBM 公司合作的机会，为 IBM PC 电脑开发操作系统软件 MS - DOS，借助 IBM PC 电脑的销售浪潮，使 MS - DOS 成为市场标准产品，成为每台 IBM PC 兼容电脑必备的软件。

微软公司第二次飞跃，是捕捉与苹果公司合作的机会，为麦金塔电脑开发图形显示界面的应用软件，积累经验，继而为 IBM PC 兼容电脑开发“视窗”操作系统，完成电脑显示界面由字符向图形的过渡。“视窗”操作系统也成了市场标准产品，使电脑变得易学易用，越来越多的人乐于接受。“视窗”操作系统和 MS—DOS 操作系统的销量随着电脑市场规模的急剧扩大而迅速增加。

微软公司第三次飞跃，是捕捉全球电脑网络迅速蔓延的机会。开发网络软件，大大加强“视窗 95”的网络和处理多任务功能。同时，微软公司还涉足与网络有关的金融、影视娱乐等行业，在网络世界中建立霸业。

结合当今科技的发展，比尔·盖茨在本书中试图从以下方面预测未来发展趋势。

信息时代是以知识为基础的时代，应用知识、添加创意是经济活动的核心。例如领子装晶片的智慧衬衫、依照路况自动调整轮胎压力的车上智慧地图电脑，都是带着知识的产品。

在新时代，知识取代土地、厂房，成为企业最重要的资产，改变了企业评估与管理资产的方式，也改变了国家的成长模式与国际竞争力。

信息时代一切信息数字化，过去有形的现金、支票、报告、面对面的会议、照片都转变为数字的 0 与 1，以光速在光纤网络中飞快流动。这不但提升了信息传输与储存的数量、速度与品质，也扩大了信息相互组合的可能性。只要比比电子邮件与传统邮局的差别，就能了解数字化带来的改变。

数字化使得一切都可虚拟化，逐渐浮现的虚拟办公室、虚拟企业、虚拟百货公司，将彻底改变经济活动。

网络的诞生将企业组织分子化(molecularization)，每一个知识工作者就是企业的最小单位，可以应工作需要做机动的组合。在分子化的组织中，自动自发、主动学习的知识工作者，透过网络合作，以知识与创意为产品创造价值。

企业可以依循网际网络的发展模式，建立网际化的组织，企业可以透过网络找寻资源与结盟，让组织内、外的疆界可以像流水一样任意延展。这对小型企业的帮助最大。

现在消费者与生产者可以透过网络直接接触，使得两者间的中介商消失，各产业的中介商必须找出自己的新价值，向价值链的上方爬，提供更多附加价值，才能免除被淘汰的命运。

产业间相互结合发展新产业是未来的趋势，结合电脑、通讯与信息内容

三者而生的新媒介及其衍生的相关服务，构成了一个新产业，并且已经占了美国国内生产总值(GDP)的 10%。现在新媒介也开始与艺术、科学研究、教育相结合，带动各产业的新发展。

在信息时代，创新对企业的重要性远胜过原料与厂房，软件业龙头微软公司教战守则中的一条就是“淘汰自己的产品”，否则别人就会毫不留情的超越你。这是微软成功的秘诀之一，也是新信息时代的生存法则。

在生产者与消费者可以经由网络直接接触后，生产者与消费者间的界线也变得模糊，消费者可以透过网络将自己的意见加入到生产过程，使自己成为部分生产者。而迎合消费者个别要求与品味的大量订做就将取代过去的大量生产。订做个人化的车子、编辑自己要的新闻、更改电影的结局都是这样的例子。

信息以光速传输的新时代，快速就是成功的新关键，在 1990 年，一部汽车由构思到生产出厂要花上 6 年的时间，现在已经缩短为 2 年。

随着网络无限制的延伸，以及知识无国界的影响，数字经济必定是全球化的经济，而全球化也加速了新科技的扩散。

在这一切新发展的冲击下，工作环境与工作内容都彻底改变。由于人们对新科技的接纳程度不同，社会上可能会出现前所未有的不一致。同时由于现有法律无法规范日新月异的新科技，人们的权力分配、工作品质、生活品质都会陷入混乱，面临新问题。

更为重要的是，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详细地阐述了自己面临未来挑战，把微软公司向信息企业新方向转换的经营层次谋略。从中，我们可以了解他如何使企业环境在未来的发展中更趋于合理和有利。

第一层，个人应用多媒体个人电脑，将信息传输效率转变为学习效率，大幅度提升个人工作与学习的效率，成为高效率的工作者。

第二层，利用集体工作网络，大家不但可以突破空间的限制，还可以同时进行工作，也不必等上游的人完成工作才动手。这可改变组织的工作流程与内容，建立高效率的团队。

波音 777 型飞机的设计，从头到尾没有一张蓝图，全靠集体工作网络把从材料供应商到消费者的各种参与者串连起来，共同在网络上完成设计。

第三层，利用信息网络将企业内部原本各行其是的众多部门整合为一体，将组织转型。

第四层，在企业间建立电脑连线，直接与组织外的顾客、供应商、甚至竞争者交换信息，使企业得以扩大疆界，重整对外的关系。

第五层，建立网际网络，将相关行业连结成商业网，创造新的商机。

例如建筑商、设计师、水电行等建筑相关行业可以连结成一个建筑网，开辟房屋新市场。想买房子的消费者可以在建筑网上选择房子的各项设计与配备，最后再看看虚拟的新房子是什么样子。

此外，在以知识、创新为基础的信息经济时代中，学习是生存先决条件，大家必须重新思考学习、工作与生活三者间的关系。

一是工作与学习逐渐融合为一。我们从事知识工作的同时，就是在学习新知。

二是在信息快速流动、更新的信息时代，学校正式教育所教授的知识很快就会过时。我们要保持竞争力，就要不断地学习，将学习当做是终身的挑战。就算只做消费者，也必须不断学习、更新自己的知识基础，才能成为知

识消费者。

三是由于学习是终身的挑战，所以组织与个人都必须负起学习的责任，私人企业将逐渐分担部分的教育工作。

遍布全球的麦当劳在美国有一所汉堡大学(Hamburger Uni - versity)，为超过 1 万名员工提供具有学分水准的课程。在 1995 年一年中，就有 70 万名麦当劳员工接受有系统的训练。

四是竞争较不激烈的校园，向来对变动的反应较慢。但是一些比较积极的学校已经开始努力改造自己、开始创新。在校园加装电脑、提供网络服务都是积极反应的动作。不过大多数教育机构仍未适应科技的冲击，做根本的改变。

五是组织学习是企业在信息经济环境中最可靠的竞争优势。企业要建立学习型组织，必须先具备观察环境的意识。网络就是企业意识的触角，让企业将团队的知识，转变为企业的智慧。所以企业必须建立好内外沟通的网络，才能有效地组织学习。

六是结合三 C 的多媒体新媒介将学习的内容变得更生动有趣，也使得学习走出教室、进入办公室、客厅与汽车，如影随形，创造工作即学习的环境。而接受新科技作为学习工具的学生，也会更有效率，成为终身学习的一分子。

同时，比尔·盖茨也清醒地认识到了信息社会对国家生活的影响，从表述中，我们可以知道：

全球联网加强了民主以及个人的权利的可能性。现在任何人都可以通过因特网发表信息和评论，电子函件的推广可软化严格的等级制度，信息革命使小小的、喜欢冒险的门外汉可以同电话巨人进行战斗。信息时代的象征是有无数联结点的、普及全球的网络，这些联结点是相互联网的，联网的世界可以使思想、市场和贸易更自由。控制信息、压制思想、孤立社会变得更困难了。

网络天地是一个创造力、想象力爆炸性膨胀的天地，每天都有大量的新技术、新手段、新概念问世，挂在像 DEC、IBM、惠普等公司的每日公告牌上，让专家们也难于跟踪了然。网络已经成为人类创造力最大限度膨胀与滋生的一片沃野。而创造力的释放与否以及释放量的大小，正在成为一个民族、一个国家成败的重要分野。邓小平同志说过：不开放是没有出路的。对于中国更是如此。

比尔·盖茨在《未来之路》中频频提到“正螺旋循环”和“负螺旋循环”。笔者虽然不能断定他曾经读过《老子》或《易经》，但可以强烈地感到他这种提法上的阴阳意味。一种东西文化同根异趣、互补互彰的感觉始终洋溢在笔者心头。当一串串计算机术语流经笔端的时候，笔者总是情不自禁地想，在一定的意义上，它们其实原本来自中土。众所周知的事实是，欧洲计算机的创始人莱布尼兹就是受《易经》、《老子》的阴阳理论而创立二进位制的数学及计算机的。《易经》的阴爻“--”相当于计算机二进位数中的“0”可表示关；《易经》的阳爻“—”则相当于计算机二进位数中的“1”，可表示开。《易经》64 卦，每卦有六爻共 384 爻，用之可演绎出宇宙万物的一切动静变化。又，遗传学上的 64 个遗传密码与《周易》64 卦圆图如出一辙，更显示出《易经》八卦原理的普遍意义。一些中国学者还提出遗传密码及八卦中的中极学说，即遗传密码及八卦三联体的第三个密码为中性，变异不改变氨基酸的性质，生动地体现了老子“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

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的理论。与此相类，信息高速公路上的一切信息，不论它们看起来多么复杂，追根溯源，不过都是与阴阳状态“— —”“—”相对应的“0”、“1”状态之排列组合而已。

当然，东方文化在这种抽象理论上的超前性质，并不能保证它在实践上总是走在全球文化的前沿。事实上，从16世纪开始，它就渐呈衰落，徒有高妙的理论，而少具体的建树，这确实令所有华夏志士难免慷慨生哀。计算机原理发轫于东方，结果于西方，随着世界各国风起云涌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热潮，中国的信息高速公路建设蓝图亦必顺应此大潮而迅速诞生。正像一位记者指出的那样：长期以来，西方人总是把中国称为CHINA(陶瓷)。而今天，中国高速信息网计划的英文缩写碰巧也是CHINA(CHINESEHIGH SPEED INFORMATION NETWORK APPROACH)。这种文字上的巧合或许正预示着，有朝一日，以想象力著称的中华民族会以阴阳八卦为基础的计算机技术崛起东方，成为信息世纪的一代枭雄。

所以，从《未来之路》中，我们可以受到最大的启示：国家有必要对世界科技发展方向和中国目前的能力进行全面的考察和研究。结合科技、经济、国际关系等诸方面的考虑因素，制订出具体的，而不是泛泛空论的高科技发展规划，并把目前积累的资金投放进去。无论如何，中国都应该努力实现从靠简单劳动赚钱向靠熟练劳动或脑力劳动赚钱的转变。如果这个转变完不成或完成得太慢，中国都将面临被新技术淘汰的危险，目前的高速增长将会很快化为泡影。因此，国家主导的高科技发展应该在科研方面主要集中于基础理论研究，而在产业方面则主要集中于跟踪外国已经成熟、而对中国又至关重要的一些领域。

(陈翔云 撰)

【美】彼得·林奇：
《学以致富》——对股票投资艺术的独到分析

股票投资是一门艺术，而不是一门科学，对于那些受过呆板的数量分析训练的人，处处都会遇到不利的因素。如果可以通过数学分析来确定选择什么样的股票的话，还不如用算命电脑算命。选择股票的决策不是通过数学做出的。

——彼得·林奇

“如果我要送我孙子生日礼物，我就买这本书给他们！”

——华伦·巴菲特

一、彼得·林奇的生平及其事业上的成就

彼得·林奇，1944年元月19日出生于美国波士顿。他的父亲是波士顿学院数学教授，后来成为约翰·汉考克公司的高级财务审计师。不幸的是，在林奇7岁时，父亲患了癌症，3年后病逝。父亲的病逝，使林奇的家庭经济陷入困境。为了生存，林奇的母亲不得不到一家制造公司上班，而正在读小学二年级的林奇也不得不从私立学校转到一所公立学校就读，并决定找个半天的工作，以帮助家里渡过难关。于是，1955年，林奇成了高尔夫球场的一名球童。也正是此时，林奇选定了自己的职业。

球童生涯并未妨碍彼得·林奇的学业。他读完了中学，并顺利地于1962年进入波士顿学院学习。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而放弃兼职球童的工作。而且，林奇在大学时期也因高尔夫球而再次受惠。当时，波士顿大学向他提供了弗朗西斯·维梅特球童奖学金。由于日后的职业十分明确，因此林奇便有目的地专门研究与股票投资有关、有益的学科。除了必修课外，他没有选修更多有关自然科学、数学和财会的课程，而是重点地专修社会科学的课程，如历史、心理学和政治学。此外，他还学习了玄学、认识论、逻辑、宗教和古希腊哲学。林奇这与众不同的作法似乎很难让人理解，然而，林奇却有自己的见解。林奇认为搞股票投资需要学好从商所应当具备的正规自然科学课程，但就为进军股市而作准备来说，历史学与哲学显然比统计学更有用。

1965年，林奇完成了波士顿学院的学业，成为波士顿大学的研究生。结束了两年研究生的学习之后，1967年林奇到炮兵服役。1969年林奇退役，并作为一名长期雇员和调研人员加入麦哲伦公司，专营股票投资。此后，林奇坐阵麦哲伦，洞悉华尔街，注意分析股市行情，使麦哲伦公司在股票竞争中获利颇丰。1974年6月，林奇从研究部副主任被提拔为该部主任，同时负责分析化学、包装、钢铁、制铝以及纺织等行业。他的工作主要是动作一个智囊团，造访各个公司，最后提供意见。1976年，林奇建议吸收爱塞克基金。1977年他负责一个小基金，名叫麦哲伦基金，同年，他成为麦哲伦公司的总经理。到1981年麦哲伦基金的总资产已由1400万美元增长到5000万美元，

它还吸收了富达公司的沙伦基金。

林奇在其数十年职业股票投资生涯中，特别是他于 1977 年接管并扩展麦哲伦基金以来，股票生意做得极为出色，不仅使麦哲伦成为有史以来最庞大的共同基金，使其资产由 2000 万美元，增长到 90 亿美元，而且使公司的投资配额上原来仅有的 40 种股票，增长到 1400 种。林奇也因此而收获甚丰。

惊人的成就，使林奇蜚声金融界。美国最有名的《时代》周刊称他为“第一理财家”，《幸福》杂志则称誉他是“股票投资领域的一位超级投资巨星”。彼得·林奇从长期的投资经营中，也认识到了自己的不凡，并以“股票天使”自居。

二、《学以致富》评介

《学以致富》是彼得·林奇第三本畅销著作，是继前两本理财畅销书——One Up On Wall Street 及 Beating The Street 之后的彼得第三本力作。该书笔触轻松活泼，作者以每天唾手可得的生活例子，深入浅出地告诉投资新人，如何建立正确的理财方法及理财人生观，并让你的钱以最有效的方式为你赚钱。

该书告诉人们未经深思熟虑就冒然进行投资，无异不懂交通规则即开车上路一样危险，投资人不可不慎。这本书，使我们了解投资大师的选股致富秘诀，是一本不可或缺的投资入门书。

投资是件有趣的事情。学习投资可以丰富人生，更可帮你迈向富裕之路。

在我们的社会里，一般大多由男人负责主要的理财工作，女人则在一旁观望，任由男人一意孤行。其实，在投资的实务上，女人可以表现得跟男人一样好。没有任何人一出生就懂得投资的诀窍，千万别相信“天生的投资专家”这种说法。投资一定得花时间靠学习才能入行。

理财的方法其实很简单。第一项原则就是：储蓄等于投资。存在扑满或糖罐子里的钱并不等于投资，但如果你把钱存进银行，或是买公债、股票，这就是一种投资。别人可以用你存在银行的这笔钱去开店、盖房子、建工厂，如此就创造出很多的就业机会，越多的就业机会，就表示越多的人因此而领得一份养家糊口的薪水。假如这些人都能存钱甚至投资，就会带动整个社会共同投资的良性循环。

任何一个家庭、企业及国家也都一样。无论是比利时、博茨瓦纳、中国、智利、莫桑比克、墨西哥，通用公司或奇异公司，抑或你家、我家，一个平日就懂得如何储蓄且投资的人，他的未来一定会比那些每月薪水都挥霍殆尽者更为富裕。美国之所以成为全球数一数二富裕的国家，就是因为她曾经是世界上储蓄率最高的国家之一。

你一定听很多人说过，要找到一个高薪而有前途的工作，必得先接受良好的教育。但你可能不明白，长期而言，你将来的财富并不只取决于你目前赚了多少钱，而是你能够拿多少钱去投资。

从事投资活动最好越年轻越好。因为投资的时间越长，成果越丰硕，但这并不是说这本书只适用于年轻人。只要你对投资感兴趣，任何年龄层的人都可以从本书中得到观念上的启发。

人类的寿命越来越长，意味着要付帐单的日子也越来越长。如果一对夫妻能活到 65 岁，他们就有机会活到 85 岁；如果他们能活到 85 岁，他们其中

之一很有可能活到 95 岁。这期间需要靠钱来维持生活开销，而赚钱最好的方法就是投资。

事实上，65 岁才开始投资为时未晚。现阶段 65 岁的老人，可能可以再多活两个十五年，投资可以让他们的财富继续增长，以支付那多出来的两个十五年的帐单。

当你还是少年 15、20 岁时，一定很难想像 65 岁时会面临什么样的生活景况。但如果你能养成储蓄及投资的习惯，在往后的 50 年，财源将会向你滚滚而来。即使你每次投资得不多，50 年丰硕的累积一定会让你叹为观止。

你投资得越多，对自己越好，整个国家也会因此而更兴盛繁荣。因为你也间接对开创新事业及就业机会，报效一臂之力。

作者在该书中指出美国的中学忘了教所有课程中最重要的一课——投资。这可说是美国教育体系上一个重大的疏漏。学校教历史，却未提及有关商品社会的发展，以及公司体制对改变人们日常生活所扮演的角色；学校教数学，却漏了教如何利用简单的算式，去推估一家公司是否能经营成功，一般人可否从持有这家公司的股票而获利。

学校教家政学，例如缝纫、烹饪、计划开支及记帐等，却忽略了教导学生及早储蓄是奠定未来财富的关键，同时最好在买下房子后，开始运用这笔储蓄投资股票，而且越早越好。

学校也教我们爱国，但大多着眼于军队和战争以及政权运作，却很少提及攸关国家兴盛衰亡的关键——各行各业。如果没有人投资金钱供各行各业发展事业，雇用新员工，或是改革旧体制使其发展、运作得更有效率，这世界将会瓦解，大家都将因此失业，美国也不可能有这么繁荣的一天。

作者在书中根据自己在股市投资的经验，对投资者作出以下几点忠告：

1. 想赚钱的最好方法，就是将钱投入一家成长中的小公司，这家公司近几年内一直都出现盈余，而且将不断地成长。

成长性的比率是财务分析中的重要比率之一。它一般反映公司的扩展经营能力，同偿债能力比率有密切联系，在一定意义上也可用来测量公司扩展经营的能力。因为安全性是收益性、成长性的基础。公司只有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偿债能力比率性、成长性的基础，只有制定一系列合理的偿债能力比率指标，财务结构才能走向健全，才有可能扩展公司的生产经营。

林奇认为成长是一个公司的重要特性，成长股也是他投资组合最大的单一类股。然而，成长中的公司绝不是他找寻的唯一目标。在任何时候都有被高估或低估的股票，形成有利的买卖机会。关于成长，林奇尤其重视单位成长的程度甚至超越盈余成长。成长股投资理论大师洛威·普莱斯所找寻的是在每个景气循环都有盈余成长的公司。不过，高成长可能起因于售价调高或高超的购并技术。林奇则注重每一个季度与每一年实际单位销售量的成长。

2. 个别投资人的优势在于他没有时间压力，可以仔细思考，等待最好时机。如果要他每星期或每个月都要买卖股票，他肯定会发疯的。

林奇认为，当一名消费者考虑购买一项重要的家庭用品，譬如烤箱，他会仔细研究，他会询问买过类似产品的朋友，并阅读消费者报告。同样的，如果他想买一栋房子，他会请建筑商检查屋子的水电设施。另外，他也会留意附近的学校制度是否完善。但是，同样的人若是买股票，却往往只根据小道消息，完全忽略了研究。

而个别投资人在某方面仍比专业人士占更大便宜。因为他没有时间压

力，可以仔细思考，等待最好的时机，就如同他在选购房子一般。

3. 一般消息来源者所讲的与他实际知道的有很大的差异，因此，在对投资作出抉择之前，一定要深入了解并考察公司，做到有的放矢。

林奇指出，有时候，向公司经理人查询其公司以外的事务，就会有意想不到的收获，比如得知投资其供应商或顾客的构想，当林奇从建筑界获知销售比预期高出许多，他马上把思路转移到林业产品、水泥等建材上。林奇认为，消息来源者所陈述的和他实际知道的有很大的差异。如果钢铁厂老板告诉你，钢铁业的情况已大为好转，定是个可靠的资讯。若他说光纤业将有重大进展，你最好找比较可靠的查证。奇怪的是，许多投资人不去请教他想投资的产业专家，却宁愿相信外行人所提供的小道消息，只因为这些人其他产业负有盛名。

林奇也将相同的原理运用于购买美国股票上。就如他所说：“我只喜欢自己拥有这些东西。如果你的决定是错误的，而别的投资机构也买了这支股票，则全部人将同时冲向门外。如果我是对的，也没有什么差别——股价早晚会上涨。”

4. 在股市投资中，最好的结果是来自于一连串的惊奇。

在房地产上赚到钱通常会带给投资人意外的惊喜。你买到好东西，它的价值上涨，你什么也不做，它涨得更厉害。林奇说，他从股票中得到多数人从房地产才能得到的乐趣：最好的结果来自于一连串的惊奇。他买股票时，没有心存任何长期目标。当福特汽车宣布 1981 年不发放股利时，林奇进场收购福特股票，并持有至今。他于 7 年前买进克莱斯勒股票，10 年前买进单一系统公司的股票。买进克莱斯勒股票的 9 个月后，他发现公司的劳动情形比原来想像的要好很多。他买驻足商店的股票，过了不久就传来好消息，然后更多令人振奋的事情发生，慢慢地股价居然上涨了 20 倍。让林奇赚大钱的股票经常令他吃惊。一开始就被林奇看好的许多股票反而使他赔钱。事情很少会如预期想象那样顺利。

5. 为了赚钱，我们可以安心地假设，他敢买进必定是对他所看到的事物有信心。而一个面临内部人员大量收购压力的公司很少会倒闭。

当公司内部人员购入自己公司的股票，林奇立刻提高警觉。他说，知情者会因不同理由而卖出自己公司的股票。但是，他买自己公司的股票只有一个原因：为了赚钱。我们可以安心地假设，他敢买进必定是对他所看到的事情有信心。根据林奇的观察，一个面临内部人员大量收购压力的公司很少会倒闭。他特别找寻那些被公司中产阶层员工撑起来的低迷股票，这要比总经理都介入的情势更乐观。

6. 投资人不必坚持拥有神奇管理系统并处在激烈竞争环境中的顶尖公司的股票，只要选择经营成效还不错，股价低，而且在股价回升时，不至于分崩离析，一样可以赚钱。

怎样选择好的投资对象？林奇通过自身经验认为，找寻低本益比的股票、股东市盈率在 15% 与 20% 之间，销售获利率为 10%。林奇最怕碰到的股票，就是最热门产业中最热门股，这种股票特别受到投资人注目，而且人们争相购买，最后是崩盘。他举出过去被认为的热门产业，比如电子表、健康中心、石油业等。而且，高成长率如同磁源吸引着更多竞争者，使热门公司投下大笔资金扩充规模为的是保证市场占有率。这样一来，毛利率剧跌，公司陷入财务危机。再者，由于这些公司是投资专家与投机客追逐的对象，

因此，股价就会直线下落。

林奇还指出，有些产业乍看起来令人讨厌，投资人避之唯恐不及，因而它们的股价很具吸引力。比如国际服务公司多年来不断成长，直到它拥有全美 5% 的殡仪馆，才被市场人士注意到。而华尔街对其股票产生兴趣时，其价值早已攀升了 20 倍。虽然这类产业很令人厌烦，但是却是稳定的。因此，林奇说：“想赚钱你就必须找出别人不知道的东西，或做别人不会做的事情。”

7. 如果你有胆识，你可能会在国外找到便宜货，因为当地的市场效率较低。

林奇从不拒绝在国外投资，他把国外公司与国内同产业公司相比较，然后决定投资。比如福特、速霸陆和富豪，他曾在富豪持股最大。

林奇指出：“你可以根据价格从事两种股票之间的套利。譬如以折旧来说，你找出厂房的总帐面价值，接着比较 AKZO 与杜邦的年度折旧率。如果 AKZO 的折旧率为 4% 而杜邦的 2%，你知道 AKZO 的利润被低估了。”

林奇在欧洲投资成功的比率比美国高。在买入股票 3 个月后，他往往对一半的欧洲公司表现感到满意，而只有 1/4 的美国公司能带给他相同的快乐。不过他说：“法国的股票经纪人非常糟糕。若你有耐心地评估一家公司的每一个部门，你将发觉经纪人的预测完全无法实现。他们不知从哪里变出那些数字。”

林奇最喜欢买其他美国投资机构正开始累积的外国股。它们之中，有些公司市值很高，会吸收大笔资金。当收购进行到某个程度，股票已经被美国人买过头，他就退出找寻下一个目标。

8. 最恐怖的陷阱就是买到令人振奋却没有盈余的公司股票，以及便宜的统计数字。

林奇看到，最恐怖的陷阱之一就是买到令人振奋却没有盈余的公司股票。他曾经购入几十家这类公司，只要故事成真就可以赚十倍的钱，而每次都以赔钱收场。新的故事总是那么诱人，就如同他所说的“只有煎的声音，却看不到牛排”。每次他都忍不住咬了下去，却再度品尝失败的苦果。

林奇为这类股票取了一个十分贴切的名字“耳语股”。林奇会看上这些公司，因为他的消息来源(通常很可靠)低声告诉他：“我有一家非常棒的公司，它的规模太小，不适合基金投资，不过你可以考虑自己投资。”

另外，便宜的统计数字也可能是真正的陷阱，而且帐面价值也有可能误导投资人。投资人尽管必须熟记一家公司的各项数字，然而只以资产负债表分析是不够的。

林奇说：“不过，购买拥有良好资产负债表的公司仍有极大好处。如果它没有好转，我可以损失 1/3 的投资额。若好转，我将大捞一笔。”

林奇也曾经几乎赔光全部的投资额，通常是因为他过分忽略资产负债表。

9. 在股市赔钱的原因之一，就是一开始就研究经济情况，这些观念直接把投资人引入死角。

林奇说：“我每年只花 15 分钟作经济分析。”他指出，“在股市赔钱的原因之一，就是一开始就研究经济情况，这些观念直接把投资人引入死角。”

林奇注意到，人们总是问他股市与经济情势及其他一般的大问题，但是没有人能够回答。然而，若投资人买到体质不佳的公司，情势一片大好之时也会赔钱。他说：讨论 6 个月后国民生产总值的人是傻瓜。球鞋业的情形如

何？这才是经济。

另外，林奇也避免使用选择权、期货和其他所谓的衍生型工具。运用它们的成本过高，获利率也降低。林奇认为将原来投资于小公司的基金转入选择权市场是件可悲的事。他认为选择权市场就像是一个巨大、无用而且昂贵的赌博市场，不如将钱用来资助小型的新兴公司，尽管林奇承认，他投资新公司的成果并不理想。

10. 购买股票的两个最佳时段是，其一，一年一度的岁末减税抛售时期。其二，在股市崩溃或股价出现暴跌、波动和滑坡时。

股票的买卖除了对象的选择之外，还有时机的选择。相比较来看，可以说后者的把握较前者更为关键和微妙。因为一般来说，除了极个别的情况，股价总是要升上去的，起码还要分红配息，血本无归的情况绝对时间来看是不存在的。但是，股票投资的目的就是企图获得高于银行存款利率的利润，因此对股民来说绝对时间是没有多少意义的。股票没有了买和卖，也就没有多少意义了。这样买卖之间就要十分重视时机。

彼得·林奇总结说，购买股票有两个最佳时段，其一是一年一度的岁末减税抛售时期，这是因为个人或企业为了减税而抛售股票，其价位较低，也容易买进；

其二是在股市崩溃或股价出现暴跌、波动和滑坡的时候。这种情况，几年间或更短时间内总会出现一次的。

11. 不相信理论，不靠市场预测，不靠技术分析，靠信息灵通，靠调查研究。

林奇每天处理好几百种资讯。其中一部分的资讯是自己送上门的，但也有不少是林奇主动猎取的。股票经纪人是前者的主要供应者，大约有两百名经纪人向林奇提供各类消息。林奇平均每天都接到几十次他们打来的电话。

林奇通常不会亲自接电话。打电话的人也知道要把简明的资料留给秘书或交易员。每十次电话，他只会回一次。如果有他感兴趣的事，林奇会主动打电话联络。

关于调查研究，林奇有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做法。这些做法包括：充分利用经纪人；打电话到意欲投资的公司查询；认真研究公司的活动；参观公司的总部；结识该公司投资人关系处的工作人员；走马观花；留意观察；阅读报告……

该书还告诉我们如何阅读报纸上的股票报价栏、上市公司的财务报表，以及如何观察股市变化。同时，面对资讯及投资工具充斥的现代社会，人们最常碰到的疑惑诸如怎样投资最省时省力，以及如何为退休计划做准备等，都可在该书里找到答案。

(侯书森 撰)

【美】拿破仑·希尔：
《成功之路》——铸造富豪的黄金定律

当别人失败了，你只需要一个正确的想法，紧跟着一个行动，你就可以成功。当你自己失败了，你也只需转换一个正确的想法，紧跟以一个行动，你同样可以获得成功。

——拿破仑·希尔

如果我在 50 年前就学到这十七条规律，可能只需要一半的时间，就能取得目前的成就。

——罗伯特·达拉

一、拿破仑·希尔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在美国，拿破仑·希尔(Napoleon Hill)的名字家喻户晓，他师从杰出的成功学家和企业家卡耐基，走上研究成功学之路。由于创造性地构建了全新的成功学的科学体系，在人际学、创造学、成功学、创富学等领域内都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从而“青出于蓝而胜于蓝”，成为全球当代最杰出的成功学家，其名望甚至超越了其师卡耐基。

1883 年 10 月 26 日，希尔出生于美国弗吉尼亚的一个贫寒之家，这是一个深谙如何教育孩子争取成功、激励孩子获得成就的家庭。18 岁时，他一边读大学，一边为一家杂志社工作，不久有幸被派去采访钢铁大王、人际关系学家卡耐基。卡耐基立刻发现了这个年轻人身上的创造性，鼓励他开始从事对美国成功人士的研究工作，并且从多方面帮助他。在以后的 20 年中，他不断地充实和提高自己的，尝试过经营煤矿、作律师等各种不同的职业，最终成为一名商业新闻撰稿人，访问了包括福特、罗斯福·洛克菲勒、爱迪生、贝尔等著名人士在内的 500 多位成功者，并进行深入细致的研究。八卷本《成功规律》问世了。从此，它成为千百万渴望获得财富和权势的人的金科玉律，引导他们走向成功的殿堂。拿破仑·希尔也一举成名，成为美国社会享有盛誉的知名学者。

拿破仑·希尔曾经担任美国总统 - 伍德罗·威尔逊和富兰克林·罗斯福的顾问，他们的许多重要政策均受其影响，进而对美国和世界历史的进程产生了重大作用。一战中，威尔逊总统用希尔的励志秘诀训练和鼓舞士兵，筹募军费。1933 年，希尔则被罗斯福总统请进白宫主持著名的“炉边谈话”节目，唤醒美国人民沉睡已久的信心和活力，拯救危难中的美国经济。拿破仑·希尔为罗斯福总统组建了美国有史以来最为庞大的智囊团，为二战的爆发提前做好物质、精神和智慧上的准备，他本人也因此而名垂青史。

数年后，他辞去官职，将全部时间与精力投入著述。1937 年，他最重要的著作《思考致富》面世，迅速吸引了上千万读者，在全世界掀起了“致富学”的浪潮。

1960年，希尔与他事业上的接班人克里曼特·斯通合著出版了《人人都能成功》。此书激励人们通过纠正意识、性格和生活习惯上的缺点获得人生的财富，它为希尔赢得了世界性的声誉。读者遍及五大洲的50多个国家，畅销2000多万册。

《思考致富》中，希尔提出了奠定其“成功学”理论框架的十七条定律，涵盖了人类取得成功的所有主观因素，使“成功学”这门看似深奥玄秘的学问以直接、简单的形式变成了具体的、可操作的法则。这无疑为千千万万寻求成功之路的“问津者”，架设了一座由17个坚实的桥墩构成的通往成功彼岸的桥梁。而此后充斥美国市场的“成功学”“致富学”等书籍，无一不是以这十七条定律发轫的。

希尔创立了“拿破仑·希尔基金会”，这个学会成为美国渴望成功人士的“进修学院”。希尔本人也被誉为“百万富翁的创造者”和“政坛雄杰的塑造人”。十七条定律则被誉为“铸造富豪”的法则。无论在美国的政界还是商界，其楚翘无一没有领受过这十七条定律的恩泽。如美国的第26任总统西奥多·罗斯福，27任总统霍华德·塔夫脱，28任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32任总统伍德罗·威尔逊，汽车大亨亨利·福特，石油大王洛克菲勒，出版大王海福纳，柯达公司总裁伊士曼等人都是十七条定律的印派者、受益者和支持者。

轮船大亨罗伯特·达拉不无感慨地说：“如果我在50年前就学到这十七条定律，可能只需要一半的时间就能取得目前的成就。”

大发明家爱迪生曾经写信给希尔：“我感谢您花了这么长的时间完成‘成功学’……这是一个很健全的哲学，追随您学习的人，将会获得很大的效益。”

人际学大师卡耐基则这样评价道：“他的成功学，是一个‘经济的哲学’，是异于苏格拉底，柏拉图与传统西方思想史的哲学体系——它不仅是一个帮助人脱离贫困，实现经济富裕的方法，更是一门帮助人建立完善人格，享受丰盛人生的大学问。”

希尔去世时，他的学说已传遍美国和全球各地。人们不分国界，不分民族，不分性别，不分贫富，都在读他的书，都从他的书中汲取信心和力量。他的成功原则鼓舞激励千百万人，使他们由一贫如洗变成百万富翁，从无名之辈成长为社会名流。终其一生，拿破仑·希尔终于找到了人们梦寐以求的人生真谛——如何才能成功，这是一笔人类享用不尽的精神财富，人们将因此永远感激他，怀念他。

二、《成功之路》评介

拿破仑·希尔经过数十年的调查、研究和探索，在这本书中他以日常口语的写作方式，明快活泼的写作风格，对成功之路作出了简明的阐释，列出了为达到个人成功所需要的方法和技巧。总结出了成功学的17条准则，并且进行了实验。他对3000多名从未做过推销工作的人用很短的时间进行训练，把这17条定律现实化、具体化。结果这3000名普通人的95%成长为美国当时最优秀的推销商。在不到6个月的时间里，大部分人赚进了100万美元，他们分别付给希尔3万美金作为“谢师礼”，这17条定律也被誉为“黄金定律”。这是希尔成功学中的精华所在，也是欲求成功致富者不可不认真加以钻研的重要经验的总结，可谓成功哲学的宝典。

这十七条黄金定律就是：

1. 设定明确目标
2. 组织智囊团
3. 培养具吸引力的个性
4. 展现应有的信心
5. 多付出一点点
6. 培养积极心态
7. 控制你的热忱
8. 强化自律
9. 正确地思考
10. 控制你的注意力
11. 激发团队的合作精神
12. 从逆境和挫败中学习经验
13. 培养创造力
14. 保持健康
15. 预算时间和金钱
16. 运用宇宙习惯力量

以下我们就对这十七条定律一一加以评述：

第一，设定明确目标。 希尔非常重视目标的作用，要想取得成功，就必须制定目标。从明确的目标中会发展出自力更生、个人进取心、想像力、热忱、自律和全力以赴。它使得你认识到达到成功必备的专业知识，认真地预算自己的时间和金钱，对机会报有高度敏感性和警觉性。一个树立了明确目标的人，可以随时判断所做的决定是否有利于目标的达成，令你的言行与性格具有信赖感和自信心。同时，你应具备强烈的成功意识，在潜意识中不断地激励自己。仅仅确定明确的目标还远远不够，拟定出可行的书面计划，还要积极地将其运用于工作中。它可提醒你明确目标的力量，同时对于目标的缺点心中有数。认为幸运才是成功的关键的人过于悲观，如果你愿意为你所追求的目标付出的话，则帮助你的人，必将依照你的要求提供帮助。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的人，是永远都不会成功的。希尔认为成功的创富者应该如情场得意的白马王子，他锲而不舍地追求自己的目标，直至征服骄傲的公主为止。所以，明确目标应是 17 条黄金定律之首，没有明确目标的人永远无法进入致富天堂的大门。

第二，组织智囊团。 智囊团原则使你得以把他人的经验、训练和知识所汇集的力量，当作是自己的力量加以运用。为确保智囊团的正常工作，你必须做到确定智囊团的共同目标，根据其工作能力和与他人和谐共事的能力来挑选团员，确定报酬和订立明确的定期集会时间和地点。要保证智囊团的和谐，你应注意你的成员是否具有以下优点。即信心、了解、公平和正义以及勇气，这是维系这个团体的基本要素。但是，不要忘记，在督促他人的时候也要时常认真地检查自己。在你已经了解了智囊团的优点后，你所应当做的是尽可能培植智囊团。事实上，你可将全家人及任何你信赖或信赖的人都纳入其中。要利用各种机会，和你的全体成员一起学习新的知识，让自己不断地进步，应该扩展视野，从书籍、杂志，演讲和录音带中学习新东西，这些对于促进成员之间的和谐都有好处。

第三，培养具吸引力的个性。 希尔认为想要达到成功的第三个步骤，

是培养具吸引力的个性。积极心态是具有吸引力最重要的个性，是无论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具备的正确心态。成功者与失败者的差别在于前者是以“PMA”（即 POSitive Mentdal Attitude，积极的心理态度）去对待人生，后者则以“NMA”（即 NegativeMental Attitude，消极的心理态度）去面对生活。同时，在迈向成功的途中，你须学会“保持弹性”，快速地适应你所处的环境。此外，你应对你所确定的目标抱有真诚态度，凡事迅速做决定而不是拖拖拉拉。时刻注意保持一定的礼节，学会控制自己的说话语气，培养微笑的习惯。在与别人打交道时，尝试着解析别人的脸部表情，以宽容的心胸对待一切，勇于坦白真相，富于幽默感和正义感。在对自己的个人魅力做出评估时，你应当反问自己，你是否通过适当的措词，动人的演说，生动的表演，结实有力的握手，光明磊落的运动家精神等来感染别人，你是否喜欢和人接触，对周围的某些事物保持长久的兴趣，你是否多才多艺？显然，其中任何一种个性的进步都会促进你个性的全面发展，也会带给你前所未有的机智和自信。

第四，展现应有的信心。致富需要自信，这是拿破仑·希尔的一个重要观点，建立起积极的信心，循着外在世界和内在世界两条途径，来了解宇宙中的“无穷智慧”。希尔指出，各种消极思想，贫穷、恐惧、疾病和不和谐，都是自信的大敌，要学会以希望取代恐惧，使心神集中在你想做的事情上。希尔强调，自我激励是潜能的激活器。应该在心里反复对自己说：“这个世界是属于我的！”而将信心运用到实际行动的第二个法门，就是积极的心态，这包括：确立明确的目标，早晚祈祷你所订目标的实现，给自己下强制性的命令。写下并回想实现目标后会有的种种好处，接受支持你的人的鼓励，在你计划中的每一天都知道向目标又靠近了多少，选择一位成功人士做为你的假想敌，时刻给自己营造建设性的气氛。最后，要敢于坚持自己的想法，并且勇于承受可能付出的代价。增加和运用信心是费时而费力的，但你也将获得无尽的回报。

第五，多付出一点点。希尔的“多付出一点点”是一种经过几个简单步骤之后，便可付诸实现的原则，它实际上是一种你必须好好培养的心境。希尔认为人们时常吝嗇于自己的付出，殊不知你所付出的额外服务将会带给你更多的回报，只要你肯多付出一点点进取心，多付出一点点服务，你就会在不知不觉中以最佳心态完成高品质工作。仅仅是多付出一点点，你就会保持愉快的心境，培养自己的进取心，给自己以自信，帮助你克服拖延的习惯。最重要的是，你可能会获得更多的绝妙的机会。希尔设计出一个简单的公式以提醒你时时不忘多付出一点点： $Q_1 + Q_2 + MA = C$ （其中 Q_1 ：表示服务品质， Q_2 ：表示服务量，MA：表示提供服务的心态，C 表示你的报酬），切记 C 是指所有进入你生命的东西，而不仅仅是金钱。真正具有多付出一点点精神的人都将深刻地理解所可能获得的报酬。

第六，培养个人进取心。多付出一点点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使你重视个人进取心，而个人进取心又会使你进步，使你受到注意而且会给你带来机会。在希尔看来，进取心是一种极为难得的美德，它能驱使一个人在不被吩咐应该去做什么事之前，就能主动地去做应该做的事，正是因此，你才可以将你的潜能发挥到极致。强烈的个人进取心能够感染别人，成就他人无法成就的工作，创造机会，创造事业，也创造财富和进步。在你订出你的明确目标之后，就是你开始运用个人进取心的时候，开始执行你的计划，组织你的智囊团，积极地行动，尽一切努力使计划付诸实现，并从错误中学习经验，

别让外在力量影响你的行动，用对成功的想像来滋养你的强烈的欲望。显然，个人进取心是一种要求甚多的特质，它的实践需要许多心理资源作为后盾。当你的进取心处于低潮时，不妨求助于可在所有其他成功原则中注入新生命力，并且使它们再度发挥作用的一项原理：积极心态。

第七，培养积极心态。拿破仑·希尔告诉我们，我们的心态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我们人生的成败。积极心态是成功理论中最重要的一项原则。如果不了解如何运用积极心态，就无法从其他 16 项原则中得到最大的效益。你的心态是你——而且只有你——唯一能完全掌握的东西，练习控制你的心态，你必须培养许多良好的习惯。例如，克制自己的贪婪，培养精益求精的习惯，帮助别人，每周阅读一次爱默生的“报酬随笔”，彻底地盘点一下自己的财产，务必了解人的力量并非全然来自物质，避免任何具有负面意义的说话型态，信任和你共处的人等。事实上，只有 2% 的人能将愿望、欲望和希望转变为确信，并最后变为信心，所以你要培养自己的积极心态，加入这个百分之二俱乐部，并以其为基础，展现你的个人进取心。

第八，控制你的热忱。热忱和积极心态与成功过程之间的关系，就好像汽油和汽车引擎之间的关系一样；热忱是行动的动力，它和信心一起将逆境、失败和暂时挫折转变为行动，借着热忱，你可将任何消极表现和经验转变成积极表现和经验。但是不要忘记控制热忱，热忱失控时，你可能会垄断说话内容，丧失判断力。所以你应当学会像使用汽油一样来使用你的热忱。为了培养热忱，你须知热忱是你为成功所付出的所有努力的自然结果，你为达到目标所采取的每一步成功步骤，同时也是在创造你的热忱。而热忱的行动，做一些“办得到”的工作，都是热忱的加强剂。希尔告诉我们，培养、展现和分享热忱，是成功学背后精神原则的完美表现，你在这个世界上付出的热忱愈多，就愈能得到你想得到的东西。

第九，强化自律。前面所强调的是控制思想的重要性，对思想的控制，在希尔看来，是个人进取心，积极心态和热忱控制的关键因素，而自律则是结合所有这些努力的过程。自律要求你“谋定而后动”，以理性来平衡你的情绪，控制你的食欲，培养积极的心态，严格地运用时间，当然，订立明确目标，也是自律的第一步。你的思想中的六个部分是有助于你了解自律的，那自尊心、情绪、理性、想像力、良知和记忆。而有四种因素；无穷的智慧，潜意识，心灵感应，感官则是你无法直接控制的。但是自律能够，而且可以随时让你了解这些因素的作用情形。希尔指出，自律的具体表现就是你的意志力，经由自律训练出来的意志力，是一种无法抗拒的力量，而它来自持续不断、而且合乎道德的练习。

第十，正确地思考。拿破仑·希尔说：当别人失败了，你只需要一个正确的想法，紧跟着一个行动，你就可以成功。当你自己失败了，你也只要转换一个正确的想法，紧跟以一个行动，你同样可以获得成功。运用思考，对个人与社会都有巨大的好处。正确的思考以归纳法和演绎法两种推理为基础。你须学会把事实和感觉、假设、未经证实的假说和谣言分开，并将事实分为两个范畴：重要的和不重要的。你必须仔细调查你所得到的每一项资料，而不要以别人的习惯作为选择依据。人性所特有兩個相反的特质都是正确的思考的绊脚石，这就是轻信和不相信他们不了解的事物。希尔一再强调，你必须借着有利的心理习惯，来控制影响思想的因素，这就是“习惯控制”。你将因此而改善生活的其他方面，正确的思考深受其他几项成功原则的影

响：明确目标、自律、迅速做决定以及积极心态，它对于下一项原则——注意力控制也有相当大的影响。

第十一，控制你的注意力。 希尔提醒你，你应该把所有的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并集中你的注意力保护它，并将它带往市场。将注意力集中在单一目标上，是无数人和机构成功的保证。控制注意力是协调所有思想能力并引导它们的共同力量，为一个既定目标努力的过程。它一方面和其他许多项成功原则的自然产物，而另一方面也是它们的重要辅助工具。能掌握 17 项成功原则中的 12 项，意味着你在控制注意力和掌握思想方面，已跨出了重要的一步。在工作时控制注意力，自我暗示以调适你的潜意识，都将产生良好的效应。事实上，你可以把十七项成功原则都应用到你的行动中，但无论你结合了哪些原则，有两项原则是必须每次都出现的，亦即控制注意力和明确目标。拿破仑·希尔深信，只要你控制你的注意力，专心致志，那么整个世界都将成为一本公开的书籍，供你随意阅读。

第十二，激发团队的合作精神。 拿破仑·希尔以他的亲身经历向人们讲述了善于合作对个人的意义，他称这种合作为“团结努力”。“团结努力”的过程中最重要的三项因素是：专心、合作，协调”。团队合作的情形和智囊团的合作状态很类似，但你须更努力于使团队成员不断地为工作奉献，同时也要求自己为成员作出奉献。真正的团队合作必须以别人“心甘情愿与你合作”作为基础，而你也应该表现你的合作动机，并对合作关系的任何变化抱着警觉的态度。团结合作是一种永无止境的过程，虽然合作的成败取决于各成员的态度，但是维系合作关系却是你责无旁贷的职责。而要想激发团队的合作精神，你还需要培养一种具有传染性的特质——热忱，如果你能将热忱注入别人体内，就必然会出现团队合作的局面。而你也将会发现，团队合作其实是成功的经营模式。

第十三，从逆境和挫败中学习经验。 拿破仑·希尔曾说：“成功的大小不是由这个人达到的人生高度衡量的，而是由他在成功路上克服的障碍的数目来衡量的。”每个人一生都要经历挫折，逆境有时候也是一种祝福，它教给你更多的智慧和经验。希尔列出了可能导致失败的 24 种原因，并以亲身经历讲述了从逆境和挫败中你会找到等值利益的种子。失败等于是一种阻抗练习，它使你再次出发后，能有长足的进步。面对挫折、恐惧、自我设限以及接受失败，都只会“困在沙洲和痛苦之中”。而你应当应用信心，积极心态和明确目标来克服这些消极心态。希尔一再告诫说，当你与失败战斗时，就是你最需要积极心态的时候，当你处于逆境时，你必须花数倍的心力，去建立和维持自己的积极心态，同时也应运用你的自信心以及你的明确目标，将积极心态化为具体行动。这是从逆境和失败中所学得的最基本课程。

第十四，培养创造力。 希尔指出，创造力所要求的，是激发你的想像力，以便为明确目标作出贡献，并且使想像出来的结果能发挥作用。它的目标在于：做到不可能做到的事情。就如你推理一样，想像力也可分为两种形式：综合性和创造性的想像力。前者并不以个人优点作为先决条件，它把人类所有的知识都置于你的运用之下。后者则以潜意识作为它的基地，它是一种媒介，创造力超越想像力，因为创造力是以无穷智慧为基础的，和爱迪生同时代的发明家盖特就是运用他的创造力的最佳例子。无可置疑，创造力是今日世界不可或缺的能力。如果你觉得你需要创造力时，你可以借着和你的良知建立起更好的关系，用更强的独立精神来培养创造力，为你自己订定明

确目标，使你的思想一直环绕着这个目标，容不下半点恐惧和怀疑。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创造力是使你得以发挥你个人进取心的动力。

第十五，保持健康。 希尔提醒你，第一，你的身体和思想是合一的。第二，你的身心和自然是合一的。所以，你须和自然力和谐相处才能保持身心健康，不要忽视生命的自然节奏，不要忽视思想的力量，思想比身心具有更高层次的功能。经过控制的注意力、自律、正确的思考、个人进取心，从失败中学习以及多付出一点点都是用来安排和执行计划的精神层面工具。它们会使你在计划各步骤的进度和整体计划的进度方面都感到满意。满足感是健全思想的重要养分，对思想最具杀伤力的是恐惧和焦虑，你应当用积极的心态面对一切。同时，不要忽视饮食、放松节奏，良好的睡眠、适当的运动，以及性和升华，这都是保持健康的体魄必不可少的条件。并且，你须学会使用有效的身心刺激物去推动你自己。希尔告诉我们，思想和身体就好像航行和船，它们共同将你载往你所希望的成功彼岸，你应尽可能保持和维护它们。

第十六，预算时间和金钱。 在拿破仑·希尔看来，时间和金钱是两项宝贵的资源。了解自己运用时间和金钱的情形，有助于你评估追求成功的进展程度，以及分析阻止你前进的因素。希尔首先提出了 22 个检讨问题单，促使你对自己做一番思考，然后他指出，根据对时间的态度，可以将人分为实干家和流浪汉两种。实干家把工作当作所有机会的来源，经由自律控制自己的思想，善于处理人际关系，注重身心健康，内心充满信念从而会合理利用时间，他们不会做任何没有收获的休闲活动。希尔引述莱肯和温斯顿二位的著作中关于支配工作时间的建议。它们包括，分出工作的优先顺序，预算你的休闲时间，预算你的金钱，在制作预算和遵守预算的同时，你已强化了你的自律习惯，同时，也学会用你的钱为你所追求的目标服务。在对金钱的预算上，希尔告诫我们应遵守“先还清自己的债”的规则。善于储蓄，并且不妨为慈善事业捐一部分钱，因为这也是你多付出一点点的一个重要部分。习惯在你执行时间和金钱预算的过程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事实上，它是能否达到明确目标的关键性因素。所以，黄金定律的最后一条就是告诉你如何在宇宙法则的基础上，选择并控制你的习惯。

第十七，在探讨问题之前希尔希望你懂得，你必须了解并且运用一个宇宙原理：——“宇宙习惯力量”，如果你经由反复习惯，在你的思想中创造某种观念，宇宙习惯力量就会接收这些思想模式，并使它们变成一种永恒而发挥效用。你应当学会控制你的思想，进而控制你的习惯。希尔列出了“培养赚钱习惯的七个步骤，告诉你一定要给宇宙习惯力量一个可赖以遵循的固定模式。不过，也不可毫不顾及弹性，切勿让你的习惯限制了你的机会、耐性、信心和热忱。要学会用好的习惯去取代坏的习惯。培养能被宇宙习惯力量接收的积极习惯，受到意志力很大的影响，而你若遵循希尔列出的七个步骤而行，你将发现你的意志力得以加强。最后，希尔指出了宇宙习惯力量的三个要素，即适应性、反复的频繁性和印象的强度，并且告诫你，宇宙习惯力量是使 17 项成功原则融入你生活的手段，整个成功学的核心就在于任何无价值、多余且有害的习惯都可被打破，并且以另一更强烈的欲望取代。不要忘记，凡是心里所想，并且你相信能得到的事物，你都能得到它。

(陈翔云撰)

【美】彼得·圣吉：
《第五项修炼》——开启了一面世界之窗

人类原本生来就是要征服自然的。

——彼得·圣吉

《第五项修炼》一书为人类找出一条新路。

——维纳博士

一、彼得·圣吉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彼得·圣吉 1947 年出生于芝加哥，1970 年于史丹福大学完成航空及太空工程学士学位后，进入麻省理工史隆管理学院读研究所，旋即被佛睿思特 (Jay Forrester) 教授的系统动力学整体动态搭配的管理新观念所吸引。1978 年获得博士学位后的十余年里，他和麻省理工学院的一群工作伙伴及企业界人士，孜孜不倦地致力于将系统动力学与组织学习、创造原理、认知科学、群体深度对话与模拟演练游戏融合，发展出一种人类梦寐以求的组织蓝图——在其中，人们得以由工作中得出生命的意义、实现共同愿望的“学习型组织”。

《第五项修炼》这部巨著便是他们研究成果的结晶。该书于 1992 年荣获世界企业学会 (World Business Academy) 最高荣誉的开拓者奖 (Pathfinder Award)，以表彰其开拓管理新典范的卓越贡献。美国商业周刊也于同年推崇他为当代最杰出的新管理大师之

二、《第五项修炼》评介

《第五项修炼》是一本不寻常的书，值得有心改变自己，并进而改善周围世界的人一读再读。

关心人类群体危机及展望未来的书似乎愈来愈多，这是令人欣喜的现象；然而人类群体危机最根本的症结何在？《第五项修炼》这本书指出，在于我们片段而局部的思考方式，及由其所产生的行动；它造成了目前切割而破碎的世界，使我们丧失了群己的一体感。这本书虽然还是在起步阶段，然而所提出的整体互动思考方式及修炼方法，已为人类的未来指出了一条新路。它不只是一本管理新论而已。

这是一本探讨个人及组织生命的书；它让我们看到个人及组织中几种潜藏着的巨大力量。当掌握这些力量，个人的生命空间会变得很大，如此方能成为一个全神贯注于自己真正想做的事、又兼顾生命中最重要事情的“学习者”。组织也因此脱胎换骨成为“学习型组织”——在其中，人们得以不断扩展创造未来的能量，培养全新、前瞻而开阔的思考方式，全力实现共同的远望，并持续学习如何共同学习。否则个人只有被这些巨大的力量所困，而

组织则产生了书中所描述的各种令人困惑的“组织学习智障”，即使目前最成功的企业也不例外。书中所探讨的问题，其实不限于企业组织，小至家庭，大至全球的问题，都具有类似的组织学习智障。这本书只是把焦点放在企业组织上来探讨。

(一) 学习组织的修炼

在该书中，作者认为：学习型的组织里，有五项新技术正逐渐汇聚起来，使学习型组织演变一场创新。这五项修炼的发展是分开的，但对学习组织的建立，每一项都不可或缺。

第一项修炼：自我超越

“自我超越”的修炼是学习不断厘清并加深个人的真正愿望，集中精力，培养耐心，并客观地观察现实。它是学习型组织的精神基础。精熟“自我超越”的人，能够不断实现他们内心深处最想实现的愿望。他们对生命的态度就如同艺术家对艺术作品一般，全心投入、不断创造和超越，是一种真正的终身“学习”。组织整体对于学习的意愿与能力，植基于个别成员对于学习的意愿与能力。此项修炼兼容并蓄了东方和西方的精神传统。

遗憾的是，几乎没有任何组织鼓励他们的成员以这种方式成长。这个领域是一片庞大而尚未开发的处女地。汉诺瓦公司的欧白恩说：“企业的员工多半聪明、受过良好的教育、充满活力、全心全力渴望出人头地。但他们到了三十多岁时，通常只有少数平步青云，其余大多数人都失掉了开始时所有的企图心、使命感与兴奋感。对于工作，他们只投入些许精力，心灵几乎完全不在工作上。”这种组织设计所造成的个人生涯是多么可悲！

而且令人惊讶的是，就个人而言，也只有少数的成年人努力发展本身，超越自我。当你询问成年人的愿望是什么，通常他们首先提到较负面的，想要除掉的人或事。例如他们说：“我想要我的岳母搬走”，或“我想要彻底治好背痛”。然而自我超越的修炼，则是以厘清对我们真心向往的事情为起点，让我们为自己的最高愿望而活。

这里，最有趣的部分是：个人学习与组织学习之间的关系、个人与组织之间的相互承诺，以及由一群“学习者”组成的企业所特有的精神。

第二项修炼：改善心智模式

“心智模式”是根深蒂固于心中，影响我们如何了解这个世界，以及如何采取行动的许多假设、成见，或甚至图象、印象。我们通常不易察觉自己的心智模式，以及它对行为的影响。例如，对于常说笑话的人，我们可能认为他乐观豁达，对于不修边幅的人，我们可能觉得他不在乎别人的想法。在管理的许多决策模式中，决定什么可以做或不可以做，也常是一种根深蒂固的心智模式。如果你无法掌握市场的契机和推行组织中的兴革，很可能是因为它们与我们心中隐藏的、强而有力的心智模式相抵触。

壳牌石油公司是第一家了解加速组织学习好处的大企业，他们发现隐藏的心智模式影响既深且广，尤其是当它成为共有的心智模式时。壳牌石油公司之所以能成功地度过1970年和20世纪80年代石油危机的巨大冲击，主要归功于学习如何浮现管理者的心智模式，并加以改善。（在70年代初期，壳牌石油在世界七大石油公司中敬陪末座；到八十年代末，它已经成了最强的一家）。最近刚由壳牌石油公司退休的企画主任德格说：“要在变动的企业环

境中持续调适与成长，有赖组织化的学习，这是管理团体改变对公司、市场与竞争者的共有心智模式的过程。因此我们把企画看成学习，而把公司整体企画看作组织化的学习。”

把镜子转向自己，是心智模式修炼的起步；借此，我们学习发掘内心世界的图象，使这些图象浮上表面，并严加审视。它还包括进行一种有学习效果的、兼顾质疑与表达的交谈能力——有效地表达自己的想法，并以开放的心灵容纳别人的想法。

第三项修炼：建立共同愿景

如果有任何一项领导的理念，几千年来一直能在组织中鼓舞人心，那就是拥有一种能够凝聚、并坚持实现共同的愿景的能力。一个缺少全体衷心共有的目标、价值观与使命的组织，必定难成大器。IBM公司以“服务”，拍立得公司以“立即摄影”；福特汽车公司以“提供大众公共运输”；苹果电脑公司以“提供大众强大的计算能力”为组织共同努力的最高目的。这些组织都在设法以共同的愿景把大家凝聚在一起。

有了衷心渴望实现的目标，大家会努力学习、追求卓越，不是因为他们被要求这样做，而是因为衷心想要如此。但是许多领导者从未尝试将个人的愿景，转化为能够鼓舞组织的共同愿景。共同的愿景也常以一个伟大的领袖为中心，或激发自一件共同的危机。但是，如果有选择的余地，大多数的人会选择追求更高的目标，而并非只暂时解决危机。组织所缺少的，是将个人的愿景整合为共同愿景的修炼——注意我指的不是一本按部执行的手册，而是一套引导学习的原则。

共同愿景的整合，涉及发掘共有“未来景象”的技术，它帮助组织培养成员主动而真诚地奉献和投入，而非被动的遵从。领导者在精熟此项修炼的过程中，会得到同样的教训：一味试图主导共同愿景(无论多么的有善意)会产生反效果。

第四项修炼：团体学习

在一个管理团体中，大家都认真参与，每个人的智商都在一百二十以上，何以集体的智商只有六十二？团体学习的修炼即在处理这种困境。然而我们知道团体确实能够共同学习；在运动、表演艺术、科学界，甚至企业中，有不少惊人的实例显示。团体的集体智慧高于个人智慧，团体拥有整体搭配的行动能力。当团体真正在学习的时候，不仅团体整体产生出色的成果，个别成员成长的速度也比其他的学习方式为快。

团体学习的修炼从“深度汇谈”(dialogue)开始。“深度汇谈”是一个团体的所有成员，摊出心中的假设，而进入真正一起思考的能力。希腊文中“深度汇谈”(dia-logos)指在群体中让想法自由交流，以发现远较个人深入的见解。有趣的是，“深度汇谈”在许多“原始”文化中仍然保存，例如美洲的印第安人，但是在现代社会中则几乎已完全丧失。今天，人们重新发现“深度汇谈”的原理与技巧，并使它更适合现代的需要。

“深度汇谈”的修炼也包括学习找出有碍学习的互动模式。例如“自我防卫”的模式往往根植于团体的互动中，若未察觉，则会妨碍组织学习。如果能以有创造性的方式察觉它，并使其浮现，学习的速度便能大增。

团体学习之所以非常重要，是因为在现代组织中，学习的基本单位是团体而不是个人。除非团体能够学习，组织便也无法学习。

第五项修炼：系统思考

当乌云密布、天色昏暗，我们便知道快要下雨了。我们也知道在暴风雨过后，地面的流水将渗入好几英里以外的地下水中，明日天空又要放晴。这一切的事件虽有时空的差距，然而事实上它们都息息相关，且每次运行的模式相同，每个环节都相互影响，这些影响通常是隐匿而不易被察觉的。惟有对整体、而不是对任何单独部分深入地加以思考，你才能够了解暴风雨的系统。

企业和人类其他活动，也是一种“系统”，也都受到细微且息息相关的行动所牵连，彼此影响着，这种影响往往要经年累月才完全展现出来。身为群体中的一小部分，置身其中而想要看清整体变化，更是加倍的困难。

经过五十年的发展，系统思考已发展出一套思考的架构。它既具备完整的知识体系，也拥有实用的工具，可帮助我们认清整个变化形态，并了解应如何有效地掌握变化，开创新局。

虽然工具是新的，系统思考的基本观念却是非常浅显的。

作者列出了五项学习的修炼之后，又具体地分析了每种修炼的特点及作用，并着重指出第五种修炼的重大意义。

在该书的第一部分，作者指出融合五项修炼对成就学习型组织是非常重要的，然而这是一件充满挑战的工作，因为要整合出一项新工具，比单纯个别应用这些工具难多了。但同时，这样做所得到的回报是无可衡量的。

这是为什么系统思考是以上所提修炼中的第五项，它是整合其他各项修炼成一体的理论与实务。防止组织在真正实践时，将各项修炼列为互不相干的名目或一时流行的风尚。少了系统思考，就无法探究各项修炼之间如何互动。系统思考强化其他每一项修炼，并不断地提醒我们：融合整体能得到大于各部分加总的效力。

譬如，如果缺少系统思考，我们的愿景将止于对未来不着边际的描述，而对各方力量如何整合运用，缺乏深刻的理解。这是为什么许多在近年抢搭“远景列车”的企业，发觉单有高唱入云的美景无法扭转实际命运。片段思考常使人们衷心相信愿望终将实现，却无法帮助我们探究隐藏在它背后的系统结构运作的巨大力量。

但是“系统思考”也需要有“建立共同愿景”、“改善心智模式”、“团体学习”与“自我超越”四项修炼来发挥它的潜力。“建立共同愿景”培养成员对团体的长期承诺。“改善心智模式”专注于以开放的方式，体认我们认知方面的缺失，“团体学习”是发展团体力量，使团体力量超乎个人力量加总的技术。“自我超越”则是不断反照个人对周遭影响的一面镜子；缺少自我超越的修炼，人们将陷入“压力—反应”式的结构困境。

最后，系统思考可以使我们了解学习型组织最重要的部分，也就是以一种新的方式使我们重新认识自己与所处的世界：一种心灵的转变，从将自己看作与世界分开，转变为与世界连结；从将问题看作是由“外面”某些人或事所引起的，转变为看到自己的行动如何造成问题。学习型组织是一个促使人们不断发现自己如何造成目前的处境，以及如何能够加以改变的地方。如同阿基米得所说的：“给我一根够长的杠杆，我单手便可以移动这个世界。”

(二) 非线性思考的突破

《第五项修炼》的作者彼得·圣吉的理论是以他的老师佛睿思特(Jay

Forrester)教授 1965 年一篇论文《企业的新设计》(A New Corporate Design)的构想为基础,融合了其它几项出色的理论、方法与工具,而发展出学习型组织的蓝图。以观察社会趋势备受全球瞩目的“二〇〇〇年大趋势”(Megatrends 2000)作者奈思比(John Naisbitt),几年前在读到那篇论文时,惊叹佛睿思特竟能在那么早以前,就正确地预知未来企业必须如何改造,并视佛睿思特的构想为重新改造企业的最佳蓝本。

其实佛睿思特既不做预测,也不单看趋势,而是深入思考复杂变化背后的本质——整体动态运作的基本机制。他所使用的是一套他自己发展出来的方法——系统动力学(system dynamics)。它和自然科学界目前最尖端、深奥而热门的混沌理论(chaos theory)及复杂性科学(science of complexity)所探讨的相同,只是圣吉书中所谈的更为平易,且与你我生命、生活及工作上,以及人类目前所面临根本而重大的困境直接相关。

基于对人类前途的关怀,1968年由各国精英组成的罗马俱乐部(The Club of Rome),决定探讨人类目前及未来的困境。结果他们发现问题复杂交错,根本无法思考。最后佛睿思特以五个重要因素,建立了系统动力电脑模拟的“世界模式”(World Model),方完成所托。《成长的极限》(The Limits To Growth)这本探讨人类困境的未来学巨著,就是佛睿思特的弟子们将他的研究成果,以通俗的方式改写而成。佛睿思特也应用他的方法,在二十多年前就预知美国经济将于九十年代中期跌入谷底,而与美国在经济上往来密切的其它国家,亦将相继下跌。佛氏并不比经济学家更懂经济学,而是深入思考经济变化背后的本质,尤其是其中有一项叫做时间滞延(time delay)的因素,是造成许多波动最主要的原因之一。

佛氏及其门生开始思索,如何教人学会整体运作本质的全新思考方式,以提升人类组织整体运作的“群体智力”。圣吉在这方面的最大贡献,是把艰深的系统动力学简化成人人易学的系统思考,并将其在企业组织中实践及推广。佛氏则由中小学教育着手。

为什么系统思考如此重要,而缺乏它会导致组织学习的智障?原来当我们面对复杂问题时,总是习惯于将其分割成可以处理的片段来思考,然后加以整合。这种先分割再组合的思想是当代思潮的主流,对于许多复杂工作是非常恰当,而且必须,要不然人类怎能完成像登陆月球这样复杂的计划。然而在另一方面,分割却使我们丧失了更深入观察整体形成的要素——组成分子之间整体的互动关系,以及其所形成的复杂现象——即使只是两三个变数,就可以复杂到不可思议的地步,圣吉将之命名为“动态性复杂”。有时它会抵消个人或群体改善问题的所有努力,它会“诱使”我们舍本逐末、避重就轻、愈治愈糟、一再犯错,甚至兴奋而努力地制造共同的悲剧。怎么会这样?因为大部分的动态性复杂都是处于缓慢渐变的过程,极不易察觉,即使察觉了,不是为时已晚,就是不知如何有效处理。想想看,水质是突然恶化的吗?交通是突然拥塞的吗?健康是突然变差的吗?婚姻是突然变糟的吗?孩子都是突然变坏的吗?我们的社会是突然变得如此乱的吗?国家是突然变弱的吗?全球生态是突然恶化的吗?杰出的企业是突然转弱的吗?……而对我们威胁最大的,偏偏多属于这种缓慢渐变的过程,大部分人却要等到它爆发成“重大事件”时才会处理。

而如果再加上整体互动中,令人难以捉摸的、相互增强或抑制的非线性关系与时间滞延,便会产生更令人困惑的现象:例如一个局部决策的小改变,

却使其它看似不相干的部分产生巨大的风暴。货币理论权威、经济学诺贝尔奖得主傅利曼(Milton Friedman),在他的新作《货币灾难》(Money Mischief)中提到,1934年美国罗斯福总统一项小小的购银法案,导致中国在1946年至1949年间5400万倍的通货膨胀。其它又如柏林围墙倒塌,或洛杉矶大暴动这类“突发性的事件”,或令人困扰的各种暴起暴跌现象,或成功之后的快速崩溃,或总是矫枉过正,或长期的不稳定等,都是同样的情况,其背后滋长的过程是长期而缓慢的。总之,它使我们以为是在改善问题,实则却往往是在制造问题而不自知。即使我们的用意是良善的,个体潜能已充分发挥,团体内也合作无间,仍没有用。然而,我们何曾学习过如何有效处理这类问题的方法?

更重要的是,圣吉将系统思考发展成一种自我的修炼,坚持这种修炼,能使我们看见自身的行动与外部力量之间,愈来愈多的新连结,而逐渐扩大与周遭的一体感。这也是我们今日最迫切需要的“第六伦”。

(三)再造中求创新

作者在《第五项修炼》的第二部分写道:第五修炼的微妙法则就是以新的视野进行新的思考,从而达到创新的效果。

因此愈来愈多的人,包括品质管理大师戴明(Edwards Deming),不仅视此书为管理中最具突破性的著作之一,并开始将其视为影响人类未来千百年命运不可或缺的基础之一。尤其是在这个全球各种组织与机构,迟早将要解体,全面重新设计、根本改造,以及价值观空前分歧而混淆的关键时代。戴明也和许多著名的学者及企业家一般,由《第五项修炼》的读者,进而成为圣吉的工作伙伴。戴明的一位弟子曾告诉我说,戴明在过世前,逢人就推荐一定要好好读这本难得一见的好书。

除了整体运作这种最大的力量之外,圣吉书中介绍的另外一项极大的力量——一种为了实现心底深处真正愿望的巨大而持久的力量;书中具体的描述个人应如何产生这股力量的方法,以及组织应如何建立“共同愿景”的实际做法。

还有一种力量我们或可称之为“求真的力量”——在组织中不断相互以检验彼此最根本的假设,来追究问题的真相。它是用一种非常特殊而看起来很“危险”的技术来沟通,以穿透团体中人与人之间那些虚伪而令人无奈、沮丧,甚至于导致误解、敌视、交相指责的“隐形墙”,进而产生一股巨大的力量,使团体在心智上由“普通灯泡散漫的光”转化为“雷射光”一般强大而持久的凝聚力,以及心灵上的高度默契。

创造最重要的动作之一是尝试,尝试的最大可能是失败。而在社会与管理系统中大幅实验的代价常是巨大而可怕的。这也是为什么管理方面的创新,始终无法像工程、科学或艺术那般具突破性,因为它可以实验的空间非常的窄。为了克服这个难题,圣吉和其他研究者透过一种系统动力电脑模拟的“组织学习实验室”(美国中小學生,邮购一片系统思考软体 STELLA 就可以学),能让他们所辅导的企业主管在其中尝试各种可能的构想、策略、情境变化,及其间种种可能的搭配,进而产生深遂而持续的企业创造力。圣吉将之视为组织创造与学习的演练场。这种学习实验室也可将我们前述的那种缓慢渐变的长期过程“压缩时空”来观察,进而及早寻求因应之道。这种电脑

模拟可用以研究许多与人有关的变数。美国一家全球知名的大企业，三十多年来一直应用佛睿思特为他们建立的系统动力经营决策模式，来辅助重大策略与政策之研拟，其中百分之九十是如领导风格、沟通态度、文化、士气等“软性”的变数。现在就连二十年前持嘲讽态度的管理大师杜拉克(Peter Drucker)也要大家重视这种电脑模拟。

(四) 寻找第六项修炼

作者在该书的最后几部分通过对分析飞机导致空运商业化革命的事实，并在第五项修炼的基础上来寻找新的学习组织的契机。

作者认为：建立学习型组织的五项修炼现在正汇聚成一个包括许多重要技能的整体。它们使得建立学习型组织成为一项有系统的工作，而非仅是一种偶然的成功，并且在将来还会有其他的创作出现。正如航空业的发展史，也许我们将来还会有一两项发展从其它不曾想到的地方出现，而产生一种我们今日尚不能理解的全新修炼。

作者在该书的第二十一章指出系统思考指出复杂有两种，一种是包含许多变数的“细节性复杂”；另一种是“动态性复杂”。当出现动态性复杂时，表示我们正处于一种因、果在时空上不相近，而原先以为是正确的解，并未产生预期结果的情形。

该书所介绍的系统思考工具，是为了了解动态性复杂而特别设计的。管理者的生活总是忙于应付天天发生的事件和没完没了的活动，因而看不见事件背后的结构和行为变化形态。这些工具帮助我们看清结构与变化形态，帮助我们了解惯用的解决办法为什么无效，以及效果较高的杠杆点可能存在什么地方。

但是细节性复杂又是怎样的情况？如果在真实的管理情境之中，有几百、甚至几千个回馈过程同时运作时，将会如何？我们要怎样才能够处理这样的复杂状况？然而，如果在这些乱成一团的活动中，系统思考只教导我们认识少数几个回馈过程，它有什么实质的用处？

作者在第十四章“大墙”部分曾指出，系统观最深的启示之一是：“巨大的细节性复杂使所有原本合理的说明变得残缺不全。虽然人类的社会系统极度复杂，你永远无法把它完全澄清，但是我们还是可以强化掌握复杂的能力。

许多证据都显示，人类有认知上的限制。认知科学家证实我们同时只能掌握少数个别的变数。我们意识层处理资讯的机制，很容易因细节性复杂而超载，迫使我们必须求助于简化的方法来理解事情。

但是我们如何解释在交通拥挤的道路上以六十英里的时速开车，或打网球，或演奏莫札特奏鸣曲这些极端复杂、涉及上百的变数以及需要快速的改变，而且必须立刻判定的反应？此外，当我们对这些工作熟练之后，做这些事情仅需少许或不需有意识的注意力。例如我们在交通拥挤的道路上一面驾驶、一面与身边的人交谈；职业网球选手的注意力完全放在对手的策略与所得分数上面；演奏会上的钢琴家心里所想的只是美的表现，而非机械性的技巧。

显然我们的心有一个面向擅于处理细节性复杂。一般称之为“潜意识”，以表示它是在我们正常的意识“之下”的一个心智层面。在潜意识的层次我

们具有意识层次所没有的、处理细节性复杂的巨大能力。

如何使个人在第五项训练的基础上达到更高的程度，在该书的最后，作者指明了潜意识能够加以“训练”也很重要。其实所有的学习都可透过有意识的心，和由其所训出来的潜意识交互作用，而产生效果。当我们刚开始学开车时，不会到拥挤的街上练习，我们会在停车场或在僻静的街道上慢慢地开，因为潜意识还未被训练得可以胜任开车的工作。当这项工作逐渐由潜意识接替，换挡动作变得是“自动的”。这使我们原本只能处理有限资讯的意识心智，能“挪出”一些空间来，专注于进一步的学习上面。

潜意识被“程式化”的方式很多。文化便是一项能将潜意识“程式化”的因素。如果你是在一个有阶级意识或种族歧视的社会中长大，你对人的看法和与人互动的方式，将与不具此类偏颇观念的社会中长大者完全不同。另外，信念也是一种能将潜意识“程式化”的因素。许多研究都显示根深蒂固的信念会影响认知：例如，如果你认为人是不可信赖的，那么你将不断“看见”别人口是心非与强词夺理，而那是不作如是想的人所不会看见的。

或许更不易察觉的是，语言也有将潜意识“程式化”的功能。语言的影响所以特别不易察觉，是因为语言似乎对潜意识的内容没有什么影响，只是对潜意识内容组织的方式有所影响。然而，内容如何被组织的方式，往往比内容本身还重要。如果确实如此，那么，我们是怎么教导潜意识组织资讯的？

如第五章所示，一般语文用来描述环状的回馈流程是极端笨拙的。因此，通常我们最后会放弃，而只说：总之“甲影响乙，乙影响丙，而丙又影响甲”。但这样以符号代替语文的简便方法，提示潜意识的心“甲确实影响乙”，但却倾向于忘掉“乙也影响甲”。如果我们的语言是直线式的，那么我们的思考也是直线式的，我们对这个世界的知觉也是直线式的，如同一连串的事件。此时我们虽仍不可能确切知道语文影响潜意识的范围到底有多大，但是我们知道影响很广。

然而如果我们开始熟习系统语言，这一切就开始改变。潜意识将在不知不觉中，被再训练将资料架构成环状而不是直线的；我们发现处处都“看到”回馈环路与系统基模。一个新的思考架构深植于心中，于是一个开关被启动了。这非常类似精通一种外国语言的过程，我们开始以这项新语言做梦，或下意识地以新语言的名词和语法来说话和思考。当系统思考也是如此的时候，会如一位主管所说的：“我们在生活上的各个层面便充满了各种环路。”

就如组织理论家基佛所说：“如果这个关键在不知不觉中被启动了，你从此就成为一位系统思考者。你便可自由运用系统和直线这两种思考方式来看这世界(仍有许多问题用直线思考最恰当)。对于以直线的方式不可能看出来的方案，也经由潜意识浮现出来，而成为可能的解。原本以为不可行的方案，现在也可能变成可行的。‘系统’成为一种思考方式，甚至是一种生存方式，而不只是一项解决问题的方法。”

潜意识不会受到回馈环路数目的限制。就如同它能够处理的细节数目远高于我们意识的心智，它也能够处理极为错综复杂的动态性复杂。更重要的是，当潜意识同时吸收几百个回馈关系，它也一并整合细节性复杂与动态性复杂。

这就是为何演练是如此重要，演练对任何有意义的意识与潜意识的交互作用，都是不可或缺的。光练习概念是不够的，学习外国语言或学骑脚踏车便是例子。就这方面来说，像微世界这样的工具会被单独用来当做组织文化

研习的媒介——人们在其中不断演练，而养成该组织共同的整体性思考与行动。

学习型组织或许就是我们改善人类社会复杂系统的杠杆点。而要建立学习型组织，需要培养人像系统思考者那样看问题，并逐步发展自我超越，和学习如何共同合作、摊出和重新建构心智模式。就今天这个以组织为主体的世界来说，这或许是能帮助我们改变自远祖以来积习在脑中的思考方式最有力的行动之一。在这个意义上，学习型组织可能不止是一项组织进化的工具，也是人类智力进化的工具。

(侯书森 撰)

社会学 · 女性学

【德】马克斯·韦伯：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窥视资本主义社会生活的窗口

现代资本主义精神，以及全部现代文化的一个根本要素，即以天职思想为基础的合理行为，产生于基督教禁欲主义。

——马克斯·韦伯

认真的阅读这部著作可以成为掌握关于历史分析和人类解释问题方面更复杂深奥的社会科学分析方式的向导，这种方式在本世纪已经得到了发展。

——特·帕森斯

一、马克斯·韦伯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马克斯·韦伯(Max Weber, 1864~1920年)是德国著名的资产阶级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经济学家。他在法学、政治学、社会科学方法论和国民经济学等许多领域中，都有建树，著述甚丰。他被称为“资产阶级社会科学的最大权威之一”，有些人称他为“资产阶级的马克思”。

马克斯·韦伯生于德国东部的爱尔福特城，幼年时全家迁居柏林，其父是普鲁士州议会议员，是民族自由党党团内有影响的人物。他的家庭是当地许多学者、艺术家、社会名流以及商人们的集会、交谈场所。韦伯在青少年时代就受到家庭的熏陶，关心社会问题。韦伯高中毕业后，曾在海德堡大学法律系读书，中间服过一年兵役，又到斯特拉斯堡、柏林和哥廷根继续上大学。在大学阶段，年轻的博士生韦伯的天赋和才能已经受到老师们的夸奖。台奥多尔·蒙森对韦伯的评语是“有朝一日我辞别人世时，我最愿意对我所器重的马克斯·韦伯讲这样的临终寄语：“孩子，我把长矛交给你，它对于我的臂膀已过于沉重。”从这一句赞赏的评语中，可以看出著名学者蒙森对青年韦伯的期待。1889年，韦伯25岁时完成了博士论文，题目是：《论中世纪的商业贸易交往史》。1891年，韦伯呈交了一篇论文，题为：《罗马农业史及其对国家法与私法的意义》，从而取得了在柏林大学任法律学讲师的资格。

1892年，韦伯受社会政策协会的委托，前往波森和西普鲁士进行实地调查，写出了《普鲁士易北河以东地区农业工人状况》一文，文中指出：若想要提高德国农业工人的生活水平，以及防止波兰人大批移民居于德国而对德国的社会和民族性有所损害，就必须解散大土地的经营制并实行农民的移居计划。此文遭到以容克为主的德国保守派的反对。韦伯在德国基督教社会福利大会的支持下，坚持继续调查研究，进一步提出了废除易北河以东地区贵族特权的激进主张。1895年，韦伯应聘到德国南部弗赖堡大学任国民经济学教授，他就职讲座的题目是《民族国家与国民经济政策》，他运用当时流行的社会达尔文主义的观点，提出：德意志民族国家乃是一切经验科学的唯一价值标准。1896年，韦伯应聘又迁回海德堡任教授并从事繁忙的科研工作。

他虽然成果突出，先后写出《古代文化衰落的社会原因》(1896年)和《古代农业关系》(1897年)，但因过分劳累，患上了精神压抑症。这一段时间，韦伯同其父有过剧烈的争吵，父亲暴卒，使他更为负疚和悔恨，病情因之加重。

1904年，韦伯放弃教职，与别人合作接办了《社会科学与社会政策文库》。他发表过《社会科学和社会政策的认识的客观性》一文，主张科学不能产生价值判断或确立价值，科学能做的只是：(一)提供为达到规定目的所需的最合适的手段；(二)描述使用这种手段时可预见的结果；(三)使行动者意识到他所要达到的目的在他所处的社会与文化制度的范围内所具有的意义。韦伯甚至把科学的规范归结为主观的规范，否认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

同年，韦伯应邀赴美国圣路易斯参加艺术与科学国际大会。他在美国停留两个半月，获益非浅。返回德国后，写了《基督教世界中北美的“教会”与“教派”》的短文。后扩展为论文《新教教派与资本主义精神》。以后，他运用“理想典型”的方法，经过一些准备之后，写出论述资本主义精神的系列文章，合成为《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1920年版)。韦伯自美国回德不久，鉴于俄国的新材料甚多，曾自学俄语，撰写了有关俄国1905年革命问题的论文。

从1911年起，韦伯的重点转向研究经济与社会问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韦伯年已五十有余，没有参与战事。大战最后两年，他又把精力转向科研和撰写文章，许多论文在他身后编成《经济与社会=理解性社会学概要》一书(1922年初版)。

1920年年末，韦伯染肺炎病逝，享年56岁。

马克斯·韦伯的著述，德国正编辑出版三十三卷本的《韦伯全集》。20年代时，马克斯·韦伯的遗孀玛丽安妮·韦伯曾编辑出版过马克斯·韦伯的《社会经济史论文集》、三本《宗教社会学论文集》、《世界经济通史》及《经济与社会》一书的部分章节，共计约200万字。

韦伯的著述大体分为两个时期。早期(1904年前)重点是关于古代及中世纪的法律、经济和社会史；后期(1904—1920年)主要是历史的比较研究。

二、《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评介

韦伯的研究方法论主要是：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比较研究法、“理念型”研究和“价值无涉”。

他把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和法学、宗教学、心理学等结合起来，从古今政治制度到东、西方宗教，从新教伦理到近现代社会的阶级、阶层，内容包括得十分广泛，他自称这一切都属于“文化科学”，都属于他研究的范畴。

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是韦伯的一个可取之处。他以社会学和历史学的交融为其综合研究的核心，实际研究的对象乃是历史社会学或称之为社会学史学。韦伯长年用社会学的方法去研究历史学的课题，如资本主义的起源等。他重视社会、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之间的相互渗透和作用，微观处理，分析严谨。还依靠民俗学、人口学、人类学的方法加以辅助，对边缘的交叉学科有新开拓，对社会结构剖析深刻，接触了社会生活各个侧面的动态关系。

比较研究方法在韦伯的著作中运用得颇为广泛。通过比较研究以论证历史发展的多样性和各具特点。他运用过的几种比较研究方法是：(1)确定相同

点作为成因解释的第一步；(2)进行反面的比较研究；(3)以例证说明的类比；(4)隐喻的类比研究。此外，韦伯还告诫过人们不要错误地用类推法以求历史的类同性。韦伯在研究中的一个明显特点是：有时进行了跨学科、跨时代的比较研究，收效亦是显著的。

关于“理念型”(或称“理想类型”)的研究方法，在韦伯写的《印度教与佛教》中就用过这种方法。具体说来，就是通过客观的观察和逻辑构思后，对具体的个别历史现象进行拔高而得出的概念。它源于历史，又高出了历史现实。这种理念型是历史研究方法之一，它的作用在于缩短理论与经验之间的距离。韦伯把历史上的许多史实视为一团未加整理的乱麻，而理念型方法就是整理这团乱麻的一种方法。他是企图借助这些理念型的概念来确定某一现象的特征。应当指出的是：韦伯的这种“理念型”方法，过分重视和强调了超经验的来源，空想的性质占主导地位，与现实脱节的概念很难形成科学的理论。

“价值无涉”或称之为不带价值取向的观点，本是韦伯对史学研究以及对一切社会科学的基本要求。他称这是“人格”要求。韦伯主张：在学术研究(包括教学)中，应不带任何价值观、阶级性、党派性，反对把学术与政治混在一起。应当纯客观地探讨和求实。韦伯提出：学术研究的任务在于确定事物的本来面目、逻辑关系、内在结构，要回答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而政治的重点却是要求去解决“应当怎样做”的问题，政治要求对事实做出价值评估，而学术则不然。韦伯甚至写道：“一旦做学问的人带上了价值判断，就不能对事实全面了解了……”。他反复提出：要“为了纯粹学术的利益”等等。

应当指出的是：韦伯的这一见解，同他一贯提倡的要为解决现实问题的需要而研究历史的观点是矛盾的。再者，韦伯的一生并未脱离政治，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热衷于社会活动，他本身是一个资产阶级自由主义者。综观他一生的著作，都是围绕着时代提出的重大问题而展开的。他本人也承认是时代给他指出了“明确的观察方向”。他本人并未脱离政治是尽人皆知的。马克斯·韦伯的研究方法有许多值得肯定和借鉴之处，它同当前世界上许多学科日益结合互相渗透的趋势是一致的。但是，作为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法学家的韦伯，他的唯心史观的体系，同马克思主义基本上是对立的。韦伯在研究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时，很少从社会经济的发展中找原因就是明显的例证。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反映了韦伯思想的总趋势。被学术界公认为世界名著。正如该书的内容提要中揭示的那样：“它致力于探讨这样一个问题，即近代资本主义为什么仅仅出现在西方，而同时期的东方却呈现出停滞之势？本书的独到之处，在于极为注重对资本主义经济兴起过程中非经济因素的重要意义的探究。通过对大量经验材料的搜集与分析，论述了新教伦理与近代理性资本主义发展之间的生成发育关系，并对东西方宗教文化传统进行了深入的比较研究。不仅是结论而且包括本书的方法论，都为当代的社会科学提供了富于启迪意义的思路，并开辟了多线研究途径。”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着重论述了宗教观念(指新教伦理)与隐藏在资本主义发展背后的某种心理驱力(指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生成关系。至于这篇论著到底具有什么样的历史的与现实的价值，我们暂不作武断的评述，留待广大读者自己去品评。但在这里我们仅想指出一个发人深思的问题：

在任何一项事业背后，必然存在着一种无形的精神力量；尤为重要的是，这种精神力量一定与该项事业的社会文化背景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韦伯和诸多伟大思想家一样，深切地感到了资本主义精神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巨大推动和支持作用。也能敏锐地洞察到这种精神的形成，有着深刻的社会文化基础。他认为，禁欲主义新教的伦理，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这个基础。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是一部划时代的社会学名著。对这部专著的评价，英译者帕森斯在新版序言中写了一段中肯的文字：“认真的阅读这部著作可以成为掌握关于历史分析和人类解释问题方面更复杂深奥的社会科学分析方式的向导，这种方式在本世纪已经得到了发展。”

《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共分两个部分，即上、下两篇。以下我们再简要介绍一下该书的主要内容与学术观点。

第一部分即上篇，“问题”包括第1~3章，是对全书所要论述的问题的提出。正文前的“导论”是整个序列研究的导言，说明其研究目的，这里不作介绍了。

第一章，“宗教派别和社会分层”，分析宗教与经济的关系。根据统计资料，工商界领导人、资本占有者、近代企业中的高级技术工人，尤其是受过高等技术培训和商业培训的管理人员，绝大多数都是新教徒。而且，资本主义愈自由，这种情况就愈明显。其原因可以从所受的教育来分析。新教徒在近代经济生活中有较多所有权和管理地位，不仅在于他们继承了较多财产，更重要的还在于他们较多接受技术性或工商业性的专业教育。新教徒由环境所形成的心理和精神特征决定了对职业的选择，从而也决定了一生的职业生涯。因此，应该从宗教信仰的永恒的内在特征中来寻求经济地位的差异，即要说明宗教精神与经济的关系。

第二章，“资本主义精神”，论述这种精神的实质。美国政治家本杰明·富兰克林关于资本主义精神曾有精辟的论述。他的论述可以概括为这样一种伦理：个人有增加自己的资本的责任，而增加资本本身就是目的。人被赚钱的动机所左右，把获利作为人生的最终目的，这种获利并不是为了满足自己的物质需要，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首要原则。这种观念在资本主义就存在，但它作为一种精神而取得统治地位是在与其他力量进行搏斗之后。在没有进入资本主义的社会中，这种精神是被排斥的。不以满足需求而以无限获利为目标的心态在资本主义企业找到了它最合适的表达，企业也从资本主义精神那里汲取到它最合适的动力。体现这种精神的主要不是商业贵族中那些具有资本主义性质的企业家，而是处于上升时期的工业中产阶级。这些人节俭、刻苦，不想消费只想赚钱，精明而大胆，自制而可靠，明智且富于献身事业的精神。这就是资本主义精神的体现。把赚钱看作是人人都必须追求的自身目的，看作是一项职业，这种现象是与所有那些时代的伦理感情背道而驰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可以理解为理性主义整体发展的一部分，可以从理性主义对生活基本问题的根本市场中演绎出来。在这一过程中，新教形成了一个先于纯粹理性哲学发展的阶段。

第三章“路德的‘职业’概念”，说明本书的研究任务。

“职业”这一概念在德语中是“Beruf”，在英语中是“Calling”，也可称为“天职”或“神圣”。这个概念的产生是路德宗教改革的结果。它包含了对人们日常活动的肯定评价。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这就使日常的世俗活动有了宗教意义，

并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的思想。职业思想便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但是这种观念并不是资本主义精神本身。本书要以加尔文、加尔文派和其他新教派别的著作作为起点来研究古老的新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的关系。当然，这不是说这些教派的任何创始人把发展资本主义精神作为他们的目的。这种资本主义精神只是宗教改革的后果。所以，本书要说明的只是宗教力量在世俗文化形成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无数不同的历史因素的复杂的相互影响中所发挥的作用，即在什么程度上，这种文化的某些特征可以归因于宗教改革的影响。作为一种经济制度的资本主义并不是宗教改革的产物。问题是要弄清，宗教力量在什么程度上影响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和传播。

第二部分即下篇“禁欲主义新教诸分支的实践理观”，包括第四、第五章，论述了各新教的基本观点及其对资本主义精神形成的作用。

第四章“世俗禁欲主义的宗教基础”，分析了一些主要宗教的教义及其演变过程，共分析了四种主要教派。第一，加尔文派。这是基督教新教主要派别之一，这是以加尔文的宗教思想为依据的各派总称，产生于十六世纪宗教改革时期，把《圣经》作为信仰的唯一源泉，主张上帝预定论。其教义认为，上帝不是为了人类而存在的，相反，人类的存在完全是为了上帝，一切造物存在的意义就是服务于上帝的荣耀与最高权威。上帝决定个人的一切，得到上帝恩宠的人永远不会失去，得不到的人永远得不到。这就使信教者感到内心孤独。他们的信仰是要从事有助于增添上帝的荣耀的行为。加尔文教的上帝要求其信徒的不是个别的善行，而是一辈子善行，并且还要结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这样，加尔文教在其发展过程中就增加了某种肯定性的东西：必须在世俗活动中证明一个人的信仰。这样现在的世俗生活就被彻底合理化了。第二，虔信派。分为大陆虔信派和德国虔信派。前者希望借助于强烈的禁欲主义来享受与上帝同在的极乐。其原则的实际作用在于对职业中的行为进行更加严格的禁欲控制，从而为职业概念提供了更为坚实的宗教基础。德国虔信派的发展与严格的禁欲教义有所背离，甚至认为在一项职业中的劳动就是最好的禁欲活动。这样，就从功利的立场出发，对生活加以实用的理性化，从而引导其教徒走上了禁欲主义之路。这种禁欲主义就是在各处都首先寻找活干，然后又细心地、有条理地把活做好。第三，循道宗。其信徒的特点在于具备有条理的、系统化的行为本性，以求达到唯一的确定性。这一派教义尽管明显背离正统教义，但仍是正统教义的逻辑展开。它强调缺乏善行德操之人决不是真正的信徒，行为成为确定真正皈依的手段或条件。第四，浸礼宗诸派。这一教派的共同特征在于它是信徒的教会。宗教不再是一种为超自然目的服务的责任机构，而是相信重生的信徒个人所组成的团体。它不再被作为教会，而被作为一个教派。信仰的重要性被降到最低的程度。它的原则是永久保留的财富，是一种直接以使信徒生活为标准的生活方式。浸礼宗行为的精明而谨慎的理智性被揉进了非政治的职业中去。这个特点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有最重要的意义。总之，各个教派通过对宗教教义的重新解释，使各种经济行为合法化，这就导致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出现。

第五章“禁欲主义与资本主义精神”，分析了资本主义精神的形成，即如何从禁欲主义新教的基本宗教观产生出资本主义精神。新教的伦理观认

为，只有当财富使人游手好闲时才是一种不良之物。在财富作为履行职业义务意义上说，获得财富不仅在道德上是允许的，而且在实际上是必行的。这就说明了现代专业化劳动分工的合理性。同时，把某种解释为天意，就说明了商人活动是合乎道德的。新教对禁欲主义的解释与资本主义精神是密切相关的。这就表现在：第一，把劳动作为一种禁欲手段，不愿劳动是没有获得上帝恩赐的象征。任何浪费时间的生活都要受到道德的谴责。第二，财富有使任何人免除必须无条件的诫命。富人尽管不必通过劳动满足其需求，但他们也必须像穷人一样去服从上帝的诫命。第三，上帝安排劳动分工的目的应该通过分工的果实来解释。一个从事专业劳动的人会有系统、有条理地完成其工作，非专业化的工人则处于混乱之中。上帝所要求的不是劳动本身，而是在一项职业中的合理劳动。这样一种经济伦理就已经形成，它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是深远的。新教对资本主义精神的影响在于：第一，资本主义精神的伦理基础是禁欲主义新的伦理。禁欲主义新教反对的是自发享受。人仅仅是上帝恩赐于他的物品的接受人。人必须像人一样把每个支付给他的便士入帐。如果仅仅为了一个人自己的享受而并非为了上帝的荣耀花掉了那怕是一个便士，结果也是危险的。这种前后一致的伦理基础只能在禁欲主义新教的教义中找到。第二，禁欲主义新教思想使自由获取行为摆脱传统伦理的束缚的心理效应，它打破了所获“获取冲动”的束缚，不仅使其合理化，而且将之作为上帝的直接意愿。新教认为不停地、有条理地从事一项世俗职业是获得禁欲精神的最高手段，也是再生和信仰的最可靠、最明确的证据。这对于我们称之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生活态度的扩张肯定发挥过无比巨大的杠杆作用。禁欲主义的节俭导致资本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的可能性，这就增加了财富。总之，在新教所影响的范围内，它的世界观有利于一种理性的资产阶级经济生活的发展。它在这种生活发展中的影响是最重要的、一致的。它哺育了近代经济人。在构成近代资本主义精神乃至整个近代文化精神的诸基本要素中，以职业概念为基础的理性行为这一要素，正是从基督教禁欲主义中产生出来的，这是本书的中心论点。

(吴名撰)

【匈】卡尔·曼海姆《意识形态与乌托邦》—— 知识社会学的理论旗帜

本书所关注的是人们实际上如何思考的问题。这一研究的目的是不是寻求逻辑教科书上所讲得那样如何去思考，而是要研究，作为一种集体行动的工具，它是如何在公众生活和政治领域中实际发挥作用的。

——卡尔·曼海姆

曼海姆的学说为韦伯·桑巴特，法兰克福学派等所提出的大陆社会理论类型与英国社会学家较为关注的实用主义的中程理论之间的鸿沟，搭起了一座由此及彼的桥梁。

——戴维·凯特勒

一、曼海姆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卡尔·曼海姆(Karl Mannheim, 1893—1947)于1893年5月27日生于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一个属于中产阶级的犹太家庭，他的父亲是匈牙利人，母亲是德国人，父母都是犹太人。按照曼海姆一生的经历和学术活动，他的一生可大致分为三个时期：匈牙利时期(1913—1919)、德国时期(1919—1933)和英国时期(1933—1947)。

曼海姆早年在布达佩斯大学学习哲学，并以关于认识论结构问题的毕业论文获取了哲学学位。嗣后，赴德国在哲学家、社会学家齐美尔门下攻读文化哲学和社会学，深受齐美尔影响。1913年，又返回布达佩斯。本世纪初期的匈牙利社会，为少数土地贵族所统治，经济落后，政治腐败。而以犹太人居多的中产阶级又缺乏独立的政治意识，安于现状。唯有少数新一代知识分子，受到欧洲各种社会思潮的冲击，倡导民主与科学，力主改革社会。当时匈牙利社会的这一特定情境与知识分子的特殊历史地位，对日后曼海姆一生学术创作中的忧患意识和救赎性格的形成，产生了直接的影响。针对当时匈牙利社会的形势，一批具有民主改革倾向的青年知识分子组成了“社会科学协会”，他们张扬改革，推崇民主政治，曼海姆也加入了这一协会中的一个学生团体——“伽里略小组”。他们发表演讲，组织学术讨论，把自己当作理性和社会利益的代言人，以挽救、振兴匈牙利社会作为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

对曼海姆早期思想产生重大影响的思想家是他的同胞——哲学家乔治·卢卡奇。卢卡奇早年曾在德国研究黑格尔哲学，并深受德国生命哲学的影响。1915年，卢卡奇从德国返回家乡，并在匈牙利的学术圈子里定期举行学术讨论会，吸引了大批的青年知识分子。参加卢卡奇周末聚会的大多是匈牙利的学术精英，他们举办了一系列有关人文科学方法论的演讲和讨论，试图在批判实证主义基础上，倡导人类精神的尊严，寻求欧洲的“精神觉醒”。1919年3月匈牙利爆发了革命运动，卢卡奇本人随之被任命为匈牙利苏维埃

共和国教育人民委员，追随卢卡奇的一批知识分子也因此而受惠，曼海姆在大学里获得了教职，讲授哲学。但好景不长，1919年8月匈牙利苏维埃政权宣告失败，又恢复了君主立宪制，实行独裁统治。政局的动荡使得包括卢卡奇在内的大批知识分子不得不亡命国外。曼海姆也因涉嫌逃离匈牙利，去了德国的海德堡大学。

匈牙利时期政治上的失意，使得曼海姆在德国期间采取了远离政治的回避态度，潜心于著书立说。如果说在匈牙利时期他试图以“行动”来表达自己的忧患意识和救赎性格，那么在德国期间，他采取的则是一种“静观”的态度，试图从理论上阐明知识分子的救赎性格，用理论来表达自己的社会历史命运的深沉忧患。初到海德堡大学，他以私人学者的身份，开办讲习班，并在思想上受到新康德主义弗赖堡学派、马克斯·舍勒以及阿尔弗雷多·韦伯的深刻影响。1922年，他的博士论文《认识论的结构分析》发表。随后，凭借对19世纪德国保守主义的深刻研究，曼海姆获得了海德堡大学的讲师资格。在此后几年里，曼海姆在德国学术界声名日隆，随着1928年在德国社会学大会上的成功亮相，他成了继奥本海默之后法兰克福大学的社会学教授。在法兰克福执教期间，曼海姆更加勤于著述，1929年出版了他的代表作《意识形态与乌托邦》及其它一些知识社会学论文，为他日后的研究奠定了理论基础。但是，德国时期这种平静的学者生活不久即因纳粹的统治而告中断。1933年4月，根据德国纳粹(国家社会主义)法令，他被作为新归化移民和犹太人而被勒令停职。曼海姆只好移居英伦三岛，继续他的流浪学者生涯。

为了挽救那些受到纳粹迫害的学者，英国著名政治学家哈罗德·拉斯基代表英国学者向曼海姆发出邀请，从此曼海姆以讲师身份在伦敦经济学院执教。二次大战期间，他被任命为伦敦大学的教育社会学教授。在整个客居英国期间，曼海姆的学术方向和兴趣发生了很大的转变。在匈牙利和德国期间，他的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哲学认识论和知识社会学方面，表现出浓厚的纯理论色彩。但在英国期间，纳粹统治的残酷现实，使他走出象牙之塔，几乎投入了全部的精力去关注、研究现实的社会危机问题，分析大众运动中的非理性现象。他积极地撰写文化评论，研究社会和教育问题，试图通过社会计划；重建理性的社会。这一时期，他不仅出版了《重建时代的人与社会》、《我们时代的诊断》，而且还为英国的Routledge & Kegan Paul出版公司编辑了大型系列社会学丛书——“国际社会学与社会重建文库”，试图通过社会学知识的传播，为理性社会的重建作出贡献。曼海姆这一时期的学术努力，也对英国社会学的现实化作出了巨大贡献，正像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曼海姆的学说“为韦伯、桑巴特、法兰克福学派等所提出的大陆社会理论类型与英国社会学家较为关注的实用主义的‘中程’理论之间的鸿沟，搭起了一座由此及彼的桥梁。”

1947年，曼海姆客死于英国，享年54岁。他死以后，他的学生和朋友们将他的一些断简残篇加以整理，结集出版，其中有《知识社会学论文集》、《社会学及社会心理学论文集》以及《文化社会学论文集》和《保守主义》等。

二、《意识形态与乌托邦》评介

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研究，发轫于对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刻探究，在这一

方面，他深受马克思主义与德国历史主义的影响。他试图通过经验研究，找出人类思想与社会存在之间的因果关联，并将其放置在具体的时空界限内加以把握。这一研究使曼海姆成为第一个将政治意识形态诉诸于彻底社会学分析的社会学家，他的著作构成了探究意识形态现象的一个理论面向。

曼海姆为什么要把意识形态问题作为自己的主要关注，这与他所处得历史背景密切相关。他认为，自中世纪以来，人类思想统一的局面就已不复存在。尤其是进入 20 世纪以后，战争频繁，政局动荡，社会历史的剧烈变迁，使得人们感到社会命运是如此难以捉摸，很难用一个统一的真理标准或信仰去把握变动不居的社会历史，因而产生出无数不同乃至对立的社会思潮，人们都试图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对社会历史作出自己的解释。因而，思想形态的多样性以及由此带来的思想上的混乱，成了这一时代的基本问题。曼海姆认为，意识形态问题恰恰集中地体现了这一当代社会基本问题的本质特征，只有通过意识形态问题的深入分析，才能够说明并拯救西方文明所面临的危机。

曼海姆认为，在人类历史上，人们关注自己的思考已经有很长的历史，但仅限于哲学领域。这种哲学思考虽然可适用于某些方面，但对于要理解和把握世界的人类来说却是远远不够的。另一方面，为了从经验与理智这两方面深入把握世界，现实行动着的人们对于他们周围的世界提出了各种不同理解方法，但是这些方法却从未被作为严格的思考方式给予精确分析。当人类活动不受理智的控制或批判时，这种活动就会难以驾驭，在曼海姆看来，我们用于获取重要决断、用于诊断和引导我们的政治和社会命运的思想方法，绝大多数都未曾得到理论上的确认，因而不能形成一种理智上的控制和自我批判，这是我们时代的一种异常现象。曼海姆把这些当代社会中未曾得到确认的方法称之为“前科学的、不严格的思维方式”，并认为这种思维方式不能通过单独使用逻辑分析而得到理解，因为这里所涉及到的是一种复杂事物，它不仅与情感和生命冲动相联系，而且也是与现实的社会情境相联系的。要解决这些问题，就必须使用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只有知识社会学的方法才可能对这种思维方式作出描述和分析，阐明与此相关的问题，并对这一问题的独特性作出裁决，找出对之进行批判性理解的途径。

在谈到思想主体时，曼海姆表现出强烈的个体主义方法论色彩。他认为，只有个体才能进行思想，这是确定无疑的，不存在超越于个体之上具有形而上学实体性质的群体精神。但他又进一步指出，尽管不存在这种形而上学的思想实体，但由此推论构成个人行动动机的所有观念和观点都源于个人，并认为仅根据个体自身的生活体验就可以恰当地理解其观念，这就大错而特错了。正像语言的使用一样，个体所使用的语言并不是他自己产生的，而是由他的同代人及其前辈为他准备好了的。

因为个体所说的是他那一群体的语言，他的思考方式是其群体的思考方式。所以，仅仅根据个体精神的起源去说明整个世界观是不正确的。

曼海姆提出，在研究人类的思想方式时，知识社会学有两个突出特征：首先，它不从单纯的个体及其思考出发，相反，它强调从具体的历史社会情境中去把握思想。个体思想之间的强调的是，思考的个体是指处在某一群体之中的人在思考。而思想的具体风格，恰恰是在个体与打上群体烙印的典型情境的无应对中形成的。所以，“个体在社会中成长这一事实，从两个方面对个体预先规定了方向：一方面他所面对的是一个预成的情境；另一方面，

他将发现，在这一情境中，已经预先形成了思想和行动的模式。”其次，知识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割断具体思想方式与集体行动背景之间的联系。生活在群体中的人，并不仅仅作为分离的个体构成一种肉体上的共存，相反，他们在多样化的有组织群体中一起行动或彼此反对。他们的思想既有相同也有相异的方面。正是这些因素导致产生了他们各自的概念以及思想形式。而纯粹的逻辑分析则往往切断了个体思想与群体所处情境之间的联系，并将思想与行动隔离开来。这在知识社会学看来，是不足取的。

曼海姆对于人类思考方式的关注，除了上述学理上的分析以外，还与欧洲思想发展的历史有关。也即是说，意识形态问题在 20 世纪初期凸现出来，这不是一件偶然的事情。因为“只是在争执比同意更为突出的时代，这种问题才成为一个普遍的问题。”意识形态的形成，有着久远的历史渊源。曼海姆认为，自中世纪以来，欧洲社会渐次进入了一个思想多样性的历史时期。在社会基础稳定并能保证世界观具有内在统一性的条件下，思想方式的多样性还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在这种社会条件下，群体成员被灌输的都是同样的单词含义、同样的思想推导方式，思想方式的修正要跨越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要通过几代人才能体现出来，因而群体成员很难觉察到这种渐次的修正。但是，随着工业社会的来临，社会的流动性加剧，摧毁了人们早先在静止的社会里形成的世界图景。社会的流动分为水平流动与垂直流动两种形式，曼海姆认为，这两种流动形式对于思想风格多样性的形成，具有不同的作用。水平流动指的是在不改变其社会地位的情况下，从一个位置向另一位置或从一个国家向另一国家的流动。水平流动可以向我们显示出不同的人所进行的不同思考。但是，只要这个国家或群体的传统没有动摇，人们就会坚守自己所习惯的思考方式，而将其它群体的思考方式看作是异端邪说。曼海姆认为，在这一阶段，人们一般还不会怀疑自己思想传统的正确性。垂直流动指的是在同一社会中不同阶层之间的流动，它有向上或向下之分。这种形式的社会流动，对于动摇甚或怀疑自己的世界观，是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曼海姆认为，一旦历史发展到先前隔离的阶层开始沟通，原先各自独立发展的思想和经验方式进入到同一意识之中，并强迫人们正视相互冲突的世界观的不可调和时，这种思想沟通就发展到了一个重要阶段。

曼海姆认为，造成思想多样性的另一原因是社会的民主化过程。在一个相当稳固的社会里，优势社会集团即便意识到不同思想方式的存在，也不认为它会引起思想上的混乱。而民主化过程的结果，使得从前不具备公共有效性思考方式的下层集团，要求获得与优势集团同等的有效性成为可能。社会民主化阶段的到来，使下层阶层的思想第一次在同等效度的水平上取得了与优势集团思想分庭抗礼的地位。

除了上述因素以外，知识阶层的兴起，对于造成思想方式多样性的局面，是一个更为主要的因素。曼海姆提出，在任何社会中，都存在着一个以为社会提供有关世界的解释为特定任务的社会集团，这就是“知识分子阶层”（*intelligentsia*）。像巫师、婆罗门和中世纪的僧侣都可看作是知识分子阶层，他们垄断了对世界的解释，并负责调解不同阶层之间在观念上的差异。他认为，从社会学的观点来看，与中世纪相比，对现代社会产生了决定性影响的一个事实，是产生了一大批自由知识分子。他们的主要特征是从不同的社会阶层中吸收成员，这就意味着其思想方式不再受等级组织的规定和约束，思想不再被定于一尊，其它解释世界的方式也不断地得到确认。

正是上述历史因素，造成了近代欧洲统一思想局面的解体。曼海姆认为，要挽救这一历史颓势，就必须揭示不同社会思想方式的社会历史根源，就必须对意识形态现象进行深入分析，并通过这一分析，为解决西方文明所面临的思想危机铺平道路。

在谈到思想的社会根源时，曼海姆指出：“知识危机的最后强化，可用两个标语式的概念‘意识形态和乌托邦’来加以表征，……‘意识形态’概念所反映的是源自政治冲突中的一个发现，也即统治集团在他们的思想中将利益如此强烈地与某一情境相关联，以至于他们再也不能看见将会削弱他们统治基础的某种事实，在‘意识形态’这一单词中蕴涵着一种洞见：在某种情境中，某一集团的集体无意识无论是对其本身还是对其它集团来说，都会模糊了社会的真正条件，从而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乌托邦的概念反映的是政治斗争的对立面的发现，即某个受压迫的集团在理智上对于毁灭和改造社会的特定条件怀有如此强烈的兴趣，以至于他们不知不觉地只看到那些情境中趋向于否定这一社会的因素。”

曼海姆这里所提出的“意识形态”概念，显然是受到马克思意识形态概念的深刻影响。但是，他认为，尽管“意识形态”概念与马克思密切相关，但是这一概念及其意义都还具有更为深远的历史渊源。他首先把意识形态概念的含义分为两种：狭义的意识形态与广义的意识形态。狭义的意识形态是指我们怀疑对方所提出的观念和陈述，因为这些观念和陈述是对某一情境真实本质的掩饰，对该情境的真实认识不符合他的利益。这种歪曲包括有意的撒谎、半意识和无意识地掩饰和蓄意欺骗他人以及自欺。狭义的意识形态的特指性较为突出。而广义的意识形态指的是一个时代或者一个具体的社会集团总体精神结构的特征及其构成要素。

广义的意识形态与狭义的意识形态虽有涵义上的差异，但其共同之处在于，为了把握对方的真实意向和动机，意识形态的这两种形式都不仅仅根据对方所说的来判定其真伪，而是通过分析个体或个体所属集团的社会条件这一间接方法，来理解对方所说的真实含义。这样一来，主体所表达的观念，就被看作是其存在条件的函数。也就是说，我们不是按照其表面价值来接受观念、陈述、命题及思想体系的，而是根据表达主体的生活情境对其加以解释，因为主体的生活情境会直接影响到他的观念、感知以及解释。上述是广义意识形态与狭义意识形态的共同特征。

此外，在广义的意识形态与狭义的意识形态之间，还存在着重要的区别。首先，狭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仅仅根据其思想内容，将对方的部分论断作为意识形态；而广义的意识形态则把包括其概念工具在内的整个世界观体系作为分析对象，并把概念看作是集体生活的派生物来理解；其次，狭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对于观念的分析，仅限于纯粹的心理层次。例如，如果宣布对方在说谎，或说他在隐瞒、歪曲某一特定的事实情境，在这种情况下，双方依然享有共同的效度判定标准，并可依此消除错误的根源。即便怀疑对方是某种意识形态的牺牲品，但还不至于将他排除在基于共同理论框架之上的讨论之外。而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则与此截然不同，当我们考虑的是不同的社会阶层按照不同的范畴进行思考时，这里所涉及的就不仅是一个思想内容问题了，而是牵涉到了思想体系的基本歧异，涉及到了具有相当差别的经验解释方式。曼海姆认为，当我们考虑的不仅是内容，而且也涉及到形式，并将思考方式的概念框架作为一个思想家生活情境的函数时，就触及到了理论的或

理解学的层次了。在谈到这一问题时，曼海姆引证了马克思在《哲学的贫困》中的一段话：“经济范畴只不过是生产的社会关系的理论表现，即其抽象。……人们按照自己的物质生产的发展建立相应的社会关系，正是这些人又按照自己的社会关系创造了相应的原理、观念和范畴。”因此，狭义的意识形态和广义的意识形态是将陈述作为社会背景的函数进行分析的两种途径，但第一种仅限于心理层次，第二种则是在理解学的层次上进行的；第三，与上述区别相联系，狭义意识形态概念运作的主要依据是利益心理学，而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使用则是较为形式化的功能分析，它只是客观地描述在不同社会背景下精神世界运作的结构差异，而不考虑动机问题。狭义的意识形态概念假定，这一利益或那一利益是某一特定谎言或欺骗的原因；而广义的意识形态则明确地以下列命题作为先决条件：在特定的社会情境与特定的视角、观点或感知之间，存在着对应关系。在这种情况下，尽管对于利益的分析经常是必需的，但它并不建立因果联系，而只是赋予整个情境以特征。这样，利益心理学就被对情境与知识形式之间的对应关系的分析取代了。

曼海姆进一步分析道，由于狭义的意识形态只局限于心理层次，因而这种分析的参考基点就永远是个体，即便我们所处理的对象是群体，所有的心理现象也最终必须化约为个体心理。如果我们将自己的观察仅局限于个体精神过程，把他看作是意识形态的负载工具，就不可能从整体上把握属于特定历史情境的社会群体的认知结构。虽然没有个体的经验和创造性反应，就不可能有作为整体的精神世界，但精神世界的内在结构却并非是通过个体经验的综合就可以发现的。例如，工人阶级中的个别成员并不能体验到无产阶级世界观的所有要素。每个个体所参与的只是这一思想体系的某一部分，因此思想体系并不是零星个人经验的总和，而是一种系统的综合。因此，只要我们所使用的意识形态概念是更多地针对孤立内容而非整个思想结构，则个体就只能看作是意识形态的负载者。而一旦使用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我们所试图重建的就是一个社会团体的整个世界观，因而无论是具体的个体还是关于他们的抽象总和，都不能被看作是整体意识形态体系的承担者。因为这一层次的分析目标是重新建构构成个体单个判断基础的系统理论，而狭义的意识形态概念的分析，至多只能揭示关于意识形态的集体心理，促进大众心理学的某些发展。

狭义的意识形态与广义的意识形态概念不仅可以在意义上区别开来，而且其历史渊源也不相同。曼海姆提出，在历史发展的所有阶段，人们对其对手所表现出的不信任和怀疑，都可以看作是意识形态观念的前。但是，只有当人们之间的不信任达到明确无误的程度，并且能够从方法上加以确认时，才可以说别人的表达具有意识形态的性质。当我们不再将别人表达中的欺骗完全归于个人责任，也即我们有意识地在社会因素中去寻求对方欺骗的根源，才算对意识形态作了恰当地解释。所以，“狭义的意识形态概念指的是一种介乎简单的谎言和由不正确的概念工具所造成的错误之间的中间现象。它所涉及到的本质上是一种心理错误，它与精心策划的欺骗不同，是非意向的，但它却是不可避免地、不知不觉地从某种因果决定因素中得出的结论。”

为了进一步论证这一问题，曼海姆提到了培根的“四假相”理论。他认为，“培根关于‘假相’的理论可在某种程度上看作是现代意识形态观念的先驱。”在培根那里，假相即“幻象”或“先入之见”，有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及剧场假相。无论这些假相是来自人性本身，还是来自特定

个体，也无论这些假相归因于社会，还是归因于传统，它们都是错误的根源，都是通往真理道路上的障碍。曼海姆对培根提出的“四假相说”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认为，就错误的根源而言，现代“意识形态”这一术语与培根所提出的“四假相”术语之间，存在着某种沟通。“尽管不能说在这一理论与现代意识形态概念之间存在着一种可在思想史上直接追溯的实际联系，但认识到社会与传统是错误的根源，无疑是对社会学观点的先知先觉。”

在曼海姆看来，很可能首先是政治领域中的日常经验，使得人们认识到思想中的意识形态要素，并对其采取批判态度。

早在文艺复兴时期，在马基雅维里的信徒中就流传着这样一句格言，宫廷思想是一回事，而公共广场的思想则是另一回事。这里所表达的是公众对政治秘密日益增长的好奇心理，它表明，以往对于公共言论的偶然猜忌与怀疑，现在已经发展成对其全部言论中意识形态要素进行有条理的研究。马基雅维里以其严酷的理性，将人们观念上的差异归因于与其相应的利益差异，被曼海姆认为是将人类思想方式的多样性归因于社会学因素的先例。

曼海姆强调，心理层次上的揭露不可与激进的怀疑主义混为一谈，因为后者是在本体论和理解学层次上进行的。但这两者又不能完全分开，因为它们都受到历史力量改造作用的影响。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心理幻象被不断地削弱，而且，由特定的世界观和思想方式所产生的本体论和逻辑公式，也在利益党派之间的冲突中被加以消解。在旧的价值观念已被摧毁而新的价值观念正在产生的剧烈变动的社会里，思想上的冲突会非常激烈，以至于对手之间所寻求摧毁的不仅是相互之间的具体信仰和态度，而且还包括这些信仰和态度赖以存在的理性基础。并且，只要相互冲突的党派生活在同一世界上并且都试图代表这一世界，这种相互毁灭就是不可避免的。在这一不断分裂的历史过程中，朴素的不信任转变成了系统的狭义意识形态观念。随着这一过程的持续，分裂就扩大到了认识论领域。新生的资产阶级不满足于在旧的封建秩序中处于被约束的地位，它代表着一种新的“经济体系”，必然也带来一整套新的思想方式和价值观念，并最终会将现存的说明世界的方式置换出来。对于无产阶级来说也是如此，这里我们同样可以看到两种背道而驰的经济观点以及两种社会体系和思想风格之间的冲突。

广义意识形态的产生与上述狭义意识形态的产生过程不尽相同，它是与整个人类意识的发展相联系的。曼海姆认为，“哲学在这一过程中起了很大作用。”这一过程的第一个阶段是意识哲学的发展。在德国，意识被认为是由首尾连贯的要素组成的统一体，这一主题构成了一个不朽的分析基础。意识哲学将无限多样化和杂乱无章的世界组织成统一的经验，认知主体的统一性确保了经验的统一性。在主体体验世界的过程中，他不仅反映外部世界的结构，而且还自发地引伸出能使他理解世界的组织原则。这样，在有关世界的客观本体论的统一性消失之后，由认识主体强加的统一性取而代之。“在中世纪基督教关于世界的客观本体论统一性的地方，出现了启蒙时代关于绝对主体的主观统一性——‘意识自身’”。

从此以后，“世界”仅是为认识着的精神而存在的世界，主体的精神活动决定了世界的表现形式。在曼海姆看来，这一理论尽管缺少社会学的含义，但事实上已经构成了胚胎时期的广义意识形态概念。在这一阶段，世界不再被看作是不同的事件的复合物，而且作为结构的统一体，它被作为整体而与主体联系起来。但在这种情况下，主体并非是一个具体个体，毋宁说是一个假

定的“意识自身”。这种观点，在康德那里尤为突出。这是本体独断论崩溃的开端。

广义意识形态概念发展的第二个阶段，是按照历史的观点来看待超时间的意识形态，这一点应主要归功于黑格尔和历史学派。他们是从这样一个假设出发的：世界是统一的，而且，世界只有与一个认识着的主体相关联的情况下，才是可以想象的。曼海姆认为，这一假设为广义意识形态概念增添了一个决定性因素，即这种统一是一个持续的历史转变过程，并趋向于在更高的水平上不断地恢复其平衡。启蒙运动时期，作为意识统一性的负载者，主体被完全看作是一种抽象的、超时间的和超社会的实体：意识自身。而现在，出现了“民族精神”代表着历史上变化着的意识要素，黑格尔又将民族精神整合进“世界精神”。这种哲学与日俱增的具体性，一方面来自对于从社会互动中产生的观念的直接关注，另一方面来自于将历史政治思潮融进哲学领域的要求。而且，自此以后，日常生活经验不再被作为表面价值接受下来，而是被考虑了所有意义，并被追溯到它们的先决条件。曼海姆在这里强调，在历史中变化着的精神本质不是通过哲学，而是通过对于时代日常生活的政治洞察发现的。也即是说“从一般的、抽象的世界统一主体（‘意识自身’）向较具体的主体（各民族之间不同的‘民族精神’）的嬗变，并不是哲学的成就，而是在所有经验领域里对世界反应方式变化的一种表达。”

广义意识形态概念产生的最后也是最重要的阶段来自于历史社会过程。作为在历史变化中演变着的意识的承担者，“阶级”取代了“民族”或“国家”的地位，而社会的结构及其相应的知识形式，也随着社会阶级之间的关系而发生了变化。正像早期历史上分化的“民族精神”取代了“意识自身”一样，而现在“民族精神”又被阶级意识形态所取代。这样，这些观念发展的结果，使我们得到的就不再是无时间的、无变化的虚构的意识统一性，而是因不同历史时期、不同民族和不同社会阶级而不同的概念。

由上述曼海姆所谈的从意识哲学向意识形态的转变，可以看出康德、黑格尔及历史主义对他的深刻影响，尤其是历史主义思想，是曼海姆分析问题的一个基本出发点。他认为，从意识概念的形成过程中可以得出两个结论：第一，对于人类事务，不可能通过对其要素的孤立认识而得到理解。一个历史时期中的每一事实和事件，都只能根据其意义才可得到说明，而意义又是与其它意义相关。因此，一个时期的统一性概念以及其意义的相互依赖性，永远构成对这一时期进行说明的基础；第二，这一相互依赖的意义系统，无论就其部分还是就其整体来看，在每一历史时期都是不同的。因此，对于意义中持续、内在的变化重新进行解释，就成为我们当代历史科学的主要关注。曼海姆认为，我们的任务就是将哲学家给予我们的这一建构观念转换成经验研究。

(裴蓉撰)

**【法】西蒙娜·德·波伏娃：
《第二性》——女权主义的“圣经”**

女人决不是神秘命运的牺牲品。

——西蒙娜·德·波伏娃

她介入文学，代表了某种思想运动，在一个时期标志着我们社会的特点，她的无可置疑的才华，使她成为一个在法国文学史上最具有地位的作家。

——希拉克

一、波伏娃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西蒙娜·德·波伏娃(Simone de Beauvoir。 1908~1986)是当代法国最杰出的存在主义的女权作家，也是学识渊博的女学问家。她的存在主义的女权理论，对当代西方社会的思想和习俗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她是存在主义哲学的创始人之一萨特的终身伴侣，他们虽然共同生活了50年，却没有结婚，因为“我们认为，按照我们的信念行事，认可这种非正式的婚姻状态，是合乎道德的”(引自《波伏娃自传》，第二卷)。

1943年，波伏娃的长篇小说《女宾》问世，从此，她一跃而成为作家。

1945年，她以反法西斯为主题的小说《他人的血》出版，在法国引起强烈反响，她的创作才华得到公认，在短短的两年中，这部小说就再版了32次。

战后，她把主要精力放在妇女研究方面，1946~1949年，全力以赴地投入了《第二性》的创作，1949年，《第二性》在法国出版，立即轰动一时，被誉为“有史以来讨论女人的最健全、最理智、最有智慧的一本书”，甚至被尊为女权主义的“圣经”，从而成为西方女权主义的理论经典。

1952年，该书被译成英文，在美国一版再版，成为当时美国的最为畅销的书籍之一。

西蒙娜·德·波伏娃一生写了许多作品，《第二性》是她获得世界性成功的一部巨著，是“有史以来讨论妇女的最健全、最理智、最充满智慧的一本书”，被誉为女人的“圣经”。成为西方妇女的必读之书。

二、《第二性》评介

《第二性》分上下两卷，第一卷主要是从女性群体的角度去讨论妇女问题，是全书的理论框架。由于这部分涉及艰深的学术理论，内容涵盖哲学、历史、文学、生物学和古代神话，国内出版的台湾译本未能将此部分译出。

作者首先从生物学的角度探讨了雌雄两性的性生活，从最简单的单细胞动物一直到复杂的哺乳动物，详细论述了单性生殖和有性生殖的种种表现，揭示了动物界当中出现的雌雄分体、雌雄同体、雌雄间体和雌雄嵌体的有趣

现象，认为单性生殖和有性生殖具有同等重要的作用，驳斥了将女性等同于子宫或卵巢的观点。

接着，作者介绍了精神分析学的妇女观，认为弗洛伊德的所谓的“恋父情结”，是根据他依照男性模式得出的“恋母情结”炮制出来的，实际上女性是否存在“恋父情结”，大可质疑，从而批判了弗洛伊德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把女性的生理、心理和处境归结为“性”的“性一元论”。

作者也论述了马克思主义的妇女观，认为马克思主义有关妇女的论述，对妇女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尤其是私有制或世袭财产的私有制的出现，是妇女受压迫的一个根本性根源的观点，对研究妇女的历史和现状更是起到了奠基性的作用。作者认为，从经济角度研究妇女，是历史的一大进步，社会主义制度终将消灭男女不平等的现象，但“经济一元论”也是有其局限性的。

作者还用大量篇幅论述了从原始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苏联社会)妇女的处境、权利与地位的变化，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实。

作者接着讨论了东西方神话中的妇女权利与地位，指出了对处女的崇拜只是在私有制出现以后，男性为了保证世袭财产能够在父系范围内继承，才确立的一种制度，而妇女因此才成为生产继承人的工具的这一重要的历史事实。作者指出，与此相反，在私有制出现以前，即在远古时代，人们恰恰认为处女是“邪恶的”、“不吉利的”，并把处女交给过路人或神殿的僧侣。交给前者是因为，过路人对处女的“魔力”可能满不在乎，交给后者是因为，僧侣具有神圣的力量，可以战胜处女的“魔力”。

作者还以司汤达和D·H·劳伦斯等五位作家为例，讨论了西方文学对妇女的态度。

在本书的第二卷，作者沿着从童年到老年这条生命发展轨迹，以各类妇女(女性同性恋者、妓女、恋爱中的女人或情妇、神秘主义的女人或修女、独立的女人或职业妇女)为对象，广泛探讨了女性的个体发展史，尤其是探讨了各个年龄阶段、各种类型女性的生理、心理及处境的变化，最终得出结论：妇女要得到解放，就必须正视她们同男性的自然差异，同男人建立手足关系。

全书以马克思的这样一段话为结束语：“人和人之间的直接的、自然的、必然的关系是男女之间的关系……从这种关系的性质就可以看出，人在何种程度上成为并把自己理解为类存在物——人；男女之间的关系是人和人之间最自然的关系。因此，这种关系表明人的自然的行为在何种程度上成了人的行为，或人的本质在何种程度上对他来说成了自然。”这是意味深长的，它在暗示着作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对妇女研究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

(一) 探示女性的奥秘

作者曾说：“我对是否要写一部有关女人的书，很久以来一直犹豫不决。这个题目并不讨人喜欢，尤其是对女人而言。而且这也不是个什么新题目，有关女权的讨论实在是太多了，以至现在我们还是不说为妙。”人们到今天还在讨论，因为上个世纪的谬见虽然车载斗量，却没有说明问题。那么，问题是否存在？如果存在，是个什么样的问题？世界上真有女人存在吗？永恒女性论当然有其信奉者，他们会悄悄对你说：“就是在俄国，女人也毕竟是女人”；还有一些学识渊博的人(他们有时也有这种看法)感叹道：“女人要

走上邪门歪道了，女人要消失了！”人们都在怀疑今天是否还有女人存在，如果存在，不论其存在是否和人们的意愿相符，她们在世界上究竟有什么样的位置？她们应当有什么样的位置？有家最近停刊的《弗兰西斯》杂志问道：“女人以后会有什么样的遭遇呢？”

在问及“女人是什么？”问题时，有的人回答说：“Tota mulier in utero，女人就是子宫。”然而在谈到某些女人时，权威人士却说她们不是女人，虽然她们和别的女人一样，也有子宫。大家都承认并且同意女性是人类的一部分，至今她们仍占人类的一半。可也有人告诉我们，女性现在正处于危境，于是他们劝告我们，可要当个女人啊，要永远当个女人啊，要做个名副其实的名副其实的女人啊！看来，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可以成为女人。要被人看成女人，就必须具备大家所公认的女性气质，而这种气质作为现实是既神秘又令人信服的。那么，这种气质是卵巢里的某种特质，还是柏拉图式的本质，亦即哲学想象的产物？仅凭女人沙沙作响的裙子，就可以把这种本质带到人间来吗？尽管有些女人热衷于体现这种本质，却很难说只有她们才具备这种本质。人们常常用一些好像是从先知那里学来的、含糊不清而又令人眼花缭乱的词汇来描述它。的确，早在圣·托马斯(St. Thomas)时代，人们就认为本质被明确限定过，这就和鸦片的麻醉力被明确限定过一样。

但是，《第二性》的作者认为：抽象的概念论今天已经没有市场了，不论是生物学还是社会学都不承认存在着决定某些特性的固定不变本质，而人们曾一度认为，女人、犹太人或黑人应当具备这些特性。从科学角度上讲，在某种程度上任何特性都是取决于处境的一种反应。如今之所以不再有女性气质，是因为它从来没有存在过。那么，“女人”是不是就没有特殊含义了呢？理性论者、启蒙学者和唯名论者的回答是十分肯定的。他们认为，女人就是“女人”这个词所指明的那种人。许多美国女人尤其会这么想：现在世界上的确已没有女人什么位置了。如果哪个落伍的女人还把自己视为女人，她的朋友就会劝她去做精神分析，以便摆脱这种想法的纠缠。多萝西·帕克在谈到《现代女人：失去性别的人》这本书时(这本书的其他论点让人恼火)写道：“对那些把女人当做女人来对待的书，我无法做到态度公允。我认为，我们所有的人，不仅是女人还有男人，都应当被看做是人。”不过，唯名论这种学说还不完备，反对女权的人曾毫不费力地指出，女人和男人根本不一样。诚然，女人和男人都是人，但这个命题是抽象的。实际上，每一个具体的人都是单一的分离体。不接受永恒的女性气质、黑人的灵魂和犹太人的性格这类概念，并不等于否认犹太人、黑人和女人在今天的存在，而这种否认也并不表明这几种人已经得到解放，宁可说是在逃避现实。有个著名的女作家，不许把她的照片放在女作家的肖像集里，她希望自己能进入男人的行列。为了得到这种特权，她竟然利用了丈夫的影响！口口声声说自己是男人的女人，实际上仍在要求男人给予照顾和尊重。这使我想起了另一件事，在一次热闹非凡的集会上，有个托洛茨基的女崇拜者在讲台上准备大打出手，尽管她实际上是柔弱的。她不承认自己作为女性是柔弱的，因为有个好斗的男人在夸奖她，而她希望和他平等。许多美国女人的对抗态度表明，她们往往无法摆脱自己的女性意识。其实只要出去走走，睁开眼睛看看，就可以发现人是分为两种人的，他们的衣着、面貌、身体、笑容、步态、兴趣和从事的工作都明显地不一样。这些差别也许是表面的，也许是要消失的，但目前明显存在却是确定无疑的。

如果给女人下个“女人就是发挥女性功能”定义还嫌不够，如果我们也不想用“永恒的女性”去解释女人，如果目前我们还需要承认女人是存在的，那么我们必须面对这个问题：女人是什么？

作者认为，叙述这个问题就已经提供了初步答案，而提出问题本身就很有意义。男人决不会想到要写一本书，去论述男性的特殊处境。但如果我想介绍自己，就必须先说：“我是个女人”，所有的讨论也必须以此为前提。男人在介绍自己时从来不会先介绍自己是什么性别，他是男人，这是不言自明的。以“男性”、“女性”这两个词来分类仅仅是个形式，如在法律文书就是如此。实际上，两性关系和两种电极不尽相同，因为男人既相当于阳性又相当于中性，人们通常用“男人”(man)这个词泛指一般的人。而女人只相当于阴性，她为这个有限尺度所限定，并不也相当于中性。如果进行理论讨论时听到一个男人说：“你这么想是因为你是个女人”，这当然令人恼火。可我也懂得，我唯一的自卫方式是说：“我这么想是因为事实本身就是这么回事”，这样就把我的主观自我排除在讨论之外。我面对这样的问题不可能这么回答：“你的想法之所以和我相反，是因为你是个男人。”因人人都觉得做个男人没有什么特别的。男人在做男人时是正当的，而女人在做女人时却是不正当的。就是说，古时候人们用垂直线测量倾斜的东西，而现在男性就是人类的绝对标准。女人有卵巢和子宫，她在主观上受到这种特殊限制，因而把自己局限在本性之内。人们常说女人用腺进行思维。男人由于优越感忽视了他的身体里也有腺，如睾丸，这些腺也能分泌荷尔蒙。男人相信他的身体同世界的关系是直接的、正常的，认为它的认识是客观的，同时却认为女人的身体是障碍和禁锢，处在它所特有的东西的重压之下。亚里斯多德曾说：“女性之所以是女性，是因为她缺少某种特质，我们应当看到，女性的本性先天就有缺陷，因而在折磨着她。”至于圣·托马斯，则说女人是“不健全的人”，是“附属的”人。创世纪对此有一个象征性说法，说夏娃是用亚当“一根多余的肋骨”做成的。

所以，人就是指男性。男人并不是根据女人本身去解释女人。而是把女人说成是相对于男人的不能自主的人。米什莱(Michelet)写道：“女人，是个相对的人……”本达(Benda)在《于里埃勒的报告》里说得更肯定：“男人身体的重要性和女人身体的重要性完全不一样，后者是无关紧要的。……男人没有女人也能够考虑自身，可女人没有男人就不能考虑她自己。”女人完全是男人所判定的那种人，所以她被称为“性”，其含义是，她在男人面前主要是作为性存在的。对他来说她就是性——绝对是性，丝毫不差。定义和区分女人的参照物是男人，而定义和区分男人的参照物却不是女人。她是附属的人，是同主要者(the essential)相对立的次要者(the inessential)。他是主体(the Subject)，是绝对(the Absolute)，而她则是他者(the Other)。

到了18世纪，确实主张民主的男人才开始客观思索这个问题。狄德罗极力证明女人和男人都同样是人，后来约翰·斯图尔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热衷于为女人辩护。不过，这些哲学家和别人不一样，他们表现出了异常公正的态度。到了19世纪，女权争论再度成为党派之争。由于工业革命使妇女加入了产业大军，女权主义的主张也从抽象变为具体，因为这时有了经济基础，而反对她们的人也因此变得越来越有攻击性。但资产阶级却仍旧墨守陈规，认为巩固家庭是私有财产的保障。随着妇女解放变成真正的威胁，命令

女人重返家庭的呼声也愈加严厉。即使工人阶级中的男人，也在极力限制女人的自由，因为他们开始把她们视为危险的竞争对手，而由于她们常做低工资的工作，这种危险也就变得愈发严重。

为了证明女人的劣等性(inferiority)，反对女权的人不仅利用宗教、哲学和神学，还动用了生物学、实验心理学之类的学科。他们顶多愿意给另一个性别“有差别的平等”，而这个有利可图的术语大有文章。它和针对北美黑人制定的歧视性法律中的“平等但要隔离”如出一辙。众所周知，这种所谓平等的种族隔离政策，只会带来最极端的种族歧视。我们前面提到的相似性不能归之于偶然，因为不论把一个种族、等级和阶级，还是把一个个性别置于低人一等的地位，证明其正当性的方式都是相同的。“永恒的女性”同“黑人的灵魂”和“犹太人的性格”，实际上都属于同一个类型。的确，犹太人问题一般来说和其他两个问题不完全相同——犹太人对反犹太主义者来说不完全是个劣等人，宁可说是个敌人，当然不能在世界上让他占有一席之地，种族灭绝是他必然面临的命运。不过，女人的处境却同黑人的处境有许多相似之处。两者如今都是从家长制统治下解放出来的，以前主人阶级都想强迫“他们的言行符合他们的谦卑地位”，即符合为他们所指定的地位。不论是对有着宁静、天真和快乐灵魂的“好黑人”，即具有顺从美德的黑人，还是对有着“真正的女性气质”(轻浮、幼稚和无责任感)的女人，即具有顺从优点的女人，以前的主人都会给予慷慨而多少有点真诚的赞扬。此时支配者阶级把论据建立在自己一手造成的情势之上。如英国作家、哲学家肖伯纳指出的，实际上，“美国白人先把黑人贬到擦皮鞋男孩的地位，然后又据此得出结论说，黑人除了擦皮鞋什么用处也没有。”这种恶性循环，在所有类似情况当中都可以碰到。当一个人(或一群人)被置于低人一等的处境，实际情况就只能是他是低人一等的。然而“是”(to be)这个词在这里必须正确理解。这个词确实如黑格尔所说有“变成”(to have become)之类的动态含义，只有不实在的人才会认为它具有静态价值。诚然，一般来说女人是低男人一等的，这是指她们的处境给她们带来的机遇较少。但问题在于，这种状况还应当继续下去吗？

(二)解除女性的束缚

作者认为：当代妇女准备以合理方式废止女性神话，她们正开始在具体方面肯定自己的独立性，但她们不会轻而易举地就能够完全过着人的生活。由于在女性世界受着女人的培育，她们的正常命运就是结婚，而这实际上仍然意味着要从属于男人；由于男性威望远未消失，它依旧建立在经济与社会的牢固基础之上，因而我们必须注意研究女人的传统命运，从而寻找解除束缚女性的枷锁的途径。

现在当然不好说女人是男人的奴隶，但她们始终依附于男人，男女两性从未平等地分享过世界。即使在今天女人也受到重重束缚，不过她们的处境正在发生变化。几乎在任何国家，她们的法律地位都和男人不一样，常处于恶劣境地。甚至在她们的权利得到法律的抽象承认时，由于习惯势力，也很难在社会习俗中得以充分实现。在经济领域，男人和女人几乎形成了两个等级，就算在其他方面是平等的，如果新来的竞争对手是男人，他们也总是有较好的工作和较高的工资，有较多的成功机遇。男人在工业和政治领域，占

据了许多高级职位，最重要的岗位为他们所垄断。此外，他们还享有传统威望，而对这种威望，儿童教育在各方面都予以支持。这是因为，现在是过去的延续和发展，而过去的全部历史都是男人创造的。女人目前虽参与世界事务，但这个世界仍属于男人。对此男人深信不疑，女人也几乎没有任何疑问。不想成为他者，不想成为交易中的一方，对女人来说将意味着要放弃同男人这个优越等级结盟所带来的种种好处。男君主会为女臣仆提供物质保障，会为她的生存进行道德上的辩护。于是，她既可以逃避经济上的风险，又可以逃避抽象自由所带来的风险，况且这种自由的目的与目标还必须由自己来设计。的确，和每个个体肯定其主观存在的道德冲动一起出现的，还有一种诱惑，使其放弃自由，变成一个物。这条路很危险，因为他一旦踏上这条路，就会被引向被动、迷惘和毁灭，成为他人意志的造物，其超越将会受挫，其各种价值将会被剥夺。但这条路也容易走，人们在这条路上可以避免真正生存所包含的极度紧张。男人一旦把女人变成了他者，就会希望她表现出根深蒂固的共谋倾向。所以，由于不具备确定的资源，由于认为把她与男人相连接的纽带虽不可缺少却是和相互性无关的，由于热衷于扮演他者角色，女人也可能不要求有主体地位。

由于女人不具备具体手段，没有把自己组成一个可以和相关整体相对抗的整体，所以才出现了上述情况。她们没有过去，没有历史，也没有自己的宗教，而且还没有无产阶级因工作和切身利益而产生的共同责任感。她们甚至没有不分等级地住在一个地方，从而有一种社区感，而同一社区的犹太人、圣丹尼斯和雷诺工厂的工人却都有这种社区感。她们散居在男人中间，由于居住、家务和经济条件及社会地位等原因，而紧紧依附于某个男人——父亲或丈夫，其程度甚至大于对其他女人的依附。假如她们属于资产阶级，就会认为自己同本阶级的男人利益，而不是同无产阶级的女人利益息息相关。假如是白人，她们就会忠于白种男人，而不是忠于黑人女人。无产阶级可以提出彻底消灭统治阶级，极度狂热的犹太人或黑人也可以梦想独自占有原子弹，让全人类都属于犹太人或黑人，但女人根本不可能去设想如何灭绝男人。把女人和她的压迫者连接在一起的纽带，是其他任何纽带所不能相比的。两性分化是个生物学事实，而不是历史上的一个事件。男性和女性虽处于原始的 Mitsein [伙伴关系]，但他们相互对立，女人还不曾破坏过这种状态。夫妻两人是由两个相互吸引的一半组成的基本整体，沿着性别界线把社会分成两部分是不可能的。我们由此可以发现女人的基本特性：她在整体中是他者，而整体中的两部分是相互不可或缺的。

有人可能认为，这种相互性也许会促进妇女解放，当赫丘力斯(Hercules)坐在奥菲丽(Omphale)脚边帮她纺纱时，情欲使他变成了她的俘虏。但她为什么没能赢得持久的权力？美狄亚(Medea)为了找亚宋(Jason)报仇，不惜杀掉了自己的孩子。这个可怕的传说似乎在暗示，由于男人爱自己的孩子，女人对他有不可磨灭的影响。阿里斯托芬(Aristophanes)的《里西斯特拉塔》放肆地描写了一群女人，这些女人从军是为了利用男人的性要求去实现某种社会目标。但这只不过是一出戏剧。在有关萨宾女人(the Sabine woman)的传说中，她们很快就不打算再用不育去惩罚强奸她们的男人。实际上，女人还不曾用男人的需求——性欲望及其想有后代的欲望，在社会上得到过解放，虽然这种需求的满足常使男人依附于女人。

主人和奴隶也由于相互需求结合在一起，可这种经济需求同样没有让奴

隶获得解放。在奴隶关系中，主人并不看重自己对对方的需要，因为他有权用行动去满足这种需要。相反，由于处于依附地位，由于希望和恐惧，奴隶则完全意识到自己对主人的需要。即使两者实际上都迫切需要对方，这种需要也总是有利于压迫者而不利于被压迫者。正因为如此，工人阶级解放运动才一直发展缓慢。

所以，许多男人会由衷地认为，女人是和男人平等的，她们根本没有理由吵吵闹闹；同时他们也会说，女人根本不可能和男人平等，她们的要求是徒劳的。让男人看到社会歧视的极端重要性实际上是很难的，这些歧视表面上无关紧要，但对女人的道德和智力造成的后果却十分严重，以至人们认为这些后果是源于女人的固有本性。即使最有同情心的男人，也无法完全理解女人的具体处境。男人既然急于捍卫他们的特权，而这个特权的范围连他们自己也难以估量，我们就没有理由完全信任他们。因而我们不当被女人受到的大量激烈攻击所吓住，不当被那些别有用心地赞美“真正的女人”的颂歌所迷惑，也不应当指望从男人对女人命运的热情中会捞到什么好处，因为他们对女人命运根本不会承担任何责任。

然而我们应当用同样的怀疑去考察女权争论，因为其目的常常让争论的价值丧失殆尽。如果说“女人问题”是无足轻重的，那是由于男性的自负使它变成了“争吵”，而人们在吵架时是无道理可讲的。人们想努力证明女人比男人优越或低劣，或者女人和男人是一样的。有人说，女人是在亚当之后造出的，所以她是次要者。另一些人则针锋相对地说，亚当只是个粗制滥造的人，到上帝造出夏娃时，才成功地造出了完美的人。女人的大脑要小一些；这不错，不过它相对来说还是要大一些。基督可是个男人，这也不错，但这也许是因为相比之下他还是很谦卑的。总之，每一种论据都会马上让人联想到相反的论据，而两种论据往往都是站不住脚的。如果我们想真正认识问题，就必须摆脱这些成规，必须抛弃优等、劣等和相等之类至今把每次讨论都搅得含混不清的模糊概念，并且重新开始。

男人既是法官，我们现在应当如何提出问题？我们需要一个天使，他既不是男人也不是女人。可是我们到哪里去找这样的天使呢？就算找到了，他也没有发言权，因为他对问题根本不了解。即使找到两性人，也不会有什么用，因为这里的情况十分特殊。两性人不完全是健全男人和健全女人的结合，他是由男女的某些部分组成的，所以他既非男人也非女人。归根结蒂还是某些女人最有资格解释女人的处境。我们可不要误入歧途，以为厄比墨尼德斯是个克里特人，他就必然要去说谎。使男人和女人装得真诚或不真诚的并不是神秘的本质，相反，倒是他们的处境使他们多少倾向于探索真理。当代的许多女人是幸运的，她们重新获得了与做人的地位相称的种种权利，从而可以提供难得的公正——我们甚至认识到了这样的必要性。我们不再像前辈那样带有党派偏见，我们基本上赢了这场比赛。联合国在最近辩论妇女地位时坚决主张，现在就应当实现男女平等，而我们一些人也没有必要认为女性气质会给我们带来不便或会成为障碍。对我们来说，许多问题要比特别涉及我们的问题更为紧迫，这种超脱甚至会让我们有希望采取一种客观的态度。但是，由于我们植根于女性世界，我们会比男人更熟悉这个世界，更直接地认识到做女人对一个人意味着什么，而且对这种认识，我们会更关心。我说过还有更为紧迫的问题需要解决，但这并不妨碍我们看到提出“做女人将会怎样影响我们的生活”这个问题的重要性。我们实际上已经有了什么机会？哪

些机会被阻拦了？等待我们年轻姐妹的将是什么命运？她们将向何处去？耐人寻味的是，我们时代的女人在写有关女人的书时，一般来说，其动力并不在于希望拥有我们的权利，而是在于努力认识和澄清问题。我们正在离开争论不休的时代，所以作为一种尝试，本书将去证明那个命题。

但是，要用不带偏见的理智态度去探讨任何人的问题，无疑是不可能的。问题的提出方式和所假设的观点，均以相对的利益为前提。所有的特性都含有价值，每种所谓的客观描述都含有道德背景。与其掩盖多少被明确暗示的原则，不如从开始就对它们公开予以陈述。于是就没有必要每页都详细说明，人们只可以在哪种意义上使用“优越和劣等，较好和较坏，进步和反动”这些词。如果我们看看论述女人的一些著作，就会注意到，“公众利益即一般利益”是经常采用的观点。当人们希望维护和确立社会公益时，总是用这种观点去表达社会公益的含义。然而，我们认为唯一的公益，是保障公民个人利益的那种公益。我们将根据向个人提供具体机会时所起的作用，对制度作出评价。但我们不能把“个人利益”和“幸福”这两个概念混为一谈，虽然有些人这么看。闺房里的女人不是比有选举权的女人幸福吗？主妇不是比女工幸福吗？“幸福”是个人的一种内心感受。“幸福”的确切含义是什么并不是很清楚，更不要说它可能标志什么价值了。根本不存在衡量他人幸福的可能性。把希望别人也能拥有的处境描绘成幸福总是很容易的。尤其是有人竟在“幸福即休息”的借口下，把笨头笨脑、行动迟缓的人也说成是幸福的。我们坚决反对这种观点，因为我们的观点是存在主义的观点。每个主体都要十分明确地通过开拓或设计去扮演自己的角色，而这种开拓和设计被视为一种超越方式。他只有不断地去追求别的自由，才能够取得自由。我们没有理由为目前的生存进行辩护，除非它发展到无限开放的未来。超越只要再度陷入内在和停滞，退化的生存就会变为“en-soi”[自在]，即受特定环境支配的野蛮生活，而退化的自由也就会变成强制与偶然。若主体同意这种退化，它就造成了一种道德过失。若这种退化是强加于他的，它就会造成挫折与压迫。两种情况下它都是绝对的恶。每个打算为自己生存辩护的人，都会认为他的生存含有一种不明确的需求，即超越自我、参与自我所选择的设计的需求。

所以，使女人处境变得特别引人注目的一个原因是，她这个和大家一样的既自由又自主的人，仍然发现自己生活在男人强迫她接受他者地位的世界当中。男人打算把她固定在客体地位上，使她永远是内在的。因为她的超越必定要失去光彩，并且必定要被另一个主要的主权自我(良心)所永远超越。女人的戏剧性在于每个主体[自我(ego)]的基本抱负，都同强制性处境相冲突。因为每锤鲋魑宥既衍W 晕遥 elf)是主要者，而处境却让他成为次要者。就女人的处境而言，一个人怎样才能得到实现？哪些路对她是开放的？哪些路是封闭的？在依附地位上应当怎样恢复独立？哪些环境限制了女人的自由以及应当怎样战胜它们？这些是作者很想阐明的主要问题。这就是说，作者所感兴趣的是根据自由而不是根据幸福，对个人的幸运予以界定。

(三) 倡导女性的独立

作者强调：“女人决不是神秘命运的牺牲品。”那些把她特别认定为女人的特质，其重要性来自于置于它们的含义。将来若是用新的角度去对待它

们，它们就可能被克服。所以，如我们所见，虽然女人通过性体验感受到(并且常常讨厌)男性的支配，但决不能依此断定，她的卵巢判处她永远跪着生活。只有在完全肯定男性主权地位的制度中，男性的攻击性才仿佛是贵族特权；女人之所以在性行为中觉得自己非常被动，仅仅是因为她已经对自己产生了这样的看法。许多要求有人的尊严的现代女人，仍然在以传统的奴性为立足点去展望她们的性爱生活：既然认为躺在男人下面，让他插入使她们蒙受耻辱，她们就会变得紧张因而变得性冷淡。但是，假如现实情况不一样，那么在性爱姿态和姿势中所表现出来的象征性意义也将会不同：比如，一个付给情人报酬并对他进行支配的女人，就可以为她的超等懒惰感到自豪，就可以认为她在奴役积极卖力的男性。现在有许多过着正常性生活的夫妇，他们的胜败观念正在为交换观念所取代。

实际上，和女人一样，男人也是肉体，因而他也是被动的，也是他的荷尔蒙以及物种的玩物，也是被欲望弄得坐卧不安的猎物。和他一样，在肉欲的高度兴奋当中，她也是一个自动同意的人、自愿奉献的人、主动的人，他们都以自己的某些方式经历了化为身体的那种陌生而又暧昧的生存。在他们认为相互对抗的那些斗争中，实际上每一方都在同自我做斗争，都在把自己所厌恶的那部分自我投射到对方当中；每一方都不是在体验他们处境的暧昧性，而是在想让对方容忍那可怜的地位，把尊严留给自我。然而，如果双方都以节制态度去接受这种暧昧性，相互都保持真正的自尊，他们就会彼此视为平等的人，就会和睦地去体验他们的性爱戏剧。和使人们相互区别的一切特质相比，我们都是人这个事实有着无限的重要性，优势决不是既定存在赋予的：古人所谓的“美德”，其定义在某种程度上“取决于我们”。两性当中表演着同样的肉体与精神、有限与超越的戏剧；两性都在受着时间的侵蚀，都在等待着死亡，他们彼此对对方都有着同样的本质需要，而且他们从自身的自由当中可以得到同样的荣耀。他们如果想品尝这种味道，就不会再去想争夺靠不住的特权，于是友爱便会在他们当中实现。

有人会说，这完全是乌托邦的幻想，因为女人不可能“改造”，除非社会首先让她和男人真正平等。保守人士在这种情况下肯定会提到那种恶性循环，然而，历史并不是循环的。如果一个等级处在低一等的地位，它无疑是低劣的，但是自由可以打破这种循环。让黑人去参加选举，他们就会配有选举权：让女人去负起责任，她就能够肩负起这些责任。事实上，不能指望压迫者会采取不谋私利的慷慨行动，但是，有时是被压迫者的反抗，有时甚至是特权等级本身的演变，造成了新的处境，所以男人也会基于自身利益给女人以部分解放，这只是意味着女人要继续攀登，而她们正在取得的成功使她们有了这样做的勇气。几乎可以肯定，她们或迟或早总要达到经济与社会的完全平等，而这将会引起深刻的精神变化。

无论这可能会怎样，总有人反对说，这样的世界即便是可以实现的，也不是理想的。当女人和她的男性“一模一样”时，生活将会失去其精华和趣味。这个论点也同样没有什么新鲜的：那些希望永远保持现状的人，总是为奇迹般的过去即将消失而流泪，并不为年轻的未来而欢笑。完全正确，消灭奴隶贸易就是意味着布满杜鹃花和山茶花的美丽壮观的大种植园的消失，就是意味着整个高尚的南方文明的毁灭。在饱经沧桑的阁楼上，仍有着稀有古老的花边以及西斯廷 *castrati* [阉人] 的清脆纯正的声音，而某种“女性魅力”也处在到达同样布满灰尘的陈列室的路途中。作者认为：的确只有野蛮

人才不会去欣赏那精致的花卉，那稀有的花边，清脆纯正的声音，以及那女性的魅力。

然而实际上女人的牺牲，在男人看来也是一种特别重大的牺牲，他们当中只有极少数人真心真意地希望女人能够作出这样的牺牲。那些轻视女人的人认为，他们从这种牺牲当中什么也得不到。那些珍爱她的人则认为，他们在这种牺牲中失去得太多了。的确，在当前的演变中，进步比女性魅力的本身更有威胁性。女人在开始为自己而生存的时候，将会放弃她在男性世界的特权地位所归之于的替身和中介的功能；男人在完全保持沉默和要求别的自由人出现之间进退两难。他认为，一个既是他的替身又是被动物的人是一种巨大的财富。他用以设想他的伙伴的借口，可能是虚构的。但她作为其根源或借口的体验，却完全是真实的，几乎没有哪种体验能比这种体验更珍贵、更亲密、更热情的了。不可否认，女性的依附性、劣等性和哀怨赋予女人以特殊的个性。毫无疑问，女人的自主性虽然免去了男人的许多麻烦，但也会拒绝给予他们许多便利。毫无疑问，某些形式的性冒险将会在明天的世界上消失。但这并不意味着爱情、幸福、诗意和梦想也会从明天的世界上消失。

那种认为男女在具体问题上实现了平等，就不可能再有狂喜、堕落、销魂和激情，这也是毫无根据的。使肉体与精神、瞬间与时间、内在的昏厥与超越的挑战、绝对的快感与虚无的忘怀相对抗的种种矛盾，将永远无法解决。紧张、痛苦、快活、受挫以及生存胜利，将永远会在性行为中得到具体表现。所谓妇女解放，就是让她不再局限于她同男人的关系，而不是不让她有这种关系。即使她有自己独立的生存，她也仍然会不折不扣地为他而生存。尽管相互承认对方是主体，但每一方对于对方仍旧是他者。他们之间关系的这种相互性，将不会消灭。由于把人类分成两个单独种类而发生的奇迹——欲望、占有、爱情、梦想、冒险，所以那些令我们激动的字眼——“给予”、“征服”和“结合”，将不会失去其意义。相反，当我们废除半个人类的奴隶制，以及废除它所暗示的整个虚伪制度时，人类的“划分”将会显露出其真正的意义，人类的夫妇关系将会找到其真正的形式。

对这种情况不可能有更透彻的阐述了，这就是说，要在既定世界当中建立一个自由领域。要取得最大的胜利，男人和女人首先就必须依据并通过他们的自然差异，毫不含糊地肯定他们的手足关系。

一个被封闭于内在性的女人，也会竭力把男人关在那个牢笼中。这样一来，那个牢笼便会和世界混为一体，女人也不会再因为被囚禁在那里而痛苦。因为母亲、妻子和情妇变成了看守。社会根据男人制定的法典宣判女人是低人一等的。所以她只有摧毁男性的优越地位才能够消除这种劣等性。于是她去攻击使她不健全的、对她进行支配的男人。她和他大唱对台戏，她拒绝接受他的真理和价值。但她这样做仅仅是为了自卫，使她注定是内在的、低人一等的，既不是固定不变的本质，也不是错误的选择，它们是硬加在她身上的。一切压迫都会引起战争状态，这一点毫无例外。被看做次要者的生存者，不能不要求重树她的主权地位。

于是，许多问题接踵而来：这样做可以改变法律、制度、习俗、公众舆论以及整个社会关系吗？可以让男女真正平等吗？“女人将永远是女人，”怀疑论者如是说。其他观察者也预言，抛弃女性气质将不会让她们变成人，而只会让她们变成怪物。或许人们也会承认，即今天的女人是自然的造物。我们必须再次重申，在人类社会中没有什么是自然的。和其他许多产品一样，

女人也是文明所精心制作的产品。在她的命运中，他人的干预起着决定性的作用。这就是说，如果这种行动采取另外一种方向，就会造成完全不同的结果。决定女人的并不是她的荷尔蒙或神秘本能，而是她的身体以及她同外部世界的关系，通过他人而不是她自己的行动而得以缓和的方式。把少男少女隔开的那条鸿沟，从他们很小的时候就在他们之间蓄意地展开了。后来，女人只能是她被造成的那种人，而且那种过去必然会影他的整个人生。如果了解了它的影响，我们会清楚地看到，她的命运不会永远是事先决定的。

我们当然不应当认为，只要女人的经济地位发生变化就可以改变她。虽然这一因素在她的演变过程中，曾经是并且依旧是基本的因素。但是在它引起道德的、社会的、文化的以及它所承诺和要求的其他成果以前，新型女人不可能出现。此时此刻在任何地方尚未取得这些成果，法国或美国是如此，俄国也同样如此，而这就是为什么今天女人在过去和未来之间左右为难的原因。她常以“真正的女人”的面目出现而又装成男人，于是她不但对她的男性装束感到局促不安，也对她的肉体感到局促不安。她必须蜕掉老皮，为自己剪裁新衣服。这一点，她只有通过社会变革才可以做到。今天，没有一个教育者能够塑造出也许和雄性人(male humanbeing)完全同源的雌性人(female human being)，如果少女得到和男孩子同样的培养，她就会认为自己是个怪人，因而把自己确定为一种新的性别。司汤达意识到了这一点，他说：“森林肯定是一下子种成的。”但是相反，如果我们认为一个社会具体地实现了两性平等，那么这种平等就会在每一个人的身上都有新的表现。

我们发现了女人经常显示具有实践能力的原因：她之所以问心无愧是因为她属于无特权的一方，她觉得她没有义务去善待那个受益的等级，她唯一的念头就是自卫。如果有机会发泄她对不能满足她要求的情人的怨恨，她甚至会感到快乐：既然他没有给够她，她便从他那儿抽回一切，以此来野蛮地取乐。这时受伤害的情人会突然发现，在他或多或少予以轻视的每时每刻，都有着私通的 in toto [全部] 价值。于是他会欣然允诺她一切，即使他在被迫兑现时又会有被利用的感觉。他会指责情妇对他敲诈，她则会叫他小气鬼，两个人都会有受虐感。

指责和辩解依旧无济于事，因为正义绝不可能在非正义中实现。殖民地官员绝无可能公正对待土著人，同样将军也绝无可能公正对待他的士兵。唯一的解决办法就是不去做殖民者，不去做军事首领，但男人不可能不做男人。于是，一方面，他不知不觉地处于该受指责的地位，对其实并不是他的错误所造成的后果深感苦恼。而另一方面，她则在不知不觉当中变成了受害者和泼妇。有时他会反抗，变得残酷无情。但那样他会让自己变成非正义的同谋，那种错误就会真的属于他。有时他会让自己被那个苛求的受害者消灭掉，吞噬掉。但那时他又会感到受愚弄。他往往只好妥协，而这妥协既让他受到贬低，又让他心神不宁。一个性情温和的男人，会受到这种处境而不是受到女人本人的折磨。所以在某种意义上，被征服者的一方反倒要好一些。但如果她也性情温和，既不能自立又不愿意用她的沉重命运压垮男人，那么她就会在无望的混乱中挣扎。

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会碰到很多这样的情况，它们由于取决于讨厌的环境，无法得到满意的解决。一个男人若是被迫在物质上和精神上资助他不再去爱的女人，便会觉得自己是个受害者。但他若将一个把一生都抵押给他的女人彻底抛弃，她就会成为受到不公正对待的受害者。这种不幸并不是始于

个人堕落(当一方指责另一方时,无诚意就已经开始出现了),宁可说是始于个人对其无能为力的处境。女人是“缠人的”,她们完全是个负担,她们因此而受罚。问题的实质在于,她们的处境同吸吮另一个机体的有生力量的寄生虫的处境毫无二致。让她们有自己的有生力量吧,让她们有向世界进攻并夺回她们自己本质的手段吧!那时她们的依附性就会得到消除——男人的依附也会得到消除。毫无疑问,男女双方将会从这一新的处境中得到巨大的利益。

一个男女平等的社会是很容易看到的,因为那正是苏维埃革命所许诺的世界:女人由于受到和男人完全一样的培养和教育,将会同工同酬。性爱自由将会得到习俗的承认,但性行为将不会被看做是应当付酬的“服务”。女人将不得不以其他方式谋生。婚姻将建立在配偶可以随意解除婚约的基础上。母性义务将自愿承担,这就是说避孕和堕胎将得到认可。另一方面也是说,所有的母亲及其子女,不论是婚内的还是婚外的,都将会享有完全同等的权利。产假将由国家付给工资,国家将承担养育孩子的责任。但这并不意味着让孩子脱离父母,而是意味着将不会把他们完全交给父母。

在书中作者呼唤:自由的女人正在诞生。她一旦赢得了对自己的所有权,也许蓝波的预言就会实现:“在她们当中,将会有诗人出现!当女人受到的漫无边际的束缚被消除的时候,当她能为自己并通过自己去生活。并且当男人(他们至今仍是可恶的)把她松开的时候,她也会成为诗人!女人将会发现未知事物!她的观念世界和我们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吗?她将碰到陌生的、深奥的、排斥的、愉快的事物。我们将占有它们,我们将认识它们。”她的“观念世界”未必就和男人的不一样,因为她只有获得和他们一样的处境,才会得到解放。可以肯定的是,迄今为止,女人的发展前景一直在受着压制并且丧失了人性,现在是时候了,让她为了她自己的利益,为了全人类的利益去冒险吧!

(裴蓉撰)

【美】莎丽·海特《海特性学报告·女人卷》——
划时代的性学研究巨著

我们重新宣告我们自己身体所具有的权利的时刻到了，我们为了自己的欢乐理应开始使用我们自身的权力。

——莎丽·海特

海特是出类拔萃的科学家和社会历史学家，她为我们理解人类的性生命活动做出了卓越的贡献……并为我们展示了未来希望的美妙蓝图。

——利荷·夏厄菲尔

一、莎丽·海特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莎丽·海特，美国当代杰出的性社会学家和历史学家，本世纪对于性学研究做出最大贡献的三位巨人之一，国际学术界公认她是继金赛、玛斯特斯和约翰逊之后性学研究成就最为卓越的人。

她的三部性学报告《海特性学报告·女人卷》、《海特性学报告，男人卷》和《海特性学报告·情爱卷》出版后，赢得了专家学者和公众的普遍赞誉和好评。迄今，她的著作已有十七种不同文字的版本。她的三卷报告已成为现代性学的经典著作。

由于她的突出贡献，1976年全美《新闻周刊》将她评为该年度“最为杰出的人物”之一。1978年，《世界年鉴》把她列为“全美25位最具影响力的女性”之一。1985年，“全美性教育学家、性学顾问及性治疗学家联合会”授与海特女士“杰出贡献奖”。1985年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弗朗克·索摩尔斯博士，对海特的研究给予了高度评价，赞誉海特的研究是对女性灵魂的全新释义，具有划时代的深远意义。作为杰出的性社会学家，海特的名字已被载入《美国名剥》、《美国名人辞典》和由英国剑桥世界传记中心出版、收录人数极少的《世界著名知识分子辞典》。

海特执教于佛罗里达大学和纽约大学，并多次在哈佛大学、宾西法尼亚大学、乔治·华盛顿大学等300多所大学进行讲演。海特不仅是著名的学者，而且还是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她积极参与为妇女争取权利的运动，多次为全美妇女联合会、东方女性中心、全美妇产科学院、纽约青年女子协会、全美犹太妇女社团开办讲座，进行义务讲演。她经常在世界性学大会、美国精神病协会全国大会、美国性教育家、性学顾问及性治疗学家联合会全国大会上发言，为捍卫女人的生命权利和尊严进行不懈的努力。她曾到过亚洲、欧洲、美洲十八个国家进行巡回讲演，讲述妇女在人类历史上的地位和应有的权利。

海特是美国诸多科学组织的会员。她既是“全美历史学协会”的会员、“全美社会学协会”的成员、“政治科学院”的成员，又是“性科学研究协会”的会员和“全美科学进步联合会”的成员。此外她还是“全美性别、性

医学及科学基金会顾问委员会”委员。

海特特别关注女人的价值、尊严、权利和自由。她早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于佛罗里达大学，随后在哥伦比亚大学攻读博士学位。自 70 年代起，她积极投身妇女解放运动。一直在为妇女获得自由解放而孜孜不倦地工作。她曾经帮助过无以数计的女人，并真诚地希望她所做的工作将会对女人世界的的生活产生积极的、有建设意义的影响。

二、《海特性学报告·女人卷》评介

性爱，这是千百年来人类魂牵梦萦的一个神奇境界。

“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正像古希腊的不朽哲人柏拉图所说：“任何一种快乐都不如肉体的爱来得更伟大、更强烈。”男女之间的性的高度完美的和谐，可说是伴着人类文明发展的整个历史进程，而成为世世代代不仅仅把自己的性爱与生命活动囿于传宗接代这一极端狭隘之功利目标上的男男女女们的不懈追求。

从古代西方最著名的性典——罗马诗人奥维德的《爱的艺术》，到古代东方最早远的房中读物《合阴阳》；从本世纪初奥地利医生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发表在欧洲伦理学界掀起轩然大波的《性学三论》，到五十年前美国学者阿尔弗雷德·金赛推出他在调查 16000 余人之后写成的名扬全球的《金赛报告——人类男性性行为、人类女性性行为》，人类之于性，可谓“路漫漫，其修远兮”，此求索之久远，史册已载两千余年。其著述之丰沛，更远非汗牛充栋可作比喻。应该说，人类对于自身“性领域”的认识，早已到了“入木三分”的程度。我们之性科学对于人类性活动本质内容的把握，也不应再像人类直面于司芬克斯一样，仿佛对什么都显得茫然无知。

然而，读完了美国当代女学者莎丽·海特的这本“性学报告”，我们却不得不心悦诚服地发出由衷感叹，我们伟大的人类至今在自身“性领域”的研究中，竟完全自闭于由几千年传统观念而积淀形成的观念误区之中。我们日常绝大部分（甚至可说是几乎所有）人的性行为，竟完全自我麻痹于因性的观念的没有真正解放而习以为常的角色误区与行为方式误区之内。我们，原来并不像此前所久久引为自豪的那样。我们，当下就需要一场性的健康观念的革命啊。

千百年来，我们对于人类性活动的理解，都是站在一个极不公正的基础上的。这个基础，就是这本《海特性学报告》要将其彻底推翻的“以男性为中心的性模式”。这种性模式，被海特女士认定为“直接导源于男性中心文化”，而具体体现在男人对女人的性行为目的、性行为角色分配及性交过程中。体现在被社会所规范的一夫一妻婚制、处女贞洁道德、女性性欲只能拥有的合于所谓“礼教”的表达方式上。体现在男性对于高潮体验、对于性行为的情感性与精神性，及对于女性在人类整个性活动中所处地位或所具功能的态度上。

《海特性学报告·女人卷》呈现给读者的是，对问卷做出回答的女人所说的话——用她们自己的语言，以她们自己的方式所描述的性生活，意在使人们了解并分析女人对于性的切身感受体验。了解女人对于性的真实感觉——更为清楚地认识女人的个人性生活。由此对女人的性进行重新界定，并强化女人的独立人格。该书同样也意在引起关于性的公众讨论以及对于性的重

新估价。人们应该开始去设计更为仁慈，更为开明，更为个人化的男女亲密交往的形式。这些亲密交往形式，将对未来具有积极的、建设性的意义。

《海特性学报告·女人卷》的主要内容和所阐述的思想，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一) 对性革命的批判

美国 60 年代的“性革命”并不是海特所说的那种意义上的性革命，她在本书中用了相当的篇幅对于这种“性革命”进行了批判。她认为“性革命”虽然也有一定的进步意义，它使人摆脱性的罪恶感和压抑人的禁忌，使人能够公开地以一种健康的态度来谈论性，在观念上使人们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解放。但它与此同时也使男人的兽性和敌意、剥削意识获得了解放。宣扬性行为是健康的和必要的，女人可以“自由地”与人发生性行为有其积极意义。但与此同时这也意味着不与他人发生行为即是不健康的、不正常的。女人不能“自由地”不去与人发生性行为。女人不想与他人发生性行为的权利被剥夺了，她们丧失了说“不”的权利。在这种强迫性的意识形态的作用下，男人要和女人发生性关系比过去容易多了。但男人对于这种行为的责任意识并没有增强，男人对于女人的态度从根本上并没有多大的变化。“性革命”并没有赋予女人真正的自由，让她们去自主地探索自己的性生命活动。“性革命”并没有赋予她们更多的选择权，只是强迫她们发生更多的同一类型的性行为，并把她们置于一种更为容易受到伤害的位置，把她们从私有财产变成了更容易得到的公共财产。

海特指出：“性革命”是隐藏在虚伪的激进表象和伪现代意识背后的所谓革命。它是男性中心文化的产物。它的中心宗旨依然是男性的价值，女人的传统角色始终没有改变。海特借用一位女士的话来表达对这场革命的看法：“在就业市场上、在女性杂志的故事里、在床上、在女人的心灵中，男人依然雄居于至高无上的地位。高居在女人之上的男人通过摇滚乐、化妆品市场，色情文艺等等来发动这场‘性的革命’。女人作为被压迫者在这场革命中一无所获。女人依然被当作性对象来对待，我们并没有从旧有的角色中解放出来，只是更加对象化了。”

从这场革命中获益最多的是男人。“性革命”为了男人寻欢作乐、逃避责任提供了一种名正言顺的托辞。此外，性的日常化和商业化，也越来越多地渗透到我们个人生活的各个角落。掩盖了它对于我们所具有的深层意义。真正的性革命并没有到来。海特衷心希望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性革命的到来，这种革命将是性的健康观念的革命，陈腐的男性中心文化性模式的革命，建立在男女平等，相互理解、相互信赖、相互交流、共同拥有的基础之上的性关系的革命。她指出，“我们需要这样的革命”。

“如果性的革命暗示着这样一种姿态，即：现在女人也‘自由’了，她们也可以用男人的那种方式去与陌生人性交，去把异性压在下面性交，那么我认为性革命是令人厌恶的。女人并不愿意‘自由地’采用男人的性行为模式。她们想要去自由地寻找发现她们自己的性行为模式。”

(二) 倡导女性的解放

有感于世人对于女人的误解，有感于女人对于性生活的普遍不满，海特在全美妇女联合会等组织的协助下，对全美各地各行各业年龄在十八岁以上八十三岁以下的数千名女人进行了广泛而深入的调查。她提出的问题涵盖面广、复杂多样、客观而全面。女人对她所提出的问题进行了坦诚、清晰、认真的回答。通过调查，海特发现，女人的焦虑、恐惧、烦恼和悲哀来源于偏见和错误的诱导。而造成这种偏见和错误诱导的是男性中心文化的性模式。大量所谓的女性的性功能障碍和失常，都是这一模式造就的产物，是这一模式对女人的错误认定和错误解释造就的。因此，海特在全面批判这种男性中心文化性模式的同时，系统地、科学地从生理学、心理学、社会学和文化等不同的角度重新解释了女人的性生理功能，心理特征，情感方式和社会作用，为正确地认识女人提供了一个全新的视角。

人类的性活动是生理性活动，更是情感性的活动，当代著名哲学大师伯特兰·罗素说：“文明时代的人不再会完全满足于那些只有本能而无恋情的性爱了。”在性行为活动中，情感活动是一项极为重要的内容。海特指出，在这方面，女人比男人更有代表意义。通常，女人对于性行为活动都要求有丰富的感情内蕴，性行为是性爱情感的表现形式，有时她们甚至认为性爱情感本身的重要性高于性行为本身。海特调查的结果证实了这一点。几乎所有的女人都认为，性行为是爱情、关怀、顾念、亲密、喜爱的表现形式。没有情感的性行为没有意义，有时她们甚至满足于没有性行为的、表现爱意的拥抱、亲吻、充满柔情蜜意的抚爱，而宁愿不要无感情意味的性交活动。

然而，男人常常让女人感到失望，男人仿佛总是目的性很强，他们的需要总是很实际。他们有时宁愿发生性行为寻求没有感情的性欲满足，而不愿只要那种捉摸不定的情感。他们甚至可以在对女人毫无感情的情况下与她们进行性交、获得肉体上的满足。女人对于男人感到不满，常常不是因为没有让她们在生理上获得满足，而是因为没有让她们在精神上获得满足。他们的行为常常并不表现对她们的情爱，而表现他们对于她们的需要。女人抱怨男人时常并不是他们在哪个具体的身体部位上，没有给她们适度的刺激，而是抱怨男人在精神上对她们漠不关心。抱怨他们对她们缺乏爱，缺少情意，缺乏顾念，缺乏深情。她们渴望交流、渴望增进相互之间的认识和理解，渴望与男人进行生命的对话。可她们常常发现男人总是更看重欲望的满足，把女人当成满足欲望的对象。因此，在人类这本应最为亲密的领域中，女人对于男人尤其失望。也就是在这个领域中，女人表现出对男人最多的声讨、最大的愤怒、最强烈的不满、最动人的哀怨，最殷切的希望，最公平的要求、最美好的理想。海特认为，这种现存的令人不满的状况应该改变，她指出，这种改变首先应是男人观念上的变化，随后是男女之间性关系的革命。

尽管反对女权主义的人建议女人放弃经济独立的权利的要求，回到她们作为妻子和母亲的传统角色中去。但无论是好是坏，是幸运的还是不幸的，根本没有完全退回我们传统地位的真正道路。既然生育孩子的重要意义已变得无足轻重，女人可以说，是失业了。这种变化的出现已经有很长时间了，而且也不太容易逆转。女人尽管作为一个阶级尚未在经济上或社会上赢得独立地位，但我们可以改善我们的地位(或者使之保持在现有水平上)，而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往前走，使我们与世界再度统一起来。或许，如果我们觉得必要，改变这个世界。

海特认为“性自由”是这样一种东西——给予女人不结婚而与人发生性

关系的“权利”，弱化一夫一妻制的重要性——其功能在于减低生儿育女对社会的重要意义，降低父亲的身份对男人的重要意义。虽然这种变化被贴上了“性自由”的标签，事实上它迄今并未赋予女人(或男人)真正的自由去探索她们自己的性生命活动。它只是强迫她们发生更多的同一类型的性行为。最后，重要的在于记得“你不可能在女人没有获得经济上的自由时宣称她们“在性方面是自由的人”；这样做无疑是把她们置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容易受到伤害的地位，使她们成为一种更容易得到的公共财产形式。

海特饱含对女人的爱，对女人的理解和关怀，对女人的同情和期待，描绘出了一幅从未有过的真实的女人性世界的图景。她在书中倾诉着女人的心声、女人的爱、女人的意愿和女人的希望。为了女人们及整个世界的欢乐和幸福、她提出了合理而公正的新理论观点，捍卫女人应该享有的、天赋的生命权利，捍卫女人的价值、独立、自由和完整的人格。她的良苦用心、艰苦卓绝的努力和对女人的无限情意而让人感动。我们相信，作者的叙说和借用他人的话语所表现的女人真实世界的景观，将会使更多的女人了解自己，了解自己的女性同伴。使世界了解女人，使男人从一个全新的角度去理解女人，去认识女人，并和女人共同去创造、去拥有一个新世界。海特女士阐发的新的生命观，将照亮性学和社会学研究的幽暗领域。让世人看到生命真象，给世人尤其是女人带来令人激动的启示和生命的福音。她的新生命观点将使她们的生命活动为之改观，从根本上改变自己的处境，走向更高质量的生存境界，快乐而有意义地生活。

(三) 女人应该了解性

长期以来，众所周知在性交或曰“做爱”过程中，大多数女人获得高潮都很“困难”，但却始终未能得出正确的结论。女人“过于敏感”或者“心理上有障碍”，这就是为什么她们不能像男人那样容易达到高潮。事实上，女人的确如同男人一样容易达到高潮，而且她们达到高潮的频率经常比男人更高。然而，她们在接受如同男人接受的刺激过程中却未能获得高潮体验。

这部著作作用事实文献来表现女人的世界，用女人自己的话语来解释述说她们如何能够很容易通过自我刺激来达到高潮。在私下场合刺激自己的性器官或外部性感部位，她们可以迅速达到性生命活动的最佳状态——然而，她们在与男人性交时，通常却无法获得这种形式的刺激。我们有关性的概念很久以来完全都是围绕性交的生殖行为来建构的。因此，无论一个女人如何挚爱男人或强烈地需要男人，她都很难超越极度兴奋的界限，达到性生命活动的最佳境界。

所以，我们必须对性的概念进行更正。问题并不在于女人难以达到性生命活动的最佳境界，而在于社会是否能够接受女人达到生命最佳境界的方式，人用手或口对性感器官进行刺激理所当然应该为人们之间性活动的令人敬重、令人欣悦的有机组成部分。

我们关于性的观念隶属于一种已成为过去——或者正在成为过去的世界观。性，以及诸种性关系已经不再能界定出它们曾经所能界定的具有重要意义财产权利；无论是对于国家还是个人，孩子都不再对拥有权力起决定性作用。虽然我们所有的社会组织依然完全建立在等级和父权制形式的基础上，但是作为一种形式的父权中心已不复存在，从性对它的界定上即可看出

这一点。我们现在处于一个转变的时期，尽管向着什么转变至今尚不清楚。今天我们所面临的挑战是，要设计出一个更合乎人性的社会，一个能够对古老的价值的精华进行发扬光大的社会。一个相互亲善、相互理解、相互合作、相互平等、让正义遍及公共生活和个人生活各个领域的社会——一种向着更能发展人的个性、更为人造化的社会的转变。

具体地说，在性的关系——我们也许应该开始简单地称之为肉体关系中——我们可以再次重新开辟很多选择的途径。以前把肉体亲密的所有形式都导入我们那种机械的性观念的做法，现在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其中包括触摸的简单形式和温暖的肉体接触形式。在性的触摸和友谊之间需要做出一种界限分明的区分。正像女人将“性欲唤起”描述成性行为活动中最美的组成部分，正如她们把亲密描述为性交的最令人快乐的特征，所以强烈的肉体接触也可以是一种就其自身而言人们可能获得的最为令人满意的活动。在男性中心的社会里，男人从来不按照女人原有的形象来理解女人、认识女人。他们只是按照男性中心的文化模式来认定女人。他们眼中的女人和心中的女人并不是女人本身，而是他们期待中的女人，是他们的欲望对象。女人究竟是什么他们并不知道，即使他们想去认识女人，想去理解女人，他们也总是不可避免地受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的影响，不由自主地去认定女人应该是什么。男人仿佛从来都没有给女人以机会，让她们说出女人的真实存在是什么样的生命存在，让她们说出自己真实的生命感觉。他们总是有意无意用男性中心的文化模式扭曲女人的存在方式和生活方式，这既让女人感到痛苦，又让女人感到无奈。海特深切地感受到了女人的艰难处境，认识到男性中心文化模式给女人带来的不幸和灾难，认识到这种文化模式剥夺了女人应享的生命权利。它把女人造就成了男人世界的性对象，在女人的本真形象和虚假表象之间构成了一道屏障。它既妨碍了男人认识女人，也妨碍女人认识女人自己的本原形象。唯有摆脱这一文化模式，排除男人的影响，女人才有可能认识自己，并让世界了解女人。

因此，海特认为，像男人一样，女人应该了解自己，应该了解他人和世界，应该让他人和世界了解她们。女人有权利为自己说话，倾诉自己的心声，表达她们的情感和观点，发泄自己的不满和哀怨，道出自己的烦恼和忧伤，展现她们的愿望和希望。

性，是关系到人类身心健康发展、生活幸福，关系到社会文明进步的一件大事——这个观点已经越来越多地为人们所接受了。

然而，性交在实际上只是人们进行性接触、表示亲密的情感的一种形式，一种较为集中的形式，但却并不是唯一的形式，更不是唯一正确的形式。性交是自然的行为，自慰和其他性的嬉戏行为同样也是自然的行为，这从人类学的研究中可以找到大量的证据。性交是一种基本行为，但它却不是人们臆想的与生俱来的行为，而是一种习得的行为。在远方的先民那里人们通过成人仪式来学习这一行为，现代的文明人则通过各种文明和不文明手段来习得这一行为。金赛、珍妮·古道尔以及诸多动物学家的研究结果证明，自慰行为、同性恋以及其他性亲昵行为在狒狒、猴子、猩猩、马、牛、大象、雪貂、松鼠等等很多动物中间司空见惯。研究结果显示，在完全隔绝的环境中长大的猩猩，根本不知何为性交，但却从很小的时候就开始进行手淫活动。

虽然我们倾向于认为，“性”是一组类型，是一活动的集群（就本质而言，生殖活动的集群），但我们没有必要去以这种方式来限定我们自己。例如我们

没有理由认为与男人的肉体亲密活动，始终应该由“前期爱抚”和随之而来的性交和男人的性欲高潮来组成，(关于这一点，我们将根据对所收到的有关男人的问卷的回答进行讨论，分析结果不久将发表)。性交必须始终作为异性间性行为活动的一个组成部分也毫无道理。性行为活动是获得快乐，与另一个人分享快乐(或者只是独自享受快乐)的亲密肉体接触。你可以发生性行为以达到性欲高潮，也可以不为达到性欲高潮而发生性行为，可以是生殖器官间的性行为，也可以只是肉体的亲密接触——无论是什么，只要你觉得合适就行。永远不存在必须把性交想作是“最终目的”的道理，永远没有理由要你努力把自己所感觉到的一切硬性地塞进那种情境之中。根本不存在“就在那儿”的性行为表现的标准，依据这个标准你可以测试你自己；你既不受制于“荷尔蒙”，也不受制于“生物本能”。你可以自由地强化对性行为的兴趣，提高性生活的质量。女人具有获得性欲高潮的能力，既显示出她们的力量，同时也象征着她们的独立和自由。在她们渴望达到高潮的时候就能达到性欲高潮，表现出她们能够完全有效地控制自己想要得到的刺激，“这代表着女人所拥有自己的肉体，是坚强的、自由的、有自主能力的、独立的生命存在。”

(四)性是生命之源

法国著名生物学家拉穆兹言：“性在一切之始，一切之终。”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类生命的历史即是人类性的历史。人类一代代生生不息的繁衍和发展，与性行为活动密切相关，人的持续和承继没有性行为活动无法进行。没有性行为活动，人的生命存在将会终结，人的历史也将会终结。

“性是人类生命的源泉，是整个人生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不管我们是否主动参与，性欲都是构成我们日常思想和情感的一部分。它根植于我们的梦想、渴望、恐惧和挫折之中。”美国杰出的性学家贺兰特·凯查杜里安在其著述《人类性学基础》导言中一开始就对性做出了这样的评价。的确，性在人类生活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甚至人类最精神化的、最美好的爱和最强烈的肉体欢乐、也维系于性的基础。就连推崇纯粹的精神之爱的柏拉图也承认“任何一种快乐都不如肉体的爱来得更伟大、更强烈。”凯查杜里安认为，“对于每一个来说，性都是潜在的快乐和苦痛的源泉。”“在人类的相互交往中，性的影响无处不在。”性的世界对于人的生命活动具有特殊重要意义。

女人角色的变化是意义双关的。从传统的意义上说，既然多生孩子已变得不太重要了，女人的地位也就下降了。也就是说，既然人们在传统的意义上几乎完全按照她们生育孩子的角色来看待她们的价值，那么当这一角色显得不那么重要时，她们作为一个阶级也就变得不那么重要，变得不太为人尊重了。与此同时，人们说现在女人“摆脱”了她们的传统角色，她们可以“在性方面和男人一样自由”等等，女人获得独立诸种新的可能性已展现在她们面前——这种观点有一定的道理。

人类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以男子为中心的历史过程。以男子为中心的文化至今还有很大的社会影响。人们常常是站在男子的角度来看待女子、要求女子的。而千百年来女子也往往以男子的这些看法作为自己的看法。事实上人们对事物的理解，不仅受自身知识和水平的限制，而且受到角色地位的限制。例如，如果单纯从领导者的角度来看被领导，单纯从父母的角度来看子女，

单纯从异性恋的角度来看同性恋，往往不可能获得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全面的认识。同样，如果单纯站在男子的角度来研究涉及男女两性的性问题，也不可能对性问题、对女子有一个科学的、客观的、全面的认识。从现代性科学的发展来看，全世界有多少志士仁人向这个领域英勇地，历尽艰苦地冲刺，他们给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文化遗产。人们铭记着他们的丰功伟绩，当然也知道任何伟大的学者都不可避免地受到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条件的限制。可是，又有多少人注意到一个最伟大、最开明，最进步的性学大师还会受到他所处的角色地位、受到以男子为中心的文化的的影响呢？《海特性学报告》的特点和它的划时代意义就主要在于彻底摆脱了男子为中心的文化的的影响，从而在男女的性态度、性心理、性行为、性反应、性角色地位以及在性文化的其他许多问题上，提出了许多有科学根据的、崭新的见解，在许多方面弥补了过去性学研究之不足。海特是一位世界级的向传统观念英勇的挑战者，这位女性不仅在科学地理解女人，而且在科学地理解男人。

为了让女人充分地、更为深入地了解自己和他人、更为真实地展现自己的形象，海特完全站在女人的立场上设计出能够深入到女人心灵深处的问卷，表现出了她的创意，她的聪慧和她对女人的关怀与同情。与其他性学研究者设计的问题相比，海特设计的问题具有鲜明的特色，集中体现在设计问题的敏感性；隐秘性和具体性上。为了使回答问卷的女人不必担心自己所写的东西会对自己的生存造成某种形式的伤害，消除内心的余悸，毫无顾忌、毫不规避、大胆袒露内心的秘密和真情，她所设计的问卷采用了匿名的形式，而且她在问卷前面的话中说明答卷者可以只回答她想要回答或有兴趣回答的问题，这样回答问卷的人就可以尽情他讲述自己想要讲的一切。一位女士说道：“把这些问题答案写出来让我感到有点儿难为情，因为从某种程度上说，这些问题还是太个人化了——如果问卷不用匿名的形式，我是绝对不会回答的。”另一位女士表达了同样的感情：“不必在上面签名，这让我感激不尽，因为弄不好这种东西会落入坏人的手中。我不能说我喜欢回答这类问题，要是当面回答这些问题我会羞死的。采用这种方式我就不必担心。”

对《海特性学报告》，如果只是评价它是一本优秀的性学著作还是不够的，应该说它是一本划时代的性学著作。现在，在中国的性学工作者中，几乎没有人不知道金赛和《金赛性学报告》、玛斯特斯和约翰逊和他们和《人类性反应》了，可是，也许很少有人知道海特和她的调查报告，这实在是一个重大的缺失和疏漏。《海特性学报告》不仅能和《金赛性学报告》、《人类性反应》等西方性学的权威之作相媲美，而且更有它独特的、崭新的意义。

《海特性学报告》的独特性不仅在于海特从 70 年代至 90 年代对人类的性问题进行了连续不断的、一个战役接一个战役的、一次比一次深入的调查（他人的一些调查往往是“毕其功于一役”），而且更重要的是她从女人的角度来研究女人并由此推及男女两性的性问题的。她的调查，从问卷设计到实施调查，到统计分析，都是由女子从事的，她们从女人的角度来研究女人，从女人的角度来理解女人，就得出许多崭新的观点、更加科学和合理的观点，甚至推翻了世界权威的性学大师的一些结论。

(张月 晓天 撰)

【美】约翰·格雷：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获得与异性之间完美关系的指南

增进你人生的爱情永不嫌迟。你只需要学习新方法。不管你是不是正在做心理治疗，如果你想与异性有更完美的关系，此书是你最佳的指南。

——约翰·格雷

要找一本可以一口气读完的自助书籍是很难的，但是约翰·格雷写出来了。《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代替了一切陈词滥调，带给我们时代一股清新的气息。

——苏佩·佩吉

一、格雷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约翰·格雷(John Gray)，哲学博士，二十多年来在许多重要城市主持研讨会，也经营一所私人婚姻治疗所。目前与太太和三名子女住在加利福尼亚州。

约翰·格雷博士是目前美国最著名的“自助专家”，并且无可争辩地取代了卡耐基的地位。其著作主要有：《你可治疗你的感觉》(What You Feel, You Can Treat)、《男人、女人与爱情关系》(MenWomen and Relationsvips)，在美国均具有广泛的影响。其《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Men are from Mars, Women are from Venus)一书自1992年出版以来连续158周雄居美国畅销书排行榜榜首，成为美国最畅销的自助读物和异性之间增进沟通建立良好人际关系的实用方针，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获得了巨大的认同，以至于《纽约时报》加以书评认为此书是“获得与异性完美关系的最佳指南，毫不夸张地说，它甚至可以称之为90年代的爱情关系指南。”

二、《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评介

(一) 男人与女人的差异

男人来自火星，女人来自金星。他们相遇、相爱、相邀，双双来到地球上共同生活。由于他们本是来自于不同的星球，巨大的背景差异导致男女之间经常发生剧烈的冲突。

作者正是基于这种男女来自于不同星球的隐喻，阐明了男女之间存在着的巨大的差异，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男人和女人之间普遍发生的矛盾。这种矛盾一涉及到爱，往往就变得极为复杂和头痛。因为“如果两个人没有感情，在争执和辩论时，很容易客观地分开立场；但当两个人有了感情关系，尤其是有了性关系时，争执就容易公私不分。”

1. 天生价值差异

第二章作者主要探讨了男人和女人的天生价值是如何的不同，并尝试论述了我们与异性相处时常犯的两大大错误：男人错误地提供解答和无价值的感觉；女人错误地提供没有吸引力的忠告和指示。借由了解火星和金星的背景，就可以清楚明了为何男人和女人会不知不觉地犯下这个错误。只要记住彼此的不同，我们就能修正错误，马上以更多样化的方式回应对方。作者认为，一般地说，在生活上，男人透过他达成结果的能力来诠释自己的存在意义，而提供给男人他不主动请求的建议，等于断定他无法自己做事或他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而女人则透过感觉和关系品质来诠释自己存在的意义。所以，作者指出，一般说来，当女人提供给男人非请求的建议，企图帮助他时，她完全不知道对他而言，她可能太过挑剔、缺乏爱心；而当一个男人觉得是问题的解答在接近他，而不是问题本身在接近他时，他就会想要改善自己。

2. 处理压力的方式差异

第三章则探讨了男女处理压力的不同方式。火星人倾向于解决和安静思考什么事使他们困扰；金星人本能地感到需要谈论什么事让她们困扰。你会学到在解决冲突时所需要的新策略。

作者认为，火星人和金星人处理压力的方式不同在于：火星人借着独自到他们的洞穴解决问题而获得舒解；金星人借着群集一起，坦然讨论她们的问题而获得舒解。

就像男人因完成解决问题的复杂细节而获满足一般，女人也因谈论问题细节而获满足。

承受着压力的女人并不急于马上寻求解答，而宁可透过解释自己，让人了解，来取得舒解。为了忘记自己的痛苦，女人可能情绪化地陷入其他问题中。

3. 鼓舞异性

接下来，作者主要探讨如何鼓舞异性：男人在感觉自己有需要时容易受到激发；女人则在感觉受珍爱时才会被激发。并进而讨论促进两性关系的三个步骤和如何征服我们的大挑战：男人需要克服他们的给予爱；女人需要克服她们的接受爱。

作者指出，当男人爱上女人时，男人为了证明他的潜力，所以表现最好的一面。只有在他觉得无法成功时，才会退回自私的老路。

不被需要对男人来说，是种慢性死亡，而当女人爱上男人时，女人不费吹灰之力就自然而然得到松懈，就像自然记起她值得被爱；她可以松懈，少给予、多接受，这是她应得的。

作者提出并分析了设立及多重界限的三个步骤：

步骤 1：激发

步骤 2：负责

步骤 3：练习

认为在学习接受时，当她醒来并记得她的需要时，他也醒来准备要给她更多了。而在学习给予时，男人最深的恐惧是他不够好，或不够资格，男人害怕给予，就像女人害怕接受一样。

当他不快乐或失望时，要他听她说话就变得十分困难，因为他会觉得自己像个失败者。

4. 语言的差异

作者在第五章探讨了男女因使用不同语言而老是误解对方。“金星/火星

措词辞典”能够翻译一般的误解用辞，介绍了男人和女人如何为了完全不同的理由说话及停止说话。女人将学到当男人停止说话时该怎么办？男人将学到为了不致失望，该如何成为更好的倾听者。他认为，在金星人和火星人的语言中使用的字相同，但却有不同的意思。女人采取多种最严重的语法、隐喻和概念化的诗一般的语言来表达她们的感觉。

作者指出：男人错误地期待女人要以男人的方式思考、沟通、反应；女人也错误地期待男人要以女人的方式去感受、沟通、反应。我们都忘了男人和女人应该是不同的。结果男女关系充满了不必要的摩擦与冲突。

男人很难分辨同感与同情的区别，他讨厌人家的怜悯；而人们常常不以为女人需要安慰，也不以为男人需要孤立，良好的沟通需要双方合作。男人必须知道女人抱怨，只是想把沮丧借着谈话发泄掉，而并非责骂，女人必须让男人知道，纵使她抱怨，但她仍然感激他。

于是作者指出：男人若能倾听并正确解释女人的感觉，就比较容易沟通。当沟通反应了已准备好的接受及对个人先天差异的尊重时，两性关系会更繁荣，若出现误解，请谨记我们是说不同的语言；解释配偶的真正意思无可避免地需要花段时间，这绝对需要练习，但绝对值得。

5. 男人和女人的比喻

作者形象地指出男人和女人的不同：男人像橡皮筋，而女人则像波浪。

第六章探讨了男人和女人对亲热有何不同要求。男人亲密后必然需要抽离，女人会学会如何支持这个抽离的过程，以使他像橡皮筋一样弹跳回来。女人也会学到与男人亲密谈话的最好时机。

而第七章作者探讨了女人的爱情态度是如何的有周期性起伏，男人应学习如何正确判断女人偶尔的情感变化，女人何时最需要关心，如何在女人情感起伏时有技巧地、不放弃地支持她们。

男人和伴侣相处到某一程度后会遗失自己，为何当女人一亲近时，男人就脱离。

然而，男人会渐渐明白自己的周期，也会向她保证脱离后一定会自动回来。与男人不同，女人的自尊起落犹如波浪，跌落低点时，正是情绪大扫除的时刻。在谈到男人如何应对这一差异时，作者指出：

男女关系表现在爱的能力上时，男人是脱离又亲近，女人则是上升又跌落。因此，聪明的男人会设身处地帮助女人安全升落，他会放下判断与要求，学习如何给予必要的支持，如此他便能在增添爱与热情的关系中悠游数年。在学习支持女人时，他可能必须经历一些感情的风暴与干旱期，但终究会得到丰富的报酬。未启蒙的男人仍然一直陷在风暴和干旱的痛苦中，如果他不明白爱情井中的她的艺术，他们之间的爱会逐渐受到压抑，停止成长。

作者认为，女人在井中，男人在穴中，他们有不同的逻辑观念：男人争取自由的权利，女人争取沟通的权利；男人要空间，女人要了解。

当她需要时，作者指出了支持她的三个步骤：

其一，接受她的要求；

其二，了解她受到的痛苦；

其三，避免争论，给予安慰。

6. 感情需求差异

作者指出，男人与女人通常没有意识到他们有不同的感情需要，所以他们不知道该如何彼此支持，男人通常只是给他们想给的，女人也给她们想给

的。两方面都说认为对方的需求和自己相同，结果两人都不满意，不高兴。

在第八章作者探讨了男人和女人如何给予他们自己需要的爱，而不是异性需要的爱。男人基本上需要信任、接受、感激的爱；女人基本上需要体贴、了解、尊重的爱。

作者认为，在完全接受及感激其他的爱之前，必须先满足基本需要：

- (1)她需要关心，他需要信任；
- (2)她需要了解，他需要接受；
- (3)她需要尊重，他需要感激；
- (4)她需要忠诚，他需要赞美；
- (5)她需要认同，他需要肯定；
- (6)她需要安慰，他需要鼓励。

男人通常误以为他只要满足她所有爱的基本需求，使她感觉快乐、安全，她就会相信他永远爱他，其实是偏颇的。相反男人可以成功地满足女人基本爱情需求的第一方式是沟通，正如我们先前所说，在女人的世界里，沟通特别重要，男人由学习倾听女人的感觉，可以有效地表现关心、了解、尊重、忠诚、认同与安慰。同时，作者认为，不但男人需要学习满足女人爱情基本需求的倾听艺术，女人也需要学习授权的艺术，女人若支持男人，就是授权给她，相信他的能力。当男人被信任、接受感激、赞美、肯定和鼓励时，他便觉得得到授权。

最后作者认为，如果男女在学习互相支持时，不把个人的要求摆在第一，双方就能够自然地改变与成长。认真了解。

配偶的六个基本需求，你可以根据这些需求调整爱的支持，使你们的关系更和谐圆满。

(二)对减少男女紧张关系与增进彼此爱情新方法的论述

1. 减少冲突

作者在大量心理咨询实践和问卷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减少男女之间紧张关系与增进彼此爱情的新方法。最重要的是提供了大量减少挫折与失望、增进快乐与亲密的实用性技巧。文中语言朴素平实、亲切感人，犹如一位智者在你娓娓谈心。在详述男女之不同之后，披露了减少紧张关系与增进爱情的新方法，也提供如何减少挫折与失望、增进快乐与亲密的实用意见。婚姻关系不必奋力挣扎，只有在我们不了解对方时，才会产生紧张、气愤或冲突。

作者认为，改善两性的关系必须清楚了解男女之间的不同，以便鼓舞互相信任、个人责任，促进彼此合作、增加爱意以提高自尊。他在研讨会上做了超过两万五千名参与者的问卷后，以积极的用语解释男女之不同，探讨这些不同时，就会觉得愤恨与不信任之冰正渐渐融化。

作者在第十章列出男人和女人不同的计分法。对金星人而言，每件爱情礼物不管大小如何，都和其他礼物一样得到同样的分数。男人则注重爱情的小小表现，而非大礼物。该章列出了女人计分的一百零一种方式。但女人必须学习将她们的精力放在给予男人想要的东西上，以博得男人的高分评价。

作者认为，不管爱的礼物是大是小，女人只记一分，每样礼物的价值都相等，男人不知道女人将小事情看得和大事情一样重要，也就是说，对女人

而言，一朵玫瑰和准时付租金得到的相同的分数，如不了解这种记分的基本不同，男女在关系中会不断发生挫折与失望。

接着，作者探讨了男人和女人给分的不同：

男人的给分法和女人不同，每次女人因男人为她做事而感激他时，他会觉得被爱，然后给她一分以回报。对男人而言，除了爱以外，他不要求任何事，女人不知她们的爱有这么大的力量，却花费许多不必要的时间做超出自己能负荷的事以赢得男人的爱。因此，男人在做家常琐事时，也需要女人对等的参与，但他如果没有受到感激，她的参与反而会显得没有意义，对他完全不重要。

作者认为，争论的结果是：多数夫妻在争论一件事后，不到五分钟，又会以同样的方式为另一件事争论，然而争论会伤人，不是因为我们说了什么所造成，而是因为我们是怎么说的。男人受到挑战时，他的注意力会都集中在对与错上，而忘了表现爱，此时他体贴，尊重的沟通能力和安慰的口气自然会减退。他不知道自己的声音是多么不体贴又多么伤害配偶。此时，一个单纯的意见不合可能听起来都像在攻击女人；要求也变成了命令。女人在此情况下自然会反抗这种没有爱心的方法。

于是，作者在论述了避免伤害的四个态度。即吵架、逃避、假装、隐藏之后指出，避免争论，我们必须牢记，配偶抗拒的不是我们说了什么，而是我们如何说。争论一定要两个人才能引发，但停止争论只需一个人做到即可，停止争论最好的方法是及时防止问题的发生。当意见不合变成争论时，你可以负起分辨的责任，停止谈话，暂时休息一下，反思你是如何对待配偶，试着了解你是否没给予对方所需要的。然后，过些时候再回来谈，但要存着爱心和尊重的态度。暂时休息可使我们的情绪冷静下来，治疗创伤在沟通之前先整理自己。

作者对争论做了深层剖析，分析了男女争论的潜在理由，男人很少说“对不起”，是因为在火星上说“对不起”就表示你做错事和道歉。

男人若不赞同女人的感觉，女人又以否定来回应他，大部分的争论就会因此扩大。而引起争论的原因：(1)当男人觉得女人否定他的意见时；(2)女人否定男人对她讲话的方式。

最后，作者指出要以爱的沟通避免争论，如果我们能了解配偶的需求，记得给予，情绪性的争论与吵架是可以避免的。

2. 加强沟通

许多人对婚姻感到挫折，他们爱配偶，但当气氛紧张时，却不知该如何做才能使情况好转。该书因了解男女有多么不同而提供与配偶成功建立关系、倾听与支持的新方法。使读者了解如何增进你本就应该拥有的爱情。

该书第十一章探讨了在困难时刻如何彼此沟通，讨论男人与女人隐藏感觉的不同方式及分享感觉的重要，并向读者推荐向配偶书写表达消极感觉的情书技巧，作为发现更美好的爱情与谅解的方法。

作者认为，写信是沟通的一种方式，但他指出，不管你写信是要分享感觉或是让自己好过一点，更重要的是，诚实写下感觉。

接着，作者分析情书的三个技巧：

- (1)写一封表达你的气愤、伤心、害怕、后悔和爱的感觉的情书。
- (2)写一封表达你想听听你配偶说什么的回信。
- (3)和配偶分享你的情书和回应信。

其中的三个步骤是：

(1)写情书。其中的基本指导原则是：

其一，读情书给配偶听，假设配偶正以爱和理解听你读。

其二，每封信包括五种感觉，先是气愤，再来是伤心、害怕、后悔，最后是爱。

其三，用一些句子描述每种感觉，保持五种感觉的句子长度相等。描述要简单明了。

其四，每写完一种感觉，停一下，让下一个感觉涌上。然后写下那感觉。

其五，爱的感觉没出来以前不要停止写信，耐心等待爱出现。

其六，在信末署名，再想想你需要什么，写入附注。

(2)写回应信。作者认为，写回应信是教男人了解女人需求的最好方法。

(3)分享你的情书与回应信。由此作者认为，如果我们生长的家庭早已有爱与诚恳的沟通能力，成功的沟通就是我们的第二天性。

3. 爱情密码

增进爱情关系之旅当然有时会碰上荆棘，问题在所难免。但这问题既可成为愤恨、拒绝之源，也可成为更加亲密增进爱情、关心与信任的机会。该书不是消除所有问题的“修理快手”，而是提供一个新方法，让男女两性的关系能够成功地支持你在人生中不断出现的问题，有了这个新认知，你就有了获取爱情所需的工具，能够给你配偶更多的爱，支持他或她的需要。

在第十二章中发现金星人为何难以开口请求支持，以及火星人为何抗拒请求，你也会知道男人以什么来取代说“你可不可以……”，以及学习鼓励男人付出更多的秘密，发现多种简短、直接的力量及如何使用正确的字眼。

作者认为，要求爱与支持是任何关系的基础。如果你想获得，你就必须要求。男女都难以启齿要求支持。但是，女人比男人更会对要求失望而感到挫折。

在第十三章探讨了爱情的四季变化。作者认为这个爱情变化与成长的现实观察将会克服浮现在任何关系中不可避免的障碍。

作者指出，爱情关系的矛盾之一，是我们感受到彼此的爱，但突然却觉得和配偶之间有了情绪上的距离。

他进而提出自己的90/10理论，认为我们对配偶批评的反应，10%是来自他们的批评内容，90%则和我们的过去有关。

通过分析，作者认为健康的人也需要辅助。有个矛盾论调：你因与配偶在一起觉得安全，所以内在恐惧才有机会浮现，但恐惧一浮现，你便又害怕得不敢分享自己的感觉。

于是，作者提出，为了永浴爱河，必须了解爱情的四季，适应持续改变的爱情四季，对爱情的特殊需求细心培植。他认为，爱情是有季节性的。春天，爱情很容易；夏天，爱情很艰辛；秋天，你感到丰收与满足；冬天，你感到空虚。只有这样，才能获得美满的婚姻。

总之，作者认为，该书虽然不能取代心理治疗的需要，也不能为出了麻烦的关系或紊乱的家庭做辅导，但即使健康的人，在面对挑战时也可能仍需要心理治疗或辅导，作者相信心理治疗和婚姻辅导可帮助我们做强有力的改变。

(天舒 撰)

【美】保妮·韦尔：
《外遇：可宽恕的罪》——医治情变的处方

被伴侣背叛的情绪是最难平静下来的，那包括被你所爱的人的伤害，失去对自己的自信，以及无法再信任别人。因此，当我们说外遇是可以原谅时，相信只要有过经验的人，恐怕都会再度撕心裂肺地翻腾起情绪来。宽恕外遇，并不是为其找借口，而是了解外遇行为背后的驱动力。外遇往往只是一种表相，底层却是个人与人际关系的模式出了问题。

——保妮·韦尔

尽管多少人歌颂爱情的可贵，变调的恋曲却时时可闻。在缺乏道德约束力的束缚下，外遇事情的发生比例像乘坐云霄飞车似地直线上升……。以宽容的心理理解对方的处境，并认清爱情的真实面貌，是面对情变时的最佳处方。

——乔治·圣塔亚娜

一、 韦尔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保妮·韦尔博士(Bonnie Coker Well oh · D)是美国婚姻与家庭治疗协会会员，作为私人家庭治疗师，其治疗对象包括个人、夫妇及儿童。她除了主持自己的电视节目外，还常出现在美国家喻户晓的电视节目“欧普拉时间”中，提供她的理论以供观众参考咨询。此外，美国三大电视网及福克斯新闻网(Fox news)也经常邀请她上节目现身说法。韦尔博士不仅在电视媒体上很活跃，著名的杂志《时代周刊》(Time)、《纽约杂志》(New York Magazine)也曾报道过她，称她是“美国很有影响力的心理治疗专家”。

二、 《外遇：可宽恕的罪》评介

《外遇：可宽恕的罪》是美国婚姻问题专家、心理学家保妮·韦尔博士所著的一部研究人类婚姻过程中的外遇现象的大众实用性婚姻心理学著作。

在这部书中，作者阐释了这样的观点：外遇毕竟是一种罪过，它伤害夫妇双方，也伤害第三者；它破坏家庭，也损害子女。作者并不主张“外遇”。但是由于外遇现象的大量存在，它已经是人类婚姻的伴生物；而且“外遇”现象包含了十分复杂的社会——家庭——个人的心理内容。考虑到它的现实性，作者主张以宽恕的态度对待之，而不主张激化矛盾，加剧冲突。在书中，作者不仅全面细致地分析了外遇产生的诸多原因，而且还涉及了如何面对情变，如何处理因外遇而造成的一系列社会后果的观点、方法以及技巧。

然而，作者毕竟是美国学者，其调查研究的对象基本上是欧美国家的“外遇”现象，其探讨的心理问题必然带有浓重的欧美民族(人种)色彩，因此，其研究必然局限在西方文化的框架之内。本书的这个特点也是很鲜明的。

中国的思想道德传统和社会制度与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不同，中国现代社

会婚姻家庭与社会生活中出现的“外遇”问题，与西方国家民族也不尽相同，无论其产生的原因，存在的类型，影响的程度，解决的方法，都有其自身的特点。但是，“外遇”作为人类社会的普遍现象，又有超越东西方不同文化背景与文化传统的许多共同点。只要我们注意到了这种共性和差异性，就可以对本书的观点采取借鉴的态度，吸取其精华，剔除其糟粕。在我们提倡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和重视家庭美德的建设中，就可以正确防止和处理好生活中所面临的外遇问题。

因此，这部书是写给每一位正在忍受被背叛的痛苦或恐惧另一半将背叛他/她的人看的，是写给欺骗者和被欺骗者看的，是写给爱人的一方以及被爱的一方看的。它既是已婚朋友的好伙伴，又是未婚朋友的好伴侣。

(一) 外遇产生的原因

在婚礼上，新人们都誓言互爱互信，至死不渝。然而，现在近一半的夫妻们忘掉曾经立下的誓约。为什么？

作为一个私人家庭医疗师，韦尔博士有机会接触大量此类社会现象。每当一对夫妇来找她咨询时，她总会问他们以下的问题：

你们是如何走到这般田地的？

为什么你不从对方找着你所想要的东西，而要到外面发展关系？

为什么当对方需要你时，你没有踪影？

为什么只有当你们中的一位和别的男(或女)人发生性关系，从而让婚姻出现危机之后，才会引起另一半的关注？

在回答以上问题时，人们总会找各种各样可能的借口，有些很容易预知，就像肥皂剧的台词。然而，对身陷其中的人而言，那却是心底的声音。有时，韦尔博士听到他们对外遇有着罗曼蒂克的幻想。许多外遇者总是把他们的行为怪罪于社会和现今错综复杂的男女关系。

通过他(她)们的回答，韦尔博士得出以下结论：

第一，在发生性关系的动机上，男女的确有别。在针对发生外遇的男女所做的研究中发现，75%的男性表示性欢愉是让他们出轨的原因，但只有35%的女性如此表示。女性对自己发生婚外情的理由常是“陷入爱恋之中”，有77%的女性这么回答，而男性却只有43%如此认为。

第二，许多外遇者喜欢把他们的外遇行为归咎于另一半的改变，或是相反地归因于自己无法适应另一半的改变。例如，常有成功的商人遗弃原配，而另娶一位年轻貌美的女子。在与配偶经年累月的相处中，对方处境改变是很平常的事，以此为理由要与配偶分开，并不能解决这个问题。

第三，外遇常出自以下动机：无聊、寂寞、挫折。有时也常因报复而致。法兰的先生和一位好友的妻子有染，她于是决定以牙还牙：“为什么我要离婚，自己养孩子？他每年赚五十万美元，我只需为自己找点乐子就好了！”

第四，人们常在生命中的某个关键时刻出现外遇情形——亲人的出生、死亡或生日时。在圣诞节或新年假期里，我常见到外遇在鸡尾酒会中发生。此时人们极想取乐以期从工作和家庭的压力中解脱，同时欢乐的气氛又冲淡了自我抑制的能力。此外，韦尔博士在调查中还发现了一个奇特的现象，即外遇的家族性。

实际上，韦尔本人的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家族。在她的书中有这样一段记

录：

“在我七岁时的一个晚上，我被一种奇怪而可怕的声音惊醒：我的妈妈和爸爸在客厅里大声叫骂着。而吵架的主题，我知道，又是爸爸一直不断的婚外情。

“我妈妈通常在家里扮演维持和平的角色，最后发现一些想忽略也没办法的明显线索——衬衫上留着深浅的印记。她知道那是唇膏，但他却坚持说那是他深夜玩扑克牌时，女招待送来的红核果染的。为此，他们俩开始争吵起来。”

到她 27 岁时，她妈妈离开了她爸爸，后来她才发现，自己的爸爸在小时候也有自己同样的经历，因为韦尔的爸爸在十岁的时候也看见了妈妈和一个陌生的男人有不正常的行为。

因此，韦尔确认：外遇很像酗酒或滥用药物一样，是个会代代相传的瘟疫。

不管表面的动机如何，外遇几乎都是家族性的问题。外遇不像高血压会通过基因遗传给下一代，但却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下一代的心理及情感。美国的肯尼迪家族就是个典型的例子。而查尔斯王子与戴安娜王妃的婚姻故事，也同样在重复着家族的传统。

除了少数颓废贵族外，没有人会相信自己的父母会做出违背婚誓之事。通常只有当他们和父母以及配偶在诚挚深谈之后真话才会吐露。事实常常深深地伤害他们，却也因此让他们从压抑中走出——在原谅了他们的长辈以及自己之后，要让有问题的家庭和睦团圆，面对面地深谈，去寻找问题的症结，是神奇有效的方式。

或许出于罪恶感、欲望或其他情绪，外遇者不再有时间全身心照顾子女。即使父母想使孩子避开苦恼的情景，儿童仍会感受到家庭中出了问题，一味掩饰可能会误导他们。记住，孩子会从言语以外的信息察知。

父母发生外遇，孩子心中出现的羞愧感或罪恶感多半出于被抛弃的恐惧。假如一个孩子无法从心底根除这种恐惧，他(或她)常会用一辈子的时间重复父母的错误。

许多外遇者正在演出儿时深藏于心却并不清楚意识到的剧本。虽然他们不知道或不承认，但外遇者的父母多半也发生外遇。然而，这些模式并非是一必然的，只要能认清这种潜藏的冲动，就能制止它。而只要它不再是隐匿难言的事(如父母外遇)，它便失去影响力。

在这里，韦尔博士强调，即使是最慷慨、对子女永远怀抱慈爱的父母，也会犯下一些错误而影响子女的未来。

每个人都曾经历过梦想粉碎的景况，某些人才华受过贬抑，有些则因不称职的父母未能相助而无法如愿以偿，尽管父母在我们眼中似乎有着神一般的权威。我们的父母有很多童年时期未能满足的需要，因而使得我们这一代也未能获得满足，尽管这是社会化进程中的必然现象。这些没有获得满足的需要会给孩子的未来带来挫折、伤害及情感上的痛楚。弗嘉提博士称之为“空虚”——从家庭衍生的一种期待失落的空虚感。

外遇是我们面对内心深处的空虚感时，想逃开这种深深的痛苦所常常运用的方式。但你无法躲开。外遇只会影响你享受亲密关系。你必须面对并处理自己的空虚感。当你以爱与支持面对空虚感时，它就不那么令人惊恐了。

(二) 对外遇的几种误解

保妮·韦尔博士在咨询活动中还发现了许多特殊现象，即不同的人对外遇都有独特的理解，但实际上，许多人在此问题上存在大量误解，概括起来有以下几种：

1. “外遇只是为了满足性”

她首先举了这样一个例子：

“狄娜 40 岁上下，臃肿而又好动，她散发的是母性的温暖而不是性感，这却是她对 50 岁的律师佛瑞兹的诱惑。佛瑞兹承认他很怀念母亲给他的温情，那弥补了苛刻但却喜欢拈花惹草的父亲对他的冷漠(或许不是巧合，妻子雪拉的淡漠使他想起了父亲)。”

她用这个例子来证明一个常被低估的事实，有愈来愈多的例子表明，特别是在工作场合，其中并没有“性”因素，性交并不见得一定发生。事实上，“心灵的外遇”比单纯的肉体外遇更具背叛性。特别是女人，当她们对另一个男人产生情感上的强烈欲求时，总会离开丈夫，尤其她们的婚姻是在并非出于感情而结合或在不清楚理由却想走出婚姻时，更会如此。

2. “外遇是由于性格缺陷而产生的”

过去，我们常蔑视酒徒那无法拒绝酒的诱惑的软弱性格，但现在，嗜酒已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瘾”，一种遗传病症，而非道德缺陷。有许多证据显示，外遇行为中某种情感上的冲动是会遗传给下一代的。

小孩在很小年纪便能感受有什么事不对劲了——两岁小孩喋喋不休地念着父亲或母亲的离去时，总会令父母感到困惑，或许他们的直觉来自于观察某些举动或重复听某些话语，过了若干年，这些孩子在不知不觉中便会以拈花惹草的方式或其他更坏的行为，重复父母的外遇经历。

3. “外遇是挽救婚姻的方式”

令人惊讶的是，外遇常错误地被用来作为挽救婚姻的一种尝试。然而这是错的。或许从外遇事件中，你会找到一种方式，让你的婚姻在外遇结束时更稳固——但它需要无比的诚实及奉献，同时，也是相当痛苦的。

为了弥补婚姻中的缺陷而出走或夜宿它处，是可怜的自欺。它是不会有效的，那就是为什么离婚夫妇中高达 65% 的起因是源于配偶外遇的缘故。经历外遇而仍保持原婚姻的人，会明白他们为此付出的代价是多么大。

4. “外遇不会伤人”

是的，婚外性行为是种娱乐——外遇者所持的理由之一是，它让你感觉如此地好，有人环绕着你，你不需在她生病时照顾她，她也不会与你争吵房屋贷款的事。

事实上，这种“单纯的快乐”不是巧克力，而是像可卡因——让你上瘾，并有害身心。家庭中的每个人都将因你的外遇行为受罪，特别是子女。这更可能引来不合法的怀孕、堕胎及至性病等问题，许多外遇者因此想到了自杀。

当你把上了“外遇瘾”和沉溺于酒、药物、毒品或工作等情形相比较时，便会了解外遇不伤人的说法显然自欺欺人。我们必须认清，外遇这种传染病就如乱伦或虐待儿童一般，是个严重危及心理健康的问题，尤其在今天它已经威胁着我们的生活。

5. “外遇必须以离婚收场”

即使你忘不掉，你也要学着宽恕，如果你能认清外遇背后的真正原因，

并学会处理深层问题，你便能从伤痕中走出来……

(三) 外遇的类型

在指出了人们在外遇问题上的误解后，保妮·韦尔博士又进一步分析了众多外遇的特点。并根据其特点对外遇进行了分类。大体说来，共分成以下几种类型：

1. 假亲密型外遇

人们多半觉得不易发展或维持一种亲密关系，对于宣告自己和父亲一样能独立成人的男子而言尤其如此，这种心态使得这样的男人与一生相伴的妻子发生问题。这种想从亲密关系中挣扎出来的心理，常常发展成一种三角关系。

在这里她举了这样一个例子：山姆是母亲唯一的孩子，备受照顾，因而也希望妻子珊德拉能像母亲一般呵护他，然而太多的宠溺却又令他觉得窒息——让他觉得自己像个小孩，于是他投向莉莉安——她看起来像年轻时的珊德拉——当她要求过多的注意及性爱时，他又回到妻子身边寻求护卫。五次离家的他，五次回家。

2. 粉饰太平型外遇

多数外遇是为了维持婚姻而做的负面努力。外遇族总是这么想：“假如我能从别的地方填补我从配偶身上找不到的东西，我就不必毁掉一个快乐的家！”其实这不可行。如果你不知道配偶的需要、挫折及恐惧，他(她)将可能向外发展不正常的感情以寻求帮助。女人通常比男人更容易采取这种形式。

如果你不是和你的配偶非常亲密，就有空子让另一个人挤入。

3. 逃避型外遇

许多女人发觉自己无法挣脱一个没有爱情甚至痛苦的婚姻。但外遇反而会加深这种感觉，而并非协助她们逃出婚姻。

4. 寻爱型外遇

不是因为爱情而结合，同时又在外找寻爱情的人，特别容易发生外遇。另有一些人以为自己正在寻找爱情——至少是性满足——当他们试着要使自己觉得活得更好时。

5. 因生病或心理问题所致的外遇

有吸毒、酗酒，以及心理疾病如忧郁症或躁郁症等问题的人，都可能发生外遇或在外随便寻欢作乐。

如果你有外遇的话，那你属于哪一种呢？

(四) 正确处理外遇

外遇是迷人的，但更是痛苦的。当你发现配偶的不忠行径，你可能像一个心脏病突发的患者一样，因巨大的痛苦而感到天摇地撼。你的自信，对人的信任，甚至活下去的意志都可能为之丧失殆尽。

犹如心脏病般，婚外情在现代社会中竟如此惊人地普遍，并且还不断增长——女性尤其如此。根据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在美国，50%—70%的男性及30—50%的女性在某些情况下会出现不忠行为。在婚姻关系中，几近80

%的夫妇遭遇配偶不忠的情况。

但心脏病不一定致命——外遇自然也不是。当心脏病患者找到了一条健康之路，他便可能活下来，甚至活得更好。你也可能因为找着了一条健康的相爱之路，而让亲密关系继续下去，甚至更好。

这条路怎么找呢？让我们先听一下韦尔博士给我们讲的一个故事：

玛格莉塔和法兰克已共同生活了十几年了，他们很好。但是，丈夫法兰克因为他想要的职位被另一位年轻人捷足先登而陷入中年恐慌之中。他的头发稀薄了，肚子大了，于是他和一位年轻貌美的助理勾搭上了，以寻找自我。

他的妻子玛格莉塔也很美丽迷人，被所有认识的人喜欢，因而当法兰克带着新欢去他们夫妻常去的餐厅时，忠实的餐厅工作人员就向她打了小报告。

有天晚上，当这对新恋人共进晚餐时，侍者送来了法兰克最爱的一种香槟，侍者说那是一位仰慕者送的，酒瓶上贴的纸条只写了几个字：“爱。卡罗·米亚”。

这是玛格莉塔的呢称。

法兰克很快用完餐，匆忙回家。

在家里，她穿着优雅的睡衣欢迎他，只说：“我们谈谈吧。”

他们谈了六小时。他第一次把心中的空虚感和寂寞感告诉了她；而她则将孩子长大离开家后，她心中的空虚感告诉了他。

她同样告诉他，他另结新欢是如何伤了她的心——现在她要他发誓，他永不会再犯。

他信守了誓约，他们的婚姻比过去还好。

不管你的婚姻处在什么时期，都可能因外力而出现障碍。这些外力包括：有了孩子；人到中年；失业；失去亲人；生病；父母离异；地位改变等等。当我们想击碎这些障碍时，心底的空虚感却会浮现，这时我们特别容易有外遇。此时的决裂是很常有的，但却不是不能避免的——如玛格莉塔就是佳例。

所有的关系都是脆弱的，特别是在艰难的日子里——因此，特别应和你的配偶亲近才是。

但并不是人人都能找到这条捷径，大多数人的表现是愤怒。愤怒是一种具有侵蚀性的情绪，如果你把它藏在心中，它将吞掉你的自尊——总会在不久后，用某种毁灭性的方式冒出来。

韦尔博士教给了人们处理这类情绪的方式：

1. 承认你的愤怒

想生气就生气吧！给自己生气的权利。不要觉得有罪恶感或是抱歉。外遇的一方的确给了你大大的羞辱。如果你不让人知道你的愤怒，它会永远在你心里燃烧。

2. 消除负面冲动

不要以外遇作为报复，也不要喝酒、暴食或自伤的方式吞掉这些痛苦。

3. 给自己抒发情绪之道

寻找没有伤害的方式，如打枕头。在没人处高喊几声，运动，找知心朋友聊天等等。

4. 回想自己是否在配偶的外遇事件中推波助澜

你是否设了底线并努力去保护？

5. 记住你和配偶曾经给彼此的爱

试着让爱重生将有助于你走出痛苦，并得到和解。

只有在你能较好地把握自己的情绪时，你才算做好了让配偶知道你的感受的准备。作为一个追寻者，你或许会感到被孤立，但是追溯你的寂寞之源以及处理被背叛的问题，对你很重要。

另一方面，在没有得到对方诚心诚意的悔过表示之前，不要恢复你与他(她)过去的关系。

在这个时候，你应学会原谅人。因为，除非我们原谅了越轨的人，否则永远无法摆脱愤怒、痛苦和沮丧等情绪的干扰，也就感觉不到希望和乐观的前景。责备并不能控制局势的发展，反而徒然使你动弹不得，只有透过和解才能使一切再现生机。

那么作为背叛者，应作何姿态呢？

作为背叛者，你或许会讨厌陷入这种充满情绪的泥沼中，但你愈是想逃离，只会使你的配偶更狂怒。在你需要呼吸的空间时，不妨叫个暂停。但是你必须了解你对配偶的伤害有多深，并且愿意正视这些情感上的伤害。不要沉默面对、否定、忽视或看轻你配偶的感受，预期对方会对你射镖枪，可是你不会以怒气还报。最难的是重获配偶的信任，而中止外遇则是第一步。如果你能理解对方的感受，你将有更多机会回复亲密。没有同情心则不可能拥有亲密。

当然，保妮·韦尔还告诉外遇者及其配偶，宽恕是双向进行的，要求和给予必须同时进行。

要达到摒弃责备和羞耻，你必须先经过下列七个步骤。如果你现在还无法做到，多重复几次愤怒和痛苦的练习，直到准备好为止。

1. 忘记这桩外遇带给你的困扰，无论多么困难都要试着忘记。

2. 真诚面对彼此。不只是婚外情，任何其他破坏性的秘密也要坦承不讳，同时也可以讨论一下童年时期的恐惧、渴求及空虚。

3. 重建信心。为了重建信心，背叛者绝不能和情人再有任何接触。如果心存疑虑时，尽量跟你的配偶讨论，别就此打住。

4. 重新展开追求。重拾你的幽默感以及取悦对方的热情。回忆种种令你心动的相处模式并且好好培养它们。

5. 重建亲密关系。实行一种新的、开放的、坦诚且充分的沟通模式。不要让工作、小孩、亲戚或其他事情介入其中。当你的伴侣实话实说令你难受时，千万不要立刻批评——先赞赏他的诚实，尽量安全地达到沟通的目的。

6. 重视忠诚的价值。与你的配偶讨论你允许的标准。时常口头提醒对方你俩所作的承诺。

7. 鼓起勇气拥抱对方。从短暂的拥抱到持续的爱抚，触摸和爱抚——也就是性治疗——能轻易地化解最痛苦的藩篱。有外遇的人通常懂得制造性乐趣，你为什么不能呢？

夫妻双方应各列一张表，举出若干种令他或她感到被珍惜的示爱方式。除了一些熟悉的方式，并找出一些你希望他或她表现的方式。其中有些可能听起来很肉麻，但却是使你们关系重生的唯一希望。举例来说：

每天从办公室打个电话给我，对我说：“我爱你”。

买鲜花回家送我，即使不是特别的日子。

牢记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早点起床，为我做一顿特别的早餐。

出奇不意送我一张卡片。

当我生病或情绪低落时，借一些我喜欢而你讨厌的录像带给我看。

牢记我常使用的香水，并不时给我惊喜。

准备一份别致的野餐，在美丽晴朗的日子里，到我工作场所，邀我一起外出野餐。

陪我一起观看运动比赛。

大部分的夫妻总在婚外情结束之后，才会碰到达成真正和解的过程中最珍贵、最重要的部分。理智上，他们都了解第三者已经离开；但是情感上和生理需求上，他们都无法真正忘记。

韦尔博士在这里谈到“性和解”的重要性。

性和解通常是宽恕过程中最困难的部分，也是我们讨论的过程中最麻烦的部分。在尚未充分了解前，我们会拒绝性爱以疏远亲密关系。

人类在性观念上是脆弱的。有些人在外遇发生前就已经有性方面的问题——虽然表面上看起来，性很少是唯一的理由。即使是性关系一向良好，大部分的人仍几乎无法避免翻旧帐的习惯。我们无法克服与敌人同眠共枕的厌恶感。

但是，不要刻意禁止任何事情。如果你继续拒绝与你的伴侣同房以惩罚之，事实上你是在惩罚自己。为何要剥夺自己达到性高潮的满足感呢？再一次提醒你，宽恕是你送给自己的最佳礼物——尤其在性生活方面。

如果你们已经下定决心不再同床，那么，为什么还要同住在一个屋檐下呢？你可以在宽恕、重享彼此的欢娱，以及继续保持冷战之中选择其一。

不要以为没有性生活的关系是安全的。通常，它更危险。你可能会更怨恨，而婚外情也会再度发生。从另一方面来说，当你在现实问题上挣扎时，性反而能够加速治疗的进度。告诉你自己，你要有性生活，而且需要性欢愉。提醒自己，你已不再是个视性为肮脏、丢脸、可耻行为的小孩子，且不再一味地喃喃自语。在进行性爱前和自己进行一次秘密的谈话，告诉自己：“我再也不拒绝享受性欢愉的权利，我值得再次从中得到快乐，别人有什么权利坐享我们共同为我们的家、我们的将来而辛苦建立的关系呢？”

之所以有外遇，根本原因是有了第三者，那么在处理外遇过程中，第三者又该怎么办呢？

韦尔博士说：如果你是第三者，你可以去思考这样一些问题：

1. 从自己开始。明白自己和不当的情人在一起更快乐的事实。承认自己对亲密关系的恐惧，并试着找出原因。

2. 在你的家庭中，是否出现过外遇或离婚事件？

3. 原谅与你较冷淡的父亲或母亲。如果你继续和已婚者来往，那很可能在你的过去有过被背叛的经历。

4. 不要让自己以及已分手的那个人痛苦。不要寄些愚蠢的卡片或打“不出声就挂断”的电话。

5. 离开你以前常去的地方。

6. 不要去找双方的朋友打听他或她现在如何。

7. 不要借特别的日子——生日、升官、加薪——为借口，让婚外情死灰复燃。

8. 把对方的衣物及令你会怀想过去的东西都寄还回去，或是烧掉。

9. 如果你们在一起工作，看看能否调部门，或另找工作。

10. 让朋友知道你有意要重新开始。
11. 不要漫无止境地回想这段关系及分手的种种细节，即使朋友也会烦的。你可以生气、可以伤心——但必须从这些情绪中康复。
12. 停止把你现在的约会对象和已分手的外遇者相比，没有人能与神话人物较量。
13. 想象你的情人二十年后及胖了五十磅以后的样子。
14. 把情人的缺点列成表。
15. 到外头活动。参加宴会、会议或研习会。不须一直等到你从愤怒或悲伤中走出来才这样做。
16. 在一个宴会中，故意找一个不是你常选择的类型的人攀谈。
17. 去度假，可以强迫你认识人并与其交往。
18. 找一些同样是单身的新朋友。
19. 找一些你真正关心的事去做：义工、上夜校、写小说。在空闲的时间里，让自己投入这些事。
20. 重复告诉自己，你不想重蹈覆辙。是的，你可能受了伤，但伤害是爱的一部分。
21. 改变一些会影响自信的行为或外表。重换发型、减体重、蓄胡子或矫正牙齿。

22. 照顾自己。健康地吃、运动。不要对自己太严酷。你值得拥有更多。在讨论如何处理外遇问题时，韦尔博士特意提到了外遇双方的孩子。她说，通常，一个家庭跑来寻求心理治疗，都是由一个孩子带领。在孩子的纯真、率直中，往往能表达出一个家庭刻意压抑的情感。如果你想知道你是如何排遣你的空虚，看看你的孩子就知道。

请记住，孩子总是倾向幻想。他们相信自己是无所不能的：“我的愿望一定会实现。”因此，只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他们总是责备自己，并告诉自己只要念对咒语，就可以使不倒翁——或他们的亲人——跌倒了再爬起来。

经常地，孩子行为上的病症警示某些事物出了问题，这些病症可包括失眠及食欲不振、尿床、操行不好、跟兄弟姐妹打架、学业成绩滑落、畏缩或过度好动。无论你从任何角度看，在一个家庭里，没有任何问题仅仅和其中一人有关。

尤其是一个孩子正处于恋母(或恋父)情结的阶段时，父母的外遇格外具有杀伤力。这个孩子不只要和另一个父亲或母亲分享恋慕的双亲之一，还要与另一个对手——父亲或母亲的情人竞争。因此容易造成其成长阶段及未来对亲密关系的混淆。

即使是很小的孩子也可以感觉到父母正在经历情感上的困扰。事实上，他们的行为正象征一桩婚外情的发生，而配偶并不知情。即使你试着对你的孩子掩饰你们婚姻中发生的问题，或想对他们说谎，那只会徒然使事情更糟。我们都害怕被遗弃，而背叛却是最令人不能忍受的遗弃。

如果父母没有复合的打算，不要给孩子错误的盼望。当你的孩子发生问题时，你不能够因此而逃避。你的孩子会使你面对现实，面对更深刻的课题。如果你选择不去处理这些问题，只会使你的恶习成为孩子的负担，而且你的孩子还会传下去给你的孙子。要不要改变他们的命运就看你了。

正因为这样，韦尔博士告诫外遇的人们：多想想你的孩子。

(五) 慎重地离婚

有时候，可宽恕的罪不被原谅，而唯一的解决办法是离婚，但是一定要等到慎重考虑以后才这么做。决裂应该被视为最后的手段，而不是一条轻松的逃避之路。

现在离婚率已稳定维持在 50%。也就是每两对夫妻中有一对最终会以离婚收场；而且 65% 有过外遇的婚姻也是以离婚收场。根据美国国家健康统计中心的数据，每个月有将近十万对夫妻离婚。

韦尔博士认为，很多夫妻会为了错误的理由而放弃婚姻关系。他们冲动行事，表现出一些情绪失控或情感迷惑的行为，并且误以为“除了这样，我还能做什么？”或者仍否定和拒绝面对自己的空虚。离婚，表面上看来，似乎是一个比较容易解决问题的方法，但是事实上却导致更困难的问题。如果分开了，却不能克服自己的空虚，外遇者将无法克服在亲密关系上所遇到的问题。这些未解决的问题将跟着你从一个关系到另一个关系。

除了上述的顾虑，你可能会很清楚，结束你们的婚姻关系仍是唯一的答案。那么，离婚并不意味着失败。通常，它比停留在恶劣的状况中还需要更大的勇气。

这是一个非常复杂的问题，而且是最难下的决定。韦尔博士要求她的心理诊疗病人回答下面一连串的问题，以显示他们在下定决心离婚前的真实感受。

韦尔博士用它来治疗正考虑离婚的夫妻。她非常强烈地感觉到，大部分夫妻都是因为错误的原因而急忙离婚，本来他们都可以继续在一起。大多数夫妻相爱，却不懂得如何永浴爱河。同时她也发现，很多人在做最后决定前，她鼓励他们先仔细考虑过下面的问题之后，他们多半改变心意，不再离婚，并决心好好处理他们自己的情绪问题，以及慢慢学会宽恕。

在她的治疗过程中，这些问题成功地挽救了 98% 的婚姻，请牢记对背叛者和外遇者可能会有不同的答案。离婚和宽恕之间仅有小小的一线之隔。

这些问题有：

1. 你是不是为爱而结婚？
2. 你正在逃避空虚？
3. 既然你们正在重归于好的阶段，为什么你还在逃避亲密关系？
4. 你是否像其他家人一样容易积怨？
5. 你是否难以忘怀悲伤的情绪？你是不是没有办法去真正宽恕别人？
6. 你，还有你的伴侣并没有承诺要解决问题？
7. 你们之间已没有爱？警告、伤害，会冻结爱的感觉。
8. 你是否被你的伴侣(或情人)传染过性病，而使你无法释怀？
9. 你是否只因为自己是对的一方，而无法原谅别人？是否错误的骄傲也让你饱受折磨？
10. 你是否意识到负面的束缚愈来愈强，使你无法离开？
11. 你是否把伤害和你们关系的死亡混为一谈？警告：很多人离开是因为自己受了伤害，却不给另一个人机会，一起接受治疗。这是离婚最常见的理由。
12. 在决定离婚以前，你是否像欺骗者一样不敢面对自己的内疚和羞耻？

很多外遇者离婚是因为受不了内心长期的愧疚和羞耻感，而不试着克服这些感觉，走向宽恕之道。这也是导致外遇者因错误的理由而离婚的最常见因素。

13. 伤害是否太深了，以致很久以后，你仍然无法原谅或忘怀？

14. 是否因为你不愿意克制你的愤怒，而希望离婚？

15. 你是否并不是因为和新的情人有染，而是因为长期的歉疚感，导致你考虑离婚？

16. 你是否试图以一段外遇结束目前的婚姻关系？

17. 一般而言，你是否害怕分开？你是否一直试着要摆脱你的伴侣？你是否曾私下偷偷希望离婚？

18. 外遇是否是一个懦夫寻求出路的行为？是你达到离婚目的的唯一方法吗？

19. 你是否将你情人的需要放在你的孩子及伴侣的需要之上？

20. 你是否和外遇者一样，做了大部分情绪性的工作？你是否比被背叛者更痛苦？你是否比你的伴侣有更强烈的意愿，去面对促使你走向外遇的问题？

21. 你，被背叛者，是否一直紧拉背叛者的衣角，拒绝面对自己，你是否把离婚视为解决空虚感的方法？这是被背叛者因错误的理由而离婚最常见因素。

22. 如果你不打算承担自己这部分责任，你是否努力使和好无望，而使离婚成为唯一解决的途径？

23. 你是否无法分辨你应该为自己做什么和你需要别人为你做什么之间的差别？

24. 你是否多年来已有“离婚冲动”的念头？

如果上述大部分状况均适用于你们，或许离婚就是唯一的解答。在你做出离婚决定之前，你必须尽你所能寻找所有不同的答案，不要在你离婚后，才发现自己停留在原地说：“只要我当时……。”

这里同样要提请你格外注意：

1. 如果你或你的孩子因此或已经长期受到精神和肉体上的虐待，或你一点安全感也没有，请马上离婚！

2. 如果你的伴侣还在不断欺骗和说谎，或始终不愿保证不再犯，离开吧！

3. 如果你被一段极具破坏力的婚姻吞噬，在这关系中你非但没有权利，而且被视作不存在，你就应该离开。如果痛苦远超过乐趣，这个现状值得维持吗？

4. 如果你的伴侣真的不要你，别留下来！你不能强求亲密或要求某人再喜欢你。当爱情已死去时，婚姻应该结束了！

5. 如果你们当初不是为了爱而结合，你们将不太可能继续在一起，因为没有任何东西可以将你留下。某些外遇，只是为了从婚姻中寻找出路。尤其对一些不是因爱而结婚的女人而言，她们只是缺乏勇气离开，直到外遇给她们足够的勇气。

如果你确信离婚是必须的，请尽量小心而仁慈地进行。你或许想要报复——但是如果你试图对你的配偶报复，你可能会妨碍将来与另一个人享受快乐生活的机会，以及影响到你孩子的幸福。有些研究指出，生长在沟通不良、争吵不断的父母阴影下的孩子，长大后就是离婚的高危险群。

一个很友好的离婚可能只是矛盾的修饰，但是为了孩子的缘故，一个文

明人应该而且能够具备这种素质。

(李宁宁 撰)

心理学·教育学

【维也纳】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解开心灵之谜的钥匙

梦无论是如何地复杂，大部分均可以解释为愿望的达成。
一个内容痛苦不堪的梦，其实是可以解析它仍然是愿望的达成。
——弗洛伊德

《梦的解析》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而且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在经验主义基础上掌握无意识心灵之谜的最勇敢的尝试。
——荣格

一、弗洛伊德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S·弗洛伊德(Frend.Sigmund 1856 ~ 1939)，犹太籍精神病医生，精神分析学派创始人。生于现属捷克的摩拉维亚的夫赖堡，1873年入维也纳大学学医，1881年获医学博士学位。1882年与精神病学家J.布洛伊尔合作，用催眠术医治并研究癔病。1885年和1886年间，先去巴黎就学于J.M.沙可，后赴南锡参观催眠疗法。回维也纳后认识到催眠疗法的局限性，1895年后改用自己独创的精神分析或自由联想法，以挖掘患者遗忘了的特别是童年的观念和欲望。1909年应美国克拉克大学校长、著名心理学家S.霍尔邀请，与荣格等赴美国参加该校20周年校庆纪念，并与美国著名心理学家W.詹姆斯，E.B.铁钦纳，J.Mck卡特尔等晤面。发表了以精神分析为主题的演讲，声名远扬。回国后，他的一些弟子A.阿德勒、C.G.荣格和O.兰克反对他的泛性论，先后背离他而自立门户。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及战后，他不断修订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提出了自恋、生和死的本能及伊底、自我、超我的人格三分结构论等重要理论，使精神分析成为了解全人类动机和人格的方法。30年代他的理论登峰造极。1930年被授予歌德奖金。1936年寿辰时，荣任英国皇家学会会员。他在最后16年曾与口腔癌作斗争，坚持工作。在纳粹分子的胁迫下，1938年被迫离开维也纳去伦敦。1939年9月23日在伦敦死于癌症。主要著作有：《梦的解析》、《日常生活心理病理学》、《精神分析引论》、《精神分析引论新编》、《弗洛伊德自传》。

《梦的解析》是弗洛伊德一生中最满意又最看重的著作之一。他曾说过，《梦的解析》这本书“包括了我好运得来的所有发现中最有价值的部分，像这类的顿悟或许多人都有，不过一生中只会有一次。”有一次，琼斯问弗洛伊德对自己的著作最满意的是哪一本。弗洛伊德顺手从书架上拿下两本书，一本是《梦的解析》，一本是《性学三论》。他对琼斯说，“我期望后一本书由于普遍地承认而不久就会过时，但前一本书将会持续更长一段时间。”弗洛伊德如此重视释梦理论，是因为释梦理论使精神分析学研究迈出最关键的一步。如果说在这之前弗洛伊德的目光还停留在一个狭小的专门的领域的话，那么，释梦理论则意味着弗洛伊德已经不满足于研究现状而开辟新的视

野。释梦理论不仅为无意识学说提供了新的材料，而且为无意识学说提供了最好的研究方式。

促使弗洛伊德从事释梦工作的主要原因，是由于梦境同歇斯底里症患者病症相类似之处。引起他的注意，也还由于他对梦的由来已久的兴趣。童年，他就做过很多十分有趣的梦，并且记住了这些梦境的情景。他曾经多次以自己童年的梦境进行自我心理分析。

《梦的解析》作为精神分析，始于 1895 年。在这个时期弗洛伊德已经觉察到在歇斯底里症状的背后，潜伏着一种不同于正常的心智过程的另一种精神活动。这种精神活动一般大都同患者的梦境有着某种不可分割的联系。弗洛伊德感到，对梦境的分析或许能够寻找出到达另一精神历程的道路。在追溯梦境中，他发现梦境总是对日有所思东西的回忆，又总是与某些观念联结，呈现为意识状态。这两个发现构成了他后来释梦理论的基本论点的轮廓，引起他对梦的本质可能是被隐藏的愿望的满足的猜测。

1895 年，在他所写的“规划”[project] 第一部分有三个论述梦境的段落，已经着手对梦境的分析。虽然他仍然以通常的心理学理论去解释梦，却也初步显示出他特有的精神分析的特色。此时他提出了两种基本心理过程的重大区别，一种是原初的心理过程(无意识)占据优势的活动，一种是自我(意识)的静止状态。梦境就是这两种过程交织而成的。如果自我处在活动状态便与原初的心理过程抵触；如果自我没提供任何经验材料即虚无，原初的心理过程也无所凭借，在这两种情况下梦境都不会出现。弗洛伊德还提出了梦的幻觉的特征。所谓梦的幻觉，就是意识把梦境东西当作真实的东西，这无非是意识压抑的排除。弗洛伊德把梦的这类特征同歇斯底里症的病状联系起来，发现它们之间有着明显的共同点。

1897 年，弗洛伊德在一封信中，表露了他要撰写一本关于梦的理论研究的著作的想法。产生这一愿望的部分原因是，在这一时期，弗洛伊德为了验证治疗歇斯底里症的理论，对自我进行了分析。这就自然地涉及到往事。对往事的回忆又使他联想到以前所做的梦。梦的理论很大一部分是来自自我分析。梦的研究既是自我分析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自我分析的结果。产生这一愿望的另一个原因，是在这一年他的父亲病故，使他决定对以前的事情重新回忆。他要强迫自己写这样一本书，以便使他从父亲逝世的强烈悲哀中解脱出来。他后来这样说，“这本书对我个人来说具有另一个主观上的意义。这意义只有我在完成本书后才知道。我发现这是自我分析的一部分，对父亲逝世的一个反应——即是说对一个最重要的事件，一个男人一生中最大创伤的反应。”

为了写成这本书，弗洛伊德查阅了历史上很多思想家对梦的研究材料，没有发现有人提出梦是愿望的满足的观点。他按照自己的思路，进一步以精神分析的角度挖掘梦的原因，从而开始了对梦的理论研究与写作的工作。大约经过两年多的时间，查找翻阅大量的材料，对材料加以分析，提出自己对梦的独特解释。就这样，他一边研究，一边写作，终于断断续续地写成了《梦的解析》这本书。

《梦的解析》一书于 1900 年正式出版。它最初只印了 600 本，销售这些书却花费了 8 年的时间。在发表的头六个星期里，只卖掉了 123 本，在以后的两年内，才卖掉了 228 本。弗洛伊德写作这本书后，曾经急切地盼望各方面能有所反响。但是，他感到极为失望，大多数人并不知道这本书，只有极

少数人才知道它。

直到十年后，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开始完善起来，进而传播开来，受到了各方面的注意，这本书才一版再版。弗洛伊德生前就已出了八版，并译成各种语言发行，从而获得了世界范围的影响。

二、《梦的解析》评介

《梦的解析》的理论是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是他探索揭示无意识心理过程的一条基本途径。从精神分析学理论发展来看，释梦理论是从神经病理学发展、演变而来，构成了非常态心理过渡到常态心理的不可缺少的环节。弗洛伊德曾经把无意识呈现形式，大体归纳为两种：歇斯底里症、失语症和日常过失属于一种形式，也称作变态心理的形式；而梦境、神话、文艺创作则属于第二种形式，也称作正常心理的形式。在这两种形式中，梦境处于特殊地位，具有从变态心理向常态心理过渡的性质。正是弗洛伊德的释梦理论，逐渐吸引了一大批人走向了精神分析运动，使之得到广泛传播，开始获得国际声望。荣格指出，“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是一部划时代的著作，而且很可能是迄今为止在经验主义基础上掌握无意识心灵之谜的最勇敢的尝试”；“在本世纪初，使梦这样不受欢迎的东西成为一个严肃讨论的对象，却是一个具有巨大科学勇气的行为。给我们年轻的精神病学家印象最深的既非技术，也非理论，而是竟然有人敢于对梦加以调查研究的这样一个事实。”

（一）梦的研究历史和现状考察

对梦的研究历史情况的考察分析，是《梦的解析》一书的基本内容之一，也是弗洛伊德梦的理论的一个组成部分，弗洛伊德考察、搜集、权衡历史上思想家提供的有关梦的研究材料、方法和见解，以精神分析学的观点来加以分析，以便从中得出自己的结论。历史上很多思想家都对梦做过解释，曾经留下了大量的参考材料，却没有作出科学的说明。弗洛伊德认为，几千年来的人类历史已经有了很大的发展，很多难以思议的问题和现象都在科学面前迎刃而解。然而在对人的心理研究领域却是另一番情形。在这里，心理学的全部问题都在激烈地争论着，特别是关于梦的解析更是如此。弗洛伊德说，“尽管梦的存在早已在几千年前即令人困惑研思，但科学方面的了解其实仍是非常有限。因此，所有有关这方面的论述，从来就没有人能引用一家的说法涵盖一切现象。”历史上曾经留下了有关梦的丰富材料，也有不少解释，但是还没有提出过对梦的本质及其根本的解释方法的意见。

古代哲学家概括史前时期原始人类留下的有关梦的丰富材料，大都做了神秘主义的解释，“他们深信梦与超自然的存在有着密切的关系，一切梦均来自他们所信仰的鬼神所发的启示。也因此，它必对梦者有特别的作用，也就是说梦是在预卜未来的。”弗洛伊德认为，古代哲学家对梦的神秘主义的解释，主要有两个原因：第一，是由梦的特点决定的。梦作为特殊的精神现象，不像人的意识那样清晰，有着逻辑的关系。梦的现象千奇百怪，错综复杂，有时又极为琐碎，互相之间毫无联系，一旦醒来，残存的梦相较之其他精神内容“显得陌生，且不寻常”，便认为它来自另外一个神秘世界。第二，

是由古代人的宇宙观决定的，他们习惯于把自身的精神生活投射于一假想的外在现实，认为有一种超现实的神秘力量存在。弗洛伊德分析指出，古代哲学家对梦的解析，都是视梦为超自然力的神秘理论。这种看法在现代仍有影响。例如，在神话、小说中，在宗教信仰中，甚至在某些哲学学派中，依然存在相信神力对梦的影响，并用神力去解释梦的原因，相信梦有预卜的力量和作用。

在古代思想家中，亚里斯多德对梦的解析引起弗洛伊德的重视，并得到他肯定的评价。弗洛伊德说，“在亚里斯多德(Aristotle)的两部作品内容曾提及梦，当时他们已认为梦是心理问题，它并非得自神谕，而是一种由于精力过剩(diamonic)而来的产物。他所谓的‘精力过剩’，意指梦并非超自然的显灵，而仍是受制于人类精神力的法则，……梦是按梦者本身睡眠深度所产生的不同精神活动，亚里斯多德曾提到过一些梦中的特点：举例而言，他观察到梦能将轻微的睡中知觉导出强烈的感官刺激(一个睡觉中的人在他感到肉体上某部分较暖和时，他可能梦见自己走入火堆中)，由此他推论梦很容易告诉医师病人最先不易察觉的病兆。”弗洛伊德充分肯定亚里斯多德把梦归结为人的一种精神活动的意见，认为这是对超自然力显灵观点的否定。

弗洛伊德认为，在古代除了思想家对梦给予解释之外，大多数是一些“详梦者”在活动，想从梦中寻求将来的预兆。后来详梦术日渐衰退，到了黑暗的中世纪比详梦术更荒唐的事物都慎重地被保存着，详梦术逐步降级乃至与迷信相等。今天，详梦术已沦于只想从梦中求得彩券中签的数字了。

近代随着科学的发展，对梦有过种种解释，提出不少看法，弗洛伊德对此进行了考察和分析。

有一种观点，认为梦是物理刺激在心理上的表示，是“一种无用的、病态的物理历程”，这种观点是对梦的生理学解释，把梦看作一种舞蹈狂的乱跳，它在心理上的表示即为梦。弗洛伊德认为，梦的第一个共同特性就是睡眠，梦似乎介于睡眠和苏醒之间的一种情境，它是尽量逃避外界的刺激，所以梦不是由物理刺激引起的。梦的第二个共同特性就是它心理生活的特性，它是醒时心理活动的剩余干扰睡眠而引起的心理现象。因此他认为把梦比作乱舞的动作是不对的，它不是物理生理现象。

有一种观点，认为梦是某种预知的或高尚的寓意。弗洛伊德认为，把梦视为人心灵的预知的倾向或高尚的目的，这不是以历史的经历和现时事件为依据，而是以谋求解决将来的问题为目标，以追求一种内在的美和善为目的，这是把梦解释为一种较高级的精神作用。似乎人们遇到痛苦和烦恼时，经过梦境，一切就会烟消雾散，感到内心轻松愉快。其原因是分不清梦境本身和梦的意义之间的区别。既然梦境总是同未来的东西相联系，对梦的解析就失去了任何实际意义。说梦是寓意的，具有高级精神作用，在某些方面是可取的，但从根本上来说，这种观点“其目的在于忽略本能的倾向”，因而“这个理论也是一种不合理的归纳，是以少数特例为根据的”。弗洛伊德不否认梦具有寓意的意义，但这种寓意并不完全同高级精神作用联系在一起。

有一种观点，认为梦与醒时思想不同，表现为联想的缺乏联结，批判能力的停止作用，一切知识的消失，以及其他机能减弱等等。弗洛伊德认为，这是停留在对梦的现象的描述上，其基本倾向，只是注意到梦境所呈现出来的东西，而不追究梦境本身的隐义。弗洛伊德指出，所谓对梦的解析就是“揭示其隐藏的意义”，如果把梦的解析仅限于一定现象描述，就必然把梦同其

他的心理过程对立起来，从而贬低梦在人的精神生活中的地位。

古代思想家多数对梦作了神秘的解释，近代科学家又不大重视梦的研究。弗洛伊德却自信，对梦的研究是科学发展的必然。但是由于梦具有飘忽即逝、扑朔迷离的不确定性，就大大增加了对它加以解释的难度。他指出，解释梦境的道路是艰难曲折的，他自己对梦的解析“也不必勉强人家信服。相信不相信，要看成绩，它可以耐心等待用自己的研究成果来引起大家的注意”。尽管困难重重，但是依据科学的发展，梦作为健康人所同有，同时为一般人所忽视的精神现象，还是可以成为精神分析的研究对象的。

梦是一种心理现象，包含着深刻的意义，那么就应当采取一种合适的方法。而所有以前的对梦解释的基本方法，在弗洛伊德看来，都不尽人意。他指出，近代科学由于把梦看作非心理活动，因而采用的释梦方法多是物理生理的，局限在动作符号的研究，想透过动作符号去了解梦。非科学界与科学界不同，则采用了另外两种方法来对梦加以分析。第一种方法，就是把梦看作一个整体符号，利用相似原则解释为另外一种内容。这就是“符号性的释梦”。所谓“梦是预知未来的”，就是利用这种方法来解释的。弗洛伊德认为，这种释梦方法表面上看是很高明的，然而在处理梦境本身包含的非逻辑的内容时，就无能为力了。符号释梦方法“仍只是一种主观的推测及直觉的反应”。第二种方法，就是把梦看作密码的集合。其中每一个密码符号，均可按密码册中已具有意义的内容加以解释，这就是“密码法”。这种方法最根本的特点就是将梦当作密码符号的集合，对其中每个片断作个别处理，并将每个片断(密码符号)同这个密码已具有的含义联结在一起，进而编织成一个完整的意义，以确定梦的含义。弗洛伊德认为，“这两种常用的释梦方法的不可靠性当然是明显的。就科学的处理来看，‘符号法’在应用上有其限制，不能广泛适用于所有的梦。而‘密码法’之可靠性又取决于每一件事物之‘密码代号’是否可靠，而事实上密码的确定性又根本没有科学性的保证。”这种释梦方法带有很大任意性和幻想成分，不可能导致有关梦的解析的任何科学结论。

弗洛伊德综合各种观点加以考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来开辟释梦理论的新的研究途径。弗洛伊德认为，梦的研究主要是心理学的研究。梦境的产生固然有其生理学基础，但实质则是属于人的正常心理过程，是心理刺激引起的反应。梦境尽管琐碎而被人所忽视，但是却有巨大的研究价值。通过梦的研究才能窥见到人的内在心理结构和包含冲突的心理过程，才能证明人的心灵存在的广阔的无意识领域。精神分析方法是揭示梦的奥秘的一把钥匙，也是解释心理奥秘的一把钥匙。弗洛伊德认为，对梦境所呈现内容的描述还不是精神分析的目的。它的目的是要揭示梦的内容和它的隐义之间的关系。任何梦境，不管是多么荒谬，多么不合情理，在经过精神分析一系列研究和解释之后，就能显露出本身的真实意义。用精神分析方法进一步研究梦的基本性质，就会发现梦不过是愿望的满足。把梦看作是愿望的满足，就超越了历史上关于梦的各种解释。恰似这一点，体现了精神分析释梦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弗洛伊德一再强调，精神分析的释梦既非思辨又摆脱非幻想，而是以经验事实为基础的科学。他对梦的研究前景持乐观主义态度，自信经过努力，一定会把梦这样错综复杂、光怪陆离的精神现象作出科学的解释。

(二) 梦是欲望的满足

梦是欲望的满足，这是弗洛伊德释梦理论的基本观点。他认为，这个观点并不是梦的完整定义，而是梦的共同特征和本质。梦是不确定的，要想给梦下定义，是极不容易的，甚至是不可能的。但是，概括出梦的共同特征和本质还是可能的。

历史上很多思想家从各种不同角度对梦这种精神现象加以说明，但都忽略了梦是愿望的满足这样一种主要特性。他们不是没有看到这一特性，而是没有进一步分析这一特性对释梦有何意义，更没有把它作为释梦的基本线索。一般梦者同样疏忽梦是满足愿望的这个特性，“其实他们也常看得见这一层，但是从来没有人承认它是梦的特性，而用来作为释梦的引线”。弗洛伊德认为，由于没抓住这一基本线索妨碍了释梦走向科学的道路，因而只能在表面现象上提出无关紧要、不能触及梦的实质的各种见解。

弗洛伊德把梦看作愿望的满足是建立在两个基本假定的基础上的。这两个假定是推导出梦是愿望满足的前提，同时按照弗洛伊德的说法是对梦加以解释和研究的根据。只有从此出发，才能经过一番曲折的跋涉，达到对梦的一般结论。弗洛伊德提出的两种基本假定是：第一，梦是一种心理的现象；第二，梦的意义梦者确实明白却又不知道自己明白。第一种假定，是确定梦的心理学性质；第二种假定，是确定梦这种心理现象的特殊性质，即半透明性。它是梦者所清楚的，又是梦者本身不知道自己所清楚的。梦的这种半透明的性质，弗洛伊德认为才是用精神分析方法可以阐明的东西。

为了探索这个半透明的梦，弗洛伊德第一步要对梦的主要特性或成分加以分析。既然梦是如此纷繁多变，要想用一句话来指出梦的定义是极为困难的，但是对梦的要点仍有指出的必要，而“指出一切梦的共同成分，或许便是梦的要点”。梦的共同成分或特性是什么呢？弗洛伊德认为，“一切梦的共同特性，第一就是睡眠”。梦显然是睡眠中的心理生活，是在睡眠状态下出现的一种特殊精神现象。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介乎睡眠和苏醒之间的一种情境。睡眠的情境是不愿和外界交涉，也不愿对外界发生兴趣，以脱离外界去躲避那些外界的刺激。但是睡眠还存在着心理活动的残余的刺激，从而引起梦的活动。梦的第二个成分或特性是，梦中大部分的经历是视象即意象，或者是意象的组合。因此，往往造成述说梦的困难，就是意象难以译成语言。

从梦的这两个共同特性或成分出发，弗洛伊德期望“对于梦的性质有较深切的了解”，就是说要揭示梦的本质，即共同特征。弗洛伊德曾由梦和睡眠的关系，断定梦是对扰乱睡眠的刺激的反应。那么是什么刺激呢？实验心理学曾提供一些证明，确有某些刺激可以在梦中出现，但是这些刺激只能解释梦的片断，不能解释梦的整体反应。弗洛伊德认为，不管外界刺激还是体内刺激，只能解释梦的起源，却不能解释梦的性质。梦大部分是视象，是不能用刺激去加以解释的。于是弗洛伊德从那两个假设出发，运用精神分析的自由联想法，让梦者联想梦的各个成分，从而发现产生这些特殊成分的情结。他说：“由代替物出发，利用一系列联想，总可以得到原来的对象；……我们或可假定一个梦的元素的联想不仅因那元素而定，而且决定于不在意识内的原来的念头。”这就是说，通过精神分析去发现梦的情结、“原来的念头”、即无意识。无意识包含的东西很多，表现为梦这个代替物的视象也多种多样。但是所有梦的隐含的共同本质或特征就是愿望的满足、达成。弗洛伊德断言：“梦无论是如何地复杂，大部分均可以解释为愿望的达成”。无意识愿望就

是梦的起源，而不是什么刺激。

但是，提出梦是愿望的满足这一结论之后，弗洛伊德感觉到还有许多悬而未决的问题，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它是否为所有梦的共同特征。为此他做了进一步的分析和论证。

弗洛伊德曾举过他自己和他同事的梦为例，说明“这梦的动机，无非是贫睡罢了”。他举过健康女子梦见上衣沾满乳汁，认为这是“盼望”有更多的乳汁给即将诞生的孩子吃。还举过一个动过下颚手术的女性病人的梦为例，这个女病人在梦中总是把动过手术的颊上冷敷的布料撕掉，认为这是处在不愉快的境遇而“想”更愉快的事。还举过儿童的梦为例，认为儿童的梦大都是现实愿望的不满足以求梦中得到补偿。甚至他还认为神经病患者的症候作为被压抑的无意识的代替物，也与梦的心理本质相通，只不过表现方式不同而已。据此，弗洛伊德认为愿望的满足，实为梦的共同特征或本质。

梦中以视象为代替物来满足的那个欲望，并不是现实实现的欲望，即不是意识的欲望，而是未实现或压抑的愿望。它实际上是无意识的，乃至是性本能。关于这个问题，弗洛伊德说：“至就梦而言，起初虽然似乎极度杂乱而不可解，但要在梦内提出这些事实，而证实精神分析的种种前提——如潜意识的精神作用，和其所遵循的特殊机制及其所表示出来的本能的推动力等的存在——则只要几个小时的努力便够了。”很显然，梦所满足的那个欲望，实际上就属无意识，而最后的推动力则是本能冲动。

就梦与无意识的关系来看，任何梦的精神价值和意义，都同人的某种心理过程有着密切的关系。梦不是在人的完全意识的条件下发生的，这就表明梦同一种潜在的心理现象有着因果联系。弗洛伊德说，所谓“隐藏的”、“不可及的”或“原来的”统统应改为“非梦者的意识所可及的”或“无意识的”，以期在叙述上更为精确。梦的真实内容和意义，之所以对梦者本人都一无所知，就在于它本身是非意识所能达到的，它本身是无意识的。实质上，弗洛伊德把梦境的整体看作是意识和无意识的统一体。梦境本身的要素和通过对这些要素的联想，而得出的替代观念，可称为意识的。这一点表明在一般情况下，梦者能够回忆起梦境的内容，形成某种时期的逻辑的联系。而梦境本身背后的意向涵义，以及表达的愿望本身，却是无意识的东西。梦者对梦境内容和意义百思不得其解之处正在于此。在这个意义上，弗洛伊德认为梦是一种画谜。梦是一幅图画，它形象表述了事件的各方面的细节。它们之间的关系，易于被人理解，它是意识的东西。但是梦境本身是个谜，外表的画面可以潜藏着一种真实的意义，它是无意识的东西。弗洛伊德指出，我们的前辈在释梦问题上的错误，就在于他们把梦解释为纯粹的图画，因而把梦看作是荒谬的，毫无意义的。“梦因愿望而起，梦的内容即在于表示这个愿望，这就是梦的主要特性之一。此外还有一个不变的特性，就是梦不仅使一个思想有表示的机会，而且借幻觉经验的方式，以表示愿望的满足。”弗洛伊德在这里所说的“思想”是意识的东西，而“愿望”则是无意识领域的东西，常常引起梦幻的东西。他说：“所以你们若仅讨论梦所代表的思想，那么梦就可为任何物——一种警告，一种决心，或一种准备，等等。但是除此之外，它本身也常可为一种潜意识欲望的满足。假使你们把梦看成梦的工作的产物，则舍欲望满足之外就不再有其他意义了。……总之，欲望的满足，这一特性才是梦的主要性质；其他成分则可有可无。”把欲望的满足看作梦的主要特性，实际上就肯定了梦的无意识特性；梦的存在也就证明了无意识的存

在。

就梦与本能冲动的关系来看，梦所满足的无意识的愿望乃是以前经历中被压抑的东西，这种被压抑的东西在梦中的体现，唤醒了原始的精神生活——自我的古老的支配权和性生活的原始冲动。

弗洛伊德认为要想追溯在以前经历中被压抑的东西形成的历史，最好从儿童的梦分析入手。因为，儿童的梦，通常很简短，梦境的内容往往是不加掩饰的。通过一系列例证分析，他发现儿童在梦中得到满足的那个欲望，是多种多样的，有饮食的，游览的，虽然还没有性的，却都是与生命冲动有关的。弗洛伊德说：“当我们说小孩因为没有性欲所以快乐时，我们可别忽略，小孩也有极多的失望，弃绝以及梦的刺激是由其他生命冲动所引起的。”这就是说，儿童虽然没有性欲，却有被压抑的欲望(失望、弃绝)以及其他生命冲动，是这些无意识冲动引起儿童的梦。后来通过更进一步的研究，肯定了儿童性本能的存在，并且把性本能放在本能的极为重要的地位，毫无疑问性本能冲动就成了梦的原始动力之一。

弗洛伊德通过对儿童的梦的研究，认为儿童的性本能和性生活是存在的，最初形成“奥狄浦斯情结”，这种情结由于受排斥、受压抑而潜伏在无意识中，而成为一种禁忌的欲望。这种欲望可以在梦中改装表现出来。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教育的加强，儿童性生活的经验多被遗忘，许多心理生活及特性，如利己主义、乱伦的欲望等等都继续存在于无意识之内。弗洛伊德通过“个体的幼年”的回溯，认为儿童的梦是包含性本能在内的欲望的满足。他指出：“这个可怕的罪恶只是指精神生活的最初的、原始的和幼稚的部分，仅作用于儿童时期。我们一方面不加重视，是因为它的份量不大；另一方面也不大以为意，是因为我们对于儿童并不要求一种高级的伦理标准。”

个体的幼年时期，是人类整个发展过程的简单的重演。而个体初期的潜在的心理过程就是植根于种族初期的潜在的心理过程。个体习得的东西，都是种族发展的遗物。据此，弗洛伊德认为，成年人的梦都不过是回复到个体或种族的这种幼稚的时期，都包含着这种原始的潜伏着的本能冲动，这是对梦的本质的最深刻了解。他说梦的这种回复到原始的幼稚时期——他叫做“梦的倒退作用”(the regression indreams)，不仅是形式的，而且是实质的。不仅是思想的一种原始的表现方式，“而且唤醒了原始的精神生活的特点——自我的古老的支配权和性生活的原始冲动”。这些古老的幼稚的特性，从前虽曾独占优势，现在却退于无意识之内，并且“改变和扩充了”对无意识的观念、看法。梦就是由包含着性生活冲动在内的欲望，对来自意识而转为无意识的“梦念”的影响(即倒退作用)而成的，这就是“关于梦的性质的最深刻的了解”。

总起来说，无论是儿童还是成人，他们的梦都是这样或那样的无意识本能欲望的满足。不过表现的内容和形式不一样，就是说还有区别。弗洛伊德说：“儿童的梦是梦者所承认的欲望的公然的满足，普通的化装的梦是被压抑的欲望的隐秘满足，至于焦虑的梦的公式，则为被压抑的欲望的公然满足。”梦从内容到形式都不尽一样，从而构成三种类型或方式：儿童的梦，欲望是梦者承认的，采取一种公然满足的方式，这是因为儿童较少受高级的伦理标准的要求和压抑。而成年人的梦，欲望是被压抑的，或采取化装的、隐秘的满足方式，或采取焦虑的、公然的满足方式。这是因为有某种精神和情绪的压抑造成的。

先看化装的梦。弗洛伊德说：“化装的梦所有背后的欲望是检查作用所禁止排斥的，而且正是这些欲望的存在，才形成化装的原因和检查作用的动机。”这就是说，化装的梦所要满足的欲望是被压抑的，这种被压抑的欲望为意识所禁止、检查，所以不得不以化装的形式来达到满足。被压抑的欲望由于受意识的检查，便有顾忌，便采取另一种形式。弗洛伊德认为，在心灵中假设有两个系统，一个是无意识即梦中表现出的欲望内容，一个是意识即扮演检查者的角色，当欲望无法为意识所接受时，它必须改变形式求得意识满意。因此化装的梦是欲望为了通过意识的检查而求得满足的一种方式。弗洛伊德把这种化装的梦，形象地比喻为真实的梦的“伪装”、“假面具”。这犹如在社交生活中那虚伪客套一样，一个人具有某种特权，另外一个人在这种特权面前处处有所顾忌，于是他只好把自己内心想作的行为加以改装。也犹如政论作家对执政者有所顾忌，就不得不将言论作些伪装。

现实中的种种伪装，完全与梦里所作的改装相类似。弗洛伊德假定，每个人在心灵中都存在着两种心理系统或倾向：“第一个是在梦中表现出愿望的内容；而第二个却扮演着检查者的角色，而形成了梦的‘改装’”。由此，弗洛伊德认为可以“推出一个合理的假设：凡能为我们所意识到的，必得经过第二个心理步骤所认可；而那些第一个心理步骤的材料，一旦无法通过第二关，则无从为意识所接受，而如果任由第二关加以各种变形到它满意的地步，才得以进入意识的境界”。可见，梦所以改装，所以出现多种复杂的曲折的形式，乃是由于人的心理过程的检查者的抗拒力量的存在，致使欲望以变形求得隐秘的满足。

再说焦虑的梦。弗洛伊德说：“焦虑的梦的内容，往往没有什么化装，好像是已经躲开检查者的注意似的。这种梦常常是毫无隐蔽的欲望的满足，但这个欲望当然不是梦者要承认的，而是他已经屏斥的那个欲望了，于是焦虑就乘机而来，以代替检查作用。”这就是说，作为欲望的满足的焦虑的梦，与改装的梦有三点重要区别。第一，梦者的欲望也是被压抑的，却又是梦者屏斥、指责和不愿有的，是一种不愉快的欲望；第二，这种不愉快的情绪引起一种抵抗力量，代替那意识的检查，却又不能制服欲望的力量，因而表现为焦虑；第三，被压抑的欲望好像避开了检查而采取一种公然的满足。“焦虑本是欲望的绝对反面，而反面又很容易和正面造成联想，……二者在潜意识内同为一物”，所以这种痛苦的、焦虑的梦，尽管是梦者所不愿意的，却不是以不愉快的心境、情绪来实现欲望的满足。这种梦由于焦虑、痛苦、不快常使梦者惊醒，好像原有被压抑的欲望未能克服检查作用而求得完全的满足，但是其主要性质即欲望的满足却没有改变。弗洛伊德通过大量的反愿望的梦的例证的分析，得出结论说：“一个内容痛苦不堪的梦，其实是可以解析它仍然是愿望的达成。”

总之，弗洛伊德认为，梦不论采取什么形式，其本质或主要特性就是一个，即欲望的满足。欲望属于无意识本能，所以梦不过是无意识本能冲动的表现(满足)而已。

(阮小波 撰)

【美】亚伯拉罕·马斯洛：
《动机与人格》——洞悉人性中的需求奥秘

我想证明人类有能力完成比战争、偏见和仇恨更美好的东西。

——亚伯拉罕·马斯洛

虽然各种族和文化可以有天壤之别，但最终的结果似乎都是相同的。驱使人类的是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这是马斯洛理论中的一个独到的基本概念。

——理查得·乔伊斯

一、马斯洛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动机与人格》的作者亚伯拉罕·马斯洛(Abraham H.Maslow, 1908—1970)，是美国著名的行为科学家。他于1934年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获心理学博士学位，并在该校任教5年，然后迁往纽约，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布鲁克林学院任教。1951年任布兰代斯大学心理系教授兼系主任。他的著作有《人类动机理论》(1943)、《动机与人格》(1954)、《冲突、挫折和威胁理论》(1943)、《妇女中的控制、个性和社会行为》(1939)、《心理安全—不安全的动力学》(1942)、《反常心理学原则》(1941，与米特尔曼合写)等。

孩提时代的马斯洛是布鲁克林郊区一个非犹太区里的唯一的犹太籍孩子。他曾说他有点像在一个清一色白人学校里念书的第一个黑人。考虑到他如今是心理学领域里最著名的人物之一，并很少受到其他持不同观点的心理学家的诋毁，很难想象他会这么陈述他的童年：“我十分孤独不幸。我是在图书馆的书籍中长大的，几乎没有任何朋友。”

年轻的马斯洛逐渐成熟，开始欣赏起艾尔弗雷德·诺斯·怀特海·亨利·柏格森、托马斯·杰斐逊、亚伯拉罕·林肯、柏拉图和斯宾诺莎等先哲的著作。他把发现了威廉·格雷厄姆·萨姆纳的《民俗》说成是“我生活中的珠穆朗玛峰”。

马斯洛结婚很早——当时他才20岁，新娘19岁。他说：“我的生命是在我结婚并前往华盛顿后才真正开始的。我发现了J.B·华生，这使我对行为主义着了迷。我因此而激动万分。”他在哈里·哈洛博士的指导下研究起猴子来。他还写了关于猴子的性特点与主导特征的博士论文。

然而，随着他日益增多地研读格式塔心理学和弗洛伊德心理学，马斯洛对行为主义的热情渐渐减退。当年轻的马斯洛夫夫妇有了自己的家庭后，马斯洛又有了个重要的发现。他写道：“我们的第一个婴孩改变了我的心理学生涯，他(指婴孩)使我从前为之如痴如醉的行为主义显得十分愚蠢，我对这种学说再也无法忍受。它不是能成立的。”

到了30年代，马斯洛又回到了纽约，任布鲁克林学院心理学教授。

当时的纽约市是一个十分特殊的地方——马斯洛称之为心理学的钟灵毓

秀之地。他本人就在这里得到了最深刻的学术锻炼。他写道：“我从未遇到弗洛伊德或荣格，但我却在阿德勒的家里见过阿德勒。他常在家中主持周五晚间研讨会，我曾与他多次交谈……我还找到了其他许多人，诸如埃里希·弗洛姆、卡伦·霍尔奈、路丝·本尼迪克特和马克斯·沃特海墨等人。我可以有理由说我有过世界上最好的正式与非正式的教师。……每个人都是我的老师。我从不参加任何狭隘……我向所有的人学习，拒绝关闭任何门户。”

他还提到了其他许多对他产生重大影响的人，他们包括玛格丽特·米德、加德纳·默非、罗洛·梅、卡尔·罗杰斯、科特·戈尔茨坦、戈登·奥波特。他们都是这一新科学的领导人物。

1941年12月7日这一天改变了马斯洛的生活方向，就像它改变了其他无数人的生活方向一样。由于年龄太大，不能从戎，马斯洛决心贡献毕生精力去寻找一种关于人类行为的普遍理论，它将因为基于世界范围的事实根据而成为有用的理论，是一种“为和平会议桌所用的心理学”。他开始着手综合他研究过的许多观点。他说：“我要使科学开始考虑迄今为止一直不是科学家所处理的问题——如宗教、诗歌、价值观、哲学和艺术。”

《动机与人格》是马斯洛的第二部著作。自它出版后，他发表了大量报告、论文、演讲和专著来发展、详述与改进其最初的表述。

马斯洛并不全盘否定弗洛伊德或华生及其他行为主义者，而是力图把他们两派的心理学中有用的、有意义的以及可运用于人类的部分加以正确评价，并以这些部分作为继续前进的起点。

二、《动机与人格》评介

马斯洛的贡献主要是进一步发展了亨利·默里在1938年把人的需要分为20种的分析研究，提出了人类基本需要等级论即需要层次论。

他首先将以前提出过的动机理论的结论概述如下：(1)动机理论的一个基础必须是生物体的综合完整体。(2)饥饿驱力(或其他任何生理驱力)被否定为明确的动机理论的中心点或中心模式。它是非典型的，而不是典型的人类动机。(3)这种理论应该把重点和集中点放在最终的或基本的目标上，而不在部分的或表面的目标上；放在目的而不在手段上。这样的重点就意味着无意识的动机比有意识的动机处于更中心的位置。(4)为了达到同一目标，往往有各种可能的文化途径。因此，在动机理论中，有意识的、具体的、局部性文化的欲望就不如更基本的、无意识的欲望更具有根本性的意义。(5)任何有动机的行为都必须理解为一种途径，通过这种途径许多基本需要可以同时表现出来或得到满足。一个典型的行动总有一个以上的动机。(6)一切生物体的行为状态都应理解为受动机支配的，或起着动机作用的。(7)人类的需要本身是按照优势需要的等级排列的。那就是说，一个需要的出现往往是在另一个更占优势的需要已经满足之后。每一个驱力是和其他驱力的满足或不满足的情况相联系的。(8)由于各种理论和实践的原因，罗列各种驱力对我们毫无用处。而且，对动机作任何分类必须要解决需要分类的动机的特殊性或普遍性的等级问题。(9)动机分类必须以目标为依据，而不以促动的驱力或有动机的行为为依据。(10)动机理论必须以人类为中心而不是以动物为中心。(11)生物体产生反应的情境或领域必须加以考虑，但领域很难单独地作为行为的唯一解释。而且，领域本身必须按照生物体的情况进行解释。领域理论不能代替动

机理论。(12)不但要考虑生物体的综合性,而且要考虑孤立的、具体的、局部的或部分的反应的可能性。(13)动机理论并不等于行为理论。动机只是行为的决定因素中的一种。虽然一切行为差不多都是有动机的,但一切行为也差不多总是受生物的、文化的和情境的条件所决定的。

马斯洛试图制订一种积极的动机理论,可以适应于以上所说的各项理论要求,同时也符合在临床实践中、在观察中和实验中所获得的已知事实。

马斯洛的人类动机理论,几乎可以运用到个人以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他认为,以下的一些设想,对一个完善的动机理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

个人是一个统一的、有组织的整体。他说:“一个行动或一个有意识的愿望,如果只有一种动机,那是不正常的。”换句话说,是整个人都受到动机的驱使,而不仅仅只是人的一部分。当一个人饿了,他整个人都需要食物,不只是他的胃。

个人的绝大多数欲望和冲动是互相关联的。这也许对如饥饿之类的更基本的需要说来并不正确,但对如爱情之类的更复杂的需要来说,无疑是正确的。

以前,大多数研究都认为,人类需要可以按方式和目的割裂开来分别加以研究。要想充分理解人类动机,就必须着重研究最终目的或结果,而不是达到这种目的之手段。当我们在一个广泛的、跨越文化的基础上进行研究,就会发现各种文化的目的,远比它们用来达到目的集团的手段要普遍。这也就是说,虽然各种族与文化可以有天壤之别,但最终的结果似乎都是相同的。驱使人类的是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这是马斯洛理论中一个独到的基本概念。这些需求是心理的,而不仅仅是生理的。它们是人类真正的内在本质。但它们都很脆弱,很容易被扭曲,并被不正确的学习、习惯及传统所征服。马斯洛说:“它们是人类天性中固有的东西。文化不能扼杀它们,只能抑制它们。”这显然对一条为多数人所接受的、古老的信念提出了挑战。这条信念认为,本能是强有力的、无法改变的、邪恶的。马斯洛的设想刚好相反:这些需要极易受到无视和压抑。它们“不是丑恶的,而是中性的或者是良好的”。

(一)生理需要

人的需要中最基本、最强烈、最明显的一种,就是对生存的需求。具体地说,这意味着对一个生活中一无所有的人来说,非常可能他最主要的动机是满足生理需要而不是其他需要。如果一个人缺少食物、安全、爱情和尊敬,非常可能他对食物的要求比其他任何事物更为强烈。人们需要食物、饮料、住所、性交、睡眠和氧气。一个缺少食物、自尊和爱的人会首先要求食物。只要这一需求还未得到满足,他就会无视或把所有其他的需求都推到后面去。因而机体为生理需要所控制时,那么,其他的各种需要简直可以说不复存在,或者退居于隐蔽的地位。我们简直只要说它饿了,就可以代表整个机体的特征。因为在那时,思想意识差不多已经完全被饥饿的感觉所占有了。一切智能都为满足饥饿的需要服务,一切感应器官和效应器官,智慧、记忆力、习惯等都可以简单地称之为满足饥饿需要的工具。凡是对于这一目的不起作用的智能都处于休眠状态或退处隐蔽地位。在极端饥饿的情况下,写诗、激情,获得汽车的欲望,研究美国历史的兴趣,购买新皮鞋的愿望等等都

完全被遗忘，或处于次要地位。因为当一个人饿得发狂或快饿死时，除了食物之外，他什么都不感兴趣了。他梦见的是食物，记得的是食物，想念的是食物，他的感情上只有食物，需要的只是食物。在这个时候(也只有在这个时候)，只有纯粹的饥饿驱力和行为存在，其唯一目标是要无条件地从饥饿中得到解救。

当一个人的机体受到某种需要的统治时，它还表现出另外一种奇异的特征：他对生命前途的整个哲学观念也随着发生了变化。对于那些长期受饥饿折磨的人来说，所谓极乐世界就是有充足食品的地方。生命的定义可能就等于吃饭。其他的東西都被看作是无关重要的。什么爱情、自由、社团感情、尊敬、哲理等等都视同敝屣，置之不顾。“如果一个人极度饥饿，那么，除了食物外，他对其他东西会毫无兴趣。他梦见的是食物，记忆的是食物，想到的是食物。他只对食物发生感情，只感觉到食物，而且也只需要食物……这样的人真可谓单靠面包为生。”

尽管以上情况是真实的，但是马斯洛认为它并非具有普遍性。在一个正常运转的和平社会中，所谓特殊紧急情况总是比较少的。这从它的定义本身就可以看出来。文化是一种具有适应性的工具。它的主要功能之一就是要使生理方面的特殊紧急情况越来越少。在人们已知的绝大多数社会中，长期严重饥饿的情况不是常有的，而是极为罕见的。当一个普通的英国公民说“我饿了”，实际上他所感受到的不是饥饿而是食欲。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他才会感受到真正生死攸关的严重饥饿。这在他一生之中是难得有几次。

马斯洛说，我们可以根据对人类需要的细分，来开一张罗列生理需要的很长的单子，但这可能没多大意义。举个例子说，我们可以证明有多少不同的感官快乐，如品尝、嗅闻、抚摸等，可以被包括在影响人类行为的生理需要中。另外，尽管生理需要比高级需要更容易分割和确定，但它们不应该被当作互不相关的孤立现象来对待。比如，一个自以为饥饿的人，实际上很可能缺乏爱、安全感或其他的東西。反之，有些人用或试图用如吸烟或喝水等其他行为来克服饥饿。因此，所有的人类需要都是相互关联的。

生理需要还受到了心理学其他两大学派的承认与重视。行为主义者认为，人只有生理的遗传冲动。马斯洛认为这一结论可能来源于这样一个事实，即行为主义学派的大多数研究都是在老鼠身上做的，而老鼠除了生理动机外，显然很少有别的什么动机了。

马斯洛认为，行为主义者关于生理需要对人的行为有强有力的影响的观点是正确的，但这只限于生理需要没得到满足时。然而，对文明社会中的多数人来说，这些低级需要都已得到相当的满足。“要是面包很多，而一个人的肚子却已饱了，那会发生什么事呢？”马斯洛自己回答道：“其他(高一级的)需要就立刻出现了，而且主宰生物体的是它们，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而当这些需要也得到了满足，新的(更高一级的)需要就又会出现了。以此类推。我们所说的人类基本需要组织在一个有相对优势关系的等级体系中就是这个意思。”马斯洛坚决主张，人的一生实际上都处在不断追求之中，他是一个不断有所需求的动物，“几乎很少达到完全满足的状态。一个欲望得到了满足之后，另一个欲望就立刻产生了。”

如果人们有了很多的面包，肚子经常填得饱饱的，那么，他的欲望将发生什么变化呢？立即就出现其他(更高级)的需要。正是这种需要而不是生理上的饥饿，现在对人的机体起着统治的作用。当这种需要得到满足时，又有

新的(更为高级的)需要出现, 依此类推。这就是我们所说“人的基本需要组织起来成为相对的优势需要等级”的意思。

以上所说的一个主要含义是, 在动机理论中, 满足与剥夺具有同等的重要性。因为满足使机体摆脱掉相对的比较生理性的需要, 从而使其他更具社会性的需要得以体现。生理需要及其部分目标得到长期的满足之后, 它就不再是人类行为的能动的决定因素或形成体了。它们只是以一种潜在的形式存在着, 那就是说, 如果这种需要受到阻抑时, 它还可重新出现而对机体起统治作用。但是, 一种需要得到满足后就不再是需要了。只有那些未得满足的需要才能对机体起统治作用而形成其行为。饥饿得到满足之后, 在个人的现行活动中就变得无足轻重了。

以上的论点多少受到另一种假设的制约, 那就是说, 某些人对于某种需要如果经常得到满足, 他们以后就最能忍受这种需要的剥夺; 而且那些过去已经受到剥夺的人和过去从未受到剥夺的人相比, 他们对于当前的满足也有不同的反应。

(二) 安全需要

如果生理需要已经相当好地得到满足, 就会出现一系列新的需要, 概略地称之为安全需要。以前所谈到的关于生理需要的各种特征在安全欲望上也同样存在, 虽然在程度上比较轻一些。整个机体也可能同样地完全被这种欲望所统治。因此, 可以把整个机体描绘成为谋求安全的机器, 所有的感受器、效应器, 所有的智能和其他能力主要都成为谋求安全的工具。而且, 这种占统治地位的目标不但对于他当前的世界观和哲学思想, 而且对于他将来的哲学思想, 都起着决定性的作用。

虽然该书关注的主要是成年人的需要, 但是如果对婴儿或儿童进行观察, 也许能更有效地理解安全需要的特征。因为在他们身上这种需要表现得更为简单而明显。其理由之一是由于婴幼儿对这种反应是从来不加抑制的, 而成年人受的教育则是尽力设法抑制这种反应。所以观察儿童或患神经症的成人, 就最有助于理解这种需要。儿童心理学家和教师发现, 儿童需要一个可以预料的世界。儿童喜欢统一、公平及一定的规律。缺乏这些因素时, 他就会变得焦虑不安。他喜欢的是一定限度内的自由, 而不是放任自流。按照马斯洛的观点, 这一点事实上对发展儿童的适应性是很有必要的。

不安的或患神经症的成人, 行动起来很像不安的儿童。马斯洛说: “这样的人做起事来总好像大难就要临头似的。他总像在应付一件紧急事件……一个神经症患者好像总是在怕挨打屁股似的行事……”不安的人对秩序与稳定有一种迫切需要, 他尽量避免奇怪或不测之事。健康者也寻找秩序和稳定, 但这并不像对于神经症患者都那样是生死攸关的大事。成熟的人对新奇及神秘也有一种兴趣。

在我们的文化中, 所有健康的、正常的、幸福的人在安全需要方面大都已得到满足。一个和平的、顺利运转的社会使它的成员们感到有充分的安全保障, 免于野兽、严酷气候、罪犯、袭击和谋害、暴政等等的迫害。因此, 可以很确切地说, 他们不再以任何安全的需要作为有力的动机因素。我们所看到的安全需要的表现只有在下面这一类现象上。例如, 人们普遍喜欢得到有固定任期和保障的职业, 普遍愿意有储蓄存款以及各种保险(医疗、牙疾、

失业、残废、衰老等)。

从其他更广阔的方面说，这种谋求安全与稳定的企图还表现在人们普遍地喜爱熟悉的和已知的事物，而不喜爱陌生的和未知的事物。人们有一种趋向，要求有某种宗教信仰或世界观，使宇宙和宇宙中的人结合起来成为一个和谐一致而富有意义的整体。这种趋向也部分地出于谋求安全的动机。所以，一般的科学与哲学部分地是由于安全需要的动机而产生的(当然还有其他的动机)。

除了以上所说的以外，我们只有在特殊紧急的情况下才看到安全需求成为对机体的智能起积极和支配作用。所谓特殊情况指的是战争、自然灾害、疾病、犯罪、社会瓦解、神经官能症、脑子损伤、长期恶劣处境等。

(三) 归属和爱的需要

当生理和安全的需要得到满足时，对爱和归属的需要就出现了。马斯洛说：“现在这个人会开始追求与他人建立友情，好在自己的团体里求得一席之地。他会为达到这个目标而不遗余力。他会把这个看得高于世界上任何别的东西。他甚至会忘了当初他饥肠辘辘时曾把爱当作不切实际或不重要的东西而嗤之以鼻。”

这样，以前所描述的整个循环过程都要围着这个新的核心而重复出现。现在，那个人就感到从来没有这样迫切地要求得到朋友、情人、妻子或儿女。他渴望同人们一般地建立感情人的联系，也就是说，要求在他所处的群体中占有一个位置；他将以高度的激情争取实现这一目标。他迫切地要求达到这个位置，胜于世界上其他一切事物；他甚至忘记了他过去饥饿时，对爱情是不屑一顾的。

在我们的社会里，在顺应不良和更严重的精神病态事例中，爱情需要受阻抑常常是最常见的核心问题。人们往往带着矛盾心理看待爱情和感情问题，以及它们在性生活中可能的表现形式，并且习惯于对它们加以种种限制和压抑。事实上，所有的心理学理论家都强调在顺应不良的情况中爱情需要受阻抑是个主要的因素。因此，我们对这种需要做了许多临床实验的研究，对于这种需要的了解也许比其他任何需要(除生理需要之外)都要多。

在这一方面，必须强调指出一点，即爱情不等于性欲。性欲可以作为一种纯粹的生理需要来研究。在一般情况下，性行为是由多种因素所决定的；那就是说，不但取决于性的需要，而且还取决于其他需要，其中主要的是爱情和感情的需要。而且，不能忽视这一事实：爱情的需要包括给予爱和接受爱这两个方面。

马斯洛说：“一般说来，性行为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不仅出于性的需要，而且也出于其他的需要，其中主要包括爱和感情的需要。”他很赞成卡尔·罗杰斯关于爱的定义：“爱是深深的理解和接受。”

他认为弗洛伊德把爱情说成来自性欲是个极大的错误。“当然，犯这种错误的，不止是弗洛伊德一人……很多不善于思考的人也有同感，但弗洛伊德却可以说是西方文明中这个观点的最有影响的代表……弗洛伊德各种理论中最广泛地为人接受的就是：温情即是目的受抑制的性欲。”

马斯洛发现，心理学对于爱的研究少得惊人。“人们有理由指望那些严肃地讨论家庭、婚姻、性生活的作者会把爱作为他们这个任务的一个适当的、

甚至基本的部分。但我必须告诉诸位，在我工作的那个图书馆里有关这些主题的书，竟没有一本严肃地谈到了这个问题。更有甚者，爱这个词，根本没有被编入索引之中。”

但马斯洛发现，缺乏爱，就会抑制成长以及潜力的发展。临床医生一次又一次发现婴儿不能缺乏爱。很多心理病理学者也认为，爱的需要受到挫折是心理失调的主要原因。马斯洛说：“爱的饥饿是一种缺乏症，就像缺乏盐或缺乏维生素一样……我们需要碘和维生素 C，这一点对每个人来说都是毋庸置疑的。我提醒你们，我们需要爱的证据与此完全是属于同一类型的。”

对马斯洛来说，爱是一种两个人间健康的、亲热的关系，它包括了互相依赖。在这样一种关系中，两个人会抛弃恐惧，不再戒备。当其中一方害怕他的弱点和短处会被发现时，爱常常就受到伤害了。卡尔·门宁格是这样谈论这个问题的：“与对方不能欣赏我们的感觉相比，我们或多或少都感到过的那种害怕别人看穿由习俗和文化强加于我们的面具的恐惧，更会伤害爱。正是它使得我们不敢与人亲密，而只在一种表面上保持友谊，低估而且不去理解别人，以防别人太了解我们。”

马斯洛说：“爱的需要涉及给予和接受爱……我们必须懂得爱，我们必须能教会爱、创造爱、预测爱。否则，整个世界就会陷于敌意和猜忌之中。”

(四) 尊重需要

在我们的社会中，所有的人(除少数病态者外)都有一种需要或欲望，要求对自己有一种坚定的、基础稳固的和通常是高度的评价，要求保持自尊和自重，并得到别人的尊敬。所谓基础稳固的自尊，意思就是说这种自尊是以真实的才能和成就以及别人的尊敬为基础的。这种需要可以再分为两类：首先是那种要求力量，要求成就，要求合格，要求面对世界的信心，以及要求自由和独立的欲望。其次，还有一种欲望，我们可以称之为要求名誉或威信(其定义为别人的尊敬或尊重)，表扬，注意，重视或赞赏的欲望。这种需要得到艾尔弗雷得·阿德勒及其追随者们的较多重视，而弗洛伊德和精神分析学家们则比较地忽视了这种需要。但是今天看来，越来越多的人普遍认识到这种需要的极端重要意义。

自重的需要得到满足，会使人感到自信、有价值、有力量、有能力并适于生存，对世界有用而必需。如果这种需要得不到满足则使人感到低人一等，软弱或无能为力。后述的那些感觉又使人容易产生严重的沮丧情绪或神经质的倾向。在一项关于创伤性神经机能病的报告中，可以明显看出人们的基本自信的必要性及缺乏这种自信会造成怎样无能为力的状况。“最稳定的，因而也是最健康的自尊是以别人给他应得的尊敬为基础的，而不是来自外部的名声、荣誉或谄媚。”

马斯洛阐述说：自由也许是一种基本的心理需要，但他又指出，证明这一观点的科学依据目前还远远不够。“众所周知的临床材料告诉我们，一个懂得真正自由的人(这自由不是牺牲了安全得来的，而是建筑于充分的安全的基础上的)不会自愿或者轻易让别人夺去他的自由。不过我们不知道对一个生下来就做奴隶的人，情况是否同样如此。”

(五) 自我实现的需要

即使以上各种需要都得到了满足，我们还可能常常(即使不是总是)感到自己必须做一些适合于自己的事，否则很快就会产生一种新的不满足或不安定的情绪。一个作曲家必须要作曲，一个美术家必须要绘画，一个诗人必须要写诗，这样才能最终感到愉快。一个人能够做什么，他就必须要做什么。这种需要我们可以称之为自我实现的需要。

这个名词首先是库特·戈尔斯坦创造出来的。在本文中它用来表示一种更具体而范围较窄的含义。它指的是一种自我完成的欲望。也就是说，人们有一种意向要使他潜在的本质得以现实化。这种意向可以简单地描述为人们要求越来越真实地体现自己的欲望，要求尽可能地实现自己的欲望。

这种需要所采取的形式，在各人之间当然有很大的差别。在这一个人身上可能表现为要求成为模范母亲的欲望，在另一个人身上则可能表现为要求成为一个体育明星的欲望，在第三个人身上可能表现在绘画或创造发明方面。它不一定是一种创造性的冲动，但是一个有创造能力的人是会采取这种形式的。

这种自我实现需要的明确出现，是建立在生理的、安全的、感情的和受人尊重的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基础之上。我们对于这些需要已经得到满足的人称之为基本满足的人。只有对于这样的人，我们才能期望他发挥最全面的(也是最健全的)创造性。因为在我们的社会中，基本满足的人只是极少数的例外。因此，无论在实验或临床诊疗中，我们对于这种自我实现的需要知道得很少。这仍是一个吸引我们去研究的问题。

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为了满足这些需要，有一些直接的先决条件。如果这些先决条件得不到满足，那就像基本需要本身受到危害一样地无法使之得到满足。例如言论自由，在不损害别人的条件下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的自由，自我表达的自由，调查和收集情况的自由，在集团中保卫自己本身，公平、正义、诚实、秩序的自由，等等，这些都是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的例子。当这些先决条件受到阻抑时，人们就会作出受威胁或紧急情况反应。这些先决条件本身并不是目的，但差不多就等于目的。因为它们同基本需要密切相关，而后者显然就是人们的唯一目的。人们要保卫这些先决条件，因为没有这些条件，就不能满足基本需要，或者说，至少基本需要会受到严重威胁。

(六)对认识 and 理解的欲望

马斯洛认为精神健康的一个特点就是好奇心。必须承认，还没有足够的科学材料和临床材料来证实这是一种基本需要；早期理论家弗洛伊德、阿德勒、荣格的著作中也没有关于这方面的研究。马斯洛列举以下几点理由来说明好奇心是一个全人类的特点：(1)动物行为中常常表现出好奇心。(2)历史上的许多例子证明人即使危险临头也会探求知识，伽利略与哥仑布就是这样的人。(3)对心理成熟者的研究表明，他们往往对神秘的、未知的、不可测的事物心驰神往。(4)马斯洛的临床经验提供的例子表明，曾经健康的成人也会感到厌倦、压抑，对生活失去兴趣，并厌恶自己。这样的症状也会出现在有才智的人身上，如果他们“做着愚蠢的工作，过着愚蠢的生活的话……我接触过许多女性，她们风华正茂，却无所事事，于是她们的智力就开始逐渐衰

退。有些人接受了建议，使自己致力于一件值得努力的事情上，她们的病情就会减轻或消失。这使我想到了，求知的需求是存在的”。(5)儿童似乎有着天然的好奇心。(6)好奇心的满足是主观上的满足；人们都说学习和发现未知的东西会给他们带来满足和幸福。

许多行为科学家认为，对秩序、系统和稳定的追求是一种强迫性神经症的形式。马斯洛认为虽然这一点是正确的，但是健康人身上也会有这种行为，只是不会为此而陷入无法摆脱的境地。用马斯洛的话来说，“有人把这一过程称为寻找意义，那么我们就应该假设人有一种对理解、组织、分析事物、使事物系统化的欲望，一种寻找诸事物之间的关系和意义的欲望，一种建立价值体系的欲望。”

(七)对美的需要

行为科学往往忽视人对美有本能需要的可能性。马斯洛发现，对美的需要至少对有些人来说是很强烈的；他们厌恶丑恶。他早期对学生作的一些研究证明，环境的美丑对他们会产生影响的。实验证明，丑会使人变得迟钝、愚笨。马斯洛发现，从最严格的生物学意义上说，人需要美正如人的饮食需要钙一样，美有助于人变得更健康。

他指出对美的需要与人的自我形象有关。那些没有因为美的作用而变得更健康的人，是因为受到了自我形象太差的限制。一个邋遢的人在一家一尘不染的豪华饭店里会感到很不自在，因为他觉得自己“配不上”。

他讲了一个就诊于他的一位精神病专家朋友的病人的伤心故事。那个病人总是贬低自己，总觉得自己一文不值，甚至不值得活下去。当他最后真的自杀的时候，他是在一堆垃圾上击毙自己的。这就是一个认为自己“不配”享受美的人的情况。

马斯洛还发现，健康的孩子几乎普遍有着对美的需要。他认为，审美需要的冲动在每种文化、每个时代里都会发现，这种现象甚至可以追溯到原始的穴居人时代。

(八)满足基本需要的先决条件

与个人动机有着密切关系的是社会环境或社会条件。在满足基本需要的诸先决条件中，马斯洛举出了这样一些条件：言论自由，在不损害别人的前提下可以随心所欲，质询自由，保卫自由，正义，诚实，公平及秩序。一旦危及这些先决条件，人们就会做出类似基本需要受到威胁时的那种反应。用马斯洛的话来说，“这些先决条件本身并不是目的，但因为它们跟那本身就是目的的基本需要有着如此密切的联系，以致这些条件也几乎成了目的了。人们会保卫这些条件，因为，没有了它们，基本需要的满足就无从谈起，或至少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一些时候以来，马斯洛一直意识到他的动机理论有不足之处。这理论似乎无法解释：既然整个人类是趋向于发展的，为什么有那么多人无法发展他们的潜力？随后，他的思想有了些突破。他引入了“挑战”（刺激）这一外部环境的附加前提条件。他现在认为，人似乎有点自相矛盾，既有惰性倾向，同时又有运动、发展的倾向。他解释道，这部分是由于生理的原因——人需

要休息或恢复。但这同时也是一种心理反应：人需要聚集能量。我们可以从已故的乔治·金斯利·齐普夫博士的广泛研究中找到有关这一观点的科学证据。他那本题为《人类行为与最少努力原则》的书中对这点作了概括。

(孟守义 撰)

【美】弗洛姆：
《爱的艺术》——独树一帜的“爱”的心理学

人皆有洞悉人之奥秘的基本需要，我通过爱而与人相融，由此领悟了奥秘。

——弗洛姆

弗洛姆的著作对于希望深入理解现代心理学的读者们构成了挑战。他的著作有待更多的学习和研究。在他的著作中可以看到一个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人本主义者的影响。

——鲁涅兹

一、弗洛姆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弗洛姆生于德国的法兰克福，出身于正统的犹太人家庭。父亲和母亲都信奉犹太教。在他上中学期间，不合理的现象和集体的歇斯底里终于导致了1914年的世界大战，并激起了他的厌恶和反对。大约与此同时，他亲眼看到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对他后来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影响。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女艺术家，也是他家的朋友，在她年老的不讨人喜欢的父亲死后自杀了。她的遗愿是和他父亲葬在一起。由这个女人的死所提出的问题不断折磨着弗洛姆。她为什么这么爱她的父亲以致于选择了和他一块死而放弃了 she 所容易得到而且熟悉的生活的欢乐？这段经历和它所提出的问题导致弗洛姆进入了精神分析学的领域。他开始研究人类行为的动机。

在海德堡大学，他攻读了哲学、社会学和心理学。在学习期间，他自称为一个地道的弗洛伊德主义者。1922年弗洛姆毕业于海德堡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1923年他入慕尼黑大学研究心理分析，并去柏林心理分析学院，1925年参加国际心理分析协会。1933年弗洛姆应芝加哥心理分析学院邀请，赴美讲学，1934年脱离纳粹统治下的德国，入美国籍，这是弗洛姆人生的转折点。1940年任哥伦比亚大学客座讲师，1941年在美国佛蒙特州班宁大学任教。1941年发表了著名的《逃避自由》一书，一鸣惊人。1947年他发表《为自己的人》（又译《自我的追寻》）一书，开始形成独到的理论体系。1956年发表名著《爱的艺术》，蜚声国际。

1957年，弗洛姆转任美国密歇根州立大学教授，他的学术创作进入旺盛时期：1959年出版《弗洛伊德的使命》，1961年发表《禅与心理分析》，《人能占优势吗？》。1961年，《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这一重要著作问世，使弗洛姆成为著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流派中骨干分子。但他仍然坚持继续作一个职业分析家，直接为病人治疗。

1962年他任美国纽约大学精神病学教授。1962年发表《论马克思与弗洛伊德》。弗洛姆是一位多产的学者，从1963年到1973年继续发表大量著作：《在幻想锁链的彼岸》（1963），《基督教的教条以及其他有关宗教、心理学

与文化之论述》(1963),《人之心》(1964),《社会主义者的人道主义》(1965),《你应有如神明》(1966),《人类新希望》(1968),《精神分析的危机》(1969),《上帝与人的挑战》(1970),《人的破坏性的剖析》(1973),《占有还是存在?》(1976)。《弗洛伊德思想的贡献和局限》(1980),以及后人编的广播讲话集《说爱》(1986)。

二、《爱的艺术》评介

《爱的艺术》1956年由美国哈珀·罗出版社出版,到1981年6月为止,该书仅德文版就发行了将近1,500万册。人们常说,欧洲有H.马尔库塞,北美有E.弗洛姆。在60年代席卷西方的大学生运动以及其后的和平运动和生态运动中,E.弗洛姆一直扮演着思想家和活动家的重要角色。

“爱”历来是文学家、伦理学家、教育家等永恒的主题。然而“爱”的心理实质是什么?古代和近代的西方学者,未能揭示其奥秘。现代心理学家麦独孤把“爱”作为十几种人类本能之一,华生把“惧、怒、爱”并列为人类三种原始的情绪,这些分析,基本上停留在生物学层次上。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1905)和《爱情心理学》(1910—1918)问世,“爱”尤其是“性爱”成了心理学界关注的课题。弗洛伊德在“爱的心理学”上是一个勇敢的拓荒者,但他仍未打破生物学化的老框框。任重而道远,弗洛姆从人道主义立场出发,挑起了探讨爱的心理学基本理论的重担。

《爱的艺术》一书共分四章:第一章爱是一门艺术吗?第二章爱情的理论;第三章爱情及其在当代西方社会的衰亡;第四章爱的实践。形成一个完整的体系。该书对弗洛姆关于“爱”的基本观点阐述得系统而深刻。

(一)“爱”的心理实质是什么?

弗洛姆一针见血地指出:“弗洛伊德的错误是:他把爱仅仅视为性本能的表达或升华,拒绝承认性欲只是人渴望爱及融合的表征。但他的错误远不止于此。与他的生理唯物主义相一致,他提出了这样的看法:人体的化学变化导致了紧张状态,而紧张造成的痛苦迫使人寻求缓解紧张的途径,这样便产生了性本能。性欲的目的即是消除令人痛苦的紧张状态,而性满足则标志它已经被消除。说起来矛盾得很,弗洛伊德所忽略的恰好是性欲的心理——生物基础,即两性分化与通过结合而贯通两极的要求。这种令人难以置信的疏忽或许产生于他极端的父权主义,促使他完全抹煞了女性特有的性欲,得出了性欲具有阳性性质的结论。”

弗洛姆认为,事实上,异性间的相互吸引远远超出性欲吸引的范围。男女二性的分化不仅存在于性功能上,而且也体现在性格的差异中。他写道:“可以这样来刻画男性性格:主动进入,统辖引导,能动活跃,严于律己,大胆冒险。而女性的性格特征则是:主动接受,防御保护,现实主义,忍辱负重,温柔慈爱”。这样一来,弗洛姆对“性爱”的实质的分析,就从弗洛伊德的“生理学的解释”的层次上,提升到心理学的层次上。

弗洛姆进一步指出:“多数人都把爱主要看成是被爱而非施爱,即否认爱即是爱的能力。”人们为什么有这种片面的看法呢?他从社会文化派的视角指出了问题关键所在:“在一种交易倾向居于支配地位,尊奉物质上的成

功为价值标准的文化中，人们的爱情关系不可避免地会遵循支配着劳动市场与商品的交换模式。”于是，人们极大地突出爱的对象的重要性，同时，贬低了爱的能力的意义。

那么，什么是给予？在当代西方社会，其答案因人而异。凡其人格倾向属非生产性者，都把给予视作亏损，因此这类人多半都拒绝给予。而具有生产性人格倾向的人，对给予的理解迥然不同。“给予即潜能的充分实现。正是在给予中，我领略到我的力量、我的财富、我的能力。”给予比获取更令人愉快，他强调：“给予的最重要的方面不在物质财富范围内，它存在于人性特有的领域。……他给予自己的欢乐、兴趣、理解、知识、幽默、伤悲、自己活泼生命的一切表征。他把其生命内容给予出去，由此充实他人，丰富他人；他深入自己对生命活力的感受，由此使他人的生机感振奋兴盛。”

(二) 爱的四个基本要素

弗洛姆从爱是积极能动的力量这一基本观点出发，指出：爱使人克服孤独和分离感，然而又让他仍为他自己，依然佇立于其整体性中。“除给予而外，爱所包含的其他本质要素也充分展示了它活泼能动的性格。这些为一切类型的爱所共同具有的要素是：关切、责任、尊重、知识。”

1. 关切(关怀)

母爱最典型地说明了爱蕴含关切。爱是我们对所爱者的生命与成长的主动关切，不言而喻，爱的本质当为“为其辛劳”，“促其生长”，爱与操劳不可分离。

2. 责任

在今天，责任经常用于指某种外加于人的职责，但本质意义上的责任乃是绝对自愿的行为；是我对他人的要求所做出的积极“响应”。对成人之爱来说。它主要指关切他人的精神需要。

3. 尊重

关怀他人，使其能发展自己，敞亮自己，这即是尊重。尊重只能佇立在自由的基础上，尊重非为恐惧或敬畏。

4. 知识(理解)

尊重人以理解人为前提，没有知识引导的关切与责任是盲目的，但不以关切为动机的知识则是空洞的。除非我超越对自己的关切，设身处地理解他人，否则这种知识根本不会产生。由此可见，关切、责任、尊重及知识是相互依存，缺一不可的。毫无疑问，这四个要素也是爱的心理实质的组成部分。

(三) 爱的几种类型

爱是一种态度，一种性格倾向。爱的对象的不同类别决定了爱的不同类型：

1. 兄弟之爱

弗洛姆是西方基督教博爱精神的信徒。“真诚地爱一个人意味着爱所有的人，爱世界，爱生活。”他信奉《圣经》上“当爱邻若爱己”的教义，指出兄弟之爱不仅是平等者之间的爱；兄弟之爱源于对弱者的爱，对穷人的爱，

对异乡人的爱。人同情弱者，由此而萌生对人类的爱。这种分析已由生物学层次跃升到伦理学层次。

2. 母爱

弗洛姆认为：母爱是无条件的，并不要我付任何代价，只要是她的孩子就行。母爱就是温暖和食物，就是满足和安全的快感。而父亲的爱是有条件的爱。父爱的原则是“因为你满足了我的期望，因为你有责任感，因为你像我，所以我爱你。”弗洛姆给予母爱以最高的评价：“正因为母爱的这种利他性、无我性，人们才公认它为最高类型的爱，最珍贵的情感纽带。”

弗洛姆还断言：从依恋母亲到依恋父亲，以及两者最终的统一，这是一个重要的发展，精神健康和成熟的基础，就存在于这一发展之中。这一发展的失败，就是产生神经症的根本原因，如强迫性神经症，多半是由于单方面地对父亲依恋而产生的；而其他象歇斯底里症，酗酒，自我表达困难，不能现实地对待生活等，则多半是由于单方面对母亲过分依恋产生的。

3. 性爱

众所周知，性爱具有一种兄弟之爱和母爱所没有的排他性。但性爱与“双人利己主义”有原则区别。性爱是排他的，但它存在于对所有人类的爱之中，存在于对所有生者的爱之中，即“排他”与“博爱”的统一。他指出“柔情”与“性欲”不可混为一谈。“柔情”不是像弗洛伊德所相信的那样，是性本能的一种升华。相反，它是兄弟之爱的直接产物，它存在于爱的生理性和非生理性的形式之中。性欲可以被爱情所激发，然而也可以被孤独的焦虑、征服或屈从的愿望、虚荣心、伤害甚至破坏的欲望所激发。

弗洛姆深刻地指出：爱一个人并不仅仅是一种强烈的感情——这是一个决定，一个判断，一个承诺。即意志，它与爱相结合。由此可见，关切、尊重、责任和理解四个基本要素在性爱中也是缺一不可的。充分发挥它们的积极作用，就能克服性爱中排他性、直觉性、冲动性、隐曲性的消极一面，而保留它们的积极一面。

4. 自爱

弗洛姆宣称：“我对我自身的生活、幸福、发展、自由的肯定，建立在我的能力上，也就是说，建立在关切、尊重、责任、知识之基础上。”这是生物学化路线与社会文化派又一次短兵相接。

弗洛姆还指出：“弗洛伊德认为，自私者自我依恋，他把给予他人的爱收了回来并将其全部倾注到自己的人格中。其实不然。自私者确实不能施爱他人，但他也无能力于挚爱自身。”他引证埃卡哈特的话：“自爱者爱人若爱己”。因此，“自爱”与“自私”不可混为一谈。能自爱且施爱于每一人者方可谓人格伟大德行昭彰！

5. 信仰之爱

弗洛姆首先考察了东西方关于“信仰之爱”的两种不同见解：“西方宗教主流认为，信仰之爱本质上就是相信上帝，相信上帝的存在，相信上帝的公正和爱。在这一宗教主流看来，信仰之爱本质上是一种思想经验。相反，东方宗教和神秘主义，认为信仰之爱是一种强烈的感觉，这种感觉来自对于一的经验，来自信仰之爱从日常生活每一方面的体现。”他接着指出：信仰之爱与父母之爱是不可分离的。在人类历史中我们看到——也可以预期同样的发展过程，最初由于弱小而依恋母性的神，然后是对父性的神的服从和依恋，最后达到成熟的阶段。此外，一个人的爱既直接与他跟家庭的关系密切

相连，又受到他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之结构的制约。如果社会结构处于权威的影响下，人关于神的观念必然十分幼稚，远远谈不上成熟。

(四)当代西方社会中爱的蜕变

如果说爱是人们成熟的富有创造性的性格所具有的一种能力，那显然人们无论生活在何种社会，其爱的能力将取决于他们所在社会的文化对普遍社会成员的性格所产生的影响。例如：“将爱当作相互的性欲满足，以及将爱当作‘同舟共济’和逃避孤独的‘避风港’这是现代西方社会最为常见的两种爱的蜕变形式，是社会化的病态爱情。”他尖锐地指出：根据弗洛伊德的理论，全部本能欲望如能得到毫无压抑的充分满足，人就可以获得精神健康和幸福。但是，临床病例显然表明，那些致力于追求无拘无束的性欲满足的男性和女性，不但没有得到幸福，而且还得常常承受严重的神经质冲突或神经症状的痛苦。

弗洛姆的忠告，确实值得当代青年记取，目前西方社会艾滋病患者数以万计，与日俱增，引起了极大的社会惊慌，证实了他的观点。他是反对“性自由”的严肃学者，有人误把他列入性放纵鼓吹者一伙人之中，是必须予以澄清的。

弗洛姆在列举了形形色色的“伪爱”之后，对当代西方社会阴暗面，作了“入木三分”的揭露。“生活完全是为了追求物质享受和人格市场上的成功。我们的人生奋斗所依据的原则是冷漠无情和利己主义(后者常常被贴上‘个人主义’和‘个人首创精神’的标签)。”

(五)爱的实践

弗洛姆强调：“爱，乃是纯个人的体验，无论何人，都只有通过自己的努力去体验。”因此，“爱的艺术”没有什么捷径和妙计良方，它如同一切艺术实践一样，都要达到以下几项要求：

1.要有一定的训练，即除了坚持练习外还要严于律己。

2.要专一。因为当代美国的文化“总是引向一种见异思迁和朝三暮四的生活方式，这是其他社会很难与之相比的。”“人成了贪婪的消费者，渴望着随时去吞噬一切——图画、酒、知识等。”这样一来，“专一”就难能可贵了。

3.要耐心。想一步登天的人不可能学到艺术。不言而喻，闪电战也难以赢得真正的爱情。“不幸的是，对于现代人来说，做到有耐心并不比严于律己和专心致志更容易。”

4.要全力以赴。“在爱的艺术中，只有半瓶子醋的人远远多于真正精于此道的人，其比例超过了其他任何艺术。”总之，要想真正掌握某项艺术，非有献身精神不可，起码也要毕生与之息息相连。

以上是实践各种艺术的共同要求，对于形成爱的能力来说，还有一些特殊要求：

1.一个人获得爱的主要条件是克服其自恋情绪。

“精神错乱者和梦者完全不能客观地看待外部世界。而我们大家都或多或少有点精神不健全，或者说，都在某种程度上处于睡眠之中……它们都是

被自恋歪曲了的现实，只是程度不同而已。”那么，如何补救呢？弗洛姆指出：“客观思维的能力是理性。存在于理性背后的情感态度是谦卑。一个人要能做到客观，要能运用其理性，就得有谦卑的态度，就得从儿时那种对全知全能的梦想上解脱出来。”

2. 实践爱的艺术需要实践自己的信仰。我们必须首先区分理智的信仰和非理智的信仰。理智的信仰来源于创造性的智慧活动和情感活动。对他人有信心的最高形式，便是对人类抱有信心。在此，弗洛姆的人道主义的政治观念和社会观念明显地表露出来了。

3. 要有勇气，即敢于承担风险和敢于承受痛苦和失望的能力。无论是施爱还是被爱，都需要勇气。

那么如何锻炼一个人的信心和勇气呢？弗洛姆认为首先应从日常小事做起。他深刻地指出：“当人在意识中产生害怕无人爱自己的念头时，其实恰好表明，他在无意识中害怕施爱于人。”不言而喻，实践爱的艺术之极为重要的态度问题，就是主动性问题了。

还必须指出：爱的实践不仅是个人努力问题，它受制于此人所处的社会。在资本主义社会，“无论是物质商品还是爱情，都得‘你出半斤，我给八两’，这是资本主义社会中广为流行的最高道德原则。”显而易见，这一基本原则与弗洛姆倡导的圣洁的爱的原则是水火不相容的。但是他也认为：“必须看到资本主义本身是一个非常复杂且不断变化的结构，其间也还有不少个人活动的余地和出污泥而不染的可能。”

弗洛姆毕竟是西方的社会学家和心理学家，他抽象地分析道：“我这样讲，并非希望暗示现存社会体制将永世长存，也并未指望现在就能实现兄弟之爱的理想。在现存体制下，能爱者毕竟是少数，在当今西方社会中，爱只可能是一种边际现象。……如果要使爱成为普遍的社会现象，而不只是极个别的边际现象，那我们非得对现存社会结构进行重大的彻底的改变不可。”

弗洛姆熔社会学、心理学、伦理学于一炉，他不是按照普通心理学教科书框框来著述心理学理论的，他在学术活动上是横跨多种学科、多种流派的一位“杂家”。

总之，弗洛姆的思想观点是多元的，他的基本立场是人道主义的。用他自己的“鉴定”来说就是：“我是一个无神论的神秘主义者，是反对大多数社会党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者，是极端非正统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家。”

在心理学上，弗洛姆批评弗洛伊德的生物学化路线以及性恶论和悲观论；他高举社会文化派的大旗，在西方心理学界令人耳目一新。

弗洛姆的心理观的哲学基础是“人道主义”和“存在主义”，他站在这个立场上对弗洛伊德主义和马克思主义搞调和折中。并把调和折中的理论和成果运用到精神分析学中来。企图走第三条道路。

如果说，弗洛姆对弗洛伊德的“修正”，是强调社会因素对人的影响，以克服弗洛伊德人性论的生物学化观点的片面性的话，那么；弗洛姆对马克思主义的修正，是强调心理因素的作用，用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去“克服”马克思主义的所谓另一种“片面性”。弗洛姆实质上是把马克思主义拉向后退，使它变成一种“人道主义”。因此，我们把弗洛姆的心理学理论体系，称之为人道主义精神分析理论是非常确切的。

《爱的艺术》在西方“爱的心理学”上，独树一帜。反对性放纵倾向，是应当受到欢迎的。在伦理学上，他抨击西方社会“物质丰富、精神堕落”

的丑恶一面，发出了改变现存社会结构的呼声。他力图引导青年走心理健康的道路，不与社会阴暗面同流合污，这种严肃的人生哲理也是值得提倡的。

弗洛姆文笔流畅、说理自然，没有那种板起脸孔教训别人的生硬态度，这也是此书畅销的原因之一。

(六) 弗洛姆心理观的主要局限

弗洛姆鼓吹人道主义，忽视阶级斗争，并有科技悲观论。

在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剖析上，弗洛姆揭示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某些方面，并试图描述这些方面如何影响人格特征，然而他却回避资本主义社会的根本矛盾，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弗洛姆提出社会改革的基础不是解决有关所有制问题，而是要医治病态社会的病态个人，才能进入他的所谓人道主义共有制的社会主义社会。弗洛姆欣赏宗教教义，追求“返朴归真”。弗洛姆还把人性的恶化和堕落归咎于现代社会的技术进步。这样就把属于全社会生产力的科学技术与社会进步对立了起来。

(春鸣撰)

【维】维克多·E·弗兰克：
《人对意义的寻求》——对生命意义的感悟与解答

人不是事物，“人”的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要成为什么——在天赋资质与环境的限制之下——他就成为什么。人在他自身内有两种可能，去实现哪一种是由他自己所抉择的，而非由情境所决定。

——维克多·E·弗兰克

到目前为止，世界上没有一个心理学家像弗兰克那样身临其境地面对死神，实实在在地感受生命，领悟生命。只有在那时，人才体会到什么是“人”，什么是生命的意义。

——F·斯坦姆斯

一、维克多·E·弗兰克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维克多·E·弗兰克(Viktor E.Frankl, 1905~)，维也纳著名心理学家和精神病理学家，一般认为他创立了维也纳精神分析的第三大学派(前两派为弗洛伊德学派和阿德勒学派)。二战前曾任维也纳罗斯儿童医院神经病科主任，1942年被关进纳粹死亡集中营——奥斯维辛。他的理论的主要思想在此受到了苛刻的考验，他在此地的经验为他的理论作了证实。他认为正是这一理论使他在死亡集中营能幸存下来。二战结束后，弗兰克回到了维也纳，仍旧在医院担任神经病学科主任和维也纳医学院神经病理学教授，重新开始研究关于意义意志对人的存在的重要性。为了和弗洛伊德的学说区别开来，他自称为“存在分析”，因存在分析常被不严格地使用，所以后来改称为“意义治疗学”。

战后，弗兰克曾多次访问美国，并在美国哈佛大学和斯坦福大学讲学。他的著作较多，其中《人对意义的寻求》(又译《活出意义来》)一书，是弗兰克最著名的著作。

二、《人对意义的寻求》评介

《人对意义的寻求》虽不是宏篇巨著，却小而不少，读来意味深长，扣人心弦。从中可以了解到他的心理学理论的核心概念和理论的基本思路。读罢作者在集中营生活体验的自述，读者可深深地理解意义治疗学的基本概念，而没有抽象和缥缈的感觉。

弗兰克以一个普通俘虏的身份，阐述在集中营中反复身受的痛苦经验和体认。弗兰克试图从心理学的角度(或观点)来解释营中俘虏们的经历和所作所为。集中营中的生活是为生存而不得不全力以赴的一场硬仗。弗兰克以换营为例，讨论在集中营中挣扎生存时的道德问题。此时营中俘虏不能以普通环境中的道德标准要求自已。换营消息是由官方发布的，表面上是说把一批

俘虏转运到另一个营区，但十有八九“另一个营区”其实是指煤气间。营中病弱而无力工作的俘虏都会遭到淘汰，并被遣送到设有煤气间和火葬场的大型集中营里。淘汰的方法是让全体俘虏来一次群殴或分队格斗。此时，每一个俘虏心中最记挂的便是：努力把自己和好友的名字，排除于黑名单之外。所以他会毫不犹豫地想尽办法弄到另一个人，另一个“号码”来代替他加入换营的行列。弗兰克认为，事实真相只有附属于一个人的经验时才有其深意。为了阐释并帮助没有集中营经历的人，了解和理解身陷集中营的人当时的经验和生还后的感受，弗兰克只能鼓起勇气，写出极其隐私的个人经验，这正是本书的价值所在。

弗兰克所讲述的是他作为普通俘虏的经验(他特别声明，被俘期间，除了最后几个星期外，并未受雇担任营中的精神病医生或是一般医生)。在集中营里，弗兰克的编号是 119104。大部分时间是在铁路沿线挖土和铺铁轨。在一次独力挖掘一条地下水管的通道后，他收到一份“奖金联券”，可以兑换 6 根香烟，这些烟或许没什么意义，但却可以兑换 12 份肉汤，在当时确实可算一道消饥救急的大餐。

弗兰克认为俘虏对集中营生活的心理反应，可分为三个阶段：入营之后的阶段，囚于集中营例行生活的阶段，释放且重获自由之后的阶段。第一阶段的症状是震惊。弗兰克以他自己入营时的情况为例，当火车到达奥斯维辛时，每个人的血液都降到冰点。接着便是幻想逐一破灭。意外的是，大多数人心头渐渐滋生出一股顽强的幽默感和好奇心。尽管有那么多的震惊，但冷静的好奇心使得理智能超越环境，进而能以客观的眼光看待周遭的一切。集中营中的俘虏很快就适应了营中生活。最初的反应经过几天后便有了变化，当事人由第一阶段转入第二阶段——冷漠，无动于衷的阶段。此时，他达到了一种情绪死亡的境地，目睹惨状，已不再把眼光移开。这种心智异常客观的情形，可以说是正常且典型的反应。几个星期的集中营生活，已使之看惯了痛苦死亡和垂死挣扎，再也引不起任何感觉了。每当斑疹伤寒患者死去，众俘虏便来抢死者的外衣、木鞋、一根真正的绳子或死者吃剩的马铃薯泥。俘虏们为抢到东西而高兴。弗兰克总会冷眼看过这一幕，才叫“看护”来移开尸体。一次，弗兰克正好从茅舍小窗口望到台阶上死者以呆滞的眼神盯着他，而他此时则继续嚼着热汤而不含半点感觉，若不是职业的关系，弗兰克对自己当时的冷漠大感惊异，很可能早已淡忘了此事。在集中营中常因细故(甚或无缘无故)而挨打，那种时候，最难受的不是肉体上的痛苦，而是不公正的待遇及暗含的侮辱所带来的精神创伤。每天只有十点半盎斯面包(这是规定的，实际上更少)和一小碗的稀汤，却要在工地上不停地干活受奴役。而且同时还要承受精神压力，时时面对死亡，担心亲人的遭遇。随时随地提心吊胆，力图自保的日子，很容易使俘虏内在生活倒退到原始状态。俘虏最常梦到的是面包、蛋糕、香烟以及舒服的热水澡，有时即便是恶梦也不可能比集中营的残酷现实更恐怖。渴望食物成为营中俘虏最主要的原始本能，也是其精神生活的重心。大多数人工作时，只要彼此距离近，且未受到严密监视时，便大谈起食物来。未曾身临其境的人，很难想象一个饥火中烧的人内心的挣扎和意志力削弱的情形。营养不良使人神往于食物，很可能也是性冲动阙如的原因所在。即使在梦里，对“性”仿佛也兴趣缺乏。近乎原始的生活，仅仅为了自保就得使出浑身解数的生存环境，使得俘虏完全漠视于自保无益的其他事物。这是普遍缺乏感情的原因所在。在集中营里，普遍存在一种“文

化冬眠”现象，但对政治和宗教则是两个例外。营中处处有人毫不间断地谈论政治。宗教信仰的深度和活力令人难以想象，最典型的要算即兴的祈祷或弥撒了。集中营中甚至还举行过“招魂会”。弗兰克认为，生活在集中营里，精神生活还是有可能往深处发展，使人能无视于周遭恐怖，潜入丰富且无挂无碍的内在生活当中。惟有此才能解释令人困惑的现象：看来弱不禁风的俘虏，反而比健硕粗壮的汉子还耐得住集中营的煎熬。为了让读者易于理解，弗兰克用自己的亲身经验进行了说明。在那艰难的岁月里，弗兰克一直想念着他的妻子，与妻子进行精神晤谈，即使弗兰克根本不知道他妻子是生或死。

弗兰克认为，强化内心生活，使营中人遁入过去，把前尘往事一一加以美化，使得人满心渴望再度身临其中，内心生活的活络使俘虏对自然和艺术的美也会有前所未有的体验。在美感的影响下，有时连自身的可怕遭遇都会忘得一干二净。弗兰克与难友们就曾一起欣赏过大自然的美景，甚至大家一起跑到集合场地去看夕阳，并为之心醉情痴。集中营里不时举行一些业余节目。节目中有歌唱、诵诗、讲笑话等，有的还暗暗讽刺营中的人和事。这一切，全是刻意要帮人们忘忧——也确实有所帮助。有些俘虏就因为这种节目很有消愁破闷之效，才不惜拖着疲惫的身子或冒着分不到当日口粮的危险而争先往观。不过集中营里的艺术活动通常有些怪异。为求自保，幽默感是另一项精神武器。弗兰克曾实地训练一位与他并肩做工的友人的幽默感，建议他俩每天至少要想出一则与获释后可能遭遇到的情况有关的趣闻。别的难友有时也会假想一些与未来有关的趣事。在集中营中，一件极其琐碎的小事，也有可能引发莫大的喜悦。弗兰克举了好几个例子来证明这一点。就连只在寝前有时间捉身上的虱子，俘虏们也高兴得很。集中营生活中的贫弱的欢娱，为大伙提供了消极的快乐。

弗兰克重获自由后很久，一位友人拿着一张画刊给他看，上面登了几张照片，全是集中营俘虏挤躺在木板床上，眼光呆滞地盯着一名访客的镜头。友人认为很可怕，那种呆滞表情底下隐含了恐怖。而弗兰克则不那么认为，或许照片中人根本就不觉得难受。弗兰克并举例说明，它只在与当时当地的情境相连时才有意义。在集中营里，每个人都努力往队伍中心挤，一则较能免挨揍(警卫总在队伍的前后两侧走)，再则也可以避风。拼命挤进队伍里头，为的是自保，每个人随时随地，尽力避免引起挺进队员的注意。但在团体中生活，若一举一动都要受到监视，就极端渴望离开团体，俘虏渴望独处。弗兰克从自愿前往斑疹伤寒区后，才有了独处的机会。集中营里人命究竟多么不值，局外人通常难以理解。当病人衰弱的身体被扔上马车，由别的俘虏送到下一个集中营时，若在马车离开前哪个病人死了，照样要丢上马车，因为名册上要正确无误。一个人的价值就在于他有一个俘虏号码，因而不愿走的人偷偷与别人的号码对换就行了。弗兰克在奥斯维辛时，暗订了一个规则：一切问话照实回答，若不明确就缄口不答，问到年龄据实回答，问到职业答曰“医生”但不详细答复。这规则屡经考验，效果良好，使他躲过了德黑兰死神的召唤。在集中营里，大家都强烈感觉到命运是人的主宰，人不能企图改变它。在生命攸关需要作出决定时，大家都宁愿由命运替他做主。弗兰克就曾因是否逃亡而深受困扰，可是最后直到他决定留下来陪伴生病的乡亲时，才心感快乐。一般俘虏不必特别去想，就都感到自己的价值已全然贬低。相反那些“酷霸”、伙夫、仓库管理员、营警则不同，自以为升格了。这种对比使二者之间一旦发生冲突，后果便十分吓人。在斑疹伤寒病患区时，弗

兰克因舍监病倒，只好临时暂代舍监，负责保持房舍的清洁，检查员所关心的是走道中央有没有一根稻草，病人的毛毯是否折叠整齐，至于病人的命运如何，压根儿不管。每次只要听到弗兰克报告完人数，便立刻离开。

弗兰克认为，集中营中的生活经验表明，人的确有选择的自由，而不是面对环境别无选择。在任何境遇中选择自己态度和生活方式的自由是不可能被剥夺的。营中俘虏变成什么样的人，实在是他内心抉择的结果。一个可以期待的未来目标，是人在处境极其艰难时的一线生机。弗兰克深有体会，当他把思路转向另一主题，弗兰克仿佛看到自己在讲台上，面对全场来宾进行演说，演说的题目则是关于集中营的心理学。这样一来，自己及自己所受的苦难全变成一项有趣的心理研究题目了。弗兰克就是用这种办法让自己超越困境的。对自己的未来失去信心的俘虏，必然难逃劫数。弗兰克举了一个例子：一位舍监，满怀希望地相信他梦中对战争结束可以获释的预许，可是传到营区的战讯却全不像是即将在预许当日获释的样子。于是在预言战争结束的日子的前一天，他突然病倒，第二天，他死了，从外在迹象看，他死于斑疹伤寒。

弗兰克引述尼采的话：“懂得为何而活的人，几乎任何痛苦都能忍受。”有一个活下去的目的，才能增强人忍受“任何”煎熬的耐力。弗兰克认为，真正需要的是从根本上改革我们对人生的态度。人应该认清一个事实：“真正重要的不是我们对人生有何指望，而是人生对我们有何指望。我们不该继续追问生命有何意义，而应认清自己无时无刻不在接受生命的追问，面对这个追问，不能以说话和沉思来答复，而该以正确的行动和行为来答复。”人一旦看透痛苦的奥秘，反而会把痛苦看作是值得承担的负荷。营中自杀的人都有典型的论调：他们对生命再也没什么指望了。弗兰克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当事人了解“生命对他仍有所指望，未来仍有某件事等他去完成”。这指望或工作是他人无法取代的，它使每个人与众不同，也使得每个人的存在有其意义。只要知道自己有责任为某件尚待完成的工作或某个殷切他早归的人而善自珍重，人必定无法抛弃生命。一次，一名不与当局同流合污的舍监，安排了一场集体精神治疗。那天大家在集合场上听训，当局宣称，今后许多行为哪怕是微不足道的，也要立刻以吊刑处决。同时要大家交出一名偷马铃薯泥的俘虏，否则全营挨饿一天，全营二千五百名俘虏宁愿绝食一天。当晚，大家心情恶劣到了极点。舍监指出几天来因病或自杀而死的许多难友，其真正的死因是在于放弃了希望，并让弗兰克替大家打气。弗兰克指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一切可以重整旗鼓，毕竟一身硬骨还在，过去不管经历了什么，都可以成为来日的一笔资产(弗兰克引用尼采的“打不垮我的，将使我更加强”)，大好的时机有时往往乍然降临——至少降临到某个人身上。接着又谈了许多能使人生命有意义的机会，谈到痛苦和牺牲的价值。这番努力发挥了极大的效果。为何同样是有血有肉的人却用尽各种残酷的手段来凌虐别人？弗兰克指出：警卫中就有几名临床医学上的虐待狂，而大多数警卫在多年来目睹过多的残酷手段后，感觉迟钝了。众警卫中也有几个对俘虏甚为同情，所以不能草率地用二分法来断定谁是天使，谁是恶魔。身为警卫或监工，却能善待俘虏；而同为俘虏却虐待难友。这说明，世上只有两种人：正人君子与卑鄙小人。

弗兰克阐述集中营俘虏心理反应第三阶段——获释后的心理。当营区当局终于宣告投降时，营中俘虏的心境随即由极度紧张转为全然松懈，当他们

走出营区时，却无法领略自由的真正含义，大家没有感受到快乐。这获释后的反应，按心理学观点，便是所谓“人格解体”所致。获释后有一种“非说不可”的感觉，说话的欲望不可抗拒，当心头的重荷宣泄够了后，才真心感到轻松起来。弗兰克在获释几天后的某一天，曾在乡野广阔的大地上跪了许久，当时在他的心里多次重复着一句话：我从窄小的牢狱里向天主呼号，而它在广袤的苍穹间答复了我。弗兰克谈到，从那一刻起他的新生命开始形成，直到重又成为一个真正的人。营中的人们一旦突然解除精神压力，精神健康也一定面临考验。有一种人一旦获释就自以为可以随心所欲，且毫不留情地使用自由，极易导致道德畸型。同时有的人在回复正常生活时易产生愤恨和幻灭，这也有可能破坏获释者的人格。当获释的日子终于来临，每样事物看起来都像一场美梦。也终有一天，一切集中营的经验在他看来，也将不过是一场恶梦。

弗兰克把自己创建的学说，称为“意义治疗学”，并解释为何使用“意义治疗学”(logotherapy)一词作为他的理论术语。logos 是希腊字，表示意义(meaning)。意义治疗法或如某些学者所称的“第三维也纳心理治疗学派”，其焦点放在“人存在的意义以及人对此意义的追寻”上。弗兰克申明他提的“求意义的意志”与弗洛伊德的“快乐原则”和阿德勒的“求权力的意志”大不相同。弗兰克认为，人有寻求生命存在意义的欲望，这便是求意义的意志。它是人生命中原始的力量，而不是由“本能驱策力”造成的“继发性的合理化作用”，这个意义是唯一且独特的，当它在人的实践中被发现获得时，人求意义的意志就得到满足。一个人求意义的意志遭受挫折即“存在的挫折”。存在的挫折能导致神经症，弗兰克称之为“心灵性神经症”。心灵性神经症不是由“驱策力”与“本能”之间的冲突引起，而是由于不同的价值冲突引起，即来自道德的冲突。患者有一种“存在性失望”。意义治疗的目的在于协助患者找出他生命中的意义。除非人体认识到他的生命有一种意义，否则没有什么东西能帮助人在最坏的情况中还能活下去。他引用尼采的名言：“参透为何，才能迎接任何。”弗兰克以自己为例：被抓进奥斯维辛时，正准备出版的《医师与心灵》原稿被没收，为了再次写出这本书，竟帮他活着度过了集中营的严酷，克服了令人崩溃的危机。弗兰克认为心理健康基于其种程度的紧张：人“已经达成”与“还应该完成”二者间的紧张；或人“是什么”与“应该成为什么”之间的紧张。这种紧张是人类生命中固有的一种属性，为心理健康不可或缺的条件。心灵动力在紧张的两极之中，一极代表需实现的“意义”，另一极代表必须实现此意义的“人”。

弗兰克认为，存在的空虚主要的表现是无聊厌烦。从内在而言就是感到生命无意义。弗兰克认为，不是人去问他的生命意义是什么，而是“他”才是被问的人。每一个人被生命询问，而他只是用自己的生命才能回答此问题，只有以“负责”来答复生命。每个人的生命是具体现实而独特的，一个人不能去寻找抽象的生命意义。必须让病人自己体会到他的责任，让他自己抉择为了什么，对什么人或什么事负责。必须让他自己负责实现他的潜在的生命意义。生命的意义必须在世界中去找寻，而非在人身上或内在精神中找寻。人无法在所谓“自我实现”上找到人类存在的真正目标，人类存在的本质是要“自我超越”。人能以三种不同的途径去发现这个意义：(1)创造，工作；(2)体认价值；(3)受苦。由此去实现“自我超越”。爱是进入另一个最深入人格核心之内的唯一方法，它可以使所爱者真的去实现那些潜能，使他理解到

自己能够成为什么，应该成为什么，从而使他原有的潜能发挥出来。弗兰克认为一个人面对无法改变的命运时，他就等于得到一个最后机会，去实现最高的价值与最深的意义，即苦难的意义。这时最重要的是：他对苦难采取什么态度？用怎样的态度来承担他的痛苦？弗兰克认为，人主要关心的并不在于获得快乐或逃避痛苦，而是要了解生命中的意义。这就是为什么人在某些情况下，宁愿受苦，只要他确定自己的苦难具有意义即可。当然痛苦必须是绝对必须，否则它就没有意义。弗兰克他在集中营中的体验证明了这一点。今天医师愈来愈多地面临这一问题：生命是什么？他不断地遭遇到的人类问题是哲学问题，而非仅仅情绪冲突问题。弗兰克通过对患者团体进行戏剧意义治疗，即在治疗性团体中提出问题，让患者设想生活在未来之中，回顾过往生活的经历，帮助患者在短时间内看到其生命的意义，这意义甚至包括了他所有的痛苦。

弗兰克认为人所要求的并不是要忍受生命的无意义，而是要忍受自身没有能力以理性抓住生命的绝对意义。弗兰克在此允许有超越并凌驾于人类之上的另一个层次的存在。认为如果患者具有坚定的宗教信仰，就应该借助他的宗教信仰及精神力量来发挥医疗上的效果。生命中唯一真正短暂无常的部分是它的潜力，这些潜力一旦成为事实，立刻就变成过去，过去将永恒存在，因而它们就从短暂性中被保存起来。事物的短暂性构成了我们的责任感，人必须不断抉择，人要决定什么样的事物，成为他存在的里程碑。意义治疗发展出一种“矛盾取向法”的技术，这种方法使病人的态度颠倒。弗兰克举了几个例子来说明这种方法的疗效。但弗兰克指出，作为一种技术不可能彻底解决问题，除非引导病人再度发现生命意义及天赋使命。每一个时代都有集体性的神经症，同时每个时代都需要它自己的心理治疗法来应付之。现时代的集体神经症可以说是“存在空虚”。“存在空虚”是一种个人性的“虚无主义”（可界说为“生命没有意义”），与之相应只能用意义治疗来处理这类问题。

弗兰克认为“泛决定论”比“泛性主义”更错误更危险。“泛决定论”忽略了人面对任何情况时有采取自己立场的能力。人并非完全被决定。人不是仅仅活着，且总是要决定他的存在到底应成为什么样子，下一刻他到底要变成什么。一个无法治疗的心理疾病患者很可能失去了他的“有用性”，但是仍然保有作为一个“人”的尊严，即使是神经症或精神病患者，也都保有残余的自由。如果病人再也没有人性的尊严，那么精神医学就无意义了。弗兰克认为人不是事物，“人”最终是自我决定的。他要成为什么——在天赋资质与环境的限制之下——他就成为什么。正如在集中营这个生活实验室与考验场中，有些难友像个恶棍，有些却宛如圣人。人在他自身内有两种可能，去实现哪一种是由他自己所抉择的，而非由情境所决定。

(周守珍撰)

【瑞】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寻求灵魂的现代人》——树起一面分析心理学的旗帜

毫无疑问，潜意识是神经症的主要原因，梦是潜意识的直接表现，梦就必定有其实际的意义，这一实际意义也许正是各种神经症的初始原因。在每一个人的心理深处，对个人起着重要作用的是“情结”。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

荣格以自己鲜明的理论，明确地表明了他和弗洛伊德的理论具有明显的分歧，他在精神分析学领域里，以自己的理论体系树起一面分析心理学的旗帜，以一个不同的学派、全新的面貌出现在世人的面前

——尼尔逊

一、卡尔·古斯塔夫·荣格的生平与成就

卡尔·古斯塔夫·荣格(C.G.Jung, 1875~1961)，瑞士心理学家，分析心理学的创始人，1875年7月26日出生于瑞士的开斯威尔，其家庭是一个牧师之家。荣格从小受到十分强烈的宗教影响(这对其以后关于集体无意识等神秘思想观念的提出不无关系)，1900年，获巴塞尔大学医学博士学位，1902年，又获苏黎士大学医学博士学位。接着，在苏黎世大学，投身在当时著名的精神病医师布鲁尔的门下，研究精神分裂症，在此期间，他也曾到法国跟著名精神病学家研究歇斯底里症和多重人格。1905年返巴塞尔大学任讲师，数年后辞职，自己开业行医并从事写作。1900年，弗洛伊德的《梦的解析》出版后，荣格很感兴趣，并且很崇拜弗洛伊德。1909年，与弗洛伊德同时应美国克拉克大学的邀请赴美讲学，1911年，在弗洛伊德的支持下，当选为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被认为是弗洛伊德的继承人，有“王储”之称。但后来，荣格与弗洛伊德在学术观点上发生分歧，主要是1912年荣格发表《潜意识的心理学》一书。1913年，在国际精神分析会议上两人的分歧进一步加深。弗洛伊德宣称，荣格不再是精神分析学者。1914年，荣格辞去了国际精神分析学会主席的职位，并退出了学会，且与弗洛伊德中断了友谊，两人关系破裂。至此，荣格创立分析心理学，成立了分析心理学派，提出集体潜意识概念。他为了研究集体潜意识，于20年代后去非洲、美洲等地对原始部落进行考察，后来，获得哈佛大学、牛津大学的荣誉博士学位。

荣格的主要著作有《力比多的象征和转化》、《潜意识心理学》、《心理类型学说》、《分析心理学的贡献》、《寻求灵魂的现代人》、《集体无意识的原始模型》、《分析心理学的理论与实践》、《人格的结构》、《心理治疗学的实践》、《记忆、梦和思考》、《人及其象征》、《心理学和东方》等。

荣格的心理学理论已经远远超越了精神病的狭窄范围，进入广阔的社会领域，涉及社会、历史、宗教、哲学、文学和艺术等领域内的重要问题，并

对这些学科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当然，其理论也并非十全十美，他的生命力概念非常玄妙，令人难以捉摸。他的整个理论带有浓厚的神秘主义色彩。但是，并不能由此而否认荣格作为一位杰出的分析心理学家在心理学史上的光辉成就。

《寻求灵魂的现代人》是荣格最有影响的著作之一，该书是他 1930 年前后发表的 11 篇论文集册成书，于 1933 年用英文出版。正是荣格脱离精神分析学会，独创分析心理学派后的著作。

二、《寻求灵魂的现代人》的评介

荣格对科学有一股不懈的追求精神，他不怕冲破传统，他唯科学，即使在他和弗洛伊德中断个人友谊之后，但他对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理论并不抛弃。在《寻求灵魂的现代人》这本书中，他对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继承性的批判和根本性的发展，对精神分析的基本概念和理论体系都赋予了自己的理解和新的涵义，形成了自己特有的理论体系。在该书中，荣格从精神分析学派赖以建立理论大厦的基本手段——梦的解析出发，精辟地分析了心理学的各个问题。由梦的解析论及潜意识，由人生类型论及与弗洛伊德根本分歧的焦点，从集体潜意识论及宗教、文艺等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的问题。

在认为潜意识是神经症形成过程中起主要作用的观点的基础上，荣格详细阐述了梦及析梦的原理和作用。在他看来：毫无疑问，潜意识是神经症的主要原因，梦是潜意识的直接表现，梦就必定有其实际的意义，这一实际意义也许正是各种神经症的初始原因。因此，寻找出这一意义所在，对于治疗神经症具有非常重大的意义。于是，对梦进行分析也就变得合情合理和势在必行了。因为梦的内容能够准确无误地揭示出那些作为神经症诱发因素的潜意识内容，而治疗效果正是由此获得的。

在析梦的实践过程中，会发现梦有许多特征和问题。首先，梦所展示的常常是一幅主观状态的真实图画，是不受意识观控制的无意识的心理过程，但人的意识却会否认这一点。因此，在析梦的过程中，荣格把梦看作极有价值的事实，不仅提供他所希求于梦的情况，而且提供一种治疗的预后。更为重要的是，还能指使治疗者的治疗从何开始。

其次，在析梦的过程中，由于梦在开始治疗后会变得更加模糊，从而使对梦的解析更加困难。那么此时，治疗医生就不能勉强地去理解梦，而要和病人达成一致，进行双方联合的反省。否则，歪曲地理解，暗示性地说教，将会对病人的性格独立有很坏的影响。因此，在析梦的过程中，应该注意的第二个问题就是治疗医生在治疗的进程中，能够发现并承认投射作用以及自己遇到的困惑和混乱，并对病人避免使用暗示疗法。

第三个问题即确立梦的前后关系。在梦的分析和解释工作中，最首要的事情并非对梦加以机械地理解和进行解释，而是应确立梦的前后关系，并凭借梦中的自身意象来发现梦的意义。通过对一系列梦的解析而达到治疗的目的。

荣格在阐述完析梦的三个过程之后，又强调了在实际的释梦过程中，必须注意的两个问题：一是必须保证意识人格不受到伤害，因为只有意识人格参与合作时，才可能将心理中的无意识补偿转化为良好的结局。二是在对待梦中的象征问题时，需把梦者的哲学、宗教以及道德信念都纳入考虑的范围，

即把象征同意识状态联系起来，在这种联系中寻找象征的意义，也就是说，把象征当做没有固定的东西来对待。

由于精神分析的广泛影响，各种心理治疗都被当作是精神分析，由此，各家学派不得不贴上自己标签，如“个体心理学”、“分析心理学”实际上都是心理治疗的又一种方法或派系。同样，荣格的分析心理学在心理治疗的问题上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承袭了精神分析的理论，但其治疗原则与体系都有自己鲜明的特色。他将心理治疗的过程分成四个阶段：一、倾诉阶段：各种心理秘密引起人们的长期压抑而导致人们患上了各种神经症，在治疗这样的神经症中，首先必须使之宣泄出来。“放弃你所有的，然后你才能获得。”通过彻底的倾诉，放弃心中的秘密，不仅在理智上承认那些压抑于心中的事实，而且以心灵来巩固这些事实，真正地释放出被压抑的感情，这样，才能迈出心理治疗的第一步。二、解释阶段：倾诉并非万灵之药。如果治疗只停留在这个阶段，那么首先，它并不总能够使病人与无意识紧密接近，从而使他们发现自己的阴影；其次，一些病人在症状痊愈之后，却沉迷于自己精神的内在深处，不断进行宣泄，与无意识连在一起，无法分开。这两种情况都是治疗过程中出现的固置现象。固置现象又会导致出第三种病况，即其固置倾向以移情的形式表现出来。对这样的现象，借助倾诉的方法已经不能带给治疗以任何结果了，这时候可借助弗洛伊德的“解释疗法”：巨细无遗地对人的阴暗面进行阐释，这种还原的解释法，将人向下和向后引导，如过分或片面应用会产生破坏性的影响。但是，通过恰当的解释过程之后，一种正常的适应和对自己缺点的容忍将会与病人的道德原则一致起来，而导致的结果是能够让其离开潜意识，于是第二个阶段的工作就已经完成了。病人此时面临的问题则是第三个阶段的工作：教育——如何被教育成一个社会性的人。对于那些有充分的动力把自己推向前进的人来说，能够洞察自身就足够了。而对那些在道德价值上缺乏想象力的人来说，自身洞察根本不足以解决问题，解释只能使他们做到对病情的理解，对病情的治疗却依然无能为力。在弗洛伊德的“解释疗法”阶段后的空白处，其学生阿德勒进行了填补：他修改了弗氏的治疗程序，以一个教育家的身份出现，尝试每一种教育方法，帮助那些已经学会了内省自身的病人找到一条通往正常生活的道路，以使他们变成正常适应的人。这一方法也正是荣格的心理治疗过程的第三个阶段的任务：以适当的教育，通过一种教育意志把病人推向正常的生活道路。

到此为止讨论的三个阶段是互相依存，不可替代的。第四个阶段——转变阶段也同样如此，它的作用是弥补前面三个阶段所遗留下来的亏空。由于人的需要是各不相同的，使一个人获得解放的东西对另一个人而言则可能是监狱，如通常意义上的正常和适应。因此，需要治疗医生指导和说服病人按照其独特的病情作出相应的转变，而并非朝千篇一律的所谓正常发展。所以在第四个阶段，不仅仅要求病人方面的转变，而且还要求医生也有所转变，反过来在自己身上应用他给病人所开列的一套治疗方法。因为，在治疗中医生的人格和病人的人格都对治疗有很大的影响，如果医生希望在每一次心理治疗中，都对病人有所影响，那只有在自己也被影响的情况下才会发生。若不接受影响，就不能施加影响。医生想避免这种影响是毫无用处的。如果医生希望确保自己对病人有适当的、良好的影响，那么，他就必须始终一贯地去满足自己的治疗要求，把自己塑造成为他想塑造病人成为的模式。这样，心理治疗就不仅成为单纯地对病人进行治疗，也包含了医生的自我完善过

程，这也就意味着心理治疗对健康人也同样有所帮助，分析心理学的用途也就更为普遍了。

文章开头首先肯定了弗洛伊德和阿德勒的理论体系，把他们的理论和荣格自己的理论都看作是针对某种倾向的理论体系的倡导者。然后，荣格指出，心理治疗的目标应该符合这样一个事实，即同一事件对年轻人表现为一种意义，对年长者又表现为另一种意义。所以，在心理治疗中，各种标记如年龄、心理构造倾向、心理功能对其他功能的支配，精神或物质的倾向等都应成为采取不同治疗方法的区别标志。当然，这些标记并不就意味着哪种标记就可以指定哪种治疗方法，心理治疗还远未达到如同医学那样的明确程度，这些标记在治疗中可以发挥的作用被分为两大类：内倾型与外倾型。内倾型的人在投向主体的心理过程中，喜欢探求内心世界，侧重主观体验，表现为沉默寡言，不善思考；而外向型的人，心理能力引向外部世界的表象中，往往将注意力指向与他人交往，活跃开朗，对一切都感兴趣。内倾或外倾作为一种典型的态度，制约着个体的整个心理过程，建立起习惯性的反应。但是，由于同一类型的人之间仍然存在着巨大的差别，仅用两种类型概括所有的人，显然是无法进行精确描述的。于是，在论及差别类型的同时，荣格又提出了四种不同的心理功能，即思维、情感、感觉和直觉。感觉确立起实际给定的事实，即存在什么东西；思维使我们认识到它的意义；情感告诉我们它的价值；直觉则指出这些事实何去何从的各种可能性。将心理结构的二分法与心理功能的四分法相结合，便构成了8种不同的心理类型。

在《现代人的精神问题》中，作者主要论述了几个问题：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的特征；现代西方社会的状况；西方人的精神问题以及古老的东方神学、心灵学对西方的影响。真正的现代人有最强烈和最广阔的意识，他远离那些与人类群体共同施行的“神秘参与”，远离于被淹没在共同的潜意识之中的命运，他与原始古朴的集体潜意识彻底地决裂。现代人是一个孤独的人，与完全生活在传统圈子内的人类群体分离了出来，他必须要走到世界的边缘，完全清醒地意识到现在这个时代，才能成为真正的现代人。并且，他还必须具有一种高度的意识，必须头脑健全，多才多艺。

但是，作为一种品质，现代人所具有的现代意识，有其优点，同样也有其缺点：现代人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心理上遭受了一种致命的震动(世界大战的打击)，他们陷入一种深刻的不确定状态中，与自身发生了冲突，并且由于世界大战灾难性的后果，导致现代人意识观内的革命。使人们对自己和自身价值的信仰土崩瓦解，其导致的怀疑主义又使得他们难以将心理能量顺利地运到外部世界中去。结果，现代人只能把他们自己扔回到他自己那儿去，使心理能量流回它们的源头。在这种不确定性中，现代人只能以物质的保障，普遍的福利和人道、高尚的理想来代替以往确定性的位置。但是，物质上的每一次进步，又都可能造成一个更大的灾难，对人类产生更大的威胁。于是，现代人又将其注意力从物质转向他自己的主观心理过程，期待着从心理生活中得到从外部世界中所没有得到的东西。这种东西本应是在宗教中找到的，然而，现代人却认为，宗教的形式已经不再是他们心理生活的表现了，而东方古老的唯灵论、占星术、通神学却似乎是能够成为他们注入心理能量的场所了。于是，这类行业蓬勃兴起，其教义建立在无意识的基础之上，且道德说教从不回避生活的阴暗面，在人们已经不再把心理能量注入陈旧的宗教形式的背景下，它们拥有着宗教的真正性质，代替着宗教发挥作用。

同时，东方的各种教义精神，在现代人倒向心理生活的真实性，并期待世界拒绝给予他们确定性的时代大背景下，正潜移默化地向西方挺进，以它的潜意识力量改变着自下而上的现代人。它深入进现代人的内心之中，从其自身心理生活的深渊中升起一种新的精神形式。这些新的精神形式将成为各种心理力量，帮助现代人获得新的生活。总而言之，无论是各种通神学还是东方精神，都是现代人典型的精神问题的体现，是心理生活对现代人呈现出越来越重要的作用的产物。

该书在最后这一篇文章中，视角从前面的纯粹理论探讨的角度，从整个大心理学的角度转到了实际的针对治疗各种神经症中所出现的问题进行研究。文章首先指出心理神经症的原因既有遗传、气质、细菌感染等因素，同时还具有内在的心理因素，这些心理因素可能是驱力或本能等。

神经症的问题在于精神的停滞和心理的贫乏，他们所需要的是能使他们继续生活下去的一种体系或终极真理，这些体系或真理就是信用是某一个方面的警戒和预防。在具体的治疗过程中，医生还要注意的问题是最好不要有一个固定的治疗目标，而应让纯粹的经验去决定治疗的目标。这种没有固定的目标并不是指医生不去做那些可能使病人的生活变得正常和理智起来的事情。事实上，如果能够的话，这就是治疗的目的了。但是，当这一目标的达到也仍然不足以解决病人的问题的时候，医生所选择的途径就要更多地涉及病人如何发展创造性潜力的问题了。这就必然要借助于非理性治疗（这类特殊的病人所要求的并非是俗世的正常生活，对他们用理性的治疗方法是难以取得效果的），而非理性的重要方法就是释梦，借助梦的参与，释梦的过程是否有效，是否能产生感奋的效果，是否能帮助病人去找到那些激发他们的东西就是真正的治疗效果。

在治疗的技术方法上，基础是自由联想，更高层次的则可以运用绘画，画出梦中所表达的幻想和情感，把这些潜意识内的东西提升到有意识行为的地位上来。病人通过绘制一幅具有象征色彩的画面而得以从一种痛苦的精神状态中解脱出来。这样，他就不需要再去寻找心理医生，或依赖于他的梦了。结果，标志心理成熟的宝贵的东西——独立性就增长起来了。除此之外，绘画还能展现出一个共同的特征，即它不仅反映出个人的潜意识，同时，还反映出一种原始的象征意义，即集体潜意识。这些图画深入过去，把原始的那部分心理也表现出来了，从而缓和了原始心理加在现实之上的那种令人惶惑不安的影响。当然，陈述绘画在治疗中的作用，并不是指它就能治疗一切心理问题。除此之外，还有很多工作需要做，才能达到更好的治疗效果，这将有待于进一步挖掘和发展。

在《心理学的类型理论》里荣格首次提出了心理类型的外向与内向两分法。

荣格认为，在每一个人的心理深处，对个人起着重要作用的是“情结”。荣格把它作为划分心理类型的标准，按照这个标准，人的心理类型信仰、爱、希望以及理解，而它们是既不能被传授、学习、索取，也不能被压抑、赢得，只能通过经验才能获得，而经验又不能制造。于是，心理医生所面临的问题就是怎样使病人在获得经验之前，得到唯有经验才能给予他的东西。

事实上，与精神痛苦问题最相关的应该是牧师。大多数的精神病人，尤其是进入到人生后半部的病人，他们的问题都是最终找到一种关于人生的宗教观。无疑，他们是病了，他们丧失了每一个时代的活的宗教给予追随者的

东西。因此，需要这样一种宗教，需要牧师。然而，由于牧师缺乏专业的心理学知识和洞察力，并且似乎也没有充分地准备起来，以解决时代迫切的心理需要。于是越来越多的人远离宗教(尤其在受教育阶层)，而伴随宗教生活的衰落，神经症就更为频繁地增长起来了。帮助他们，治愈他们，这付沉重的担子就落在心理医生的肩上了，而心理医生怎样才能担负这一重任呢？在这里，最重要的并不是心理治疗中的技术问题，而是精神治疗医生在工作中应采取的态度问题。在荣格看来，态度远比理论和方法重要。医生必须具备一种不带偏见的客观态度，必须同这个人的心理生活相接触，并接受病人的一切包括优点和缺点。这样，才能真正为其提供指导，并帮助他，这同时也就意味着医生必须接受一切邪恶。甚至包括自己在内的邪恶，因为只有完全接受了自己的人，才可能具有不带偏见的客观性。

(曾红 撰)

【俄】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给授业者解惑的名作

我认为教学和教育过程有三个源泉：科学、技巧和艺术。谁要领导好教学和教育过程，谁就要精通教学和教育的科学、技巧和艺术。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是活的教育学，是学校生活的百科全书，是教育工作的经验之谈，也是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的教学指南。

——罗科索夫斯基

一、苏霍姆林斯基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瓦·阿·苏霍姆林斯基(Вацув Арекапобуй Сухоумнцку，1918—1970)出生于乌克兰克缅丘格市帕夫雷什镇一个贫农的家庭。1935年师范学校毕业后回到家乡的一所小学担任教师。在这期间，他一边从事教学工作，一边以函授的方式在波尔塔瓦师范学院语言文学系接受高等师范教育。1939年取得中学教师的合格证书，调奥努夫列耶夫卡完全中学任教。

苏联卫国战争爆发后不久，苏霍姆林斯基应征入伍，在前线部队担任政治指导员。翌年2月，身负重伤，住院治疗。出院后，他曾请求重返前线，但司令部考虑到，炮弹的碎片仍然留在他的胸部，不宜于继续服役，便决定让他重返教育部门工作。先后担任中学教师、中学校长、区教育局长等职。1948年改任帕夫雷什中学校长，他在这个岗位上一直工作到逝世为止。

帕夫雷什中学原是一所不为人们注意的普通农村中学，在战争年代又遭到过严重的破坏，条件较差。苏霍姆林斯基到任以后，竭力改善学校的物质条件和学生生活的环境，全面关注学生的学习和成长。同时，还筹办了“快乐学校”，为即将进入小学的6岁儿童进行预备教育等等。很快就在教育实践和教育理论探索方面取得了重大的成就，引起了苏联教育界的广泛注意。1950年，乌克兰共和国最高教育研究机构和基辅师范学院选拔他为在职研究生。在完成学习任务后，获得了副博士学位。

1957年，苏霍姆林斯基被选为俄罗斯联邦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两年后，又获得了功勋教师的光荣称号。他在帕夫雷什中学的成就和经验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许多师范院校纷纷以优惠条件邀请他去工作，但都被他婉言谢绝了，他坚决表示：“我要留在农村”。

1968年2月，苏霍姆林斯基再次被选为苏联教育科学院通讯院士。同年6月，又被选为全苏教师代表大会的代表，同时还被授予“社会主义劳动英雄”的称号，并先后获得两枚列宁勋章，一枚红星勋章，多枚乌申斯基和马克连柯奖章。

1970年9月2日，残留在他胸部的炮弹碎片终于夺去了他的生命。

苏霍姆林斯基把毕生精力献给了农村教育事业，兢兢业业，数十年如一

日。他整整花了 10 年时间跟踪观察和研究了学生从童年到青年的各种表现，对众多的学生做了观察记录，积累教学资料 2000 多本。他一生共完成了诸如《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和青年校长的谈话》、《公民的诞生》、《帕夫雷什中学》和《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等 40 多本理论著作。此外，还发表了 600 多篇论文和 1200 多篇儿童读物。1977 年，苏联有关部门把他的教育著作汇编成《苏霍姆林斯基教育文集》出版。目前全世界已用 30 多种文字翻译出版了他的教育著作。他的教育著作既有完整系统的理论，又紧密联系实际被人们誉为“活的教育学”，“学校生活的百科全书”。

二、《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评介

苏霍姆林斯基在帕夫雷什中学工作的几十年里，为了满足广大青年教师的迫切要求，帮助他们提高对教育事业的认识和克服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困难，根据自己多年从事教育工作的实践经验和体会，创作了《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一书。

该书写于 1965—1967 年。开始以连载形式发表，70 年代收入《苏霍姆林斯基教育选集》(第二卷)。它既反映了苏联学校教育的时代特征，也体现了苏霍姆林斯基的基本教育理论。

1981 年被译成中文后，在我国广泛流传，深受广大教师和教育工作者欢迎。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一书的写作方式新颖独特。它不是采用通常对教育基本理论问题做分章论述的方式，而是针对教师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经常遇到的各种重要问题，用提建议的形式阐明自己的观点，生动具体，情深意切，很有说服力。这些问题乍看似乎没有什么严格的逻辑体系，甚至令人有些零乱重复之感，但实际上却凝结了教育学、心理学和教学论的精华，贯串了作者统一的教育思想和教育理论。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的另一特点是，理论密切联系实际。本书的侧重点不是系统地从宏观上论述基本教育原理，而是具体入微地针对教育教学工作中的实际问题，有的放矢地给予回答，提出积极的建议。从这一角度说，本书也可说是一本“教师手册”，实用性强，对教育工作者，尤其是中小学教师具有切实的指导意义。

本书多是苏霍姆林斯基的经验之谈，内容丰富。但由于体裁的关系，它不可能全面系统地论述所有教育教学的基本原理，也无法包容苏霍姆林斯基的整个教育理论。不过，尽管如此，本书作为苏霍姆林斯基的主要代表作之一，还是发挥了它特有的作用，广大教师可从中得到许多教益。

《给教师的一百条建议》全书分上下两篇，前 50 条为上篇，后 50 条为下篇。上篇主要论述教师职业的性质、特点，教师应具备的素养以及智育的主要任务与方法等问题；下篇主要论述教师应如何协调各种教育力量以促进学生的全面和谐发展。在上下两篇的最后部分，苏霍姆林斯基还就教师如何制订教育、教学工作计划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 教师职业的特点和教师应具备的素养

苏霍姆林斯基根据自己的实践经验，深知作为一个教师首先必须深刻理

解教师职业的特点和提高教师的基本素养，才能创造性地进行教育教学工作。因此，他一开头就提出了这个问题，并详尽地阐明了自己的看法。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人的工作是一种特殊的、最富于创造性的职业，它具有以下几个特点：

1. 教师是对不断变化发展的儿童施加影响。正因为这样，教师的职业是最富于创造性和最有意义的。教师的智慧、能力、思想修养和工作艺术决定着学生在德、智、体、美、劳等方面的发展以及他的幸福和在生活中的地位。

2. 教师的工作具有滞后性。“教师的教育劳动的独特之处是，为未来而工作”。教师对儿童个性的影响和教育工作的结果，不是立刻就能显示出来，而是要经过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见分晓。

3. 教师在各种影响和教育儿童的力量(如家庭、集体、学校、书籍、街头伙伴等)中处于“指挥者”的地位。教师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协调各种教育力量，使之配合行动，克服对学生的消极因素，使积极因素发挥作用，并且以自己的个性对学生施加最鲜明、有效和有益的影响。

4. 教师“工作的对象是正在形成中的个性的最细腻的精神生活领域，即智慧、情感、意志、信念、自我意识”。它要求教师必须用同样的东西去对学生的精神世界施加自己的影响。

教师职业的上述特点，决定了教师自身必须具备一定的文化水平和思想修养，这就是：

1. 愿意和乐于在“儿童世界”中生活。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的工作是在儿童世界中进行的，教师如果乐于和善于与他们交往，认识其中的“和谐的乐声”，就能从中找到生活的乐趣，充实自己的生活，精神饱满地进行工作。反之，如果本性孤僻，不爱交际，沉默寡言，不能与集体交往，并从中找到任何乐趣，就最好不要选择教师职业。

2. 要有“研究人”的嗜好。苏霍姆林斯基指出：“教师的职业就是要研究人，长期不断地深入人的复杂的精神世界”教师工作的创造性首先就体现在要认识人、了解人，对人的多面性和无穷性感到惊奇。

3. 要有人道主义和乐观主义精神，能真诚地热爱、尊重和信任儿童。教师应当“把整个心灵献给孩子”，但同时又要“善于把热忱和智慧结合起来”，要相信每一个儿童都可以成功地予以教育。他指出，相信儿童这一信念“是教育者和受教育者的创造力、精神力量和健康永不枯竭的泉源”。

4. 要有科学共产主义世界观和高尚的道德品质。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要成为真正的教育者，就应当毕生都学习科学共产主义理论，用马列主义世界观来教育自己”，使自己成为具有高尚道德品质的人，并成为学生学习的良好榜样。

5. 要精通自己所教的学科，懂得教育学和心理学，具有渊博的知识。鲜明地表现出他对知识、科学和智力生活的态度，从而激发学生的思维并对学生的个性产生影响，创造性地开展教育教学工作。

6. 要有高度的语言修养。在他看来，语言是教师手里最重要的工具，借助语言可以向儿童揭示周围世界的各种现象，深入儿童的心灵，激发他们热爱祖国、积极向上的精神。

(二) 智育的主要任务及其实施

在本书中，苏霍姆林斯基以大量篇幅论述了智育问题。但是，和传统的教学论观点不同，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智育不是简单地传授知识，而是“包括获得知识和形成科学世界观，发展认识能力和创造能力，培养脑力劳动文明，养成一个人在整个一生中对丰富自己的智慧和把知识运用于实践的需要”。

苏霍姆林斯基主张，智育最主要的任务是，一方面要给学生传授系统的科学知识和技能技巧，另一方面则要培养学生基本的学习能力。那么应该如何进行智育教育？苏霍姆林斯基建议：

1.要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掌握知识和获得实际技能是在教师指导下进行的复杂的认识活动，而激发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则是推动学生进行这一活动的主要动力。所以，每一个教师都要尽量设法唤起学生对其所教科目的兴趣，使他们入迷似地酷爱这门学科。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强烈的学习愿望是一种道德和政治的情感，培养这种情感首先是教师的职责。

2.要为学生创造一个丰富的智力生活环境。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智力生活环境既包括个人的精神生活，也包括集体的精神生活。其中，他特别强调集体的智力生活，认为只有当学生为多方面的智力兴趣和要求的氛围所包围，当他与周围人们的交往中充满求知精神的情况下，学生的智力才能得到更好发展。

发人深思的是，苏霍姆林斯基特别把课外阅读和课外活动小组作为开发“困难”学生智力的重要手段。

3.要为学生提供充分的自由活动的自由时间。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自由活动时间，是学生智力生活丰富的首要条件”。“自由活动时间问题，不仅在教学方面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而且在智力培养和全面发展上也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他要求教师必须教会学生如何利用自由活动时间。

苏霍姆林斯基还进一步指出，教会儿童利用自由活动时间，主要是靠组织各种活动，靠示范和集体劳动。

4.组织学生参加劳动，做到手脑并用。苏霍姆林斯基非常重视劳动在智力发展中的作用。他认为，充满着崇高精神和思维活动的劳动是智力品质形成的重要源泉。双手灵巧，热爱劳动的学生，能形成清晰的、好钻研的头脑。

5.根据每个学生不同的思维方式和兴趣爱好，因材施教。按照苏霍姆林斯基的意见，人类的思维有两种基本类型：一种是逻辑分析思维或叫数学思维，一种是艺术思维即形象思维。教师在教学过程中应当通过细致的观察，了解每一个儿童的思维类型特征，正确地指导学生的脑力劳动，一方面要发展每个儿童的逻辑思维和形象思维，不可有片面性。同时又要善于把每个学生的智力发展引导到最符合其天资的轨道。

6.要认真地、正确地评价学生的成绩。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儿童的个人自尊心决定于他们的学习成绩”，而“儿童的学习成绩，他个人的自尊心”又是教师“创造性劳动的乐趣的火花”。因此，他要求教师必须经常关心儿童的学习，正确地看待学生的学习成绩。

从上述可见，苏霍姆林斯基关于智育的理论是丰富多采而又颇具特色的。

在教学的基本原则方面，苏霍姆林斯基虽然没有什么新的发现，但他没有套用传统的、僵死的教学原则，而是根据时代的特点，根据教师和学生具体情况，创造了一系列灵活多样、行之有效的方式方法，从而大大激发了

学生的学习兴趣和求知欲望，充分发挥了教师的主导作用和学生的主体作用，把教学论提高到了一个水平。

(三) 协调各种教育力量，保证学生全面而和谐的发展

苏霍姆林斯基把受教育的儿童形象地比作一块大理石，而参与雕刻这块大理石的有6种力量，即家庭、教师、学生集体、学生本人(自我教育)、书籍、街头伙伴、亲属或熟人。并且进一步指出，只有当这些“雕塑家”配合协调行动，才能“使我们在苏维埃学校里创造出来的人成为德育、智育、美育的完善杰作”。

1. 充分发挥教师的“指挥者”的作用及其对学生的直接影响。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在上述六种力量中起主导作用的是教师。教师不仅是参与造就共产主义新人的雕塑巧匠之一，而且应是整个雕塑巧匠合唱团的明智的指挥。他的任务首先是要看到整个合唱团，听到每个团员的演唱，指出哪里音不准。换句话说，他应当依据教育科学来了解学生并指导其他巧匠进行塑造人的工作，特别是要充分发挥教师个人对受教育者的直接影响。他指出：“能力、志向、才干的培养问题，没有教师的个性对学生个性的直接影响，是不可能实际解决的”。

2. 与家长密切配合，共同完成儿童的教育工作。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儿童教育的基础是由父母奠定的，“父母是社会的主要建筑师”，儿童的整个成长过程都与家庭教育密切相关。在教育共产主义新人方面，“没有比指导母亲和父亲如何教育儿童更为重要的任务”。

为了提高家长的教育水平，帮助他们改善家庭教育，苏霍姆林斯基主张开办“家长教育学校”，开设家长教育学，以帮助家长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创造良好的家庭气氛，培养儿童的情感和智力。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必须从小对儿童进行情感教育。同时，儿童的智力发展取决于家长的智力兴趣，“取决于书籍在家庭的精神生活中占有什么地位”。

(2) 培养明智的父母之爱。苏霍姆林斯基认为父母对孩子的爱应是明智的爱，应力求做到正确使用家长的权力，将热情关怀和严格要求，爱抚和严厉适当地结合起来。“使爱和严、柔和刚达到和谐”，并且要求父母之间在意志、情感和愿望方面要一致。

(3) 要从小培养儿童热爱劳动的品质。他主张使劳动进入儿童的早期生活，从四五岁时开始就应使儿童从事力所能及的工作。随着儿童年龄的增长，家长要配合学校，把他们的劳动纳入家庭经济物质生活，促使他们为创造物质财富而从事认真的劳动。

3. 培养集体，充分发挥集体的教育作用。苏霍姆林斯基认为“集体是教育的工具”，是个性全面发展的手段。

如何培养集体？按照苏霍姆林斯基的意见，集体是教师的创造。

首先，集体的建立是从思想一致开始的。为了实现思想一致，教师就要让学生对善和美等道德观念有一致看法，要充分发掘和揭示学生集体活动中的道德意义，使学生在认识这种道德意义的过程中形成统一的向往和追求，并且意识到集体的强大力量，个人只有在集体中，才能发展自己的个性和力量。

其次，要通过劳动培养学生集体。苏霍姆林斯基认为，劳动是使集体的

思想基石和情感基石相一致和结合起来的有效途径。在具有崇高精神和需要坚强意志的艰苦劳动中，体现了为人民服务、为人们的福利贡献力量的思想，而这种为人们幸福从事的集体劳动，就是真正思想教育的初步。

最后，要培养共同的智力倾向。苏霍姆林斯基在这里所说的“智力一致，指的是大家都渴求知识，尊重科学思想、书籍，尊重聪明的、有教养的人”而不是说，在认识领域中，集体的所有成员都应当有相同的具体兴趣。这表明苏霍姆林斯基强调将集体的“共性”和“个性”有机地结合起来，力求使集体生活和个人生活达到和谐一致。

4. 指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

苏氏断言，能够促使人去进行自我教育的教育，才是真正的教育。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自我教育的全部过程是头脑和心灵的复杂活动的统一，是感情和信念的统一”，因此学生的自我教育应该包括道德、劳动、学习和体育等几个方面。

为了指导学生进行自我教育，苏霍姆林斯基强调教师必须首先与学生建立起相互信任的良好的师生关系，促使学生个人的尊严和荣誉感发挥作用。

5. 要用书籍去影响学生的心灵。苏霍姆林斯基非常重视书籍对学生的教育作用，认为启发智慧和鼓舞人心的书，能吸引学生入迷似地思索人生的目的和意义，从而培养他们的爱国主义思想、高尚的道德情操和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书籍还是“智力生活的指路明灯”，是兴趣的最重要的发源地。学生求知思想的火花，首先是在书本世界里得到充实，从这个意义上说，“书——也是学校”。因此，他要求教师必须充分利用书籍对学生的直接影响，教会学生从小积累和选择自己所需要的书籍，并通过自己的读书生活去间接影响学生。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师除了要协调上述各种教育力量以外，还应密切注视街头伙伴、亲属或熟人对学生的影响，善于观察学生周围的环境，充分利用各种积极的影响，克服消极影响，以保证学生的健康成长。

在儿童的教育过程中，人们早就注意到学校、家庭和社会的意义，并力图使这三者相互一致。苏霍姆林斯基的功绩在于把这些教育因素具体化，并用自己的实际经验使之更加丰富。他特别强调教师在儿童教育中的地位和作用，明确指出，教师不仅要充分发挥其对儿童的直接影响，而且要成为各种教育力量的“指挥者”。这就大大提高了教师的地位，进一步激发了教师工作的光荣感和责任感。他还以辩证的观点论述了个性和共性的关系，力求把集体教育和个人教育结合起来，指出：“个人与集体是同一事物的两个方面。没有对个人的教育，就谈不上集体的教育力量，而对个人的教育离开自我教育是不可思议的”从而发展了马卡连柯的集体主义教育思想。

(四) 做好教育工作计划

苏霍姆林斯基认为，教育工作计划是教育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没有工作计划就不可能有“完全合格的教育工作”。那么，教师应该如何制订教育工作计划？按照苏霍姆林斯基的意见，在这个问题上是不可能有任何刻板公式和现成方法的。但是有几个问题必须注意：首先，在做计划之前必须明确教育目标。其次，任何一个年级的教师都不能孤立地考虑本年度的工作，而必须考虑教育工作的全过程(从学前期，直到学生中学毕业、独立参加生产劳

动、完全长大成人并做父亲或母亲)，对今后 10—15 年期间必须进行的工作制订出一个总体计划。最后，在大体弄清教育目标和总体计划的基础上，编制具体的、详细的计划。

1. 教学工作计划。首先要制订为期数年的远景计划，它包括：学生应阅读的文学作品、科普读物的书目；学生应当欣赏的音乐作品；跟学生谈话时使用的绘画作品；学生应当牢记的基础知识；各年级要写的作文题目；“思维课”的题目；教师和学生要制作的直观教具的大致清单等。其次，要根据远景计划的总目标，制订专题计划或课时计划，这种计划不应是详细的讲稿，而是“对教材进行创造性加工的内容”，如检查家庭作业时要让学生回答的问题，学习新教材要独立完成的作业等。

2. 教育工作计划。与制订教学计划不同，在制订教育工作计划时，首先要制订一般性计划。其内容包括：草拟学生在校学习期间和毕业后应读完的书籍的书单；使学生“懂得什么是劳动、荣誉、尊严、友谊和对人的关怀”，以及应该为自己的父母和其他人做些什么。其次，要制订出教育工作的更具体的计划。

此外，苏霍姆林斯基还建议教师要经常写教育日记，他认为教育日记是教师“进行思考和创造的源泉”。它有助于教师观察学生的行为和思维活动的变化，从而有针对性地对学生的教育。同时，写日记还有助于教师集中思考教育工作中的问题，积累教育资料，提高教育修养，逐渐形成自己的教育体系和工作作风。

(江华 撰)

【美】劳伦斯·沙皮罗：
《EQ 之门：如何培养高情商的孩子》——开启少年儿童的心灵之窗

情商技能诸如解决人际关系的能力、持之以恒的能力、友善及情感共鸣等等，都是可教的，都能对孩子日后的生活产生深远的影响。

——劳伦斯·沙皮罗

情商技能的高低决定了人生的成功与失败。新的世纪是一个要求更高、竞争更加激烈的世纪，无论对你还是孩子，都是一种挑战，那么你和孩子都已经准备好了吗？读完沙皮罗的这本最新著作，你便会清楚地了解自己孩子的情商状况，知道怎样去帮助他们提高情商。

——大卫·所罗门

一、劳伦斯·沙皮罗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劳伦斯·沙皮罗是美国儿童心理学界的知名人物，儿童精神疾病治疗专家，他创立的美国实用心理学中心在美国已是家喻户晓。他根据自己 23 年的理论和实践，在其扛鼎之作《EQ 之门：如何培养高情商的孩子》一书中以无数个实例，告诉我们如何预防和杜绝孩子不好的行为，如何培养孩子的各种情商技能，如何帮助孩子掌握走向成功的金钥匙。书中的理论集美国心理学研究之大成，方法是作者数十年实践之总结，而且通过游戏的形式，展现给读者，集趣味性和挑战性于一身，让孩子在娱乐游戏中掌握通向成功的金钥匙。

二、《EQ 之门》评介

在作者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他为读者描绘了几幅这样的图景：

底特律郊外，两个男孩正坐在一间教室的课桌旁，往常他们也许会打得不可开交，而此刻却同意让另一伙伴来调停他们之间的纠纷，三个孩子都只有 7 岁。洛杉矶，一位父亲正与三个孩子玩需要合作技能的捉人游戏，这是孩子们的老师设计的。在玩这种游戏的两周中，家人间的争吵基本销声匿迹了。

作者指出，上面提到的这些孩子受益于儿童心理学上的一场革命：情感和社会技能的培养。同伴调停训练已在美国各地普及开来，实践证明，它可以有效地减少孩子动辄求助于父母及畏事停学的现象，校园暴力也受到控制。有赢有输的合作游戏，能有效增强家人的团结，减少孩子间的愤恨与霸道。

“EQ”，即情商，与智商相对，就是心理学家们所称的情感智力。尽管情商一词还鲜为人知，作者和许多儿童治疗家 20 多年来一直用它来帮助孩子们解决问题。无数研究表明，具备情感技能的孩子比一般孩子更加幸福、自

信，在学校表现更佳。要想把孩子培养成负责任、有爱心、能力强的一代，这些技能是不可或缺的。EQ 之门一书正是要教会孩子们类似的办法和游戏，增强他们的情感和社会技能。

沙皮罗把情感智力分成六个部分：与道德行为相关的技能、思考能力、解决问题的能力、人与人的相互影响、学术和工作成就及情感。每个部分又细分出特殊的情商技能，比如：自我激励、交友、情感共鸣、现实地思考等等。具体而言，该书主要的内容与观点如

(一) 什么是情感智力

“情感智力”一词首次出现在 1990 年，由哈佛大学的彼得·萨洛瓦里和新罕布什尔大学的约翰·梅耶两位心理学家提出，用来描述对成功至关重要的情感特征。它们是：同情和关心他人；表达和理解感情；控制情绪；独立性；适应性；受人喜欢；解决人与人之间关系的能力；坚持不懈；友爱；善良；尊重他人。

1995 年，丹尼尔·古尔曼的畅销书《情感智力》使这个概念家喻户晓，而该概念出现在《时代》杂志封面上，更使之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

情感智力最初为人们所接受，是因为它在教育和培养孩子方面极大的实用性。不久便扩大至其他工作环境，直至所有人际关系和人类行为。研究证明，孩提时代专心听课，与同伴友好相处的孩子，20 年后，同样的情商技能仍能帮助他事业成功，婚姻幸福。

为了使读者更好地理解情商在孩子教育过程中的重要意义，沙皮罗对情商与智商作了生动的比较说明。

但大多数社会科学家认为智商可以由标准的智力测试来测定，韦氏智力量表就是其中一种。它包含了语言和非语言能力，包括记忆力、词汇量、理解力、解决问题的能力、抽象推理能力、视觉驱动能力。

然而情商的含义则模糊得多。但它仍然是个有具体含义的概念。人们确实无法随意测定大多数社会行为和人的个性特征，比如仁慈、自信、对他人的尊重等。但是，人们能从孩子身上看到这些品质，并承认它们具有无比的重要性。人们在潜意识中理解情感智力的蕴涵及重要性，也认同情商就是它的同义简称，就像智商是认知智力的同义词一样。

沙皮罗认为，情商并不是智商的反义词，相反它们在概念上、在现实世界中都可以能动地互相作用。如果某人能够在认知能力和社会情感技能两方面都出类拔萃，那么便是最理想的。托马斯·杰弗逊就是这样一个典型，是智力和个性的完美结合体，是真正的天才。富兰克林·德拉诺·罗斯福之所以能领导美国克服经济萧条，承受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磨难，他的极富能动性的性格和无限的乐观精神，毫无疑问是最重要的原因。

情商与智商相比，遗传成分要少得多，这或许是两者最重要的区别。也正因为如此，父母和教育者们便得到了一次机会，来弥补孩子性格中的不足，为他们日后的成功奠定基础。

(二) 为什么必须教会孩子情商技能

那些对情商教育持怀疑态度的人认为，“孩子的情感难道不是自然而然

的吗”沙皮罗的回答是“不”，而且永远不会。

在以往对孩子的教育中，人们总是致力于使孩子更聪明或至少让他们的标准智商测试成绩更好。在这方面，人们的努力是超出前人的，如今孩子的智商成绩高出上半世纪 20 个百分点。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一代比一代更聪明的同时，情感和社会技能却急剧下降。如果以精神健康和社会学统计的标准来衡量情商，我们会发现今天的孩子在许多方面比上一代逊色许多。

据美国全国精神健康协会统计，全国有 7% 的儿童有严重的精神健康问题，而其中只有 20% 的人接受各种形式的治疗。

许多社会科学家认为，孩子今天所面临的问题可以归咎于近 40 年来社会所发生的一系列变化，诸如离婚率的增加，电视和新闻媒介的强大的负面影响，不再把学校作为一种权威而尊重，父母与孩子相处的时间减少等等。尽管这些社会变化是无法改变的，但问题是：怎样才能培养出快乐、健康、有所作为的孩子。本书提供的情感和社会技能正是要帮助你填补人类天性的空白，使您的孩子更能应付现代生活的压力。

(三) 如何成为高情商的父母

在孩子们的情商教育中，父母的作用举足轻重。要培养高情商的孩子，首先必须是高情商的父母。根据父母对孩子的反应，研究者们把父母分成三种类型：独裁型、纵容型、权威型。独裁型父母设定了严格的限制，孩子们必须遵守，他们坚信孩子们必须“呆在该呆的地方”。反对他们发展自己的观点，企图按照严格限制和传统来管教孩子。他们却没有意识到，许多情况下他们过分强调秩序和严格控制，反而成为孩子的负担。

纵容型父母却走向另一个极端。他们想尽可能地接受孩子，尽力去培养孩子，但却很被动，不能为孩子确立一定的限制，孩子不服从时也束手无策。他们对孩子没有强烈的要求，甚至没有明确的培养目标，相信孩子应该任其天性自然发展。

权威型父母与上述两者都不同，既尽力为孩子创造极佳的成长环境，又确定明确的限制。他们指导孩子，但决不意味着控制。他们对自己的行为作出解释，同时也允许孩子有主见。对孩子的独立性很欣赏，同时又培养他们对家庭、同伴和社会的责任感，反对孩子的依赖性和幼稚的行为，鼓励和赞扬孩子的能力。权威型父母必定更可能培养出自信、独立、想象力丰富、适应性强、很受欢迎的孩子，也就是高情商的孩子。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高情商的父母？在沙皮罗看来，首先应该给予孩子建设性的关怀。建设性的关怀意味着为孩子提供良好的情感环境，以一种孩子能承认接受的方式支持他，它需要父母积极参与到孩子情感生活中去。

研究证明，开放式的关怀可以长期影响到孩子的自我形象、处理问题的方法，甚至是他们的健康。心理学家琳达·鲁塞克和施瓦茨向美国身心健康协会 1996 年 3 月的会议呈交的研究报告正好证明了这一点。他们对始于 35 年前的一项研究作了报告。当时有 87 名 20 岁左右的哈佛大学的学生接受了调查，对父母的关心和支持作出书面评价。

35 年后，这些参加者均已步入中年，研究者对他们又进行了调查。结果证明，自称受到父母关心的人，中年时患心脏病等严重疾病的可能性要小得多，也不受诸如家庭历史、年龄、吸烟等主要危险因素的影响。而那些认为

父母对之不公的孩子到中年时，多患上比较严重的疾病。

其次，家长们应对孩子进行积极的约束。要想提高孩子的情商水平，不对孩子采取一致有效的纪律约束，是不可能达到目的的。真正有效的原则，简单地说，有以下几点：

(1)将限制和规定清楚地确定下来，并坚持遵守。

(2)孩子开始调皮时，警告或提醒他们。这是培养孩子自我控制能力的最佳办法。

(3)用表扬或欣赏来肯定好的行为，以此塑造积极性的行为，对孩子故意吸引你注意的行为置之不理。

(4)教育孩子按照你期望的那样成长。

(5)防患于未然。大多数问题的发生是有特定的刺激原因和信号的，及时看出并排除这些因素，会有助于避免那些问题的发生。

(6)如果某规定和限制被违反了，不管是否故意，应立即给予适当的惩罚。一定要前后一致，说到做到。

(7)惩罚孩子时，程度一定要适宜。

(8)掌握一些限制办法。最普遍使用的有：

指责：这是孩子犯错后，父母首先该做的事。既让他改正错误，又不至于对你产生怨恨或对他的自我形象产生消极影响。

明白后果：就是让孩子经历自己的捣乱行为必然的后果，以便让他明白你为什么确立某项规定。比如当母亲心急如焚地要赶校车时，孩子磨磨蹭蹭，不愿意赶上，那么就让他自己走到学校，并告诉老师他迟到的原因。当然，有时这个方法是不现实的或危险的，比如教育孩子不要跑上大街，不要玩火等等，如果孩子违犯了，就不能使用此法。

面壁：或许这是最普遍介绍的方法了，就是让你的孩子独自呆在一个中性的、不受影响的地方，时间很短，根据年龄大小，1岁加1分钟。如果孩子公众场合捣乱，这个方法很有效。

剥夺一项特权：当孩子太大，不能用“面壁”法时，父母们便剥夺他们的一项特权。比如不让看电视、玩游戏机和打电话，效果就很好。但不要剥夺有可能对他们的成长有利的特权，比如，提前一个月不许他外出，而不是不让他参加学校的篝火晚会。

过度矫正：该办法一般用于快速矫正行为。孩子捣蛋时，你必须重复正确行为至少10遍，或持续20分钟。比如，如果孩子从学校放学回家，把外衣和书本扔到地板上，对你的招呼不理不睬，你就该让他出去，重新进门10次，每次都要热情地与你打招呼，并把书本放好，把外衣挂在衣帽钩上。

行为分数制度：对一些慢性问题，许多心理学家建议采取这种办法，每次孩子能准确地说出好的行为，便给他加分，可以立即得到或以后得到奖赏。相反，遇到调皮捣蛋行为就减分。

(四)利用负面道德情感的作用

人类的每种情感的产生都是有原因的，避免孩子情感发育过程中产生负面情感，就好像从画家的调色板上拿走一种颜色。画家失去的将不仅仅是某种颜色，而是失去了可以用它来调配的成千上万个色调。羞愧和内疚之类的负面情感对情感学习和行为的作用，远比正面情感要大得多。

羞愧是极端的尴尬，孩子在觉得自己没能满足其他人的期望时就会产生。而当他觉得没能满足自己内心的行为标准时，就会产生内疚感。

沙皮罗认为：

(1)当孩子做了应该感到羞耻的事情时，情感上没有反应，这时应该唤起他的羞愧感。

(2)不能给孩子留下深刻印象的管教方式失败后，羞辱法应该被当成改变行为的合理方式。

内疚则是另一种非常重要的、应当加以利用的负面道德情感。由于内疚是建立在自我内心标准和期望之上，因而比羞愧感更能对人产生强烈而深远的影响。当我们激发了孩子的内疚感时，他们内心对社会准则的理解更严格，对自己行为的后果考虑得更严重。

在沙皮罗看来，如果我们承认羞愧和内疚是孩子情感生活中正常且有力的一部分，那么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建设性地利用它们，来培养有道德、有爱心、诚实、正直的孩子，避免不必要的伤害。下面便是他的几条建议：

1.规定要前后一贯，被违反后的惩罚力度也是前后一致。确保惩罚公平、适度、有效。

2.如果孩子已经超过 10 岁，破坏了重要规定，且没有受到你的惩罚的影响，那么便让他们自己列出惩罚内容，然后由中间人(朋友、亲戚等)来决定采取何种惩罚措施。如果中间人同意，还可要求他来监督惩罚过程。一般情况下，这种办法能刺激孩子对自己产生较高期望，并努力实现这些期望。

3.当孩子伤害了他人时，你的反应一定要比平常猛烈。比如，如果孩子没有按时交报告，失去了得到好成绩的机会，结果只影响到他自己。而如果他比平时规定的时间晚回来两小时，害得你担惊受怕，那么情况就不一样了，惩罚就应该重一些。孩子的行为如果伤害了他人，那么在惩罚他的同时，不要害怕表达自己强烈的情感。如果这种情感让孩子不安了，也不要很快安慰他。这次让他内疚，下次他就不会这么办事不加考虑了。

4.重视道歉。书面道歉要结合口头道歉一起进行。如果孩子道歉不真心，不要轻易放弃，而是不断要求他道歉，直到他在情感上做出反应。

(五) 乐观主义：忧郁症和成绩差的解毒药

沙皮罗认为，要想让孩子变得乐观一点，首先你必须能区分乐观和悲观思想。两者之间最大区别就是对有利和不利事件原因的解释。

乐观主义者认为，有利的、令人快乐的事情总是永久的(也就是能不断发生的)，而且是普遍的(即总是能在任何时间、任何场合发生)。他们能努力促使好事发生。而一旦不利的事件发生了，他们也能视为暂时的，不具普遍性的，对其发生原因也能采取乐观现实的态度。

而悲观主义者考虑的恰恰相反：好事总是暂时的，坏事才是永远的；好事只是靠碰运气，偶然发生的，坏事才是必然的。在解释坏事发生原因时，也常常犯错误，或者每件事都责怪自己，或者全都委过于他人。

悲观主义在性格上是“灾难性”的。悲观不仅仅是思考的负面方式，还是对孩子健康的最大威胁，是“流行性的忧郁症”。而沙皮罗认为，乐观性格是可以培养的，并且提出了以下几条建议：

1.批评之前仔细考虑一下方式

采用合适的方式批评孩子。方式合适与否，显著地影响着孩子日后性格的乐观与悲观。

批评孩子的第一要点就是恰如其分。“过度批评会给孩子造成过度的内疚和羞辱感，超过了使孩子改错的度。而不批评孩子又会使孩子丧失责任感，磨灭其改正错误的愿望。”

其次，掌握乐观的解释性的方法，实事求是地解释问题，指出犯错误的具体原因，使孩子明白自己所犯错误是可以改变的。

2. 自己要充当表率

孩子会模仿你的行为，把你的优缺点一并吸收。如果你是个悲观主义者，那么你的孩子也会那样思考问题。如果你希望他们养成乐观品性，那么你必须首先改变自己的思维方式。

(六) 网络时代的情商教育

电脑在培养孩子情商技能方面的潜力是超出我们想象的。它能让孩子们有机会学习，参加合作游戏，在全国甚至全世界范围内交朋友，打破陈规和偏见等，它能使学习成为有多种感官参与、彼此间相互作用的经历。互联网络(Internet)的发展和对儿童的成长所起的作用是不容忽视的。

互联网络不仅能给孩子们带进图书馆、博物馆，阅读儿童报刊杂志等等，更能刺激孩子情感智力的发展。它能教会孩子们许多社交技能，刺激差等生的学习欲望，使他们有一种成就感。

到本世纪末，几乎所有的学校、图书馆、40%—50%的家庭都要加入互联网。下个世纪最初十年，孩子们很可能会夹着笔记本电脑上学。互联网络或其他服务可以在瞬间接通，无比美好的未来正一步步走来。

电子邮件，一度被视为冰冷的没有感情的交流方式，现在变成了互联网络和在线服务(On-line)的最普遍方式。父母们和孩子们用它来保持联系，老师们用它来与学生父母联系，顾问和心理学家们用它来指导治疗，最为重要的是，孩子们用它来与其他兴趣相同的孩子通信联络等。

在线服务中最受大孩子欢迎的是“闲谈室”，一种真实生动的电子邮件，供孩子们之间进行交谈和交往。

对许多孩子尤其是十几岁的少年来说，闲谈室是他们进行相同年龄间交往的最理想方式。它还有一个优点，可以不公开自己的名字，因而更是吸引了许多孩子。用在线服务或互联网络与人交流时，你的身高、长相、胖瘦、肤色等都无关紧要，重要的只有你的话、你的思想，因而就能更自由地表达自己。

孩子们有机会谈论一些普遍关心的问题，为群体自助增加了新的内涵。

年龄小一点的孩子更容易喜欢那些趣味性浓一点的内容。比如“电脑俱乐部”中的“电脑博物馆”就很受欢迎，孩子们可以自我计划，自我设计比如在线画廊“地球威力”等，后者能将有志于拯救环境的孩子们凝聚在一起。

孩子们在互联网上学习的机会几乎是无穷无尽的，把游戏、教育、科学、体育、新闻等融为一体，使孩子们在娱乐的同时，增长了知识。

电脑为教育孩子的认知、情感和社会技能开辟了一个崭新世界，信息高速公路也有重重陷阱。幸运的是，解决方法即将出台了。

第一个陷阱是孩子的安全问题。报纸报导过，某些软件导致孩子受情感

诱惑而离家出走。针对这些问题，研究人员研制出一些新的软件，如电脑巡警等，使父母可以对某些特定软件实行控制，使孩子不能进入。

第二个危险是电脑会给一件本来的好事赋予太多东西。人们担心，孩子们会挂上球拍，放弃实际的身体运动而成为电脑终端的奴隶。但科学技术再一次迅速成功地解决了问题。父母能用密码控制孩子玩电脑的时间，只要时间一到，软件便自动中止。

但最好的办法不是父母进行监督，而是父母和孩子一起用电脑，选择适合孩子玩的软件，规定孩子用电脑工作和玩耍的时间，确立孩子能输入电脑的内容(比如，未经允许，孩子不能泄露自己的姓名、地址等)，以及花在线服务上的费用。

父母需要教会孩子使用在线服务时的适当礼节，比如，全部用大写字母写信，就会被当成是对人大喊大叫。要告诉孩子如何处理不愉快的事件，讨论在线服务的危险及行为方式等。但是最大的危险是根本不让孩子接触电脑。电脑革命所能引起的最严重问题便是，处于劣势的孩子会更进一步地被社会拒绝。如果只有中上等家庭才买得起电脑，那么孩子们在知识范围、工作技能，甚至基本文化水平上的差距将日益扩大。

最后，沙皮罗告诉人们，在网络时代对孩子的情商教育必须注意如下几点：

(1)互联网络和在线服务为孩子们开辟了学习和交往的新领域。现代科技的发展不是把孩子们隔离开来，相反它打破了地域和偏见的界限，从而把全世界的孩子联系到了一起。

(2)尽管电脑对孩子们存在一定的危险，父母应该予以监督，但它的优势远远超出了它所带来的问题。

(3)孩子最大的危险是不能接触电脑，被新的科学技术甩在身后。

(杨广丽 撰)

【新西兰】戈登·德莱顿 【美国】珍妮特·沃斯
《学习的革命》——通向新世纪的个人护照

任何人都可能更快地学习几乎一切东西——通常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加快 5~20 倍，通常无论什么年龄都可以提高效率 10~100 倍。

——戈登·德莱顿

一旦你知道怎样学习，你就能加快学习的速度。要大多数人都能至少比原来好五倍、快五倍、轻松五倍地学习任何东西并将学习贯穿一生，是十分简单的事情。

——珍妮特·沃斯

此书可与所有学习相关——不管什么技能水平和什么课程，其切实可行而又有参与性的方法出色地涵盖了有关学习的所有基本知识。

——理查德·D·帕克

一、德莱顿和沃斯的生平及其成就

戈登·德莱顿(Gordon Dryden)是位土生土长的新西兰人，目前是新西兰著名的播音员、记者、主持人。同时他还是一位出色的多媒体通讯专家、电视节目制作人、广告创意主管、公关顾问、出版发行人、电台创办人、作家、研讨会组织者及行销专家。

在过去 40 年从事商业、市场、广告、公共关系、新闻、电台和电视的生涯中，戈登·德莱顿——《学习的革命》的作者之一形成了一些简单的信条：

1. 现在一切都是可能的。我们几乎可以获得，本世纪 30 年代当我还是一个小男孩时，乌托邦主义者梦想的所有东西。

2. 几乎每个问题已经部分地、在世界某个地方得到解决。谁第一个采用世界最好方案之精华，并将这些方案与他们自己的成就相结合，谁就领导这个世界。

3. 在问题还没有得到解决的地方，我们现在有产生非凡新方案的简单技巧。事实上，大多数新的答案仅仅是老答案的新组合，是将组合的智慧与全世界的资源相连接的新方法。激励人们去发现问题和机遇并找出解决问题的新方法，是通向成功的钥匙之一。

4. 并非大国、大地方、大公司或大的学校才能领导世界。人类早期历史充斥着小城、小邦领导世界的记载：雅典、罗马、荷兰、葡萄牙、西班牙、英国。当代历史也是如此：台湾拥有世界上最大的外汇储备；像香港、新加坡这样资源贫乏的岛国或地区在人均总收入上已大大超过了像新西兰、英国这样资源丰富的国家；马来西亚已成为当今世界最大的硅片出口国。

5. 我们现在处于关键的历史转折点。大约 1 万年前，我们的祖先学会种庄稼、利用役畜，这引起了农业革命。在 200~250 年前，他们释放了蒸汽的力量，从而引发了工业革命。在过去 25 年，我们进入了即时通讯的时代，从

此世界将永远不同以往，信息革命的时代到来了。

珍妮特·沃斯(Jeannette Vos)出生于荷兰，现居美国。她花了七年时间研究综合快速学习法，并因此获得教育学博士学位。她同时是个真正的教育家，虽然成长于加拿大，但却把大部分时间投注在美国的教育工作上：在从幼儿园、小学、初高中，到大学的各个教育层次都任教过。她的工作经历还包括在美国马萨诸塞州的剑桥学院——这所全美第一个将“综合快速学习法”运用在百分之七十五课程上的学校——担任过教师。

当珍妮特·沃斯专注于完成其博士论文时，另一位作者戈登·德莱顿正带领着一组电视制作人，周游世界各地以便制作一个长达 130 个小时的电视系列节目，其内容包括了许多有关学习及教育的成效惊人、却又简单的最新突破。

两位作者将两人的独特才能合二为一，一位是出生于新西兰的资深记者、作家、播音员和多媒体通讯专家。另一位是华裔美国人、教育学博士，曾在各个层次教学过，并通过对世界最佳学习方法进行长达 7 年的研究而获得了博士学位。

如果《学习的革命》最初几版很有影响的话，新版更是一剂引发变革的特别催化剂。作者之一德莱顿，将过去两年中的大部分时间花在两个项目上。第一个是编制一个重要的节目，以帮助家长教儿童在学龄前就能读、写、拼和做基本的算术。第二个是对公司学习方法，特别是对公司发展电子多媒体的潜力进行研究。这两方面的内容，在此版的补充部分得到了充分的阐述，并增加了可以放大作为实践指南的“海报”。

在 80 年代末 90 年代初，《学习的革命》的作者珍妮特·沃斯和戈登·德莱顿在世界不同的地方进行着各自的项目。他们从未见过面。

经历了在美国学前、小学、中学、大学各层次的教学工作后，珍妮特进行了一个为期 7 年的研究项目，以取得她的教育学博士学位。她的主题是：学习方法的大改良——使中学差生在 10 天“超级营地”生活中取得极大好转的技巧。

大约与此同时，戈登·德莱顿正在从事一项较大的研究，为一部 6 集电视纪录片撰稿并进行拍摄，部分地反映世界和他的祖国新西兰在教育方面的新突破。

两位作者初次见面于“快速学习与教学学会”1991 年美国大会上(该学会从此改名为“国际学习联盟”)。当各自的电视系列片和博士论文完成后，他们交换了研究成果和背景情况。双方的相似之处令人惊奇。电视片和学术论文居然完全吻合。他们的发现非同寻常但也很简单：

任何人都可能更快地学习几乎一切东西——通常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可以加快 5~20 倍——通常无论什么年龄都可以提高效率 10~100 倍。那些学习方法是简单、充满娱乐、常识性的，并且确实有效。

这些学习技巧提供了学习革命的基础，以适应正在改变着人们生活的技术、信息和通讯等方面的急剧变革。

自《学习的革命》一书于 1993 年、1994 年初版以来，两位作者有机会作了广泛的旅行和更多的研究。

结论都肯定了他们突出的每一趋势，也肯定了大多数国家的公众“教育辩论”一直是围绕着几乎毫无意义的选择进行着——仿佛自工业时代开始至今世界没有任何改变。

在英国和美国，一部分公众辩论很大程度上都是关于如何确保儿童离开小学后能够读、写、拼和做基础的算术。但是戈登·德莱顿已经拍摄了世界上许多快乐自信的儿童在上学以前就会做这一切了。

在过去的两年半时间里，他研究了世界上最好的儿童早期培养方法。这些方法都确认，在一个鼓励进行娱乐性探索的环境中，婴儿是很容易以愉快、兴奋的心情进行学习的。但到现在为止，他只发现两所学前中心使用全部的最好方法，这些方法是他发现的方法中最有效的。这两个中心的孩子在上学前都会读、写自己的故事，会拼、加、减、乘、画、唱歌、舞蹈——以及许多其他事。

更多的证据显示，每个人都有必要以我们各自的学习方式学习。但是人们依然辩论不休，仿佛所有孩子都以相同的方法吸收信息，仿佛一个教学方法适合所有的人。

所幸的是，《学习的革命》的内容会有助于使这样的辩论有一个更为有效的基础。

戈登·德莱顿还曾在英国、美国、新西兰和亚洲的公司工作，了解怎样使用现代多媒体技术来引发学习的革命。这段经历也使他确信，我们正置身于全面革命之中，这一革命对我们所有人生活的影响比珍妮特·沃斯和他当初开始策划通向未来的相似道路时所想到的还要巨大。

所幸的是，我们将在该书中找到简明表述的信息，这些信息将为我们提供一本通向 21 世纪的交互式学习护照。

二、《学习的革命》评介

20 世纪的最后几年，《学习的革命》已成为世界性的畅销书。自从 1995 年首次在瑞典问世至今，已经在那里售出了 3 万册，有 2 万 5 千多瑞典人参加了本书作者之一珍妮特·沃斯的研讨班和实验班。其他国际教育革新家也仿效她，出版商英格玛·斯旺特森(Ingemar Svantesson)用《学习的革命》来引导改变瑞典人学习方式的全国运动。

在新西兰，《学习的革命》在出版的头 5 个月里就出了 3 版。在一个 350 万人的国度，该书迄今为止已售出了 2 万册。你会在每个学校发现该书被充分使用，教师几乎人手一册。在新西兰的一个省份，85% 的学校参与了一次“学习的革命”研讨班，讨论将学校重新规划成终身学习的中心。

1997 年 10 月，中文版的《学习的革命》一书在中国大陆和香港特别行政区两地同时出版发行。到 1998 年 8 月，共印刷九次，25.6 万册。几乎每个月都要加印一次，而每一次都会迅速售完。这在出版史上也是极其少有的事。1998 年 12 月 9 日，在中央电视台晚间黄金时间——新闻联播之后、焦点访谈之前，突然出现谢晋导演拍摄的《学习的革命》一书的电视广告，全国亿万观众都知道了有一本《学习的革命》。12 月 12 日，北京科利华教育软件集团在全国 30 多个点同时剪彩开幕“学习的革命”大型主题展览会，向全社会宣布他们推广《学习的革命》1000 万册的行动正式开始。从此以后，每一天都有近 10 万册书售出，盛况空前。

在北美，每晚向大约 4 万用户播出自我提高节目和学习节目的新型民众电视网(People's Television Network)，已经将“学习的革命”用作它将来的主题。在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市举行的国际学习联合会会议上，本书作者

之一戈登·德莱顿苦战3天，主持了16集每集半小时的“学习的革命”电视节目，将该书中涉及的许多革新家的观点作了描述。

英国“2000年教育基金会”认为该书极为重要，它邀请了负责英国大多数学校的所有地方教育领导部门，参加两位作者的完全交互式研讨会。拥有4万4千名员工、600多家零售商店的英国巨头——伯顿集团(Burton Group)，是少数几家购买数百册该书的公司之一，作为其管理人员和员工的行为指南。

《学习的革命》概括了众多学科的研究，并将它综合成学习新理论，使社会上学习蔚然成风。它简明地讲述了这种新的理论知识是如何已经在学习、教育和商业领域产生革命性的突破的，它呼吁我们立即行动：进行一场学习和思维的革命，以适应技术和信息的飞速变化和我们的生产商品及提供服务的能力的不断提高。

《学习的革命》的作者面对未来世界的15种发展趋势，提出了对于学习方式的一些大胆的设想和革新。这15种发展趋势，虽然是对发达国家而言，但事实上我们也或多或少地受到这种趋势的影响。我们正在逐步地走向信息社会，由于通讯的发展，人们生活和工作的方式正在起着变化。随着电脑的逐步进入家庭，在未来的岁月里，家庭可能成为生活、学习和工作的场所。劳动密集的行业日益减少，服务性行业的比重增加，旅游业日益发达等。至于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趋势，更是任何人也难以阻挡的，特别是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后，我们必定要迎接一体化所带来的挑战。人口老龄化也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要事实。为了使老人们有丰富的学习生活，教育的对象不再只限于儿童了，每个人都面临终生教育的问题。为了使老年人的生活更丰富，适当的学习也是很重要的。书中提出的“学习的革命”是具有时代意义的。有的可能有些超前，但还是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问题，在学习和教育方面都有着更广泛的内容。

作者认为每一个国家的财富特点是一个国家人民的技能，而技能又依赖于该国家人民学习技能的能力。因此许多国家都定出了2000年教育要达到的目标，力求建立最好的学习基地。该书作者认为怎样学习是比我们学习什么更为重要的问题，这个思想贯穿在整本书中。他们认为学校教育最重要的任务是让学生学习怎样学习和学习怎样思考。提倡把趣味性归还给学习过程，提倡给学生创造最佳的学习状态、积极的学习气氛，介绍了用音乐可能提高学习效率的例子，主张消除各种学习的障碍，通过大量的练习，做到思考、储存、记忆、激活等环节相互配合而取得最好的学习效果。提倡根据学生吸取知识的类型和思维来进行教育。介绍如何使学生高效率地学习，在有限的时间学习尽量多的知识。也特别提出了“多问”和“一帮一”的行之有效的学习方式。本书提出的一些学习的革命，恰是对当前应试教育下，对于教师职责在于“传道，授业，解惑”的机械理解的一种挑战。虽然书中所举的例子，是在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中进行的实践，条件也不尽相同，有些不能照搬，但不少精神是值得人们借鉴的。

提高水平比较差的学校的教学质量是件刻不容缓的事。当教育领导部门提出要就近入学时，家长们所担心的是孩子们进了落后的学校怎么办。该书介绍了如何使落后的学校改变面貌的经验，他们认为改变的关键是对教师进行再培训。这个思路也是贯穿在整本书中的一条线。通过教师和学生的共同努力来改变学校的面貌。该书也介绍了如何利用各种方法，使智商落后的学

生能取得进步，走出退学的困境。而学校的纪律往往可通过让学生参加学校的管理来解决。

教育儿童是古今中外都关心的一个问题。该书中对父母提出了许多要求和有益的指导。作者认为父母是儿童最好的启蒙老师。儿童在8岁之前是增进智力发展的好时期，父母肩负着重要的促进责任。书中有很多利用感官的感性认识给儿童介绍新的事物，利用我们周围的整个世界作为课堂来进行教育，利用事物的对比来启发儿童的思维，使孩子更快地成长，充分发挥儿童学习的潜在能力的实例。作者还特别提到三岁左右是学习语言最好的时刻，应尽量使儿童有学习语言的机会。

展望未来，在规划未来的学校和改变教育体制的问题时，作者强调要把学校当作社区的资源中心，把家长、学生、教师和整个社区紧密结合在一起，尽量用现代化的传媒手段进行教学。书中又特别指出对教师再培训的重要性。本书的特点在于不仅提出观点，而且这些观点都来源于某些地区和某些学校已有的行之有效的实践经验，因此有一定的说服力。

《学习的革命》是一本让人们认清世界发展趋势并帮助人们取得人生成功的书。人生的外延可以经验性地划分为三大块：学习、工作、生活。《学习的革命》能够直接地帮助人们的学习和工作，也间接而深远地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譬如一个孩子如果在学校中经常是失败的，经常遭受到老师的批评、家长的责骂或者同伴的嘲笑，那么他的失败就不会仅仅限于学习方面。教育不当，反应不当，会使这个孩子对自己完全失去信心，从而导致整个人生的失败。相反，如果通过《学习的革命》的帮助——他自己通过阅读它来获取帮助，家长、教师以及同伴也通过阅读它来支持他、帮助他，那么他的学习就会转败为胜，他会建立起面对整个人生的自信和信心，他会走向人生的全面成功。

《学习的革命》这本书让人们真切地感受到了学习革命给人类未来带来的巨大振荡。如果说《未来振荡》、《大趋势》、《追求卓越》等主要是在观念上、理论上引导人们跨入新的未来，那么，《常识》(Thomas Paine 著)、《第五项修炼》(彼得·圣吉著，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等则主要是在行动上、实践上开始挑战现实、开拓未来。而《学习的革命》，则不仅兼有上述两者的特点，而且事实上它已是对这场学习革命的初次总结。这场革命已经悄悄地开始了好几年。各个国家和地区的那些深具先进意识的教育家们各自独立地进行着实验性的工作，奠定了这场革命的基础。只不过就全世界范围而言，这场革命在此之前是不连贯地、零星地甚至是在不自觉地静悄悄地进行着。现在，由于本书两位作者的努力以及本书的出版，它将变成一场世界范围内的自觉而温和的革命。它带给人的是一种生活方式的变革，是人类认识世界和自身的一个新的希望。

《学习的革命》是一本写给大众看的书，它并不需要具备很高的学历，很强的思辨力，很多的专业知识，相反，它需要你真诚，需要你发现自己学习的需要，需要你去学习而不是去评论，需要你走出你自己原来的小圈子，无论这个小圈子是头脑、专业、高傲还是偏见。如此，你必将受益。如果你是一位教师，你和你的学生必将受益；如果你是一位教育管理者，你和你的同行、部属必将受益；如果你是一位家长，你和你的孩子及亲人必将受益；如果你是一位终身学习者，你和你的朋友们必将受益；如果你是一位企业领导，你和你的员工必将受益。相反亦然，无论你是独处还是处在家庭、学校、

企业、军队等等团体的场合，你们总是会发现此书对你们都有益。或许，整个团体因此而有素质上的很大改进，效益上的很大提高，人际上的更好沟通，等等。

《学习的革命》一书，粗看起来感觉较为散乱，这是一般读者阅读的一道障碍，这本书的内容安排跳跃性大，信息量大，启发性也大，阅读这样的书，你的自由度也大——它可以成为你忙里偷闲的读物，可以随时拿起或放下，可以随意读任何一章或一节。阅读这样的书，你的创造的可能性也大——一般来说，你会被这一书本的结构、观念完全套住，很长一段时间后才可能开始创造性的思考和行动。因为一般的书都有一个所谓的结构，你必须钻进去才能把握它的内容，但《学习的革命》的结构是隐形的，它更像是一篇散文，在这个意义上，你也可以把它当作一本手册来读。

但是，阅读这样的作品也会使绝大多数人很不习惯，而且这的确需要更丰厚的阅读背景和新的思维方式、阅读方式。而且，由于这本书涉及了人类的学习生活(只要有生活，就会有学习!)的一切领域，所以在内容上显得庞杂无序，有许多部分都有重叠。而因为仅仅是一本书，它又无法披露现今所取得的所有成果或者介绍更为详细的操作性建议，所以此书对许多内容也只是点到为止。

《学习的革命》人人该读，人人该认真地学习，除非你已经能达到这样的水平了，除非你根本不想与这个知识社会相关。

由于《学习的革命》一书广涉众多学科、领域，遍及大多数个人、团体，所以此书在写作上也的确不可能如一切人所愿。譬如学者们会觉得这本书不算一本学术书，喜欢理论系统的人觉得这本书散乱，走在科研前沿的人会觉得这本书所引用的并非是最科学的科研成果，等等。这些评论都有一定的道理，但公正地看，这些评论至少都有些隔靴搔痒，因为这本书本身并不在他们可以评论的那个范围内。打个比方来说，如果你是一位画家，你就不可能用你绘画的基本原理去要求一部音乐作品；如果你是一个吝啬的人，你就不可能要求一个慈善的人服从你的原则。当然，由于《学习的革命》与学术书、理论书、最新科研成果等等的界限并非如画家与音乐家，吝啬者与慈善者的界限那么分明，所以出现上述的一些看法也在情理之中，但并非正确。

《学习的革命》涉及切实可行和经过检验的方法，它们简易有效，将为我们的孩子、为我们的家庭创造一个体面的未来。

将此书叫做《学习的革命》，是因为本书的主要内容是关于面向所有人的真正教育。但是，它并非只谈论增进学术知识的教育，它谈论的是个人成长、生活技能和学会学习。一旦你知道怎样学习，你就能加快学习的速度。要大多数人都能至少比原来好五倍、快五倍、轻松五倍地学习任何东西并将学习贯穿一生，是十分简单的事情。但人们不仅需要令人兴奋的新方法吸收信息，而且更需要树立信心，从这个一切都可能发生的时代充分获益。

这是专为这场革命而撰写的书。在这本书中，人们会发现一些简单的方法，这些方法已经在世界许多地方改变着医疗制度、学前教育、小学、中学和商业。

这也是本有着全新格式的书。许多优秀教师相信大多数学习是潜意识的，通过动手，人们可以学得更为有效。因此，该书的编排格式正是配合这两种学习过程：

1. 要点和引文都在所有左边书页上简要列出。这是为“速读”而设计的。

2. 许多引文和概要都设计成可以放大为海报的式样。这些有助于创造潜意识气氛的海报，可以用在家中、学校 and 工作中。

3. 其他左页设计为备忘清单的形式，让读者记住主要的原则。

4. 作者还将许多自学方法包含其中：你可以马上使用的音乐、游戏和技巧。

5. 你还被要求将每章做成你自己的脑图。如果你对这一技巧不熟悉，可以将样图放大，开始在上面尝试着填入内容。

《学习的革命》基于 8 个基本信念：

1. 世界正飞速地经历着关键的历史转折点。

2. 人们正经历一场改变他们生活、交流、思维和发展方式的革命。

3. 这场革命将决定我们和我们的孩子们是否和如何工作、赚钱和最大程度地享受生活。

4. 这是一个我们想要获得的一切几乎都会成为可能的世界。

5. 但也许 5 个人中至多只有 1 人知道怎样从巨变中充分获益。

6. 如果人们找不到答案，占人口 20% 的精英就会分享全国总收入的 60%，而占人口 1/5 的最穷的人的收入则只占全国总收入的 2%。这必将导致贫穷、学业失败、犯罪、吸毒、绝望、暴力和社会冲突。

7. 我们需要一场与信息革命并行的终身学习革命，让所有人分享巨大潜力时代的果实。

8. 值得庆幸的是，这场革命——一场能帮助每个人更快更好地学习一切的革命——也正在加快着速度。

书中讲述所有这些事情，它还充当实用指南，帮助人们掌握自己的未来。学习的革命来得正是时候。

人们现在处于即时通讯的时代。人们有存储世界上所有信息的能力，并且几乎可以使地球上差不多任何人以任何方式即刻获得这些信息。

自从该书第一版以来，人们已经看到这种变化是怎样以既迅速又经济的方式产生：

1. 利用了世界上最好“任课教师”的能力。

2. 用简单、新型、交互、愉悦的学习技巧将他们的才智与世界上最好的专家联接起来。

3. 将他们与世界上最杰出的交互式多媒体通讯方式密切结合起来。

4. 将这一工作具体化成简单的模式，使之能以适合每个人自己风格的方式很容易地将任何东西教给每个人。

5. 在电视机上插入一个便宜的网络电脑盒——几乎就同操作电视一样容易，使得这样的课程能即时、免费地真正为世界上每个人获得。

记住这段概要，好好地记住。它将改变你的世界，至少不亚于字母、印刷术、蒸汽机、汽车、电视和电脑的发明对世界的影响。

人们终于也在学习使用所有人类资源中最杰出的资源，这资源就是组成人类普通大脑的 1 万亿个细胞和数十亿个连结的几乎无限的力量。

这是一个所有人都需要重新考虑诸如“工作”、“失业”、“退休”和“教育”等词语含义的时代。

我们正飞速进入一个由世界一体化经济占统治地位的时代。正如美国劳工部长罗伯特·赖希(Robert B·Reich)所指出的那样，这个世界将不会有“一国”的经济、产品、公司和工业。但我们仍然会有“一国”的社会，每一个

社会的主要任务，就是为其所有成员重新构筑他们自己的未来，发展在世界一体化经济中取得成功所需的各种技能。

只占人口 20% 的一部分美国人收入已经超过了全民收入的 50%。大多数高收入者精于确定问题并解决问题，精于将新的机遇与答案联系起来。哈佛大学赖希(Reich)教授估计，到 2000 年，美国 1/5 最高收入者的收入将是全国人口总收入的 60% 多。最穷的 1/5 人拿回家的将只有 2%——除非我们改变我们的特权，使大多数人得到教育和重新培训，这样他们就能发展现在只被富有阶层所使用的技能。越来越多的预言家指出，完全新型的教育形式能够提供致富的钥匙。

英国教授、咨询家查尔斯·汉迪(Charles Handy)在《非理性时代》(The Age of Unreason)中指出，势不可挡的变化速度要求“彻底地重新考虑我们的学习方法”。他说，教育将不再是我们大多数人所了解的教育。“教育需要被再发明。教育将不随学校学习的结束而结束，也并不限于 18 岁时成绩出众的那些人。学习……贯穿人的一生，除非我们中止它。”

汉迪呼吁，用逆向思维法解决每一个今天困扰这个世界的主要问题，他说：“逆向思维法建议人们，不将全国统一的课程用于教育，真正需要的是适合每一个儿童的单独课程。”

要达到这一目标，得完全改变有关学校教育的大多数概念。这意味着需要彻底再思考的不只是学校的作用，还有商业的作用。

汉迪还描述了如不这样的严峻后果：“无所事事的危险在于，低层阶级(这是个令人震惊的新词)不属于我们将进入的世界，他们有他们自己的倡议，用恐怖主义代替政治、用炸弹代替投票，以此作为他们颠倒这一世界的方法。”

约翰·奈斯比(John Naisbitt)和帕特丽夏·阿巴顿(Patricia Aburdene)也描绘了这样一幅类似的图画，他们的《2000 年大趋势》(Megatrends 2000)一书这样开头：“我们站在新纪元的开端，在我们前面的是文明史中最重要、最激动人心的十年，是充满令人眼花缭乱的技术革新、前所未有的经济机遇、令人惊奇的政治改革和非凡的文化复兴的一个时期。”

他们也提出了解决办法：“走向大灾难，还是黄金时代，应由我们抉择。”

美国商业顾问汤姆·彼得斯(Tom Peters)认为，新的信息系统正在极大地减少“中层管理”的职位，并且每个人现在都必须成为“自觉的经理”。在《解放管理》(Liberation Management)中，他给了学生们这样的忠告：“记住：1. 教育是通向成功的唯一途径；2. 教育并不以你获得的最后一张文凭而中止。终生学习在一个以知识为基础的社会里是绝对必需的。你必须认真地接受教育，其他所有人也必须认真接受教育。教育是全球性相互依存经济中的‘竞赛’。就是如此而已。”

斯堪的纳维亚航空公司总经理简·卡尔松(Jan Carlzon)在《关键时刻》(Moments of Truth)中说：“没有信息的雇员不能负起责任。有了信息，他就不可避免责任。”

学习的革命为成功指明了道路。它帮助澳大利亚的高中学生在 8 周时间里学完了一门需 3 年学完的外语课程，帮助说英语的成年人在不到 4 周的家庭学习中学会了德语。它帮助新西兰 11 岁的学生在不到 10 周的时间里弥合了 5 年的阅读差距。

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一场帮助任何一个人在一生中——从最早的岁月一直到 80 岁、甚至更长——更快、更有效、更愉快地学习的革命。

总之，《学习的革命》是一本好书，一本非常契合人们的需要和渴望的好书。尽管仍然有人对教育失望过头而导致麻木冷漠和不信任，也有人可能从来没有期望过教育会给人们提供什么，但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说，依然充满着希望和憧憬，依然满怀着激情投入行动。正是这种希望和憧憬，才唤来了这场学习的革命，也唤来了这本——《学习的革命》。

(江华 撰)

文学·宗教学

【美】海明威：
《太阳照样升起》——对迷惘一代的剖析

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

——欧内斯特·海明威

在那些岁月里，他完全陶醉在战斗中，仿佛生活在另一个世界上

——库尔特·辛格

一、海明威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欧内斯特·海明威于1899年7月21日出生在美国伊利诺斯州芝加哥市郊的橡树园镇。他的父亲克拉伦斯·艾德蒙兹·海明威是本地颇有名气的外科医生，行医之余，喜爱钓鱼、打猎等户外活动。他的母亲格雷斯·霍尔·海明威出身于有教养的家庭，喜爱艺术，热衷于宗教活动。父母的爱好和兴趣对海明威都产生过一定影响。再加上海明威天性中的好动、喜欢冒险成分，使他从小就培养了一种硬汉气质。这为他后来的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

少年的海明威，精力旺盛，富有想象力，对于冒险、搏斗极有兴趣。由于美国社会民主化和宽松的生活环境，美国人民有喜爱户外活动和喜爱大自然的倾向。这种倾向和他们征服大自然的观念在美妙的异国风光和风度潇洒，体魄健美的各类运动员身上找到了共鸣点。美国人喜欢需要拼体力的体育活动及各种剧烈运动，喜欢冒险和对力的崇拜，海明威本人更是这个意义上的标准的美国人。

他四处为家，早年旅居巴黎，30年代移居古巴，住在哈瓦那郊区的“了望农场”，1953年到非洲作狩猎旅行，1957年又去西班牙居住，当中还有多次的欧洲旅行及1941年的中国之行。在国内，他先是定居在佛罗里达州的基维斯岛，但他经常登上“皮拉尔”号(他的私人游艇)到岛外去捕鱼，又到怀俄明和蒙大拿打麋、打野鸭。海明威的常年旅行，到处迁移，正代表了美国人的流动性，怪不得有人称美国人为一个“在四个轮子上的民族。”爱冒险的海明威就在这样的环境中大显身手。

海明威参加过两次世界大战和西班牙内战。

1914~1918年的帝国主义战争，是人类历史上一次空前浩劫，是一场无意义的大屠杀，夺去了几百万人的生命，毁灭了大量的物资。送上战场的人就有七千多万，海明威也是其中的一个。他和其他青年一样，有着美好的憧憬和幻想，并想在战火中建立功勋，但战争展现在他眼前的却是一幅恐怖和残忍的景象。

19岁的海明威不远万里，从美国中部奔赴欧洲激战前线。炮火连天的意大利北部战场绝非像年轻人想象的充满传奇色彩。海明威在驻地意大利士兵分发食品的时候，被奥地利军队的迫击炮弹击中。待他苏醒过来，发现身

边的两个士兵一个已被炸死，另一个受了重伤。海明威带着伤拖着身边的重伤员向后转移，又被机关枪击中膝部。但他仍以顽强的毅力冒着敌人的枪弹，把一个昏迷的意大利伤兵从血泊中一步一步背到红十字急救站。而他自己身上却“镶嵌”了227枚敌人的弹片。意大利政府为了表彰他的勇敢，授予了十字军功章、银质奖章和勇敢奖章各一枚。然而，一次大战后资本主义世界阴影重重的现实，使他先前不惜用生命去追求过的理想，像肥皂泡一般破灭了。他不仅在肉体上受到创伤，而且精神上也受到伤害。尽管海明威从积极参战开始变得有点消极厌战，但他并没有彻底绝望，因为他有着极端要强的“硬汉”性格。

特别在西班牙内战期间，海明威的战争观发生了很大变化。以前对战争的迷惑、厌恶转变成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正义战争，反对法西斯主义。

1936年，以佛朗哥为首的法西斯分子发动叛变，挑起西班牙内战。早在内战之前，海明威就同西班牙人民结下深厚的友谊。内战爆发后，他先后四次前往西班牙，积极参加并呼吁世界人民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反对法西斯主义。在1936年美国作家会议上，他强烈抨击法西斯，指出“只有一种政府不能产生出好作家，这就是法西斯主义，因为法西斯主义是恶棍在撒谎。如果一个作家不愿撒谎，他就无法在法西斯主义下生存和创作。”

他自己出钱为共和政府购买救护车，冒着生命危险前往前线实地拍摄战斗情形，撰写解说词。《西班牙大地》拍成后，他先给罗斯福总统放映，以唤起美国政府和人民支持西班牙共和政府的正义事业，并将该影片所得到的收入全部捐给共和政府。虽然海明威不是共产党人，但是他的这些行为举动都和共产党的目标一致——支持西班牙人民的正义事业，以取得反法西斯的胜利。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作为随军记者在欧洲战场参加反法西斯的战斗。并且曾以随军记者的身份登上美国轰炸机，亲自参予了对法西斯德国的轰炸。在作战过程中，他因飞机失事而再次受到重伤，伤口缝合50多针。人们都以为他死了，但他却大难不死。

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在决定性的大反攻中，他甚至先于苏、美盟国的各路大军，亲率一支法国游击小分队，头一批冲进了法西斯据守的巴黎。这真可谓轰轰烈烈的英雄壮举了。从而作为枫丹白露的保卫者而名垂军事史册，获得美国政府授予的铜质星字勋章。

第二次大战结束后，海明威带着无限荣耀回国。他的朋友和崇拜者们理所当然地对他寄予厚望，相信这位当时世界上最有名望的作家，这位传奇式的英雄，一定能写出更为伟大的作品。他自己也充满信心，准备伤好后大干一场，去实现新的超越。但是，令人恐惧的幽灵很快出现了，他脑子里出现一种沉闷的嗡嗡声，然后是剧烈的头痛，思想和说话迟钝，遣词造句时记忆力有所丧失，写起字来有倒下笔的倾向，不时的耳鸣还造成部分听觉失灵。他意识到，这是战争创伤造成的严重后遗症。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没有比这种症状更为残酷、更让人痛苦的了。

另外，名声也使他难以自拔。他住在“芬卡楼”里，时时挤满了编辑、访员、食客、酒友及各国渔猎运动家。为寻求安宁和生命力的恢复，他到越来越远的地方去打猎。这不仅耗费时间，而且一再受伤。例如，有一次打野鸭时就被一粒反弹的填塞物把一只眼打伤了。这使海明威深感绝望。加上腿部弹片位移引起剧烈疼痛，他暴躁不安。再加上他常年患有高血压、肝炎、

糖尿病、皮肤癌等重症，有人说他创造了人类承受苦难的世界纪录，致使妻子担心他精神总崩溃就要来临。然而，海明威毕竟是海明威，一次又一次“淬过水”的硬汉子，他像“一头一再冲锋的钢筋水泥凝成的牛”，“虽然被斗牛士刺得鲜血淋漓，被红绒旗逗得气急败坏，但依然站在斗牛场上。”他决心振奋精神，像那位古巴老人一样，再作一次悲壮的远航！

海明威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大学才子，也没有从小就受文学熏陶。他不是课堂里教育出来的文学家，然而谁也不能否认他是个知识丰富的作家。除了对生活、战争的体验之外，他虚心学习，把当作家看成是一生追求的事业。他晚年对《巴黎评论》的记者说，他想不起来他“决定作为作家的确切时刻”，他“一直想当一个作家”反映他个人的体验以及他所熟悉的硬汉品质。

由于海明威追求的是当一个一流作家，“写出前人没有写过的作品，或者超过死人写的东西。”因此，有人说，海明威是一位手“拿着一把斧”的作家，“他斩伐了整座森林的冗言赘词，还原了基本枝干的清爽面目”，“删去了解释、探讨、甚至于议论；砍掉了一切苍苍绿绿的比喻；清除了古老神圣，毫无生气的文章俗套”，把亨利·詹姆斯以来附在英语文学上的“乱毛剪了个干净。”这无疑为海明威对20世纪英语文学的贡献，他这样勇敢地净化文风，使几代作家受益非浅，但他用板斧大力砍伐之后，又拿起金钢钻刻刀雕凿他的文句，他把一些最寻常的用词修磨得闪闪发亮，让它焕发出奇异的光彩。

海明威追求的不是只写一两本好书的一般作家，而是要成为独树一帜，有所创新的一流作家。海明威曾说过：“一本写成了的书就像一头死狮子。你打死了一头大狮子，也许会有人给你发奖，那当然是好事，但是你真真正感兴趣的却是下一头狮子。”如何才能猎获更大更美的“狮子”，作者认为：“作家的工作是告诉人们真理。他忠于真理的标准应当达到这样的高度：他根据自己经验创造出来的作品应当比任何实际事物更加真实。”谈到作家应当塑造活的人物时，海明威又说：“小说中的人物不是靠技巧编造出来的角色，他们必须出自作者自己已经消化了的经验。”他在这里反复强调的是作家的经验，而经验必须身临其境，从实际生活中才能取得。

海明威看拳击、斗牛、打猎和上战场，有个性爱好的成分，但更多的是出于作家的使命感。如果他不去战场了解真相，没有亲身的经历和体会，他就不可能写出有独创性的、别具一格的战争文学。如果不基于经验而又超越经验，《太阳照样升起》就不可能如此深刻地表现战争使世界成为废墟，使人软弱无能失去精神支柱的主题。《永别了，武器》也不可能如此有说服力地把战争的毁灭作用跟人类的困境和社会的崩溃联系在一起。《丧钟为谁而鸣》更不可能令人信服地揭示政治、战争和人性的复杂性。也正是当作家的使命感使海明威在领悟了战争与人的命运相通之处后，感到有必要为人们指点方向。乔丹为什么给人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是因为炸桥是海明威本人在西班牙战争期间的经历和感受，但经过作者的反复推敲和精炼，使之得到了升华。海明威参加了西班牙内战，可他终究还是回归了祖国。但海明威却把乔丹——他自己的形象永远留在西班牙大地上。这就是海明威对西班牙反法西斯战争的态度，这种态度通过乔丹的死而完美地得到了表现。

“一旦被卷入战争，不论可能出于何种原因，你只能打赢。”同样，人要生活，也必须不打败。在这方面，恐怕只有猎人和渔夫，斗牛士和拳击家才是不认输的人，只有他们才有勇气和毅力，才具备压力下的优雅风度。

如果海明威没有深厚的生活根底，他不可能如此细腻地刻画出没有阳刚之气的麦康伯在找到勇气和尊严时的狂喜，也不可能塑造出桑提亚哥这样高大而光辉的形象。

海明威认为：“根据曾经发生的事情，根据存在的事情，根据你知道和不可知道的一切事情，你创造出来的东西就不是描写，而是比任何实际的，现存的东西要更真实。你把它写活了，如果写得好，你就会使它不朽。”因此，他在最后一次冲刺中，以哲理和象征使他的“硬汉子”得到升华，（《老人与海》1952年）海明威通过桑提亚哥的形象告诉我们：“人们处处都在为幸福，为值得人们追求的生活而斗争。他们不一定能够胜利；他们必须经历不幸和挫折。但是正像这个老人一样，一个有能力取得日常功绩和知道如何夺取胜利的人，在遭到最严重的挫败之后是不会失望的，他不悲观失望，而是继续斗争”。《老人与海》虽然篇幅很短，但却气势磅礴，从而获得1954年度的诺贝尔文学奖。

二、《太阳照样升起》评介

如果说短篇小说集《在我们的时代里》使海明威初露锋芒的话，那么《太阳照样升起》则使这位作家名震欧美，成为世界性作家，在《太阳照样升起》这部作品的扉页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你们都是迷惘的一代

——引自和格特露德·斯坦的一次谈话

当一代青年怀着某种神圣的狂热，在“圣战”中耗尽自己的精力乃至生命之后却失望地发现这一切都是毫无意义的时候，绝望的病态就会像瘟疫一样蔓延开来。只要想一想中国“十年动乱”之后出现的“伤痕文学”，就多少可以理解20年代风行欧美的文学潮流——“迷惘的一代”，只是后者的悲观主义色彩和对人生的反思要深重得多。怀着正义的冲动投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欧美青年，在经历了战场上的残酷厮杀与死亡的恐怖之后，侥幸从枪林弹雨中活过来的人惊悚地发现所有这一切不过是历史对他们这一代人的残忍的捉弄，心灵的伤害远比肉体的伤害更为深重。理想的失落导致心灵的迷惘，20年代的青年已经没有了但丁时代的幸福。当但丁于人生中途陷入迷惘之时，自有维吉尔和贝亚德接引他游地狱、炼狱而入天堂，海明威们却只有听任豹（淫邪）、狮（野心）和狼（贪婪）的撕掳了。苏联十月革命的火光曾使许多欧洲的艺术家的（如罗曼·罗兰）受到鼓舞，把消灭法西斯制度视为人类的希望。但“迷惘的一代”却宁愿从人类的生命本体去寻找灾难的根源，因此而陷入了更深的绝望。他们试图消极遁世，在纸醉金迷中麻痹自己，在极富刺激性的活动中亢奋自己，在放荡不羁的生涯中娱乐自己。但是隐藏于内心的道德感和正义追求并未完全泯灭，使他们即使在浓重的酒精浸透脑髓之时，仍依然保持着痛苦的清醒。在麻痹与亢奋过去之后，是更加深重的无奈与绝望。

《太阳照样升起》的主人公们是一群手头富裕的浪荡子。从战场的死神中逃出来，死亡的阴影还在后面跟着。他们从来没有为钱犯过愁，他们喝最好的酒，住最高级的旅馆，酗酒、赌博、嫖娼、打架、钓鱼、游泳，……可谓愿意干什么都可以，按照马斯洛所说的人生五个层次的需要，他们似乎都有了，如果说没有，那是自己不需要。什么都有，又好像什么都没有。最主要的是——“上帝没有了”：

……我为自己祈祷的时候，我发觉自己昏昏欲睡，所以我就祈求这几场斗牛会是很精彩的，这次节期(指狂欢节——本文作者注)很出色，保佑我们能钓几次鱼。我琢磨我还有什么要祈祷的，想起了我需要点钱，所以我祈求能发一笔大财，……有点害臊，想到自己是一个糟糕透顶的天主教徒而懊悔。

书中的女主人公勃莱特一点也不比巴恩斯强：

“我同宗教气氛是格格不入的，”勃莱特说，“我的脸型长得不对头。”

所有这些话都不是出于喜剧性的油滑，而是以认真、严肃的口吻写出的，因此带有深刻的悲剧性。他们像黑塞所描写的“荒原狼”，有充分的自由，但却茫然不知所往。

悲剧的根由似乎在于性。战争毁掉了主人公巴恩斯的性能力，使他同勃莱特相爱而不能结合。勃莱特热烈地爱着巴恩斯，但同时她又坦率地承认她是一个“坏女人”，她需要性生活。象征着生命的性结合成为不可能，而爱情却还燃烧着，这实在是一种难熬的痛苦：

勃莱特的脸色苍白，通亮的灯火照出她脖子的修长线条。街道又暗下来了，我吻她。我们的嘴唇紧紧贴在一起，接着她转过身去，紧靠在车座的一角，离我尽量远些。她低着头。

“别碰我。”她说，“请你别碰我。”

“怎么啦？”

“我受不了。”

“啊，勃莱特。”

“别这样。你应该明白，我只是受不了。啊，亲爱的，请你谅解。”

“你难道不爱我？”

“不爱你，你一碰我，我的整个身体简直就成了果子冻。”

“难道我们就无能为力了？”

她直起身来。我用一只胳膊搂住她，她背靠在我的身上，我们俩十分安详。她正用她那惯常的神情盯着我的眼睛，使人纳闷，她是否真正在用自己的眼睛观看。似乎等到世界上别人的眼睛都停止了注视，她那双眼睛还会看个不停，她是那样看着我，仿佛世界上没有一样东西她不是用这种眼神看的，可是实际上，有很多东西她都不敢正视。

“那么我们只能到此为止了。”我说。

“不知道，”她说：“我不愿意再受折磨了。”

“那么我们还是分手的好。”

“可是亲爱的，我看不到你可不行。你并不完全明白。”

……

生命死了，爱情却还存在。勃莱特说：“我认为这是人间地狱般的痛苦。”

“我睡不着，只顾躺着寻思，心猿意马。接着我无法控制自己，开始想起勃莱特，其它的一切念头就都消逝了。我思念着勃莱特，我的思路不再零乱，开始好像顺着柔滑的水波前进了。这时，我突然哭泣起来。过了一会儿，感到好过些，躺在床上倾听沉重的电车在门前经过，沿街驶去，然后我进入了梦乡。”

难忍的痛苦折磨着可怜的灵魂。美丽的勃莱特剪掉了金色的长发，戴着男式毡帽，整天喝酒，酒醉之后就同自己并不热爱的男人嬉戏、调情、接吻、睡觉。巴恩斯则试图在荒凉的山野里磨掉那强烈的欲望。然而他们不能不相遇。巴恩斯不能不眼睁睁地看着勃莱特被拥在另一个男人的怀抱里。

这是一种怎样的痛苦！——自己心爱的女人就在隔壁，仅仅隔着一层薄薄的墙，她是你的生命和希望，你清楚地听见或想象到她在同另一个人说笑、

接吻，这一切都历历在目，关上灯也没有用！更重要的是你确信她爱你，正是因为爱你而又不能同你结合，正是这种痛苦使她无法解脱，才去同她不爱的人说笑、接吻、睡觉！用什么样的语言才能把这种痛彻肺腑、撕裂人心的感受表达出来？如果想正面写，可以说即使搜索枯肠，寻找到一百个比喻、一千个联想，也很难把这种感受传达出来，因为这是人类所能感受到的最强烈的痛苦之一。海明威不是这类笨拙的作家，他在描写此时此刻巴恩斯的心境时，几乎一个和痛苦相类似的字眼都没有：

她进屋时，他醒过来，两人说着话儿。我听到他们的笑声。我关灯想入睡。没有必要再看书了。我闭上眼睛已经没有旋转的感觉了。

在没有意识到勃莱特进入迈克房间之前，由于白兰地的强刺激，使他一闭眼就天旋地转，但勃莱特走进迈克房间，这是一个更强烈的刺激，酒精不起作用了，天也不旋地也不转了，头脑变得意外清醒！这种清醒使他格外清楚地听到隔壁两人的说笑，关上灯使自己处于黑暗之中也无济于事，因此他一下子变得急躁起来：

但是我睡不着。没有理由因为在暗处你看问题就该和在亮处看问题不同。真见鬼，毫无理由！

有一次我把这事好好思量了一番，于是整整六个月，我关了电灯就睡不着觉。这又是一个精彩的一闪念。反正凡是女人都见鬼去。你，勃莱特·阿施利也见鬼去。

在现实生活中遇到痛苦时，便从形而下逃入形而上，从现实的世界逃入空灵的世界，这是许多知识分子用以解脱自己的办法。巴恩斯试图这样做，他把爱人同别人一起睡觉这件事转化为一个哲学问题：“在暗处看问题和在亮处没有不同”，甚至意识到这是一个“精彩的一闪念”。但可怜的巴恩斯没有办法使自己在哲学世界里舒服地呆上三秒钟，现实世界又把他痛苦的灵魂枷回来了。“反正凡是女人都见鬼去，你勃莱特·阿施利也见鬼去。”这句话说得决绝，但读者清楚地感受到了决绝背后的呻吟和绝望。

接下来又是躲闪，他想女人的不值钱，想帐单，想享乐与代价之间的关系——又是形而上的思考。……但是没有用，头脑又回到了现实：

然而，我真希望迈克对科恩的态度不要太刻薄。迈克喝醉了不安分。勃莱特喝醉了安分。科恩从来不喝醉。迈克喝得一过量就惹人讨厌。我喜欢看他伤害科恩。但是，我又希望他不要那样做，因为事后会使我厌恶自己，这就是道德；事后会引起你厌恶自己。不，那该是不道德的行为。这是种笼统的见解。

科恩是勃莱特的另一个追求者。他喜欢看迈克伤害科恩，但道德感又希望迈克不要这样做——这种矛盾心理仅是表层。可悲之处是巴恩斯并没有想到无论迈克或科恩都是他的情敌，他应该象一个勇敢的骑士那样去捍卫自己的爱情。没有，他没有这样想，他已经习惯于不这样想，因为他没有资格去这样想，他只能期求另外两个情人之间打一通！无论这种邪恶的期望或苍白的道德背后都掩藏着一颗自卑的灵魂！这种自卑中又含着多少辛酸！

怎么躲闪都无济于事，形而上救不了巴恩斯，帐单救不了巴恩斯，对勃莱特、对一切女人的贬抑心理也没有用，那深藏在心底的爱情又如泉水般涌出来了：

瞎说，我耳边响起了勃莱特说的这句话。瞎说……

这是一个可爱女人的口头语，娇嗔之态栩栩如生。巴恩斯试图从这个温暖的回忆中拔出脚：从“瞎说”想到英国人的思维方式，由英国人想到爱斯基摩人，想到切罗基语，……这一切又都白费。重新打开灯看书……

……直到天快亮时我才睡着。

幸好圣福明节开始了。这是东方传统观念无法理喻的节日。她的全部精神体现在那面在蓝空中飘动的红色横幅上：

美酒万岁

整个七天七夜，人们手执古代人使用的皮酒袋，饕餮纵饮，浸泡在酩酊之中。狂欢节最富刺激的项目就是斗牛。不只是在斗牛场上看犍牛或马匹怎么被公牛角挑出肠子，血流满地，还有当大群公牛被赶出牛栏在街道上狂奔时，喝醉了酒的男人在公牛的前面吼叫奔跑，然后一群群倒在地上，牛群从人们的身体上踏过去，几十人被送进医院，披着黑衫的寡妇在丈夫的尸体面前嚎哭——这都是节日不可缺少的项目。对于那些赫赫有名的斗牛士，人们怀着狂热的崇拜花几十个比塞塔的大价钱买一张门票，为的是看他们的惨亡。当有的斗牛士不肯贴近公牛时，人们就诟骂着向他们的英雄抛掷坐垫、面包片和瓜果。东方人自从进入文明时代就倡导“君子远庖厨”，中国也有“斗牛”、“牴羊”、“斗鸡”之类，但都是坐在看台上看动物之间相斗，绝无危险的。而西方人却喜欢直视痛苦的现实，领受悲剧性的激情。巴恩斯的朋友比尔把狂欢节说成是“一场妙不可言的恶梦”。

勃莱特似乎找到了自己的爱情和希望：她迷上了19岁的斗牛士罗梅罗。罗梅罗是《太阳照样升起》中唯一的英雄，这不仅因为他“长得很帅”，而且他对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充满了挚爱和自信，他把“斗牛”这种恐怖转化成优美的艺术：

一个回合未了，他们又面面相觑。罗梅罗面带笑容。公牛又要来较量一番，于是罗梅罗的斗篷重又迎风张开，这一次是朝另一个方向的。每次他让牛极近地擦过身边，以至于人、牛和在牛面前鼓着风旋转着的斗篷成为一组轮廓鲜明的群像。动作是那么缓慢，那么有节制，好像他在把牛轻轻摇动，哄它入睡似的。

在斗牛中有所谓公牛地带和斗牛土地带。斗牛士只要处在自己的地带里，就比较安全。每当他进入公牛地带，就处于极大的危险之中。斗牛士们常使用各种障眼法使观众误认为他在“公牛地带”，但内行的观众一眼就会识破，接着便毫不客气地把坐垫、面包、瓜果向他丢过去，这个斗牛士就声誉扫地了。19岁的罗梅罗差不多总是带着镇静、从容的笑容把自己着着实实地置于“公牛地带”，仿佛公牛随时可以挑死这个可爱的孩子。在巨大危险面前的镇静自若，给观众带来巨大的悲剧性的刺激和对于英雄的狂热崇拜。正是这种精神把勃莱特迷住了。

作为罗梅罗“斗牛士精神”的对立物是科恩对勃莱特的爱。科恩尽管是一位当过冠军的拳击手，但就如同他那个被揍扁了的鼻子一样，是一个颓败的象征。这位具有中世纪骑士风的青年，把《紫红色的国度》(威·亨·赫德森著)中那些玫瑰色的爱情故事当作理想来追求，在他那充满柔情的心灵里把勃莱特当作圣母来崇拜。当巴恩斯如实地指出勃莱特曾经两次把自己嫁给一个不爱的人时，科恩竟然恼怒地迫他收回这些话。玫瑰色的迷狂使得科恩在勃莱特同他“逢场作戏”地睡了一夜之后，竟然神魂颠倒地以为勃莱特永远属于他了。他在她面前卑微得像条狗，但这种缠绵而无力的中世纪式的爱情只使勃莱特对他更加厌恶。她渴望的是一种“力”。这种力不属于扁鼻子的拳击冠军而属于神采焕发的青年斗牛士。当勃莱特甩掉穷追不舍的科恩、甩掉同自己订了婚的迈克、甩掉自己深爱着的巴恩斯而扑进出身低贱的斗牛士怀抱中时，拳击冠军终于疯狂了，他几乎宰掉罗梅罗：

“据说那时斗牛士坐在床上。他已被(科恩)击倒约莫十五次，但还是不肯罢休。勃莱特按住了他，不让他站起来。他很虚弱，但是勃莱特按不住他，他站起来了。”

面对这挨了重重的十五击依然倔强地站立着的斗牛士，科恩突然意识到：自己可以把他打死，而却永远无法使他屈服。这种想法使科恩自己软下来了。

于是斗牛的小伙好歹摇摇晃晃地向他走去。科恩退后靠在墙上。

“这么说你不想揍我了？”

“对，”科恩说：“我不好意思了。”

于是斗牛士用足全身力气往科恩脸上狠揍一拳，然后坐倒在地上。勃莱特说他爬不起来了。科恩想扶他起来，搀他到床上。他说科恩要扶他，他就要打死他，还说什么如果科恩今天上午不离开这里，他无论如何要置他于死地。科恩哭了……

当带着满脸伤痕的罗梅罗依然按照原来安排好的日程出现在斗牛场中央时，科恩已经悄悄地离开了此地。科恩的败北，象征着一种古典式的爱情观念的死亡，象征着由《紫红色的国度》为代表的那种玫瑰色的浪漫故事已经失去了往昔的魅力，化为一片毫无血色的苍白。罗梅罗则是原始的野蛮的粗犷的力量之神，是早在蒙昧时代自然赋予人的那种朝气蓬勃的生命。这种生命在属于贵族阶层的科恩、迈克和巴恩斯身上都被文明给阉割掉了。它只在没有受过文明教育的斗牛士的身上活着。

然而，勃莱特在同罗梅罗共同生活了一个多月之后，还是迫使他离开了自己。“他才19岁，”她不忍心毁了这个前程远大的角斗士。这似乎是一个充足的理由。但在这充足的理由背后是否还隐藏着不满足？一个文化水平低下的斗牛士能否满足一个具有现代复杂心灵的文明女性的全部欲求？现代意识像一口填不满的深井，勃莱特注定要永远痛苦，于是，就像故事的开头一样，勃莱特又回到了巴恩斯的身边。

那末，如果没有这场罪恶的战争，或巴恩斯没有丧失性爱能力。他和勃莱特是否就会获得美满的爱情呢？作者在小说的结尾处，描写两个人坐在汽车里有一段意味深长的对话：

“噢，杰克，”勃莱特说，“我们本可以过得多好啊。”

前面出现了一个穿卡其制服、指挥交通的骑警。他举起了指挥棒。汽车猛然减速，把勃莱特撞到我身上。

“是啊，”我说，“这样设想不是很美妙吗？”

马克·斯华尔卡教授对这一结尾做了如下解释：

“‘美妙’是个浪漫字眼，在这里意味着‘愚蠢地考虑绝无可能发生的事’。而不是‘现在不会发生的事’。这个解释的信号来自交通警，他在勃莱特和巴恩斯的问答之间指挥着来往车辆。身著卡其制服，手握障碍性警棍。他象征着战争以及制造战争的社会，因为他有力量命令情人的汽车停下，又能剥夺他们正常的性别角色。正像巴恩斯所看到的那样，对于他们这代人来说，爱情已经死去。甚至没有伤残，他也不会是个男人，勃莱特也无法让自己的头发留长些。”

勃莱特同巴恩斯的相遇——分别——再相遇，象征着一个历史的圆圈。罗梅罗不过是无边黑暗中稍纵即逝的光束，出现又消失，一切都回到老样子。两个人都无法摆脱这个圆圈，无法摆脱命运给他们安排的爱而不能结合的痛苦。这个命运的圆圈早在《圣经》中就把它描绘出来了。海明威把它也写在了本书的扉页上：

一代过去，一代又来，地却永远长存。日头出来，日头落下，急归所出之地。风往

南刮，又向北转，不住的旋转，而且返回原道。江河都往海里流，海却不满。江河从何处流，仍归还何处。

《太阳照样升起》的书名即《圣经》中“日头出来”，海明威只是改用了现代英语的拼法，写作《The Sun Also Rises》。有人把这段引语及标题作乐观主义的解释，恐怕是不符合该书原意的。

(天舒撰)

【英】艾略特：
《荒原》——现代派诗歌之典范

在冬日破晓时的黄雾下，/一群人鱼贯地流过伦敦桥，人数是那么多，/我没想到死亡毁坏了这么多人。

这里的人既不能站也不能躺也不能坐，/山上甚至连静默也不存在，/只有枯干的雷没有雨，/山上甚至连寂寞也不存在。

——艾略特

艾略特是一个骨子里渗透了传统的作家，但这个传统经过他富有新意的创作得到了调整和充实。

——赫伯斯坦

一、艾略特的生平及其文学成就

艾略特(1888~1965)，英国诗人，批评家。出生于美国密苏里州圣路易斯，其祖辈是英国移民。艾略特中学毕业后，曾先后到哈佛大学、法国巴黎大学、德国、英国牛津大学求学，从事过中学教师和银行职员等工作。1922年创办《标准》杂志，1925年任费柏出版公司主任。1927年加入英国国籍。194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

艾略特早期诗歌创作中最主要的作品是《普鲁弗洛克的情歌》及《一个女士的画像》，1922年发表的《荒原》是他创作高峰期的代表作，后期主要的作品有《灰星期三》(1930)和《四个四重奏》(1944)。

艾略特的诗作表现了他面对欧洲文明的衰落所作的寻求和探索。在写作技巧上受到法国象征派诗歌、文艺复兴后期英国剧作家和玄学派诗歌的影响。从主题、结构、语言三个方面为现代派诗歌树立了创作的典范，改变了一代诗风。

二、《荒原》评介

从19世纪中叶的波德莱尔、爱伦·坡开始，西方艺术家对近代资产阶级理性精神的怀疑，历经本世纪初的后期象征主义、意象派、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超现实主义和未来主义等流派的冲击，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形成了一个高潮。战争的灾难无疑是对近代理性精神的致命一击，加速了“近代人”的衰亡。1922年问世的长诗《荒原》，即是对战后欧洲社会图景的象征主义描绘，也是近代理性主义危机的集中表现。它在艺术上所达到的成就，使它成为现代主义诗歌的里程碑。

把但丁的《神曲》和艾略特的《荒原》加以比较，是颇有意味的。两部作品都产生于历史发生转折和动荡的时期，都具有恢宏的史诗气度和神秘的宗教意识。他们都试图描绘出他们所处的时代图景，并为人们指出拯救自己

的道路。但《神曲》给人们提供的世界图景是严整而明晰的：地狱(九重)、炼狱(七重)、天堂(九重)，每个人都可依据自身的情况在这个图景中找到自己的准确位置或拯救自己的方式。这种世界观念的严整性和明晰性，决定了它在艺术形式上的严整和明晰。全诗 100 曲，除序诗外，每篇 33 曲，全部用三行连环体写成。形式上的“三”是世界本原的“三位一体”(圣父、圣子、圣灵)的投射。内容和形式上的这种高度适应性，使这首史诗达到了几乎无法比拟的完美程度。而《荒原》的情形却似乎完全相反，它所提供的世界图景是模糊而混乱的，人们从中无法探寻出世界运行的图景。这种模糊和混乱是近代理性在西方走向衰落的标记。全诗使用的晦涩、混乱的语言结构也恰好同这种世界图景相适应。《神曲》的字面意义是善有善报、恶有恶报，《荒原》却是恶欲横流，善良死灭；《神曲》表现出对“恶”的强力意识，《荒原》却是软弱无力；《神曲》引导人们走向“乐园”耶路撒冷，而《荒原》却让人的灵魂感到无家可归；《神曲》追求个人完美，《荒原》追求的是死亡意识。两者都以基督教为皈依，但《神曲》充满乐观精神，《荒原》却渲染浓厚的灰色意识。

当社会出现信仰上的“断裂带”时，往往产生“荒原文学”。在西方历史上，最典型的荒原期是公元 4、5 世纪——古罗马行将灭亡时期和公元 17 世纪初——即所谓“巴洛克时期”，还有就是上世纪末、本世纪初——资本主义发展的“低谷”和第一次世界大战。精神上的“荒原”期末未必是文学的衰颓，而常常是相反。荒原期的文学所揭示的心灵是破碎的，氛围是悲观的，思想是神秘的，结构是奇诡的，语言是诡谲的。从总体上说带有精神病人的那种心理变态。

《荒原》同《神曲》一样，大量使用神话。但《神曲》多用古希腊荷马时代以后，即人类开始进入“本体论时代”的材料，这些材料反映人类童年时代的个体意识觉醒和对宇宙规律的最初思考。这种思考本身就意味着人对自然的分离。而《荒原》引用的多属“神话时代”，即蒙昧时期的神话。这一时期的人与自然尚存“脐带联系”，人和自然交混为一，个体意识有如胚胎，躁动于大自然的母腹之中，人和自然都显得更加混沌和无秩序。艾略特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物质废墟和精神废墟犹如使人们返回了那个比希腊文明更早的神话时代。那个时代的世界图景在两本著作中得到了生动的描绘，这就是魏士登女士所著的《从祭仪到神话》(J.L.Weston:《From Ritual to Romance》)和弗雷泽所著的《金枝》(Frazer:《Golden Bough》)。在这两部著作中，作者大量记述了原始时代灾难流行导致山野荒芜、植物不再生长、动物几尽灭绝、妇女神秘地失去生育能力的传说。在初民们的理解，那一定是主繁殖的神(如渔王)患了病或被害了(耶稣也是主繁殖的神，《金枝》中有关于他被害的传说)。只有少年英雄出现，手执利剑去寻找“圣杯”，才能治愈渔王的病，使荒原复苏。这里的“利剑”喻男性，“圣杯”喻女性(纸牌中的“黑桃”和“红桃”分别从剑和圣杯转化而来)。寻找“圣杯”的故事又源于人们对于宇宙间一切生命本源的最初觉悟，只是用神话的形式来表现了。人类进入文明时代经常以“荒原”作为象征喻人类精神的被毁灭。《圣经》中《以西结书》有对以色列人因崇拜异教偶像，上帝耶和華命令将家园变为废墟的记载。古罗马灭亡前，罗马城五次遭焚，“神圣之都”化为废墟，是上帝对荒淫的罗马人的惩罚。“荒原”于是成了人类犯罪结下的恶果。到了文艺复兴末期，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把人世间比喻为“荒芜的花

园，到处长满恶毒的莠草”，使“荒原”成为邪恶势力的象征。在《李尔王》里，疯了的李尔流落于荒原之上，荒原具有宇宙本体的意义。所以，本世纪初，艾略特以荒原喻死亡不算是发明，但他在极其广阔的历史跨度上展开“荒原”的精神内涵，使得“荒原”成为物质世界与精神世界毁灭的象征性符号。

这是一首需要用“智力”来阅读的诗，像但丁的《神曲》一样，充盈着各种典故，而且晦涩、朦胧、“混乱”。然而，一旦突破这些“障碍”，一股强大的情感激流就会淹没你的身心。

第一节《死者葬仪》的最初几行表现了一种同近代理性精神绝不相容的情绪：

四月是最残忍的一个月/荒地上长着丁香/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又让春雨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

文艺复兴以来，春天(四月)历来是生命与希望的象征，莎士比亚的喜剧称之为“春天的戏剧”、“绿色的戏剧”。浪漫派雪莱的名句：“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其中的春天也是希望和胜利的象征。但在艾略特看来，春天是残忍的，其残忍就在于把“回忆”和“欲望”掺合在一起。回忆已经逝去，欲望又只能导致人们犯罪和死亡(“欲望”毁灭人)。它用春雨去催促那些迟钝的根芽生长，而生长的结局又将是痛苦的死亡。因此，还不如冬天。

“冬天”的好处就在于不死不活，不知道是死、不知道是活。冬雪成为蜗居的洞穴，它帮助人们忘掉一切。老话说“哀莫大于心死”。这里艾略特却说：“乐莫大于心死”；心死了，就没有了欲望，也就没有了痛苦。

但实际上诗人饱含着痛苦。他回忆起那象征纯洁的“爱尔兰小孩”和象征春天的“风信子女郎”。但这女郎在走出风信子花园时头发湿漉漉的——她失掉了自己的贞洁。面对被玷污了的女郎，诗人说：……我说不出话/眼睛看不见/我既不是活的/也未曾死/我什么都不知道/望着光亮的中心看时/是一片寂静/荒凉而空虚是那大海。

情欲吞没了纯洁，使精神世界变得一片荒凉。基督教的“先知”以西结突然奉神旨出现了：所有灾难都是信奉异教偶像的结果。上帝必将惩罚你们：“在你们一切住处，城邑要变为荒场，邱坛必然凄凉，使你们的祭坛荒废，将你们的偶像打碎，你们的日像被砍倒，你们的工作被毁灭。”

第二节以《对奕》为题，通过贵妇人的无聊生活与酒吧间庸俗小市民的对话，继续深化“虽生犹死”的主题。本节第一句就引用了《安东尼和克莉奥佩特拉》(莎士比亚)的话：

她所坐的椅子/象发亮的宝座/……

使人想起那个色欲旺盛终致毁灭的埃及女花蛇。房间里陈设的描绘也带有浓重的情欲气息：

小瓶里/暗藏着她那奇异的合成香料——/膏状 粉状或液体的——/使感觉局促不安，迷惘/被淹没在香味里；

“镶板的房顶”又令人联想到委身于伊尼亚斯的女王狄多，她也为自己的情欲付出了生命的代价。

在情欲的大海之上飞翔着一只纯洁的夜莺，那是被狂暴的国王强奸并杀害了的翡绿眉拉，她是纯洁而不幸的，整个世界参与了对她的迫害，而她的哀歌也只有唱给“脏耳朵听”。生活在这个污浊环境里的贵妇人百无聊赖，只有在用刷子梳理长发时，“散成了火星似的小点子/亮成词句，然后又转而野蛮的沉寂。”无聊压迫着她，使她恐惧。

“偶像”的破碎导致生活理想的失落，精神世界茫无所归，剩下的只是情欲，于是等待着奸夫的到来：“等着那一下敲门的声音。”

在下等酒吧里，几个庸俗女子在谈论色情。丽儿的丈夫退伍快回来了，可丽儿在丈夫入伍期间打了5次胎，刚满31岁就老了，“你应该把牙拔了，换副好的，让丈夫看了痛快”。可丽儿“有的是男人”。言谈之间插入店老板五次催促：“请快些，时间到了。”多次反复使这句简单的言词有了象征意义。结尾的“明儿见，明儿见，明天见，……”见之于《哈姆雷特》中奥菲莉娅死亡前向世界告别的台词。因此“时间到了”就自然地同死亡联在了一起。

在第三节《火诫》中，失去理性支持的人们堕入情欲之海的情景在更广泛的天幕上展开了，那在夏夜泰晤士河畔野合的“仙女”及“老板们的后代”、野合处留下的香烟头和面包纸以及老鼠粘湿的肚皮爬过的草地，同希腊神话中偷看裸体的月亮女神的阿格坦恩，同福迪能王子“在死水里垂钓我那国王的兄弟的沉舟”交混在一起。

第四节《水里的死亡》和第五节《雷霆的话》，指出淹死在情欲大海中的“腓尼基水手”（“珍珠是他的眼睛”）们，只有皈依上帝才能从死亡中救赎自己。《神曲》中指出的救赎之路也是皈依上帝，但它具有强烈的追求个人完美的色彩；而《荒原》却实实在在地告诫近代人要砸碎一切偶像返回远古的神话时代。《神曲》是“进步”的，《荒原》是“倒退”的，这样评价似嫌过于简单化。在由机器和电气（乃至当今的计算机）所造成的科学时代，资本主义制度加上科学的无孔不入，造成物质主义盛行，人们匍伏于五光十色的物质商品面前，成了金钱这一商品等价物的奴隶。为了反抗这种物质主义，需要找回自己的超于物质经验的精神生活，没有这种精神生活人将堕落而非人，而为禽兽。这种对于超验世界的寻找，就是走在你身边的“那一个”（“that”，即耶稣）。当代西方迫于物质世界的压迫，迫于陷于“网络”之中而成为“操作对象”的尴尬，普遍出现一种“返回神话”的趋势，他们在重新寻找“上帝”。当然，这个“上帝”已不同于中世纪的上帝了。

（天舒撰）

【日】川端康成：
《古都》——展示愁绪超脱之悲美

我现在深感自己的生涯尚未“出发之前”就已经终结了，只有自己一人回到旧日山河中去。我业已死去，此后除了日本悲哀的美之外，连一行字也不想写了。

——川端康成

他是一位和传统有着最深刻联系的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着日本的感情和感觉的作家。”

——吉田精一

一、川端康成的生平及其文学成就

川端康成于 1899 年 6 月 14 日出生在大阪市北区此花町 1 段 79 号。父亲荣吉，从东京医科学校毕业后，在大阪府东成郡天王寺桃山的一家高桥医院任副院长。在川端康成出生的第二年，父亲因患肺结核病去世。母亲阿玄带着姐姐芳子和川端康成回到乡下丰田村娘家。由于母亲因照顾父亲也染上了肺结核病，回到娘家的第二年也追随父亲而去。失去双亲后不久，川端康成便随祖父回到了老家——大阪府三岛郡丰川村，姐姐芳子则寄养在姨母家里。

川端康成生活在日本社会激烈动荡的年代。1918 年的“夺粮暴动”，1921 年的经济危机和 1923 年的关东大地震，使得 20 世纪初期的日本混乱不堪。与此同时，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引起了日本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开展。这是一场重大的社会斗争，其严肃性、深刻性以及残酷性是一些小资产阶级作家所始料不及的。

川端康成对无产阶级革命始终持审慎、保留的游离的态度。他的作品也不乏对劳动者的溢美和对社会下层弱小者的同情，但他又认为无产阶级无法解除知识分子的生活穷途和精神苦闷。他虽然从未否认过无产阶级文学，但从来没有接触过马克思主义，一直徘徊于心灵科学的迷雾之中。

西方文化汹涌而来，日本传统文化遭到巨大的冲击。这个国家正经历着殖民心态下的痛苦变革和迅速发展经济的动荡时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伦理道德等多方面都在发生着痛苦的脱胎换骨的嬗变。

川端康成自幼羸弱，饱受疾病折磨。步入老年，更是每况愈下。60 年代，长期困扰他的脑神经衰弱已使他苦不堪言。在写作《古都》时，几乎处在似醒非醒，精神恍惚，夜游神般的状态之中。他曾试图停药长期滥用的镇定药，但此后又发生了严重的禁药症状，以致躺在东京大医院神志不清达 10 天之久。1966 年又得了肝炎。1972 年 3 月，就在他自杀前一个月，又因急性盲肠炎做了手术，身体更是虚弱。他一生几乎没有健康快乐的日子。一个人失去健康是痛苦的，一个作家由于疾病的折磨而不能写作，则更痛苦。再加上思

想观念和社会生活方面的矛盾状态使之精神发生危机，创作枯竭。于是他口含煤气管，于1972年4月16日，平静自若地撒手人寰，走向天国，结束了自己73岁的生命。

1968年川端康成以《雪国》、《古都》、《千只鹤》这3部小说荣膺世界文学最高荣誉——诺贝尔文学奖，成为继泰戈尔之后，登临斯德哥尔摩文学圣坛的亚洲第二个作家。他以其敏锐的感受，高超的叙事技巧，表现了日本人的精神实质，他在艺术上的创新和独特的美学风格为世人瞩目。

川端康成的创作生涯始于1914年，迄于1972年自杀辍笔，历时58个年头，总计写了一百多种长篇、中篇和短篇小说。人们对这些作品褒贬不一。

一方面，他的小说充溢着对日本山川林木自然风光的深情歌颂，对普通人民，特别是贫苦的下层女性的由衷赞美。小说的基调是一种扎根于日本民族传统的纤细的哀愁，一种面对自然与人生的深沉的感伤，使他的小说深受日本人民的喜爱。特别是战后，川端康成获得了多种荣誉头衔和奖金奖章。1948年任日本笔会会长，同年他的中篇小说《雪国》获“文艺恳谈会”奖。1952年，《千只鹤》和《山音》两篇小说获日本艺术院奖。1957年获原西德政府颁发的“歌德金牌”。1958年被选为国际笔会副会长。1960年又获法国政府颁发的文化艺术勋章。1961年，他以小说创作的杰出成就被日本政府授予文化勋章。1968年以《雪国》、《古都》、《千只鹤》三部小说，获瑞典皇家科学院颁发的世界性最高荣誉奖——诺贝尔文学奖。

但是另一方面，川端康成在日本也受到过许多严厉的批评，主要是一些无产阶级文学派的批评。他们认为，川端康成的小说缺乏时代感，回避社会矛盾，宣扬封建统治阶级或资产阶级情调。八十年代后，川端康成的作品介绍到中国，我国读书界对他的小说多数也持难以肯定的看法。他们认为川端康成倡导的“新感觉派”主张是“唯心主义的”，他的文艺思想是唯美主义的，他的人生观是虚无主义的。对这些评论，尽管我们不能用孰是孰非来作简单的结论，但是也不能不引起重视。

川端康成的作品确实缺乏时代气息，缺乏真切的社会感，这恐怕是由多种因素造成的。如日本先被拖进战争的深渊，后又遭到惨败，使他产生一种“国破”的哀痛。随着社会生产高速度的发展，随着西方生活方式和思想道德的涌入，日本传统的东西遭到冲击和破坏，等等，这就决定了川端康成战后生活和创作的基调。无论在实际生活中还是在创作实践中，他却不是现实生活的积极参加者和干预者。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以战败为分水岭，我从此仿佛只有脚离开现实，遨游于太空了。也许由于我本来就没有深入现实中去，所以脱离现实也很容易。无非是舍弃世界，隐遁山林而已。”因此，川端康成的目光是狭窄的，描写对象主要是女性和自然景物。他开始，写学生欣赏舞女，艺术家欣赏艺妓，后来写哥哥欣赏妹妹（《孤儿的情感》），弟弟欣赏嫂子（《寂静的雨》），到最后发展到公爹欣赏儿媳（《山音》），已经丧失性能力的老头欣赏服了安眠药的裸体妓女（《睡美人》）。这些欣赏，都是带细微的性心理描写进行的，即使在日本也不认为是道德的。这表明，川端康成所追求的日本传统美已经穷途末路了。

作为新感觉派的代表，川端康成一再宣称自己的文学与政治无关，追求的是瞬间的美，刹那间的感受以及受压抑的官能，追求一种清新淡雅的风格，寂寞孤独的情调。很难看出他作品中的男女恋情，人生流转，禅宗佛教有多大的社会功利目的，也不能从茶道和舞蹈中发掘出振聋发聩的东西。川端康

成追求的是一种纯粹的“美”：自然山水的美，风花雪月的美，男女恋情的美，甚至他还能把丑恶的情欲化作“丑中之美，死中之美，死中之生。不伦中的清洁，罪恶中的纯洁，诸如此类的内部转换和象征升华。”使他的作品难免带上颓废色彩。或许如同日本学者所说：“川端康成所继承的日本美，正是一种颓废的感情，是由于毁灭和死亡的接近而更加炽烈的官能冲动及虚无、悲哀产生的。”因为川端康成就是“作为一名走向没落的日本上流阶级家庭的毁灭和死亡的歌手登场”的。

至于虚无思想的影响，川端康成曾强调说：“有的评论家说我的作品是虚无的，不过这不同于西方所说的虚无主义，我觉得这在‘心灵’上根本是不同的。”这里作者强调的“心灵”是关键，西方的虚无主义者的心灵有一种“恶”的精灵。他们否定一切价值，而川端康成却是抱着一种“空灵”的态度，有虚的一面，同时还有“灵”的一面。在他看来世上的一切都像“镜中花”一样，作为花的实体它是无意义的，作为花的美感它是存在的。川端康成正是用这样的态度来对待现存世界的二次大战时期日本动荡的政局，大战后人民的苦难，文坛的严酷、动荡，对川端康成来说不是不存在，他只是用一面镜子把自己与现实隔开。竭力挖掘自我内心的不安，追求刹那间的美感，官能上的享受和日常生活中非现实的东西。这一事实是无可回避的：它们不论在反映生活的本质内容上，还是在朦胧颓废的艺术效果上，都与西方现代文学中，体现着虚无、颓废思潮的作品有着千丝万缕的相通之处。

可见，外来文化与本土文化的交流和碰撞，虽然给川端康成的创作提供了丰富营养，但两种文化中的负面影响又给他的小说带来了一些不健康的色调。这说明，对任何文化，无论是本土文化，还是外来文化，都要有一种正确的态度，既要合理吸收，又要适当扬弃。

日本民族是一个具有浓郁审美情愫的民族。泰戈尔曾这样说过：“日本民族创造了一种具有完美形态的文化，发展了一种视觉美，从美中发现真理，从真理中发现美。”川端康成就是继承和发展了日本民族传统美的作家。他以特有的纤细和敏锐的感受，捕捉了“清淡而纯真之美，向世界展示了东方之美”——悲哀美。

二、《古都》评介

（一）东西融合的创作方法

在评介《古都》这部小说之前，我们先来分析一下川端康成的创作方法。尽管川端康成是一位执着追求传统美的作家，用日本学者吉田精一的评价是：“他是一位和传统有着最深刻联系的，从形式到内容都渗透着日本的感情和感觉的作家。”但他并不排斥西方流派的影响。他曾是“新感觉派”运动中的一名骁将，也醉心过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和乔伊斯的创作，参加过新艺术派和新心理主义文学运动。他的成功就在于他寻找到了—条继承和借鉴相结合的方法：那就是在东西方文化的比较中寻找民族文化的根，寻找自己的路，即继承传统与借鉴西方文化并举的路，从而创造出川端康成文学的美，东方传统的美。

川端康成在总结日本文学借鉴西方文学的利弊中指出：“我总觉得，许多人在学习和引进西方文学方面耗费了青春和精力，大半生都忙于启蒙工

作，却没有立足于东方和日本的传统，使自己的创作达到成熟的地步。”川端康成的分析是深刻的，他找到了问题的症结，也指出了解决问题的途径。

“我们的文学的传统却是潜藏着的看不见的河床。”他努力将汲取的西方文学溶化在日本古典的传统与形式之中，更自觉地寻找“共同思考东西文化的‘融合’或‘桥梁’的位置。”从而育成川端康成文学的特质。

在川端康成的重要作品中，始终将现代主义的创作方法与日本传统文学的创作方法有机地融汇在一起，使东方的审美意识与西方的审美意识互补渗透，熔铸成一种崭新的审美情趣。如川端康成根据联想来描写人物的意识流动，使联想不断地深入到人物的内心世界中去；同时又保持日本文学传统中坚实、严谨和工整的格调。既有意识的自由流动，又有叙事的稳定程式；使意识的跃动不是杂乱无章，而是有条不紊地进行；使西方的意识流的手法结合着日本传统文学的表现手法：显示出一种独特的美学力量。这就使建立在东方文化根基的川端康成的文学，焕发出一种新的异彩。

又如，川端康成借鉴“新感觉派”艺术表现手法，创造新颖独特的艺术形象和表现人物微妙复杂的心态；善于利用捕捉瞬间的感觉来构成丰富的动感画面；着意描写人物的情绪，追求虚幻、抽象的意境，形成一系列虚虚实实、真真假假，替迭变化的意象。这些艺术方法借鉴的是西方式的，但透视着的却是日本式的情调和心态。

川端康成并不“不认为追求西方文学的新潮流就是新，也不认为追求时代的新潮流就是新”，而是更执着于对日本文学传统的追求，更强调完全模仿西方不是日本文学应走的唯一新路。他主张“日本既是日本的，也是东方的，同时又是西方的，”即创造出一种新的日本文学。既有传统的，又有现代的；既有东方的，又有西方的。但其根基是传统的，日本的。川端康成向全世界显示了一种富有独创意义的美的存在。

概言之，川端康成的人生经历，社会环境，传统文化和西方影响等多层面的因素构成一股强大的合力，促成他文学创作的鲜明美学风格——悲哀美。

川端康成既是美的执着的追求者和探寻者，也是人生的执着的追求者和探寻者。他对人生的追求与探寻，主要是通过对美的追求与探寻体现出来的。

从川端康成追求美的心路历程，我们可以看到，在早期的创作中，他对美的追求主要表现为对美好人性的呼唤和期盼。他将这种渴求与期盼倾注到纯洁的少女身上，表现了一种哀婉朦胧之美。在中期创作中，由于战争的爆发，一切美的东西都遭到了毁灭性的打击，人的价值、人的尊严因野蛮主义的恶性膨胀受到了更为极端的践踏。向往美，追求美，但又害怕斗争的川端康成，则表现出美好人性在现实面前的绝望，男女之间的爱情，美好高尚的品德幻化成一种虚无，使作品呈现出凄冷悲怨之美。在晚期创作中，川端康成作为一个日本人观察了战败国的人情冷漠，世态炎凉。专制统治的压抑和束缚，使他对美的追求由对美好人性的追求转变为扭曲变态的人性的探索，并从病态中挖掘人类生命的本质，企图从中找到一种非现实的“纯真之美”。川端康成在创作的晚年，达到了他探索的最高时期，他清醒地看待社会，潇洒地面对人生，开始追求一种乐观、旷达、积极的情调，从而实现了对美的升华与超脱。

他的整个创作都渗透着日本民族文化心态中的一种强烈的生命意识。一方面，是在可诅咒年代里，善良人们痛苦的呻吟和顽强的挣扎；另一方面，

是在现实的重压和冷酷面前人们的哀伤、悲叹与绝望。川端康成的作品，始终笼罩着一种“温柔的伤感，淡淡的哀愁”的艺术氛围。他把悲与美巧妙地结合在一起，构成一种既美且悲，愈美愈悲，因悲方美，因美而悲的独特格调。

(二) 别具一格的愁绪超脱关系

纵观川端康成的作品，他的悲美风格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早期创作的哀婉朦胧之美；中期创作的凄冷悲怨之美；二战后期的扭曲病态之美；以及晚年创作的愁绪超脱之美。

可以说，川端康成创作晚年是其愁绪超脱之美的最高表现时期。这一点在《古都》这部小说中可以十分清晰地反映出来。在《古都》中，尽管也有缕缕哀愁，但它却没有压过贯穿整部小说的乐观、向上的主旋律；尽管也有怀旧的悲叹，但艺术形象却冲破作家所圈定的窠臼，体现出对真正意义上的“传统美”的珍视。

《古都》以千重子和苗子这对孪生姐妹的悲欢离合的遭遇为故事情节的主旋律，她们之间深厚的姊妹情构成了作品的主要部分。其次是千重子与养父母的亲子情和千重子、苗子、真一、秀男、龙助等之间纯真朦胧的爱情。

由于生活所迫，姐姐千重子出生后就被抛弃，后来为批发商太吉郎收养，成为富贵人家的小姐。而妹妹苗子则很小就成了孤儿，在一贫寒人家长大，以做工为生。然而，天各一方的别离并没有割断骨肉之谊。苗子虔诚地去神台参拜，祈求“知道姐姐的下落”，千重子无时不在挂念着远方的亲人。在与妹妹相认后，千重子不顾路远，跑到北杉村去看望苗子，无微不至地关怀她，全心全意为她的前途着想。巨雷骤雨袭来时，苗子怀着“纵然冒死也要掩护”姐姐的决心，用自己的身体把千重子覆盖得严严实实，她的“体温在千重子身上扩散开去，”使千重子感到“一种不可名状的至亲的温暖”。苗子为了不打扰姐姐一家的生活，毅然拒绝了千重子共同生活的邀请，只是“趁没人看见”的深夜到千重子家里，与姐姐同床共枕一宿，并把这视为“一生的幸福”，第二天清晨便冒雪离去了。小说到此嘎然而止，但姐妹俩深厚的感情和从中体现出来的善良的心灵美，却长久地留在读者的脑海中。

亲子之情主要表现在太吉郎夫妇和千重子之间的感情上。千重子虽然不是太吉郎夫妇的亲生女儿，但他们从来没把她当弃儿看待，20年如一日，视如己出，总是爱护她，关心她；千重子虽然早已知道自己不是这家的孩子，却对养父母由衷地挚爱、孝敬。分担着父母因生意不好而引起的烦恼和忧愁。如当太吉郎因买卖不景气而到嵯峨山中隐居时，千重子想方设法照料安慰他，换围幔，做饭菜，送画册，使郁闷得难以自拔的太吉郎看到了晚年的乐趣。而母亲更是把全部感情倾注在千重子身上，她关心着女儿的成长和婚事，生命上体贴入微。他们把名贵的围幔毫不吝惜地剪开给女儿做围腰，可又觉得不够好看，父亲便亲自动手苦心设计图案，专门请人编织，“用来表达对女儿温暖的父爱之情。”这种深厚、真诚的亲子情，展示出人性中最为美好的、神圣的部分，从而为作品增添了深沉的力度。

纯真朦胧的爱情在《古都》中所占比重不大，但却洁净得近乎透明。小说开篇，作家就以明快的笔调，单纯的线条，描画出在樱花盛开的春日里，千重子与儿时好友真一之间纯真感情的萌发。他们青梅竹马，无论是织工秀

男的倾心爱慕，还是大批发商的长子龙助的热烈追求，都不能抹去真一在千重子心中的身影。尽管这种爱情是朦胧的，带有几分稚气，但它是那么自然、纯洁，是那么醇香沁人。龙助为了得到千重子的爱，不惜放弃财产继承权，甘愿去做太吉郎的下手。在那处处散发着铜臭的社会中，这种感情又是多么清新，可喜。因门第悬殊，秀男只能把对千重子的爱埋在心底。一个偶然的时机，他把苗子错认为千重子，后来转而移情于苗子。苗子刚刚体会到初恋的，夹带着羞涩的甜蜜，但为了姐姐的幸福，迟迟不肯答应秀男的求婚，以致想牺牲这份感情，躲入深山。

《古都》充满了人类最纯朴、诚挚的感情，这种感情又为高尚的情操和自我牺牲精神所升华，给人一种净化灵魂的审美感受。

尽管这部作品的笔调是乐观的，但其中也有缕缕愁绪。无论是同胞姐妹咫尺天涯，情深意切却终难相聚的遗憾，还是太吉郎夫妇行至暮年、生意萧条的怅惘，特别是秀男难以如愿的初恋之情，苗子忍痛割爱的远遁之心，都为小说平添了一种淡淡的哀雾。但《古都》的悲哀，大都是有根基可寻的现实的悲哀，而无虚无、空幻的氛围。它正是贫富不均，动荡不安的社会所导致，正是现实阴影在主人公生活中、心灵里的反照。因而，这几许哀雾，不但没有使《古都》处于一片朦胧之中，反而增强了它的现实感。加之作品所表现的姐妹情、亲子情和爱情，它们闪闪动人的光芒穿透了孤独、悲哀的屏障，使全篇充满了温暖、淳厚的人情美。

(三)对民族审美“幽情”观的继承和超越

川端康成笔下的忧怨哀伤的格调构成了“川端康成之美”的主旋律。他的“悲哀美”深深植于日本传统的“幽情”，表现了日本民族特有的审美意识。

川端康成是日本新感觉派文学的代表，他在创作方法上主张感受至上，认为文学是表现人的主观而非再现客观世界，刻意追求新的感觉和新的表现手法。读川端康成的小说，犹如欣赏东山魁夷的画，不要试图去追寻故事，而要注重感受，注重那纯静而又艳丽，清晰而又朦胧的感觉之美。他的小说犹如一曲曲哀婉动人的抒情小调，“只那清清淡淡，疏疏落落的几句，就把乾坤古今的一切情感都包括得纤屑不遗。”

《古都》中千重子虽为富门闺秀，但“弃儿”一词总是铭刻在她的头上，挥抹不去。她希望与妹妹苗子生活在一起，弥补幼时失去亲人之爱，但贫富、门第的悬殊，造成隔阂。苗子长自农村，一直受雇于人，自立谋生。当二人骨肉重逢，姐妹团圆，永不分离大有希望时，千重子邀请苗子去家里作客，苗子却坚定地说：“不，我不能去。”当千重子征得父母同意，让苗子与自己共同生活时，苗子的回答是那样有自知之明：“小姐，现在你我之间的生活方式不同，教养也不一样，我也过不惯大城市生活，我只要上你家去一次，只要一次也就行了。”这里，既有一往情深的善良心地，又有对自己环境、地位、前途的清醒的自我意识，更包含着对社会、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和体会。寥寥几笔，通过简练自然，如行云流水的语言，表现出人物的“幽情”。可谓精练传神的含蓄之美。

(四)对日本传统“物哀”文学的延续和升华

“物哀”是日本人从自然风物的生长状态来体悟人生和美学，植物的盛衰荣枯就积淀为审美意识。“物”是指自然万物，“哀”则是指人的各种情感意绪，有感伤，也有渴念。感伤发端于生命短暂的哀叹；渴念则是哀叹中的憧憬，无望中的希望。所以，“物哀”是心与形，主观与客观，自然与人生的契合，表现一种优美而典雅的情趣，又具有悲哀的意蕴。可以说，“物哀”就是大和民族以“生命短暂的悲哀”为情感基调的，对于大自然的全息而广达的审美感悟。“物哀”之所以成为日本美学和文学的最高原则和境界，就是因为它浓缩了大和民族关于生命与死亡，此岸与彼岸，瞬间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的丰富深邃的生命体验，“融化了日本式的安慰和解救”的思想追求。这也构成川端康成审美意识的主体部分，对其文学创作有着深远的影响。

川端康成吸收并延续了传统的“物哀”文学的手法，而且使之升华到更高的艺术层次，形成自己独特的审美特征。正如作者所说：“在小说家中，我这号人大概是属于喜欢写景色和季节的。”景物描写在川端康成的笔下，形成了一大特色。作品中的自然景物的描写，不仅仅作为人物的背景与活动的空间范围来写，而是为了作品中人物的情绪的对象化，既成为人物感情变化的衬托，又是人物情感世界的辐射和拓展，将自然景物的变化与人物心灵的喜怒哀乐交融契合，达到浑谐一体的“忘我之境”。

诗情画意的风俗图——

川端康成的作品具有诗一般的意境，诗情画意构成了他小说独特的审美风格。他在小说中的“意境”的创造，很容易使人联想到中国古典诗词创作中的“意境”。尽管川端康成是在叙事体文学中创作意境，但是那种情景交融的艺术境界，如同诗歌创作中的“意境”一样具有强烈而又丰富的审美效应，产生着无穷的艺术魅力。

《古都》更如一幅长长的“京都民俗画卷”。作者让读者跟随千重子寻访京都的名胜古迹，领略古都的传统节祭，风俗人情和生活百态。京都最引人注目的是她一年四季频繁不断的各类庙会节祭，其中最著名的有号称“三大祭”的“葵祭”、“祇园祭”和“时代祭”，以及初秋时节的“大字篝火”等。它们各具特色。不用说“葵祭”中古老的典仪，华贵的王朝装束，也不用说“祇园祭”上那华美巨大的彩车巡行，震天动地的鼓乐；更不必说“时代祭”上如同京都千年风俗变迁画卷的游行队伍。看着那个五山篝火中最为壮观的一个——东山如意峰“大字篝火”，使人感到的，不仅仅是深深的秋意，而且可以感到的日本人那颗虔诚的心的延续和伸展。

另外，还有鞍马寺那充满男子汉气概的伐竹会，贺茂神社那古趣盎然的曲水之宴，京都老铺旧家那洁无纤尘的红格子门，甚至那些古老的作坊和传统食品，无处不体现着川端康成对日本传统美的赞美和热爱。

然而，《古都》中也不乏嵯峨那样幽寂素朴之所，甚至仇野石塔群那远古之灵徘徊之地。如果说前者是一条汹涌的大河，那么，后者则可以说是一股隐伏难觅的暗流，它不时地露出地面，闪烁几下忧郁沉寂的目光，又被强大的主流所吞没。

更有甚者，青莲院中那棵巨大的楠树，盘根错节，形状古怪的老根，似乎可以感到其中蕴藏着一种强劲的生命力，令人望而生畏，甚至联想到整个日本国也同这古老楠一样。这种“虽悲且美”的“悲哀美”形成《古都》风俗图的格调。

融情入景以景言情——

川端康成这种融情入景，以景言情的艺术手法，流露出浓厚的日本式的抒情风味，熔“物哀”美与“幽玄”美为一炉，匠心独运，切实达到了外物与人心高度合谐。在《古都》中，他经常把自然景物和人事相互映照，寄托对人事无常的感慨，从而延伸情感表达空间。如对紫地丁树的描写：

树干弯曲处的紧下边有两个小坑，紫地丁就寄生在这两个小坑里。而且每年春天它就开花。从千重子懂事的时候起，那树上就有两株紫地丁了。

上边那株和下边这株相距大约一尺。豆蔻年华的千重子有时想：“上边的紫地丁和下边的紫地丁彼此不会有朝一日相逢，会不会成为知己？”紫地丁“相逢”和成为“知己”是什么意思呢？这连她自己也茫然。

这里的景物不是人物事件的单纯背景，而是为了加强感情表达效果，延伸情感的表现空间。这种景物描写是人物命运和人生情绪的相互契合，仿佛在人物命运演变中，大自然在跟着人走。两株紫色的地丁，是人物内心情感在自然界引起的一种感应。自然景物呼应着人物的心境，情感的波纹荡漾开去，就像空谷回音，久久不能平息。

(杨广丽撰)

【奥】卡夫卡：
《变形记》——营造荒诞艺术的王国

卡夫卡的荒诞艺术带领我们走进一个寻找真理而没有找到真理的非真实的真实的王国。

——约瑟·贝尔格纳

如果要我就卡夫卡的性格谈点什么的话，那么这就是：在他身上毫无特别引人注目的地方……他总是干干净净，整整齐齐，拘谨而又规矩，但是穿着从不讲究……他仿佛总是被一堵玻璃墙包围着，他同我们保持着距离和疏远。

——埃米尔·乌帝兹

一、卡夫卡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卡夫卡(1883~1924)，奥地利小说家。1883年7月3日出生于布拉格一个犹太家庭，父亲是个百货批发商，“专制犹如暴君”。1901年卡夫卡入布拉格大学学习文学，后转修法律，1906年获法学博士学位。曾在保险公司任职，1923年迁往柏林，1924年6月3日在维也纳附近的基尔灵疗养院病逝。在大学期间，卡夫卡结交了马克斯·布罗德，并在其影响下开始创作。不久，他又有机会涉猎丹麦哲学家存在主义先驱者克尔凯戈尔的哲学著作。这对他的思想和文学创作都有深远影响。卡夫卡的主要文学成就是小说，代表作有：3部长篇小说《美国》、《审判》、《城堡》(未写完)；短篇小说《变形记》、《在苦役营》等。卡夫卡的创作自成一派，他善于通过奇特的构思勾勒出夸张的画面，把现实与非现实、常人与非常人并列在一起，不点明时间、地点和社会背景，故事情节支离破碎，主题模糊，被称为现代文学的鼻祖。

荒诞艺术的创作个性，是卡夫卡的艺术观和美学追求。荒诞是一个哲学概念，也是一个美学概念。它是本世纪20至50年代存在主义思潮的产物。“荒诞”一词最初来自拉丁语 Surdus。后引伸为人与人之间的不能沟通或人与环境之间的根本失调。但这个概念并不是始终统一的，它因时而移，因人而异。海德格尔利用荒诞来描述基督教的信仰。雅斯佩尔斯笔下的荒诞表现为人在现实中的反复受挫，萨特通过荒诞表现人的生存的无意义。G·马赛尔观念中的荒诞是生命神秘的一种象征。卡夫卡的荒诞则是作者的一种特有的人生体验。

正如卡夫卡在1922年写的自况性的寓言体短篇小说《一条狗的研究》中，有一段关于荒诞的议论：“我最喜欢举的例子莫过于那条‘空中狗’了。最初听说有这么一条狗时，我不禁为之捧腹，怎么也不相信。……我觉得在这种荒诞的生活中，最荒诞的事情也比正正经经的事情要可信，……我坚信它们的存在。它们在我的世界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我觉得尤为不可思议的还在于那空中狗存在的荒谬性，那种不言自明的荒诞性”。这里不过是借狗的口吻说出作者对人的生存境况的见解罢了。所谓“空中狗的存在荒谬性”，

也就是人的存在的荒谬性。这段话中，表达了卡夫卡的一个重要的美学观点：荒诞的事情比正经的事情更可信，而且这个观点“在他的世界观中占有重要地位。”这对于卡夫卡的创作来说是决定性的，而对于认识卡夫卡的作品来说也是关键性的。荒诞，构成卡夫卡美学思想中的核心。

卡夫卡虽然身为业余作家，却具有强烈的使命感和职责感。从卡夫卡的使命感来看，卡夫卡认为作家并非一种职业，而是意味着一种使命。作家作为整个人类的代表，不是表现自我或仅仅只对自我说话，而应当是面对全人类发言。正因为如此，文学创作这一寻求意义的活动，便与人的存在意义和价值密切相联，如同生命中的阳光和空气一样。卡夫卡感到，他生活的幸福，他个人的能力，他在生活中所作所为的全部可能性，从来都存在于文学之中。只有处在文学的创造性活动中，认真的，评判作品的价值也是公正的、客观的。他曾经说过：“一本书真正独立的生命要在作者死后才表现出来，说得更正确些，要在作者死去一段时间后才表现出来，因为这些血性的人在他们死后还会为他们斗争一番，然后书就慢慢地孤单下来，只能依赖自己的心脏的搏动了”。卡夫卡的意思很清楚，文学作品本身的价值是独立存在的，对它们的价值的判断，不应以作家本人的态度为依据，而应以作品本身的尺度来评判。恰好言中了卡夫卡自己，他生前不愿发表作品，当然也没有什么名气。去世后，他的作品才开始流行，照他自己的说法，这时他的作品才“依赖自己的心脏的搏动”而存在。

卡夫卡创作不仅是观察自我内心世界、把自我的主观精神由内向外“巨大推进”的结果，也不仅是自我存在的实质的证明，同时也是以特殊的方式向现实这一巨大的“城堡”进行挑战和反抗，是作家自己的勇气、决心、意志和绝望的表现方式。他从独立走上社会那一天起，就开始全面反叛和挑战这一切，而他凭借的唯一的又是全部的武器，就是文学。这正是卡夫卡死后，他的文学越来越显示生命力的原因。

二、《变形记》评介

(一)无法摆脱的孤独感

卡夫卡特有的对人生与社会的全面失落感，注定了他作品中流露出来的孤独意识。在卡夫卡的作品中，他笔下的人物都像是生活在与周围世界完全隔离的“真空”中，无不给人一种不可摆脱的孤独感。

在《变形记》中，他把主人公变成一条大甲虫，通过扭曲人的外部形态，使人从人的世界中孤立起来。主人公小职员格高尔·萨姆沙一天清晨醒来，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甲虫，硕大的身子长着许多小细腿。特别令他痛苦的是，他的头脑还像以前那样清醒地思考问题，也能听懂别人的谈话。为此，他遭到全社会的厌恶和唾弃。首先抛弃他的是那个曾为之卖力干活的公司。公司的秘书主任原是用来登门问罪的，一见格里高尔遭了难，拔腿就溜，喊都喊不住，从此，公司再也不来问津了。接踵而来的是家里亲人的厌弃。母亲因同情而昏厥，父亲气得直想揍他，有一次拿苹果砸他，苹果嵌进他背上的肉内，因无法取出而变质腐烂。妹妹开始对他还不错，每天悄悄给他送来些吃的东西，但时间长了就感到他已不再是她的哥哥，开始讨厌他。雇用的老妈子“经常无聊地滋扰他，”笑骂他为“老屎蜣螂”。房客们拿他当怪物来

欣赏。他的亲人、朋友、同事、上司和熟人，“非但不帮他，却一个个都冷冰冰的”。他疑惑惶然，他的孤独感是常人无法接受和理解的。

(二) 审美情感的移入与间离

卡夫卡的《变形记》与古罗马的一部名著同名，即奥维德的《变形记》。这本身就意味着作者认为人类经过几千年的奋斗，并没有使自己从动物中升华出来，人们所创造的升华条件反过来变成束缚人自身的绳索。用《浮士德》中魔鬼的预言来说，是“比畜牲还要畜牲”。不同之处是，奥维德的《变形记》是双向的，人(神)可以变为动植物，动植物又可变为人(神)。统观全书虽有悲苦，但还有着人与自然浑然一体的自由感(天人合一)。卡夫卡的同名作品却是单向的：主人公格里高尔变成了虫，不可能再变为人，只有人的倒退而没有人的升华，因此显得更加悲哀。近代西方对人的困境的揭示早已有之，但《变形记》为人们提供了一个具有高度概括性的形象符号，以惊人的荒诞框架和惊人的细节真实再现了人的异化主题。作者不象巴尔扎克那样鲜明地指出造成人类沦落的社会条件，而只是深入探索被异化的内心感受。而这些感受的普遍性和真实性诱导读者进入主人公的虫体世界，读后仿佛自己也变成虫了。

德国费肖尔父子认为：审美过程是“移情”过程，并把这一过程解析为：“前向情感”、“后随情感”、“移入情感”三级。

依费氏父子的观点，我们试着对《变形记》作一分析。

人居然变成了虫，这同人们的生活常识相悖谬，因此造成接受的困难。如果不克服这个困难，读者始终认为故事是虚假的，就不可能发生“移情”的审美过程。

一个平庸的作家如果要在自己的作品中写主人公变成了“虫”，必先费很多笔调渲染奇诡、神秘的环境(惊雷、浓雾、乌云密布、火光闪闪、……)，而后写他在变成虫的过程中种种奇异的感觉和变虫后的惊恐，以致晕厥……总之，写一个惊奇的事实，必需种种令人惊奇的因素和后果来加以烘托。而卡夫卡的《变形记》竟然开得如此平淡：

一天早晨，格里高尔·萨姆沙从不安的睡梦中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床上变成了一只巨大的甲虫。

平淡得就像在讲一件人们习以为常的事。作者这种平淡的语气，同人们的习惯性心里反映之间产生了距离。这种距离使读者发生了疑惑，也就是作家的镇静态度使读者感到疑惑。这种疑惑构成“前向情感”，引导读者跟着作者向前走。反之，如果依照前面“平庸作家”的写法，作品与读者的习惯性心理(也许来源于众多诸如此类的作品)之间没有距离，没有“陌生感”，尽管你笔下吞云吐雾，读者只会索然无味，甚至不能卒读。

按照习惯性逻辑，一个人发现自己变成了大甲虫，他该是何等惊恐？他可能会大叫、会挣扎、会晕厥。如果照此写下去，读者依然会站在局外人的角度，冷眼旁观。而在卡夫卡的作品里，这些都没有发生。格里高尔发现自己变成虫时，他并没有惊恐，因为他怀疑这是个梦。作为一个终日辛劳的小职员，他多么需要睡眠呵。这种把意想不到、突然发生的事疑为梦境，是一般读者都易于接受的。此时，读者心态已从疑惑转入与格里高尔的心态暗合。这种暗合是情感移入的先导。想起床，起不来，以为只是太累了，……读到

此，读者的心境开始从疑惑转为萌发对这个小职员的怜悯和同情，……一个未意识到自己的不幸的不幸者，往往会博得更多的同情。此时，虽然书中的格里高尔还未意识到自己真的变成虫，而读者的心境却先于他体味这种情感。此时“前向情感”已转向“后随情感”。

快七点了，母亲催他起床去上班，他要回答母亲呼喊，却发不出人的声音，只会吱吱叫。这个现象仍未引起格里高尔注意自己变虫的事实，因为他被一种可怕的焦虑淹没了；万一赶不上火车，耽误了老板的事，自己被革职怎么办？年老的父亲和年幼的妹妹何以为生？这种心态对一个小职员来说，非常真实。……此时的读者被震撼了：人在变成非人之后，不是为自身的命运痛苦，而是焦虑他变成虫给他人带来的后果。待经理派秘书来催他去火车站而发现他已变成虫时，吓得从楼梯上滚下去了，这件事加深了格里高尔的焦虑：丢职似已无疑。而读者的情感开始同他产生“间离”：主人公的心境是焦虑，读者的心境是悲哀。当读者产生如是感觉时，表明他已经不自觉地接受了“人变成虫”这一荒诞的框架，并已开始为变虫的格里高尔而悲哀了。对于上述三阶段，可简单列表如下：

	前向情感	后随情感	移入情感
审美对象(作品)	镇静	(疑为梦中)	焦虑
审美主体(读者)	疑惑	心理暗合	同情与悲哀

审美主体与对象之间的“三阶段”是间离 暗合 间离。但后一个间离与前一个不同，第一个间离表明审美主体的情感尚未移入。后一个间离是移入后在“合一”(读者对主人公的同情)的基础上的“间离”。如果只有间离暗合，而没有第二个“间离”，作者只能让读者的心境随同主人公的命运而沉浮，而不可能获得更多的东西；第二个“间离”是现代派作家特别重视的。审美过程既有“移入”，又有“跳出”。

这种“移情”过程是反复发生、不断深入的。在格里高尔意识到自己已变成虫并因此而使家庭陷入窘境时，读者起初关心的是“怎么办”，这是在同情基础上生发的一个疑问(前向情感)。读到格里高尔悄悄爬到父母门边偷听家里经济情况时，读者发生进一步的同情(后随情感)。他因为没有办法帮助家庭解脱困厄而陷入无法自拔的痛苦，在这种情况下，他只能苦中作乐；

“在大白天，考虑到父母的脸面，他不愿趴在窗子上让人家看见，可是他在几平方米的地板上没什么好爬的。漫漫的长夜里他也不能始终安静地躺着不动，此外他很快就失去了对于食物的任何兴趣。因此，为了锻炼身体，他养成了在墙壁和天花板上纵横交错地爬来爬去的习惯。他特别喜欢倒挂在天花板上，这比躺在地板上强多了，呼吸起来也轻松多了，而且身体也可以轻轻地晃来晃去；倒悬的滋味使他乐而忘形，他忘乎所以地松了腿，直挺挺地掉在地板上。可是如今他对自己身体的控制能力比以前大有进步，所以即使摔得这么重，也没有受到损害。”

这又是一段震撼心灵的描写。但同样有“间离”：主人公苦中有乐，而读者心中酸辣苦咸都有，唯独没有乐。主人公的“乐”给读者的是更深沉的“悲”。

卡夫卡作品如此荒诞，但又能使读者接受，其根本原因在于荒诞框架中有惊人的真实。卢卡契说：“卡夫卡作品整体上的悖谬与荒诞是以细节描写的现实主义基础为前提的。”这种真实性特别突出地表现在细节上。格里高

尔父母和妹妹对他由最初的关切到终于厌弃的过程极其细致真切；一个为家庭生计奔波而变成虫的人最后被全家人所厌恶，这一过程是冷酷无情的，又是合情合理的(相形之下,巴尔扎克笔下的两个女儿对高老头的厌弃就未写出上述过程)。结尾写格里高尔自我消灭的愉快和家里人的轻松心情都真实可信。人的异化导致人的自我价值的失落，除了自我消灭，没有别的生路，因此死亡是愉快的。

(天舒撰)

【日】渡边淳一：
《失乐园》——现代婚外情的绝唱

我不是用头脑和知识来写这部小说，而是全身心为创作搏斗。

——渡边淳一

整部小说，是梦幻与现实，灵与肉，观悦与痛苦的交织。全书弥漫着似真似幻如泣如诉的悲哀，荡气回肠，扣人心弦。

——良木松二

一、渡边淳一的生平及其主要著作

渡边淳一，日本当代著名作家。1933年出生于日本北海道，就读于札幌医科大学并获医学博士学位，授课行医多年，后弃医从文，专心于文学创作。1965年，渡边淳一的小说《死亡化妆》正式登上日本文坛。1970年其小说《光和影》荣获日本文学奖，奠定了他在文坛上的地位。著作颇丰，代表作有：《心脏移植》、《雪舞》、《花葬》、《众神的夕阳》、《紫丁香冷清之街》等。

渡边淳一以多年从医的知识与生活积累在创作题材、手法、观念等方面给日本文学开拓了新天地，他的文笔清新流畅，多从现实生活中寻求现代人生的意义与命运抗争，善于选取独特的视角，去审视与俯瞰现实人生百态，探索人性发展与现代社会伦理、道德关系的矛盾冲突，蕴含着深刻的哲理，意味深长，发人深省。

二、《失乐园》评介

“我们是一边写这部小说一边在谈恋爱，是自己完全沉浸在恋爱状态之中写出来的，我从未如此深深地化为主人公来这般写作。”

“我不是用头脑和知识写小说，而是以全身心为创作而搏斗。”

这部小说就是渡边淳一近年来的一部力作——《失乐园》，刚一面世便引起了日本社会的轰动，一时间掀起一股“失乐园热”，小说一度改编成电影、电视连续剧在世界各地放映。

故事本身并不复杂，所讲述的也是日本现代生活中很平常的现象——婚外情。一对已婚的中年男女偶然相识相恋，陷入迷乱的情爱和疯狂的性爱而不能自拔。现实毕竟是残酷无情的，或是向世俗开战，公开他们的地下恋情，或是选择逃避，了结这段轰轰烈烈的情缘。世人的白眼与亲人的疏离并没有令他们退却，他们甘心冒天下之大不韪，毅然抛弃了各自原本看似美满的婚姻，然而也陷入了良心的自责，对不可知的未来的困惑与被社会抛弃的深深的孤独。他们无路可退，莫非是因为偷吃了性爱的禁果才会沦落污秽的现世，或许只有来生才是两人永恒的爱之乐园。几度挣扎之后，两人满怀着对彼此

的深爱和对未来的美丽梦幻，在“欢喜的顶点”了结此生，共赴重返伊甸园的旅程。

整部小说中，梦幻与现实，灵与肉，欢悦与痛楚相互交织，微妙的心理活动与错综复杂的情感纠葛，溶入到异域特有的四季更迭的绮丽环境，绯红如雾的樱花，洁白如银的雪景，两宗凄艳残酷的情杀旧事，令全书弥漫着似真似幻，如泣如诉的悲哀，荡气回肠，扣人心弦，不能不让人佩服作者精巧的构思与优美的文笔而难以释卷。

《失乐园》的故事情节基本上是沿着时间的推移而发展的。在第一章“落日”的开头，作者对男、女主人公的身份背景做了交待。

男主人公久木祥一郎，五十三、四岁，由于受新社长的排挤，被解除了出版社某部长的职务，调到调查室成为赋闲的编委，负责昭和史的编辑。独生女知佳出嫁后，其妻久木文枝忙于陶器厂的业务指导工作，夫妻二人关系冷淡无味，“夫妻之间只有公式性的谈话，连一起出去吃饭，或外出旅游都没有过。”而且近十年都不再有性生活了。女主人公松原凛子，三十七岁，一个“脸庞娇小玲珑，惹人喜爱，身材纤巧而匀称”的家庭妇女。家庭条件颇为优越，其夫松原晴彦是东京某所大学医学部的教授，“身材颀长的美男子”。然而这个看似平静的家庭中却潜伏着不安的暗流，晴彦个性沉默多疑，自私自利，专心于自己的事业，夫妻关系颇为冷淡。

两个人的相识是通过在文化中心工作的衣川。由于是衣川的老朋友，久木去中心作关于写作的讲演，而凛子则在中心担任书法的讲师。正处于事业和情感低谷期的久木立刻被美丽的凛子深深吸引，“一周后竟然凭着名片主动给对方打了电话”，并紧追不舍，而凛子也被久木的成熟魅力和痴情征服，两人终于陷入情网并做出越轨之举。

虽然，久木和凛子的爱是真挚而热烈的，尤其是彼此都从对方身上享受到了前所未有的炽热的性爱。拿凛子来说，起初是个很拘谨的，“楷书”一样刻板的女人，她的冷漠自私的丈夫从未给她温柔体贴的性爱。然而久木却开发了她沉眠未醒的快感，蜕变成一个成熟的女人，纵情享乐，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在作者看来，这是个美丽的过程。“这是女人肉体逐渐崩溃的过程，同时也意味着女性潜在的本身性感的苏醒”。而对于作为男人的久木来说，眼看着心爱的女人由原先青涩、坚硬的蓓蕾变得松弛、柔软，最终绽出飘香的大朵的鲜花，没有比这更快乐、更自豪的事了。这给久木带来的是某种生命意义上的满足，而且也充分享受了性的欢愉。

但是，这种快乐中也潜伏着无可回避的焦虑与危机，两个人都意识到他们的相爱终归是对彼此配偶和家庭的背叛。有妇之夫和有夫之妇的相爱是不合道德、有悖伦理的。在久木和凛子偷偷地去镰仓的路上，凛子谈起了她的女友逸见与一个大公司的社长的私情最终夭折的事，从而透露出对她和久木的爱情前景的担忧，及对日本现代社会对婚外情的态度。

众所周知，日本社会长期以来在男女关系问题是极严格而敏感的。婚外情一旦暴露，不仅意味着将会受到舆论的一致谴责，甚至“外面有情人”的话就会被降职或成为人事变动时的不利因素”。这正如弗洛伊德所说，人类的性文明史就是人被压抑的历史，压抑是获取文明不得不付出的代价。但是这种文明社会的骨子里又是什么呢？作者对此作了尖刻的嘲讽，“从表面上看一本正经的样子，内心的欲望却被压抑和扭曲，丧失了自由潇洒的勃勃朝气。于是渐渐蜕变为嫉妒、中伤横行的险恶的社会了。”

事实上，从人本主义的角度来看，人类的性与爱不仅不是低俗的品性和行为，而是很高尚的，不仅不是不值一提的小事，而是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性与爱同人的自我有着极大的关系，一个不尊重自我的社会和文化也不会尊重性与爱。作者坦言，性就是文化，而且是一种奇妙无穷，必须去亲身体验的文化。“男人和女人，我们每个人从出生到长大成人，从所受到的教育以及经验和感性认识，都在性的场合中赤裸裸地暴露了出来，”与现代社会高度繁荣的表象相比，日本人越来越异化，越来越丧失自我，甚至在性爱中都不能真实地流露和渲泄自我。从久木所在的调查室的同事身上，我们不难发现，“离了婚”的秘书小姐，“与恋爱无缘”的铃木，“有相好的女人”的村松等，在恋爱、婚姻乃至性爱上都是不健全的。也正为此才对久木身上发生的新变化充满好奇与妒嫉并津津乐道。

对于这样一个社会大环境有所了解后，就可以明白何以久木和凛子在尽情品尝快乐的同时，总是摆脱不了焦虑与惶恐。甚至在最快乐时凛子还想着“我们会下地狱的”。就在他们的情爱逐步升级到达顶峰的一瞬间，他们却突然发现前方出现了一条峡谷。当两人以为找到快乐的伊甸园时，才意识到前面是杂草丛生的荒野。他们需要冷静地面对眼下的问题，如何能既满足两人的愿望又兼顾家庭呢？他们只能采取隐瞒和欺骗的办法。久木对妻子频频撒谎，凛子由于个性倔强以及不知不觉的放纵，与丈夫晴彦的关系日渐变僵，以至于去文化中心找衣川求职以取得经济独立时，都表现得心事重重。

可见，两个人开始感受到外界和自身的压力了，难怪苦恼无比的久木自问：“无论常识和伦理如何随着时代发展变化，相爱的人结合是万古不移的大义”，莫非这真的是不可宽恕的原罪吗？但如此耽于快乐，他们也认识到这怎么说也是不正当的。尤其是在凛子在为刚去世的父亲服丧期间，出于极度的思念，久木赶到横滨她娘家附近，强迫凛子来与其相会并以“令人羞耻的姿态结合”，事后久木为自己的寡廉鲜耻震惊，而凛子则为自己的不孝而深感罪孽深重，并且引起了母亲的怀疑，这给两个人的心灵都投下了阴影。

新年伊始，两情相悦达到了新的和谐，凛子由以前的被动变为主动。她的性意识彻底苏醒，彻底绽放了，伦理和常规对于这样一个欲火熊熊的女人来说再也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潜藏于身体深处的本能在觉醒，在发狂。她有了性的自信与自豪，下定决心不再理会丈夫的态度，并劝说久木也抛弃家庭。此时的久木不得不对凛子的决然刮目相看，两人在涩谷租下了房子过起秘密夫妻的生活。

他们的家庭状况都进一步恶化了。久木与妻子处于冷战状态，一向宽厚温和的妻子旁敲侧击地告诫他，连女儿都让他“对妈妈亲热一点儿”。凛子与丈夫的关系也更加紧张，她日渐憔悴，为了暂时躲避这种不快，两人一起去观看雪景，谁知雪越下越大，阻塞了下山的道路，凛子无法及时参加丈夫晴彦的侄女的婚礼，被迫滞留山上。两人在亲热中由于兴奋，久木几乎被凛子掐死。由此，久木联想到自己正在编写昭和史中接触到的材料——阿部定情杀案。他给凛子讲述了这个真实的故事，太平洋战争前夕，美丽的阿部定与她的老板，有妇之夫吉藏偷情，两人性爱极为和谐。在某次幽会达到快乐的顶峰时，阿部定勒死了吉藏，并割去吉藏的性器官带在身上，原本欲自寻短见，却被警察抓获。舆论对她颇为同情，律师也力辩这是爱的高潮中的过火行为，此案最终以轻判结案，阿部定仅入狱五年就被释放了。这个美丽而残忍的故事勾起了凛子的好奇心，同时也预示着久木和凛子未来的结局。

不久，久木身边发生了许多事，尤其是同期入公司的很有前途的水口因肺癌入院，在不久人世之际，一向勤奋工作的水口却表示对久木的羡慕后悔自己未能及时享乐。但此时久木和凜子处境更为不妙。晴彦终于无法忍耐，私下调查了他们相好的事，并以拒不离婚的方式折磨凜子。文枝也彻底对久木绝望，主动提出了离婚的请求，女儿知佳也站在母亲的一边，劝久木答应母亲的请求。出于内疚和犹豫，久木迟迟下不了决心。凜子被母亲逐出家门，她只有更加依恋久木，由于性感觉的深化她更加崇尚刹那主义，并且潜移默化地影响着久木。

久木无法下决心摧毁近三十年来生活现状，而凜子又离不了婚，两人再次逃避，来到伊豆的修善寺来赏樱花。妖艳美丽的樱花令他们痴醉不已，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光也是那么美好，但是心上的石头仍是沉甸甸的。凜子向久木倾诉了自己被晴彦虐待和凌辱的经过，再也不愿回那个家了。夜深人静，欢爱之后，凜子模仿阿部定，用红带子勒住久木的脖子，让他给自己念审讯阿部定的记录。两人都沉浸在这件诡异的案件中，凜子甚至发生了共鸣，认为“女人的心里都藏着这种念头”，由于爱一个男人爱得太深而杀死他是可以理解的。樱花在窗外不停地飘落，开也匆匆，谢也匆匆，绚烂一时却不能长久，久木和凜子对前途也充满了无奈的忧伤。

久木愈来愈沉溺于和凜子纵情享乐的浑浑噩噩的生活，不知不觉日益脱离公司的同事以及其他社会交往。在和衣川再次去酒吧喝酒时，才意识到努力工作的衣川和自暴自弃的自己，无法再保持以往的融洽了，衣川无意再为凜子的求职斡旋，也不再提邀请久木调往出版局工作的事。

刚进入梅雨季节的第二天，水口病故了，久木前往吊唁，对于世事无常，久木不禁感慨万千。当同来吊丧的同事中泽与久木聊天时流露出对他的艳羡时，久木的心情更加恶劣。只有他自己最清楚，他和凜子这份刻骨铭心的爱与诚实和善良无缘，将来很难会有善终，因为他们已陷入良知和理性的谴责而不能自拔的地步。这其中的难堪和苦痛又岂是中泽这个局外人所能了解的呢？这更令久木感到自己的孤立无援。

而凜子此时的处境更为艰难，其母向她发出了断绝母女关系的最后通牒。凜子蜗居于涩谷的小宅中，为了摆脱痛苦和自我惩罚，竟然向久木提出了鞭打她的变态要求。一度疯狂之后，两个人都想到了死。两个人认真地探讨，他们都是自由恋爱而结婚，然而为什么当初幸福美满的婚姻最终却千疮百孔？而谁又能保证他们这份如今正炽烈的爱永不褪色呢？久木现在失去了朋友、同事，在公司愈来愈不受重视，凜子也被这份沉重的爱所缚，落得孤家寡人的下场，只是一心憧憬着死在满足的顶点。久木在她的影响下，也不再排斥自杀的念头了。

梅雨将尽，久木和凜子去了轻井泽，想在凜子父亲留下的别墅中放松一下。在二人前往轻井泽的途中，作者借凜子之口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其中最关键的还是在于为什么世人只知道斥责和侮辱婚外情而不能心平气和设身处地考虑一下当事人自己的感受？对待音乐和小说会有所厌倦，对于爱过的人也自然会日渐淡漠。和自己不喜欢的人在一起生活，是欺骗对方，而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又被人说成是拆散家庭，这种两难的局面究竟是谁造成的，又该怎样解决呢？两人相对无言，只能彼此在床上给予对方暂时的平静和欢愉。

在轻井泽期间，凜子带久木去看有岛五郎绝命之处，这又是一个婚外情

的悲惨旧事。1924年，当时的文坛宠儿有岛五郎和有夫之妇，《妇人公论》的漂亮女记者波多野秋子在这里的别墅双双上吊情死，留下“在这欢喜的顶峰迎接死亡”的遗书，死状极为凄惨，这件旧事给予两人很深的刺激。连一向消沉、怯懦的久木都产生了既真实又可怕的想法：“人越是感到幸福，就越希望永远拥有它，因而选择了死。”所以两人都觉得“爱情这个很好听的字眼，其实是极端自私的，暗含着毁灭这种剧毒的东西。”两人为了体味活着的真实感觉，消除对死亡的恐惧，继续疯狂服用性爱的麻醉剂，沉沦于爱的地狱。

炎热的大暑时节，久木被迫辞职了，其导火索是凜子的丈夫晴彦为了报复，向社里的董事写了一封匿名信，恶意地揭露了久木与有夫之妇的不正当关系，久木无法做出有力的解释，正所谓对同一件事的看法会因人而异，两个人自以为至死不渝的爱是建立在不道德的基础上的，让久木百口莫辩。公司决定将久木调往他根本不熟悉的负责商品管理或流通部门的共荣社，没有一个同事表示挽留和安慰，这让久木伤透了心。在和凜子商量后，久木毅然递上辞呈，两人索性同时领来离婚协议书，签上各自的名字寄给家里，一时间，两个人都觉得摆脱了重负。

但是，他们真的自由了吗？在获得自由感的同时，随之而来的是被社会抛弃的孤独感和不安。凜子的母亲、兄嫂以及亲戚们都像躲避瘟疫似的躲着她，甚至不准她去给故去的父亲扫墓。久木也意识到了自己付出的代价，连今后的生计都成了难题，满腹忧愁的久木第一次主动打电话请衣川去他们常去的小酒吧喝酒，原想得到些许安慰，却不料被衣川训斥为不切实际，咎由自取。这代表日本社会男人们的普遍看法，逢场做戏是可以，但是，地位、工作以及家庭的体面更重要，哪能愚蠢到为了一个女人放弃一切呢？但是衣川也没有掩饰对凜子的仰慕和同情以及对久木的妒嫉，毕竟这样执着的情感在日本现代社会中是越来越可遇而不可求了，久木和凜子都是勇敢得令人钦佩的人。

出于好奇，凜子向衣川打听了久木的妻子文枝，并在暗地里观察了她，不禁惊诧于久木怎么会和这样好的妻子离婚。爱情本来就是游移不定的，他们两个人的爱迟早也会从顶峰上衰落下去，彼此厌倦，不复有今日的柔情蜜意。如果说现在久木和凜子虽然众叛亲离，但起码还拥有对方的狂热的爱，一旦爱情开始走下坡路，那他们就真的一无所有了。凜子坚定了去死的决心，她蛊惑久木和她一起在最快乐的时候死去的声音，不禁令久木想起了把有岛五郎引向死亡的波多野秋子。他也认同今后的生命中，的确不会再有超过现在的幸福和辉煌了，而且一想到倘若两人能紧紧地抱在一起死去这不知会给世人以怎样的震惊，这无疑是对整个社会的挑战和报复，这不能不令他有着隐约的快感。于是两人下定决心，一定要在快乐的顶峰同时结束生命。

为了能以结合在一起的姿势共赴死亡之旅，两人较尽脑汁。久木突然想起了自己的高中同学川端在环境分析中心的研究所工作，想办法从川端那里弄来了剧毒的氰化钾，而川端却毫不知情。

毒药的难题解决后，久木和凜子开始拟定死亡计划。为了能宁静、安详地死去，他们不分昼夜地欢爱，以消耗、燃尽所有的精力，摆脱日益临近的死亡的阴影。

在告别世界之前，久木返回阔别的家见妻女最后一面。贤慧的文枝虽然憎恶他的不忠与不负责任，还是为他准备了秋装，女儿知佳对自私的父亲生

气，却竭力在父母之间周旋。久木暗地心酸，他也不明白为什么好端端的一个家庭最终却支离破碎，但是一切已无可挽回了。

秋高气爽的季节，久木和凛子回到了风景宜人的轻井泽。作者让久木想起瓦莱里的诗句，“起风了，好好活下去”，衬托出久木对人世间的留恋。金秋时节，一切都是那么美好，两个相爱的人却来到这里迎接死亡，这是多么的不协调啊！

次日下午，凛子拟好遗书，“请原谅我们最后的任性。请把我们两人葬在一起，这是我们最后的希望。”在各自给至亲的人分别写完遗书后，两人共享最后的晚餐，为他们曾真实地活过，热烈地爱过举杯相庆，“活着太好了”！这是他们发出肺腑的感叹，但是又是谁剥夺了他们爱和活的权利呢？

最后的时刻无可抗拒地到来了，两人已了无牵挂，心地澄明，终于如愿以偿地在快乐的顶点喝下掺有氰化钾的红葡萄酒，紧紧地结合在一起，携手踏上两人所期待盼望的和梦寐以求的通往极乐世界的旅途。当人们一如他们所设计好的在指定时间来到别墅时，看见的只是两具热烈相缠的僵硬的尸体。至于他们是否真的能够重返伊甸园，也许只有他们自己才知道。

(杨广丽撰)

【美】考门夫人：
《荒漠甘泉》——滋润心田的甘泉

我们的一生，无时无刻不在患难和危险之中，但对于有信心与爱心的人，在他的心中却有极大的安宁。正如经上说：“在世上你们有苦难，但你们可以放心，我已经胜了世界。”

信心是一泓鲜活甜美的生命甘泉，爱心是一座支取不尽的心灵宝库。

——考门夫人

《荒漠甘泉》肩负传播着福音的使命，考门夫人为之讴歌和推崇的信心和爱心定能流遍人世间的每一个角落。教人生活、做人、处世，迄今为止，除了《圣经》没有一本能出其右。

——吕辉

一、考门夫人的生平与学术成就

考门夫人(Mrs.Charles E.Cowman)原名丽蒂伯德，1870年3月出生在美国伊利诺州一个好客的“伯德家庄”中。19岁时她与查理考门由“一见钟情”而步入结婚礼堂，两人爱情在春光之中享受甘露的滋润。

1894年初，两人参加了卫理会和奋兴会。这时考门夫人突然病危，她的丈夫查理考门在神前祷告，经过一场激烈的内心交战，终于回到了喜乐平安的家园。

1901年，考门夫人凭着信心与爱心，开始了她25年之久的宣教事业。特别是在查理考门突然去世以后，考门夫人在经历了更加艰辛的苦难与奋斗，开始提笔写作。这些作品受到了广泛欢迎，因此她把这些文字编辑成书，这就是有名的《荒漠甘泉》。

二、《荒漠甘泉》评介

《荒漠甘泉》是考门夫人在其丈夫生病卧床之际，为激励其丈夫战胜病魔而写下的一本诵经领悟集。该书从头至尾弥漫着浓重的宗教气息，好像一切都在主的授意下完成的。其实，该书是一部从宗教的角度介绍人生感受、智慧哲理的著作。她以丰富的内涵、精湛的意蕴、感人的情怀以及巨大的魅力，征服了亿万读者的心，成为一部畅销世界的不可朽名著。1894年，考门夫妇两人参加了卫理会和奋兴会。这时考门夫人突然病危，她丈夫查理考门在神面前谦卑祷告，求神医治爱妻的重病，并许愿以余生供奉神。经过激烈的内心交战，在爱世界与爱神中抉择，终于他走到基督赦罪的十字架前，再次回到天主的家，心头充满着喜乐平安。不久，考门夫人神奇般地恢复了健康，从此，考门夫妇更加虔诚地信仰上帝。为了传播上帝的恩泽，两人共同的心愿是去布道。就像《圣经》中所说“一粒麦子不落在地里死了，仍旧是一粒，

若是种在地里，就结出许多子粒来。”两人做了一些当机立断的决定，变卖自己的家产，款项全部捐给在非洲的传教士。紧接着，考门先生放弃自己的工作，把所有的时间都用于布道。为了上帝的信仰，考门夫妇走上了另外一种生活。1901年，他们凭着虔诚的爱上帝之心和爱人类的赤诚，在远东开始了长达25年之久的传教事业。1918年，他们回到美国，呼吁更多的人到远东去传教。正当他们从俄亥俄州去密西根的路上，考门先生忽感心脏剧痛，立即下车就医，谁知一病就是六年。考门先生只得放弃传教事业，在家休养。对于一个殷勤活泼的、立志把上帝恩泽传遍全世界的虔诚传教士，这是一个多么残酷的现实。从喧嚣繁华中退隐到孤寂的病房，从荣耀辉煌的工作到完全撇开这一切，再加上病魔的折磨，这又是多么的无奈！难道这是上帝的旨意？六年的时间，考门夫人没有睡过一个好觉，时时刻刻都在陪伴夫君煎熬，以度过漫漫长夜。

这样的打击和痛苦是常人难以承受的。然而，也只有苦难中磨出来的经验才具有撼人的力量。考门夫人在历尽苦难以后，一边陪伴丈夫，一边开始提笔写作。考门夫人本来就深谙《圣经》，现在重读，更有新意。她冥冥之中感觉上帝在向她招手，给她以信心和爱心，她不能独自享用，自己有责任更有义务把上帝赋予她的信心和爱心传播给全世界。她要让像她丈夫那样困在病房或远在非洲荒漠不辞辛苦的传教士，听到凯旋的奇妙音乐的回音，学会发现在沙漠中涌流的溪水。于是，她把自己诵经时的感受以日记的形式付诸笔端，这才有了《荒漠甘泉》。

由于考门夫人信仰上帝虔诚之至，在她的眼里，上帝是至高无双的。上帝创造一切，统治一切，他无处不在，无所不能。上帝给人类以恩惠，人类依仰上帝而生活。耶和华“是信实的神；向爱他、守他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直到千代；向恨他的人，当面报应他们，将他们灭绝。”人和上帝随时随处都可交流，他不需要人的形象，也不露出任何具体的形象，他始终在隐蔽处与人交谈。读罢整本书，只觉得好像是上帝在与你对话，上帝教你理解《圣经》的真谛。“向着天！主与你们同在”。每篇文章篇幅都不长，都是对《圣经》上面某一句话或一段话的领悟。读者可以想象，在夫君煎熬的漫漫长夜里，挑灯夜读《圣经》该是一种怎样的情景。那孜孜不倦，全神贯注的神态是多么的令人起敬！考门夫人联想自己25年苦难的传教经历，对着《圣经》上的一字一句，该有多少的感慨。没有亲身经历的苦难，没有刻骨铭心的感受，是绝对写不出那些令人动容的话语的。考门夫人以第一人称的语气，与你娓娓道来，其情深，其意切，好像自己是在禀承上帝的旨意，向人间播撒信心和爱心的种子。即使你不信上帝，但是你一旦读罢此书，你也好像感觉上帝的存在。不过，对于不信神的非基督教徒来说，这个上帝就是“考门夫人”自己，她代表的就是信心和爱心。所以这本书虽然具有浓厚的宗教色彩，但丝毫不减她的魅力。无论何时读她，都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人生充满着艰难与曲折，患难与危险，每个人既能享受成功的喜悦，也要品尝挫折的苦涩。有人面对困难垂头丧气，一蹶不振，觉得前途渺茫。这时，他们的心灵真可谓是处于一片荒漠状态。在苦难中苦苦挣扎的人们，该是多么地需要援助！当人们的心灵处于象这样丧失信心、软弱、忧伤、痛苦的荒漠时，《荒漠甘泉》是最好的“心药”。《荒漠甘泉》也可以说是用信心和爱心串穿起来的一片一片的话絮。坚定的信心和纯洁的爱心就是那流过干涸荒漠的甘泉。有了这甘泉，心灵就会被滋润，软弱、忧伤、痛苦都可以

被战胜。信心和爱心是《荒漠甘泉》全书的主题，是全书的灵魂。考门夫人为了激励病中的丈夫和病魔作斗争，反复强调信心和爱心。这信心和爱心，同样激励了亿万读者的心。人类的生命像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从远古流淌到现在，谁能说其中的主旋律不是《荒漠甘泉》中所展示的信心和爱心呢？信心和爱心好似那不熄的火炬熊熊燃烧，照亮人类前进的道路。

考门夫人在书中写道，谁也不能预卜在将来的行程中自己会碰到什么遭遇，什么变迁和什么需要。不能因为害怕而畏缩不前；不要因为能在平原上驰骋就心满意足，要力求登峰造极。在山顶上，有更美妙的景物在等着我们。看，多么璀璨晶莹的露珠，何等清新的空气，何其俊逸、开阔的居民，而这些在平原上是绝对享受不到的。但山路崎岖，令人心寒，因此有人就留恋平地，惧怕攀山越岭，终身局促于雾谷中，根本不了解极顶佳境。这个时候，最重要的是信心。焦躁的开始就是信心的结束，信心是走向成功的桥梁。只要信心一萌动，祝福就来到了。要坚信神站在你和你的难处之间，不能有丝毫的疑虑。神是我们的避难所，是我们的力量，我们在患难中随时给我们救助。有时我们似乎感觉神不理睬我们的请求，有意避开我们。但这是神在试炼我们。等到试炼过去后我们就可以见到父神的面容，领会他的奇妙。在黑暗中，我们如同瞎子，看不见神的踪影，但应深信他的存在。这其实是考门夫人告诉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随遇而安，不思进取。要相信只要有坚定的信心，努力去拼搏，成功就在等着我们。这个看不见的神，其实就是信心。他对处于困境中的人有着无穷的激励力量。

考门夫人在书中一再重复信心的重要性。正如她听说，信心是一把打开应允之门的钥匙。这把钥匙的使用权在你，你若不走近大门，门不会为你自动开启。要牢记，过度的等待就是不信。信心之于我身，正如动力之于工厂。有了信心，我们就没有一样不能做的事了。其实，在考门夫人所有的日记之中，无论是明的或是暗的，都或多或少地涉及到信心，信心是考门夫人写作的出发点。有了信心，才有一切；没有信心，世界也就不存在了。

强调了信心的重要性之后，考门夫人告诉我们如何抓住信心。她说：水退虹霓照，心静主降灵。一个有福的生命，不忧前程，不患得患失，万事知足。刮风或酷热的晚上，露珠凝结不起来，静谧降温，露珠才凝结到叶子上。你必须心平气和，心里充满安宁，神的甘露方开始滋润你的心灵。万物的发展演变，有其自身的规律。神的声音暂缓，不是拒绝，只是时辰未到。

当我们有了信心以后，又该如何看待困难呢？考门夫人说：神把华贵的王冠置于重重苦难之上。阴暗倒是植物生长的必要条件，逆风会使飞机高升。人生也如此，病痛、贫穷、损失喻为音乐里的休止符的话，不能删除。作为音乐来说，休止符，此时无声胜有声。人生也如音乐，虽顿住一下，可我们已徜徉于佳境，过了此刻，声乐又悠扬飘逸。神给我们困难与障碍，为的是要磨炼我们的信心。我们在日常的道路，如果遇到什么障碍，就应当把它们视为盛载信心的器皿，立刻拿主的“丰富”和“够用”去装满它们。如果能在苦难中静心等候，苦难最终就会变成我们的祝福。不能忍受苦难，就不能得到祝福。许多喜乐只能在忧伤中得到。生活在海洋里，不要惧怕风雨，风雨中我们最能产生信心。重压下的香料会散发出更浓郁的香气，最美丽的花朵生长在高高的雪山之巅，最精美的宝石受到最长时间的琢磨，最优美的雕刻受匠人凿子的敲打最多。彻底的失败往往转化成神奇的胜利，因为，只要坚定信心，迟早会绝处逢生。在危难中要感到惊喜，每战胜一次困难，意

志力都会百倍地增长，生命变得更加丰满。考门夫人把大困难看作大喜乐，她相信真金来自火炼。想成为真金的人，不仅不怕火炼，反而应感恩上帝给了你火炼的机会。

考门夫人对上帝充满着爱，因为上帝对人类赋予无尽的恩泽。无论在什么地方，主都与我们同在。她这样赞美爱心：“落日绚丽，繁星闪烁，高山险峻，海洋沉静，树木芳香，花草鲜艳，虽然无比美丽，却比不上那一颗爱上帝的心”。不难看出，这一颗爱上帝的心其实就是考门夫人爱人类的那一颗热忱的心。爱心使我们的生命更深沉、更丰富；爱心是心中一团燃烧的火，使我们痛恨罪恶；爱心具有无穷的力量，能战胜最恶毒的仇恨。考门夫人一再告诫人们要信上帝，要把最真挚虔诚的心献给上帝。人们一旦这样做了以后，就会时时接受感恩的雨露。祝福的微风吹起，人们立即沐浴一阵充满感恩的小雨。爱心犹如和谐的星空、绿树和清泉，她美化人生。爱心，导源于神的本性，在人间绽开美丽的奇葩，正如灯芯汲取油，点燃后就成了一盏明灯。

信心和爱心，是考门夫人所要送给读者最崇高、最珍贵的礼物。任何读者，都能从书中得益。书中的每一句话，如果抛开宗教的因素，无不闪烁着理性的光芒，跳跃着智慧的火花。自从《圣经》写成以后，还没有哪一位作者像考门夫人如此用浅显、亲切的语言深刻地阐述过。《荒漠甘泉》是考门夫人信心和爱心的宣言书，是人类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对于那些在艰难中奋斗，在困境中挣扎的人来说，犹如是奋进的号角，激昂的战鼓。《荒漠甘泉》所表达的信心和爱心，永远不会过时。人类只要生存，就不会抛弃信心和爱心。信心和爱心激励人们去克服困难，奋勇拼搏，夺取一个又一个的胜利。

丈夫去世以后，考门夫人悲痛欲绝。从此，在充满艰辛的布道之路上少了一个志同道合的伴侣。然而，考门夫人并没有倒下。上帝在召唤着她，信心和爱心在支撑着她，考门夫人仍然不辞劳苦地进行着宣教工作。由于过渡的劳累，考门夫人终于不支倒地。当医生断定是绝症后，考门夫人回到美国，仍马不停蹄地奔走各地策划一切。希望为远东、为中国献上的一切。在她九十高龄的那一年复活节，她歇下了地上的劳苦。安息前三天，她默默地将所有的笔记交托专人处理，这些整理出版以后就是《荒漠甘泉》的续集。在续集里，考门夫人同样地强调信心和爱心。信心和爱心是上帝要赋予人类最宝贵的品质，有了信心和爱心，世界才会和谐地运转。

《荒漠甘泉》可以说是一部生活、做人、处世方面的百科全书。《圣经》是基督教的经典之作，其中有许多内容是阐述基督教徒该如何遵照主的教导、怎样为人处世的原则。《荒漠甘泉》除自始至终贯穿的信心和爱心以外，还对这些为人处世的原则做了进一步的阐述和发挥。

考门夫人说：对自己要坦诚！高举两盏真理的灯——《圣经》和良知，诚恳地祈求《圣经》的指引，然后再勤勉地追问。要坦诚地面对自我，不要找借口掩饰过失，更不要与自己妥协。一旦发现有任何退缩的迹象，就立即提高警惕，追究根底，视察心灵的每个角落。锲而不舍地搜索，直到弄清问题的症结。要脱去虚伪的外衣，不要让嫉妒、骄傲、愤怒、贪婪、恶毒、野心占据你的心，不要因为恶小而为之。一个犹豫、一个疏忽，常给魔鬼制造机会。你让一寸一步，他立刻得寸进尺。要看守住防线，看护好灵魂。永远不要向魔鬼低头。

考门夫人对年轻人寄托着厚望，特别钟情于年轻人。她用饱满感情的笔去讴歌年轻人。年轻的心灵纯洁如清泉，也最能付出爱，他们的同情心如琴弦一般敏锐，喜乐或哀伤的轻轻一触，就能激起涟漪般的回响。他们的本性清新无邪，就如春天里的一片新绿，未蒙纤尘的污染。青年是人生的黄金时代，世界上许多伟大的成就都是由年轻人创造的，未来的许多丰功伟绩也可能是今天的青年成就的。同时，考门夫人告诫年轻人不要因为生活太忙乱，以致听不见从天上传来的美妙声音。要仔细聆听真理那寂静微小的声音，年轻人要珍惜宝贵的光阴，勤奋地收获。考门夫人充满自信地宣称：在时间的田地上早起耕作的人，一定会赢得生命最丰厚的奖赏。她要年轻人趁着青春年华，抓紧时间充实灵性的知识，修毕智慧的课程，专攻恩慈的德性。只要年轻时勤奋地磨炼自己，将来长大成人，不管面对如何严酷的考验都不致于疲于奔命、穷于应付。

现代社会物欲横流，在充满秽语淫词和欲望浮世的环境中，考门夫人警告人们要保持警惕，要像鸽子一样，洁身自爱。要相信圣灵，不能被罪恶所污玷。她把纯洁比作清晨摘下的一朵花，花瓣上缀着的露珠美得胜过世上任何珠光宝气的女皇。但是一旦抖落花上的露珠，任你再怎么小心尝试用水滴洒，也不能造出那晶莹的露珠了。尤其是年轻人美丽纯洁的天性，象一幅碧湖、青山、绿树交织而成的绝美的风景画，一旦被污黑的手触及，就永远无法恢复原来的纯洁。人要珍惜纯洁，宁愿被鲜血所染，也不肯让秽物玷污洁白之身。因为人一旦失去纯洁，或一般人所谓的人格及性灵，就等于什么都失去了。

《荒漠甘泉》面面俱到，只要是生活方面的事无论大小巨细，均有阐述。小至生活琐事如要早起，大至人生方向如树立远大理想。考门夫人认为，所有伟大的圣徒都是早起的人，不能因为贪图享受而赖在床上。一日之计在于晨，一年之计在于春。谈到理想时，考门夫人鼓励年轻人说：你们有幸面临一个伟大的日子，其伟大在于你们的未来。你们的成就一定会被衡量，不是依照以往你们享受了什么、做了什么或者拥有过什么，而是依照你们最后的成就。所有伟大的成就都是基于高远的目标、伟大的理想、广阔的视野、渺不可及的想象。地平线那端的巍峨群山，或许现在它们对你来说太陡峭、太巍峨，但是它们就是你的人生目标。不时高瞻远瞩的人，最终将发现他们已登临山顶，与蓝天相邻。她要年轻人记住：目标常常是吸引他们的磁力。

《荒漠甘泉》是一座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只要你去挖掘，无论何时何地都有巨大的收获。愿信心和爱心这股甘泉，流尽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流进每一个人的心田。

(江华撰)

【英】威廉·巴克莱：
《花香满径》——基督教的人生指南

生命是短暂的，人生是生与死的交替，也是哀与乐的交替。

——威廉·巴克莱

本书从宗教角度讲述了人生现象，为作家和读者提供了一个了解圣经的窗口。

——张震明

一、威廉·巴克莱的生平及其学术成就

威廉·巴克莱(William Barclay 1907—1978)博士，是当代英国爱尔兰著名圣经注释学家、希腊文专家，从1957年至1970年间，在英国报章杂志上所发表的谈论人生道德，伦理修养的短文集，在基督教中，这类文章算作“每日灵修读物”，《花香满径》原书名为《与威廉·巴克莱度过一年》(Through The year with William Bar - clay)。

巴克莱博士的著作在我国基督教界早已负盛名，他所著作的《新约圣经注释》(The Daily Study Bible Series)共18册，经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约请多位学者译成中文并出版发行。从1969年第一版发行以来先后再版六次。近年来，我国培训教会牧师的许多所神学院，每年的毕业生都人手一套，成为他们手中重要的圣经参考书。他的多种著作《致七教会书》(新约时代的7个教会)(Letters to the Seven Churches)，《新约原文字解》(New Testament Words)，都已译成中文由香港基督教文艺出版社分别于1958年及1979年出版，此外他所著作的《圣经导论》(Introducing the Bible)，《主人的人们》(The master's men)，《保罗的思想》(The mind of Paul)及《每天与巴克莱相处》(Everyday with William Bar - clay)也都是我国教会人士所熟悉的作品，巴克莱博士除去有许多解释圣经的著作外，这本《花香满径》又是他著名的灵修书籍，可以说这本书代表了基督教中主流派教会的主要思想，巴克莱博士对音乐还有高度修养，在英国格拉斯哥大学任教时，还曾担任过该校圣诗班的指挥。

二、《花香满径》的哲理思想

《花香满径》可以说是从基督教观点出发，对人生、道德、伦理、人际关系、社会服务等各方面作了较深入的阐述，基督教界人士认为此书为一本较好的人生修养书籍，现将其中一些闪耀着人生哲理的光芒的警言摘录如下：

幸福 幸福的生活有三个不可缺的因素：一是有希望，二是有事做，三是能爱人。

生活的规律 生活的规律有三条：

第一条规律是：要幸福，不可让自我做中心；第二条规律是：在幸运之时，永远不要只顾自己；第三条规律是：在善事上，不可自以为义。

时间 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差不多都感叹人生太短，不知道到底有多少时间可以给他用。要是把我们一生可用的时间仔细计算，真是少得令人吃惊。因此，关于时间，我们应该常常记住三件事：

第一，我们一生只有那么多时间，用完了不会再增加。其次，谁也不知道自己还会有多少时间可用。第三，如果要学习，应该趁着现在去学；假使现在不学，将来能够用在学习上的时间会越来越少。

决定做一件事，必须细心思考。想做的事太多，时间却太少，要拣真正有价值的事来做。

圣灵 圣灵不单是忧伤时能安慰我们的朋友，也是我们生活艰困的时候灵性上的力量。

刚柔互济 生活里头最大的一个恩赐，就是能够刚柔互济。

有坚强的意志固然很好，但是不可以顽固。

坚持自己的宗旨是好事，但不可不给人留有余地。

坚持信仰是好事，但却不可自以为是。

专心 要做到专心有两件不可缺少的事。

第一要有兴趣。有了兴趣，专心自然会来。一件应该做的事，而又能够完成它，我们才能专心。

乐观与悲观认为天下无难事的人，有他一定的的用处。

阅读 经常阅读，广泛阅读，价值无比。喜欢读书的人绝不孤单，喜欢阅读的人绝不厌倦。喜欢阅读的人可以海阔天空。

能读书才能不偏激、不狭隘，不致见木而不见林，不致目光短浅。读书能让人的眼光远大、头脑丰富。

生活 一个人对一件事要是不能情有所专，嗜之如命，绝不能成就伟大。基督徒无论做什么事，只为了一个目的，就是得到基督的赞许。

学习 真正的好教育不是教学生想什么，而是教他怎样去想。

真正的教育不是把东西塞进学生的脑袋，而是从学生的脑袋里把东西提取出来。

领袖 领袖是有眼光能看见明天需要的人。领袖是一个有智慧的人，知道在什么时候应该做什么事。

做领袖的人必须有冒险的勇气。领袖一定要有吸引人的魅力。

传统 传统是重要的。传统能把好的保留下来。传统也能把一些已经毫无意义的事，抱残守缺，保留下来。传统可以启迪新思，或发思古之幽情；也可以成为进步的阻力。

我们应该鼓励好的传统。同时我们也不应该抱残守缺。

代沟 代沟是“权威”这种思想的结果。

父母应该是孩子的好指导、好顾问，把孩子当成一个人，是两代人之间应守的第一条原则。

父母若要成为子女的朋友，他们之间必须有沟通。

祷告 祷告不是要上主替我们做事，而是让上主帮助我们去完成我们的工作。

祷告不是把我们的责任卸给上主，而是让上主来帮助我们有力量完成我

们自己的责任。

祷告不是要逃避，而是要征服。

祷告不只是和上主讲话，更是听上主说话。

祷词没有说“帮助我”，而是“帮助我们”。

祷词没有说帮助别人，而是说帮助我去帮助别人。

最完美的祷告，应该是：“主啊，求你帮助我有力量去帮助别人。”

小心谨慎 我们接触或处理十分有价值的事物时，一定得小心谨慎。

遇到人生有价值的事物，能小心处理；遇到危险的事物，能谨慎避开；遇到能为善也可为恶的事物，能用戒慎戒惧的态度去使用，这人是智慧的。

积少成多 无论做什么事，若能不断努力，每次做一点；有恒心地做下去，积少成多，可以做成大事。

立身之道 一个文明要不解体的话，必须具有三个基本条件，它们是一个社会能够生存的力量。第一是诚。没有了诚，一切商业、工业和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都会瓦解。第二是服务的精神。第三是贞。

美丽 岁月催人，我们的面孔在时间的磨炼中慢慢形成一个样子，是许多种平日的表情留下的痕迹陶塑出来的。忧虑能在我们的前额留下深深的皱纹。愤恨能在一个人的脸上留下痕迹。喜乐也能在一个人的脸上留下痕迹。

中庸之道 古圣先贤忠告我们别走极端，凡事都应寻求不偏不倚之道，要做得恰到好处。

魅力 魅力是一种伟大的天赋。

魅力里面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像阳光能溶解冰块。

魅力也是一种最危险的天赋。魅力可以招致两种危险。第一种危险是用它来摆脱自己所惹来的麻烦。第二种危险是用它来替代行动。

先知 先知是能洞悉未来的人。

先知是肯细心用耳来听的人。先知有敢于说话的嘴。先知是奉献全身心的。先知的工作危机四伏。凡能为了上主的缘故，不顾生死的人，才配做他的先知。

谦逊 最高明也最有效的布道，在基本上必须出诸同情和爱心。

要是能用基督徒的谦逊来说话，话里面有的是同情和爱心，设身处地为罪人想，这种布道的态度，一定可为基督赢得胜利的归来。一个人有权利持有自己的意见，也有权利把这些意见说出来。

一个人有权利说出他自己的意见，但也同样有义务听取别人的意见。

自信 有充分的准备，又有力量能应付，这是一种自信。

有天赋而又有自知之明，也可以产生一种自信。

心高气傲，自命不凡，当然也是一种自信；但是，是错的。

美好的事物 平淡的生活中总可以见到美好的事物。对美的追寻，可以让我们得到三件东西：

它让我们思念天父，懂得这个世界是天父所创造、所管理的。

它能让我们心存感恩，知道天父总会为我们预备一些美好的事物，让我们能够献上感谢。

它能让我们立下决心、采取行动，尽我们的所能，为这世界除去丑陋，增添几分美丽。

眼光 事事物物要能从长远看，才能显出它们的真正分量和价值。着眼将来，应该不仅仅想到自己，也要想到人家。我们现在做什么，无论是好是

坏，死后都会继续影响下去。

要是能着眼永生，就更好得无比。

人生因此应该目光远大，着眼将来。

自己 要认识自己绝不容易。没有一个人能真正认识自己。

一个人很容易对自己产生错觉。

因此有人帮助我们真正认识自己，看清自己的时候，应该心理对他十分的感激。

人从哪里来 我从哪里来？我往哪里去？我怎样去？

这个问题的答案不止一个。人是男女交合的产物。

我们可以说，人是纯物质的构成物。

在基督徒眼中，生命不是偶然的遇合，也不是化学物质的揉搓。生命实质上来自上主。

生与死 人生的价值是不能够用年岁来衡量的。这道理人人都明白。

生命的长短与生命的价值，其间没有必然关系。

从另一种意义来说，人无论怎么老，都不可以死，因为死后要见上主。谁也没有资格去见圣洁无暇的天父，生命才是短暂的。

世界是一座桥，智慧人只会从桥上走过，不会从桥上往下走。人只是世上的一个寄居者，一个朝圣客。

人生是生与死的交替，也是哀与乐的交替。生与死、乐与忧，交替不息，不管变化如何，生命总得向前。

对人生憎恨、抱怨、抗拒，不能改变世界，只能引起无穷的烦恼，徒呼负负。

历史 历史可以让人悲观，也可以让人乐观。

历史因此证明了基督的能力可以完成像这样不可能的事。历史让我们可以对人类保持乐观的希望。

历史可以给我们希望，也可以给我们失望，历史可以叫我们怀疑，也可以让我们得到信心。

历史可以催入睡，也可以叫人醒。

悲观、乐观；怀疑、信服；催眠、提醒；这一切，历史都可以给我们。

选择权操在我们自己手里。

归信基督 一个人一生有三次转变：

转变的第一步，是要深信耶稣基督的奇妙救赎，明白他能够为我们完成我们没有力量替自己做的事。

转变的第二步，就是这种归信基督的经验，使我们有了权利和责任，去和有同样经验、共同信仰的人交通，成为他们的一分子。

转变的第三步，就是明白我们归信基督，不只是为我们自己的好处，也不只是为了要与信徒结成一体，而是要负起一个基督徒的责任，心里惦记着世人的罪、痛苦和忧愁，把福音传给他们。要是有一个归信了主的人没有成为教会的一部分，这种归信是不完全的。

归信是把个人和其他的信徒连接起来，而不是与他们分开。

要是一个人对社会不关心，对世人没有热切的责任感，这种归信也是不完全的。

献身给耶稣基督，和教会密切团契，积极关怀、爱护我们四周的人，是归信基督的一体的三面，也是真正归信的标记。

友谊 时间可以让我们淡忘一个人；但真正的友谊所建立起的关系，决不能被时间摧毁。

真友谊关山不能隔断。真正的友谊是懂得什么时候应该只陪朋友，什么时候一定要帮他做点事。

真正的朋友是懂得什么时候应该行动，什么时候应该安静的人。

拯救 悔改很容易引起误解。悔改包括三件事：第一，是对我们所犯的错误的体认；其次，是对我们所犯的错误的忧伤难过。

必须要有更新，要把生命重塑，像圣经所说的结出悔改的果子来。这是悔改的第三步。他指出了得救的四个步骤：

“第一，你必须愿意承认他是上主，他是永生的。

“第二，尽管你有罪、你失败、你背运，你必须接受他仍然爱你这个事实；这也就是为什么他要他的儿子为你死，并且钉在十字架上。

“第三，你必须愿意认罪悔改。悔改的意思就是说，承认你德行上的缺陷，愿意完全脱离罪。

“第四，你必须接受耶稣基督作你个人的救主。”

革新 面对任何新的情况都不外这三种态度：(1)反动的态度。反动的态度不能忘情于旧日，是进步潮流的阻挡。(2)革命的态度。(3)温和的、渐进的态度。

残忍 我希望畜养小动物的人千万不要这样残忍。动物不会抗议，不会投诉，如此残酷，于心何忍。残虐是丑陋的，对有口却不能说话、孤苦无助的动物残忍，更是丑陋无比。

命运 我们生活在一个力量的世纪。人类所控制的力量是我们的祖先从没有梦想到的。

现代人拥有的力量是空前的。

这种力量给我们带来了一个生死攸关的问题。

要是人类所控制的力量，只用来毁灭自己，倒不如没有发现它们的好。

有了力量，最要紧的是使用这些力量的人要有好的品性和德行。力量操在良善有爱心的人手里，便能成为祝福；要是落在自私自利而又暴戾的人手里，力量便会变成罪恶。

目标 人生一定要有目标。

没有目标让我们不能朝着目标的方向去努力，决不能把事情做好。

有了目标，我们才能知道是不是在进步。

定目标的时候，一定要让它高过我们所能达到的标准。这也就是理想的精义。

基督徒的生活可以用一句话来总结：朝着“仰望基督”走来耶稣基督才是那唯一的目标，也是那唯一的标准。

(江华撰)

科学学·未来学

【美】弗里德·希伦：
《挑战上帝》——揭开宇宙与生命本源的“天机”

我们对这个宇宙的定律发现得越多，我们就越明白事物运动的方式。

——弗里德·希伦

一位怀疑圣经上帝的人和你探讨有关宇宙与生命的重大问题。

——希·卡尔

一、弗里德·希伦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弗里德·希伦是《宇宙追求》季刊的编辑。该刊专为探索和争论由科学而引起的世界本源问题的人提供信息和论坛。

作为科学栏目撰稿人和怀疑圣经上帝的人，最近七年来，他为探讨有关生命的重大问题的结论付出了极大的努力。为了寻找有关宇宙根本问题的科学和历史的证据，他直接走访了许多作出重大科学发现的人，其中包括获得诺贝尔奖的天文学家、美国航空航天局项目小组组长以及像史蒂芬·霍金、阿兰·古思这样的理论物理学家。

在研究探索的过程中，希伦创建并领导了“探索灯”公司和宇宙探索协会，通过这两个组织，对最新科学研究成果及其哲学涵义进行了深入研究。他最近的重大项目主要包括：制作《当今最高级的太空科学家访谈录》系列录像带（第一集名为“上帝的证据”），以及《怀疑论者的圣经指南》等几套录音磁带。他已经完成了由四部著作构成的《奇迹》丛书，本书是该丛书的第一部。

希伦经常在天文学会议上演讲并参与辩论。他还担任着日星制片公司的“世界唯一的宇宙记者”。他鼓励终日缠在琐碎的日常工作中的人们摆脱繁琐的小事，去考虑生命的重大问题。这位“世界唯一的宇宙记者”现与妻子和五个孩子生活在美国伊利诺斯州。

二、《挑战上帝》评介

弗里德·希伦称，他的工作使命是为了“鼓励终日缠在琐碎的日常工作中的人们摆脱繁琐的小事，去考虑生命的重大问题。”这一意向在本书中有充分的体现。

浩渺无垠的宇宙从哪里来？

时间与空间因何得以发端和延伸？

茫茫广宇及其包容的万物万类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

太空中数不尽的星体星系循何种规则靠何动力运动和演化？

概率极低的有机生命为什么降临和衍生在我们这个蔚蓝色的行星上？

DNA 这种高度精确的显微级生命基因密码有没有“先期设计者”？

地球生命在太阳系、在银河系、在更加遥远的宇宙空间竟能何处觅知音？自然之谜太多、太多！破解了这个，又冒出那个。人类用实证科学手段锲而不舍地“上下而求索”，一次次挑战圣经“上帝”，一步步深入未知领域，一层层揭开“天机”奥秘。时至今日，宗教对“造物”根由的解释权已在空前程度上被科学所取代。

（一）“回归圣经”的倾向

本书以科普作家通俗的表述方式和睿智的语言风格，对20世纪以至更早时候探索宇宙生命本源的科学成果、论点和质疑作了相当全面的归纳、分析和评介，内容上涵盖了从天文学到考古学、从生物学到历史学等学科前沿发出的一系列新鲜信息，以及许多著名西方科学家“遵循实证”的创见和他们难以摆脱的“回归圣经”的倾向。科学的异彩与神学的灵光不协调地交互呈现，构成了本书的一种特色。

在科学与神学两界，希伦一向被认为是“怀疑圣经上帝的人”。但在这本书里，他却表现出某种“回归圣经”的倾向。在“大爆炸”问题上，希伦援引了圣经故事中的“神喻”和一些西方科学家带有神学意味的言论，认为似乎有一个超然独立于宇宙之外的、类同于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的“超级智慧”，是这个“超级智慧”预先编排了“大爆炸”的“整体程序”和各种必要的“密码”，启动“大爆炸”并使之按他的“前期设计”在膨胀中造成了包括地球生命在内的可观测宇宙。换言之，也就是基督教所谓的“全知全能”的上帝在幕后运作着这一切。

翻开《旧约全书》首篇《创世纪》第一章，我们看到了圣经对神创造天地之过程所作的描述：“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神看光是好的，就把光暗分开了。神称光为昼，称暗为夜。”“神说，诸水之间要有空气，将水分成上下。神就造出了空气，将空气以上的水、空气以下的水分开了。事就这样成了。神称空气为天。”“神说，天下的水要聚在一处、使旱地露出来。事就这样成了。神称旱地为地，称水的聚处为海。”这里所说的神亦即通常所谓的上帝。上帝于混沌太极之境开天辟地，据圣经说，只用了两日。接下去，第三、四、五、六日，草木、日月、众星、飞鸟、昆虫、牲畜、野兽，乃至我们人类，仍是凭着上帝说一声“要有”，便递次创造出来，于是“你有我有全都有”了。天与地，及其所承载万物万类，由是俱全。第七日，上帝功成身退，休息去了……

对我们唯物论者来说，这样解释浩繁驳杂的物质世界之创生，乍看之下，难免会觉得“太不讲理”。“事就这样成了”？哪会这么简单！但是，冷静地想一想，似乎也能理解。据说圣经产生于三千多年前，人类对自然界的探索还可以追溯到更久远的远古。谁能知道，自人类悟性初萌至圣经问世那一段漫长的岁月里，曾有过多少种关于宇宙与生命起源的奇想殊见呢？无论千种万种，受文明程度特别是科学发展水准的限制，大抵没有哪一种能够突破蒙昧的藩篱。即便如此，却不能没有一种“终极”的解释来统一人们的认识。圣经担起了这个任务：先创造一位“全知全能”的上帝，再让上帝凭自己至高无上的意志和无所不能的神力来创造大自然的一切一切。他老人家一说该有什么，立马就有了什么。这就是圣经赖以立足的顶头到底的“道理”，你不用再问“为什么”。可也是，圣经开始成书那个年月，你不接受圣经的解

释，又还有什么更高明的解释堪称“终极”呢？今天用历史的眼光来看，圣经也很了不起。

《创世纪》往后，圣经接着给我们讲了一个《伊甸园》的故事。说上帝造人，先造了个男人叫亚当，后造了个女人叫夏娃，又给这一男一女造了个园子叫伊甸园。园子里花草果木应有尽有，吃喝不愁，悠哉悠哉。上帝告诫亚当夏娃，什么果子都能吃，就是生命树上结的智慧果不能吃。不料亚当夏娃受了蛇的唆使，把智慧果摘着吃了。这一吃可谓“天惊石破”，原来浑酱酱的脑袋顿时开了窍；一看自己光着身子，赶紧摘片树叶遮住私处，他们知道羞耻了。上帝闻知，大怒，派天使把这一双男女撵出了伊甸园。这还不算，还罚他俩和蛇永远受苦：男人饱受劳作之苦，女人饱受生育之苦，蛇饱受用肚皮走路之苦。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被基督教称之为人类的“原罪”，以后种种罪孽皆由之衍生。

如若且把“偷吃”摺在一旁，单从“启蒙”这一点来琢磨，我们该说“原罪”是大有可取之处的。以舍弃伊甸园无忧无虑的幸福生活为代价，换来的是获取智慧，其实倒很值得。那条蛇也真不算一条完全彻底的坏蛇。伊甸园的故事颇具寓言意味：与其说亚当夏娃偷吃禁果有了智慧而被罚受苦，倒不如说人类是经过长期辛苦劳作才逐渐摆脱蒙昧，变得聪明起来的。当然，这是从劳动创造人的唯物论说引申出来的看法。

依圣经的意思，人类开启鸿蒙之初便是忤逆上帝之始。实际上，人类越来越增长的聪明正是对圣经上帝越来越迫近的挑战。古希腊人亚里斯多德及其后继者托勒密创立的“地心说”，视地球为宇宙中心，地球不动，日月星辰都绕着地球旋转。关于宇宙面貌的这种“静态”阐释与圣经同宗，符合基督教教义，作为权威性宇宙学说，统治人们思想长达2000年之久。偏偏亚当夏娃的后裔们继承了老祖宗“不安分的基因”。16世纪时，意大利人伽俐略用望远镜仪器窥视天空，看到有几个小卫星绕着木星转，由此他推想地球和月亮的关系，进而验证了早些时候波兰人哥白尼的预言：地球不是不动而是在动，和其他行星一起绕着太阳作圆周运动。“地动说”亦即“日心说”一出，原来稳踞地球亦即宇宙中心的天堂和上帝没了着落处。教会慌了神，动用宗教裁判所来对付“异端邪说”。审判、监禁、火刑，封住了伽俐略的嘴巴，烧死了“日心说”死不悔改的追随者布鲁诺。然而，地球照转不误。后来英国又出了个牛顿，没等蛇来教唆，看见苹果从树上掉下来就萌动“邪念”，发现了“万有引力”，把人们的视野扩展到比“日心说”广袤、深远得多的宇宙空间。看来，人类的“原罪”赎也难，因为亚当夏娃的后裔们总是越变越聪明，不会越变越傻。

(二)揭示“天机”的证据

在本书的第二和第三部分，作者用大量的科学发展的事实和证据，解释世界创立的奥秘。

自然科学的长足进步，特别是现代物理学及其相关学科不断取得的突破性的新发现，将大自然宏观与微观的真实面貌日益清晰地揭示在人们面前。小到构成天地万物的基本粒子，大到分布于太空的星团、星系、星体，以及驱动宇宙运动的引力、电磁力、强核力、弱核力，还有许许多多实证科学的可靠成果，不仅归结成科学家专著中艰深的论述和法则、公式，而且通过科

普传播逐渐为一般人所关注和接受。亚当夏娃的子孙已经看破了多少“天机”！人们越发懂得宇宙与生命的本源非物质莫属，最伟大的“造物主”原来是物质运动与演化的自然规律。随之不可避免的是，“上帝创世说”的根基发生动摇，连上帝本人存在与否也成了问题，圣经在相当程度上降格为“远古的传说”和“朦胧的史料”。上帝为亚当夏娃偷吃禁果而大发雷霆之怒，想想不无道理。如果他俩听招呼、守规矩，事情何至于闹到这个地步呢！

俗话说，“开弓没有回头箭”。科学之箭穿云破雾，锐不可当。一代代的科学家莫不以揭开更深层的“天机”为己任，为求真理不惜把天捅破。最典型的例子就出在我们这个二十世纪。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爱德温·哈勃作了一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观测。借助光波的“红移”效应原理，分析遥远星系中星光的颜色，哈勃发现，不管你往哪个方向看，远处的星系都正急速地飞离我们而去，离我们越远的星系，飞离的速度越快。不得了，这说明宇宙正在膨胀！在膨胀的宇宙中，星体相互之间早先必然更加靠近，甚至在再早的某一时刻它们是聚在一处的。科学家们循着哈勃开拓的思路继续观测、实验和研究，进一步的成果异常惊人、空前伟大——建立了宇宙起源和演化的“大爆炸标准模型”！我们国家的科学泰斗朱光亚同志简明扼要地向我们介绍了这个宇宙学的最新理论。他说：“宇宙是在大约150亿年以前从炽热而稠密的物质与能量的大爆炸而形成，随着它急骤膨胀、冷却、逐渐衍生成众多星系、星体、行星，直至出现生命。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太阳系，约在50亿年以前才开始出现。”几句话，讲清了开天辟地这个大问题，比圣经简捷、明确得多。

“大爆炸”说的确立将宇宙开端问题带进了科学王国。原来是“事就这样成了”的，跟圣经上帝没什么关系，看来他老人家应当归于“子虚乌有”之属，历史使命既已完成，可以解职交权退休了。但事情没这么简单。“文革”中常说的“不会自动退出历史舞台”这句话，这里正好用得上。究其原因，倒不在上帝本人不愿退位赋闲，也不全在教会方面不想破产倒闭。很重要的一点在于：要让圣经上帝彻底下台，自然科学本身还不够理直气壮。

建立“大爆炸标准模型”的科学家在宣布他们成果时，同时作了声明：“研究宇宙学问题的还有哲学家、神学家、神秘主义者；然而，与他们不同的是，科学家们只接受经过实验或观测检验过的事实。”注意，科学家们只说自己的研究“与他们不同”，可没说他们的研究不对。被认为与爱因斯坦齐名的英国物理学家史蒂芬·霍金说得更露一点。他在《时间简史》一书中写道：“在一个不变的宇宙中，时间的端点必须由宇宙之外的存在物所赋予；宇宙的开端并没有物理的必要性。人们可以想象上帝在过去的任何时刻创造宇宙。另一方面，如果宇宙在膨胀，何以宇宙有一个开端似乎就有了物理的原因。人们仍然可以想象，上帝是在大爆炸瞬间创造宇宙，或者甚至在更晚的时刻，以使它看起来就像发生过大爆炸似的方式创造，但是设想在大爆炸之前创造宇宙是没有意义的。大爆炸模型并没有排斥造物主，只不过对他何时从事这项工作加上时间限制而已！”自然科学以实证为本，与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有天然的联系。而在基督教传统根深蒂固的西方，从事自然科学研究的人们，有许多既是成就卓著的科学巨匠，又是虔诚的基督徒。他们在推出他们划时代的重大科学发现时，不免要考虑并维护上帝的存在。

上帝得以继续在位，其实也并不完全取决于某些西方科学家们的神学情结，更深一层的原因，应当到自然科学发展历程及其与神学碰撞的历史中去

寻找。远的不说，自哥白尼写出《天体运行论》迄今，在这人类文明加速进步的 450 多年中，宗教对“造物”根由的解释权越来越被科学所取代，人类对“天机”真相的认知力越来越被科学所加强。教会只能顺应世态人心之变化，不得不在神学原理上作出新的解释，在宗教实践上实行某些“改革”。以至罗马教庭前几年公开承认对伽俐略、布鲁诺的处罚是不对的，也算为四个多世纪前教会制造的这宗冤案平了反。可换个角度来说，在这自然科学硕果累累的 450 多年中，又总是惊世骇俗的科学发现前脚迈出去，更加费解的科学难题便后脚跟上来。自然之谜太多太多，破解了这个，又冒出那个。科学家们前赴后继地“上下而求索”，其中亚当夏娃最聪明、最富有才能的后裔们，辛苦毕生也只能取得“阶段性成果”。

即使 20 世纪最伟大的宇宙学理论“大爆炸说”确立于世，自然科学对圣经上帝的挑战也还没有以取得最后胜利而告终。依照现代数学物理原理，“大爆炸”开始那一时刻，宇宙的尺度无限小，密度无限大，温度无限高。在这种被称之为“奇点”的条件下，目前所有的科学定律并因此所有预见将来的能力都失效了。科学家们现在还只能模拟和描述“大爆炸”发生后若干毫秒时的“原始火球”及“暴胀宇宙”中能量与物质的复杂走势，可以告诉人们第一个原子产生于何时、星体如何形成、生命如何出现，但对“大爆炸”发生前的事情，却一概“无可奉告”。因为无限致密的“奇点”等同于现在宇宙中“黑洞”的核心。时间和空间在那里俱归于零，不会有任何信息传出来。在这科学实证无能为力之点上，恰是神学冥想的用武之地。你说宇宙起源于“大爆炸”不是吗？那好。你再说说看，“大爆炸”的初始动因是什么？它从何而来？“大爆炸”造成的宇宙为什么是这个样子而不是另一个样子？今天宇宙面貌的“总设计师”又该是谁？一事物虽经你运用现有一切科学手段加以研究，相关的“问题之笋”虽被你剥开百层千层，但接下去只要还能提出“为什么”来，而你又无言以对时，神学家们就会捧出圣经，指着其中某一章节对你说：“先知们早就有言在先嘛，答案还是在这里！”

圣经历来以对天地万物的“终极”解释来标榜其至高无上的权威。所谓“终极”，不外乎神说“要有”，“事就这样成了”。你觉得他不讲理，一时间你又讲不出别的理来。于是，被科学逼进神殿角落的上帝便挤出身来，拍拍圣袍上的尘土，重又坐上造物主的宝座。我们可以说，自然科学的触角已接触到、但还未能深入其中的未知领域，也就是给圣经上帝留下的使他老人家得以继续在位的余地。科学发展固然艰难，挑战上帝亦非易事。

虽则如此，这本书仍不属于神学著作。在书中，希伦用较多的篇幅对本世纪以至更早时候探究宇宙与生命本源的科学成果、论点、论学和质疑作了相当全面的归纳、分析和评介。作者直接采访过诺贝尔天文奖得主霍金等许多著名的科学家、吸纳他们的真知灼见和富于个性化的论述，因使这本书不仅涵盖了来自从天文学到考古学、从生物学到历史学等科学前沿的一系列新鲜信息，而且处处可见当代科学思想的奇光异彩。这本书的“内核”还是以阐述科学发现、弘扬科学精神为主旨的，“回归圣经”的倾向只是它的“外壳”。这一矛盾状况，也正好可以帮助我们了解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知是如何在矛盾中发展的。所以我们说，希伦这本书不失为一部优秀科普著作。

信仰与实践不相吻合的情形，古今中外皆不鲜见。言及这个话题。还真不能不叹服圣经的典籍品位。人家早就说了，亚当夏娃因蛇的诱惑才违神喻、犯“原罪”的，言下之意就是并非出自他们的本性。他们是受骗上当，本性

还是崇信造物主的。是不是这种“安分的基因”代代相传至今，霍金、希伦等搞科研和写科普书的亚当夏娃的后裔才念念不忘圣经上帝，始终不忍心整得他老人家没地方呆呢？

科学挑战圣经上帝，圣经上帝也在挑战科学。两者的某些代表人物在某些时候、某些问题上可能会互相迁就一下，但是一动根本、一较真章，就无可调和了。我们还拿“宇宙创生”作例子。如果说上帝是在“大爆炸”发生瞬间开始创造宇宙的，就算他老人家耐得住亿万度的高温辐射，也还是“大爆炸”发生在先，上帝出现在后，是“大爆炸”崩出了上帝，而不是上帝导演了“大爆炸”。这与圣经不符，为神学所不容。如果把上帝挪到宇宙之外、“奇点”之先去发号施令，时间空间都不存在，他老人家的“司令部”又该设在什么地方？实证科学只能摇头苦笑。即使有这样一位超然于一切物质境界的上帝，还能进一步提问，他又是怎么来的呢？追问下去，冥想神学也只有瞠目结舌。在今天的世界上，唯物论和唯心论似乎可以各得其所，并存共处，但要找到把上帝与科学从根本上融为一体的契合点，大抵是徒劳的。

无论过去、现在或将来，科学也都同样避免不了暂时无法回答的问题。但科学总是实事求是讲道理的，任何时候都不会用“事就这样成了”之类没有实证基础的断言来充当“终极答案”。科学的态度是朝向未知领域不断探索，努力掌握更先进的探索手段和研究方法，尽最大可能获取更新更多的信息和资料，加以分析和综合，以求更深入更彻底地揭示物质世界的本质与本源。大约在60年代初，毛泽东同志听取粒子物理学成果介绍，听到某种新发现的粒子可能是物质最基本的构件时，当即表示了不同的意见。他用哲学家的语言讲了自己的看法，大意是不会到此为止，物质是无限可分的。后来，科学家们果然接二连三发现了更微小、更深层的基本粒子。科学实践证明毛泽东的预言是正确的，也证明了唯物主义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与客观物质世界及其自然规律是相吻合的。

(三) 探求上帝和万物的起源

对于上帝和万物的起源，对于神造物的种种解释作者在本书中没有直接下结论，只是给读者展示了许多的新发现、新观点。

他说对物质和能量的起源问题持诚实态度的那些科学家们已经承认了两件事：首先，该问题最不可能通过科学得到解决的；第二，这种状况对科学家们来说实在是太令人头痛了。

在国际上都受到尊重的天文学家(自己承认是不可知论者)罗伯特·贾斯特罗承认，由于遇上了一个他们永远无法解答的问题，科学家们都遭受到了“精神创伤”。在其著作《上帝与天文学家》一书中，贾斯特罗写到：“鉴于科学在逆时追踪因果关系链方面是如此地成功，这一结果却是未曾预料到的。”

这种情况打破了科学家们对科学本身所深深存有的“宗教信仰”，即科学应该能够最终发现那些足以解释一切的力量和规律。卡尔·萨根就告诉过我们，科学是“适用于一切的。有了这个工具，我们能够征服一切不可能性。”但是，贾斯特罗却写到：“试设想一下问题的重大性。科学已经证实宇宙在某一时刻因爆炸而形成，但它所提出的问题却是，是什么原因导致了该爆炸？是谁或什么将物质和能量放到宇宙中去的？……科学不能回答这些问题，因

为按照天文学家们的观点，在其存在的最初一刻，宇宙是受着异常程度的重压并被超出人类想象的高温所吞噬着的。”

贾斯特罗指出，宇宙开始时的情况，“不但在现在而且一直看起来就不可能找到是什么力量促使宇宙在哪一刻得以产生的。”

早以预料到了所有这些关于不可知创世时刻的问题，因此以赛亚告诉我们没有人能够看透造物主的心思(以赛亚 40 28)。但是圣经又提出，即使我们不知到底是谁或者什么是这场事变的原因，难道我们就对该答案一无所知了吗？“睁开你的眼睛望苍穹：是谁创造了这一切？……你不知道吗？你没有听说过吗？主是永远的上帝、是造物主……”(以赛亚 40 26a, 28a)。

在与倡导物质与能量一直以某种方式存在着的其他学说进行比较之后，英国物理学家爱德蒙·惠特克说道：“主张创世源于绝对的虚无更为简单——神将从虚无中创造出自然来。”

物理学家巴里·帕克也同意：“我们当然有另外一种解释。我们可以说不曾有过创世，宇宙一直就在那里。但是，这一点要比创世说更难以接受。”

在考虑过宇宙有一个起始点和科学永远不可能发现过去发生过什么事情之后，天文学家贾斯特罗以下面的话结束了他的著作：“对于一直坚信理智力量的科学家们来说，故事就如噩梦般地结束了。他已经爬上了无知之山，他正准备去征服那最高点，当他爬过最后一块石头时，一帮已经在此坐了几个世纪的有神论者在向他打招呼。”

许多人(包括许多科学家)似乎过于相信自然法则本身，好像关于平衡的认识和自然法则的描述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拥有这些特殊的、恰到好处的衡量而不是别的什么的原因似的。

今天，科学家们正在寻求一种能表述所有自然法则总体一致的简短的公式。这种对“关于每个事物的理论”(即所谓“TOE”)的探求表明，科学家们期望统一和简化自然中所有复杂事物的核心。关于自然的经验教很多人期望找到我们所观察的许多和谐工作系统的共同来源。但是，如果科学家们去探求这样的公式会怎么样呢？它能解释所有事物是如何到来的、如何以一种完全适合于我们的方式出现于世的吗？关于这个问题，史蒂芬说：

即使只有一种可能的统一的理论，它也只是一套规则和方程式。向方程式注入新内容并使宇宙正如这些方程式所描述的那样是什么呢？通常的建立一种数学模型的科学方法不能回答为什么会有一个如模型所描述的宇宙的问题。为什么这个宇宙摆出所有这些现实的问题？

霍金的《时间简史》经常被引用的“那么，寄予造物主的是什么？”这个问题，需要作为由他的无开端的宇宙数学理论所引发的一个问题，放在其上下文中去理解，放到一种特殊的上帝方面去理解。在描述大多数人如何只将上帝看作是一个创造宇宙然后让宇宙自己发展了人之后，霍金证明他的无开端的宇宙数学理论怎么会提出这样一个软弱无力的造物主概念。霍金自己也不知道宇宙是必需存在一个造物主，还是不应当也指望感觉到造物主以其他方式介入：“……他对宇宙还有其他什么影响吗？”他说他的无边界理论，并非暗示着上帝的不存在，而是说它可能影响我们有关造物主的自然的思想时，这看来也是他对我讲话的论点。总之，这个论据使霍金认识到造物主的关键地位：他不仅是宇宙的创始者，而且也是“为方程式注入新内容并使宇宙正如这些方程式所描述的那样”的人。

与霍金一样，其他科学家也认为某些事物的逻辑必需不仅仅是当初的那

一套物理学定律。理论物理学家海因斯·佩吉尔斯深入考虑了宇宙起源之前的真空问题：“这些定律被写在真空的什么地方？是什么‘告诉这个真空’其孕育着一个未来的宇宙？这看来似乎这个真空也从属于法则，即一种先于时空而存在的逻辑。”

在提出有关宇宙设计的自然原因方面的困难，必然又使我们回到在提出有关宇宙存在的自然原因方面的困难。据说根本原因在科学领域之外，科学的问题又不可避免地转而指向宇宙存在与设计两方面的根本原因，而科学却不能为我们提供有关其中任何一方面的信息。

本书只列出了很多的非自然选择中的九种。天文学家休·罗斯列出了 25 个宇宙参数，他说：“在界定得很狭窄的现存任何生命范围中一定有下降的值。”普林斯顿物理学家弗里曼·戴森代表许多认识到看来像是有目的的准备的事物，即特别为我们的利益而存在的自然法则中的一个完善的计划的科学家。他写道：“我对宇宙及其结构细节考察得越多，我发现的关于在某种意义上宇宙一定预先知道我们要到来的证据就越多。”

经常被人视为当今第一流的天文学家阿兰·散迪吉对作者概括说：“如果不用超自然的方式，则我们不能以任何清晰的方式理解宇宙。”

广义相对论也表明，宇宙中的空间并不是一无所有。爱因斯坦写到：“并没有空虚空间即无场空间这种东西。空间—时间并不能声称它们自己的存在，它们是以场的结构特性显示出来的。”宇宙学家保罗·戴维斯指出，对物理学家来说，当他们问到有如何能生于无之时，“这不仅意味着物质是如何从虚无中产生的，而且意味着空间和时间为什么首先会存在？以及物质为什么能从它们中产生出来？”

当物理学家谈论宇宙由奇点开始膨胀时，他们不是谈论在更大空间中的膨胀而是在谈论空间本身随大爆炸的膨胀。在宇宙之外并没有任何东西，但是宇宙正是要从这种虚空中生发出来的。在这种“真正的虚空”中，没有任何东西包括量子物理中的现象能够发生。

NASA 下属的利用 COBE 卫星研究宇宙本底辐射光谱曲线的项目负责人约翰·马瑟告诉我：

“我们有描述一种物质转化成另一种物质的公式，但是我们却没有任何描述创造空间和时间的公式。在英语中，该概念甚至都没有任何意义。因此我认为，我们尚没有甚至来思考一下从虚无中创造出什么东西来的术语或概念。而当概念都没有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不知道有哪个理论能够解释它。”

换言之，任何类型的起始于绝对虚无(ex nihilo)的自然创造过程，对于目前这个科学时代就如其一直对于哲学家们那样，简直是不可思议的。某些宇宙学家可能想说，他们已经找到了一种解释宇宙现实中的这一最棘手问题方法，但是由于缺乏对宇宙最初起始点的任何真正意义上的解释，所有的人都必须就此停步。他们所能提供的最接近于解决这一问题的解释可能是说，由于我们知道有量子波动，某些东西还是有可能来自实际上的虚无的。利用 COBE 卫星研究宇宙本底波纹项目的主要负责人乔治·斯穆特谈道：“可以设想宇宙起源于几近虚无之中——不是一无所有，而是实际上的一无所有。但是，几乎是绝对虚无并不等于完全的一无所有。”

当被迫回答创造怎能从虚无开始的问题时，特莱恩自己(波动创世学说的首创者)说道：“很有可能的是，我们永远也得不出一个自信的答案。”早些时候看起来有还是可能产生于无的希望现在看起来又是在走 18 世纪中叶“自

然发生论”的老路，即生命(甚至是苍蝇)是可以从密封罐内的非活性物质中产生出来的。

作者认为：在即将进入 21 世纪之时，科学还没有对宇宙的起源作出自然性的解释，而希伯来书 11：3 中的超自然解释看来仍然是我们所具有的最佳的解释：“靠信仰我们领悟到宇宙是在上帝的安排下形成的，因此，我们所能看到的并非是出自所能看见的东西。”

很明显，这种信仰至少是和科学所能提供的任何一种理论同样地有道理。

(四) 追溯宇宙的历史

在本书的最后一部分，作者写道：宇宙的历史到底是哪一个？他考察了七种宇宙历史，但却不能以逻辑的方式得出一个结论。他认为：在我们最近的历史进程中，我们依次发现了很多自然法则，但我们从来不知道为什么有这些自然法则，为什么没有混乱。科学不能告诉我们任何有关这些法则的原因。我们只知道这些法则产生了秩序、匀称、平衡、心灵的震撼、复杂、以及我们在实验室里竭尽全力也不能复制出来的、更不必说能寄希望于偶然发生的高度发展的生命形式。现代科学家之所以献身于发现一种大一统理论(GUT)的原因就在于，自然教他们期待匀称、和谐、有目的的设计、以及以整体复杂性，即将它系在一起的单一精神为基础的单纯。

尽管一些著名科学家——名人以及一些教科书作者还在讲科学规律实际上如何统治着自然，但科学家本人，尤其是那些发现这些规律的人往往已经确信，这些完美的、有目的规律属于一个完美的、有目的的超级智慧者。在这些涉及设计的章节中所引到的所有人都是很著名的、非常受人尊敬的天文学家、数学家和物理学家。据我所知，所引用的所有本世纪的引文作者中(除引用其两段引文的天文学家休·罗斯之外)没有一人是笃信圣经的基督教徒。因此，这个结论没有受到基督教观点的影响。那些拒绝承认圣经中的上帝的人没有得出他们不顾证据、非出于证据的结论。

在自然中观察到的公认的目的性和精心的设计强有力地指出，上帝是一个有意识的、关爱的、有目的的人(简称之)，而不是一种无目的的、冷漠的、无意识的力。正如前面谈到的那样，这肯定比想象人的身份——我们所知的最高级的智慧——是某种我们拥有而上帝缺乏的东西有道理。甚至在不接受圣经关于我们是由他的想象制造的明确论断的情况下，我们也可以推断，如果造物主的意识状态与我们的不同，则它必定是一种更伟大的意识，而不是一种低劣的意识。这个推测大多是讲上帝是小于旧观念中的那个与宇宙同在的上帝的人，哪个观念与现代科学不一样(因为科学一致认为宇宙有一个开端并要求外来者来开始它)。

反过来，对“盲目偶然”观点的信仰需要相当的忠诚。这种信徒如果不能给出实实在在解释它的理由的话，就常常使他们自己处在阐明生命的意义的困境之中。很多人已经受到其显然没有将他们的解释考虑透彻的著名科学家的不合逻辑的观点的影响。那些大谈存在的空洞的盲目偶然论者中，几乎没有人的思想坚定性值得称道。作为一种必然结果，这种观点变得非常可悲，可悲地近乎使人发笑。因此，虽然我们找不到来自从很多承认没有上帝生命便索然无意义的科学家(像史蒂芬·维因伯格一样)的引文，但我们可以提

供以下这个出自乌狄·阿伦所著的名为《独自在宇宙中漂泊》的文章的颇有见地的引文：

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更严重，人类面临着十字路口。一条道路通向极端失望和绝望。其他的道路通向总体灭绝。让我们祈祷我们有做出正确选择的智慧吧。我只是顺便说一下，没有任何作用，但有着存在之绝对无意义的足以令人恐慌的理由。

在这篇文章的末尾，作者解释原因说：“我们没有精神中心。我们独自在宇宙中漂泊……”

有些人可能会问有神论者，为什么他们的观点会比盲目偶然观点赋予生命更多的意义。原因只是某个超自然的设计者装备好了这个宇宙并让它出发。难道这应当使我们的生命充满了意义？

信仰冷漠的自然神的人一定附和这个观点，但是，如果观察提供确凿的证据，证明这个宇宙不仅是被设计好的，而且是用很高的精确度和关爱，特意为我们设计出来的，正如当今的物理学家所说的那样，那么，我们就不是独自呆在宇宙中。我们不是在造物主的思想的目的之外。相反，我们对他有责任。他对我们的关爱使我们有义务提出以下极富人性的问题：谁是我的造物主？如果上帝关心我们并怀着让我们了解他的愿望制造了我们，他应当提供一条途径。如果有任何使我们可以与他建立个人关系（正如我们猜想一定有的那样）的机会的话，符合逻辑的做法就是将我们短暂的生命用于寻找这个手段，因为这是一种可以持久的关系，一种与某种超越时间的东西的关系，一种能赋予我们生命以恒久价值的关系。

真正的爱要求双向选择。读者可能还没有猜到关于自然设计的这番谈话将要引起关于真爱的讨论，但这个讨论是不可避免的。

如果上帝希望与自愿报答他的爱的人建立一种永远的信任关系的话，他就不能简单地创造一种填满爱和信任的人，因为那样就不会涉及他们的愿望。就是这个真正愿意信任和爱的想法需要真有不信任和拒绝的愿望的可能性。这种接受或拒绝的可能性只能来自真实的生活机遇。上帝给每个人都提供这种机遇，这种天职。但是他只挑选那些愿意接受和信任他的人永生。是否应当根据智力成就来用于上帝的发现呢？由于只有非常非常好的人才符合上帝的要求，因此是否应当根据发现那些最理解这个计划的人——也就是说最好的百分之二——的原则来进行这种选择呢？

要测试信仰必需要有清晰的信仰目标。爱要求一种爱的目标。由于上帝的恩惠，如果上帝想要选择尽可能多的人并且尽可能使产生他们爱的愿望，什么方式比首先向他们贡献爱更能激发他们的爱呢？

当然，这种愿望测试不能涉及内在特征。如果有什么区别，则在地上的优势与天上的优势之间都有一种相反的关系：“谁得到的多，谁需要付出的也多。”对于那些已经体会到上帝非常爱这个世界以至于献出了他唯一的儿子的人来说，需要付出的也就更多。

上帝以一种更加普通的方式，即通过自然，向我们展示了他对他的造物的权力和仁爱，这个事实至少开始软化哪怕对他最硬的心肠。但是，如果科学或逻辑能给我们提供有关上帝的答案，我们就能拥有找到他的信心。圣经的故事不是人寻找上帝的故事，而是关于上帝如何想我们展现他自己的故事。看来是他给我们科学和逻辑以刺激我们的胃口，使我们去读他的书。

作者从一个圣经信仰的怀疑者的观点出发已经写成了这部书。他曾一度

相信这个行星上的生命可能是自发开始的，《创世纪》的出现可能与其他古代创世故事一样神秘。他设想旧约全书中的大多数故事都太遥远而不能提供很多考古学的证据。更糟的是，没有办法知道耶稣的故事是否历时而没有发展。

作者说：“如果要给你提供改变这个想法的事实，就需要这个系列的余下部分。我从来不容易产生信仰，但是，现在我所有的信仰不再能被糟糕的一天……或糟糕的十年所动摇。我承认我想相信，但不是相信无稽之谈或谎言。”

圣经本身使我们相信，如果它真的出自上帝的话，我们应当可望发现超出圣经的证据以证实其可靠性。实实在在的事件应当留下考古和书面历史的证据，因为“这个(耶稣的著作)不是秘密完成的。(《使徒行传 26 26》)。我们应当可望发现来自天文学的证据，因为“苍天陈述上帝的荣耀”(《诗篇 19 1》)。如果圣经真的是福音的话，我们应当可望发现不能用其作者的环境文化和时间来解释的知识的证据。应当有独特无双的、超自然的先见之明的证据，因为《以赛亚书 46 9—10》声称：“我是上帝，没有人能与我相比。我在开始的时候预言末后的事，远在上古时我已经宣布那些还没有发生的事了。”

总之这部书提供了从天文学到考古学，从生物学到历史学的一系列信息。我希望尽量利用其有限的篇幅，提供一种便捷的能回答各种常见的有关圣经和耶稣基督福音的可靠性的问题的资料来源。

(耿忠津撰)

【美】卡尔·萨根：
《魔鬼出没的世界》——照亮黑暗的蜡烛

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时刻在进行自我批评，时刻将我们的思想内外部世界进行比较。

——卡尔·萨根

他那广博的知识，犀利的思想，入木三分的揭露，霸辟入里的分析和发人深省的启示，阐述了科学与非科学的区别。

——赫·乔·詹姆斯

一、萨根生平及主要学术成就

卡尔·萨根博士是美国康奈尔大学的天文学教授。同时他又是世界著名的科普作家。他对科学的精辟见解使他成为“唯一能够用简明扼要的语言说明科学是什么”的科学家。他成为本世纪最有影响的人物。

卡尔·爱德华·萨根于1934年11月9日生于纽约布鲁克林市，于1955年在芝加哥大学获得物理学学士学位，1956年获得物理学硕士学位，1960年获得天文学和天文物理学博士学位。从60年代早期他就在哈佛大学执教。1971年任康奈尔大学正教授。1996年12月20日，这位当代最伟大的科学家和科普作家在与骨髓癌抗争了两年之后，在福莱德·胡钦斯癌症研究中心与世长辞，年仅62岁。

卡尔·萨根一生研究成果惊人。他的研究重点为金星上的温室效应、火星上的季节变化、原子战争所造成的长期环境影响、地球上的生命起源、外星智能生命探索等。他是宇宙生物学的创始人和开拓者之一。长期以来他一直担任康奈尔大学天文学和太空科学的硕士和博士生导师。病重期间，他仍然在指导他的学生。他是康奈尔大学最值得尊重的教授。

卡尔·萨根在美国航空航天局的“航海者”、“海盗”、“旅行者”和“伽利略”宇航探险计划中曾起到重要的作用。为此，他荣获美国航空航天局颁发的特别科学成就奖，两次荣获杰出公共服务奖和航空航天局颁发的阿波罗成就奖。萨根除了获得航空航天局的承认和奖励以外，还拥有美国大学和学院授予的22个荣誉学位，以表彰他在科学、文学、教育和环境保护方面的重要贡献。由于他在原子战争的长期后果和反对核武器方面的杰出贡献而获得了许多奖励。他还获得过许多其他部门给予的奖励，如美国太空航行委员会的约翰·F·肯尼迪太空航行奖；探索者俱乐部第75届年会奖；苏联航空联合会康斯坦丁·柴科夫斯基奖；美国天文协会马素斯基奖；美国国家科学院授予的公共福利奖；美国国家科学院的最高奖，以表彰他在“将科学应用于公众福利方面所做出的杰出贡献。”

萨根是美国天文协会行星科学学会的主席、美国地球物理学会联合会行星研究会主席、美国科学促进协会行星学会主席。他在12年的时间内连续担

任研究行星的权威杂志《伊卡洛斯》的主编。萨根是行星协会的合作发起人，这个机构拥有 10 万会员，是世界上最大的以研究行星为主的组织。这个组织为寻找外星智能生命的无线电联络研究项目和地球附近的小行星的研究项目提供帮助。萨根还是加利福尼亚的喷气推进器研究所的客座科学家和《太空漫游》杂志的投稿编辑。在这个杂志上他发表了许多论文。在他病重期间，他还写了一些与他的疾病有关的文章。

卡尔·萨根还是伟大的科普专家和科学教育家。1980 年，他推出大型长达 16 集的电视连续片“宇宙”，在世界上引起极其强烈的反响，这部电视片被翻译成 10 多种语言，在 60 多个国家放映，观众达到 5 亿！这个电视片获得米·彼博迪大奖。与这个电视片配套的科普书籍《宇宙》是《纽约时报》连续 70 周的发行量最大的畅销书，是历史上英语出版的科普书中发行量最大的书籍。他的一生著述甚多。除了各种科普文章以外，他还写了 30 本书。其中《伊甸园的飞龙》、《布鲁卡的脑》、《无人曾想过的道路：核冬天和武器竞赛的终结》、《被遗忘的前辈的影子》、《接触》、《彗星》、《宇宙中的智能生命》和《浅蓝色的点：人类在宇宙中的未来之展望》等书籍已经被翻译成多种语言。《伊甸园的飞龙》还获得美国普利策奖。

卡尔·萨根在科普中的卓有成效的工作使他获得美国青少年的尊重和喜爱。他的知名度超过所有的影星歌星，甚至政治领导人。在 1991 年美国青少年中进行的“十大聪明人”评选中，他的名字列居榜首。而在当年海湾战争中大出风头，立下赫赫战功的斯瓦兹科普夫也才名列第二，里根和布什分别名列第四和第六。他同时还是“美国超自然现象说法科学探究委员会”的成员，并于 1987 年获得该委员会授予的“维护理性奖”。1994 年，他又获得第一届“阿西莫夫奖”。

二、《魔鬼出没的世界》评介

（一）科学是探究和维护真理的崇高事业

卡尔·萨根博士的著作《魔鬼出没的世界——科学，照亮黑暗的蜡烛》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部作品。当年便创下最佳畅销书第一名的记录。这是萨根诸多作品中比较全面地反映其思想的一部作品。作者以广博的知识，犀利的思想，入木三分的揭露，鞭辟入里的分析和发人深省的启示，阐述了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别。热情地讴歌了科学家在人类生活中的伟大贡献和科学给人类带来的幸福。全书充满理性的思维和科学精神，从科学的角度对伪科学和伪科学后面所隐藏的反科学意识进行了深刻的批判。

精神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但是精神世界的源泉是什么？萨根在书中写道：“当科学与大自然相遇时，科学就必然会使人产生对大自然的敬畏的感觉。对大自然的真正的理解的行为是与自然的结合和融合的欢庆，即使是在很小程度上的结合，也能使人感受到宇宙的宏伟和壮观。随着时间的流逝而积累起来的世界范围内的知识体系使科学变成了跨国界、跨时代的超越所有界限的理智的东西。‘精神’一词是从拉丁文‘呼吸’变化而来的。我们呼吸的是空气，无论它多么稀薄，但毫无疑问它是物质。尽管‘精神’这个词的使用是与物质相对而言，但我们都不可能脱离物质（包括构成大脑的物质）而谈论这个词中‘精神的’基本涵义。有时我也会随意使用这个词。科学不

仅与精神性和谐共存，而且是精神性的深厚源泉。当我们抓住了生命的错综复杂、光彩美丽和精妙绝伦之时，我们就有了一种飘然飞腾的感觉，这是一种洋洋得意与自感谦卑相结合的感觉。毫无疑问，这是精神的。当我们置身于伟大的艺术、音乐或文学，当我们在甘地或马丁·路德·金等令人景仰的无私的勇气和行为面前时，我们的感觉同样是精神的。科学与精神性以某种方式的相互排斥，对双方都将产生损害的作用。”萨根在书中认为，当人类发现宇宙的年龄是 80 亿到 150 亿年，而不是 6000 年或 12000 年时，人类对宇宙的变化和其深邃宏伟有了更深的认识。当人类明白了人只是原子的复杂的结合体，而不是什么神灵的创造后，人类至少增加了对原子的景仰之情。当人类了解了我们居住的星球只不过是银河系中数以十亿计的星球中的一个，而这个星系也仅是数以十亿计的星系中的一个时，人类的视野得到了极大的扩展。当人类发现自己的祖先同时也是猴子的祖先的时候，人类知道了自己与其他生物之间的关系并越来越认识到这个发现的重要意义。

无论人类怎样看待科学，人类的一切都与科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人类不可能回到愚昧中去。人类最好还是充分利用科学。当我们最终认识到科学的美妙绝伦和其极大的力量的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无论是精神还是实际物质方面，科学都给我们带来了极大的益处。萨根指出，科学远不是十全十美的获得知识的工具，而仅仅是我们所拥有的最好的工具。它本身不能支持人类行动的途径，但是科学却能预测人类选择行动途径的可能结果。科学的思维方式既富有想象力，又要以科学素养为基础。这是取得成功的关键所在。科学要求我们以事实为基础，即使事实为我们以前的看法不相符合。科学劝告我们要首先在头脑中形成假想，然后看这个假想是否符合事实。科学催促我们要时刻保持开放，接受新思想，同时要允许持异端观点的人和严格的怀疑论者对包括新思想、新经验和新知识进行验证。科学取得成功的原因之一，是科学的核心具有内在的改正错误的机制。有些人可能认为这是对科学过于夸张的描述，但是，萨根在书中认为，我们在进行科学研究的时候，我们时刻在进行自我批判，时刻将我们的思想内外部世界进行比较。当我们自我放纵和放弃自我批判时，当我们将希望和事实混为一谈时，我们就滑入了伪科学和迷信的泥沼。由于伪科学和迷信是用科学总是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的说法，来适应人们强烈的情感需求，所以伪科学和迷信至今仍在盛行其道，迷惑人们的思想，对复杂的问题作出轻率和随意的回答，对于怀疑的质问采取回避搪塞的办法应付，使人们惶恐迷惘，将事实当做过眼烟云，视而不见。迷信和伪科学使我们墨守陈规，不思进取，使人们变成轻信牺牲品。确实如此，如果 UFO 潜藏在百慕大群岛附近的深海之处吞噬飞机和轮船，如果死去的人能够通过意念使电话听筒震颤并脱离电话机，如果我们的梦能够解释，如果我们能够用我们对于世界所了解的知识精确地预测未来，那么，世界将变得多么吸引人啊！

但所有的一切都是伪科学的例子。他们声称他们使用的都是科学的方法和发现的成果，但是实际上他们完全背离了科学的本质。这是因为他们所有结论都缺乏充足的证据，同时将能够证明不同结论的证据弃置不论。他们能将假的说得像真的一样，使人轻易相信。许多报纸、杂志、出版社、电台、电视台和电影商等在未做深入研究的情况下就给予配合，使这些伪科学思想得到广泛和大量的传播。这些思想的传播为对事实的其他解释，对科学的新发现所带来的新思想的传播增加了困难。

萨根在谈到伪科学时精辟地论述说：“真理可能会令人感到敬意或与我们的直觉相反。真理可能与人们根深蒂固的信仰相矛盾。实验是使我们获得真理的方法。在几十年前的一个宴会上，有人向物理学家罗伯特·W·伍德敬酒时说：‘为物理和玄学干杯！’那时，人们提到玄学时都意指哲学或仅凭思考就可以获得的真理，也可能包括伪科学。伍德回答说：‘如果一个物理学家有了一种思想，他就要进行思考，他思考得越深刻，他理解得也就越深刻。他要参考科学文献，他阅读得越多，他对这种思想实现的前景就越清晰明了。在做了这些准备之后，他就要走进实验室，用科学仪器进行实验。实验令科学家废寝忘食、呕心沥血、历尽磨难。他要对所有的可能性进行实验和检测，他要对实验数据精益求精，将错误的可能性降至最低限度。他不论后果如何，只是全力以赴按实验的进展进行下去。经过精心的实验，在研究工作结束时，他有可能发现最初的思想是毫无价值的。这时，物理学家就会将实验和结果丢在一旁，将自己的思想从一堆错误中解脱出来，去做其他的研究。’伍德将他的酒杯高高举起，下结论说：‘物理学和玄学之间的差别不在于实践者中谁比谁更聪明，而在于，玄学家没有实验室。’”

萨根接着谈到，有人为玄学家辩护说，他们的思想像真正的科学一样在同样的程度上被人误解，如果他们的语言不被别人篡改和曲解，他们的思想同样会被人接受。如果你根本没有听说过科学(更不要说科学的研究过程了)，你根本就不可能意识到你接受的是伪科学，你会用人类所具备的一般思维方法去思考问题。宗教经常是受到政府保护的伪科学的保育院，尽管没有任何理由能够说明为什么宗教要起到那样的作用。在有些国家，几乎所有的人都相信占星术和预测，包括政府领导。但是，这些并不是靠宗教简单地灌输到他们头脑中去的，而是靠文化环境，在这种文化环境中，人们乐于接受这些做法，在任何地方都能得到肯定的褒扬。

在人类历史上的大部分时期，人类对于外部世界是恐惧和害怕的。因为人类对可能发生的危险不能预测。人类对于任何能够减少他们恐惧的解释都欣然接受。科学在了解世界、掌握事物的发展规律、控制自身和指导安全航行等方面取得了极大的成功。萨根说：“一个国家将会因为没有知识而灭亡，可以避免的人类灾难在这些国家会因为无知和愚蠢而更多地发生，特别是当这个民族对自身缺乏了解的时候。特别是在新的世纪即将到来之际，我对于伪科学的迷信似乎一年比一年更具有挑战性而倍感忧虑。”他进一步深刻地阐述了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重大差异：“伪科学与错误的科学是有区别的。”“科学就是在改正一个又一个的错误的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科学经常会得出不正确的结论，但是，这些结论不是最终的，而是暂时的。科学家总是先设立假设，然后，再去确定其正确与否。任何假设是否能最后证实是可行的，完全要依靠实验和观察。科学是经过探索和曲折，才逐步加深对事实本身的了解的。当一个科学假设被证实是错误的时候，任何想秘而不宣的做法毫无疑问是十分有害的。因为这种对假设的反证被认为正是科学事业的核心。但是伪科学却恰恰相反。伪科学的假设是经过精心设计的，以防任何能够提供反证的实验，因此，即使在原则上，它们也不能被认为是无效的。伪科学的实践者采取防守战略。谨慎小心。他们激烈反击对他们的论点表示怀疑的任何调查和研究。当他们的假设经不住科学家的调查和质问的时候，他们就会策划出压制科学家的意见的阴谋。”“科学和伪科学之间的严格区别可能就在于，与伪科学相比，科学对人类的不完美性和犯错误的不可避免性，具有

深刻得多的认识。如果我们坚决拒绝承认人是必定会犯错误的这一基本常识，我们就一定会永远犯错误，而且是严重的错误。但是，如果我们能够有一点自我评价的勇气，无论这种评价会获得多么令人沮丧的结果，那么我们获得成功的机会就会大大增加。”“如果只讲科学的发现和成果，无论这些发现和成果是多么有用，甚至令人鼓舞，但是，如果我们不向每个公众说明科学严格的研究方法，人们又怎么能够分辨出什么是科学什么是伪科学呢？表现在公众面前的都是没有证据的论断。权威的科学就是权威们所说的科学。只有你自己来判断科学与伪科学。”

(二) 科学传播的最终目的是将科学精神注入民族文化

人类传播科学和技术的活动究竟始于何时至今仍无从考究。但是，西方学者认为，有一点应该肯定，那就是，在人类利用科学技术从事生产活动的时候，传播科学技术知识和信息的活动就已经开始了，只不过在历史发展的各个阶段其特点有所不同罢了。这是由人类社会性动物的本性所决定的。而且随着社会的发展，随着人的社会化程度的提高，科学技术知识传播的程度也随之提高。也就是说，科学技术的传播是人类的社会性所决定的必然行为。

科学之所以能被电台、电视台、电影、报纸、书籍、电脑程序、主题公园和教室等公众媒体广为传播，是因为在科学的所有用处中，培养出少量的、专业知识水平很高、高酬金的牧师似的专家是不够的，事实上也是危险的。相反，某些最重要的科学发现和科学方法必须在最大的范围内使公众得到了解。萨根在书中指出，对新兴的民族来说，尽管有许多失误，但是，科学仍然是摆脱贫穷和落后的金光大道。科学能够使国家经济发展，全球文明程度不断提高。科学也提醒我们要重视由于我们改变世界的技术而带来的严重后果。特别要关注我们赖以生存的全球环境，科学给我们设置了一个重要的早期警戒系统。科学告诉了我们关于人类、生命、我们的星球和宇宙的起源、本质和命运等最深刻的问题。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我们能够真实了解了其中一些问题，当我们领悟到这样的问题并高度重视其所具有的重要意义，我们有时会惊出一身冷汗。从长期的发展过程来看，科学送给我们的最贵重的礼物可能就是，它告诉了我们人类能够了解我们的宇宙的产生和发展；我们来自何处，何时来到这个世界上以及产生我们自身的方式；科学是防范假装有知识的人的有效方法，它是反神秘主义，反迷信以及反对在不属于自己范围内的地方滥用教义的宗教的一座堡垒。如果我们忠于科学的价值观，那么科学就可以告诉我们，我们什么时候被欺骗了。科学在我们犯错误的过程中就能将其改正。科学的语言、规则和方法应用得越广泛，科学的精神实质越多越深地溶于社会文化，我们就越会有更好的机会来保留托马斯·杰斐逊和他的同行们思想中的东西。

尽管科学现在已得到公共媒体的广泛宣扬，尽管科学为公众了解和掌握能产生巨大的作用，然而在 19 世纪以前，公民对科学知之甚少，科学本身也处在艰苦探索阶段，真正的推广和普及科学使科学知识和科学思维方法更好的为社会了解和接受，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一方面“科学自身的善变性导致了人们对它的不信任与攻击。当公众刚刚有些明白了那些被科学家们热烈讨论的东西的时候，他们却又告诉公众那些东西已不再正确。即使它们仍然正确，科学家又开始讨论许多闻所未闻、难以相信、带给人不安的暗

示的所谓新发现了。因此，科学家可以被视为是在愚弄公众，被认为想要推翻一切，被看做社会危险分子”；另一方面，“科学中也存在主观和偏见。我们每一个人无一例外地怀有偏见、科学家同别的人一样生存于偏见盛行的环境当中。科学家们无法脱俗，他们偶然也会为那些臭名昭著的理论提供帮助和方便(例如，他们通过测量脑容量的大小或脑颅骨的突起或智商的高低来论证所谓的种族优越性或性别优势等)。”所以，科学和科学家时常遭受一些伪科学的信仰者、神学家和宗教人士的指责和攻击，使公众对科学的认识产生误解甚至歪曲，增加了科学普及为推广的困难。在此情形之下，科学成了少数人的工作，这种科学为大众，为社会文化的隔离，使迷信和伪科学大行其道，迷惑了我们中的亿万“巴克利”。使他们成为循规蹈矩，没有个人思想的行事者和轻信牺牲品。因而，萨根指出，我们要挽救“巴克利”先生和上百万像他那样的人，我们要停止产生沉闷的，无好奇心，无辨别力的，缺乏想象力的新一代。我们人类需要，也应当得到完全清醒的，基本了解世界是如何运作的公民。如何让公民比较全面、完整的了解科学，并认识科学的真实面目，进而逐步掌握基本的科学知识，萨根指出，这是科技工作者义不容辞的责任。

随着人类传播科学和技术的理性化程度的提高以及公众对科学逐步地认识和掌握，人们，尤其是科学家和工程师们，在不断地提出更深刻的问题：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是什么？传播科学和技术的目的是什么？

18至19世纪，人类对于其文明进化的结果——知识的传播仍处于广义的阶段，也就是说，知识的传播中科学技术的知识还没有占据重要的地位。那时，人类知识的传播还是一种“知识的传布”(Diffusion of Knowledge)。进入本世纪之后，直至40年代前，科技传播开始出现活跃的态势，书籍、报刊、广播等传播媒介中关于科学技术的内容大量增加，西方学者将这个阶段称之为“科学普及”(Popularization of Science)，也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科普”。20世纪40年代和两次世界大战后，科学技术的传播速度和质量随着人类对自身权利的要求和经济发展，以及对环境的关注程度的提高而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广大公众对于科学和技术给人类带来的影响由过去的一无所知、排斥或者盲从迷信转为冷静的思考和怀疑。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人们对科学的目的和技术的弊端提出了疑问。战时科学产生出原子弹、氢弹等大规模的杀伤性武器，科学家利用人体进行生物武器实验和化学实验，化学工业化给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尤其是臭氧层造成了破坏性的影响。1962年，美国女科学家蕾切尔·卡逊的代表作《寂静的春天》第一次用通俗易懂的语言，用预言的形式向广大公众揭示了化学技术对人类生存环境的破坏性影响。公众开始了对科学和技术的影响的思考和讨论。人们由过去“科学无益”或“科学万能”到对科学的作用辩证思考，使人类对自身的智能所带来的结果采取了冷静和审视的态度。从社会的意义上讲，这是人类的进步，而不是否定科学的倒退。公众对科学家的道德、技术的影响、对科学和环境、科学和人类之间关系的审视导致公众对科学议题的全面参与。科学知识和公众、科学家和公众之间由过去的自上而下、简单的灌输和接受的关系转变为一种新型关系。科学技术的传播工作从过去的单纯的科学技术普及向公众理解科学技术转变。科学家和科学团体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重视科学的社会价值。学者们将这种关系称之为“公众理解科学”(Public Understanding of Science)。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更接近 Understanding of

本意。科学和公众之间形成了互动的关系。所以，萨根指出，在这个时期，我不认为科学难于讲授的原因是人们对接受科学没有准备，或是由于科学仅仅产生于侥幸，或总的来说，我们的脑力还不足以掌握它。相反，我所看到的公众对科学的巨大热情。这证明：“科学倾向深深地埋藏在我们之中，不论在任何地点，还是任何文化中。”

80年代，人类科学技术的传播活动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美国芝加哥科学院副院长米勒博士于1989年提出公众科学素养的三个标准：(1)对科学技术术语和概念达到基本的了解；(2)对科学的研究过程和方法达到基本了解；(3)对科学的社会影响达到基本了解。他的这个基本思想一经提出，就得到世界各国的赞同。这三项标准体现了当今科学和公众之间的新型关系，与过去的简单的、自上而下的灌输关系截然不同。而“科普”这种说法仅指人类传播科学技术知识的行为，而不能完整、全面地涵盖科学和公众之间的关系。

从功能上讲，现代民主社会所要求的国民的科学素养也由过去的让公众了解科学知识转变为使公众具备基本的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就是萨根在本书中所不断提到的好奇心、探究真理的精神、怀疑精神、参与决策的意识与能力和实证意识。正如卡尔·萨根所说：“对于从事科学普及的人来说，巨大的挑战是，如何向人们说清楚科学发现、客观真实、曲折坎坷的历史和人们对科学的误解，以及科学的实践者偶尔表现出的决不改变航向的执着的顽强的精神。许多，可能是大多数的培养科学家的教科书对这些内容都涉及很少，用一种吸引人的方法传授从长达几个世纪中人类不厌其烦积累下来的有关大自然的问题中得出的智慧，比系统地讲授散乱地积累人类智慧的方法要简单得多。科学的方法，可能看起来繁琐和生硬粗暴，但是与科学发现相比要重要得多。”萨根指出，科学的方法——与其有所缺陷——可以用来改进社会、政治和经济体系。不管采用什么样的改进标准，这一点都是正确的。科学离不开实验，社会和政治的改进同样也离不开实验。

萨根认为，科学素养对普通公众是十分重要的。一个远离科学，没有科学素养的公众群体是无法承担民主政体对他们的要求的。因为在民主政体中，公众舆论是决策过程的重要影响因素，民主程度越高，其影响就越大。虽然对于一个特定的问题的科学因素有更全面的了解并不一定导致人们对最佳决策形成认同，但是，至少可以得出更为明智的，因此也是最好的决策选择。从这个角度上说，没有具备一定程度的科学素养的公众就不可能有国家和社会的民主和进步。

同样，科学素养对于科学家来说同样十分重要。科学家是一定社会意义上的从事科学技术工作的专家。他们首先是社会的人，然后才是某个领域的专家和学者。麦克斯韦、爱因斯坦、达尔文是科学家，他们对人类的贡献是巨大的。他们留给人类的不仅仅是科学的成就，而且是社会正义的化身和代表人类本质的正直的价值观。从他们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科学的本质和科学的正确发展方向。但是，也有鼓吹将原子武器用于杀人的科学家，也有用人体作为制造细菌武器的科学家，也有在国家处于重要的关头卖身投靠、为虎作伥的科学家，也有为了个人利益出卖科学家良心的科学家。他们在科学上不愧为一代大师，但是，他们的所作所为也背离了科学的本质。他们是具有科学知识却没有科学精神的科学家。从这个意义上讲，具有足够的科学知识不一定具有科学精神。但是，要具有科学精神必须具备足够的科学知识。

在论述对公众进行科学教育的重要性时，萨根指出，握有权力的人必须与科学团体的道德关注和关心程度相辅相成，必须建立在最广泛的对公众进行的科学与民主重要性的教育基础之上。科学使前所未有的巨大能量成为现实，这就是要求科学共同对道德的关注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而且还要把科学和民主的重要性最广泛地贯注到公共教育之中。

公众(其中包括科学家本身)理解科学活动的本质和核心内涵是对科学本质的深刻理解，对科学给人类带来的价值观的理解和维护，对理性的渴望和维护。而不仅仅是科学知识的灌输。从这个意义上说，理解科学的本质，维护科学的纯洁，牢牢把握科学航船的航向，不仅是科学家的责任，也是整个公众的义务。而整个公众对这个义务的理解需要科学家和有关机构的启蒙和教育，这才是公众理解科学的真正目的。

我国虽然是一个具有 5000 年历史的文明古国，其光辉灿烂的文化确实可以使人感到骄傲和自豪。虽然在我国的历史上曾经出现过对世界文明史上产生过重大影响的思想家和科学家，但是在近代史上，我们的先人和现代人却干过许多令世界文明社会不可理解的、令人耻笑的蠢事。并且，做这些蠢事的因素至今仍然存在。科学精神还远远没有进入到我们的文化中。科学，还远没有成为我们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组成部分。没有全体国民科学素养的整体提高，下个世纪中华民族的腾飞是不可能的。正在科学传播领域中工作的科学家、工程师、学者和传播媒介的工作者应该清醒地认识到：全体国民科学素养和其他素养提高之日，就是中华民族腾飞，中国人受到世界尊重之时。而我们，任重而道远。

(赵永新撰)

【美】丹尼尔·贝尔：
《后工业社会的来临》——未来学的奠基之作

“后工业的转变并没有提供“答案”。它只给了新的希望和新的力量，新的制约和新的问题——所不同的是，现在这些新的规模是世界历史上过去从未想象过的。”

——丹尼尔·贝尔

贝尔的阐述……学识超人，富于创见。更加令人佩服的是，他对未来并没有抱不可取的浪漫主义的态度。

——《幸福》杂志马里昂·丁·列

维

一、贝尔生平与学术成就

丹尼尔·贝尔是美国当代著名的社会学家、未来学家。1919年5月生于曼哈顿，父母为波兰犹太服装工人。1938年19岁时毕业于纽约市立大学。

贝尔在40和50年代主要从事新闻工作，曾任《新领袖》杂志主编、《幸福》杂志编委和撰稿人。同时还在芝加哥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讲授社会学。这一时期他的主要著作有《美国的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史》、《英国的新右翼》等。在60和70年代，他主要从事教学工作，曾在哥伦比亚大学和哈佛大学任教。同时，还从事一些与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有关的活动：曾任《公共利益》杂志二主编之一；担任过《代达罗斯》和《美国学者》杂志编委；1964~1966年在美国总统的“技术、自动化与经济进展委员会”内供职；1966~1968年担任美国政府“社会指标委员会”两主席之一；1966~1974年担任美国文理科学院的“2000年委员会”主席；1976~1979年任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际未来计划”的政府间顾问委员会美方代表，后任美国总统“80年代议程委员会”委员。在这20年中，他的主要著作有《意识形态的终结》、《基本权利》、《极端右翼》、《普通教育之改革》、《今日资本主义》、《走向2000年：进展中的工作》、《大学的对峙》、《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和《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等。1980年发表了《曲折的航程——社会学历程论文集1960~1980年》。

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是中外历史上许多学者和社会活动家所热衷的主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科技革命迅猛发展，社会变迁加速，发展问题成为世界各国关注的重点，这些因素推动未来研究与发展研究日益结合。美国著名社会学家与未来学家丹尼尔·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一项探索》一书是这方面的一部代表作，发表以来，受到国际学术界和各方瞩目。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思想始于50年代末。1959年夏季，贝尔在奥地利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首次使用“后工业社会”的名称，提出了他对未来西

方社会的设想。其后，在 1962 年和 1967 年又写了《后工业社会：推测 1985 年及以后的美国》和《关于后工业社会的札记》[]和[]。1973 年出版的本书对“后工业社会”的思想作了全面的理论阐述和实例分析。他提出“后工业社会”的五大基本内容是：(一)在经济上，由制造业经济转向服务性经济；(二)在职业上，专业与科技人员取代企业主而居于社会的主导地位；(三)在中轴原理上，理论知识居于中心，是社会革新和制定政策的源泉；(四)在未来方向上，技术发展是有计划、有节制的，重视技术鉴定；(五)在制定决策上，依靠新的“智能技术”。1976 年出版的《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本书的姊妹篇，它着重从文化角度继续探讨“后工业社会”。贝尔在该书的《前言》中对两本书的重点与配合作了说明，他说：“两本书具有辩证的关系，互为补足。《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力图说明，技术(包括知识)和理论的高度集约化，正成为创造发明和制定政策的新原则，日益改造着技术——经济体制和社会的阶层体系。”《资本主义文化矛盾》则“讨论文化的问题，尤其是关于现代主义文艺的思想，并讨论在社会价值观强调欲望不加节制的情况下如何管理复杂政治形态的难题”，“当代资本主义的种种矛盾是由于曾把文化与经济维系在一起的绳索已经散解，由于享乐主义已成为我们社会的主导价值观和影响。”

西方学术界论述未来社会的许多见解在贝尔影响下套用了“后……”的前缀，以表示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阶段、新类型社会的开始，有些描述未来社会的名称虽未使用“后……”的前缀，但也受到贝尔思想不同程度的影响。

贝尔对未来西方社会的探索中，从技术分析联系到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权力中心、管理体制等方面，无疑是具有重要意义的。现代的科学技术正在经历一场巨大的革命。面对这场重大的科技革命，不但要重视其经济影响，而且要重视其社会、政治和文化等影响。贝尔已看到西方社会正处在历史变革的巨大动荡之中，现有的社会关系、权力结构和文化价值都在迅速消蚀。因此，“时代终了感”是当代西方社会特有的文学形象。他预感到“后工业社会”会带来一整套新的匮乏和一系列新的问题。

二、《后工业社会的来临》评介

阿诺德·托因比认为，自从人类聚居点出现以来(或者说自从有这方面的文件记载以来)，已经经历了 21 个不同的文明，作为一种文化统一体的西方社会是其中之一。但是西方社会本身就是一幅宏大的历史画卷。在西方社会内部，有着令人眼花缭乱的形形色色、相互交织的成分，不论是宗教的分化、政治帝国的兴衰，或者是社会——经济制度的相继。社会学家或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要制订出一种明白易懂的研究方法。《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就是 50 年代开始出现的有关未来研究和社会预测方法的这样一部名著。全书由“导论”、正文六章和“结语”构成。

(一)中轴原理：对社会进行分析的方法论基石

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一书的“导论”中，贝尔说明全书所要探讨的工业社会的未来。他首先区分了预测和预报。他认为，预报通常着重于对有

关事件做出决断，这种决断不可能公式化，即不可能使其受一些规则的支配；预报的职能主要是，通过长期熟悉情况而取得详细的内部知识和判断。而预测则要对规律性的发展，重复出现的现象、持续发展的趋势等进行推测。预测不能预先报告出结果，而且推断的时间越远，误差程度越大，但它能说明政策决定发挥效用的限度和范围。贝尔简述了各种各样的预测，包括技术预测、人口预测、经济预测、政治预测等。他把经济预测又分为三类型：简单的市场调查、最标准化的预测(制定宏观变数的时间序列，如批发价格和消费价格指数、工业产量、农业生产率、失业率等，将这些指标综合起来对经济状况预测)、数理经济模型。此外，他还提出三种社会预测：推测社会趋向、鉴别促成社会的历史“关键”、预测主要社会体制内的变化。他认为要鉴别历史“关键”是非常困难的，所以，他把重点放在社会结构变化方面，后工业社会作为此书的主题，正是对西方社会结构变化的一种社会预测。

贝尔在书中提出了中轴原理。贝尔认为社会可以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等三个部分。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政体则调整权力的分配和评判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生矛盾的权力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义的领域。按照这种方式来划分社会是有益的。因为每一个方面都有一个不同的中轴原理起支配作用。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这是一个根据最低成本、使用代用品、谋求最佳效果和寻求最高价值等原则来分配资源的途径。现代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有时候经过动员或有控制的参与，有时候是自下而上要求的参与。文化方向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过去这三个领域是由一个共同的价值体系来联系的，但在当代，这三个方面正日益趋于分裂。

他并不认为社会结构的这些变化决定着政治或文化的相应变化。而是社会结构的变化从三个方面向社会的其余部分提出了问题。首先，社会结构是一个旨在协调个人行动以达到特殊目的的职能结构。这些职能确定适应于某一具体职位的、有限的活动方式，从而把人进行划分，但人们并不总愿意接受某项职能所规定的要求。第二，社会结构的变化对政治制度提出了“管理”问题。在一个日益意识到自己的命运、并力图掌握自己命运的社会里，政治秩序必然是重要的。第三，强烈依靠认识能力至上和理论知识至上的新的生活方式，不可避免地要与文化发展的趋势相冲突，这种文化力求加强自我，并且越来越反对受道德规范束缚和反对制度化。

贝尔认为，社会结构不是一种社会现实的“反映”，而是一种概念性图式的“反映”。一个概念性图式是从一个复杂的现实中选择特殊的属性，并按照共同的成规分类而成。作为一种逻辑顺序的方法，概念性图式并无真伪之别，而只有有用与无用之分。概念性图式的基础是中轴原理，并具有一个中轴结构，它们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趋中性。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是以生产和使用的各种知识作为中轴的概念顺序。例如，以财产为中心轴，美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苏联是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和技术为中轴，美国和苏联都是工业社会。

由此，贝尔认为，理论知识正日益发展成一个社会的战略源泉，即中轴原理。中轴原理的中轴结构的思维力图说明的不是因果关系，而是趋中性。在寻找社会如何结合在一起这个问题的答案时，它设法在概念性图式的范围内说明其他结构环绕在周围的那种组织结构，或者是在一切逻辑中作为首要逻辑的动能原理。

社会的主要秩序或领域可以通过识别中轴体制或原理而得到最好的研究，因为这些体制或原理是其他体制结构汇聚的主要路线，它们是社会要解决的主要问题。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中轴体制是私人所有制，在后工业社会里，中轴体制是理论知识的中心地位。在最后一百年来的西方文化中，中轴线始终是“现代主义”，它对传统进攻并确立体制。在西方的政治制度中，中轴问题是争取大众参政的愿望和官僚主义之间的关系。

概念性图式和中轴原理之所以有价值，是它允许人们用多方面的立足点来设法了解社会变化，但它并不摒弃在特定计划内理解关键结构或中轴原理的“首要逻辑”的价值。因此，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名词，都是马克思主义结构内以财产关系为中轴的概念顺序。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些名词是以生产和使用的各种知识为中轴的概念顺序。以中轴为基础，我们可以突出相同点和不同点。因此，以财产为中轴，美国 and 苏联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和技术为中轴，苏联和美国就都是工业社会，因此又多少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当人们观察苏联和美国时，就不需要完全依赖于趋于一致的原则或固有冲突的原则，而可以具体说明以此进行区分的，旋转着的中轴。

(二)后工业社会

1. 后工业社会的概念

“后工业社会”概念是怎样提出的？贝尔说，他是在1959年夏季奥地利萨尔茨堡的讨论会上，第一次提出了这样的思想，使用了后工业社会这个名称。当时他所强调的，主要是生产部门的变化以及由一个产品生产的社会转变为一个服务性的社会。1962年春，贝尔为波士顿的一个讨论会写了一篇长文，题目叫：《后工业社会：推测1985年及以后的美国》。这篇文章的主题已经转为研究“智能技术”和科学在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认为那是正在形成的后工业社会的主要特点。该文虽然没有发表，但却在科学界和政界人士当中广为传播。

人们一直提出这样的问题：为什么把这种推测性的概念称之为“后工业”社会，而不叫做知识社会、信息社会或专业社会。贝尔认为，这是因为所有这些似乎都与他所描绘的那些正在出现的明显情况有所吻合。当时，他受到拉尔夫·达伦多夫在《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一书中所说的“后资本主义社会”和W·W·罗斯托在《经济增长阶段》一书中所提出的“成熟后”的经济这两种思想的影响。他认为对于我们生活于其中的西方社会来说，我们的感觉过去是、现在仍然是：它处于一种巨大的历史变革之中，旧的社会关系(由财产决定的)、现有的权力的结构(集中于少数权贵集团)、以及资产阶级的文化(其基础是克制和延迟满足的思想)都正在迅速消蚀。动荡的根源来自科学和技术方面，也还有文化方面。因为，贝尔认为西方社会的文化已经实现了独立自主。这种新的社会形式究竟会像个什么样子，现在还不清楚。所以，“后”这个缀语，是要说明生活于间隙时期的感觉。

贝尔认为，他采用“后工业”的词，有两个理由：第一，在于强调这些变迁的间质性和过渡性；第二，在于着重知识技术这个主要的中轴原理。但这种强调并不意味着技术是所有其他社会变迁的首要决定因素。没有一个概

念图式可以把一个社会现实描述穷尽。每个概念图式都是在各种特征中遴选某些特征的棱镜，以便突出社会变迁，或者更具体地去回答某些问题。

2. 后工业社会的主题与标志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主题主要应用于社会结构(技术——经济秩序)的变化，只是间接地涉及政体和文化(这包括社会结构的其他主要领域)的变化。其结果就是扩大了不同领域之间的割裂，因为各个领域现在都是在相互矛盾的中轴原理之下运行的。

后工业社会的标志是什么？在贝尔看来，今天世界上绝大多数国家仍然依赖第一类经济部门：农业、矿业、渔业、林业。这些经济部门完全以自然资源为基础。它们的生产率低，并且由于原料和初级产品的价格波动而使其收益大幅度摇摆。在非洲和亚洲，农业经济占用劳动力的70%以上。在西欧、北欧、日本和苏联，劳动力的大部分从事工业或产品制造业。贝尔认为，今天的美国是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国家：它的服务业部门雇用的劳动力占就业总人数的一半以上。美国是第一个服务性经济的国家，是第一个大多数人既不从事农业生产，也不从事工业生产的国家。今天，约有60%的美国劳动力从事服务性行业；到1980年，这个数字将上升到70%。最惊人的变化是专业和技术人员的增加——这通常是要求具备大学程度的职业——其增长率是平均增长率的两倍。更进一步的一个统计分析将勾划出这样一幅图景——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作用，他们是构成后工业社会的关键集团。

贝尔认为，后工业社会的概念是一个广泛的概括。如果从五个方面，或五个组成部分来说明这个术语，它的意义就比较容易理解：(1)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2)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3)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4)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5)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行业为基础的。因此；它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这里要考虑的不是纯粹的体力或者能源，而是信息。

在该书的第2章中，贝尔在美国的结构范围内探讨了后工业社会五个方面中的两个：从产品生产经济向服务经济的转变，以及职业比例曲线的变化。他指出，后工业社会是以服务行业为基础的；如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话，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准来确定。随着工业发展，必引起运输和公用事业的扩大；大规模商品消费和人口增长，使销售和金融、不动产、保险等传统白领就业中心活动增加；人们生活面扩大和新的需要与爱好发展，使第三产业即个人服务部门迅速发展。他援引了美国1870年到1968年的各种统计资料，以及到1980年的预测，说明了制造业部门和服务业部门就业情况和百分比变化，并指出专业与技术人员是职业类别中增长最快的，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占主导地位的职业集团。贝尔还探讨了后工业社会的某些劳工问题。他也指出了这方面变化的一些限制，其中主要包括：生产率的限制、通货膨胀的限制，美国制造业产品定价过高从而在世界市场上销路下降的限制等。

贝尔指出，后工业社会并不取代工业社会，就像工业社会并不消除经济中的农业部门一样。犹如在羊皮纸上刮去原有文字后重写，这些新的发展覆盖在旧的一层上，消除了一些特征而加厚了整个社会的结构。为了使读者对本书的详细论点有个指南，贝尔还强调一下后工业社会的某些新的方面。

(1)理论知识的首要性。他认为每个社会都是存在于知识的基础之上，但

是只是到现在才有个改变，理论知识的系统汇编和材料科学成为技术创新的基础。关于这一点，我们可以主要从标志着本世纪后三分之一时期的、以科学为基础的新工业(电脑、电子学、光学、聚合物)中看到。

(2)新知识技术的产生。贝尔认为，通过以电脑线性规划、马尔考夫连锁、随机过程之类为基础的数学和经济新技术，我们可以利用模型、模拟以及系统分析和决策理论的其他手段，来对经济问题、工程问题(也许不是社会问题)制订更为有效和“合理”的解决办法。

(3)知识阶级的扩展。社会上成长最快的集团是技术和专业阶级。在美国，1975年，这个集团加上经理人员，占800万劳动力人口的25%。到2000年，技术和专业阶级将是社会上最大的一个集团。

(4)从商品变为服务。贝尔认为，在工业社会中，服务业主要是辅助商品生产的运输业、公用事业和金融业，以及个人服务(美容院、餐馆雇员，等等)。但是在后工业社会中，新的服务业主要是对人服务(主要在医疗保健、教育和社会服务)以及专业和技术服务(例如，研究、评估、电脑以及系统分析)。这些服务业的扩展成为对经济增长的限制和持续通货膨胀的根源。

(5)工作性质的改变。贝尔认为，在前工业社会中，生活就同大自然的竞争，人类要从土壤、水域或林木中夺取生计，活动往往是小批的，并受自然变迁所制约。在工业社会中，工作是和虚拟自然进行竞争，当机器生产出商品和东西时人类就相形见绌了。但是在后工业世界里，工作主要是“人与人之间的竞争”(官员和当事人之间，医生和病人之间，教师和学生之间，或者在研究团体、办事机构、服务团体之中)。因此在工作经历和日常事务中，自然被排除了，人造事物被排除了，人们必须学会如何相处。在人类社会史上，这是一个全新的、没有类似的新情况。

(6)妇女的作用。贝尔认为工业部门的工作(例如在工厂)主要是男人的工作，妇女往往被排除在外。后工业部门的工作(例如对人的服务)对妇女提供了更多的就业机会。

(7)科学的蜕变。回顾17世纪的科学群体，是人类社会的一个独特组织。它具有超凡感召力，因为它在寻求真理上是革命性的，在方法和程序上是公开性的；它的合法性来自它的信条，即科学的目标是知识本身，而不是任何特定的实用目的。它不像其他有超凡感召力的群体，(主要是宗教团体和救世主式的政治运动)，它并没有把自身的信条视为“常规”而强制推行一些正式的教条。直到最近以前，科学并没有碰到研究工作官僚化、研究工作从属于国家指示的目标，以及研究结果要根据实用报酬来“审核”等问题。现在，科学已经不但和技术而且和军事、社会技术、社会需要等密不可分。所有这一切就是后工业社会的中心特征，是这个新科学组织的特性，对于未来的自由研究和知识是极为重要的。

(8)工作地点成为政治单位。大多数社会学分析集中注意阶级或阶层，注意那些相互之间存在上下级关系的社会横向单位。然而在后工业部门，一套纵向次序的工作地位很可能将是政治关系的更重要场所。在本书第406—407页，他叙述了这种后工业格局的可能工作地点。有四个职能性工作地点——科学的，技术的(即工程学、经济学、医学等应用技术)，行政的和文化的——以及五个体制性工作地点——经济企业，政府部门，大学和研究机构，社会机构(例如医院、社会服务中心)，以及军事部门。贝尔的论点是，主要的利益冲突将是在工作地点集团之间，同时，对工作地点的强烈归属感将会阻

止新的专业集团在社会上组成一个坚实的阶级。

(9)能者统治。后工业社会主要是一个技术社会，奖酬较少根据继承或财产(虽然这些能掌握财富或文化优势)，而较多根据教育和技能。能者统治的问题不可避免地成为一个重要的规范问题。在本书中，他试图界定能者统治的性质并主张“公正的能者统治”的观点，或者主张根据成就和通过同行的尊敬来确立其地位。

(10)匮乏的终了？贝尔认为，19世纪的大多数社会主义和乌托邦的理论把社会的几乎一切病态都归之于商品的匮乏以及人类为争夺这些稀缺商品的竞争。事实上，最常见的经济学定义之一是把经济学定义为：对竞相争夺的稀缺商品进行有效分配的艺术。马克思和其他社会主义者认为富足是社会主义的先决条件，从而实际上声称，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由于人人的需要都得到满足，所以无需采用公平分配的规范性条例。就这个意义来说，共产主义的定义就是废除经济学，或者是哲学的“物质体现”。然而，相当清楚，我们却始终摆脱不了匮乏。贝尔指的并不只是资源稀缺的问题(对这个问题仍然争论未决)，而是说，后工业社会在本质上带来了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作家们所未想到过的新匮乏。社会主义者和自由派人士曾经谈论商品的匮乏；但是我指出的是，在后工业社会里会出现信息的匮乏和时间的匮乏。即使人类日益成为经济人，他们在支配休闲时间上仍然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冷酷的分配问题。

(11)信息经济学。如贝尔在前面所指出的，信息在本质上是一种集体货品而不是私人货品(如财产)。在商品销售上，生产商之间的“竞争”战略显然是可取的，以免企业变得懒散或垄断。然而，为了知识的最佳社会投资，贝尔认为，我们必须采取“合作的”战略，以增强知识在社会上的扩散和使用。关于信息的这个新问题，在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和政策方面，向经济学家和决策者们提出了最重大的挑战。

在列举了后工业社会出现的新情况之后，贝尔认为，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有着若干不同的阶段。第一，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必然引起运输和公用事业的扩大，商品运动和能源使用增加的辅助性服务，同时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劳动力的增加。第二，在大规模商品消费和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销售(批发和零售)和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传统的白领就业中心的活动也在增加。第三，正像十九世纪后半叶德国统计学家克里斯琴·恩格斯的理论所指出的，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人们发现，家庭用于食品的费用比例开始下降，边际增长额首先用来购买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然后用于奢侈品、娱乐等方面。因此，随着人们生活面的扩大和新的需要与爱好的发展，第三产业即个人服务部门开始发展饭馆、旅社、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但是，这里开始出现一种新的认识。对于社会所许诺的幸福生活的要求集中到两个领域，这是这类生活的基本：保健与教育。疾病的消失和过上丰裕生活的人数不断增加，加上努力延长寿命，这就使保健服务成为现代社会的一个重要特色。

3. 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

关于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贝尔谈到了工业社会中阶级与权力的转化。从那些基础上，贝尔他认为，按照这两个历史轴心来考虑而看看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就可以得出两个很明显的结论：第一，正在兴起中的新社会里的主要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但是，

第二，社会的支配体系不在代代相继的职业阶级手中，而是在政治秩序中，至于什么人管理政治秩序则尚待观察。

后工业社会的阶级状况如何？在贝尔看来，管理性资本主义的兴起，不应视为公司企业专业化的一部分，而且是那种社会结合剂上发生的“裂缝”。美国家庭资本主义解体之后，在权力与社会阶级的关系之间正在发生两种“无声的革命”：一种是传统权力的衰落(但不一定是财富的衰落)，这意味着，社会上层的富裕企业家阶级及其子孙后代不再构成一个统治阶级；另一种是经理阶层的兴起，这意味着权力不再继续掌握在一个特定的特殊集团手中，权力的连续性体现在机构职位方面。统治权大部分掌握在技术——知识中坚集团手里，这包括公司经理和当时占据机构职位的政治领导人。个人和家庭的权力消失了，但机构权力依然存在。所有这一切，对当代社会中阶级和社会地位不断变化的性质，打开了一个更加广泛和更加理论性的前景。最终说来，阶级并不意味着一个特殊的人群：而是把取得、掌握和转移不同权力及其有关特权的程序制度化的一种体系。

后工业社会有它特有的精神气质。这种精神气质有四个成分：普遍性、社团性、不谋私利，以及有组织的怀疑。普遍性要求事业应对任何有才能的人开放。它反对取决于个人属性或个人的社会属性——诸如种族、民族、出身、或阶级——的要求。社团性意味着知识是社会的产物，来自过去的共同遗产并自由传给未来的继承者。在科学中，以人命名的声誉(例如气体的博伊尔定律)是一种纪念性的措施，而不是一种财产权力。不谋私利并不是个人动机的问题(科学家对于自身名誉的要求，和其他人相比，即使不是更具妒忌心，也是同样妒忌的，因为名誉是他们的主要报酬)，而是规范性的重大问题。在科学史上事实上不存在骗局。这和其他领域的活动相比确属出色的记录，这主要不是由于科学家们的个人品德，而更多地由于科学本身的探究性。科学知识不是意识形态(虽然它可能由于意识形态的目的而受到歪曲)，而是要经受取得证实的不断考验的公开解释。

后工业社会的意义在于：(1)它强调科学的作用与认识的价值为社会基本结构之必需；(2)它使决策更具有技术性，这就使科学家和经济学家更加直接地参与政治活动；(3)它使现有的脑力劳动科层化倾向不断加深，从而造成传统意义上的知识的目的和价值发生一系列变化；(4)它产生和发展了技术知识分子，从而提出了技术知识分子与文科知识分子的关系这样一个重大问题。

贝尔认为，一个新型社会的出现带来了财富、权力和地位的分配问题，这对于任何社会都是中心问题。因此，在其中第6章中，他主要探讨了科技治国论决策和政治性决策之间的关系。贝尔把1945~1950年看作后工业社会象征性的“出生年代”，考察了科技治国思想的发展，评述了物支配人、军人支配物的现象。他列出了“阶层划分和权力”表，分别从资源、社会活动场所、统治人物、权力手段、阶级基础，取得权力的途径等方面，对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进行了比较。他指出，在后工业社会里，专业技术是取得权力的基础，教育是取得权力的途径，通过这种方式出现的人们是科学家。但是，在一个紧密交织在一起的社会中，更多的决策必须通过政治和计划来制定，因此，政治决策仍是社会的主要决策，知识对于权力来说仍是一个从属的因素。

在“结语”部分，贝尔分析了后工业社会将出现的主要问题。他首先说明现代社会主要问题不是阶级矛盾，而是经济职能不受管束的性质。当代发

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变化，一是经济职能从属于政治秩序，二是社会职能与财产相分离。新的认识为基础的专业阶级兴起，形成“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411页）。然后他主要分析了两类问题，第一类是科学与政治或政府的关系，第二类是实行能者统治原则所产生的矛盾。他认为，最尖锐的紧张关系是文化与社会结构之间的矛盾，前者的中轴方向是反体制的，而后者则按经济化模式和科技治国论模式确定的。这种紧张关系将成为后工业社会中的最根本问题。

(马宏 孙竹 撰)

【美】托夫勒·阿尔温：
《第三次浪潮》——使人迈向未来的大门

在跃向未来的赛跑中，穷国和富国站在同一起跑线上。

——托夫勒

问题提的越大，犯错误的风险越大，绝口不提，又窒息了知识的生命。

——乔治·斯坦因耐尔

一个发展一体化的浪潮，经历了好几个世纪。

——诺伯特·伊莱亚斯

一、作者的生平及学术成就

《第三次浪潮》的作者阿尔温·托夫勒，是个记者出身的美国社会学家。他曾任《幸福》杂志副主编，给许多杂志撰写文章。他还著有《文化消费者》，《城市学校校舍》，1970年出版了《未来的冲击》，讨论美国未来的政治和社会制度，被译成五十多种文字，畅销七百万册。托夫勒还曾任罗素·赛奇基金特约研究员，在新社会研究学院讲授未来学。1969年在康乃尔大学当特聘教授，从事研究未来价值体系。他还曾任洛克菲勒兄弟基金会，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和未来研究所顾问。

西方社会对未来的研究，一方面是为了适应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客观形势，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和动荡。曾经当过美国副总统的纳尔逊·洛克菲勒说过，关于美国的未来，是他多年来一直深为忧虑和不断遭到挑战的难题。他说：“现在迫切需要集中设计出一种行动方案，使我们能够应付所面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的挑战。”

该书提供的由于科学技术发展所引起社会各方面的变化与趋势，值得我们注意与研究。它所阐述的观点，也可作为我们了解与评论西方思潮之用。

从根本上说，该书的观点同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是相违背的。但是不管它讲得确切不确切，或者还有什么别的目的，从另一个角度，我们可以得到一种信息：在本世纪末，下世纪初，现在已经突破和将要突破的新技术，运用于生产，运用于社会，将带来社会生产力的新的飞跃，相应地会带来社会生活的新变化。对我们来说，对今后向现代化进军，这既是个机会，也是一个挑战。

托夫勒主要著作有：《文化消费者》（1964年）、《未来的冲击》（1970年）、《未来主义者》（1972年）、《关于经济痉挛症的报告书》（1975年）、《第三次浪潮》（1980年）、《力量转移》。

二、《第三次浪潮》评价

20世纪80年代，在美国，每当人们翻开报纸，头条大字标题往往都是

恐怖分子绑架人质；

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

大使馆火光冲天，突击队横冲直闯！

“危机”晴雨计——黄金价格打破历史记录！

面对着这些报道，凶事预言家们聚集起来大合唱，厄运之歌充斥了人间。名人在大街上宣称，世界已经“发狂”，而专家们指出，总的趋势将导向大难临头。

然而，《第三次浪潮》却提出了与此鲜明不同的观点。

它的主题是，世界并没有突然转向疯狂。在表面上无聊骚动和吵吵嚷嚷的底下，世界的事情实际上惊人地显示出潜在的具有希望的前景。本书就是讨论世界这个前景和希望。

《第三次浪潮》是献给那些人，他们认为，人类的历史远未结束，人类的故事不过是刚刚开始。

巨大的浪潮汹涌澎湃，遍及今天的世界。它往往以不同寻常的方式，创造人们工作，娱乐，婚配，生儿育女和颐养天年的一个全新的环境。商人们在经济湍湍急流中搏斗。政客们看到他们在民意测验中浮沉。大学，医院和其他公共机构在物价飞涨中拚命挣扎。价值观念，社会准则被撕成碎片正在解体，而家庭，宗教和国家的“救生艇”*被猛掷在巨浪之中。

对于这些激烈的变化，我们可以把它们当作不稳定的瞬息即逝的灾难和孤立事件。然而，如果从长远的观点来看，许多事情的出现，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

首先，今天世界的许多变化，并不是孤立的，彼此不相关的，也不是偶然出现的。例如，小家庭的崩溃，全球性的能源危机，迷信的到处蔓延，有线电视的流行，灵活上班制，新的养老金和带工资休假合同的兴起，从魁北克到科西嘉的分裂主义运动的出现，所有这些看来似乎是孤立的事件，恰恰是反过来看，才是正确的。所有这些和其他许多看上去不相干的事情和趋势，都相互有联系，是结合在一起的。实际上，它们是宏观世界中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末日，展示着一个新的文明正在兴起。

我们孤立地看待这些变化，没有察觉其巨大意义为时已久。对于这些变化，我们不能作出一个系统的有说服力的回答。因此，作为各个单位和个人，我们的决策不过是毫无目标和作茧自缚。作为政府，我们在危机和决策中，东倒西歪，跌跌撞撞，面对未来则缺乏高瞻远瞩的想像力，既无信心，又无规划，在前进的道路上犹豫徘徊，束手无策。

认识今天世界存在的各种力量的冲突，需要系统的结构。我们好象是陷于狂风暴雨困境中的船上水手，没有罗盘，没有海图，在危险四伏的暗礁中摸索航行。对策已被埋在零散片断的资料和无关痛痒的分析中。综合，此时不仅是有用处的，而且是关键所在。

因此，《第三次浪潮》是一本规模庞大综合的书。它叙述了我们许多人生长于其中的旧文明，细致全面而又生动地描绘了一个正在闯入我们生活中的新文明。

这个新的文明是多么深刻的革命啊！它向我们固有的一切观念挑战：陈旧的思想方法，老一套的公式定律，这时的教条和观念形态。对于这些，无论你多么珍爱，运用起来多么得心应手，这都无补于事，它们已不再适合实际情况了。

世界正在从崩溃中迅速地出现新的价值观念和社会准则，出现新的技术，新的地理政治关系，新的生活方式和新的传播交往方式的冲突，需要崭新的思想和推理，新的分类方法和新的观念。我们不能把昨天的陈规惯例，沿袭的传统态度和保守的程式，硬塞到明天世界的胚胎中。

因此，当本书在描绘这个陌生的新文明时，我们将陈述理由，来对付今天非常时髦的悲观主义的挑战。绝望支配了文化可能超过十年之久。

然而，当我们考察许多新涌现出现的关系时，——在改变能源方式和家庭生活方式之间，在先进生产方式和自助运动之间，只是少许提到这些，我们就不禁猛然发现，许多导致今天巨大危险的情况，同时也是打开未来世界大门令人神往的新的潜在力量。

《第三次浪潮》向我们揭示这些新的潜力。它论证了在极端腐朽和濒临毁灭之中，现在我们能发现惊人的新生和活力的迹象。它清楚地表明，而且我们认为，运用智慧再加上一点运气，新出现的文明，无可争辩的比我们所知道的任何文明都更健全，更明智，更经得起考验。它将更加公正，更加民主。

如果该书的主要论证是正确的，那么，即使在临近转变的这几年以暴风雨骤雨和危机重重打头，该书也对未来持乐观的态度提供了充分有力的理由。

该书与悲观主义观点截然不同，世界并没有面临末日，人类的历史才刚刚开始。《第三次浪潮》断定，悲观绝望不但是一种罪过(按照 C·P·斯诺的说法，我相信这一点并再次提出来)，而且还是毫无根据的。世界在混乱骚扰底下，蕴藏着惊人的希望和前景。

当今世界许多变化和趋势都相互联系结合在一起的，是宏观世界的组成部分。它意味着工业化文明的末日，一个新文明正在兴起。

认识今天世界各种力量的冲突需要系统的结构。本书是综合规模庞大的书。它叙述了旧文明，全面而生动描绘了正在闯入我们生活中的新文明。

悲观绝望是毫无根据的。许多导致今天巨大危险的情况，也是打开未来大门的潜在力量。本书揭示这些潜在力量，论证化腐朽为新生的迹象。作者认为，运用智慧再加上点运气，新文明将比以往的更健全，明智，公正和民主。因此有充分理由对未来持乐观态度。

为使大规模的综合简明扼要，该书把文明分为三个时期：第一次浪潮农业阶段，第二次浪潮工业阶段，和目前正在开始的第三次浪潮。

预测社会未来不可能避免主观的评价，该书并不自命为科学著作。但本书是以大量事件和准系统化典型的工业文明与我们之间的关系为基础。

我们从四个方面对该书进行评价：

(一) 超级斗争的文明

新文明的诞生，是我们生活中最大的事件。

对这个新文明有各种各样的命名。有的失之于片面，有的没有反映它的冲突与压力，没有充分表达人类面临变革的全部力量和范围。

第一次浪潮历时数千年。第二次浪潮至今不过三百年。今天历史发展速度加快，第三次浪潮可能只要几十年。

对于未来，有两种看法：一是认为今天的变革，不会动摇他们所熟悉的经济与政治结构，期待未来将一如既往。另一种是断定今天的社会没有未来，

世界已临末日。

这两种未来观都使人们陷于无所作为的境地。

有很多光明大道让我们去思考未来，为未来作好准备。这还有助于我们变革现实。本书的“革命前提”认为，即使今后几十年里充满动荡，骚乱与暴力，但不会把我们摧垮。我们已经取得了变革的经验，一个健全合乎需要的未来是可能实现的。

需要一种新的方法来识别与分析面临的变革。“浪潮前锋”分析法认为，在历史的长河中，探求哪儿是带动我们前进的前锋。它把注意的焦点对准历史的中断——革新与破裂时期。这是识别变革的关键。

农业的兴起，是人类社会发展的头一个转折点。工业革命，是第二次伟大的突破。工业化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十年达到顶峰，第三次浪潮开始蜂拥而来。

在任何一个稳定的社会中，任何一个占优势的变革浪潮的发展前景，是比较容易看清楚。相反，当一个社会被两个或更多巨大变革所冲击，而没有一个显出优势时，对未来的信念就被弄得支离破碎，对变革的意义就难以辨别与选择。

今天，在美国与许多国家里，两个浪潮之间的冲突所引起的社会紧张与危险，打破了通常阶级，种族，性别和政党的界限，使人很难从反动中区别进步，从敌人中识别朋友。所有原来的两翼和联盟都崩溃了。政治生活的紊乱，反映在人的精神上是个性的崩溃。

但是，当我们认识到第三次浪潮的变革是与第二次浪潮消退相联系时，我们就可以察觉到一个性质截然不同的潜在秩序。这对我们对未来的选择认识更明确，而且是透视政治和社会的X光，提供了洞察个人在历史中的作用。

两次浪潮之间的冲突，是以紧张的政局为中心贯穿于今天的社会。政治的根本问题在于：谁能为新文明的兴起作出规划，以取代旧的工业社会。因为世界上许多严重问题，都不再能在工业制度结构中解决了。

三百年前爆发了工业革命，摧毁了古老的社会，创建了一个全新的第二次浪潮文明。它是一个丰富多彩的社会制度，涉及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并把一切事物集中组织起来，形成世界有史以来最有力量，最有向心力，最有扩张性的社会制度。

第二次浪潮各个社会的共同特征：一，都是以使用不能再生的化石燃料，作为能源基础。二，技术的突飞猛进。三，大规模的销售系统。三者结合，形成了第二次浪潮的技术领域。

第二次浪潮的技术领域需要彻底革新的社会组织形式。原来农业社会的大家庭职能转移了。家庭不再是共同劳动的经济单位。大家庭的结构变成了人口简单，富于流动的现代化小家庭。

儿童要为将来进入工厂作准备，群体化教育成为第二次浪潮社会又一个结构中心。在以工厂为模特的群体化教育中，在“表面课程”之外，还有“隐蔽的课程”，即：守时，服从，死记硬背与重复作业。

存在于所有第二次浪潮社会中第三种机构为公司组织。它扩大了上述两种结构对社会的控制。责任有限公司这个创造，打开了投资的闸门。

小家庭，工厂式的学校加上大公司，三者形成第二次浪潮确定的社会结构。围绕着这三个核心结构，出现一大批也按工厂组织原则建立的社团组织，形成错综复杂的社会组织生态。

工厂的组织原则甚至反映在艺术领域中，音乐从室内乐发展到交响乐的历史，提供了例证。

发明邮局，为工业化时代通讯打开渠道掀起第一个热潮。1960年，邮件数达一百亿件。在美国，邮局为全国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儿童递送了三万五千五百件国内邮件。1960年，美国人每天打了二亿五千六百万次电话，一年超过九千三百亿。

报纸，广播，电影和电视都体现了工厂的基本原则。所有这些传播工具，打上相同的印记，传入千百万人的脑际。大规模制造出来的标准化的“事实”，标准化副本与成品，通过几个集中的“思想工厂”加工，源源不断地流向千百万消费者。

所有工业社会都依靠上述的信息领域，技术领域和社会领域这三者的结合，组成社会的基本结构，协调经济生产和个人活动。

旧观念的崩溃，改变了我们对自然形象的认识。现在强调人与自然和睦相处，改变以往对抗的状态。地球事实上比过去的估计更脆弱也更渺小。科学对自然界探测所拥有的工具，可以探测小至一百万亿分之一厘米的现象，远至宇宙边缘一千万亿英里以外，可以研究只存在一百万万万亿分之一秒的短暂现象。地球并不是唯一有生命的行星。

在对进化的认识上，曾经认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达尔文主义，实际上只适用于某些特定场合。各个领域变化的规律是不同的。许多生命科学家和人类学家正在研究“巨变理论”。从1953年破译了DNA密码以来，今天世界各地实验室研究遗传工程的人，都能创造完全新的生命形式。人类将成为进化的“设计者”。

第二次浪潮的乐观主义遭到了第三次浪潮文明的痛击。悲观主义成了一时的风尚。今天世界迅速认识到，在道德，美学，政治，环境等方面日趋堕落的社会，不论它多么富有和技术高超，都不能认为是个进步的社会。进步不再以技术和物质生活标准来衡量。

社会不会只沿着单一轨道发展。丰富多彩的文化是衡量社会的标准。

科学家们指出，时间不是绝对的，而是相对的。它受自然所左右，根据不同的位置，测量到不同的后果。“黑洞”否定了时间，可使时间静止。在粒子和微波的世界中，一位科学家甚至假设：时间会倒流。还有的科学家指出，时间在宇宙不同部分的流速不同，可能还应有复数的概念。所有这些，都沉重地打击了第二次浪潮的时间直线说。对待时间的理论，需要作根本的修正。

第三次浪潮使人类与空间的关系进入新阶段。人口的重新分布，改变个人和社会对空间的观点和希望。第三次浪潮还形成一种见解：既是地方色彩浓厚，又是对全球甚至对银河系兴趣浓厚。在第三次浪潮精神世界中，远近兼顾，融为一体。我们正在迅速地接受具有更多动态和相对性的空间观。

世界没有唯一“正确”的地图，而只有为不同目的服务的不同空间形象。

第三次浪潮文化注重研究事物的结构，关系和整体。系统论思想强调“全面，而不是零碎地观察问题”。它在50年代中期在文化界普遍发生深刻影响。70年代生态论者与系统论者观点一致，共同斗争。大学各学科之间要求共同研究的呼声达到狂热程度。

西方青年热衷于东方宗教。

医学界兴起“整体疗法”。

“机能整体主义者”狂热地追求整体，导致他们所坚持的并不是“整体主义”，而是整体的另一个部分。他们的整体主义仍然是半体主义。

思想深刻的批评家主张把整体论与简化论结合起来。这并不是放弃分类科学。但是现在应该同样支持“大规模综合系统研究”。

第二次浪潮机械因果论在解释生长，衰亡，突变等现象时，远不能令人满意。它只适用某些特殊情况，而不是全部现象。

在某种程度上，第三次浪潮因果论起源于系统论的反馈论。“负反馈”的功能是保持稳定。科学家们发现它从生理学到政治学，在各个领域里起作用。六十年代初期，开始更多地提倡研究“正反馈”，即不是压制变化而是促进变化，不是保持稳定，而是向稳定挑战，甚至推翻稳定。“正反馈”可以说明过去很多令人迷惑的因果关系。把“负反馈”与“正反馈”结合在一起，可以看到两个不同的过程在复杂的有机体内充分地相互作用。第三次浪潮的因果论，生动地描绘充满相互交叉影响的复杂世界。它还帮助我们从宿命论与反宿命论这个长期争论中走出来。这可能是哲学上最重要的突破。

诺贝尔奖金获得者伊里亚·普里高津，揭示了化学和其他类型结构如何通过偶然和必然的结合，跃向分化和复杂的更高阶段。他阐述了“耗散结构”。普里高津认为，他的观点除了纯科学意义外，还具有政治和哲学的共鸣。

普里高津以白蚁筑巢的过程为例，说明“自发形成的相干的结构”。

随着超越第二次浪潮决定论的因果观，我们开始使用这些互相作用的机制来分析问题。它们有些使涨落放大，有些使涨落衰减；既有系统的崩溃又有突发的革命跃进，既有耗散结构又有偶然和必然的结合。

朝着新变革和多样化方向发展的第三次浪潮文化，试图把新的关于自然，进化，进步的观点，把新的更丰富的关于时间与空间的观点结合起来，以新的因果关系把整体论与简化论融为一体。

对电子家庭所作的种种设想。夫妻在家里共同劳动将保证密切而亲热的关系，可能增加爱情的新内容。

爱情除了性的要求，心理的满足，还得加上大脑的思维能力，责任心，自制力以及其他在工作上必须具备的品德。

青年人今天与社会的感情疏远，很大程度是他们被迫成为社会中的非生产者。电子家庭将改变这种现象。它把青年纳入工作行列，可能为青年的高失业率，提供真正解决办法。

可以设想在明天的家庭里，邀请一两位外人共同生活，组成受到法律保护的小企业，组成“电子大家庭”。这些“电子大家庭”可能组成工作网，以提供商业和社会服务。其意义与影响十分重大。

任何家庭结构的改变，都会改变人们各自在生活中的身分和地位。由小家庭向多样化家庭的过渡中，由于可供选择的方式太多，情况变化太快，将使家庭成员经受极度痛苦和孤独。必须从道德观，就业和税收政策等多方面的立即进行改革，以适应家庭模式多样化的形势，使人们轻松地愉快地转变到在明天的家庭中生活。

今天上百万家庭的不幸与破裂，是工业总危机的组成部分，是第二次浪潮一切制度破裂的产物。

赞成恢复第二次浪潮小家庭制度的主张，实际上是要求恢复整个第二次浪潮文明。这不仅是冻结技术，而且使历史本身都停止发展。

第三次浪潮的出现，也不是小家庭的终结，而是它不再是社会仿效的理

想模式。代之而起的是各种不同的家庭模式。

美国人口的 93% 已不生活在符合第二次浪潮的小家庭模式之中。

独居人口迅速膨胀。

不合法律手续而同居的人数增长很快。

在许多工业化国家里，很多人不愿生孩子，形成了“不生育文化”。

很多孩子由离婚的父母单方抚养。

“合伙家庭”反映了高比率的离婚者再婚的现象。

技术发达国家的家庭模式象蜂窝一样发展和扩大：同性恋婚姻，群居村，一群老人同居，少数民族的群居。还有合同婚姻，连续婚姻，家庭群等等。

美国芝加哥黑人区调查表明，有八十六种以上成人的结合关系。

第三次浪潮文明的家庭，不是单一的模式。家庭模式将变得非群体化。

第三次浪潮的发展，使社会生活基本准则和人们的行为规范发生变化。两代人以及各个领域中所发生的冲突，实际上是应该采用哪种行为规范之争。

第三次浪潮带来完全不同的时间观念改变了社会基本节奏，把人们从机器束缚中解放出来。

(二) 解开楔子的法则

在《第三次浪潮》中作者认为：第二次浪潮把人类生活劈成两半：生产和消费。

这一裂变，后果极为重大。市场第一次成为人类生活的巨大中心。

经济市场化，同样发生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经济中。

以市场的规模衡量经济的增长，成为各国政治的首要的目标。

市场的存在与扩张，导致了生产率的猛增。但生产与消费的分裂，也导致了政治，社会，文化的深刻矛盾与冲突，影响到人们的家庭生活和两性身分，甚至个人的精神与个性。

贪得无厌，商业腐化，人际关系的冷酷，并非利润制度独有的现象，并不是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反映，而是工业化的后果，是所有以市场为中心的社会的反映。

标准化，专业化，同步化，集中化，好大狂，集权化，这六个相互联系的原则，组成了工业化文明的法则，统筹安排了千百万人的行动，影响到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它是生产与消费分裂的后果。

在本世纪初创建的美国电话电报公司的西奥多·伐尔，是伟大的标准化专家。他不但使电话机标准化，而且把公司的业务程序和行政管理也标准化了。

另一个是泰勒。他认为，只有每个工人在劳动中的每一个动作实现了标准化，劳动才是科学的。泰勒成为世界企业管理的导师。

标准化还应用在雇用办法，教育方法与内容，大众传播界，语言，重量与长度单位，货币，商品价格等等。

亚当·斯密是专业化的积极倡导者。1908年亨利·福特开始制造T型廉价汽车时，把操作工序分成七千八百八十二种，他对这近八千种工序所需要的劳动力的分析，是过度专业化最残忍的证据。专业化同样成为社会主义建设的特征。

工厂生产的发展，高价的机器和与它紧密相依的劳动，要求非常精确的同步化。钟表应运而生。人们从小受到强调时间观念的教育。社会生活，以至人们日常生活的各个方面，都必须适应机器运转的需要。

第二次浪潮不只是集中了能源，它还集中了人口，集中了劳动生产。资本流通集中于大公司。社会主义也信奉生产集中化是有效率的。

产消分裂产生了好大狂。“大”成了“有效率”的同义语。美国电话电报公司1970年雇员已达九十五万六千人，还有十二个月为期的十三万六千名劳动力。马克思，列宁对大生产所作的肯定性的论述。斯大林粗暴地推行大规模工业化。

不惜一切代价，不顾生态与社会危险，追求国民生产总值，成为第二次浪潮各国政府盲目追求的目标。

集权化在企业中应用，是从铁路管理开始，然后表现在政治上。中央银行的出现，为分散的经济集权化提供了帮助。

工业化把原来的社会砸碎，必须有些人把社会重新组织起来。出现了许多新的专家，其根本使命就是组织。这些人是第二次浪潮的“组织者”。

在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国家里，跃居权力之巅的，既不是企业主也不是工人，而是“组织者”。

权力不是来自“生产资料”的占有，而是来自于“组织手段”的控制。

第二次浪潮文明需要庞大的政府作为工具，以组织协调整个体制的运转。

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权力金字塔是由各企业，政府各部门的统治集团所组成，并由最高权力集团所掌握。它产生于每次危机或政治大变动之后。人名，口号，党派，可能有变化，革命来而复去，但权力的基本结构依然如故，它是工业化文明的需要。它与工业化文明所承诺的民主水火不容。

第二次浪潮各国政府制度尽管表面上各不相同，但实际建立在相同的蓝图上。它都是根据第一次浪潮老观念和工业化初期的新设想结合的产物。例如，政治代表的产生来自居住地区，教育程度受到重视，办事缓慢属于前者；政治思想，组织形式，工作方法，又都呈现初期机械工业的特征。

代议制是第二次浪潮政治结构的基础。各工业化国家运用代议制虽各有不同，但有共同之处。社会主义各国都有类似的代议机构。

论述代议制政府在历史上的进步性和它的局限性。总的说来，它在政治上赋予人性化的突破。但从一开始就没有达到由人民来统治的理想。代议机构的组成，远不能削弱技术专家和社会权贵的控制，反而成为他们保持权力的主要工具。

代表操纵的原则，是控制社会更加重要的工具。代表形成新的社会权贵阶层。代表与被代表者之间的鸿沟，日益扩大。

代议制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对工业技术不平等的确认，是挂羊头卖狗肉的冒牌货。

作者认为：第三次浪潮文明建设新的信息领域，为无生命的环境输入智慧的关键是电子计算机。

在丰富多彩方便伶俐的智能环境中生活，提出的哲学问题是：机器会代替一切吗？会不会超过人的能力以致无法掌握？能不能使它永不伤害人类？

信息领域的深刻变革，注定改变人们对思考问题，综合情况，预测行动后果的方法，改变识字在生活中的作用，甚至改变自己大脑的物质组成和化

学性质。

第三次浪潮信息环境不仅极大地扩大了社会记忆，而且使它起死回生，变得既丰富又活泼。可以要求计算机“思考难以想象的和以前没有想到的”事情。这就有可能产生新的理论，观念，艺术见解，新的技术进展，新的经济和政治创见。

第三次浪潮信息环境在历史上第一次为机器之间通讯交流，甚至为人与周围智能环境交往提供强大设施。

先进国家制造业工人百分比逐年下降。第二次浪潮最落后的工业已从富国转到穷国中去。出于战略与经济考虑，富国不能完全放弃制造业，但只生产主要商品，使用更少的工人。

第三次浪潮制造业的特征，是生产短期的个别的或完全定做的产品，“以致可称为‘只够老鼠喝一口的牛奶’量”。

美国五角大楼在九十一亿美元购买最终成品款额中，有78%（七十一亿美元）用于购买批量生产不到一百件的产品。

第三次浪潮制造商可称为后笛卡尔主义者。现在已能生产更精确更可靠没有一粒可拆卸零件的整体手表。努力的最终目标是：在逐渐由顾客直接控制下，产品完全定做，采用整体件，连续流水生产。这个转变将对大学生未来前途，商人投资计划，以及国家战略的发展，产生影响。

所有办公室的旧等级制度和结构将被改组。办公室的第三次浪潮革命，是各种力量冲突的结果。“过去十年中，办公室生产率勉强增长4%”，而电子计算机的产量过去十五年增加一万倍，其每种功能费用，已下降了十万倍。这两种因素形成了不可抗拒的“文字地震”。各种电子设备将是明天“无纸办公室”的开端。本书后半部就是用文字处理机写成。

电子邮政系统将取代邮局。

所有这些，引起许多恐惧，认为成百万人的职业将被取消。而文字处理机工业部门对此表示乐观。一份七国调查报告指出，1963—1967年期间，以价值总和的百分比计算，日本在七国中对新技术投资率最高，其就业增长率也最高。英国对新技术投资最低，其就业率也最低。

（三）帝国狂热的背后

第二次浪潮的政治实体，需要与不断发展的第二次浪潮经济实体相适应。从美国和法国革命开始，经历了整个19世纪，一个国家主义的狂热，横扫世界工业化地区。

各国政府都极力扩大自己的市场和政治权力，但都遇到了外在与内部条件的限制。修建铁路，成为十九世纪“生存空间”的争夺。

在第二次浪潮以前，欧洲的统治者已经建立了庞大的殖民帝国。这些早期的冒险家和征服者实际是为追求个人财富，其殖民地仍是自给自足经济。

第二次浪潮改变了这种规模较小的掠夺抢劫，形成了大企业，扩展成庞大的帝国主义。新兴的帝国主义从殖民地搜刮原料，加工后以高价把制成品卖给殖民地。

19世纪80年代到90年代，欧洲政治家恬不知耻地宣扬“帝国即贸易”。

第二次浪潮文明不可能孤立存在。它要为搜刮殖民地的资源而不顾一切。它首先需要有一个统一的世界市场来汲取这些资源。

创建统一的世界市场，大半是根据大卫·李嘉图提出的观点。他主张把分工原则运用到国家之间。统一的世界市场成功的建立，使世界贸易大大发展。1750—1914年间，估计增长了五十倍以上。

帝国主义与殖民地之间的贸易是不公平的。贸易扩展的利益，主要是从第一次浪潮世界倾注到第二次浪潮国家中去了。同时对非工业地区人民的社会生活带来深刻的变化，把它们强迫纳入世界贸易体系中。

帝国主义横行于全世界。1492年哥伦布踏上新大陆时，欧洲人统治只占全球的9%，1801年统治了世界的三分之一，1880年就占了三分之二。1935年，欧洲的政治统治达到全球面积的85%，统治人口达到全球的70%。

第二次浪潮国家为争夺世界经济控制权，不断展开流血战争。英法的霸权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遭到德国的挑战。第二次世界大战进一步延缓了世界市场的扩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1946—1950年国际贸易处于1913年以来最低水平。美国和苏联承担了第二次浪潮制度的复兴任务。

美国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关税及贸易总协定，组成统一的世界贸易体系，从1944—1970年基本上控制了各国的贸易。

社会主义工业国也需要一个统一的世界经济体系，以获取资源与原料，并把自己的产品销售到国外。

它建立了经济互助委员会，强迫东欧国家参加。它坚决奉行李嘉图国际分工论。它的行径与老牌帝国主义完全一样。

帝国主义是第二次浪潮世界工业发展的“增压器”和“加速器”。

工业现实观是工业化的产物。它贯穿在工业化一切观念意识形态之中，指导我们去认识和理解这个世界。它是为第二次浪潮文明的运用而形成起来的。

表面上，第二次浪潮似乎没有思潮的主流，而是两股思潮势力的冲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国和苏联都企图把自己的主义传播到全世界。双方斗争激烈，各自提倡不同的“学说”，但双方贩卖的基本上是同一个“超学说”。他们的许多观念的出发点都是一致的。在向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进军时，双方都具有相同的前提，都宣传工业化比其他文明优越。他们都是工业现实观的鼓吹者。

他们所传播的是根据工业现实观三个盘根错节的信念：

一，不同意识形态的双方，都建立在人类要面对自然，征服自然的思想

上。

二，社会进化的观点。社会达尔文主义认为，工业化是社会进化的更高阶段，第二次浪潮文明比谁都优越。

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同时，也认为工业化是最先进的社会形态。

三，结合征服自然与社会进化的进步原则。它认为历史潮流奔向人类生活更美好的未来，势不可挡。

工业化社会需要精确的计算时间的单位并把它标准化了。

时间直线说的观念，在工业化社会占据了优势。它是信奉进化和进步工业现实观的先决条件。

工业化再一次建立“空间广阔”的文明。由于千差万别复杂的劳动分工，要求更多专门的空间形式，并细致地组织在一起。必须把合适的人，在合适

的时间，置于合适的地方。这是同步化在空间上的运用。

宇宙是由独立的，单个的，可以再分的部分所组成。这个观念成为工业现实观的组成部分。

这个原子论的认可，还有它政治和社会的原因。

第二次浪潮文明对事物因果关系的认识是建立在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之上的。

新的因果论，连同对时间，空间和对物质的新观念，把人类从古代迷信中解放出来。

但工业现实观也给自己筑起新的禁锢。它也不自命“道德中立”，也产生“变形的过滤器”，让人民通过它来看待自己和世界。

没有一个简单的主要原因，说明工业革命的起因。它是许多变革的细流的汇合。最值得注意的是生产和消费的分裂和市场的出现。

“工业化男人”所处的环境是他们祖先所无法辨认的，甚至基本的传递感觉的信号都与往昔不同。

面对着心理，经济，政治，社会如此众多的变化，人们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价这个文明？

工业化的批评者，在描写十八九世纪英国工人阶级悲惨生活时，往往把第一次浪潮农业社会浪漫化了。但这并非历史真实。

当然工业文明也有阴暗面。但是，走向未来的道路，不是重新恢复更加悲惨的过去。愚蠢而失去理性的憎恶自己时代和人民的人，很难为创造未来奠定良好的基石。

第二次浪潮本身有两个变化，使工业文明不可能再正常生存下去。

第一，征服自然的战役，已经到达一个转折点。生物圈已不容许工业化再继续侵袭了。

第二，不能再无限地依赖不可再生的能源。

第二次浪潮文明两个非常重要的基本补贴：廉价的能源与廉价的原料均将消失。

工业社会内部也发生分崩离析的压力。第二次浪潮处在种种危机之中。

让我们紧紧把握这个时代的基本事实：工业文明正在消逝，在创建第三次浪潮中，塑造我们的余生。

(四) 政治的陵墓

第三次浪潮文明不能使用第二次浪潮文明的政治结构。需要创造新的政治工具。

今天社会内部的“黑洞”，不是属于哪一个政府的问题，而是各种形式代议制民主本身的深刻危机。

从美国到苏联，到所有工业国家，决策的失灵，不是哪一个总统，总理，首相，主席独有的现象。没有一个领导人能在现存制度的框框内予以解决。政党失去了吸引力。参加选举的人日益减少。权力的真空正在扩展。

人们普遍地批评领导人无能与错误，要求强有力的领导，要求一个救世主。这种愿望，正好与从极右法西斯分子到“左”的极权主义的死灰复燃同时出现。

对要求加强领导班子三种错误思想的批评：

一，所谓极权主义效率高。其实效率与极权并无关系。

二，相信过去使用的领导方式，适用于现在与将来。但不同的文明，需要极其不同的领袖品质。过去的罗斯福，邱吉尔，戴高乐和斯大林这些昨天的强者，未必能领导今天与明天。今天领导人的软弱，并非个人品质的反映。

三，需要政治救世主，拯救我们脱离苦海。但在现有的政治结构框框中，即使是圣人，天才加英雄来统治，也仍然面临代议制最终的危机。

第三次浪潮文明要求领导人的作风与品质，不在于自信武断，而在于从善如流；不在于横行霸道，而在于富于想象；不在于权迷心窍妄自尊大，而在于对领导新世界的局限性颇有自知之明。

第三次浪潮迅速出现，打破了关于如何消灭贫困所有的传统观念。四十年代后期以来，缩小世界贫困差距的大部分努力，都是采用“第二次浪潮战略”。即认为第二次浪潮社会是进步的顶峰，所有社会要解决它们的贫困，就必须重演在西方，苏联和日本所发生的工业革命，要模仿这种已经成功的模式。推行这种战略的，只有少数情况特殊如南朝鲜和台湾得以成功外，大多数国家的努力都以惨败而告终。原因很多，但严峻的事实是，按照第二次浪潮的模式搞工业化行不通了。伊朗就是一个最引人注目的例证。

随着工业化总危机加深，黑暗降临那些最富的国家。人们不禁反问：为什么还要去模仿一种它本身已处于土崩瓦解痛苦中的文明？

富国面对第二次浪潮战略的失败，穷国愤怒要求重新检讨全球经济的呼声，并且深为本身前途担心，从70年代起，开始为穷国设计出一套只能称之为“第一次浪潮战略”。

第一次浪潮战略是第二次浪潮战略的颠倒。它重新强调发展农村。强调以低成本，低能耗和低技术，进行强度大的劳动生产，认为只需要“适当技术”或“中等技术”，似乎是介于“镰刀和收割机之间”的技术。

这个“新”方案只是在改善第一次浪潮的恶劣处境，而远不是革掉这种处境，是急救绷带，而不是治病良药。全世界许多政府都持有这样的见解。

突然偏爱强度大的劳动也受到了指责。第一次战略一种家长式的谬论：生产的其他因素要讲究经济节约，而劳工的时间和精力则漠然视之。

第一次浪潮方案危险地贬低先进科学技术的作用。现在提倡的许多“中等技术”甚至比1776年美国农民所使用的还原始。它们更接近镰刀而不是收割机。只有那些从未干过几年艰苦手工劳动的人，才会漠视早在1855年就能比一个人快一百二十三倍的脱粒机。任何轻视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发展政策”，都将使千百万农民陷入万劫不复之境。

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任何一个大国使用第一次浪潮战略能够使它发生变革。

第三次浪潮兴起强烈地提醒我们：不要再在这两种方案之间折腾了。一种新奇的关系正在第一次浪潮社会和迅速形成中的第三次浪潮文明之间出现。

第三次浪潮许多特点与第一次浪潮社会有很多共同之处。对某些国家介绍第三次浪潮结构是不是比传统的工业化道路更容易一些？

未来的发展战略将来自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它产生于本国，适应本地的实际需要。

第一次浪潮社会应建立何种能源体系？印度科学家雷蒂指出，最迫切需要是为农村提供分散的能源。农村能源的发展与丰富，“可能是最出色的避

孕药”。

以色列分子生物学家阿维夫提出利用当地条件，形成完整生态循环的生产。美国研究单位把养虾或养鸡与种菜和养鱼综合在一起。

在长期农业规划中必须把改造气候，计算机，卫星监控和遗传学集中起来考虑。这是“锄头和计算机”两者的结合。

未来学家麦克海尔和他的妻子指出：超先进生物技术的出现，对改造第一次浪潮社会有极大的潜力。

瑞典莫尔豪斯认为，穷国眼光应当注视第三次浪潮一个关键工业：微电子技术，它有助于生产的分散化，投入资金少而收益大。过分强调劳动强度大而生产能力低的技术，可能成为坑害穷国的圈套。

在新复合材料在强度，韧度，和轻重上都比铝，钢强好几倍的今天，匆忙地建立钢厂，可能等于盖一个马鞭子工厂。穷国也许应当去迎接“全材料时代”，而不是寻求贷款或外资去建立钢铁工业？

越来越多的第一次浪潮国家的领导人意识到通讯的重要性。搞一个先进的通讯网比建设高价的道路，可能远为便宜，节约能源，从长远看更适当。

至此，可以描绘一个改革战略：既建立发展低流量生产，只需少量资金面向农村的工业，也发展某些经过仔细选择的高流量的先进科技工业，并形成一种对两者都加以保护和促进的经济制度。简而言之，即：甘地加卫星。

瑞典经济学家根纳指出：“失业”这个概念本身就是第二次浪潮的观念。完全就业是不可能实现的目标。生产兼消费者的出现，导致对第二次浪潮经济学的观念与目标产生疑问。政府需要对生产兼消费者的活动，在政策，措施和宣传等各方面，予以鼓励与赞助。

第三次浪潮不是创造某个理想的超人，不是什么新的英雄人物，而是使分布于社会的普遍性格发生显著变化。不是产生一个新人，而是产生一种新的社会性格。

明天的孩子可能在远非以孩子为中心的社会中成长。电子家庭的孩子将直接吸收在家庭工作行列之中。青年期将缩短，责任心和生产作用都增强了，可能成为未来的优秀建设者。

第三次浪潮的文明培养青年的性格可能是：对长者不那么顺从，对消费不那么计较，对享乐不那么耽溺。

第三次浪潮雇主所需要的新型工人是：敢于负责，懂得自己工作怎样与别人配合，能承担更多的任务，能迅速适应变化的情况，以及敏感地与周围的人协同一致的男女。这种人办事灵活，行动敏捷，很复杂，很独特，以自己与众不同而自豪。

第三次浪潮制度惩罚盲从的职工，奖励有限度的勇于争辩的人。凡是探求工作的意义，怀疑权威，持有独立见解，认为他负有社会责任的职工，是第三次浪潮工业最受欢迎的人。

生产兼消费者的伦理观高度评价人的作为，钱多固然取得声望，但自力更生的能力，适应和克服困难的能力，以及自己动手干的能力，都很重要。它提倡多才多艺，全面发展。生产兼消费者可能享受脑力劳动与手工劳动兼而有之的乐趣。手工劳动在遭到三百年歧视之后，再度受人尊敬。男女在客观与主观两方面取得新的平衡。

通讯革命给每个人提供一个更为复杂的自己的形象，进一步把人们区别开来，加速了人们尝试塑造自己不同形象的进程。

没有一个政府，政治制度，宪法，宪章和社会是永世长存的。要考虑修改美国宪法，要扩大“人权法案”，把过去未曾考虑到的对自由的威胁写进去，同时创建崭新的政府结构，为人们在新世界生存的需要，作出既明智又民主的决策。

将进行一场持久的斗争，整顿甚至砸碎一切代议政府，上至联合国，下至城镇乡村，这许多不灵活不中用的机构。这顶任务要求亿万人民参加。如果受到顽强抵制，就可能引起流血。风险是巨大的。然而不整顿不改革则风险更大。开始整顿得越早，我们将越安全。

必须按照三个至关重要原则，重新思考未来的政治生活：少数派权力。半直接民主。决策分工。

现在是少数派说了算。政治制度必须反映这个事实。在第三次浪潮中，真正穷人不一定再占多数，成了少数派。所以，多数派统治原则，未必再是人道和民主的了。

少数派的抬头，是丰富多样，开放而又有差异的新生产体系需要的反映。或者抵制差异性，只有用极权主义办法来拯救第二次浪潮的政治机构，结果必然导致经济与文化的停滞。或者承认差异性，对政治机构进行相应改革，引导我们走向社会进化和以少数派为基础的 21 世纪民主。

在第三次浪潮条件下重建民主，要摒弃谬误而吓人的观念，认为承认差异性，将增加社会紧张和冲突，但情况可能恰好相反。如果有适当的社会措施，差异有助于缔造一个安全而稳定的文明。新的政治机构要为容纳差异性，作出富有想象力的合法的安排。要从民主的象征——投票箱开始，重新制定投票法，消除反少数派的偏见。抛弃过时的政党结构，同时创造一些暂时的政党模式，为形成少数派结构服务。准许少数派管理自己更多的事务。我们必须以 21 世纪可能提供的技术和观念作工具，探索各种新的政治途径，迈入 21 世纪社会。

利用先进的电子通讯设备，创造许多富有想象力的措施，把直接民主和间接民主接合起来。

决策分工，是打破第二次浪潮政治领导的决策僵局，把决定权分类并重新分配，扩大分担作出决定的范围，并根据问题本身的需要而转移决策的单位。在权力过度集中的国家，决策分工是不可避免的。它不只减轻决策负担，而是从根本上改变权力班子的结构。

扩大民主决定于社会的决策负担。只要社会政治制度的决策负担在膨胀，民主将不是一件随意选择的事，而是进步的必然。

在第二次浪潮和第三次浪潮力量之间这场超级斗争，曲折地渗透到阶级和政党中，渗透到年龄和种族的团体中，渗透到性癖好和亚文化群中。它重新组织和调整了政治生活。

第三次浪潮文明新政治结构的创立，不会在单独一次社会变动趋势中到来，而是在许多地方，在各级水平上，经过几十年千百次革新和冲突的结果。

在走向未来的道路上并不排斥暴力行动的可能性，而且危险比历史上的更大了。这取决于今天各级政治领导阶层的灵活和明智。顽固地抵制第三次浪潮，将使暴力和他们的自身毁灭逐步升级。

创造一个文明需要全体人民的能动力，要发挥集体的想象力。要避免激烈的动乱，必须从现在起，把注意力集中在世界政治结构逐步废弃的问题上。不只是交给专家和政治家，而且交给广大各个阶层群众，要利用先进的电讯

设备，就这个问题展开广泛公开的辩论，同时在国家和跨国各级进行机构改组的试验。

推行一次声势浩大的预先的民主政治试验，能够防止极权主义的冲击，使千百万人民作好准备，去应付横在面前的混乱和危机，并对现存政治制度施加战略压力，促使它加速必要的改革。

变革的责任在我们肩上。要趁现存政治制度还没有进一步解体之时就开始行动。我们的使命注定是创造未来！

总之《第三次浪潮》认为，一种文明还可以运用它的某些进程和原则，发展它自己的“超意识形态”(super ideology)，去阐明它存在的现实性与合理性。

因此一旦我们了解这些领域的进程和原理是怎样的变化，以及它们怎样相互转变因而激起威力无比的波涛时，我们就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变化的巨大浪潮正在猛烈地冲击着我们今天的生活。

(赵永新 撰)

